

卢跃刚自选集·观察中国（上卷）

卢跃刚 / 著

在底层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卢跃刚自选集/卢跃刚著, - 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
2000.2

ISBN 7-80652-029-5

I. 卢… II. 卢… III. 报告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12869 号

卢跃刚自选集(上卷):《在底层》

卢跃刚 著

出版发行:南方日报出版社

地址:广州市广州大道中 289 号

电话:(020)87373998-8503

经销: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中山鼎山包装有限公司

开本:850mm×1168mm 大 32 开 印张 15.5

字数:375 千字

印数:1-10000 册

版次:2000 年 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价:23.00 元(全套:46.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一位诗人在吟唱：“风点燃荒火，冰雪温暖草棵。”

□ 我这部自选集，是“报告文学自选集”，其他文体的写作皆没选入，长篇报告文学也没有选入。我写作的全部心态，可以用本自选集“献辞”中那位诗人的诗来概括：“风点燃荒火，冰雪温暖草棵。”这首诗告诉我，一切（包括我的报告文学创作）都刚刚开始。此时，我正沐浴着新世纪的阳光。

□ 我更愿意将我的报告文学叫“报道文学”。因为我的报告文学题材，绝大部分是重大而动态的题材，是用文学方法对新闻报道的延伸，是作家职业对记者职业的延伸，或者说是“新闻一律”、新闻报道内容受到限制、新闻文体的空间狭窄的必然结果（本书所选的十三篇作品，除一篇受杂志委托外，其余皆是报社派遣）。所以，对于我来说，往往是先有残缺的报道或先有被枪毙的报道，然后有较完整的“报告文学”。它们是孪生兄弟——新闻报道先出母腹，然后是报告文学紧随其后，放声啼哭。

□ 有一种说法认为，有两种报告文学，一种是作家的报告文学，一种是记者的报告文学。一些“作家型的”报告文学作家也经常引用这种说法来证明自己“文学”的高明和层次。港台称“报告文学”为“报道文学”，似更准确，更符合“非虚构文体”的特征。因为，报告文学新闻性和真实性是第一位的，不能本末倒置。如果是“主旋律”，就可以更加“文学”，风花雪月一番，莺歌燕舞一番。我们看见这些作家倒立行走，屁股上印着“文学”，读者却哄笑而去。此时，“文学”与“虚假”、“虚荣”同一语义。

□ 最早提出“主旋律”创作的著名评论家冯牧先生曾对我说，他所说的“主旋律”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张扬社会美好

的东西，一是鞭挞社会丑恶的东西。我赞成这种涵义的“主旋律”。遗憾的是，相当长的时间里——今后还将继续下去——“主旋律”被庸俗化了，成了“文过饰非”、“逃避现实”的代名词，成了生产“精神垃圾”、误导和愚弄公众畅行无阻的通行证。

□ 检索新时期报告文学，许多代表性的有冲击力的作品出自有记者背景的作家之手。比如刘宾雁、苏晓康、麦天枢等。究其原因，相当重要的一条，就是这些作家有强烈的“报道意识”，写作题材大多是“硬碰硬”题材，重大题材，麻烦当然也最多。报告文学实际上是一种介于新闻和文学之间的边缘性文体。从新闻的角度看，它是调查性报道的放大；从文学的角度看，它是真名真姓真时间真地点探索人性探索社会问题，表达作家和社会真实情感真实想法的大载体。它之所以汇入文学主流，是因为特殊的意识形态背景而导致的社会需求。它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社会批判”是它当然的性格。

□ 报告文学的审美特征：第一层次是真实，第二层次是人性和历史感。“真实”指的是“新闻要素”所规范的情节和细节。报告文学与调查性报道采访、写作本质是一回事，都必须在前期做艰苦而翔实的调查，都必须在写作时把握起码的分寸，必须顾及法律和当事人的处境和情感。当然，在很多时候，还必须顾及意识形态宽容度。有的事实必须披露，有的话必须说，又不能充分地披露充分地说，于是作家和编辑默契，与那些“雪亮的眼睛”玩儿猫和老鼠的游戏。这些游戏体现在文本的字里行间，亦有某种特殊的审美意味。这种“欲语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的“意味”，甚至被认为是中国记者、作家和编辑玩这场游戏的“最高境界”。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难就难在不是人家肚子里的蛔虫。玩不好，便可能是灭顶之灾。要不然，怎么是“最高境界”呢？

“人性和历史感”指的是基于人性的历史感。它一是人道主义，人的基本需求和情感，人的命运；二是“大历史”的感觉或意

识。转型社会中所发生的重大事情,必有其社会的背景,必有其历史的惯性和阴影。惯性和阴影,有时是主流,有时是潜流,有时是主流与潜流的汇流。所谓“艺术性”,只能在“思想的写作”中才会呈现。在历史的背景下,关注人的命运,特别是弱势群体的命运,形成“文学”状态,以区别“新闻报道”。

□ 九十年代报告文学与八十年代报告文学相比较,有着完全不同的写作语境和走势,或者说有着完全不同的理性背景。八十年代报告文学,是在“浪漫理性”的背景下确定观察中国的视角并展开叙述的。九十年代不同。九十年代遵奉的是“客观理性”。我在不同场合和文章里讲过这种差别。概括地说,“客观理性”,首先是在对人类社会一些诸如“自由”、“民主”、“法治”等终极价值认同的前提下,对中国社会进步的性质、路径、方法、时间表有了新的认识和理解。一言以蔽之,尊重传统,尊重现实。引进社会学方法和新闻调查的方法,由“宇宙视点”回到“人间视点”,由大而化之的“宏观叙述”回到扎扎实实的“微观叙述”。我想说明的是,这种理性认识的转变,不是轻轻松松的过程,而是血与火的燃烧过程,而是痛苦和眼泪浇开的罂粟花朵。我们经历了大悲剧,于是我们停下来想想,中国发生了什么事情,中国正在发生什么事情,中国将要发生什么事情。

□ 八十年代以“精英文化批判”为特征的“强势写作”已悄然隐去,“经济”和“市场”占了主导地位。“经济学”成了“显学”,“法学”大有取代经济学成为“显学”之势;“金钱”在世俗的眼光里成了“市场乌托邦”的主要指标。九十年代严肃报告文学写作面临意识形态和“市场化转变”的双重压力。双重压力既是负面的,也是正面的。负面压力,既是意识形态约束,也有市场化的稀释和解构;正面压力,是指我们观察中国社会,仅仅靠“文化批判”的惯性,靠既往的文学标准,靠经验知识远远不够了。

□ 关于观察中国问题的方法,有人提出了“真中国问题”和

“假中国问题”的问题。这个问题提得过于极端,却发人深省。我理解它的含义,中国社会至今仍然是农村和城市二元结构,按阶层划分,又有富裕与贫困、上层与底层之分,如果我们的眼睛总是盯着城市、富裕、上层,无论是建构理论学说,还是用文学或者其他方式描述中国问题,都可能一叶障目,陷入“假问题”的泥沼。二十世纪,梁漱溟到山东搞乡村建设,费孝通研究“江村经济”,鲁迅塑造“阿Q”和“祥林嫂”,至今无人超越。我的九十年代报告文学创作没有提出“真问题”、“假问题”的问题,我也不可能提出这样的问题。我认为,只要是认真严肃地研究和写作,都值得尊重。我只是发现,研究中国问题,如果没有底层、农村、贫困的参照系,没有这些层面——一个涉及十亿左右人口的层面的深切观察和体验,很难把握中国社会的走向。

□ 在此,我必须说明,我的自选集上卷用了我一九九六年发表在《中国作家》的《在底层》的标题,下卷《在高层》标题则是出版商和封面设计的技术需要并经我同意面定的。出版商通读了我的作品,封面设计家听过我的想法,他们的意见有道理。

本书所收选的作品曾分别发表在《中国作家》、《当代》、《开拓》、《报告文学》等。在此,我要感谢《中国作家》萧立军、《当代》刘茵、《开拓》(一九八九年停刊)王小中。本书所选的绝大部分作品经他们的手编辑发表。我知道,一个记者,一个作家,最大的幸运是遇到与自己心灵沟通的好编辑。遇到他们,真是我的幸运。作品发表前,我们一起讨论修改意见;作品发表后,他们与我共同承担成功的欢乐和压力的烦恼。他们在我的作品中灌注了勇气和智慧,至今温暖着我的心。我至今怀念萧立军办公室那些啤酒瓶和卤猪蹄。还有许许多多帮助过我的人,名字不能一一列举,也请你们接受我的感谢和祝福。

2000年1月15日于北京木樨地

目 录

在底层

| | |
|-----------|-----|
| 自 序 | (1) |
| 在底层 | (7) |

《在底层》一九九六年初在《中国作家》发表后,引起了一场大风波,因为文中内容触痛了地方权势者,招致大规模的反击,中国作协在不调查、不与作家对话的情况下,武断地下了“严重失实”等影响恶劣的结论,我亦致书中国作协抗议,《中国作家》在巨大压力下,被迫刊登检讨“声明”。《中国作家》一时“洛阳纸贵”,这便是一九九六年中国文学界的“《在底层》事件”。

《在底层》中,我实际上提供了一个“底层”视角,用“单元逻辑”、“单元阅读”的结构方法,把沈阳下岗职工、贵州山区农民、重庆“海外集团事件”所涉及的冤屈者,把一九八九年以来的中国政治、新闻运作、经济在恶劣的环境下生长的奥秘,把工人、农民、记者、报社总编辑、市长、宣传部长、市委书记、部长、省长等等似乎不相干的人物、事件和领域,像冰糖葫芦一样串了起来。这篇报告文学不能用传统的报告文学阅读方法来阅读,因为其中既不是“人物”的,也不是“事件”的;既是“人物”的,也是“事件”的。但是,它的主旨很清楚:揭示中国人、特别是底层人严酷的生存处境(既是宏观的,也是微观的),打破幻想,采取积

极的人生态度,即生存“自救”,否则没有出路。

以人民的名义——湖南娄底政治生活档案 …………… (73)

我在进入一种愤怒和恐惧的写作状态。

湖南娄底市人民代表颜跃明在一九九二年市人大会上,依法向代表大会提出罢免市长案,市长没被罢掉,自己却被“监视居住”二百一十四天,还是那种整人的老套路,在市长积极参与下,公安、检察联合组成专案组,吸收社会一千人等,人大会议一结束,就非法拘禁了颜跃明。先是整经济问题,整了半天整不出来,然后整男女作风问题,牵涉无辜男女数十人,刑讯逼供,惨不忍述。此时,邓小平南巡讲话,全国大踏步改革开放,娄底却是人人自危,白色恐怖。

“颜跃明事件”涉及我国政治体制、司法体制等许多重大问题。身临其境,顿感惊悚: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颜跃明身上发生的事情,完全可能发生在我们(包括我)的身上,颜跃明的命运完全可能是我们(包括我)的命运。

讨个“说法”——《以人民的名义》续篇…………… (145)

调查湖南娄底“颜跃明事件”属报社派遣,但是七千字的调查报告“二百一十四天的较量”写出来后却被“枪毙”,后在《经济日报》一九九三年“两会”讨论两院报告期间全文发表。可能是因为“兔死狐悲”、“物伤其类”的感受,与会代表反响强烈,纷纷质询湖南代表团。这是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以人民的名义》在《当代》当年第三期发表,发表后,即在海内外引起轰动。在《当代》主持召开的作品讨论会上,我说,我将以“连续报告”的形式写出《以人民的名义》续篇,因为事件远远没有结束。与会者颇惊讶,因为报告文学写作往往都是一锤子买卖,特别是揭露性的题材。

续篇在当年《当代》第五期发表时,事件仍没有了结。于是在文章的结尾处告诉善良的读者:“惩恶扬善、伸张正义、因果

报应、出口鸟气的好莱坞式结局，在生活中，往往是一种良好的愿望和美丽的期待。”

创世纪荒诞——“傻子瓜子”兴衰记…………… (205)

不到四万字的文章，关于“傻子”年广九、“傻子瓜子”的经典故事，经典细节多的我都有点不好意思。我采访到这些经典故事、经典细节，不是因为我聪明，而是因为我傻。我只不过是把上百的记者、作家看到了一笑了之并文过饰非的事儿当了真，只不过按照常识作了判断。通过这些故事细节，我们基本能把握那一时期的“改革家”的情状。

据我调查，“傻子瓜子”在八十年代末衰微，不是像人们所说的，是因为他没有文化，素质不高，不懂现代管理。西方原始积累时期的企业家，大多是海盗和亡命之徒，大多没文化，可是并不妨碍他们有经营头脑，构筑自己的商业帝国。“傻子瓜子”衰微的原因不外有二：一、在独特的制度和意识形态挤压下，年广九经营心态变形；二、违背起码的商业道德，坑害消费者，自毁品牌，“禁止有奖销售”仅仅是导火索罢了。

“关广梅现象”回顾…………… (255)

关广梅在一九八七年可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她所领导的辽宁本溪“租赁改革”被认为是中国改革的标志，她的出名，很大程度因为《经济日报》“姓资姓社”大讨论。一九八八年初，我到本溪调查关广梅租赁改革。我的结论是：一、本溪关广梅租赁承包责任制改革，基本上是一出闹剧；二、一九八七年《经济日报》大讨论也基本上是一出由报社导演的闹剧。

我到本溪发现了两个让我惊诧不已的事实：

一、关广梅任总经理的本溪东明商业集团，没有获得法律资格，关广梅既不是集团的法人代表，也不是下属八个有独立法人资格商店的法人代表。关广梅正是在这种长期不合法的状态下，参加包括党的十三大在内的各种政治、经济活动。

二、关广梅那封导致“姓资姓社”大讨论的给《经济日报》的信，是《经济日报》记者、本溪政策研究室“提升”、“拔高”关广梅本意而炮制的。而且，《经济日报》记者对待关广梅的态度前后不一。

我发现，建立法治（当时我用的是“法制”），建立市场经济秩序这样一些改革的目标，却被所谓的“改革”和“改革者”蔑视。我对那种用“运动”的方法搞改革提出了质疑。这种质疑，今天也有其重大的现实意义。

春天里的神话 (307)

郑州商战，“亚细亚风波”，是一九八九年后两三年的沉闷气氛中人们能拿出来说的故事。故事本身很精彩。但是，我想通过这个故事说明的东西却不是人们想象的样子。我的落脚点是评价中国传统文明。

我的目光延伸到了北宋汴梁。《东京梦华录》吓了我一跳：当时的汴梁竟是如此繁华。“清明上河图”仅仅是汴梁之一角。交易规模之大，交易方式之先进；人口至少 250 万，比现在的郑州市区人口多得多……活脱脱呈现出的是商业文明的景象。往上缕，可以缕到发源于河南的商朝；往下缕，可以缕到晚清，浓郁的商业气息绵延不绝。而这一块儿，在评价中华传统文明时被忽视被丢失了。人云亦云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在事实面前又受到了挑战。

乡村八记 (381)

我必须安顿我负疚的灵魂，于是写了《乡村八记》。

我一九七五年插队回到四川雅安老家，一九七六年主持修建“科学饲养场”，在公社的支持下，以“科学”与“革命”的名义。挖了数十座古坟，取石砌墙。几年后的一天晚上，灯光错暗，我嫂子告诉我，每逢天阴下雨、气候寒冷的时候，便有鬼魂哭泣。当年，由于施工质量不好，拱券垮塌，一个如花似玉的女知青成

了冤鬼。当地人说,她替了我的命。冤鬼冤魂知冷知热,没有了栖身之所,怎么不哭泣?但愿他们在天之灵能原谅我。

农村经历,颠覆性地改造了我的世界观,培育了我的“底层视角”。

二十年后,我来到了鄱阳湖畔的湖下村,我在一位农民青年家里住了八天,调查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

中国农民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吃的是草,挤的是奶”,被剥夺,然后被遗忘。我想说明的是,占我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庞大群体是怎样被社会“边缘化”的;一九四九年“土地改革”以来半个世纪,中国传统社会的伦理秩序怎样被“革命”颠覆,并留下怎样的恶果。

在高层

南中国海喻言 (1)

一九九九年五月八日北约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以中美关系为核心的暧昧的国际关系摊了牌,终于使我三年前写作的《南中国海喻言》前两章在《中国作家》和《报告文学》发表,我们虽然大力宣传“爱国主义”,但在现实中,什么时候“爱国”,什么地方“爱国”,什么领域“爱国”,什么形式“爱国”,什么分寸“爱国”,什么渠道“爱国”,什么人有权资格“爱国”,是被上面严格规定的。所以,媒体包括文学刊物,但凡涉及“外交”,但凡涉及国家利益、国际关系、地缘政治,惶惶如惊弓之鸟。真是一种大荒唐。

《南中国海喻言》的命运便能说明这个问题。

据我所知,《南中国海喻言》是国内五十年来第一次比较系统地报道南海情况。

我来告诉你一个真实的南海:南沙群岛二百多个岛礁八十年代已被周边国家瓜分完毕,丰富的石油天然气资源已被开采或正在勘探开采,我国渔民被周边国家大肆抓扣、审判、打死、打

伤,大肆抢掠、没收设备,外交不得力,海军束手无策;北部湾有过之无不及。所谓南海主权,仅仅是九条画在地图上的虚线而已。

王恒杰传奇——《南中国海喻言》续篇 (65)

一位老人一辈子从事边疆考古,学术目的只有一个:维护国家利益和国家主权。可是读完这篇报告文学,我相信,谁也不会轻松。这位老人一辈子爱国,却一辈子孤独。

这位老人是一位失去左小臂的考古学教授,一位残疾学者,一位残疾书生。

那些肢体健全,最有“权力”爱国的人都到哪儿去了呢?终让这位独臂老人泛舟南沙,出生入死,积劳成疾,早早地离开了我们……我参加了独臂老人在北京八宝山的葬礼。那天,苍天都在为他哭泣。

辛未水患 (119)

连我自己都有点吃惊,一九九一年《辛未水患》中的判断和预言,一九九八年长江、松花江大洪水全部兑现。我的判断和预言是:一、中国治水有一对基本矛盾永远无法解决,即水的自然规律与人类社会的利益构成永远冲突;二、中国治水思想,宏观上“堵”始终占上风(注:亦有例外,如二千二百多年前修建的都江堰和灵渠),并影响到了政治理念,微观则是以邻为壑;三、出于利益的短视,宁愿花钱买棺材哭哭啼啼送葬,不愿花钱买药长治久安;四、出于政治的短视,非人性地面对灾难,丧事当喜事办,把灾难当作对当权者歌功颂德的机会,凡此,水灾不仅不会减弱,而且会加剧。一九九一和一九九八年水灾,本质是一样的:人祸大于天灾。

对中国治水思想和水灾历史、现状的考察,促使我产生了如下想法:一、马克思“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理论,由于其“西方中心”背景,由于其对东方社会特别是中国社会的陌生,解释力过

于狭窄；二、评价文明社会，特别是评价中国这样的传统社会，制度文明是第一指标，简单用“专制制度”一言以蔽之，很难解释中华文明一统天下、文化传递两千余年而不灭的历史；三、发现了家庭、宗族、社区、乡、县、市、省半径不断扩大的治水的“利益同心圆结构”，治水首先要调整的是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然后才是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四、对统治者来说，治水的政治考虑远大于兴利除害。

长江三峡：半个世纪的论证 (225)

三峡水坝是中国人的一个宿命，否则无法解释一个民族为了一个工程萦回纠缠七十三年才有其始终。一个工程的论证几乎贯穿一个世纪，是人类文明史上绝无仅有的。

三峡论证实际上是围绕着两个层面展开的：一个是“治水”思想，即长江治理，应该是“先支(流)后干(流)”，还是“先干(流)后支(流)”；一个是“治国”思想，即是否坚持民主与科学精神。民主与科学精神的实质，就国家重大决策而言，就是允许有反对派，尊重反对派意见，并创造一个保证反对派发言的制度性环境。三峡论证如果没有反对派意见，工程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上马，后果一定是灾难性的。即使是三峡工程的主上派也承认这个判断。

根据我对三峡工程长期跟踪，我认为，有些问题必须记录在案：一、三峡建设资金，反对派的计算基本准确，即建成后所需动态投资约四千亿至五千亿，还不包括三峡库区地方配套改造投资和其他间接投资，主上派在投资问题上打了埋伏，或者是计算太有出入；二、移民投资管理有明显的腐败黑洞，库区一百一十四万移民将可能留下巨大的隐患；三、三峡上游每年流进库区的五至六亿吨泥沙短期内不可能解决，而只有二百亿立方米库容的三峡水库，其寿命将一直面临挑战；四、库区环境问题，目前为止，还没有找到切实有效的解决办法。

超越世纪:性艺术在中国 (325)

什么是“性艺术”?有点儿莫名其妙。“超越世纪:性艺术,中国”,有点儿大而无当。但是,用“性艺术”来概括一九八八年底,一九八九年初“人体油画艺术大展”倒有简洁之妙。“人体油画”现在不觉得有什么了不起,当时可不得了。平时门可罗雀的中国美术馆门票两角钱,现在门票两块钱还人山人海,波澜壮阔。“人体油画艺术大展”由一个专题性艺术展览,演变成了社会关注的重大事件,重要社会现象,“人体油画艺术大展”与稍后的“现代艺术大展”,被认为是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大悲剧预言性的事件。

这期间,还发生了模特儿起诉画家侵权官司。这场官司一打十年,今年我在报纸上看见模特儿胜诉的消息时,真有恍如隔世之感。

在那酒神徘徊的地方 (383)

茅台酒欺负人,贵州醇不服气,所以有了斥资数千万打官司的恶战。这场恶战,持续六七年,直杀得血雨腥风,到今天才以茅台酒停止“贵州醇”生产,贵州醇胜诉而告终。

这是中国酒业恶性竞争的典型案例。

我当时的判断没有错。文章发表后,遭到贵州省的反击,极尽权势造谣中伤之能事,编辑部在中国报告文学会领导的压力下,被迫赴贵州解释,我则坚持己见,坚信报道的事实没问题。时间作出了最公正的裁判。

报告文学新局面的诞生 冯立三 (452)

卢跃刚速写 吴 滨 (473)

我有话要说 卢跃刚 (479)

自序



一位诗人在吟唱：“风点燃荒
火，冰雪温暖草棵。”

一位诗人在吟唱：“风点燃荒火，冰雪温暖草棵。”

□ 我这部自选集，是“报告文学自选集”，其他文体的写作皆没选入，长篇报告文学也没有选入。我写作的全部心态，可以用本自选集“献辞”中那位诗人的诗来概括：“风点燃荒火，冰雪温暖草棵。”这首诗告诉我，一切（包括我的报告文学创作）都刚刚开始。此时，我正沐浴着新世纪的阳光。

□ 我更愿意将我的报告文学叫“报道文学”。因为我的报告文学题材，绝大部分是重大而动态的题材，是用文学方法对新闻报道的延伸，是作家职业对记者职业的延伸，或者说是“新闻一律”、新闻报道内容受到限制、新闻文体的空间狭窄的必然结果（本书所选的十三篇作品，除一篇受杂志委托外，其余皆是报社派遣）。所以，对于我来说，往往是先有残缺的报道或先有被枪毙的报道，然后有较完整的“报告文学”。它们是孪生兄弟——新闻报道先出母腹，然后是报告文学紧随其后，放声啼哭。

□ 有一种说法认为，有两种报告文学，一种是作家的报告文学，一种是记者的报告文学。一些“作家型的”报告文学作家也经常引用这种说法来证明自己“文学”的高明和层次。港台称“报告文学”为“报道文学”，似更准确，更符合“非虚构文体”的特征。因为，报告文学新闻性和真实性是第一位的，不能本末倒置。如果是“主旋律”，就可以更加“文学”，风花雪月一番，莺歌燕舞一番。我们看见这些作家倒立行走，屁股上印着“文学”，读者却哄笑而去。此时，“文学”与“虚假”、“虚荣”同一语义。

□ 最早提出“主旋律”创作的著名评论家冯牧先生曾对我说，他所说的“主旋律”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张扬社会美好

的东西，一是鞭挞社会丑恶的东西。我赞成这种涵义的“主旋律”。遗憾的是，相当长的时间里——今后还将继续下去——“主旋律”被庸俗化了，成了“文过饰非”、“逃避现实”的代名词，成了生产“精神垃圾”、误导和愚弄公众畅行无阻的通行证。

□ 检索新时期报告文学，许多代表性的有冲击力的作品出自有记者背景的作家之手。比如刘宾雁、苏晓康、麦天枢等。究其原因，相当重要的一条，就是这些作家有强烈的“报道意识”，写作题材大多是“硬碰硬”题材，重大题材，麻烦当然也最多。报告文学实际上是一种介于新闻和文学之间的边缘性文体。从新闻的角度看，它是调查性报道的放大；从文学的角度看，它是真名真姓真时间真地点探索人性探索社会问题，表达作家和社会真实情感真实想法的大载体。它之所以汇入文学主流，是因为特殊的意识形态背景而导致的社会需求。它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社会批判”是它当然的性格。

□ 报告文学的审美特征：第一层次是真实，第二层次是人性和历史感。“真实”指的是“新闻要素”所规范的情节和细节。报告文学与调查性报道采访、写作本质是一回事，都必须在前期做艰苦而翔实的调查，都必须在写作时把握起码的分寸，必须顾及法律和当事人的处境和情感。当然，在很多时候，还必须顾及意识形态宽容度。有的事实必须披露，有的话必须说，又不能充分地披露充分地说，于是作家和编辑默契，与那些“雪亮的眼睛”玩儿猫和老鼠的游戏。这些游戏体现在文本的字里行间，亦有某种特殊的审美意味。这种“欲语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的“意味”，甚至被认为是中国记者、作家和编辑玩这场游戏的“最高境界”。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难就难在不是人家肚子里的蛔虫。玩不好，便可能是灭顶之灾。要不然，怎么是“最高境界”呢？

“人性和历史感”指的是基于人性的历史感。它一是人道主义，人的基本需求和情感，人的命运；二是“大历史”的感觉或意

识。转型社会中所发生的重大事情,必有其社会的背景,必有其历史的惯性和阴影。惯性和阴影,有时是主流,有时是潜流,有时是主流与潜流的汇流。所谓“艺术性”,只能在“思想的写作”中才会呈现。在历史的背景下,关注人的命运,特别是弱势群体的命运,形成“文学”状态,以区别“新闻报道”。

□ 九十年代报告文学与八十年代报告文学相比较,有着完全不同的写作语境和走势,或者说有着完全不同的理性背景。八十年代报告文学,是在“浪漫理性”的背景下确定观察中国的视角并展开叙述的。九十年代不同。九十年代遵奉的是“客观理性”。我在不同场合和文章里讲过这种差别。概括地说,“客观理性”,首先是在对人类社会一些诸如“自由”、“民主”、“法治”等终极价值认同的前提下,对中国社会进步的性质、路径、方法、时间表有了新的认识和理解。一言以蔽之,尊重传统,尊重现实。引进社会学方法和新闻调查的方法,由“宇宙视点”回到“人间视点”,由大而化之的“宏观叙述”回到扎扎实实的“微观叙述”。我想说明的是,这种理性认识的转变,不是轻轻松松的过程,而是血与火的燃烧过程,而是痛苦和眼泪浇开的罂粟花朵。我们经历了大悲剧,于是我们停下来想想,中国发生了什么事情,中国正在发生什么事情,中国将要发生什么事情。

□ 八十年代以“精英文化批判”为特征的“强势写作”已悄然隐去,“经济”和“市场”占了主导地位。“经济学”成了“显学”,“法学”大有取代经济学成为“显学”之势;“金钱”在世俗的眼光里成了“市场乌托邦”的主要指标。九十年代严肃报告文学写作面临意识形态和“市场化转变”的双重压力。双重压力既是负面的,也是正面的。负面压力,既是意识形态约束,也有市场化的稀释和解构;正面压力,是指我们观察中国社会,仅仅靠“文化批判”的惯性,靠既往的文学标准,靠经验知识远远不够了。

□ 关于观察中国问题的方法,有人提出了“真中国问题”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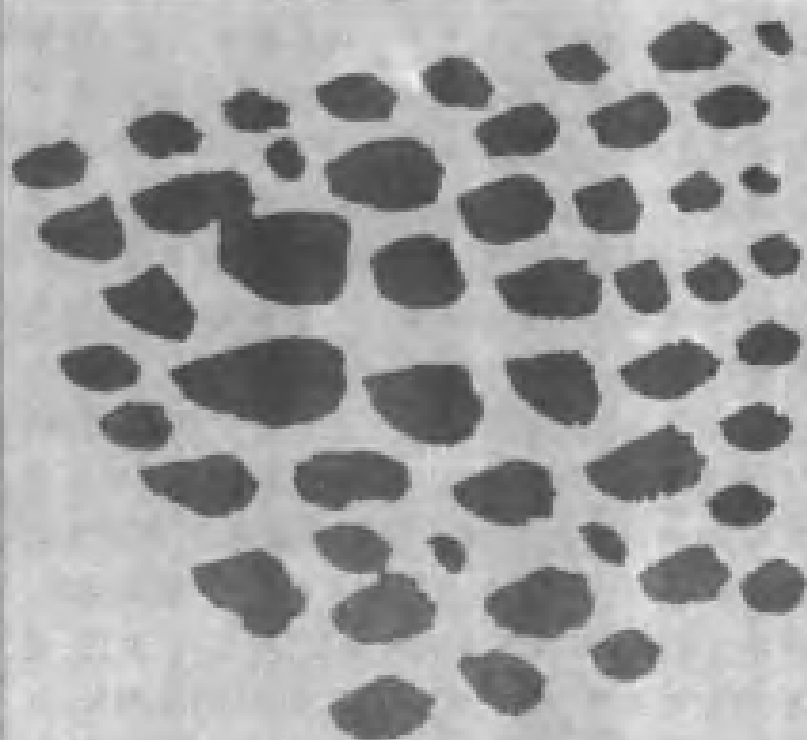
“假中国问题”的问题。这个问题提得过于极端,却发人深省。我理解它的含义,中国社会至今仍然是农村和城市二元结构,按阶层划分,又有富裕与贫困、上层与底层之分,如果我们的眼睛总是盯着城市、富裕、上层,无论是建构理论学说,还是用文学或者其他方式描述中国问题,都可能一叶障目,陷入“假问题”的泥沼。二十世纪,梁漱溟到山东搞乡村建设,费孝通研究“江村经济”,鲁迅塑造“阿Q”和“祥林嫂”,至今无人超越。我的九十年代报告文学创作没有提出“真问题”、“假问题”的问题,我也不可能提出这样的问题。我认为,只要是认真严肃地研究和写作,都值得尊重。我只是发现,研究中国问题,如果没有底层、农村、贫困的参照系,没有这些层面——一个涉及十亿左右人口的层面的深切观察和体验,很难把握中国社会的走向。

□ 在此,我必须说明,我的自选集上卷用了我一九九六年发表在《中国作家》的《在底层》的标题,下卷《在高层》标题则是出版商和封面设计的技术需要并经我同意面定的。出版商通读了我的作品,封面设计家听过我的想法,他们的意见有道理。

本书所收选的作品曾分别发表在《中国作家》、《当代》、《开拓》、《报告文学》等。在此,我要感谢《中国作家》萧立军、《当代》刘茵、《开拓》(一九八九年停刊)王小中。本书所选的绝大部分作品经他们的手编辑发表。我知道,一个记者,一个作家,最大的幸运是遇到与自己心灵沟通的好编辑。遇到他们,真是我的幸运。作品发表前,我们一起讨论修改意见;作品发表后,他们与我共同承担成功的欢乐和压力的烦恼。他们在我的作品中灌注了勇气和智慧,至今温暖着我的心。我至今怀念萧立军办公室那些啤酒瓶和卤猪蹄。还有许许多多帮助过我的人,名字不能一一列举,也请你们接受我的感谢和祝福。

2000年1月15日于北京木樨地

在底层



该文发表后，引起了一场大风波。《中国作家》被迫刊登检讨“声明”。《中国作家》一时“洛阳纸贵”。这便是一九九六年中国文学界的“《在底层》事件”。

世纪末感言

《在底层》一九九六年初在《中国作家》发表后，引起了一场大风波，因为文中内容触痛了地方权势者，招致大规模的反击，中国作协在不调查、不与作家对话的情况下，武断地下了“严重失实”等影响恶劣的结论，我亦致书中国作协抗议，《中国作家》在巨大压力下，被迫刊登检讨“声明”。《中国作家》一时“洛阳纸贵”，这便是一九九六年中国文学界的“《在底层》事件”。

《在底层》中，我实际上提供了一个“底层”视角，用“单元逻辑”、“单元阅读”的结构方法，把沈阳下岗职工、贵州山区农民、重庆“海外集团事件”所涉及的冤屈者，把一九八九年以来的中国政治、新闻运作、经济在恶劣的环境下生长的奥秘，把工人、农民、记者、报社总编辑、市长、宣传部长、市委书记、部长、省长等等似乎不相干的人物、事件和领域，像冰糖葫芦一样串了起来。这篇报告文学不能用传统的报告文学阅读方法来阅读，因为其中既不是“人物”的，也不是“事件”的；既是“人物”的，也是“事件”的。但是，它的主旨很清楚：揭示中国人、特别是底层人严酷的生存处境（既是宏观的，也是微观的），打破幻想，采取积极的人生态度，即生存“自救”，否则没有出路。

——作者

—

沈阳铁西区菜市场外摆擦鞋摊儿的“刘姐”远不会想到，一个时代的结束和一个时代的到来，竟然是那么突兀，那么急促，那么冷酷。

大家都叫她“刘姐”。一九九六年元旦刚过的沈阳，零下一二十度的天气，浸骨地冷。三十多岁的刘姐，皮肤白皙，衣服整洁，羽绒服外罩了袖套，戴着一块白头巾，与其他摆鞋摊儿的一比，显然是沈阳城里人。她摆摊儿一年多了。她所在的建筑公司放长假也有一年多了。零下十几度的大冬天，在家门口干擦皮鞋的营生，别说干，以前就是梦都没有梦见过。沈阳有谚云：“宁肯饿死，也不蹲马路牙子。”有一次儿子对她说：“妈，你能不能不擦皮鞋？”她说：“你妈不擦皮鞋，你能上学吗？”

刘姐刚开始干时可没有这么理直气壮。天冷，她跺着脚对访问者说：最初半个月，她戴了个大口罩，把脸捂了个严严实实，看见熟人赶紧低头。“我要是个大姑娘，我也不来擦皮鞋。这里的人都认识，以后怎么找对象呀。”她指指旁边的外地人说，“不像他们，在这里低头挣钱，完了回家换身干净衣服，谁知道你在外面干的是啥？”

与刘姐相比，四十六岁的刘金芬隔了一代人。

刘金芬是一九九三年从一家大型国有企业的后勤处下岗的。她三天两头跑各类劳务市场，至今没有找到可心的工作。她说：“难呐，俺们这年龄，不上不下的。体面点儿的活儿，人家还不挑年轻点儿的、水灵点儿的？难！可不挣点儿钱不容易呀。我爱人单位效益也不好，每月勉强能百分之七十开支。我父母

和公公、婆婆都是一个厂的退休工人，厂子一黄，退休金都错月发，如今这物价，吃饭都是问题。我有个十九岁的儿子，今年大学二年级，每个月都要寄一百元钱。到去年四月，我觉得实在拿不出这笔钱，就跟儿子商量，看能否向学校申请困难补助。儿子回信说：‘只有农村来的学生才申请补助呢。’”

无可奈何的刘金芬，说起来是“老三届”。老三届除了考上大学的外，绝大多数都回城就了业。就业政策，倒是简单明了，“谁家的孩子谁抱走”，近亲繁殖。这批人年轻的时候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上了山，下了乡，少则几年，多则十几年，青春年华都窝在了农村。回城后，忙恋爱，忙结婚，忙住房，忙生孩子，三忙两不忙，没文化，没技术，一晃就到了上有老下有小改革开放的竞争时代。沈阳市妇联的一份调查说，沈阳下岗女工中，四十至四十五岁的占到了百分之七十一一点五，都是刘金芬的年龄段。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这批人在社会就业竞争中都处于劣势。

刘金芬念了一段顺口溜：“最想的是上岗，最怕的是离厂，最倒霉的是老三届，最担心的是物价涨。”“你看，这些都让我给摊上了，可我做错了什么？”

原沈阳市数据转换部的职工刘洁则是另外一番景象。

她一九九二年下岗，自己办了计算机培训班。在各种计算机培训班林立的情况下，为了在竞争中求生存，她拖着七个月身孕到北京揽活。孩子刚满月，她又为了一批急活上了北京。一次办完业务出来坐地铁，奶胀得厉害，就走进地铁厕所，往池子里挤奶。

雪白的奶水流进下水道，打扫卫生的大妈见了直心痛，问：“这位姑娘，那么好的奶水，为什么不给孩子吃？”

刘洁一听这话，眼泪决堤般流了出来。

沈阳寒冷的冬天，把人的心抽紧了。“怎么还不来暖气？”铁西区进入十一月了，屋里冰凉。许多工厂停产或半停产，工人都

在家歇了。没钱开工,没有东西拿到市场上去买,或者傻大黑粗的东西根本就卖不出去,没钱发工资,没有取暖费,供暖公司收不到取暖费就没钱买煤,没钱买煤就无法供暖。大家都在熬着,等着,盼着,心情沮丧。

沈阳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

这一天,一批下岗失业工人涌进了沈阳市政府。

“俺们要见市长!”

“俺们要工作!”

“俺们要吃饭!”

市长李长春出来接见工人代表。

李长春,细眼,白净,中等身材,穿着黑呢子大衣。

在李长春的市长任上,他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场面。但是,沈阳这笔账,他心里谁都知道,对他,他早有思想准备。在他的任内推行沈阳防爆器材厂破产试点改革,震动了全国。虽然沈阳防爆器材厂是一个只有几百人的小型国有企业,但是具有很浓重的象征意义,毫无疑问是“铁饭碗”。这意味着一九八四年以来缓慢疲惫的城市体制改革要“活不好,死不了”的国有企业开刀了,这意味着中国政府和企业将与“父爱主义”告别了。相对于几十万个处于亏损半亏损的国有企业来说,这只不过是小试锋芒,投石问路。投石问路,当然是诚惶诚恐小心翼翼,对可能发生的社会震荡作出估价,特别是下岗失业工人安置和出路问题,将会充分显露出来。弄不好,矛盾激化,影响社会安定。而且,八十年代中期,恰恰是中国改革风起云涌、中国改革往何处去的关键时期,各种思潮花样翻新,各种利益纠缠胶着,改革激进与渐进争论不休,学生要民主,工人要生存,社会关系空前的复杂和脆弱。政治家们多少有些忐忑不安:经济体制改革再往前走多远,才可能不超过政治体制的安全线,才可能不动摇中国政治的基础?不久便有了“学运”、“反资产阶级自由

化”和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辞职。真可谓“山雨欲来风满楼”。风满楼，颇犯愁。

对于工人来说，一个温温馨馨充满了幻想的时代结束了。

对于政府来说，一个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双刃剑拿在了手里。

所有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中国人都会发现，他既是改革者，又是被改革者。他们时刻都在扮演着“改革和被改革”这一双重角色。社会的某一个阶层，要么原有的利益会在新的利益结构下被拿走，要么还会得到新的好处。人人都在呼吁改革，人人又在保护既得利益。在这场利益的调整、纠缠、较劲的改革风景中，“乌托邦式的福利社会”土崩瓦解，贫富两极悬殊拉大，在缔造了大量百万富翁的同时，缔造了大量的贫困人口。

这在预料之中，却是这样的急迫，直直地逼到了李长春面前，逼到了所有市长面前。

在工人看来，找市长要饭吃，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市长关心市民的疾苦，更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理论上讲，你这个市长还是大伙选出来的呢！

李长春来到了工人中间。

“我是李长春，有事坐下说。”

工人们大声嚷嚷着：

“俺们是工人，工厂开不出支，俺们吃什么？”

“市里把俺们调到有钱的厂子去吧，有福大家享，有饭大家吃嘛！”

要求就是这么两条，说起来并不过分。人要吃饭，人要生存，这是最起码的要求。任何人都无法拒绝这个要求。可是李长春无法现场解决上访工人的困难，而现在又不是说大道理的时候。他从兜里掏出几张钱：

“同志们几个月拿不到工资，我当市长的心里也难过。这几

个钱算是我的一点心意，请你们收下。”

“俺们不要市长的钱！俺们要共产党的钱！”

“共产党也不是点石成金的神仙，能变金山银山！”

“……”

“同志们，我领大家唱一首歌吧。”

“唱歌？”

这时候唱哪门子歌？大家心里直犯嘀咕。

“来，我给起个头。”

这时，屋外的人听见接待室里传出了《国际歌》的歌声……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

也不靠神仙皇帝。

要创造人类的幸福，

全靠我们自己。

……

李长春与上访工人同唱《国际歌》，一篇报道描述说，唱完歌，“工人悄然离去”。有人说，一首歌就是一段历史。

此一“史”，彼一“史”。此一时，彼一时。同一首歌，今天唱，别有一番滋味。

二

一九九六年二月三日午夜十一点四十五分。北京木樨地家中，我坐立不安。

明天应该发沈阳“下岗职工”生存状况十篇调查报道的第一篇《走进沈阳》。第一篇里写到李长春带领上访工人唱《国际歌》。不安不是因为发表的问题，而是事实本身。李长春现任河

南省省委第一书记,如果“唱国际歌”的事实有问题,一个电话打到北京来,可能带来颠覆性的后果。作为报道的组织者和责任编辑,对此必须进一步核实。“下岗职工”生存状态是既具有极大的新闻价值又相当敏感的题材。“把毛浩调来!”四川记者站站长毛浩元旦前便被紧急招到北京,与编辑部记者吕彤、沈阳记者站记者迟洪江会合,共同商讨,面授机宜。元旦前后二十多天的采访,回来后十几天的写作,十篇稿子,后九篇稿子万一被掐死,那便是欲哭无泪了。

“神经过敏”,是大报从业人员的第一职业病;“好处着手,坏处着想”,是大报从业人员的第二职业病;“偷偷摸摸躲躲闪闪暖暖昧昧不明不白不尴不尬不清不爽”,是大报从业人员的第三职业病。

废话少说,赶快打电话!“66”,刚拨了京东宾馆的两个号,便发现昏了头。“早把毛浩这家伙放回了成都。”把毛浩放回成都,真是一个英明决策。一年“新婚燕尔”,出来一个多月就想老婆,直想得心猿意马面容憔悴,再也无法写文章。一天下来,说是“一个字没写”。“跃刚,头痛,没感觉,写不出来。”他捶着头跟我说,白皙孱弱的身子骨夸张地摆动着。我的眼神说:“你少装蒜!”“饱汉不知饿汉饥!你混蛋!”他把细黑边眼镜往上推了推,那细白的小身子骨能飞过来吃人。三十多岁,翩翩少年,复旦大学中文系才子,此刻已经茶饭不思。“志春决定。”我说。“跃刚决定。”主管副总编辑周志春球又踢给了我,然后冲着我得意地一笑。冯尼格的黑色幽默,《回到你老婆身边去吧》!“走吧!”我说。说这话时,我真想冲着他屁股狠狠地踹一脚。毛浩,“冒号”。他被我扣留一个多星期,写了五篇报道,没写完,“冒号”后面还有两篇文章,“带回老婆身边写去吧”!他欢呼雀跃着去买了第二天的飞机票。稿子按时用电脑传回了编辑部。这小人儿,这情种,居然能写出如此沉稳厚重的文章!还是“老婆”这剂

药管用。正在开着会，我悄悄给周志春写了一张条子：“放毛浩回家，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英明决策。”隔着桌子，志春扔过来会意地一笑。

午夜时分的毛浩，想必是“重湖叠翠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

吕彤在盯夜班。

“吕彤，把毛浩给我揪起来。”

“我没带他家电话。”

“我也没有。我有重要事实跟他核实。事关重大。你想办法。”

“好，我想办法。打通了说什么？”

“让他给我家来电话。多晚都行。”

零点十五分，窗外寒风凛冽。电话响了。

“跃刚有什么事儿？”几千公里外的毛浩，声音里分明还带着被窝热乎乎的气味。

“抱歉，毛浩，为了慎重起见，我还要核实一下李长春带着工人唱《国际歌》的事实来源。”

“没问题。在沈阳采访，好几个人给我讲过这个�故事。而且还有正式出版物记载。”“OK！”

三

今晚失眠。满眼浮现的是法国人欧仁·鲍狄埃和狄盖特，这两个《国际歌》的词曲作者。好像鲍狄埃秃顶，狄盖特戴着帽子，都是大胡子。一个沉郁的声音在反复朗诵着《共产党宣言》的第一句话：“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

这个“幽灵”，便是人类理想中的公平公正的社会——共产主义。原来以为，这个社会已经就在眼前。可现实打破了幻想。“一切归劳动者所有”，结果是谁都有又谁都没有。

一九一三年一月三日俄罗斯《真理报》刊登了一篇“尼·列·”的署名文章《欧仁·鲍狄埃（为纪念他逝世二十五周年而作）》。“尼·列·”显然是匿名。“鲍狄埃出身于贫困的家庭，在整个一生中他一直是一个穷人、一个无产者，他起先靠包装箱子，后来靠绘制印花布图样维持生活。”欧仁·鲍狄埃是巴黎公社委员。“公社失败后，鲍狄埃被迫逃到了美国。著名的《国际歌》就是他在——一八七一年六月，也可以说是在五月的流血失败之后的第二天写成的……”“这首歌已经译成欧洲各种文字，而且不仅仅是欧洲的文字。一个有觉悟的工人，不管他来到哪个国家，不管命运把他抛向哪里，不管他怎样感到自己是异邦人，言语不通，举目无亲，远离祖国，——他都可以凭国际歌的熟悉曲调，给自己找到同志和朋友。”“世界各国的工人相继歌唱自己的先进战士、无产者诗人的这首歌，并且使这首歌成了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歌。”

后来国际歌不仅仅是“无产阶级的歌”了。它已经变成了全世界不愿意把自己的命运交给别人把握的人们的歌。

二战期间，当斯大林格勒战役胜利的消息传到英国时，英国议会无论是工党议员还是保守党议员，全体起立，在议长的指挥下，高唱《国际歌》，以示庆祝。其悲壮、磅礴和命运感不亚于工人阶级。

“尼·列·”，就是列宁。列宁在纪念《国际歌》的作者时，俄罗斯革命者流放地的小木屋已长出茵茵绿草，西伯利亚的原野已是莽莽葱茏。

四

贵州长顺县青苗关年近七十的程明云老人不会唱《国际歌》。

老人闷着头不说话。他坐在火塘边，四尺长的烟杆一明一灭。三天来，他的内心痛苦而犹豫。他拨开炭火，续上新柴，火苗映红了他那满是皱纹的脸。十六年前，为了打通青苗关，大儿子程安荣被哑炮炸死，如今已长成人的二儿子程安青又嚷嚷着要上青苗关。青苗关呀青苗关，……绿树青草的怀抱中，大儿子的坟头仿佛有两只眼睛，在眺望和期盼着黑山龙场的乡亲们，眺望和期盼着火塘边的老父亲。

一条路，从山里通到县城，不到五公里，民国三十八年（一九四八年）开始修，修修停停，停停修修，前后用了四十四年！连他儿子，已经死了两个人，路还是没有修通。哥哥死的时候，弟弟只有十六岁，眼看着弟弟成了家，有了孩子，能让他去么？一座青苗关，挡住了黑山人的出路，残酷地隔开了龙场人与外部世界的联系。黑山黑山，真是一个“黑山”！天刚一擦黑，整座村子便死去了一般。祖祖辈辈没有电灯，祖祖辈辈受苦受穷，到了一九九二年，全村人的人均收入不到四百元！一盏煤油灯，何年何月才是个头？

外面有宽阔的马路。

外面有明亮的灯光。

外面的世界充满了诱惑。

要把外面与黑山联系起来，只有修路！这个浅显的道理谁都懂。要不然，黑山就永远是“黑山”，黑山就永远是云贵高原被

世界遗忘的一个小村庄。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国家穷,靠不住,一辈子也甭想国家能投资修这条路。靠自己,家徒四壁,除了一身的力气,几乎一无所有。是这么继续穷下去,还是一锹一镐一钎一锤开出一条生路来,根本就没有第二条路可以选择。

一九四八年的努力失败了。

一九七零年“农业学大寨”接着修,七年修了两公里四米宽的路。就在第七个年头的一九七六年,老人的长子和主动回村修路的程安坤双双炸死在青苗关,双双葬在了青苗关。那以后,再也不提修路的事。

七年之功,一搁就是十六年。

二儿子程安青要重上青苗关,颇让程明云踌躇。老人德高望重,在村里负责。大主意当然是他拿。可这修路让黑山人伤透了心。再让程安青踏着哥哥的脚印上青苗关,真不敢说是什么样的结果。可是打不通青苗关,原来的路等于白修,两条命也等于白扔了。

“去吧。”老人闷闷的声音说。

青苗关,“人过要跳,马过要绕”。民办教师程安金计算过,黑山人出山过关,要跳过绕过四十道乱石嶂。其险其峻不在话下。

一九九二年底,一九九三年初,整整一个冬天,黑山人的心都像炮工一样,在山崖上悬着。“轰隆隆——轰隆隆……”,地动山摇,群山响应。二千五百个炮眼,四十五箱炸药,把青苗关轰上了天,把黑山人的心轰落了地。

人们在哭,人们在笑。近半个世纪的梦想突然间变得那么近,伸手可及。

路修通了,山里的东西运了出去,山外的东西运了进来。黑山人正在发生变化,虽然变化是那么地缓慢。一九九四年,黑山

人人均年收入四百八十五元，一九九五年人均年收入六百一十五元。一九九五年全村集资把电引进村。一九九六年春节，是黑山龙场有史以来第一个光明的春节！

几杯酒下肚，大家已是微熏。

叶研在给我讲述着黑山龙场的动人故事。本来这个完整的故事应该是中国青年报驻贵州记者方豹讲述的。一九九五年十月的一天，方豹来到了我的办公室。已经记不清这个小个子眼镜是怎样进来怎样出去的了。与他一起来的几个人中，数他话少。他总是仔细地倾听别人的发言。

“方豹？”

“哦……”

方豹好像忘记了这个会与他有关。

“听说你有个线索？”

“是。”

“请讲。”

“离贵阳市一百多公里，有个长顺县，长顺县有个叫黑山龙场的地方，那里的农民修一条几公里长的公路，花了四十四年的时间。”

不惊不诧，语调平缓。

“四十四年？”

“四十四年！”

方豹说：“为了修通这条路，哥哥排哑炮炸死了，弟弟接着干。路修通了，村里人为了纪念死者，把坟建在了青苗关路旁。村里人说，死者只有天天守着这条悲喜交加的路，灵魂才能得以安息。”

山西县西崖村也有一个几乎与黑山龙场一模一样的悲壮故事。西崖村人发誓要从太行山里走出来，两代人三十多年，修了一条十几里长的路。

“要致富，先修路。”这是所有中国山区贫苦农民祖祖辈辈受穷悟出来的道理。

中国农村八千万贫困人口，绝大多数在山区。走不出来，打不通与外界的联系，何谈脱贫？中国有多少个黑山龙场和西崖村？他们被大山死死地封住。他们不缺乏智慧，他们浑身是力气。他们的命不好。他们必须改变命运。在所有的寓言故事中，我们可能最熟悉的是“愚公移山”。愚公家门口有两座大山挡住了他家的出路，一座叫做太行山（就是挡住西崖村的那座山），一座叫做王屋山。愚公发誓要挖去这两座大山。于是愚公一家每天挖山不止。“这件事感动了上帝。于是他就派了两个神仙下凡，把两座大山给背走了。”这个寓言故事，像是《圣经》故事，二十几年前，好几亿中国人都能背诵。

这个寓言曾经鼓舞着共产党人“从胜利走向胜利”。

这个寓言曾经鼓舞着中国农民“战天斗地”。可是，他们的努力并没有感动上帝。他们仍然在贫困线上挣扎。

今天能感动上帝吗？

黑山龙场和西崖村极具象征意义。黑山龙场和西崖村可以说就是中国人向现代化奋斗的一个缩影。——贫穷，落后，愚昧，渴望与世界交流，渴望富裕，渴望强大，渴望彻底改变自己的命运。——代表着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人不屈不挠自强不息的精神状态。

鲜血，眼泪，汗水；痛苦，悲伤，喜悦。

人类现代化进程的历史上，可能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像中华民族这样充满了坎坷和磨难，这样的悲壮。

“这是个重大题材。”我感动了。“赶快写出来。”

“编辑部的实习还没有结束呢。”方豹说。

“还有多长时间？”

“一个半月。”

“别管它。马上走！”

“需要协调一下。”

“我来办。你马上准备飞回贵阳。”

方豹回到了贵阳。他给我打来了电话。他说,他正在收集背景资料,不久即去长顺。

然而,“出师未捷身先死”。就在方豹准备出发去长顺的前一天,突发脑溢血,不久病故。

“方豹死了。”

电梯里有人告诉我。

“不可能!前两天他才跟我通了电话。”我不相信。

“是死了。脑溢血。”

“……”

我惊得半晌说不出话来。几天前好好的一个人,突然没了。正应了我“不声不响地来了,不声不响地走了”的印象。报社头版头条刊登了方豹的遗作和讣告。二十七岁的方豹便这样匆匆地走了。他在他的一篇文章中写到:我将在我以后的记者生涯中集中精力研究中国农村的贫困问题。

他刚起步便夭折了,留下了长长的遗憾和感叹。

我心情沉重。我觉得方豹的逝世多少与我有关。“如果不提前离开北京,可能就躲过这一难了。”我想。

在报社新闻中心会议上,做为系列报道“走出贫困”的负责人,我提议,“再派人去贵州长顺,接替方豹完成报道”。

“同意。”周志春说。

“派谁去?”

“听说叶研在贵阳处理善后事宜。”

“那就让叶研去。”

“打电话征求一下他的意见。”

“估计他会去。”

“具体线索?”

“方豹没说。请叶研查查方豹的日记,或是问问方豹的亲属。”

记者部副主任叶研变成了方豹“前赴后继”的替补。

他一切从零开始,终于找到线索,奔赴长顺。

叶研在中国青年报是个人物。他被叫做“牛仔”叶研。他穿的牛仔服是“李·库柏”牌(他强调说:“这可是美国排前四名的牌子!”),宽边毡帽和牛皮带是专门请人在美国西部德克萨斯买的,鞋子是美国加州牛仔靴。这一身打扮穿齐整,加上他歌着跳着走路和偶尔的腼腆一笑,哪像四十多岁人的样子!他和已经转行的李伟中被称作“行动派记者”,共同写出了大兴安岭火灾《红色的警告》、《黑色的咏叹》、《绿色的悲哀》等脍炙人口的名篇。他是那种敢玩儿命的人。他在云南建设兵团时,深夜与人打赌,不走大桥,只身横渡洪水滔滔的红河。他更是职业感极强的记者。上唐古拉山,上北极,去南沙群岛,总之哪儿惊险就想着方儿去哪儿。采访伞兵部队,为了写出真实的感受,他也跟着从飞机上往下跳。

行前,叶研在方豹的遗像前放了一张纸条,纸条上写道:“兄弟,请放心,长顺那边有我呢!”

五

“又是电话!”

电话铃声把我吵醒了。

“今天九点半到全国总工会后面的‘职工之家’开会。”报社那边说。

“职工之家”不是想像的机关工厂的小俱乐部，而是隶属于全国总工会的三星级宾馆。大楼雄伟，标志鲜明。

“开什么会？”

“中宣部和全国总工会联合召开的通气会。”

“什么内容？”

“与下岗职工有关。志春要你参加。他也去。”

这种会，周志春非得去，因为是中宣部的会，级别高；周志春肯定去，因为关系到一组报道的命运。

志春是个怪人。在我的印象中，他除了每个星期五下午打几圈桥牌，便没有什么爱好了。他是那种典型的工作狂。六楼办公室，每天都是他走得最晚。看稿子，签报纸大样，还有他喜欢在办公室处理的乱七八糟的事情。他买衣服穿衣服都很讲究，规规矩矩地系着领带，领带的颜色与衣服的颜色是精心搭配的。为此，有人称他是最后的“绅士”。游泳运动员出身，一米八几的个子，心却很细。有时候像个老谋深算的守望者，有时候却感情用事，充满了浪漫的情怀。一九九零年北京亚运会结束后，他给所有参加报道的编辑记者的妻子写了一封信。信的全文如下：

卢夫人曹丽女士：

送上一套亚运会期间的本报。您夫君的作品就在其中。当然，他的劳作和贡献绝不限于这些文字。他和我们这个集体的智慧和汗水浸透在这些报纸中。

在把您夫君交还的同时，我高兴地告诉您，我们没有浪掷您的牺牲，没有虚度光阴。我们认识自己，彼此认识，也让社会进一步认识了中国青年报。我们的努力有目共睹，我们的成绩让别人评说。但我们有把握，您将会从人们的一顾一盼、言谈话语中，感受到作为中国青年报人妻子的荣耀。

没有困惑就没有发现，没有磨砺就没有光彩，没有痛苦就感

受不到什么是幸福。

请尽享那别后的浓情。

致诚挚的问候！

中国青年报亚运会报道组周志春

一九九零年十月八日

人情味，荣誉感，成就感，团队精神，探索精神，——寥寥几百字，把社会大动荡后的中国青年报人的精神状态展露无遗。这样的文体，像语录一样，读下来，有一种酸酸的感动，有一种回光返照式的怅惘。

我进入报社工作的第一天，便是与周志春合作。没几天便是北大学潮，政治形势空前紧张。总编室夜班每天都在紧张地注视着局势的发展。因为中国青年报是团中央机关报，主要读者对象，除了共青团组织外，便是大学生。与其他大报比较，尤其显得敏感和紧张。这一夜，已近十点，上面送来了一篇“社论”，标题是“同学们你们要赶快成熟起来”！夜班的所有同仁都清楚，现在是政治上的非常时期，稍有不慎，便可能带来严重的后果。

“跃刚，你也读一下。”周志春读完“社论”，交给了我。

我仔细阅读。

“有什么感觉？”他问。

“标题有些不平等，有教训人的口气。”我说。

“必须改吗？”

“就这么发表，效果适得其反。”

我从他的眼睛里已经看到了“必须改”的决心。

我作为一版责任编辑，当然支持这种决心。

“必须改！”

“春龙的意见？”他又征询总编室副主任何春龙的意见。

“改!”

现代社会的报纸,无论如何不应该是“师爷”或“圣人”的形象。

他拿过“社论”,略加思考,迅速地在标题上划拉了几笔,然后扔过来。“你看看。”

删去“你们要”,“同学们”后加了一个“,”变成了“同学们,赶快成熟起来!”。

不伤原义,效果大变。第二天,社会反应证实了这一点。

通常情况下,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特别是在超敏感时期。

在社会动荡和大是大非面前,需要勇气,需要胆略,更需要智慧。

总之,他是那种优点和缺点一样鲜明的领导。

“志春该来了。”我暗忖。

一九九六年元月十九日,阳光灿烂,空气干冷。

通知九点半开会,北京各大报的总编辑和相关部门负责人十点才陆陆续续来齐。十点过开会。最晚的十点半才到,一路进来一路说,“堵车,堵车”。

中宣部的会,迟开近一个小时,“真是不严肃”。我因为来得准时,有一种吃亏的感觉,嘴里嘟嘟囔囔的。

大凡中宣部召开的会,各报都有点儿忐忑,上了普罗克鲁斯特的铁床,不知自己的腿是长还是短。(按:普罗克鲁斯特是希腊神话中的怪人,常把人放在他的铁床上,比铁床长的人,斩去腿的过长部分;比铁床短的人,则强拉长以与床齐。)每次会议精神,到会者都要回去一字不漏地逐级传达,不敢稍有懈怠。

因为与我正在组织实施的报道有关,我提前钻进了三楼大会议厅,竖着耳朵听,什么是“YES”,什么是“NO”。这是我第一次开中宣部的会。据经常开这种会的人告诉我,要特别注意听中宣“YES”和中宣“NO”,就是说,要特别注意上面的指示,哪些

话儿能说,哪些话儿不能说;哪些事儿能干,哪些事儿不能干;哪些事儿能轻些儿干,哪些事儿能使劲儿干。在“YES”或“NO”没有发出之前,你不知道会犯什么忌,甚至不知道自己是否有正常思维,是否还有正常的判断能力。有时候你要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子检讨自己可能是正确的当然也可能是错误的错误。

(按:真有不堪忍受三番五次没完没了魂飞魄散写检讨的折磨挂冠而去的总编辑。“那检讨写得真是头昏脑胀屁滚尿流”。总编通常是新闻检查和新闻业务的纽带,扮演着双重角色。他既是掌握办报方针、决定重大敏感题目、调兵遣将的元帅,也是负有政治责任的新闻检察官。总编们想必都有写检查的经历,但是有多少是心口如一的呢?)

(又按:原四川省省长萧秧喜欢唱“卡拉OK”,能顶到头唱完高难度的西北风“辘辘、女人和狗”。我大为惊诧,问:“萧省长,你都六十五岁了,中气怎么这么足?”萧秧拿着“麦克”诙谐地说:“我写了一辈子检讨,中气足,主要是写检讨写的。”后面还要说到萧秧的故事。)

永远像是一个长不大的孩子,或者要永远保持可能成为坏孩子的警惕。谁想钻个空子炸个刺儿,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专门有一个由退下来的特别有经验的老同志组成的“审读小组”,每天一字不漏地审读列入名单的大报(所以与会者要一字不漏地倾听,一字不漏地传达)。谁也别想有侥幸心理。出了差错,不仅要受到批评,而且还要记录在案。当然,新闻媒体也自有一套循规蹈矩腾挪躲闪的法术,一方面“指示我照办”、“挥手我前进”,一方面也不至于太愚蠢有伤大雅,不至于太装蒜对不起读者。

我在后排挑了一个座位,能侧对着观察主席台上的大人物。我心里有些忐忑,生怕部长的嘴里溜出不利的话来,把刚回北京一个星期、正在废寝忘食写作的毛、吕、迟三位先生给打趴下喽,

把还不成熟的生瓜蛋子从青藤上强拧下来,让沈阳下岗职工的调查报告胎死腹中。那时,心痛且糟,哭都来不及。

说起来,也是生事儿,弄得今天这么折磨自己。精力过剩,思想不止,是我的坏毛病。我原来说,要解剖几个城市,通过解剖城市来分析中国发展的脉络,来把握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历史走向。上海、重庆、沈阳,都具有典型意义。

首选,当然是沈阳。四十年代,一场辽沈战役,奠定了共产党取得江山的基础。日伪时期,“一五”时期,辽沈与黑龙江、吉林一起奠定了新中国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工业化基础。以其在中国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辽宁素有“辽老大”之称,沈阳则是“大”中之“大”。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市场经济制度的引进,辽沈的地位逐渐式微,辽老大变成了辽老三辽老四辽老五,沈阳也由过去的第三位退居第七位,计划经济仍然占有统治性的比例。昔日中国工业化的“母机”,今天却成了改革开放的包袱。有人说,辽沈像是一个巨大的恐龙,架子很大,气脉已虚。有人说,辽沈是计划经济的最后堡垒,需要打第二次辽沈战役了。一九九五年全国足球甲级联赛,曾经在甲级联赛十联冠的辽宁队全线崩溃,降为乙级队。这些都让辽宁人痛心疾首。辽宁人笨?辽宁人不顽强?都不是。有个顺口溜专道辽宁人:“醒得早,起得晚,走得慢。”辽宁人的脑袋聪明活泛是出了名的,几十年来,无论是哪个时代,风流人物辈出。五十年代的劳动模范孟泰、王崇伦等等,六七十年代的劳模加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蔚凤英、姚连蔚等等,八十年代更是风起云涌,出了一系列震动全国的改革人物改革现象,只有九十年代稍微消停了一下。感觉辽宁人永远不甘寂寞,永远热热闹闹。各个朝代出典型,成了著名的“辽宁现象”;传统的计划经济,传统的工业基地,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包袱沉重,国营大中型企业疲惫不堪,成了著名的“东北现象”。解剖东北,辽宁最典型;解剖辽宁,沈阳最典型。

这一组数字让人吃惊。与所有传统工业基地一样,沈阳三百三十个国营大中型企业,有一半以上处于停产半停产的亏损状态,相当数量的产业工人由此失业。据保守的估计,至少有三十万下岗失业职工,其中有四万人是特困户,即平均月收入不超过八十五元人民币。八十五块钱,吃咸菜稀饭都不够!据有关部门对辽宁等九省市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调查,一九九五年上半年,在二十万家企业,三千二百七十二万职工中,停产、半停产和破产企业一万零四百六十七户,涉及职工二百一十二万。仅黑龙江、吉林两省停减发工资就达三十五亿人民币。全国职工家庭人均收入低于当地规定的最低生活标准的困难职工已逾一千万人,占国有集体职工的百分之八以上。有关部门测算,一九九三年全国零售物价指数增长百分之十四点七,造成百分之十九的职工生活水平下降;一九九四年零售物价指数增长百分之二十一点七,使得百分之三十的职工生活水平下降。拖欠工资,拖欠离退休费,拖欠医疗费,已成了极其普遍的现象。

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在他的一份报告中披露:除了官方公布的一九九四年四百六十七点四万失业人口外,还有“在职失业”人口二千六百万,失业率不是自欺欺人的百分之二点八,而是百分之十四点九!如果这个事实成立,那么中国的失业率便居世界之首,远远超过了社会的安全线。

三千零六十七万城市失业人口和农村2亿剩余劳动力,构成了中国庞大的失业大军,同时也构成了中国特色的贫困现象,构成了严峻的社会问题。

.....

“开会了。”中宣部副部长的南方口音说。

“欢迎各位新闻界的朋友来全国总工会作客。我来通报一下有关情况……”全国总工会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的西北口音说。

嗡嗡嗡烟雾缭乱的会议室顿时鸦雀无声。

六

路过木樨地，能在长安街南面看见那幢青脸憨实的建筑物，像是个大匣子。颇有气势的门楣上悬挂着“中华全国总工会”七个大字。毛泽东手书，红底衬托，金光闪闪。

“全总”应该是中国最大的群众团体，拥有数千万会员。“维护工人的合法权益”，是工会的天然职责。全总书记说，一九九五年十二月，总书记江泽民在兰州看望困难职工时，专门背诵了《宪法》。《宪法》总纲是这样描述国家政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江泽民甚至指出：什么是政治？政治就是对群众的认识和感情问题。所以，一到过年过节就忙乎，组织全国基层工会挨家挨户“送温暖”。所以，一到过年过节，就可以经常在电视上看到各级政府各级工会“送温暖”的情景。

本世纪二十年代初，刚刚取得政权的苏共有过一次关于工会性质的大辩论，并产生了重大的分歧，乃至引起了一场党内危机。

季诺维也夫说，工会是“共产主义的学校”。

托洛茨基说是“管理生产的行政技术机关”。

布哈林则说：工会“一方面，它们是共产主义的学校……另一方面，它们又是——并且愈来愈是——经济机关和整个国家政权的一个组成部分。”

列宁嘲笑托洛茨基的说法是“没有底的玻璃杯”，批评布哈林“用折衷主义来偷换辩证法”。列宁说：“工会是国家政权的蓄

水池,是共产主义的学校,是学习主持经济的学校。”要害是,是否坚持党对工会的领导。

中国工人阶级最辉煌的时候,是文化大革命。毛泽东说:“工人阶级要领导一切。”于是工人宣传队进驻了所有大中小学,领导“斗批改”。后来发现,这是玩儿闹,这是笑话。于是,“工人阶级”非常尴尬地撤出学校,等到恢复高考的时候,他们或者是他们的儿子、孙子去他们曾经领导过的学校接受教育。

“工人阶级”曾经是一种待遇,一种政治荣誉。粉碎四人帮后,说“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个部分”,知识分子是何等地感恩涕零欢欣鼓舞啊!

有人问全总书记:“工人下岗失业了以后,还是不是领导阶级?”

书记肯定地说:“下岗失业后,仍然是领导阶级。”

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领导谁?怎么领导?工人阶级当家作主,当谁的家?做谁的主?加强主人翁地位,生存岌岌可危惶惶不可终日,没有工作,没有饭吃,何谈主人翁?著名经济学家蒋一苇先生生前反对劳动合同用工制度,最重要的理由就是劳动合同用工制度削弱了工人阶级的主人翁地位,不符合“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既定方针,不符合《宪法》所规定的国家政体。言之凿凿,不可动摇。

九十年代初,以上的问题,在劳动部的主管官员看来,实际是“皇帝的新衣”,自欺欺人。现实生活中,大家都看见了,大家都不说罢了。然而,当时大有颠覆十年劳动合同用工制度改革之势。

在特定的政治背景和强大的社会压力下,劳动部长阮崇武紧急致书新任总书记江泽民,要求给予劳动合同用工制度改革探索以明确的肯定和支持。劳动部劳动就业司认为,工人阶级既是国家的主人,又是靠自己的体力和技能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甚至说,工人阶级首先是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然后才是国家的主人。亦是言之凿凿。

有一份资料具有调侃的味道:劳动合同用工制度严格地讲,不是改革,而是新时期的拨乱反正。因为,刘少奇在五十年代就学习苏联,在国营企业推行劳动合同用工制。这本身就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

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却搅起如此大的波澜。人大会议上,有人提出恢复固定工和内招制度。一九九零年、一九九一年的春天不断地有些“倒春寒”,庄稼都被打蔫儿了。

回潮,倒退,理直气壮地成为社会主流。

在短暂的失望和观望后,开始有人站出来捍卫十年改革的成果了。

一九九一年二月二十三日下午二点半分,劳动部长阮崇武约见我。

这天阴天,干冷干冷的风,像小刀子一样一片片割肉。一路上,自行车掉了好几次链子,弄了一手机油。

劳动就业司负责联络的董平见了我就发愁:拉拉邋邋的牛仔服,头发被风吹得凌乱不堪,再加上怎么看怎么不顺眼的胡子。

见面不好意思握手。“抱歉抱歉,先洗洗手。”

“见部长也不剃剃胡子。”董平说。

这位白面书生一急脸就红。

“部长可管不着我的胡子。”我故意漫不经心的样子。

“还有点时间,我去给你找个剃须刀来。”

“有那么重要么?别别,找把梳子就行。”

“像我这样多好。”

这白面书生的下巴壳青青的一小片,是挺干净。我暗自惭愧,嘴上却打岔:“部长管得了你,可管不了我。”

“走吧走吧……”董平无可奈何。

董平带着我下了大楼,穿过院子,上了一座小楼,去见阮崇武。

在部长里头,阮崇武是个人物。他是革命烈士的后代,与李鹏、李铁映等同是延安保育学校的光腚伙伴,然后同一期留苏。一句话,他与体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在部长的圈子内绕了一大圈。团中央书记处书记、上海市副市长、公安部长、国家科委副主任、劳动部长。这期间,他小有挫折。他任公安部长时,一九八七年,几次大的治安事故使他被迫离任。这也可能不是他离任的根本原因。当时他五十出头,正部级干部中,数他风华正茂。一九九三年,他接替邓洪勋、刘剑锋出任中国最大的经济特区海南省委第一书记兼省长,在海南经济处于低潮的情况下,稳健治省,抓基础建设,抓大环境治理,颇有建树,那是后话。

去时稍提前,在阮崇武办公室外的会客室等候。两点半,阮崇武从里面踱了出来。

这是一次相当重要的采访。“六四”以后,杜润生领导的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撤销,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的研究人员或审查或逃亡或调离或沉寂,几乎完全失去了改革的锋芒。除了一些欢喜若狂的“左爷”,可以说是万马齐喑。治理整顿,又给中国经济涂上了一层灰暗的颜色。但是,可以断定,这种局面不可能长期维持下去。越是在这种时候,越是需要有见识有胆略的党内人士出来发表谈话。

阮崇武愿意。

“请坐请坐。”他坐下后便对我说,“你先说。”

我的记者生涯中,最怵跟政府官员打交道。这些衙门里长大的人,特别是重权在握的衙门,装腔作势拿腔拿调谨小慎微明哲保身的多了。阮崇武不同。他衣冠楚楚,中等个儿,身材魁梧,头发梳得很整齐,跷着二郎腿,眼镜后面的不经意里透着犀

利的观察。他的身上能品味出一种拿得起放得下的洒脱劲儿来。在劳动部、公安部、国家科委时,他的某些风格还不太显露。到了海南,他的风格将好与他的前任第一书记相反。诗人书记许士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不论是下班的路上还是更深夜静,他都接待来访的客人,以至积劳成疾,过早仙逝。“阮老板下了班以后便闭门谢客,节假日闭门谢客”,大事小事都在工作时间处理,在海南岛是出了名的。许士杰空闲时间吟诗作赋,阮崇武则喜欢打网球。这便显出了贵族政治家与平民政治家的区别。政治的职业化和贵族化,大抵是未来政治的一个趋势。也就是说,将来专门有一类人来玩政治游戏。要害是效率,要害是政绩,要害是政策的连续性,要害是稳定的价值观。

阮崇武的观察瞬息即逝,接下来摆开了充分把握局势来者不拒的架式。

谈话严肃而敏感,阮崇武的开场白直言不讳。他说:“无论出现什么情况,改革不能动摇,改革必须发展。我坚信这一点。”

请注意,说这番话的时间是一九九一年初。一九九一年,中国的政治局势并不明朗。中央和地方官员在刚结束的政治和社会大动荡之后,都处于休整观望期,慎言改革,宁慢勿乱,宁左勿右。从中国政治的历史经验来看,“左”远远比“右”安全。而且,“六四”之后,上下说套话大话空话假话已成了一种社会风气,稍有操守的人,宁愿不说话,也不说套话大话空话假话。像阮崇武这样的高级干部,如此坦言自己的政治观点,实属罕见。

我为之一振。这不仅是一种态度,更是一种判断。因为开放的大门并没有关上,世界的新鲜空气仍然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国,中国的十年改革让老百姓尝到了甜头,目前低靡倒退的局面不可能维持下去,停滞和倒退都没有出路。

然而,特别令我感兴趣的还不是改革本身,而是改革者的语境发生了变化,倡言改革的语言也发生了变化。阮崇武给江泽

民的报告在阐明劳动合同用工制度改革必须坚持的理由后,没有使用诸如“打破铁饭碗”、“劳动力优化组合”、“优胜劣汰”等字眼,而是从利益和权利的角度提出问题,“赢得更多的人来支持改革”。他提出了劳动合同用工制宣传的三个观点:

一、“实行劳动合同制,有利于维护企业和职工的合法权益。”

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是科学。不论什么社会制度都要遵循。”

三、“改革代表着大多数人的利益,要让人们看到眼前和将来的好处。”

政治家们已经感觉到了中国改革的微妙之处,已经体会到了激进改革可能带来民众的反感并形成抵触情绪,自觉采用中性语言来陈述政见,留够了余地,扩大了张力,更接近客观,同时加强了可操作性。这种语言的转换非同小可。与此同时,一批前卫画家和作家分别打出了所谓的“新意象”、“新写实”的旗帜,部分转换了前卫意识,创作了一批有影响的作品,以寻求与社会对话的契机。报告文学界则有人提出了“客观理性”的问题,以总结新时期以来刘宾雁“狂飙突进”和苏晓康“浪漫理性”的利弊得失,以期更逼近真实,用更客观的眼光来解剖中国现实。学术界由外向而内视,企图通过清理激进思想复归传统实现刚性学理的转化,在渐进改革、保守主义、民族主义的基础上逐步实现社会变革的理想。这是“六四”后出现的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政治家,艺术家,作家,理论家,他们在不同的领域里研究问题,寻找答案,结果竟是殊途同归。

我开始喜欢这位劳动部长了。这位劳动部长挺实在,不玩儿虚的,急了,还有“他妈的”口头禅。本来预约了二十分钟,结果谈锋大健,谈了两个半小时。

听着,劳动部长开骂了!

针对“恢复固定工和内招”——

“这是根本的问题。你他妈的把工人分成三六九等,固定工,合同工,临时工,轮换工,农民工,实际上让固定工当主人。这样的差别不合理。工人阶级分出这样的档次不对!”

针对“主人翁”——

“主人翁是具体的,实实在在的,不是蒙人的空帽子。厂里不兴旺发达,你当什么家,作什么主?把家都败坏了,端着饭钵要饭,你还是什么主人?他妈的不能玩儿概念!有权有利有义务,这主人才当得有滋味。搞理论不能把边际条件绝对化。现实就是现实。”

针对“待业”——

“什么待业?失业就是失业。(按:长期以来,官方媒体、官方统计、正式文件报告都不承认失业,只承认待业。一九九五年下半年中央电视台才正式使用‘失业’这个词。而且,到目前为止,失业人口的统计仍然遮遮掩掩,玩儿概念游戏。阮崇武真是够大胆的。不实事求是可见一例。)失业的滋味不好受,里外都没面子。工人很现实,当然要抵制。他们的理由也很充分:主人怎么可能没有工作呢?工人阶级怎么能失业呢?社会主义不就是人人有饭吃,人人有工作吗?大家不习惯失业这玩意儿。原来说是资本主义腐朽的表现。但是,‘失业’这个‘鬼’没有想像的和画的那么可怕!劳动部的意见是,让劳动力市场化,但是不敢,有思想束缚,市场也不发育,需要有一个过程。不过有一点是可以预期的,将来市场调剂劳动力的比例肯定会加大。”

阮崇武在当时改革前景并不明朗的情况下,实际上给了我两个暗示:一是未来中国市场化改革的趋势不可逆转;一是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会不可避免地遇到大量失业问题。

访问相当成功。一九九五年九月三十日我在香港机场偶然碰见了阮崇武原秘书崔旭,证实了四年前的判断。阮崇武和我

都意识到了这次谈话的厉害及不合时宜,完完整整发表,将会引起爆炸性的后果。

阮崇武时而兴奋,时而激动,时而愤怒,时而平心静气。阮崇武叮嘱道:“我这些话你可以写,但是不要说是劳动部长阮崇武说的。报纸也可以有自己的意见嘛。”

他微笑着,下意识地去扶了一下眼镜,然后与我握手告别。

没想到,他会用这番话收尾。所谓“曲终收拨当心画”!好厉害的阮崇武!一闪身,便到了后台。他的谈话,折射了高层的一些信息。没有高层的某种说法或默契,他不会这么说。当然,后来发生的事儿让他全说着了。

七

一九九二年重庆的震荡远比一九八六年的沈阳来得剧烈。

行业规模全国排行老三的重庆针织总厂破产了!

这是中国第一家国营大中型企业破产。

一九九二年六月十一日《重庆日报》刊登了重庆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公告”：“本院已于一九九二年六月八日立案受理重庆针织总厂申请破产一案。未收到本院通知的债权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向重庆市中级人民法院申报债权,说明债权的数额和有无财产担保,并且提交有关证据材料。逾期未申报债权的,视为自动放弃债权。并定于同年六月二十八日在本院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

这是一九四九年以来最大的一起国有企业破产。冷冰冰的法律语言把以前纷纷扬扬的传说变成了铁板钉钉的事实。

六月二十八日下午两点半,重针总厂债权人会议在小泉宾

馆如期举行。小泉宾馆溪流环绕,温泉喷涌,卧在秀丽的峰峦叠翠中,十分幽静。原址是国民党中央干部学校。

审判长“情况通报”的每个字都重重砸在几十家债权人的心上:“重庆针织总厂建于一九五零年,一九五二年十月正式向工商部门登记开业。该厂属地方国营性质,主营针织衣裤、经编胚布及制品。经四十二年的发展,成为针织、染、整一体的西南地区最大的一家国营针织企业。该厂现有职工二千九百一十三人,其中在册职工二千一百二十八人,退休职工七百八十六人。该厂占地面积十一万二千四百二十六平方米,拥有生产厂房三十一幢,非生产辅助用房三十幢,生活区用房三十五幢,各种类型针织机、染色设备、经编机等设备一千二百台套。具有年产十六万件针织产品和八百吨化纤加工能力。该厂现有固定资产原值三千五百万元,净值二千三百三十万元。该厂从开业经营至一九八六年期间,除一九八六年受社会环境影响出现过九点九二万元的亏损外,其余年年生产盈利,累计为国家创税利九千七百五十四万元,为国家建设作出过贡献。一九八六年至一九九一年,该厂连续六年亏损,至一九九二年五月,累计经营亏损已达二千六百九十一万元。经企业初步清理,该厂具有资产和债权计四千二百二十一万元,债务已高达八千零六十三万元,资产负债率达百分之一百九十一。但是,债权人已向本院申报的债权经初步统计已达八千二百二十七万元,其资产负债率应为百分之一百九十五。本院登记债权的工作到十月三日才能结束。债权人申报债权的总额还会增加。在已登记的债权中,设定财产抵押的约为三千八百二十五万元,该厂已将厂房、汽车、机器设备、办公楼、单身宿舍以及产成品、未收回的债权均作了抵押。接受抵押的单位具有优先受偿权。未设定财产抵押的一般债权为四千二百三十万元。该厂从一九九一年底至今,欠职工工资已近二百万元;欠职工集资款、房屋保证金等个人财产约四十万

元；欠税款一千四百多万元。如扣除职工工资、个人财产、税收等因素后，其资产负债率估计将超过百分之二百。”

厂里多年亏损、资不抵债的情况，所有工人都知道，但是大家宁愿接受得过且过不死不活的清贫日子，也不愿接受“破产清盘”的残酷现实。

退休工人孙世英和两个儿子、儿媳一家五口都在重针总厂。他听人读完《重庆日报》后失声痛哭：“天哪！这下叫我们怎么过啊！”

有工人扬言，下一个月如果领不到工资，就到工厂外的路上拦劫汽车，收过路费，一车两元，补足工资奖金及劳保。

一些老工人联名给法院写信，发泄心中不满：“我们辛辛苦苦工作了几十年，到头来落了个‘家’破‘碗’砸，实在是令人痛心！这些年来，厂里年年亏损，上面年年派蹲点组、工作组、调查组，到底查明了什么？厂里推行承包责任制，对工人是有过必罚，对厂长是包赢不输。资本主义搞破产，跳楼的是资本家，而我们这里搞破产，牺牲的却是工人的利益。现在厂垮了，大祸临头了，各级领导又该承担什么责任呢？”

为什么资本主义社会的企业破产，跳楼的是资本家？

为什么社会主义社会的企业破产，倒霉的是工人？

这是一个既简单又复杂的理论与现实问题。

走到破产这一步，谁之过？一句两句说不清。像重针总厂这样资不抵债的国有企业多的是，只不过先拿重针总厂开刀罢了。

这时的重庆市委书记是萧秧。

八

萧秧手里拿着一杯法国红葡萄酒,轻轻啐了一口。他的手微微颤动时,高脚玻璃杯的红葡萄酒漾出玫瑰色的波光。北京皇家艺苑十二层的大套间,因为只有这位小个子风云人物而显得十分空旷。

这位拥有一亿多人口中国第一大省的省长,个头一米六六、六七的样子,操着川音普通话。他有一种迅速贴近谈话对象的魅力。一九九六年元旦前,他在四川省驻京办事处接见一些学者。他一面和大家握手一面说:“老人怕过年,小孩盼过年。我小时候,天天盼啊。过年吃肉看戏穿新衣服放鞭炮,热闹得很啊。现在人老了,过一天少一天,过一个年少一个年。时光如流水啊……”透着“逝者如斯”的感伤。

在皇家艺苑则是另外一番景象了。此时,他正以省长的身份带着工作组处理“重庆危机”。收购重针总厂的重庆海外集团主要领导人大规模贿赂政府官员,涉及一批市局级领导人,使刚刚运行只有一年多的新一届重庆市政府陷入深深的信任危机。萧秧八十年代中期由北京调任重庆市长,后任市委书记。一九九三年换届,萧秧本应以四川省委书记的名义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可他运气不好。十四大上发生了不利于萧秧的戏剧性变化:落选中央委员。本要委以重任的萧秧的名字“被放在了候选人名单的第三名”,在不甚了解的情况下,代表习惯性地只给前一二名候选人划钩,就这样漏掉了萧秧。一个小小的技术问题,一个小小的“偶然”,便葬送了这个四川阆中县农家儿子成为大政治家的可能。他以最后一名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当然,落

选的原因可能更复杂。

出会场，萧秧碰见上海市长黄菊。他打趣说：“老黄呵，十三大你是中央候补委员最后一名，也是最年轻的中央候补委员。怎么，现在把最后一名的位子让给我这个老头了？”

香港记者闻讯堵住他问：“萧秧先生，你当选的票数最少，有什么感想？”

萧秧说：“这个问题很尖锐。但是诸位，你们不要忘了，我的票数既是最少，又是最多。”香港记者面面相觑，不明白萧秧说的是什么意思。

萧秧眯缝着眼缓缓说：“我比那些没有选上的，当然是票数最多了。”

一副仙风道骨超然物外的模样，一个机敏的打岔，把生事的香港记者给绕进去了。既回答了问题，又不失风度。

政治是一种离智慧最近的行当之一。生杀予夺，山重水复柳暗花明，风云变幻，就在那一瞬之间。

重庆流传着一个著名的故事。1989年“学潮”期间，市委书记萧秧与学生对话，数千人群情激昂剑拔弩张的场面。

学生问：“萧书记，你说，我们是不是动乱。”

萧秧从容地说：“你们不是动乱，是乱动！”

“乱动？”

“乱动是什么意思？”学潮以来，没听说过这种说法。全场哑然，愿听其详。

萧秧接着说：“说你们乱动，我有两条理由，第一，法律规定，游行示威要事先申请批准，你们没有批准就上街；第二，你们没有按照规定的路线游行，一来干扰了他人的正常生活，二来坏人混进来怎么办？凭这两条，就可以说你们乱动。”

从语义讲，“动乱”是一种行动的性质和结果，“乱动”则是一种行动的不规范状态。不规范，可以约束，可以调整，可以商量，

可以沟通。如果匆忙定性,政治解决便没有余地了。“乱动”打破了“动乱”的刚性语境,增强了不失原则的对话基础。清华大学建筑系毕业的萧秧,当然知道大学生的心理。严格地讲,大学生并不像早期共产党人那样,有着明确的革命目标,坚定的革命信念,严密的组织形态,灵活的工作方法。一九八七、一九八九两年的学潮,在学生领袖领导下,政治要求十分模糊而不切实际,更像是青春期躁动与宣泄。这是全世界范围内的社会心理现象。但是要妥善解决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特别是在一直被拱火、已经没有了理智的学生面前。弄不好,能否顺利走脱都是问题。

萧秧在学生中间发表了长篇讲演,有原则,有智慧,有分寸,有情理,征服了大学生,控制了局势。能把好斗的大学生好斗的重庆人“搞定”,在天下大乱的年代重庆不乱,重庆人,无论持左、中、右哪种立场,都认为这是一个奇迹。“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重庆人有过“文革”被打得稀巴烂,死伤几十万人的惨痛经验。萧秧的讲演,在大学生热烈的掌声中结束。

审时度势,处乱而不惊,做到这种份上,实属不易。当事人描述说,萧秧与学生平等对话,纵论古今,循循分析利弊得失,让学生平心静气,用一种平常心和现实眼光来稀释某种崇高感庄严感,每每奏效。

地方父母官不易,过了初一想十五,矛盾具体,过五关斩六将,都是国计民生逼到眼皮子底下的事儿。“六四”是国计,破产是民生。他现在面对的是被砸了饭碗的失业工人。李长春领着大家唱《国际歌》,他萧秧怎么办?

重庆陈家坪重针总厂大会议室,离退休职工、工人代表、厂中层以上干部、主管局领导、市委市政府领导,满满地挤了二百多人。“现在请萧书记讲话!”大家鼓掌之后,都静静地等着,看他萧秧怎么说。

重针总厂破产与六年前的沈阳防爆器材厂破产的区别太大了。沈阳防爆器材厂只有职工一百三十六人,而重针总厂有职工近三千人,无论是规模还是影响,都不可同日而语。沈阳防爆器材厂的破产具有很强的新闻和象征意义,可重针总厂有点真刀真枪的味道了。

与充满浪漫情怀的学生对话和与为生存而斗争的工人对话,有着天壤之别。他讲些什么呢?奇迹还会再次出现吗?党的领导,第一把手,书记任上遇到这么两件大事,真是够“烧烤”的。

还是大家熟悉的那种缓缓的控制着语调控制着节奏的南腔北调。

“一个工厂宣布破产了,同志们心情很沉痛,我的心情也很不平静。好端端的一个工厂,经过大家几十年的奋斗,成为一个在针织行业中有相当地位的工厂。现在却要申请破产,谁到了这个地步,都很难接受。我听说我们一些同志,还是参加过淮海战役的。当年参加淮海战役为什么?还不是为我们的工农群众能过上好日子,能够有一个幸福的生活。共产党就是干这个的。今天企业要宣布破产,当然大家心情难受,从感情上讲,容易理解。”

“我第一次看到同志们的报告,要求破产,我也很犹豫。后来,又接到你们工会有个报告,要求不破产。我也曾提请有关同志认真研究一下,不破产行不行?不破能不能把这条路走下去?但谁也不敢下这个决心。你们的工厂,欠了人家八千多万,你自己的资产才四千多万,你说怎么办?要这样下去,每年的利息就要背七八百万,咱们的日子还过不过?吃不吃饭?这几千人,就这么混下去行不行?看样子行不通啊!”

“所谓破产,就是你用这四千多万来还八千多万,这就叫破产。借的钱就不还了,就吹了,至少吹百分之几十。这些钱是谁

的？国家的。不是哪一个人的。不是哪一个个体户的，都是国家的。也就是说，国家在你们宣布破产的时候，要硬赔四千多万。就是这么个道理。”

“市委市政府谁不懂得不破产好啊！不破产，这四千多万谁来承担？纺织局今年上半年就亏了六千多万；全市市属预算内企业一至五月盈亏相抵才盈利五百多万。同志们，我们要来抵你这四千多万元，就是把全市的利润全部都拿过来也不行啊！”

“我昨天刚出差回来，听说同志们很激动，对市委市政府有意见，说这个企业没管好，市委有责任，市政府有责任，纺织局有责任。这一点，我们完全理解。纺织局的局长被扣了三十七个钟点，‘扣’也算处分吧？！他也是和同志们一样的心情。”

萧秧这里指的是市纺织局局长谭德树、副局长吴受铭被重针总厂工人围困于利苑火锅店的事件，即重庆人人皆知的“火锅事件”。

六月十六日晚八点，谭德树接到市经委主任王式惠打来的电话。

“听说你被围困在了利苑火锅店了。”

“没有的事！开什么玩笑！”

这个消息是“市长公开电话”办公室传来的。看来是误传。但是，他们判断，重针总厂肯定出事了。谭德树和吴受铭赶到现场时已经是十点了。他们亮明身份后，立即被愤怒的工人抓进了利苑火锅店。火锅店有早先被围的局法规处的两名干部，厂里聘请的律师，厂党委书记刘畅。他们被强行听取意见。

“重针办了四十多年，为什么要破产？”

“破产了，前三届领导班子要负责！上级要负责！职工有什么责任？”

“谁申请破产的？符不符合法律手续？”

“破了产，我们怎么办？”

“待业期间,每个月多少生活费?”

“我们退休工人哪个管? 生病了哪里看? 医药费,哪里报?”
这都是相当具体的事情。

一九九四年八月,我听到一个刚刚发生的故事。一家工厂停产好几个月了,职工每月只有不到一百元的生活费。一家双职工好几天没吃肉了。大人熬得住,小孩可熬不住。小孩闹肉吃。父亲说:“别闹了,爸爸去给你买肉吃。”不久,父亲拎回来一块肉煮了。一家人美美地吃了一顿肉。等孩子出去玩时,妻子问:“肉是哪来的?”丈夫说了这块肉的来历。他到菜市场的农民肉摊上偷了一块肉,被摊主发现,摊主夺过肉来,一顿劈头盖脸地暴打,然后拖到派出所。他满脸羞惭地说了家里的情况。农民听完后说:“嗨! 咋不早说! 早说了还会打你吗? 这块肉,拿走,拿走。”

这块肉来得太屈辱了! 夫妻俩抱头痛哭。哭完,夫妻双双服毒自杀……

深夜两点,闻讯而来的警察营救出吴受铭、刘畅等,谭德树为了不使事态扩大,愿意继续留下来听取工人的意见。

第二天,事态进一步扩大,工人们阻断了交通。公路正中摆了一张方桌,桌上供着一尊毛主席石膏像。怕太阳暴晒毛主席像,专门给塑像打了把伞。公路两旁拉起了几幅红布大标语,上面写着:

“我们要重针,要工作,要生活!”

“毛主席啊,我们永远怀念您!”

“坚决要求收回破产申请!”

目击者说,失业工人和围观者加起来约有五千人,场面颇为壮观。一直到十九日下午四时许才恢复正常。

萧秧说的就是这件事。如果不算“六四”,这是“文革”结束之后重庆最大的风波。

“今天，我们市政府的秦副市长来了，市委市政府及有关部门的主要领导都来了。来了干什么？给同志们说清楚，既然企业已经申请破产，咱们就不要再犹豫了。这个债务越拖越沉，越拖越久，日子就越来越不好过。破产能起到两个作用，第一是能保护债权人，第二也保护债务人。他两头都保护，不要以为它只保护哪一头。今天请厂里的同志们来，就是向大家说清楚，不是谁愿意破不愿意破。我很希望同志们拿出一个不破产的方案来，说，咱们不破了，四千多万的债务，咱们两年之内把它还了！谁有勇气站出来说一说，我当然欢迎啊！”

萧秧说完，停了一小会儿，环视会场。

对于破产，厂里八百名离退休职工反应最为强烈。几天前，他们选出代表，起草了《破产不是路全力救重针》、副题是“重庆针织总厂三千职工的呼声”的长篇呼吁。他们说：“恶劣的社会环境，强大的舆论攻势，最终导致企业不攻自破。其实，即使有八千多万元巨额的债务，即使有一千二百多万的‘东租阎王债’（按：‘东租’即东方租赁公司。重针厂破产的直接诱因便是东方租赁公司与该厂的债务官司。重针总厂败诉。），我们企业仍然可以在重负中挣扎，以求生存。去年我们企业的减亏是卓有成效的。然而，自社会各界传出了‘重针要破产’的风声之后，随即便产生了债主催债、借贷无门、生产无路、领导无措、职工惶惑等负面效应。整个企业愈益显得日暮途穷。在这强大的舆论攻势和极端险恶的社会环境下，企业正将应验某主管领导所预言的‘重针不攻自破’之说。”“重针职工决不赞成企业破产！”“上级领导体恤民情，顺应民心，停止对重针破产的思考并采取有效的应急措施，扶持我们的企业走复苏之路。”

然而他们提出的救援方法却是政府拿出一千二百万帮助企业还东方租赁公司的“阎王债”、“追命债”，贷银行的四千万元挂账停息……，总之一句话，还要靠政府继续拿钱养着。这笔账，

如果算给贵州长顺县黑山龙场的农民听,肯定是天方夜谭。当然,农民与工人相比,连算账的资格都没有。他们从来没有享受过“福利”。他们从来不敢企求恩赐,从来不敢养尊处优,从来不敢把命运交给别人。几十年前,梁漱溟就在全中国政协发言,对“工人生活在九重天上,农民生活在九重地下”不满,而遭到了农民的儿子毛泽东的斥责。农民早就搞清楚了,所谓“当家作主”,所谓“工农联盟”,都是既不可望又不可及的东西,到头来,谁也靠不住。他们是认账又认命。

这个账可不能一头算。政府还有一笔烂账没有算呢!萧秧从容不迫娓娓道来的一笔账,直算得重针人绝望。

他晾在场的人站不出来。他们不明白,无论给他们戴多少高帽子,理直气壮地找政府要钱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不是政府不愿给,而是政府早就难以为继了!政府财政的米缸里如果是满满的,那还改什么革,开什么放?经济学家认为,一切自上而下的改革,动力,大凡来源于政府财政的深刻危机。如果日子还对付得下去,犯得着重唱《国际歌》?犯得着一家人说两家话拉开桌子撕破脸领导与领导阶级谈判?我爱你,我疼你,然而我无能为力。

萧秧狠狠地将了一军。这是一个不给退路的选择。谁敢这个时候拍着胸口说,还上八千多万元的债,让重针总厂在不破产的情况下起死回生?

萧秧在等着。会场一片寂静,没有人伸头接话。

萧秧慢条斯理地说:“我估计你们做不到这一点。你们里面有些同志,也有五十年代的工人、干部,也有年轻的同志,大家在这个问题上团结起来。破产,咱们也要破得有志气,不要弄得窝窝囊囊的。至于说它的经验教训在哪里,咱们去总结吧。这一破,各方面都会得到教训。首先我萧秧就要得到教训。一个工厂破产了,惨呀!市委市政府有教训,纺织局有教训,贷款的人

有教训,批项目的人也有教训,工厂内部也有教训。听说同志们这几天很激动,我想要早两年像现在这么激动,这个厂子早就搞好了!工厂也兴旺起来了!但一直这样拖着,疲疲沓沓地拖着拖到了今天这个地步。我还听说有一个极不正常的现象:工厂周围一百多家个体户,哪个不发财,唯独我们的工厂赔钱。这到底是什么问题?”

萧秧也必须对前几天的骚乱表态:“这几天同志们有些事做得不对。有些同志很不像话,挑动一部分老太太、青年同志去静坐,自己则在后面鼓动。我要告诉这些同志,你这样搞,出了人身事故,就得追究你的责任。今天我给同志们讲清楚,以前的事,不管是挑动的也好,有过火的行为也好,一律不追究。但是今后不能再这样干了!你想全市有两百多万产业工人,我们再这样下去,就会直接影响到他们的正常生产和工作。难道要弄得大家都破产吗?所以,我们对同志们这几天的过激行为,一是理解,二是反对。给同志们讲清楚,特别是共产党员,究竟要带领群众干什么?一个党的组织,一个团的组织,一个工会组织,究竟要带领这两千多群众干什么?是保护他们,还是要伤害他们?保护就应该采取正当手段。你采取不正当手段,这就是伤害我们自己两千多个群众呀!”

今后怎么办?萧秧说:“现在已申请破产了,大家要好好地商量,今后怎么办?这两千多群众的生活要保证。共产党不保证工人的生活能行吗?但这个保证要按照规定。退休的怎么办?在职的怎么办?要有一套办法。刚才厂长跟大家通了气,属于保障生活这方面,大家有什么意见,都可以提。但是我提醒同志们,工厂办成这个样子,工人就没有责任吗?都有点责任,不能说都是市委市政府的责任,都要政府来承担。因此,大家都要有点奉献精神,也要作点自我牺牲,不能把这个责任统统推到人家身上去。职工生活要保障,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同志们

也要体谅国家的困难。我们并不是很富裕,现在全市亏损企业还有百分之五十四点三八。所以,在保障的同时,同志们也要作出某些牺牲,就不能跟正常的工厂完全一样,奖金、各种补贴一律照拿。恐怕这个也不合适吧?”

萧秧说:“在工厂困难时期,工厂的党政工团都不能散伙。厂长还是法人代表,这个工厂没有结束,所以,希望工厂要正常起来,绝不能瘫痪。另外,我们尽可能给同志们以支持。首先是解决生活问题,其次是解决今后的出路问题。这个出路咱们共同商量办理。有的同志可以自己联系就业,有的可以远走高飞,这些我都不反对。我倒有个想法,咱们一部分有志气的同志,你们能不能做点准备,有没有这个胆量,把这个破了产的企业重新组织起来。至于用什么办法,以后再说,今天咱们暂不讨论这个问题。先把当前的问题处理好。反正就这么两条:第一,吃饭要保证。只要我萧秧有饭吃,重针厂的职工也都会有饭吃。这一条我敢保证。第二,只要你们在改革过程中敢闯,用改革的精神来对待当今的事物,我们一概支持。这两个问题靠谁?第一要靠党的组织,第二要靠政府。但是,最根本的要靠重针总厂两千多职工同志。我看你们厂长刚才讲得不错嘛!厂长,书记,工会主席,都要有志气,把这个企业组织好,把大家团结起来,坚守岗位,共度难关!”

又是热烈的掌声。

“萧秧有饭吃,重针厂的职工也都有饭吃。”成了安定民心的名言。

虽然是这么说,厂门口还是聚集了一些老太太堵萧秧,她们有的是退休职工,有的是退休职工的老伴。她们要萧秧当面说出个子丑寅卯来。她们堵住了萧秧的小轿车。殊不知,萧秧早换坐面包车神不知鬼不觉地走了。

让这些老太太堵住可是件麻烦事。

沈阳市委宣传部部长刘迎初给我讲了个故事。

沈阳有个大厂，一直亏损，工资、离休退休费、医药费……都成了问题，每天都有一帮老太太找厂长说事儿。厂长啥也干不了。有一天逼急了，厂长大叫：“各位大妈大婶，你们都可以做我的妈。妈！——”

一声“妈”，喊愣了在场的老太太。

厂长今儿个是怎么回事？

“你们儿子现在有困难了！妈，你们体谅着点。你们给我让个道，我这不是为了去解决困难吗？”

“让道！让道！”

话说到这种份上，老太太闪开了一条道。

九

重庆市委一号楼，座落在重庆一个小山头上，拐弯抹角上去，被茂密的树丛包围着，居高临下，能看见万家灯火，大江东去。长江、嘉陵江交汇处，依傍峭壁悬崖建造了一座一千多万人口的超大型城市。连绵起伏，变化多端，雄伟而恢宏。平巴掌大的一块岩石，便可以挨着挨着起来一幢幢高楼。这样的技巧，这样的智慧，这样的毅力，让人眼花缭乱，叹为观止。“吃”，最能概括重庆人的特点。酸菜鱼，豆花鱼，啤酒鸭，口水鸡……每年都有花样翻新，足见重庆人的创造力。开车到歌乐山吃“辣子鸡丁”，一斤半干辣椒，半斤花椒，爆炒一两斤重一只的小土鸡……足见重庆人的火爆和想像力。

不知道为什么，如此高的技巧，如此多的智慧，如此坚强的毅力，如此的创造力和想像力，却没有让重庆走出困境。

七十年代,赵紫阳时期,便有了一百个以重庆为主体的企业改革试点,快二十年了,步伐仍是这般沉重。

在重庆妇孺皆知,“一号楼”是重庆市权力核心的代名词。“一号楼”的主人正密切关注着重针总厂事态的发展。

“火锅事件”后,工人又冲击了重庆市中级人民法院。事态还在继续发展。坚决反对破产的工人分兵两路,一路进京告状,状子递到了国务院、全国总工会、纺织工业部;一路到市中级人民法院,状告厂长“违背宪法,侵犯广大职工的民主权利”,“不听从职代会‘生产自救’的决议,私自向法院递交破产申请,是一种粗暴的‘强奸民意’的行动”。

工人的行动构成了巨大的压力。重庆一九九二年的夏天,是一九四九年以来最炎热的夏天。最高气温达到了四十二度!而且是持续高温。

工人的情绪也是持续高温。“破”与“不破”,“一号楼”颇费踌躇,法院也颇费踌躇。在社会环境复杂,市场经济发育不完全的情形下,破产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和法律问题了。在西方发达国家,破产如同生老病死,是一种自然和常规的现象,而中国不行。在西方发达国家,破产失业更多是经济问题;在中国,更多的是社会和政治问题。所以,破不破产,要由党和政府来决定,而不是由法院来决定。在现行司法制度下,法院不过是一个体现某种意志的机构罢了,只不过是某个程序中的一个环节罢了。重大的案件,敏感的案件,牵涉面广的案件,法院做不了主,必须接受领导。

法官们来到一号楼。他们需要有一个明确的指示方能行事。他们的对面,坐着书记和市长们。

焦点是萧秧。法官汇报了法院审理“重针总厂破产案”的情况和问题之后,会议室一片沉默。萧秧发言之前,谁也不会说话。问题突出,矛盾尖锐,形势严峻,这个时候,谁说了都算不了

数,唯等萧秧定调子。

萧秧说话了,还是那种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慢条斯理不慌不忙。“我看争议的中心很明显,就是一个破与不破的问题。是不是?”他用眼睛问市长孙同川。

“其实,大道理很多人都懂得,但只要一接触到切身利益、既得利益,感情上就通不过了,就哭哭啼啼的,伤心得不得了。我看,企业的破产,有点像人的死亡。有的人明明知道自己得了绝症,确实医治不好了,但总想拼命活下去,也就是民间常说的:好死不如赖活着。只要还有一口气,就绝不轻易地闭上眼睛。他的亲属们心境也一样,不论花多少钱,花多大力气,也要请求医生进行徒劳无益的抢救,输血,供氧,点滴,喂人参汤,千方百计把命吊住。到头来,还是免不了一死。这不仅是一个感情问题,其实也是一个观念问题。”

下面便是常务副书记、市长、副市长的排队发言。

萧秧还接着谈他的生死观。他在讲哲学。“据古书记载,大哲学家庄周的妻子死后,他不但不痛哭流涕,反而鼓盆而乐。也就是敲一种音色很好的陶器庆贺吧。这在一般人看来,简直有点不可思议。可能认为这位哲学家神经有点不正常,或者,按现代的说法,他可能有婚外恋。这当然不是事实。在古代,封建道德约束得很紧,庄子是著名学者,绝不会有这等风流韵事。那为什么这么乐呢?道理很简单,因为他是大哲学家,明白生老病死乃是一种人力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人活到头了,自然应该死去。死,也是从生的病痛中的一种解脱,一种了结。所以至今在民间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把结婚和逝世统称为‘红白喜事’。其实这种说法很有道理。我们假设,自有人类以来,所有的人只允许生,不允许死,那么今天,全球人口就不是五十亿,不知该有多少个亿了。许多老者都活上几千岁,几万岁,白胡子都拖到地上了,人挤人,人挨人,那成了什么样的世界?!”

副书记张文彬更是说得直截了当：“我就主张已无再生希望的企业实行‘安乐死’，早死早投生！我就主张‘搞死’一批（企业）。毫无疑问，人们对于必须搞活国营大中型企业是不会有异议的。但是，对于同时也必须‘搞死’一部分企业，则存在着心理障碍。因此，近几年来，我们在研究如何‘搞活’上，功夫下得很多，面对如何‘搞死’，则研究得不够。因此，我认为完全有必要在这个问题上统一认识，首先研究一下企业‘活’与‘死’的辩证关系。”

“一号楼”关于“生”与“死”的讨论，触痛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最敏感的神经，展开了“红”、“白”悲喜剧的广阔背景。

此时，一号楼窗外的“知了”仿佛被太阳烤着了，口干舌燥，声嘶力竭，“知了！——知了！——”，叫得人心里发毛。

十

有人“知了”，也有人不“知了”。

“知了”让人发毛，不“知了”更让人发毛。

一九九四年八月二十七日午夜，重庆大雨滂沱，“哗哗哗——”，泼水一样，两三步开外见不着人。灯光都被肢解和扭曲了，怯怯闪烁着。雾重庆变成了雨重庆。那阵势，惊心动魄！任亚非正在延续着两年前八月一号楼的故事。这位购买了重针总厂的重庆海外集团的代理总裁此时独自躲在一家饭店里，对着小录音机录音。他已是破釜沉舟，作了最坏的打算。他曾起草了中国第一家大中型破产国有企业——重针总厂的收购方案。历史曾经给了他一次机会，让他施展经营才华。他要抓住它。一九九三年二月三日，他看到了当天的《重庆日报》刊登了重针

总厂破产清算组的一则“公告”，曰：“我组对重庆针织总厂破产的固定资产已清理评估完毕，现决定整体出售（包括对土地使用权的转让）。欲购者，请于二月十八日前到重庆市中级人民法院经济庭登记面议。”这则“公告”，只占了窄窄一小条不显眼的版面，却惊起了任亚非心中的波澜。这位一九八六年大学毕业、一九九一年从中国人民建设银行辞职的个体小老板，一直梦想当个大老板。那个时候，工商注册对私营经济实行歧视政策，个体户不能直接注册公司，他便携带着几年拼死拼活积累的全部流动资金、全部固定资产、全部赚钱的生意数百万元，再加上他的全班人马，投奔了市委统战部，他出钱出物，统战部所属的海外联谊会当“主管单位”，出公章，出干部（董事长和总经理都由不出资的统战部决定和派出，并任企业法人代表。），注册了一个“集体所有制”性质的“重庆海外实业发展总公司”。或者说，他任亚非拿着自己的钱找了个“爹”，找了个“娘”，给企业戴了顶“集体”的红帽子。这是个极其复杂的心理过程。他说：“我虽然上过电大学金融，虽然在银行干了好几年，虽然闯荡社会赚了一点钱，成了百万富翁，但是没有社会地位，贷款受歧视，发展受限制。”他与当时所有私人老板一样，必须找到一棵大树，背靠大树好乘凉。如此这般，一开始合作，便处于劣势，便种下了祸根。他的内心深处埋藏着深深的自卑。他有钱，但是没有名分。他不得不在企业产权关系极其模糊的情况下，找一个说法让出资所有者的天然权利，以换取合作者的信任与合作成功。他的内心十分矛盾。他明白，除了钱之外，他手里没有任何有分量的砝码。他是拿钱上门求着被“招安”。他填完了“法人代表登记表”，又自己把它撕了。他的心如同洒了一地的“法人代表登记表”碎纸屑。他对统战部派来的总经理说：“法人代表还是由大哥来当。”官方派来的总经理朱家琪，原是司法局副处级官员，公司成立后专门调到统战部，说起来是他半年前认识又十分投契

的哥们儿，长他三岁，所以叫大哥。为了亲上加亲，互相做对方孩子的义父。这位大哥的老师是统战部副部长。没有这位大哥，他连统战部的边都沾不上，当然就谈不上即将成立的“总公司”了。这种妥协既是无可奈何的结果，又是算度的结果。企业离不开金融，特别是上规模的企业，尤其离不开金融的支持。做为一个银行出身的金融运作高手来说，他深知牌子和名分的重要，因为牌子和名分意味着某种信用关系。这种不平等的互相利用的关系，再加上说不清道不明的哥们儿关系，再加上特定的政治气氛，把一切问题都搞复杂了，形成了早期中国市场经济的奇怪景观。

“包括土地使用权的转让。”这让任亚非的眼睛发亮。

还有什么比土地更值钱呢？搞活大中型企业，有一时髦的话，叫做“盘活存量”。不说那些“三线厂”，一些大中型城市的一些大中型企业，往往占着城里的黄金地盘。制度不值钱，厂房不值钱，机器不值钱，人也不值钱，唯有地值钱。北京“退二进三”，一些工厂把二环路内的厂房迁到三环路外，老厂址办第三产业，以第三产业养第二产业，所谓“以三养二”。最大的“存量”是土地。

土地里面大有名堂。

“我们应该去争一下！”任亚非提议。虽然在所有八个国内外竞争对手中，海外集团的实力最小。他和一名律师私访陈家坪重针总厂。重针总厂占着一百多亩地，临靠成渝高速公路的重庆起始段，有着很大的开发潜力。他们正看得高兴，被护厂的工人抓获。清算小组有严格规定，破产清算期间，未经许可，任何外人不得进入厂区。

“你们是干啥子的？”

“司法局的。”律师随口答道。

“司法局的？来厂里面搞啥子？”

“随便看看。”

“不行！赶快离开！”

俩人被高度警惕的工人押着离开了工厂。

一九九四年八月的一天，陈家坪。重庆三十七度高温，我大汗淋漓。“三十七度？只不过是温柔地抚摸一下。”旁边的重庆人幽默地说。

重针总厂已更名为“重庆海外针织总厂”。厂长老蔡抱怨说：“今年的生产形势不错，订货都作不完。就是银行不贷款。说是市里面打了招呼。这不是把我们往死里整？我不是没有还贷能力嘛！我的生产形势不是不好嘛！”

此时，海外集团和海针总厂正面临严重的危机。

任亚非说，搞好海针总厂，他是有把握的。这位三十八岁的白净小个子，不经意地抚摸着车间的机器，像是抚摸自己的孩子。他断定这是一块风水宝地。最终海外集团以四千零六十万拿下重针总厂。条件并不轻松，必须安置八百名职工，继续从事针织行业。光是这两个条件，就吓跑了大多数竞买者。

重针总厂的购买成功，给海外公司带来了出乎意料的社会声誉，也给海外公司带来了巨大的利益。不到一年，海外公司便成为估价近两亿的海外集团了！

蛋糕做大了，欲望也在膨胀。

先是内讧，然后是摊牌。什么哥们儿、义父，全都不顾了。还是副处级官员的总经理朱家琪“要打破集体决定企业重大问题的事先约定”，把任亚非挤出集团决策层，使权力高度集中。同时把自己的小舅子安排为财务总监，剥夺了任亚非的财权。遭到了任亚非的反击。那时的海外集团可热闹了。一个公司，两个水火不容的领导核心，各自都有各自的人马，各自都有各自的“上面”的渠道，上午总裁召集开会，下午副总裁召集开会，你说你的，我说我的，你上午作了一个决定，我下午就推翻，互相攻

击,互相拆台,不一而足。公司成了硝烟弥漫的“阶级斗争”战场。谁都想当老大,谁都想说了算,权力,利益,面子,意气,……到后来都搅和到了一块,张飞杀岳飞,杀得满天飞,直看得公司员工眼花缭乱,无所适从。一幅“春秋战国”的景象。

这一代人、这一个时代受过“阶级斗争”的训练,熟悉“阶级斗争”的方法,非黑即白非友即敌的二元思维定势仍然毒害和左右着社会的大脑。

朱家琪的软肋在关键时候暴露出来了。按任亚非的说法,朱家琪“下海”没脱衣服。此时,朱家琪虽然是这家集团公司的总裁,但他的组织关系行政关系都在市委统战部,仍然是统战部官员。吃公家饭,受公家管。

反击是致命的。

结果,朱家琪啷当入狱,连带了几十名处以上干部,诱发了重庆一九四九年以来最严重的一场政治地震。

做为举报人,任亚非却受到了更严厉的审查。他始料未及。他没想到会引起如此大的震荡。他突然发现自己犯了一个大错误。他的举报得罪了台上一大批有权势的人,市长、局长、处长,无论是直接得罪还是间接得罪,总之都是得罪。一位经济学家说,中国的问题如同一篓活螃蟹,拎出一个来,其它的手拉手脚抵脚互相纠缠着一个跟着一个全出来,让你顾此失彼顾彼失此。中国官场的人际关系何尝不是如此呢?利益维系,千钧一发。朱家琪是韩为模的学生,主管统战部的市委副书记又兼管政法。高层讨论任亚非案件时,一些主要当事人和有牵涉的人没有进行必要的回避,仍然发表意见并参与决策。暂且不管这些意见和决策正确与否,由于不回避,意见和决策的公正客观性便打了折扣。当我向当时的市委书记孙同川提出这个问题时,孙承认“此案与市委市政府的一些干部有牵连”,说,“我没有办法不让他们发表意见”。

他把问题想的太简单了。他对朱家琪的反击,如同一把双刃剑,伤了别人,也伤了自己,可能伤自己还会更严重一些。上面给银行打招呼,不给海外集团和海针总厂贷款;上面给工商局打招呼,不让海外集团更换法人代表;有消息说,上面组织了更强大的人马,对他这个给重庆市带来麻烦的举报人进行调查。

他的方案曾经救了重针总厂,可他现在救不了自己。他感到有一张巨大的网正朝他张开,而且,网口正在收拢。他已经走投无路。他作了最坏的打算。他说:“我是搞企业的,不懂政治。”当事态朝政治方面演变时,他便无能为力了。他的行动几乎动摇了重庆市刚刚建立起来的政治结构和利益阶层。那边是一个集团军,而他,只有他自己。这个时候,他强烈地意识到,只有一样东西能保护他,能救他,就是“产权关系”。当初,他留了一手。他与当时主管公司的韩为模签署了一个投资比例分配清单。这份双方投资比例清单,事实证明,水分很大,需要进一步甄别,但它意味着产权某种程度然而是不规范的确认。但是,有关方面不认账,努力寻找定性为“集体企业”的说法。这是最后一道防线,如果守不住,将进一步引起连锁反应。海外联谊会社团法人性质的民间机构,任亚非又是个体户,海外集团便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民营公司。谁会容忍中国第一家大中型破产国有企业被一个私人为主的股份合作制的企业买走呢?照一部分人的眼光看,如果是这样,重庆破产改革试点就不具备经典意义了。

这涉及到了海针总厂姓什么的问题。姓“公”?姓“私”?或者是“公”“私”兼有?涉及到了理论与实践上最含混不清的“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

可能一直到现在,大家都以为,海外公司或后来的海外集团是统战部的下属企业,海针总厂当然姓“公”。英国 BBC 记者采访重庆市政府官员时问:“重针总厂是一个公有制企业,海针总

厂也是一个公有制企业，你们以公破公，破来破去，有什么实际意义呢？”

所有政府官员工作总结和对国内外新闻媒体发表讲话，都以“公”而论之。没想到冒出了个任亚非，要打海外集团的私有产权。

收购企业的所有制性质早期被疏忽了！被想当然了！

这才是问题的要害。

任亚非是相当矛盾的。今天这个结果，是个两败俱伤的结果。搞掉了朱家琪，他也没有好果子吃。而且，在商场这片江湖上行走，自有一套大家心照不宣的规矩。这套规矩在看不见摸不着的地方，在脑海里，在血液里骨髓里，在内心的最深处。这是一套超越了公众道德评价系统的道德评价系统，是一套超越了成文法律的不成文“法律”。它铁一般地存在和稳定。它的厉害恰恰在于“看不见摸不着”。在这套规矩和“法律”面前，“告发者”是最让人躲之唯恐不及的角色。不论是哪种社会，都充满了交易，政治交易，经济交易，人情交易，从来都有看得见与看不见的两套伦理系统并行不悖地运转着。搬教条，认死理，根本无法生存。事实上，看不见的裁决往往比看得见的裁决更可怕，江湖中人看来，看不见的裁决能断了一个人一方水土的生路。任亚非深知此理。他知道他犯了江湖上的大忌，但已无法挽回。话分两头讲，他认为，毕竟还有公理在。他现在面临的已不是“生路”的问题，而是“死路”的问题。此时，他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他对我说：“我如果突然‘消失’的话，这盘录音带保存在你那里，作一个凭证，为我伸冤！”

我打开了录音。

那天夜里，大雨倾盆，雷电交加。任亚非在诉说：

“我叫任亚非，现年三十八岁，我的身份证编号为：

510202561023121。……我要说明,我今天把我所说的录在磁带上,(是想)让今后有人知道这个情况。因为(我)所说的问题,涉及到的不是一般的平民百姓,(而是)涉及到重庆市政府市长、副市长、台办(对台湾事务办公室)主任。(注:后经省委工作组查实无误,分别予以查办公布。)……我是搞企业的,本身对政治不太关心,但是,我明显地感觉到,企业各方面压力很大,压力来自哪里,我不清楚。甚至,我也可能遭到灭顶之灾(注:录音在此停顿了一会儿)。我生死未卜。

“做为每一个公民,共产党号召我们,每一个公民都有义务起来与不正之风作斗争。我向(四川)省纪委反映的情况是真实的,有根据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怎么做。我也不知道我在哪一天‘消失’。所以刚才说这些,都是事实。我愿意为我上面所说的话承担法律责任。如果有一天我‘消失’了,……我希望通过我的录音和你们的谈话,在有良心有正义感的人们中间能唤起些什么,能悟出些什么。……”

任亚非把录音带交给我。他脸色铁青,继而微红,眼泪在夜半灯光下闪烁着,忍着不让流出来。谁也不说话。房间里静得吓人。这是一个非常自负的人,独往独来,自以为能永远控制住局势,也可能是他的过于自负害了他。他为了抢时间,自以为是地通过关系但违反程序公证了那份“分配协议”,把一个光明正大的事情办成了一个鸡鸣狗盗的事情,结果让别人揪住小辫子。他出身于工人家庭,在兄弟里面行三。自己一个人出来打天下,八面来风,处处陷阱,自然有一帮江湖朋友相互提携两肋插刀,自然染上浓重的江湖气,大家都是兄弟,锅里有肉大家吃,碗里有酒大家喝。但是江湖朋友有这么个特点,能穷过,不能富过,特别是在市场经济背景下的现代企业,江湖气简直就是一个毒瘤,一个杀手,可以把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大厦全毁喽。在一般的人际关系中,行侠仗义,不拘小节,不计得失,无疑是个人魅

力;“吃亏是福”,“吃亏维朋友”,亦是流布江湖的美德。然而,在一个新兴的现代企业,带进来的江湖气有着天然的缺陷,它会严重侵蚀现代企业中头等重要的秩序、规则、制度,打破维系企业利益关系与合作的某些道德准则。任亚非的一个小兄弟听说总经理朱家琪和任亚非过意不去,便私自闯进了朱的办公室。

“你是朱家琪吗?”

“你是谁?”朱家琪见一个陌生人突然闯进来,吃了一惊。

“别管我是谁。你是不是朱家琪?”

“是。”

来人确认了以后,再也不说话。他面无表情,撸起袖子,手里拿着一把刀片,往自己的小臂上深深地切进去,然后往下迅速一划,皮肉一下子翻开一条好几寸长的口子。因为速度快,翻开的肉白花花的,继而殷红,继而鲜血畅流。

朱家琪还没明白怎么回事,一套动作便完成了,鲜血已经“滴答”“滴答”落在了办公室的地上。

朱家琪大叫:“你这是干啥子!你这是干啥子!”

来人从容不迫,面不改色心不跳,说:“亚非是我大哥。你要是再跟他过不去,便是这样!”

朱家琪的脸顿时就白了。

“赶快来人!赶快来人!”

“有话好说嘛。咋个这个样子沙!”

“赶快止血!”

“找绷带!找绷带!”

总经理办公室内一片混乱。

.....

这是暴力!一种通过自戕来威胁别人的暴力!“文革”期间,重庆是一个闻名全国的暴力城市。“文革”的大多数时间里,我生活在重庆。我看够了暴力,以及暴力给许多家庭带来的痛

苦,看够了暴力对社会的毁坏,对人们肉体和心灵的伤害。

北京话叫“哥们儿”,重庆话叫“兄弟伙”。四川是“袍哥”的故乡,“兄弟伙”带有“袍哥”遗风。

如此显赫知名的企业集团,却是这样的糟糕,不能不令人失望。自己都是土崩瓦解的架式,还想救海针总厂于水火之中?

我问:“你事先知道吗?”

任亚非答:“事先不知道。”

问:“这个人为什么会用这种手段帮你?”

答:“我曾经在他最困难的时候帮助过他。他没文化。”

“这种帮法只会带来负面效应。”

“我也这样认为。这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十一

剪不断,理还乱。

重针总厂破产案,给重庆市引来两场大风波,与“六四”相比,其广泛不如“六四”,其深刻则远在“六四”之上。

谁也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结局:副市长免职(保留党籍),台办主任免职(留党察看一年),朱家琪判处有期徒刑两年、缓刑两年;由于海外集团被指定为“集体所有制”企业,重庆市北培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以侵占罪和挪用公司资金罪判处上述三人问题的“举报人”任亚非有期徒刑十五年。

证据确凿的被举报人呼吸着自由的空气,“反腐败”的举报人却在经受铁窗之苦。这个结局多少有点滑稽。从诸多迹象看,这个结局是两种力量较量的反映。既是闹剧,又是悲剧。

从一九九四年底开始,统战部理直气壮地派人接管了海外

集团及其海针总厂等所属十几家企业。一年多过去了,集团一九九四年八月负债六千八百万元,一九九五年底负债增至九千万元。

任亚非一夜之间倾家荡产,变成了身无分文的穷光蛋,变成了阶下囚。

原来一年只收两万元管理费的统战部海外联谊会,一夜之间成了近两亿资产企业的“真正主人”,像是完成了一次“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世界舞台搭得竟是这样的有趣:历史这个魔术师和现实这个搭档,能把不可能的变成可能的,把可能的变成不可能的;能让台下幕前的观众看傻了眼。

任亚非不甘心,不认命。他要寻找公道。他还要抗争。他要把自己从不公的命运中解救出来,如同黑山龙场和西崖村完全靠自己的努力修一条自由之路的农民,如同沈阳铁西区菜市场外摆擦鞋摊的刘姐,如同把奶水挤到北京地铁厕所的刘洁。

他有申诉的权利。

奇迹会出现吗?

奥地利著名作家茨威格讲了一个非常奇特的故事。

一八三九年瑞士逃亡者约翰·奥古斯特·苏特尔来到美国西部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瑞士旧称“黑尔维喜阿”,于是他给这个地方起名叫“新黑尔维喜阿”。后来,新黑尔维喜阿的土地上建起了富裕繁荣的大都市——旧金山。旧金山的富裕繁荣就与这个瑞士冒险家约翰·奥古斯特·苏特尔有关。

约翰·奥古斯特·苏特尔成了新黑尔维喜阿的地主。他种粮食,种葡萄,养牲畜,建庄园,若干年后,苏特尔“成了世界上最最有钱的人”。一八四八年的一天给他带来了厄运。他雇佣的细木匠在农庄的地里发现了黄金!这个消息像瘟疫一样迅速传遍了整个世界。茨威格描述说:“接着发生的一切真是史无前例

的。苏特尔手下的人一下子离开了自己的工作,铁匠们跑出铁工厂,牧羊人扔下羊群,种葡萄的离开葡萄园,士兵们撂下枪支,所有的人都像是中了魔似地急急忙忙拿起筛网和煮锅,向锯木场飞奔而去,从泥沙里淘黄金。奶牛没有人去挤奶,在那里大声哞叫,有的倒在地上死去;围起来的一群群野牛冲破了栏圈,践踏着农田;成熟的庄稼全烂在了秸秆上;奶酪工厂停工了;谷仓倒塌;大工场的轮盘联动装置静静地呆在那里。而电讯却不停地传播着发现黄金的好消息。跨过陆地,越过海洋,于是从各城市、各海港络绎不绝地有人来,水手们离开自己的船只,政府的公务员离开自己的职守,他们排成长长的、没有尽头的纵队,从四面八方拥来,有的步行,有的骑马,有的坐车,掀起一股疯狂的淘金热。这些挖金者简直像一群蝗虫。他们不承认任何法律,只相信拳头;他们不承认任何法令,只相信自己的左轮枪。在这片欣欣向荣的殖民地上,到处都是这样一群放荡不羁、冷酷无情的乌合之众。在他们看来,这里的一切都是没有主人的;也没有人敢对这群亡命之徒说一个不字。他们屠宰苏特尔的奶牛,拆掉苏特尔的谷仓,盖起自己的房子,踩烂苏特尔的耕地,盗窃苏特尔的机器——一夜之间,约翰·奥古斯特·苏特尔就穷得像个乞丐,恰似迈达斯国王最后憋死在自己点化的黄金中一样。”

一八五零年,加利福尼亚并入美国。苏特尔根据自己的土地产权,突然提出了一系列权益要求。他控告了一万七千二百二十一名农民,要求州政府和联邦政府赔偿他的损失,要求从全部挖到的黄金中分到自己的份额。这是一场人类历史上闻所未闻的诉讼。为了捍卫自己的权利,打赢这场官司,他送二儿子去学法律,并把自己新庄园的全部收入用来诉讼。他用了四年才完成上诉程序。

一八五五年三月十五日,法官汤普森裁定,约翰·奥古斯特·苏特尔对这片土地的全部权益要求是完全合法和神圣不可侵犯

的。茨威格描述说：“判决消息传开之后，圣弗兰西斯科和整个加利福尼亚卷起一场大风暴。数以万计的人成群结伙举行暴动。所有感到自己财产遭到威胁的人、街上的无赖歹徒和一贯以抢劫为乐事的流氓一起冲进法院大厦，把它付之一炬。他们到处寻找那位法官，要将他私刑处死。他们集结成一支声势浩大的队伍，前去洗劫约翰·奥古斯特·苏特尔的全部财产。苏特尔的长子在匪徒们的围困下开枪自尽了；第二个儿子被人杀害；第三个儿子虽然逃出性命，但在回家的路上淹死了。新黑尔维喜阿的土地上一片火海，苏特尔的农庄全被烧毁，葡萄藤被践踏得乱七八糟，家具器什、珍贵收藏、金银钱财均被抢劫一空，万贯家财在毫不怜悯的愤怒之下统统化为乌有。苏特尔自己好不容易捡了一条命。”

苏特尔，这个“衣衫褴褛、精神萎靡的老人在华盛顿的法院大厦周围游来荡去走了二十五年”，“成了一个最最贫穷的乞丐，一个最最不幸和失败最惨的人”。

任亚非会不会成为苏特尔？海外集团会不会是新黑尔维喜阿？很难说。

美国西部大开发时代与九十年代的中国毕竟不一样了。但是，不讲规矩，蔑视法律，崇拜权力，以权代法，歧视个人权利，歧视私有财产，确实带有旧时代的痕迹。

这是人类社会演进中的一个极端案例。这个案例是血腥而可怕的。正是有了这类血腥而可怕的案例，才会有法制社会的进步。

我们看到了进步。

任亚非创办的海外实业发展总公司本质上是一个“假集体”公司。与它相类似的公司，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全国有成千上万。这是《公司法》出台之前大家心照不宣社会充分默契规模巨大的“制度”造假行动。根据我的考证，“挂靠”戴“红帽子”的发

明权应归浙江温州的私营企业家,应归“无为而治”、比较实际的温州政府。有“红帽子”的,没钱,没经营人才,没经营能力;没“红帽子”的,有钱,有经营能力,于是二者便结合起来了。他们用这种方法规避意识形态歧视、市场交易歧视、资源配置歧视以及诸种歧视所带来的商业风险,包括阶段性地利用和挖掘旧体制生产力资源,以求生存和发展。

这是一个公开的秘密。

这是中国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公开的秘密。

什么是中国特色?这便是中国特色。

什么是中国智慧?这便是中国智慧。虽然这个“智慧”,是一种扭曲的智慧,是被逼出来的智慧;虽然这个“智慧”会给市场经济的道德秩序种下苦果。

人们已经清醒地看到了这一点。

个体经营者任亚非投资挂靠统战部海外联谊会,与统战部部长副部长商定“挂靠费”每年两万,并商定海外联谊会不负公司经营的任何经济连带责任。申报注册资金时,任亚非认为应该搞个吉利数字,于是注册资金“一千六百七十八万元”应运而生。“1678”,取“一路去发”意,取“共同富裕共同发展”意。四川话发音,“6”读“LU”。然而,“1678”并没有给任亚非带来好运气,并没有带来吉祥如意,反而带来了灭顶之灾。“一路发去”,双双“发”进了监狱,让渔翁得利。

真是一个黑色幽默。

这是一个产权不清的悲剧。

任亚非明白,救自己只有一条路,就是厘清产权。

海外集团产权性质的界定,关乎任亚非“罪”与“非罪”。司法界人士认为,如果秉公执法,性质不难界定。

“罪”与“非罪”,咫尺之遥,却又往往是咫尺天涯,可望而不可及。

看来,任亚非也要唱《国际歌》了。

十二

又是电话!

“沈阳人来了北京?”

我一惊,急问,“来人怎么说”?

沈阳下岗职工生存状态的报道,惊动了沈阳。“明天见沈阳市委宣传部长。”

说话间,已是一九九六年二月。再过几天就是春节了。他们也该来。“下岗职工”,确是一个敏感的话题,关系到安定团结。每年过年,都要拿出一笔钱来安抚困难企业困难职工。财政没钱,就用银行贷款,银行再头痛也得贷,哪怕是打水漂。所谓花钱买“安定团结”。所谓“安定团结贷款”。一九九六年,辽宁拿了四千万过年,沈阳拿了五千万过年。

不管是哪一级的宣传部长都怕见。怕见也得见。急了往中宣部告一状,无伤大雅,却也麻烦,而且十篇报道刚发了一半。

刘迎初迎而走来。这位小个子宣传部长是湖北人,举止干练,说话坦率。第一印象不错。他说:“哎呀,你们不知道,我们沈阳现在唱三首歌,《国际歌》,《敢问路在何方》,《我们走在大路上》。沈阳的问题多了,困难多了,说问题,倒苦水,几天几夜倒不完。前些年,沈阳人愁眉苦脸,牢骚满腹,计划经济时期,对国家贡献那么大,国家全部财政收入中,沈阳曾经占到了十二分之一!你说贡献大不大?可是光埋怨没有用。问题还是要靠自己解决,困难还是要靠自己克服。你们还应该二下沈阳,去看看沈阳人的志气。”

一九九五年,军委副主席张震上将在沈阳视察。张震上将是红军时期干部。白发苍苍的老将军问市委书记张国光:

“国光同志,你说,你们现在遇到的困难大,还是红军长征时遇到的困难大?”

“当然是红军长征时遇到的困难大。”

“红军长征都走出来了,难道沈阳走不出来吗?”

所以要唱《敢问路在何方》、《我们走在大路上》。

《敢问路在何方》是八十年代的流行歌曲,《我们走在大路上》是“文革”前和“文革”期间的流行歌曲。年轻一代对后者可能不熟悉。《我们走在大路上》是一首进行曲。它的第一段歌词是这么唱的:“我们走在大路上,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毛主席领导革命的队伍,劈荆斩棘奔向前方。向前进!向前进!革命洪流不可阻挡。向前进!向前进!朝着胜利的方向。”

五、六十年代的流行歌曲、八十年代的流行歌曲和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流行歌曲就这样被搀和到了一块,很难纠缠本真的涵义了。也就是说,不能学究气地较劲。怎么方便怎么来,怎么好记怎么来,怎么实用怎么来。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功利主义时代。中国是个“镪水”池,如果想的话,什么东西扔进去,都可以化得无影无踪。

其实也不是没写沈阳人的志气。

比如沈阳防爆器材厂厂长石永阶。一九八六年九月三日,发表在《中国青年报》一版的一张大幅新闻照片让石厂长出了名。照片的标题:“倒闭后的滋味”。照片有一段说明:“正在闷头抽烟的是原沈阳防爆器材厂厂长石永阶。八月二十五日上午,他到厂里来领救济金证,市保险公司称他的问题正在调查中,目前尚不能发证。石永阶先是大发雷霆,尔后又眼睁睁地看着工人们领证。他在这里当过近两年厂长,此时此刻,不知心里是啥滋味。”

这张照片得了当年的新闻大奖。记者郑鸣因此而获得当年十佳摄影记者的第一名。

“一定要找到石永阶。”

“去沈阳写下岗职工，找不到石永阶，等于没去沈阳。”

访问者十年后问石永阶：“当时你为啥‘大发雷霆’呀？”

石永阶说：“他们让我退休。我说，我不退。他们说，那就病退。我说，我没病。”现在的石永阶，已经不是十年前的石永阶了。十年前拥有一百三十六名在岗职工和七十八名退休职工的破产国有企业厂长，现在已是私营老板了。他还干防爆老本行，两个厂，十七名雇工，十几台机床，四十万固定资产。一九九五年底，正当石永阶准备再建一个分厂的时候，有二千二百名职工的沈阳防爆电器厂宣告破产。石永阶得意地说：“现在沈阳生产防爆电器的，已经被我顶得差不多了。”他生产的产品，远销美国、泰国。

十年前石永阶可不敢得意，他像是只被拔干净了毛的“凤凰”。厂子黄了，他这个厂长和工人一起失业了。他都没脸出门见人，在家憋着。老伴儿心窄，着急，气瞎了一只眼。

总在家里呆着也不是回事。破产厂长被罚免了两年救济，他没了维持基本生活的收入。他哭过，他骂过，他怨过，没用。

总得干点什么。干什么呢？寻思半天，“干老本行”！石永阶说：“我就是要赌这口气！让大伙儿看看，咱老石不是孬种！”

他向亲家借了一千元，向老家借了一千元，就在防爆器材厂破产三个月后，他老石只有一台机床的小作坊开业了。小作坊离让他一辈子伤心和耻辱的防爆厂不到一里路。

访问者问：“你现在这个厂长跟过去有什么不同？”

他说：“大不一样。过去搞个产品，得向上级报计划，申请经费，现在我一句话就办了。过去工人不干活，我只能劝只能说，现在我马上让他走人。过去产品质量有问题，谁都不说，层层给

你打马虎眼,现在谁敢!过去我说话不算数,好几个副厂长,还有书记呢,现在就听我一个人的。”

老伴儿插话道:“过去花钱挣钱都是厂里的,现在都是自己的,真睡不踏实。”

刚开业时,扩大生产,老石借了三万元钱。这可是一笔巨款,相当于老石十几年的工资!老石一家一辈子没见过这么多钱。

老俩口这天晚上没睡着觉。

第二天,老石向全家颁布了一条“法律”:“今后每顿咱家只吃酸菜豆腐,啥时候还上钱,啥时候吃肉。”

有了工厂、有了分店,买了房子、买了车的石家,至今还保持着酸菜豆腐的传统。

十年后,记者又去访问他。他拉着记者的手说:“十年前你们拍了我倒霉的照片登在报上,今天再给我拍一张成不?笑的。也登报。”

一九九六年二月六日,《中国青年报》一版刊登了老石的照片,还配发了十年前那张“倒闭后的滋味”。

石永阶,六十八岁,马上就要“知天命”了。他戴着呢子帽,身穿黑呢中山装,帽下是白头发,一看便知,是个厚道老头。镜头对准他的时候,他露出笑脸,挺直了腰板……

十三

办公室杂乱无章,灰尘鼎沸。北屋背阴,永远没有阳光,所以看不见灰尘在光束里冲撞迷乱的景象。永远下不了决心,而下决心之前,尽可能不去动桌子上的东西,尽可能避免去寻找与

桌子上有关的东西,将乱就乱,熟视无睹,渐渐麻木不仁得过且过,天长日久,竟然也就养成了浑然一体或者高高挂起的情性。凳子腿断了,谁来坐都要受到警告。“注意别摔着了!”再后来警告也忘记了,等着来人趑趄摔跤尴尬,然后再警告再忘记,周而复始,进行新一轮循环。这有点像荷兰著名现代画家莫里茨·柯内里斯·埃舍尔的“智力图象”,把时间和空间拆解成数字和图象,并组成了一个眼花缭乱的多维空间,任何一个纬度都可以阐释认识与历史的一个等式:“起点——终点——起点”。艾略特在她的诗中写到:“我们将不停地探索/而我们所有探索的终点/将是到达我们出发的地方。”

历史便是这样一幕幕上演的。

我们看到的情景是:各色人等,同台演出。

我们看到,在同样的舞台背景下,人们匆匆忙忙,自顾不暇。

十四

转眼间又到了“两会”。一九九六年是八届人大四次会议。

各省选出的议员和政府官员、封疆大吏进京议天下之事。大家心里有数,每年一次的进京大聚会,一半心思开会,一半心思公关。人大议事,说说而已,举手而已,而已而已。大事,几个人早就捏咕好了,轮不上这些议员七嘴八舌。发点牢骚,顶多印成简报。这一段狂轰滥炸的“新闻”,根本就别看。真正的新闻,早就被“不准”掉了。

人大也有赌气的时候。头“春节”,几位重要省份的封疆大吏人事变动,颇引人注意。省长变动,自然要通过同级人大;省长是否变动,跟同级人大又没关系。这回,四川省省长萧秧的变

动便在三年前曾用了“888”票选他上马的省人大遇到了一点小麻烦。工人没工作了,叫“下岗”。四川人幽默,把领导人不担任现职,无论是哪一级领导人,无论是哪一种原因,都叫“下课”。不担任省长的萧秧,还是那么的洒脱。见面后,便拉着去四川驻京办事处地下室唱“卡拉OK”。他会唱《笑脸》,会唱《耶利亚姑娘》,会唱《三套车》、《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最后与我合唱《我的太阳》:“啊,多么辉煌,灿烂的阳光,暴风雨过去后,天空多晴朗……”

十五

沈阳人又来了北京。他们在新华社举行新闻界招待会。

沈阳市市长张荣茂致词。

这位市长是“文革”前毕业的研究生,能豪饮,喝得兴起,能把一个四两杯的沈阳美酒——三十八度“老龙口陈酿”一饮而尽!

这位市长上来就说大实话:沈阳的形势从没有像今天这么好过,工作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艰难过。我们沈阳人明白了两条道理:第一,办企业是要赚钱的;第二,借钱是要还钱的。这位市长说:沈阳是最后退出计划经济的城市。沈阳为计划经济作过巨大的贡献。有个厂长问我:“张市长呵,我们的红旗到底还能打多久?”还以“红旗”自居呢!原来以为,沈阳作过贡献,中央应该在各个方面支持沈阳,让市场经济将就沈阳。现在我们明白了,谁也靠不住!要靠我们自己!我们面临困难没有倒。我们挺身前行!

从李长春领着工人唱《国际歌》到张荣茂说“我们沈阳人明

白了”，从普通工人农民到厂长经理、市长省长，大家面临的生存处境，本质是一样的。

有些道理如此之简单，却用了如此漫长的时间、付出如此沉重的代价来领悟，不禁让人仰天长叹！

不论早晚，领悟到，就可能进步。

张荣茂大声提议：

“请大家举杯！——”

一九九六年三月六日凌晨四时于北京木樨地

声援胡自造反：观察中国

以人民的名义

湖南娄底
政治生活档案



湖南娄底市人民代表颜跃明在一九九二年市人大会上，依法向代表大会提出罢免市长案。市长没被罢掉，自己却被“监视居住”二百一十四天……

世纪末感言

我在进入一种愤怒和恐惧的写作状态。

湖南娄底市人民代表颜跃明在一九九二年市人大会上,依法向代表大会提出罢免市长案,市长没被罢掉,自己却被“监视居住”二百一十四天,还是那种整人的老套路,在市长积极参与下,公安、检察联合组成专案组,吸收社会一千人等,人大会议一结束,就非法拘禁了颜跃明。先是整经济问题,整了半天整不出来,然后整男女作风问题,牵涉无辜男女数十人,刑讯逼供,惨不忍述。此时,邓小平南巡讲话,全国大踏步改革开放,娄底却是人人自危,白色恐怖。

“颜跃明事件”涉及我国政治体制、司法体制等许多重大问题。身临其境,顿感惊悚: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颜跃明身上发生的事情,完全可能发生在我们(包括我)的身上,颜跃明的命运完全可能是我们(包括我)的命运。

——作者

序 篇

我走在宽阔的长安街上的时候,我的魂魄却还留在阴冷潮湿的湖南。我迷恋这太阳的光芒。北京大风掠过的晴天,太阳热烈而坦率,却不能把我从那愁雨绵绵的感觉中拽回来。

伫立湘江大桥上凭栏眺望,舟行缓缓,灯火明灭,江风拂来一阵阵轻轻的叹息……天地本来就狭隘,可这春天的雾雨使天地更加狭隘了。湖南人短小精悍的身体都藏到雨伞中。满街都飘动着雨伞,满街都飘动着那雨伞庇护下的捉摸不定的精灵。人们兀自在雾雨中行走,仿佛轻飘飘没有分量。

我来到湖南娄底。

出站口,一边一个人举着我的名字。我朝右边那个鹤立鸡群的英俊高个走去。“你是颜跃明吗?”我问。

他却指着左边说:“他在那儿。”

顺着指去的方向,我看不见人,他好像不存在,或者是被人流给揉碎了,只有一双精瘦、苍白的手在黑压压的人头上跳着生命的舞蹈。

我来调查“颜跃明事件”。

这起发生在洞庭湖畔,动用专政机关残酷打击迫害人民代表历时七个月的恶性事件公开曝光后,举国震动!在娄底市五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在湖南省八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在全国八届人大一次会议上,“颜跃明事件”成为人民代表们议论的焦点。人民代表们愤怒了!中央政法委书记、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建新,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田纪云,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王汉斌看到有关报告和报道后,批示湖南认真调查处

理。

一切都似乎是在法律的程序中完成的。

一九九二年十二月一日下午,处于“监视居住”状态的颜跃明,被“专案组”的人带到了冷水江市检察院。娄底地区检察分院的检察长,副检察长和“专案组”检察官向他宣布了《撤销案件决定书》:

“本院一九九二年四月二十九日受理的颜跃明的受贿案,被告人颜跃明,经立案侦查认为其不构成受贿罪。现决定撤销此案。”

一九九二年四月二十九日至十二月一日。整整二百一十四天!

在绝望中突然获得了自由的颜跃明拿着无罪撤案书,欲哭无泪。由于内心过度的激动,拿着无罪撤案书的手微微有些颤抖。

“我自由了,我自由了!我没有罪,我没有罪!”他自言自语地念叨着。他非常清醒地意识到,这是一桩全国罕见的非法拘禁人民代表案。他愤怒地指着“专案组”的一个检察官说:“你有罪!你看见他们打我,你不制止!”

颜跃明拒绝了检察官们同车从拘禁地冷水江回娄底的邀请,自己收拾好行李,上公路拦了个小拖斗车往家赶。

“自由啦——”他坐在小拖斗车上,内心不断发出这样的呼喊。

特别奇怪,总是阴天沉闷的娄底,今天却出了太阳,照耀着这个朝娄底狂奔的自由灵魂。他知道,妻子女儿正在家里盼望着他。小黑怎样了呢?这个出生才两个月颇通灵性的小猫。他离开家那天,它贴着脚跟出来,依偎着他,舍不得他走,今天还能感觉到它暖人心房的体温。眨眼的工夫,小黑快满一周岁了!

娄底市皮革厂是颜跃明早先改革起家的地方。娄底市二轻

局和他的家,都在皮革厂里。听说他今天回家,二轻局和皮革厂的职工,还有街道居民,都自动聚集到皮革厂大门口等着。一下午,左等右等不见来。傍晚时分,来了警车。大家拥上前去,一看下车的都是检察院的人,不见颜跃明的影子。

“颜跃明呢!”颜妻周吉莲急忙问。

“怎么,他还没到家?”

“没有啊。”

“他早该到了。”

周吉莲只觉得眼前一黑,昏了过去。

人群中一阵骚动。

这时,颜跃明从小拖斗车上跳下来,他双手挥舞着大声喊道:“我在这呢……”

“爸爸!——”

女儿亚亚朝他扑过去,他一把把女儿紧紧地搂在怀里,热泪夺眶而出。

人群欢呼起来。鞭炮被点燃了,一片炸响声,把这寂寥的夜晚搅得像过节一样。

真是难以想象,二百一十四天是怎么熬过来的!面对着亲人,面对着这些渴望他归来的面孔,面对着这热烈的场面,恍如隔世。他的记忆,时而清晰,时而模糊,思绪远远地飞离了人群……

第一章 “罢免市长案”震撼娄底城

娄底城里,几乎人人皆知,颜跃明一九九二年的劫难,是从当年三月份市四届人大三次会议“关于提请罢免赵伯栋市长职

务案”引发的。

“罢免市长案”是怎么回事？

事情来得太突然。主持大会的本届人大常委会按照常规思维，本以为每年一度的人大全体会议，代表们吃几天好伙食，举举手，走走过场，大会就胜利结束了。可这回的气氛却有些异常，大家好像听到了点什么风声，都在等待着一个激动人心的事情到来。

一九九二年三月三十日上午八点整，代表颜跃明带着一份“罢免市长案”和有关材料来到会议议案组。

这个“罢免市长案”上有包括颜本人在内的二十三名代表签名，构成了法定的提案签名人数。

颜跃明问议案组组长戴耕陶：“罢免市长案需要什么程序？我这个提案交给你，算不算合法程序？”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小戴的声音有些发抖，“娄底从来没有搞过罢免案，要找文件来看。”

罢免市长，的确是娄底人民政治生活中破天荒的事情。谁都知道美国、巴西可以弹劾总统，日本可以罢免首相，可那都是资本主义民主，跟我们的社会主义民主毫不相干。市长都是组织上定的，举手选上后，那一定是铜浇铁铸的交椅，永远是“人民的公仆”。你颜跃明虽说是人民代表，但毕竟是市长属下的二轻局长，毕竟是市长治下的子民，竟敢斗胆罢市长的官，摘市长的乌纱帽！真可谓“犯上作乱”。别说小戴肝颤，整个会议都沸沸扬扬炸了锅。“要马上报告秘书长。”小戴明白，此举事关重大。

颜把提案交给了大会秘书长刘庆龙，并继续问道：“这不符合法律程序？”

刘庆龙明确回答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代表大会地方组织法》规定，符合法律程序。具体怎么搞法，要请示主席团。”

其实,主席团只是个幌子,提不提交大会审议,真正的决定权不在那里。

市委副书记尹平马上找颜跃明谈话:“罢免案最好别提了。有什么意见,最好找赵伯栋同志本人交换一下。如果有必要,我去把赵伯栋同志找来谈谈。”

可罢免案明明白白地写着,本届人大一次会议选出的市长赵伯栋,“政治思想、文化素质、组织协调能力离一个市长的要求相距甚远”,根本就不是谈心交换意见的事儿。

颜向尹平历数市长就任两年来的种种品行和失误,包括市长压制和打击报复改革者,说到伤心处,他失声痛哭。“我不要党籍,不要一切,也要行使人民代表的权利。赵伯栋如果再当市长,还会给娄底带来灾难!你们要救救娄底人民啊!”

我看到了一份附于“罢免案”后的“关于请求依法罢免赵伯栋市长职务的有关材料”,历数了赵伯栋在担任副市长、市长四年期间的问题:一、不懂经济,独断专行,强行将湘中无线电厂、市无线电厂、家用电器厂和市机械厂四个亏损的风马牛不相及的厂合并;擅作主张,将有质量问题的澳大利亚的卡乐生产线拆装到彩色水泥厂,结果在索赔案中败诉;直接插手企业事务,安排亲信,致使外商不满,延期投资……这给娄底本来就十分薄弱的经济雪上加霜,损失严重。二、欺上瞒下,弄虚作假。娄底仅有二十多家市属企业,一九九零年工交企业实亏一百四十三万元,却虚报盈利二十万元。一九九一年,报表反映市属企业实现利润一百一十点七万元,实际上整个工业企业亏损惊人。三、人事安排,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一方面安排同乡好友担任重要职务,一方面打击报复,排除异己。市委委员、市经委副主任严觉飞曾给赵伯栋提意见,结果长期闲置,并于一九九一年下半年找严谈话,说:“我提得你起,搞得你下,整得你死,”材料还列举了“包庇犯罪分子,刁难政法机关”、“利用职权,谋取私利”等方面

的问题。

在本次人大会议上担任联络员的地区行署常务副专员龙德发直言不讳地告诉我：“颜跃明‘罢免市长案’不是没有道理。我早就向地委提出过赵伯栋不适合当市长。我给他总结了四条：理论浅、文化低、胸怀窄、胆子大。当着赵伯栋我也是这样讲。如果从爱护干部的角度出发，应该尽快采取组织措施，调离市长岗位。”

颜跃明倾吐肺腑，令尹平神色为之黯然。很多情况他何尝不知何尝不晓？可他这种角色能怎么样呢？尹平沉默片刻，说：“颜跃明同志，如果你认为罢免赵伯栋是对的，不提出罢免案心里不舒服，我也不勉强你。你就按自己的意志行使权利吧。”

中午，颜跃明回到家，想踏踏实实睡个午觉，可刚躺下不一会儿，便被叫醒了：“地委市委领导要你马上去招待所。”

颜跃明被带到市委招待所二楼的一间房子里。

这里有一个强大的阵容在等着他。地委彭秘书长，市委副书记张经发，市委组织部长李亭玉……大家的脸色都不好看，紧张、严肃。空气凝固。

张经发首先说：“颜跃明同志，现在我代表市委正式跟你谈话。你看你看，你又闯祸了，又提什么罢免市长案，把地委领导都惊动了。你是个共产党员，又是党组书记，你必须无条件与市委保持一致。如果你执迷不悟，后果你自己负责。”

李亭玉说：“你的罢免案就是不撤销，也搞不成了。有几个代表经组织教育，现在已经退出了。”

什么叫“组织教育”？

组织部门的意思是，“罢免市长案”将会以签名法定人数不够而无效。

颜跃明听罢按捺不住，大声说道：“罢免市长案是我发起的，材料事实由我负责。材料的真假，地委为什么不查一查？如果

是假的,完全可以说我颜跃明诬告呀!至于几个代表退出,可以告诉我这个发起人,他们是哪几个。请问,我可以和他们见个面,问为什么退出吗?可以肯定地说,如果不是你们的压力强迫,他们是不会退出的。第二,我作为发起人,将提案交给了大会秘书长和议案组,如果有代表退出,应由大会秘书长通知我,而不是你组织部长通知我!”

谈话期间,颜要上厕所,组织部长也跟着上厕所。有意思的是,组织部长不是在厕所外面等,而是一块跟进厕所,站在颜的背后,等颜解完小便再一块出来。

颜提出要下楼买包烟,组织部长拽住他的衣服说:“你不要去,我这里有烟。”

在屋里谈话时,组织部长就搬个折叠椅堵在门口,不准颜随便出去。

颜向在场的地委和行署领导抗议说:“上厕所李部长也跟着去,烟也不让买,这是在人大会议期间非法限制我的人身自由!”他愤怒地冲着组织部长说,“你这么搞是非法的!”组织部长也理直气壮:“这样做是为了你好,为了你不犯错误!”

大家僵持在那里,忘记了时间。组织部长一看表,大松了一口气说:“好了,时间到了。你可以回去了。”

颜跃明也看表,正是五点半。这是大会提案正案的最后截止时间!他被隔离之后,失去了补充签名的机会!

“卑鄙!简直是目无法纪!”他在心里狠狠地骂道。

为了阻挡颜跃明等“罢免市长案”生效,地市两级领导可谓如临大敌,费尽心机。

更精彩的交锋是四月二日,市四届人大三次会议闭幕那天。

地区人大工作联络委员会主任,办公室主任,本届会议秘书长、议案组长,一起找颜跃明谈话,实际上是害怕颜在会上发言,把颜与会场隔离开。

这时,在三楼的一间屋子里,颜跃明正与他们进行着一场激烈的唇枪舌战。

争论的焦点是罢免案是否合法、是否成立。

“你的罢免案不能成立。”

“为什么?”

“不合法律程序。有几个签名代表退出。”

“那要看是怎么退出的。”

颜跃明拿出两张字条,给在座的人展示。一张是教师刘淑涛写的。刘淑涛写道:“我原来的签字继续有效。”

另外一张条子则写道:“我退出是被迫的,是张书记、李部长强迫我退的。”

“难道这是合法的吗?”颜问。

大家哑然无声。

“我要向刘秘书长和戴组长提三个问题。”颜跃明一字一句地说,“第一,我的提案是不是交给你们的?”

“是的。”

“第二,我把提案交给你们时,问过提案是否符合法律程序,你们答复说,符合法律程序。是吗?”

“是的”。

“第三,退出提案的代表,是不是应该从议案组或秘书处退出来?退出声明是不是你们收到的?”

屋里人们不作声。

“请你们用党性和人格答复一下,是不是?”颜紧追不舍。

“我们没有收到声明。所有退出代表也没有从议案组退出。”戴组长说。

“退出代表的名单,是市委组织部李部长转来的。”刘秘书长说。

也就是说,有人采取了非组织非程序的措施。

“提问完毕。”颜跃明喘了口气,然后侃侃而谈:“我提出的三个问题,第一第二你们回答说是的,第三你们回答不是的,那么所有参加罢免案签字的代表名单,我依照法律程序交给了大会秘书长和议案组,你们均没有提出异议,签名者应该到秘书长和议案组退出才是合法的。由市委组织部李部长转交的退出代表名单,不符合法律程序,所以是非法的。其次,我作为人大代表,是根据法律规定行使权利,在会议期间的活动理应受到法律保护。但三十日我提出议案,下午我的行动就受到限制,到五点半提案截止期到后才放我出来。对我都那么搞,对其他代表更可以想象。现在大会马上就要散会了,可是我连提问的权利都没有。第三,人大会议期间,我的家受到了非法监视,我的电话被窃听,我出去有便衣跟踪,这些完全是违法的!赵伯栋市长心胸狭窄,罢免案后,肯定要对我我和我的家庭实行打击报复。在这里,我正式请求人大维护我的合法权益,保护我的人身安全。”

“不会吧。”

“如果打击报复,我找谁?”

“找人大。”

“如果赵伯栋市长在光天化日下打击报复,我愿意用我的生命来维护人民代表的合法权益!”

这时,二楼的闭幕式散会,三楼这几个人长舒一口气也跟着散会了。

颜跃明从屋里走了出来,一脸的苦笑和无可奈何。他不明白,为什么人民代表依照法律程序行使权利时,会有一种更强大的力量,藐视法律,超越法律程序,凌驾于人民代表大会这一宪法规定的最高权力机构之上,并随意把玩之?当人大主任,在权力结构上,往往被视作退居二线,所谓“退人大”就是这个意思。更让人不能理解的是,谁赋予了书记和组织部长这种权力,可以随便在人大会上找代表谈话,逼代表作出这样或那样的选择?

书记和组织部长的权力基础何在？

娄底市四届人大三次会议的“罢免市长案”流产了。

对于不知内情的代表来说，“罢免市长案”流产有些不明不白，会议的关键时刻，颜跃明竟不翼而飞，无影无踪，大会主席团也没有任何解释，就宣布大会“胜利闭幕”。

代表们交头接耳，散去脚步有些迟疑，不时地回头探望主席团，不时地在人群中寻找那个大眼睛、小个子、活力无穷的“罢免市长案”的领头人，他们还幻想着出现奇迹。

“罢免市长案”的流产，应该是意料之中的事，因为这在娄底的政治生活中已不是第一次。一九九一年市四届人大二次会议时，颜跃明曾邀约几位代表发起“罢免常务副市长梁杖伦案”，但是在地委市委的强有力干预下流产了。而一九九二年的“罢免市长案”无论是开始还是结局，都是一九九一年“罢免常务副市长案”的翻版。

两次罢免案，书记们向颜跃明发出了这样的警告：

“你是党员，要有党性，要与党保持一致。如果不与党保持一致，继续提出罢免案，你要受到党纪处分，一切后果你自己负责。”

颜跃明不明白，在罢免案这一点上，怎么“与党保持一致”呢？党说不准提罢免案？党说市长即使不称职，也要领导娄底全市三十二万人民在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精神的鼓舞下搞改革开放？

颜跃明不明白，这些和人大会议毫不相干的党政干部，怎么能在人大会议上发号施令指手划脚呢？怎么能毫无顾忌地践踏民意呢？

颜跃明说：“我是党员，我也是人民代表，既要讲党性，更要讲人民性。人民代表，就是要为人民鼓与呼。为人民服务也是党的宗旨。党性是人民性的高度体现，没有人民性，何谈党性！

党章规定,党的各级组织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到底是宪法、党章大,还是你们市委、地委大?”

有人散布说,颜跃明要搞乱大会。

作为联络员,行署常务副专员龙德发则向地委汇报说:颜提出罢免案是正常的,搞乱大会的不是颜跃明,而是赵伯栋。

午夜时分,赵伯栋给龙德发打电话造谣说:颜跃明身上带着刀,要杀人!

又是午夜时分,又是赵的电话:龙专员,颜跃明要跳楼自杀!

龙德发冲着话筒严肃地批评道:“伯栋同志,你不要制造紧张空气!”

龙德发对娄底的政治动态有着清醒的认识。他认为:“罢免市长案”完全是被赵伯栋市长本人和市委书记逼出来的。他对我说:“颜跃明在1992年初,提出愿意辞去市二轻局局长兼党组书记职务,回到严重亏损、他原来曾任过厂长的皮革厂当厂长,如果干不好,可以就地免职。他给地、市都打了报告。我接到报告后认为,应该支持颜跃明的想法。但是一些人态度暧昧。赵伯栋和黄懿斌书记甚至说:这是颜跃明耍花招。一直拖着不理。”

看来,民主与独断专行是一对孪生兄弟,如果不是迫不得已,如果不是被逼上了绝路,谁都不会轻易来敲“民主”这扇大门。因为“民主”的代价太昂贵了。

叫谁都不能理解,在一个官本位的评价体系里,不愿当官,去下属的一个只有三百多人的国营亏损小厂当厂长,竟会被上级领导认为是“耍花招”、“捞政治资本”,他立下了“一年改变落后面貌,二年实现产值、利税翻一番,三年评为省先进企业,如不能实现,不回机关,甘愿接受组织处分”的军令状。就这么点稀松平常的事儿,左一个报告不批,右一个报告不批,找经委找市长找市委书记找行署专员,上上下下找了个遍,都没有个结果。

光是市长市委书记就找了一二十趟！仿佛弃官当亏损企业厂长，有天大的好处。

市委黄书记甚至诘问道：“你为什么偏要去皮革厂？”

这种怀疑的语气，令颜跃明心酸。

关于弃官下放的动机，颜跃明给我讲了个故事。

一九九二年春节前，娄底市皮革厂濒临倒闭，工人靠上街卖皮鞋发工资。颜是皮革厂的老人，市二轻局机关和颜的家都住在皮革厂院内，皮革厂的现状他了如指掌。虽然他是主管局长，却无能为力。某种程度上说，还是他颜跃明连累了皮革厂。上面领导对他不满，认为皮革厂是他捞政治资本的大本营，所以，技术改造，不准；承包经营，不准；申请中外合资，不准。凡是沾了他的气味都不准，生生要置皮革厂于死地。

一天下午，下着雨，颜跃明坐车回家，看见皮革厂副厂长彭国光、办公室主任肖福元、车间主任郭顺秀在厂门口摆地摊，卖皮鞋。雨大，卖的皮鞋浇湿了，人也浇湿了。

“怎么不收摊子？鞋都湿了。”颜跃明问。

“局长……”

“局长……”

大家都围上来诉苦。

郭顺秀哭着说：“局长，救救我们吧！不能不要我们呀！”

颜跃明也哭了，雨水、泪水一块顺着脸往下流。

这天晚上停电。颜跃明在烛光下对妻子说：

“周吉莲，我有个想法，想跟你商量一下。”一阵风把烛火晃了一下，火光在他的脸上闪烁不定。

“什么事？”

颜跃明没有把想法从正面提出来，他先反问妻子：

“皮革厂工人对我们好不好？”

“好。”妻子用很迷惑的眼神瞧着他。

“我的荣誉,是不是皮革厂给的?”

颜本人一九七八年就调到娄底皮革厂,一九八三年由一名大集体工自荐承包了这家近二百名职工的全民所有制企业,在湖南引起了很大轰动。这之后,他任皮革厂厂长,先后被省、市命名为“改革勇士”,被团中央命名为“全国新长征突击手”、“全国优秀青年厂长经理”。他认为,这与全厂职工的努力休戚相关。谁还有周吉莲了解他的成长经历呢?

她回答说:“是。”

“皮革厂几年严重亏损,他们在厂门口卖积压皮鞋,你看见没有?”

“看见了。”

“皮革厂有困难,工人没工资,要不要拉他们一把?”

“当然要。”

“如果我在皮革厂干,能不能把皮革厂搞活?”

“凭你的能力,完全可能。”

妻子今天完全被搞懵了。她问:“你到底要说什么?”

“周吉莲,我有个重要决定……我要回皮革厂当厂长……”

“怎么,你去当厂长?!”妻子不待他说完,便抢过话头,一面哭一面数落着他,“十年了,风风雨雨,我理解你。当厂长当局长,没有一天安稳的日子,跟着你担惊受怕。现在你又要回到十年前,还要冒那么大的风险,我和你熬了十几年,再也熬不下去了。你要是回去当厂长,我和你离婚。你自己过,我和亚亚过。”

这番话,使他发火了。大嗓门把睡梦中的邻居都震醒了。

“凭良心说,我的乌纱帽都是皮革厂工人的血汗换来的。我不能对不起工人。当这个局长,闲着没事干,赵伯栋不仅不支持我,反而处处刁难我,打击我,再当下去有什么意思!”亚亚也醒了。她哭着说:“爸爸妈妈别吵了。”她一只手搂着爸爸,一只手搂着妈妈,一家三口哭作一团。

.....

所以,黄书记的责问,简直可以说是一种对他人格的污辱。

颜跃明就这样被防范,被歧视,被误解,被逼上了梁山。他曾当面对市长说:你不为娄底人民做好事,娄底人民就会罢免你!

市长的神态却是:我等着呢!

“罢免市长案”便在所难免了。他便以人民的名义、以宪法和法律赋予人民代表的民主权利,在法律的程序内,在民主的程序内,向娄底市强大的权势集团提出了挑战。

这是一场堂·吉珂德式的挑战。

当市四届人大三次会议沉重的帷幕拉上时,厄运便在颜跃明的头上和娄底的头上降临了。

第二章 专案组又回来了

“罢免市长案”的流产经过,给我们演示了娄底市的一幅政治图景:在民主的程序外,还存在着一个更强有力的程序;在民主的逻辑外,还存在着一个更强有力的逻辑。在这种较量中,民主的程序和逻辑,显得那么脆弱和不堪一击。

颜跃明不过是在中国的软肋处轻轻地捅了一下,便引起了轩然大波。娄底市民被惊呆了,娄底市人民代表在整个过程中感到茫然失措。如果说人大在强大的外力干预下显得无能为力、爱莫能助,那么,代表们则缺乏应有的基本训练来有效地行使和捍卫自己的权利。也可能许多人民代表根本没有意识到他们有这种权利,他们不仅可以选举地方最高行政长官,同时还可以罢免地方最高行政长官。一些代表原以为,他们能当代表是

组织的关怀,是组织的恩赐,他们只有按照别人的意志举手的权利,没有根据选民的意志或者自己的判断选择的权利。选择的权利天经地义属于组织部,属于党委书记。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当他们正在对眼前发生的一切充满陌生感时,另外一套系统已经开始启动了,并且高效率地工作着,严密注视和把握着事态的发展。

在市人大开会期间,人大代表、市总工会副主席李建军,涟滨乡副乡长曾光明,以及原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颜日衡,晚上十一点从颜跃明家出来,发现他们乘坐的北京吉普被一辆面包车“盯”上了。

吉普车开到地委,面包车就追到地委,在城里转了三圈都甩不掉。后来司机灵机一动,在市百货商场一拐弯,便把所有的灯都熄灭了,仗着道路熟悉,慢慢走,先开到市第一中学,又开到市保险公司,“尾巴”才被甩掉!前后整甩了一个小时!那情景,与解放前白区地下党的遭遇何其相似!

李建军说,那天幸好没有月亮,天漆黑,要不然根本甩不掉。

市公安局办公室主任曾文胜也有过这样的遭遇。一天晚上,他从颜家一出来,就被一辆汽车跟踪了。甩了半天甩不掉,干脆掉转车头,迎面开上去,走拢一看车牌,是公安局自家人。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

曾文胜大小是公安局的领导,他把警车上的干警呵叱下来,一看,都认识。他怒问:“你们想干什么?”

“曾主任,你别生气。我们也是奉命行事。”

奉谁的命,大家心照不宣。

小警察赔完罪,上车一阵风地溜了。

与白色恐怖下搞地下斗争不同的是,在这里监视不需要技巧,不需要神不知鬼不觉,而是明目张胆,生怕被监视人不知道。所以,与其说是一种监视,毋宁说是一种威慑和警告。

与颜跃明有关系的人,都被纳入了监视的范围。这些人,准确地说是一批人的一举一动,上面都了如指掌。

一九九二年十月初,在娄底市的希望大厦四楼演了这么一出戏。赵伯栋市长调任地区公安处长,刚举行完告别宴会,晚九点,微醺的赵市长来到大厦看望《湖南日报》副总编李钧和湖南电台的高级记者郑余谋、彭叶青。恰好,娄底市电台的新闻部主任金明正在场。

赵市长趁着酒劲,劈头盖脸地训斥金明正:“你在人大会议期间的一举一动我都很清楚,你在会上的态度和表情我都很清楚。你还记得不,你当时坐在会场的倒数第二排第三个位置?”

金明正的脑袋都听炸了!赵市长的情报真精确!当初他是做为特邀记者参加市四届人大三次会议的。赵市长不仅知道他坐的位置,甚至知道旁边坐的是谁。

金明正说:“赵市长,在会议期间,我是光明磊落的。代表提出罢免案,那也是按法律办事。”

回家出门时,赵市长又赤裸裸地说:“你金明正是个人才,在我心目中印象很深。你不要搞我,你路子走错了,你要翻过我的手背是不可能的。你不要以为我调出娄底市了,我还会回来的。我可以告诉你,我现在有几十个人!”

赵市长酒后吐真言,车轱辘话里带着明白无误的威胁和恐吓。

金明正也非常严肃地回敬了他。

金明正把一个新闻工作者的良知和勇气做到了极限。

市四届人大三次会议“罢免市长案”提出后,金明正的家即受到严密监视。有天晚上,颜跃明和几位代表到他家,外边就有小车跟踪。

从此,金明正不敢骑车上下班,预防可能发生的那种不明不白的“车祸”。晚上出去,要换上深色衣服。这真有点耸人听闻。

可更耸人听闻的事情还在后头呢！

就在四届三次会议结束后的第2天，市公安局竟成立了矛头直指颜的“三·一八匿名信专案组”。

“三·一八”匿名信是怎么回事？

三月十八日，市长赵伯栋和市张氏美容器材厂厂长陈铁元分别收到了匿名恐吓信。这简直是送上门来的好由头。于是，赵伯栋和市公安局把颜视为最大的嫌疑。然而围绕颜查了半天，都不能认定。

专案组在匿名信查无所获的情况下，迅速转向调查颜跃明的经济问题。后来，就出现了很奇怪的现象。匿名信专案组不调查匿名信，传来的证人都是有关经济问题的。细心的证人都注意到，他们所收到的传票，有着“三·一八匿名信专案组”的字迹。这虽然名不符实，但是工作目标非常清楚：一定要找出颜的问题，挖地三尺也要找出颜的问题！专案组一位负责人说：“颜跃明搅乱人大会议，市政府指示，主要打击颜跃明。”

后来，经济问题也没有多大油水，又双管齐下查流氓和男女作风问题。对某些长官来说，想整人的话，揪经济问题、作风问题是个老章法。

由匿名信而经济问题而作风问题，似乎遵奉着一种想找茬必定有茬的逻辑，但所有办案人员都很清楚，市长交办的这个案子的指向是“政治”。在有的部门文件中甚至明确说，这“是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

我在娄底时，和管常务的副市长杨沛林等几个人到市委、市政府“迎宾馆”对面的一家名叫“大世界”的餐馆“宵夜”，等菜时，杨沛林撕了一片纸，写了一个一九九二年在娄底盛传的民谣：

“拔掉一根毛，扯烂两部臀，挂起两只羊，杀掉六只鸭，整整李和黄。”

初看这民谣，有些丈二和尚不得要领。

他们告诉我,这是从专案组内部传出来的,“毛”、“曾”、“羊”、“李和黄”,都是娄底的一批中层干部的代号。毛者,西阳乡党委书记毛国江也。曾者,曾也——市物资局副局长曾巨龙,市公安局办公室主任曾文胜。羊者,杨也——市商业局局长兼党组书记杨仲刚,市组织部副部长、现副市长杨沛林。鸭者,颜也。湖南方言,“鸭”、“颜”同音——市检察院检察长颜维和,市委宣传部分部长颜日衡,市民政局局长颜子雄,市商业局副局长颜介其,市经委副主任颜平华,还有颜跃明。“李和黄”是市乡镇企业局副局长黄文瑞和市总工会副主席李建军。

这个民谣,无疑就是一个整人的黑名单!

其实要整的还不止这些人,从市委常委到市人大到各乡主要领导干部,都想换上清一色的自己人。有的方案已经实施,全套或者说更彻底的方案,由于政治形势发生了逆转,才没能出笼。颜跃明只不过是这批人当中最显眼、最有声望、最有代表性、最敢说话也是最难收拾的人。也难怪赵市长重视,要亲自干预和督办“颜跃明案”了。

虽然赵市长和专案组一再声明,调查颜并对颜实行“强制措施”与“市长罢免案”无关,可在办案期间,时时处处都没忘了罢免案,时时处处都能感觉到赵市长的存在。

颜跃明在关押期间的一九九二年七月十六日深夜至十七日凌晨,市政府司机朱永卫(是赵市长的专车司机,专门配有“大哥大”电话)和市公安局三名专案人员,在冷水江市公安局六楼刑事技术室,强迫颜跪下,用手铐将颜的双手一上一下反铐在背上,声称“罢免案是犯罪的”,要颜“交待人大罢免案内幕,揭发罢免案的幕后人”。十七日上午,朱永卫对颜说,他正式代表市委、市政府和颜谈话,要颜揭发市人大主任肖国华和副主任刘积葵。颜一楞,一个小车司机怎么有权代表市委、市政府呢?谁给他授权,以至他敢这样明目张胆地审讯被告?

“市长罢免案”、“三·一八匿名信案”，市长赵伯栋都是当事人，本应在调查中回避。可是，专案组副组长、市公安局局长李柏林告诉我，他不仅不回避，反而亲自指挥了专案组对颜案侦查审理的全过程，亲自参加了颜案审理的所有重要会议，亲自拉着李柏林午夜时分查看颜的转移关押现场（一间坐落于市郊的市武装部炸药包库），亲自找“证人”谈话，要求“证人”积极与组织合作、与专案组合作，勇于揭发检举颜的“犯罪”事实，为颜的“受贿”和“流氓”的“罪行”作证。据不完全统计，市长在颜被“监视居住”后，曾先后十一次把“证人”找到家里和办公室谈话。总之，检察机关、公安机关、市长联合办案，可谓是名副其实。

一九九二年十二月二日下午，也就是颜跃明获得自由后的第二天，市皮革厂厂长谢跃中把颜拉到自己办公室。

谢跃中把门关好，“扑通”就给颜跪下了，一面哭着一面打自己的嘴巴。

“颜局长，我对不起你，是我害了你。”

颜跃明把谢跃中从地下拉起来。说：“跃中，不要这样，有什么话，好好说。”

原来，五月份，赵伯栋把谢跃中叫到家里，劈头盖脸就是一顿训斥。

“颜跃明贪污几十万元，是娄底市一桩大案。你与颜跃明配合杀过人，与颜跃明同谋！”

“我没有杀过人！”谢一楞，大惑不解地辩护说。

谢跃中知道，市长指的是数年前皮革厂一个女工患精神病自杀身亡的事。当时有人捏造了一份所谓该女工的“遗书”，指控颜跃明。此事已经公、检、法联合调查组证实，“遗书”系伪造。赵市长为什么又重提已有结论的旧事呢？

“你好好回忆一下。”赵伯栋说。

之后，赵伯栋又在“迎宾馆”与谢跃中谈话。诱导说，颜跃明

在皮革厂贪污,要谢出来证实。

谢跃中说:“贪污的话,财务的账现在不好做。”

“你要好好配合政府,配合专案组。”

赵伯栋又进一步逼问,要谢承认他妻子曾被颜跃明强奸。

一件事比一件事大,一件事比一件事耸人听闻。谢跃中平时是个不多言语、老实巴交的人,都快被逼疯了。

“你爱人名节事小,政府名节事大。”赵伯栋开导他。

在专案组的压力下,谢为专案组作了伪证。于是便有了刚才的一幕。

分析专案组的内部结构,也是件非常有趣的事情。

一到娄底,就有人给了我一份还不算很完全的专案组名单。他们从地、市所属十六个机关单位、工矿企业抽调了办案看守人员五十余人,其中包括公安、检察官、干部、工人、待业青年。

我逐一核对了专案组成员的背景,结果触目惊心。要么是父子,要么是兄弟,要么是老乡,要么是亲戚,要么是亲信。从名单来看,不仅是公安、检察、市长联合办案,更是父子、兄弟、老乡、亲戚、亲信联合办案。市检察院检察长颜维和说,专案组的人员都是经过精心选拔的,有着明显的地域色彩,大多数人都是市长家乡邵东县或邵东附近的人。看来这是市长的一大特点,从干部调整选拔到专案组人员,“老乡”比“五湖四海”可靠。

“专案组”,在人们的历史记忆中,是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名称。在十年浩劫中,各级的“专案组”握有至高无上的生杀大权,一个取代法制、摧毁法制的公开或秘密的调查组织。这些“专案组”曾经按照上面某个人和某级组织的意图,制造了多少遗患至今的冤假错案,使多少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为了避免悲剧不再发生,“文革”后,中央曾三令五申,禁止组织“专案组”,强调公安、检察、法院各自独立地行使司法职能,并形成相互制约监督的关系。

娄底似乎是与中国改革进程毫不相干的一块飞地，一个独特的政治单元，一个国中之国。这里有这里的规矩。所以，当市长需要一个更有权威、更有效率、更能按自己意志行事的办案组织时，“专案组”便应运而生了。

这是一个财源茂盛经费充足的专案组，他们在市区最好的宾馆包租了数间带空调的客房，配备了“大哥大”电话，机动车若干。

娄底人惊呼：专案组又回来了！

任何一个有历史经验的人，都非常清楚“专案组”将意味着什么！

第三章 颜跃明蒙难

没有比这样的诱捕更有魅力更有把握的了。

一九九二年四月二十九日，午夜十一点后，电话铃突然响了。

“颜跃明同志，在家里呀？”

一听口音，颜跃明便知是市委书记黄懿斌。这么晚了，打电话干什么呢？莫非有什么急事？市四届人大三次会议结束后，到处都传来不好的消息。颜去长沙告状，就听说他们派了人追踪；四月二十二日，就有专案组的人冲进原团市委书记、乐坪办事处书记李春明的家搜查。问李：“颜跃明来过没有？”想到这儿，颜跃明有点紧张。可是，黄书记的口气十分和蔼可亲，而且是他从未听见过的和蔼可亲。年初的时候，他向黄书记提交辞职报告，黄书记不准他回皮革厂；颜又提出可以把他派到娄底最贫困的乡去，还可以把老婆一块带去，三年干不好就地免职，黄

书记不同意；他要求留职停薪，黄书记说，从未有过这样的规矩。被逼无奈，他在给市委、市政府的最后一份报告中说，如果请求在十五天之内得不到明确答复，可视为同意，默许。在他的观念中，二轻局长可以任免下属厂长，如今他要挂冠下放，到下属厂当厂长，应当是个简单的事情。黄书记大怒，认为这是要挟组织，要给他纪律处分。所以，这种和蔼可亲绝对是个好兆头。

“哦，黄书记。我是颜跃明。”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黄书记提高了嗓门说，“你去皮革厂改革的要求批准了。你还有什么要求，什么困难，需要市委帮助解决，今晚准备一下，明天上午到我办公室来，我找你谈话。你还需要什么人参加？”

颜跃明做梦都不曾想到，市委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黄书记前后判若两人。

颜跃明听到这个消息当然高兴，也没去细琢磨。他提出：

“请市委副书记尹平同志和组织部长参加行吗？”

“可以。我明天通知他们参加。你千万要来呀。”

“我当然要去，可是路上不安全。”

“怎么不安全呀？”

“赵伯栋要抓我。我明天去，你派车接我一下。”

“不会吧？那好，明天我的司机接你。”

“谢谢。”

这消息让颜跃明欢欣鼓舞。

“终于批准啦！我有活干了！”

今晚黄书记的一番话仿佛是冥冥中飘来的上帝的福音，让这漆黑无尽的黑夜豁然开朗，光芒万丈。

颜跃明平时就是喜怒哀乐形之于色。他冲妻子大声嚷嚷着，然后跑到阳台上，舒展腰腿。他想冲着满天星的夜空大声叫喊，让塞满胸膛的郁闷宣泄出来，让这无声无息的世界从睡梦中

醒来,一起分享他如愿以偿的快乐。

然而,此时的颜跃明还不知道,一个欲置他于死地的计划正紧锣密鼓地进行着。一张巨大的网已朝他张开,网口在一步步收拢,逼近。

四月十六日,芙蓉饭店承包经理陈华德被传讯,专案组说陈私藏枪支、警棍,这种罪名够判3年以上徒刑。之后,紧追颜跃明帮助陈之妻兄调动工作的事情,逼陈交待向颜行贿。判刑三年或者不让出去,饭店怎么办?贷款二十万元办的新厂怎么办?专案组说,这事儿“提起来千斤,放下去四两”!(注:这是专案组最常用的语言之一。)他们真能干得出来!“把你舅子从江西调来,不给钱行吗?”“你办厂,颜跃明帮忙跑,不给钱行吗?”陈被逼无奈,只好在被拘留第四天时,编了一个只有他与颜两个人在场、他送给颜一千八百元钱的故事。为什么这么编呢?陈说:“只有两个人,颜完全可以不承认。”

四月十八日,凌晨二时许,市二轻局政工股长熊才贤和妻子,被一阵猛烈的踢门声惊醒。

熊起来开门,两个便衣闯了进来。其中一人说:“到公安局去一趟。”

传唤单上写着“三·一八”案。当晚,他们夫妻都被便衣带走。然而,整个讯问与“三·一八这案”毫无关系。“娄底政治斗争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你是军转干部,又搞政工,要站在组织一边,不要站在某个人一边。你知道吗?”“你要老实点,你与颜跃明不是一般关系,别人说你是颜跃明的死党。”“颜跃明是个坏家伙,人代会、交易会都捣乱。”接着又追问颜跃明家彩电和冰箱的来历。

四月十八日上午,私人企业主、市金属塑料制品厂厂长周吉贤以“贪污罪”被地区检察分院重新立案(注:周本人被关押二百三十天,该案于一九九二年十二月九日因缺乏证据而撤销),专

案组十几个人五天五夜轮班审讯,不准睡觉,不准坐,不准抽烟,说是有人揭发周贪污巨款,向颜跃明行贿三万元。搞得该厂停工停产,一年损失了一百多万。

.....

颜跃明在阳台上正陶醉的时候,忽然发现,路灯下停着好几部车,十几个穿制服的公安人员在马路边来回走动,手里拿着对讲机。他大吃一惊,又赶紧跑到厨房,发现围墙外面也有人。

他猛地醒悟到,他家所在的市皮革厂被包围了。

他的第一个意识就是打电话给黄书记报告情况:

“黄书记,我家被包围了!赵伯栋要抓我!”

黄书记的语调依然是那么和蔼可亲,安抚他说:“没有这么回事嘛,公安机关可能在办别的案子。在家里好好睡觉,不要怕,啊……”

这时候,颜跃明还蒙在鼓里,以为黄书记不知情。他被抓后,曾和专案组的人抗争:“你们抓我没有道理!黄书记都支持我改革。”

公安局刑警队长唐铁军嘲讽他说:“颜跃明,你也太天真了!我问你,是不是黄书记打的电话让你当厂长?”

“是啊。”

“告诉你吧,我们前线指挥部就设在黄书记家里,是黄书记、赵市长亲自指挥的。黄书记打电话时,我也在场。”

手段竟如此之卑鄙!颜跃明感到愤慨而悲哀!

二十九日晚饭后,地区检察分院三楼会议室的灯大亮着。这里正在开着地区检察分院检察委员会全体会议。市委书记黄懿斌、市长赵伯栋、公安局长李柏林、副局长邹洽岭等列席会议。会议由地区检察分院检察长张禄主持。议题为是否对颜跃明实行立案侦查。这个问题已讨论多次,大家意见很不统一。

就在四月二十九日的前四天,在有地区检察分院、市长、书

记、市公安局长等人参加的一次会议上,地区检察分院副检察长刘松平重申了他以往的意见,不同意立案,理由是:证据不足,数额不大。如果以流氓罪立案,那应由市公安局立案。

市公安局长兼党组书记李柏林也认为不能立案。理由是:颜主要是经济问题,而且经济问题也定不死,数额也不大;流氓罪也只是一方面的供述,不能确认。

赵伯栋市长说,这是党委交办的案子。公安局要立案。对颜跃明要采取措施,可以先收审进来。颜跃明的问题很大,采取措施后再审。

在检察院和公安局都不同意立案的情况下,书记下令:由公安局打立案报告,批准立案后,立即对颜跃明采取措施。

然而,公安局顶着没办。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一种力量运作通了更高一层的权力,避开了阻力和僵持,把颜跃明的立案讨论程序提高了一个层次,一个可以完全控制和把握的层次。于是,便有了四月二十九日的连夜开会。这次会上有人认为,不立案不利于办案,而且说颜要逃跑要自杀,只有把颜隔离起来,才能把受贿案和流氓案查清楚。

最后,检察长张禄归纳说,同意立案,但要请示地委。

张禄让与会者休息片刻,自己下楼打电话请示。一会,他上楼告诉大家,地委领导不在家,他打电话找到了正在涟源市砂坪煤矿视察工作的专员丛树英。丛专员同意立案。

当夜,立案手续、传唤证、搜查证就全办好了。

午夜时分,书记、市长、专案组主要负责人和主要骨干,把地检院的会场移到了黄书记家,商量着如何稳住颜跃明。于是便有了前面所叙述的那一幕,一面派重兵包围颜住所,一面由黄书记打个和蔼可亲的电话。等于是给颜上了个双保险。

在专案组看来,在黄书记和赵市长看来,由地检院提出立

案,到丛专员批准立案,他们算是走完了把颜跃明抓起来的法律程序。

这里要提一个大大的疑问。娄底市是个县级市,市二轻局长只不过是科级干部,为什么不在市检察院立案?为什么要跨越市检院和市检察长由地区检察院立案?

此时此刻,他们独独忘记了颜跃明是市人大代表,独独忘记了对人大代表实行司法强制措施,必须经同级人大常委会批准方能实施的这一最重要的法律程序。

此时此刻,他们可能有足够的理由认为,他们可以藐视人大代表的权利,可以藐视人大常委会的法律地位。在他们看来,人大常委会顶多不过是个二线干部俱乐部;人大顶多不过是个橡皮图章,甚至连橡皮图章都不是,而是橡皮泥图章;人大会议顶多不过是各级党组织选送的按组织的意志行使权利的举手机器。

所以在第二天,专案组的检察官向颜跃明出示“监视居住决定书”时,他向检察官展示了一九九二年四月三日在《湖南日报》上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说:“我是人大代表,你们不能这样干!”检察官们却毫无表情,木然而视。

颜跃明在“监视居住决定书”上签下了:我是人大代表,未经人大常委会批准,剥夺我的人身自由是违法的。

同时,他向刘松平副检察长要求,因为是罢免案而遭打击报复,赵伯栋、市公安局副局长邹洽岭、市公安局刑警队长唐铁军、市公安局政保副股长左友发等人必须回避。

从颜跃明被立案侦查、监视居住的司法程序来看,基本上是个权力运作的结果。

根据有关法律规定,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并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其他行政机关、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地方各级

检察院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和人大常委会负责并报告工作。可是,我们目前的体制有问题。拿娄底来说,在公、检、法之外,还有其他一些领导部门的干预。政府方面,也有一个副职负责政法工作。这就使权力干预法律不仅成为可能,简直可以说是敞开了大门。

没有比讨论“权大还是法大”更荒谬的事情了。因为现有司法机制,恰恰把权力凌驾于法律之上,在法制体系外,又有了一套更强有力的体系来管理之,笼罩之。

独立审判、独立检察、独立侦查,到底有多大的独立性呢?没有独立性、或者没有充分的独立性,何谈法制?何谈公平?何谈公正?宪法所赋予公民的权利何谈保障?

这当中,权力的交易成为可能。赵市长从头至尾参预、操纵、控制颜跃明案也成为可能。

市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原主任童耀文对我说:“如果一个人掌握了人权、财权、司法权,那就太可怕了。”

颜跃明也感到了这种可怕。

当他看到住宅被包围后的第二个意识,就是嘱咐妻子:“我要是被抓,你马上给李钧和吴兴华打电话。”

李钧,《湖南日报》副总编辑,是颜跃明非常敬重的一位长者;吴兴华,《人民日报》驻湖南首席记者,在湖南以擅打官司、主持正义而著名,有“吴青天”之美誉。

年初,颜提出辞去官职到亏损企业之举,得到了他们二位的坚决支持,他们将颜的辞职报告当面呈交给了娄底地委书记唐之享。

然而,对于颜案,在一种强大的干预下,他们也无能为力。政治体制与新闻体制是一体化的。所谓舆论监督,所谓客观报道,与所谓司法独立一样,都是绝难做到的事情。

颜跃明在劫难逃。他必须为中国的民主蒙难了,必须为中

国的法制蒙难了。

四月三十日下午六点,由专案组人员和专门聘请的涟源钢铁厂武术队的文建国秘密将颜跃明押送到双峰县剧院招待所,进行所谓的“监视居住”。

在这之后的二百一十四天里,颜的“监视居住”先后更换转移了三个县市、十一个地点,远远超出了“监视居住”的法律范畴。市检察院检察长颜维和说,他们这种做法,是典型的“非法拘禁”。按法律要求,“监视居住”,必须在二十四小时之内通知家属和所在单位。监视场所,只能委托当地派出所、街道和单位实施,不能弄到外地,不能剥夺人身自由。

颜被专案组关押到双峰县,与外界完全断绝了联系。包括家里人,谁都不知道他到哪儿去了。

五月六日下午五点半,颜跃明绝食绝水,抗议专案组的非法行径,要求市长回避,要求和家属见面,要求和地、市领导见面。

七日晚,大雨滂沱,市委副书记尹平来到双峰关押地。

尹平是个与娄底各宗各派都不搭界的人物,是一位副省长的秘书,下基层带职锻炼。他同情颜的遭遇。我一九九三年二月二十四日在长沙采访时,承蒙他帮助,让我采访了省人大主任刘夫生。

颜见到自己尚能信任的市委领导后,双膝跪地,嚎啕大哭,大喊“冤枉”,大喊“赵伯栋制造冤案”。然后将他在关押时写的“血和泪的控告”,请尹平务必转交地委、市委和市人大常委会。

“我请求你以党性和人格担保,把这份材料带出去。”

“好。好。”尹平的眼睛也红了。

专案组不相信尹平能保密关押地点。第二天晚上十二点,将颜转移到娄底市武装部万宝炸药包库。窗户全部关闭,不准开窗透气,不准出房门一步。这个地点,就是赵伯栋市长晚上十二点多拉着公安局长李柏林踏勘视察过的关押地点。专案组副

组长、公安局副局长邹洽岭之子邹涛参加看守。

五月十二日凌晨一点,又将颜转移到市武装部家属楼。门窗全部钉死,阳台封闭,不准出去。

五月十七日下午五点,颜又被转移到冷水江市武装部招待所。

之后,又转到冷水江公安局审讯室、刑事技术室、四四〇发电厂、冷水厂铁焦总厂等处关押。

六月十八日之后,专案组宣布了不准看书,不准看电视,不准出门等纪律。

“《邓小平文选》、法律书都不让看吗?”

“不准!”

这期间,颜曾四次书面报告专案组,因为“长期不见天日,不能活动,头晕耳鸣,四肢麻木”,请求每天放风两次。这一合理请求,这个连犯人都可以享受到的待遇遭到拒绝!

七月一日开始,审讯升级。这天中午,冷水江公安局两个全副武装的警察,“咔嚓”一声用手铐铐了颜,带到公安局的刑事审讯室。里面坐着专案组的唐铁军、左友发、干警彭春华,还有彩色水泥厂的一个司机。

湖南七月的天气,酷热难当,可是审讯室吊扇的电线被剪断了,两只摇头扇只对着专案组吹。

“颜跃明,你在经济问题上顽固不化,为了端正你的态度,我们要审讯你的生活作风问题!”唐铁军说。

生活作风问题?挨得着吗?即使要查,也是纪委的事,轮不上公安局查,轮不上检察院查。“我要提两点,”颜说,“第一,为什么地区检察院的人不来?第二,我没有任何生活作风问题。你们是按经济问题给我立的案,按法律规定,与本案无关的问题,我可以拒绝回答。”

“不老实,站起来!”

颜跃明站起来后,在以后的十天里,便再也没有正经坐下去过。专案组分四班轮流审讯,不准他睡觉,打盹时立即叫醒。

两天没有收获,第二天下午,专案组让颜跃明站在凳子上,将他的左手铐在审讯室铁窗上两米多的高处。他刚站好,彭春华便把凳子抽掉,颜跃明悬空挂在了铁窗上!

“哎呀……痛死我啦……”颜跃明惨叫着。

我在娄底车站见到的那双精瘦苍白的手,血脉完全阻滞,肤色由白变红,由红变紫。

“说!你老实说!说了就放你下来。”

“好,好,你们问吧。”

见他想招,他们把他的手铐低了些,让他的脚落地。

“交待你的生活问题。”

“我实在是没问题啊!”

“你看看上面。”左友发指着铁窗的高处说。

“你们要我說什麼?你们告诉我。”

专案组拿了几个女人的审问记录给他看,要求交待的与记录一致。

“你看清楚了吗?”

“没有!”他赌气。

他们又把他吊高悬空。手腕上,铐齿越勒越紧,咬进肉里,他万箭钻心般痛。

“好,好,别吊我了,你们要我說什麼就說什麼!”

“这还差不多。”

他被放了下来。他按照证人所说的事实抄一遍交上。

公安局的审讯人员见他“交待”了,大喜,马上叫地检院的人。

晚上,地检院的检察官肖正奇来了,问:

“颜跃明,今天你交待了?”

“他们铐我，打我。”他指着手铐说。

“颜跃明，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你看我们检察机关不打人，你就跟我们软磨硬抗。我们也有办法收拾你。”

“他们吊我。”

“我不管。我只保证我自己不吊你。”

这时，左友发派人喊走了肖正奇，然后威胁说：“等一下检察院的人来，你再不老实，等他人走了就吊死你。如果你配合，按我们的要求做，便可以优惠，两三天没睡觉，可以让你好好地睡一觉。”

这之后，他开始与专案组“配合”。然而，在“配合”的时候，他故意将时间、地点说得和材料上不同。有时候交待细节时，不让看材料，所以只能猜。在胡编与某某发生关系的故事时，他们问道：“她穿什么短裤？”

“花短裤？”他说。

“不是。”

“黑短裤。”他试探着猜。

“不是。”

“绿短裤？”

“不是。”

“红短裤？”

“不是！颜跃明，你不老实，犯强奸罪，可以枪毙你。态度好，可以保你一条命。”

颜跃明也憋不住火，大声说：“我说了那么多短裤都不是，她的材料又不给我看。我冤枉！”

“不老实！铐起来！”

颜跃明急了，一把抓过桌上的一个黄色花纹的大瓷茶杯，往自己脑门猛砸。“我的脑子是红的还是白的，我砸出来给你们看！”

“你威胁哪个？你砸吧！”唐铁军说。

唐铁军在左，刑侦队副队长在右，邹涛在后，都是伸手就能拉住的地方。但是他们无动于衷，眼睛里都闪着杀气。

茶杯在头上连砸了十几下，砸得碎瓷迸飞。头被砸肿了，砸破了，鲜血流了出来。“他们是想叫我死！”他拣起一块瓷片割腕静脉时，才被一个干警拉住了。他手上的瓷片被夺下来。他终于昏倒在地。他们把他拖出门外，用自来水冲醒后又拖了回来。

等他清醒一些，又被铐上铁窗。此时已是凌晨，他全身疼痛至极。五天五夜没有睡觉，加上酷刑，真是困极了。他哀求左友发：

“让我靠在墙上，眼睛闭五分钟行吗？”

“可以，但有个条件。你强奸×××三次的时间不对，你要按照她说的时间交待。答应这个条件，我可以让你睡五分钟。”左友发说。

“好好。我支持不住了……”话没说完，眼睛一闭就睡过去了。

迷糊中他听见喊叫：“颜跃明醒来，时间到了！”

他看了一眼桌上的表，只走了四分钟！只走了四分钟啊！

人的意志被折磨崩溃了。他按照专案组的意思写，按照材料提供的细节写，故事不够就编故事，名字不够就想名字。只要是认识的女人，统统发生过关系，统统提供给专案组，有的女人他仅仅只见过一面！

“好了，可以去睡觉了。”

六日，他回关押处睡了一觉。第2天中午刚吃过饭，邹洽岭的儿子邹涛，左友发的儿子左海两个无业青年进屋，二话不说，把他一铐，带到审讯室。颜跃明又站到凳子上，一只手被铐在原来的地方。

这回是审经济问题，方法简单而奏效。不承认？踢开凳子！

不签字画押？踢开凳子！直弄得审讯室里鬼哭狼嚎，惨叫之声，不绝于耳。

又是几天几夜轮班审，不准睡觉。

九日凌晨，专案组问：

“陈华德送你多少钱？”

“没送钱。”

“你不说，我要踢凳子啦！”

“别踢别踢。一百块。”

“不是。”

“二百块。”

“不是。”

“三百块。”

“不是。”

“四百块、五百块。”

“不是！”

“五百块？六百块？”

他一直猜到了八百块！

这时，专案组干警罗贵华伸出一根指头说：“别罗嗦了，再加上‘一杆水’（注：湖南小偷黑话，即一千块钱）。”

“好，一千八百块。”

罗贵华笑起来：“这还差不多。”

就在颜跃明受到非人待遇时，他的妻子周吉莲六月二十四日被唐铁军等人强行带到地检分院，又秘密转到地区商业局招待所和迎宾馆406房，连续四天四夜威逼、恐吓，强迫她承认受贿，并不准回家，不准拿衣服，不准看病取药，上厕所所有人跟着。其审问的情节，跟审问他的情节如同一个模子里出来的。

“周吉贤送了我五百元。”她被逼无奈地说。

“不老实。”

“一千元。”

“不老实。”

当加到二千元时,专案人员说:“基本沾上边了。还少些。”

“二千五百元。”

“那差不多了。”

于是,便有了周吉贤行贿二千五百元的证据。

四天四夜,她没把女儿亚亚安顿好。来之前,局长只是告诉她,检察院的两个人找她,说可能是颜跃明病了,让她带点什么东西给他。颜跃明是生是死,在什么地方关着,音讯全无。她心急如焚。而专案组的压力却是铺天盖地。“你对颜跃明不要抱什么希望了。告诉你,皮革厂的房子马上要你搬出来。颜跃明被撤职了,市委的房子也没他的份,你还要尽快找房子呢,不然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你必须跟我们配合,才有出路。”“你也参预了这个案子,你串供、诽谤他人、私闯监视居住处,是严重违法的。根据你的犯罪情节,也可以把你和颜跃明一样,监视居住起来,查你的经济问题。你要知道,监视居住是没有明确时间的,一年、二年,甚至三年,直到问题查清。时间我们多得很。你不说,想拖,我们不怕你拖。你男人判刑,你也被关起来,孩子将流落街头。你自己想想后果吧。”“你要为孩子想想,尤其是女孩更需要妈妈。”这捅到了做母亲的最薄弱的地方。周吉莲哭了,哭得不能自己。她渴望见到丈夫,见到孩子!孩子无辜!

她深深地知道,她的这个家庭来之不易。她和颜跃明一九七七年谈恋爱,一九八零年结婚。那个时候,颜跃明是涟源皮革厂工人,做皮鞋、皮件,大集体工,每月工资十八元,还要补贴家里。更麻烦的是,他父亲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一九五八年又被打成反革命。湖南这个地方与别的地方不同,由于历史的原因,空气里弥漫着仇恨和血腥,弥漫着暴力和恐怖,弥漫着偏激和歧视,与这样家庭背景的子弟恋爱、结婚,将会有无穷无尽的

烦恼。但她喜欢他。这个小个子、大眼睛的青年，聪敏好学，喜欢文学，大眼睛里总闪烁着对未知世界探索的激情，总是充溢着改变境遇、改变命运的勇气。她的选择不会错。然而，她知道他性格的弱点，对人对事过于坦率，眼中没有权威，看不顺眼的东西，嘴上没有遮拦，批评起来不管不顾，没有余地，认定的事情，一股道儿跑到黑。她认定他的一生必定铺满荆棘。

她拖着病弱的身体从专案组走出来时，只感到心力交瘁。她对着苍天呼唤：颜跃明，你在哪里？

被秘密拘禁在冷水江武装部招待所 106 房间的颜跃明，听不见妻子的呼唤。

他不能离开房间一步，三餐饭都是看守人员送来。没有书，没有电视，他已经与世隔绝。

他也想念妻子。他后来知道，他被秘密非法拘禁后，妻子和他弟弟红军，到处打听他的下落，跑遍了娄底地区五个县市。十多年夫妻，从他一九八三年自荐当了娄底市皮革厂承包人以来，她整整担惊受怕了十年，整整不安宁了十年。

他想完妻子，又想亚亚。

他心爱的女儿亚亚才十一岁，就承受了如此大的家庭灾难。一九八五年，妻子外出学习，亚亚上地委幼儿园，一天，下着大雨，他去处理一件急事，把接亚亚的事给忘了。都快十点了才想起来，赶到幼儿园，幼儿园的大铁门紧锁着，早已空无一人。他赶紧沿着回家的路上找，走不远，看见一个小人儿在一家屋檐下蜷缩着睡着了。一看，是亚亚！亚亚全身淋湿了，脸上还流着泪。看见这情景，他哭了。他脱下衣服，轻轻把亚亚包起来。亚亚一惊，看见是爸爸，一下扑上来，两只小手紧紧地搂着爸爸的脖子，哭诉着：“我要爸爸妈妈，我怕。我要回家。我肚子饿了，我肚子饿了……”父女俩紧搂着，哭作一团。

……

这般亲情都被现实无情地撕碎了。

连续十几天残酷的刑讯逼供,已把他折磨得虚弱不堪。左手腕因为长时间悬空吊铐,伤口已经化脓。右手掌则全部僵硬,不能自由伸曲。在他痛苦难忍时,对妻子、女儿的回忆化作阵阵清风,抚摸着疼痛钻心的伤口,抚摸着他那被凌辱被残害的心。这世界上还有什么比妻子、女儿更值得珍爱呢?现在,一切都成了过眼烟云,唯有亲情还在伴随他,支撑他,还在不断地提醒他,要挺过来,要保住生命,只要活着,就会有希望。所以在非法拘禁期间,屈打成招,然后翻供,翻供后又屈打成招,成了他拘禁期间的生命状态。为了留下证据,他故意用烟头在窗帘上烧了个窟窿,在被吊铐的时候,记下了窗外一辆看到情景的摩托车牌号:50281。用指甲在墙上刻下字迹:“刑讯逼供,冤深似海。冤冤冤,赵(伯栋)、唐(铁军)炮制冤假案。”

我曾问专案组第一副组长、公安局长李柏林:“专案组有刑讯逼供的情况吗?”

“有这种情况。”

“你作为专案组副组长,为什么不制止?”

“我专门讲过不准搞刑讯逼供。我在会上讲过,颜案与其他案不同。他的身份不同,有名人物,又是二轻局长兼党组书记,所以办案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能搞逼供信。我没讲由我负责。讲清楚了,再搞,谁搞谁负责。”

李柏林搞公安工作四十年了,懂得执法犯法的后果,可他在办案后期由于不受信任,对专案组的行为已失去控制。

他说:“这说明里面还有一个核心。”

核心人物是谁?不言自明。

地区检察分院常务副检察长兼党组副书记、湖南省刑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娄底地区刑法学研究会会长周恩良和市检察院检察长颜维和都认定说,专案组办理颜案的过程中,有严重的

刑讯逼供。

检察院具有司法监督职能。那么，专案组中的检察官都到哪儿去了呢？

一九九二年七月十三日中午，检察官唐立山进屋时，颜跃明见没别人，赶忙写了一张字条交给唐：“我没有收陈华德的钱，是公安局的人屈打成招的。”

而且，铐打过程中，检察官肖正奇等就在门外，一目了然，甚至参加了威胁。

检察官视若无睹、置若罔闻的态度，纵容了专案组公安人员的违法乱纪行为！

这个以打击政敌为目的的专案组，在某些当权者的支持下，几乎到了肆无忌惮、无法无天的地步！随意传讯，随意关押，威胁，利诱，恫吓，拷打，逼供，套供，指供，无所不用其极！一个小小的娄底市，一个地区所在地的县级市，近一年的时间里，警车常鸣，一片恐怖，民不聊生！

第四章 百姓遭殃

一九九三年二月二十三日晚八时，一辆北京吉普车不声不响地驶进了娄底师范专科学校。天下着大雨，校园里漆黑一片。娄底师专所在地派出所的一位所长开车把我们送到一个地点，然后独自下车，幽灵一样闪进黑暗里。一会儿，他带来了一位四五十岁模样的人。“这是学校保卫科李副科长。”他们还带来了雨伞和电筒。

“去地下室要电筒。”李副科长说。

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个简单的地下室，而是一间精心设计的

专门关押人的禁闭室,更准确地说,是一间货真价实的地牢!

地牢上面是师专办公大楼。下地牢,要经过三道铁门和一道木门,阶梯狭窄,刚好够一个人单向上下。

地牢阴森恐怖,寒气逼人。四面水泥墙壁,没有窗子,面积约有十二三平方米。里面凭空贴墙挖了一条宽约二十公分、高约十公分的水沟通向外屋。外屋不到十平方米,用作监视和暗房。

“屋里挖这么条水沟干嘛?”我问。

“你不知道,这里五六月份潮湿得很,地下水都渗出来了,这四面墙壁也是水,像下雨一样。”李副科长讲。

也就是说,到了雨季,这间地牢便成了“水牢”。如此奇妙,真是巧夺天工!

如果三道铁门、一道木门全部封死,这间地牢与外面世界沟通的唯一方式,是屋顶一个铁板盖压的方孔。铁板上面是间大办公室,师专保卫科雄踞其上,办公,监视,观察,喂食,功能齐全。

办公楼一九八六年动工,一九八七年竣工。

直到今天,我都百思不得其解,“一个学校,办学的地方,一个培养教师的地方,怎么会有盖间地牢的想法?莫非这体现着他们某种教育思想?”

真是不敢细想,细想便有些毛骨悚然。

当初,在里面关押过的人跟我描述里面的悲惨情景时,我还不相信。猜想所谓“地牢”,顶多不过是大楼地下室众多房子中的一间罢了。当我踏勘了地牢现场后,我惊呆了!

坐在我面前的这个小个子廖利民,曾在师专地牢里被关了七天。

他是市金属塑料制品厂办公室主任,因为在厂长周吉贤被专案组抓走后,在全市散发“紧急呼吁”而被刑事扣留。

抓廖利民像是游戏一般。警车先在娄底市转了一圈,然后往南开,好像去双峰县。开了一段后,又突然折回来往西面冷水江市开,把廖关进了冷水江市看守所。不知道为什么不能光明正大地往冷水江开,不知道为什么在娄底市拘留,不关在娄底,却要关在冷水江!

审讯时,专案组首先给他讲形势。廖说:“他们要我看清主流,站在赵伯栋市长一边,揭发颜跃明等人的犯罪行为。”

连续审讯四天四夜,没有收获,专案组急了。一天,干警彭春华在押廖上厕所的路上说:“你要是不老实,我的枪是干什么的?随便伪造一个事实,说你越狱逃跑,就击毙你。我们讲的到做的到。”

彭春华还用烟头搥廖的鬓角,揪着廖的脸,强迫廖跪下。

关于专案组的彭春华,颜跃明有一个终生难忘的细节。

一九九二年农历的六月二十五日,是颜跃明三十八岁生日。饱受摧残的颜跃明央求彭春华:“老彭,我好久没吃肉了。我有五元钱,请你给我买一瓶可乐,剩下的钱,买两块肥肉。”

他的央求被拒绝了。他们还故意耍弄他,在屋外面大鱼大肉,胡吃海塞,剩了一桌子。

“老彭,能不能给我块肥肉吃?”颜跃明太需要油水了。他继续央求道。

彭春华恶狠狠地笑道:“你他妈的也想吃肉!”说着把肉倒在地下,再用脚踩脏,踩烂!

.....

六月份,专案组把廖利民关到地区乡镇企业局招待所,连续三天三夜审讯,不给饭吃,饿得他头晕眼花。他冲着他们喊:“我就是死囚,也要给饭吃!”他说,“根据刑法一百三十六条,‘国家工作人员对人犯实行刑讯逼供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干警刘小雄“啪”地给他一个大耳光，“你还懂法？看是你的法狠，还是我的耳光狠！”

“我肚子饿，几天没吃饭了。”他向专案组央求。

唐铁军说：“只要你讲出来，我们中午请客。”

在七十天的拘留和关押期间，给他身体和心理摧残最凶的是师专地牢七天的拘禁。

廖利民说：“他们把我扔进师专地牢后也不审问。里面天天见不到阳光，墙壁都在滴水，十分潮湿，被子能捏出水。完全是个‘水牢’。”

里面有灯，但是开关在外面。灯一关，里面伸手不见五指，人一下就被黑暗吞噬了。除了一天三餐饭和解手能见到人外，大多数时间都是他一个人。陪伴着他的是黑暗。无休无止的黑暗在那里不动声色，在他身体的前前后后、上下左右窥视着他。黑暗是个长满了眼睛的怪物，是个能统治万物众生、统治宇宙的巨人。它的力量无所不在。它会慢慢地消解你，摧毁你的意志，蚕食你的灵魂，然后整个吞没你。它不与人对话，它认为实力悬殊的对话是没有意义的，它只需要较量，一场能证明实力的较量。而它的锐利武器是沉默，无穷无尽的沉默，生命短暂的芸芸众生，便在这可怕的沉默面前溶化了。

由于孤独、寂寞、恐惧，由于空气潮湿被子潮湿，他根本无法入睡。他的精神彻底垮了。

他向铁门冲去！用头撞击铁门！“咚咚咚……”

“我要出去——我要出去——”

“我×你妈！”

他们根本不审讯他，天天在铁板上面打牌娱乐，他这时倒希望审讯他，希望与活着的人在一起。不管他们是谁。

然而，上面仍然在打牌，没人理会他。

……

廖利民放出来时,脸上没有血色,体重减了三十六斤,已经不像个人样了。由于落下了风湿腰腿,走路一瘸一拐的。妈妈和妻子见状都哭了。

廖利民就是这样被不明不白抓进去,关起来,又糊里糊涂放出去,表现出司法手段在娄底市某些人手里的极大随意性。

与廖利民比起来,被扯进颜跃明一案的糊南宁乡县历经铺乡金南村金南饭店的个体户吴合良和他母亲更冤枉。

吴合良说,一九九二年六月十九日下午,他们母子懵里懵懂被专案组六个人强行绑架到娄底市迎宾馆,分开审讯。专案组拿出四张照片要吴合良辨认,说是其中一人曾经在金南饭店嫖宿。吴合良说,四张照片的人都不认识,即遭到罚跪、毒打,几次打得满脸是血,昏死过去。他痛得喊叫,就用拖鞋堵嘴。专案组连续审讯拷打了二十多个小时。

第二天下午,专案组罗贵华拿来一张“拘传通知书”,要吴合良签字。吴拒绝:“我没有犯罪,为什么要拘传我?”

又是一顿拳打脚踢。吴被迫按罗的意思签上了一九九二年六月十九日十六点及自己的名字。而这一天应该是一九九二年六月二十日十四点!也就是说,这是一次彻头彻尾的非法绑架!吴合良今年二十四岁,毕竟有文化,明事理,他意识到这是一次公安人员执法违法的事件,必须留下证据。回到家的第二天,他就去县照像馆拍了受伤部位的彩色照片。

然后,吴合良向长沙市公安局报案。六月二十五日,长沙市公安局出具了“法医损伤检验报告书”:

“伤者多被钝性物体击伤,致头皮下血肿,脑外伤综合症,胸、腰、背部、双上肢及面部,多处软组织挫伤。”他的右耳也被用手铐打骨折了。

吴合良一案是个大大的阴差阳错。

一九八八年,颜跃明在省青年企业家协会成立大会上,被选

为副会长，与几个青年厂长一块回来时，在宁乡金南村吃了顿饭。

据颜跃明回忆说，是在金南饭店旁的友谊饭店吃的饭。

后来友谊饭店改作了百货商店，路边便只剩下金南饭店一家食宿店。于是，专案组认定就在金南饭店吃的饭。结果是金南饭店的老板倒了霉。

今天大家见面谈起来，只是愤怒和苦笑。

再看看专案组是如何侦查颜跃明的“流氓罪”的。

“流氓罪”的线索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刑讯逼供下，颜跃明本人被迫说出的一大堆女人的名字；二是已有结论的陈年老帐；三是有些人的“检举揭发”。

先说陈年老帐。

我看到了一九八八年九月二十九日娄底市公、检、法联合调查组的“调查报告”，和一九九零年八月十八日娄底市纪委“关于颜跃明几个问题的结案意见”，都对颜的所谓“强奸”和“流氓”等问题作出了否定性的意见。一九八五年八月十三日，市调查组亦有相同的意见。其他两条线索，基本上是先定罪后找证据，所以整个过程充满了荒唐和滑稽。

我到娄底后，看到了娄底市广播电台一位女记者于一九九二年六月五日写的《五·二五传讯始末》。我专门访问了这位女记者，向她核实了这份公开散发的“始末”中所述之事实。

这位记者所写的这篇七千多字的材料，故事情节十分清晰，给我们留下了珍贵的史料。

这位女记者写道——

1992年5月25日下午4点多钟，我到电台办公室去看报纸，在楼梯口处，碰上了两个男青年和一个女人。一个男的20岁左右，一个男的20多岁，那个女的约摸有三十五六岁。他们都穿着便衣。见到我，那个男青年便问：“你是××吗？”我说：

“是的。”那个女人马上接着说：“我们是娄底市公安局的，有一个事情想要你去采访一下，车子在下面等着。”我问：“是张曙光要你们来的吗？”他们回答说，是的。我于是相信了，跟着他们上了车。上车时见里面司机座位旁边还坐着一个40岁左右的男人，后来知道他叫左友发。车子拐一个弯到了娄底市接待处迎宾馆停下。他们领我到了106房间。这时我才知道，找我去根本不是为采访什么事情，并且从他们问我的姓名、年龄、所学专业、家庭住址等情况的口气来判断，我是被公安局专门找去“问话的”。大概是6点半多钟罢，他们开始“问话”了。审问我的一共有四人，他们是唐铁定、左友发、刘小雄、陈小莉（女）。首先，作记录的刘小雄了解并记下了我的简历。接着，左友发开场白，他说：“我们是九二专案组的，这个专案组是为调查颜跃明的问题而专门成立的，由地区检察院、娄底市公安局联合组成，代表娄底市政府。今天找你来，是想了解一些情况，你以一个证人的身份，必须如实回答我们提出的问题。”没有一点思想准备、糊糊涂涂就被公安局传讯的我，到这时心里才有了点眉目。左友发接着说：“颜跃明这个家伙，不仅是一个政治流氓，还是一个生活流氓，有经济问题，动乱问题，生活作风问题。这次我们是下了决心非把他搞倒不可的。所以你应站在市政府一边。要知道，与市政府作对是没有好下场的。”

这一番话令我感到好莫名其妙。我对左说：“你到底要我回答什么问题，直截了当地问好了，不必拐弯抹角。”这时唐铁军接过话说：“好，我们开门见山。你和颜跃明是什么关系？”我回答说，是一般的朋友关系……唐说：“你说的都是表面现象，与客观事实相差太远，你要花招，拐弯抹角，态度不老实，不端正，不诚恳，实质性的内容你都没说。”

我说：“我说的都是事实。我也是很认真、很诚恳地说。”

左、唐嗓门提高八度，做出一副凶神恶煞的模样，说：“你不

老实,讲到关键性的问题就绕弯子。明白地告诉你,今天是你人生的转折点,你应该珍惜现在你所拥用的一切,包括你家庭的幸福,工作条件的优越。如果你不积极与我们配合,和我们对抗,包庇颜跃明,那么你就没有好下场,你现在拥有的一切都要失去。我们是讲得到做得到的。提起你有千斤,放下你只有四两,你要想清楚。”

我这时也激动起来了,对他们说:“你们到底要我说什么?”

他们说:“你自己心里应该清楚,别人检举揭发,说你是颜跃明的情妇,你和颜跃明有不正当的关系,颜跃明自己也多次提到过你,并亲口承认与你发生了关系,还说你是主动的。如果我们没有掌握真凭实据的话,我们是不会找你的。”

到这时我才明白,原来他们是要我承认那根本不存在的事情。

我气愤地说:“我根本不是颜跃明的情妇,也根本没有跟他发生过关系,连接吻、拥抱都没有。别人是捕风捉影,是诬蔑、造谣;如果颜跃明说与我发生了关系的话,那颜跃明太卑鄙,我要当着他的面和他对质。”

唐说:“你现在别想跟颜跃明对质,你也见不到颜跃明,你只要承认,你到底与颜跃明发生过关系没有?”

我坚决地说:“没有。”

唐说:“你没有与颜跃明发生关系,我就不姓唐,我就砍脑壳。”我也针锋相对地说:“如果我和颜跃明发生了关系,我就不姓×,我也砍脑壳,我敢当着全市人民的面说这种话。”左说:“看样子你和颜跃明真是情投意合,感情深厚,死心踏地要为颜辩护、包庇。你怎么脑子这么不开窍?我们喊你来,是把你作为受害者来看待,你说出来,我们保证保密,绝不声张出去。”

25日晚,我整整抵抗了一个通宵,没有合一下眼。26日早晨,大概是7点多钟,他们转移地方,把我带到地区商业局招待

所,又开始了一整天的审讯。当时我随身带着一个小包和英语书。左、唐等因此大加发挥,他们说:“你现在发狠学外语,又和英国人打交道。哼,你想出国深造,没有经过我们公安部门批准,就别想出去。如果你把颜跃明的事情讲清楚,和我们积极配合,那么,你现在拥有的一切就不会失去,否则,后果自负,我们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出来的……”唐说:“所有的道理都给你讲清楚了,你总是不听,怎么这么蠢!要打你两个耳光,打掉你的蠢气。”

从25日晚6点多钟开始,一直到26日晚上7点多钟,整整二十四五个小时,除了短暂的吃饭时间外,他们就一直在威吓我。他们一共5个人,每次都是3个人问,两个人休息,这样轮番地审问我,对我进行精神折磨和体力损耗。一遍又一遍,非要达到他们先入为主的目的方才罢休,否则,就扬言要打掉我的饭碗,撤掉我的工作,还要把我监禁起来,成立什么专案组,调查我的作风问题……他们对我说:“明白地告诉你,要整你个弱女子,那还不容易!你不把事情讲清楚,就别想回去!”

直到5月26日下午,我已无法忍受他们的车轮战术,感到筋疲力尽,脑袋像灌了铅似的,神思恍惚。我知道和他们硬顶下去,他们是不会善罢甘休的,只会招致更大的折磨。我甚至想我还会不会活着回来。我决定暂时违心地承认那种子虚乌有的事情,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允许我回去,我也才能够见到我的丈夫,把事情弄清楚。当时我的想法真是太幼稚太简单了。

我强打精神,说:“我说实话,你们不相信;我说假话,你们就相信了。那好吧,我就按照你们的意思说……”

罗贵华问:“你们是在沙发上,还是在床上?”

我说:“你说的在沙发上也行,在床上也行,随你怎么写。”他于是写“在床上”。

罗又问:“你衣服全脱,还是半脱?”

我说：“你说全脱就是全脱，说半脱就是半脱。”他便写了“脱了下面的裤子”。

罗又问：“他在你身上乱摸了吧？”

我说：“按照你们的逻辑推理，发生那种事情，肯定是那样的吧。”罗便在纸上写“乱摸”。

罗又问：“有多长时间？”

我说：“颜跃明说有多长时间就有多长时间，你们不是相信颜跃明说的话吗？5分钟也可以，10分钟也可以，2分钟也可以，随你怎么写。”

他于是写上“2分钟”。

在要我签字、画押之前及之后，我语气坚决地大声说：“前面说的是实话，后面说的是违心话，是你们逼着我说的。”

.....

一直审问到晚上7点，才把这位精神和肉体都折磨垮了的女记者放回家。整整审问了二十七个小时！

这也难怪他们着急，定了个满天下都知道的罪名，市长、书记大会小会宣讲，却拿不到“罪证”，使出十八般武艺疯狂地抓人审讯，便是自然的了。

市二轻局供销公司副经理D事后的泼辣和刚烈，正好与女记者的清醒和理智形成了反差。D经理先后于一九九二年五月、六月、七月数次被专案组传讯。在专案组的折磨和逼供下，只好按专案组的意图编与颜男女关系的故事。事后，她在丈夫和母亲的支持下，一直告状。去地检分院、地区妇联……该去的地方她都去到了，却毫无结果。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她来到了市人大法工委。这是她最后的希望了。她走进市委、市政府、市人大大楼，上了三楼，推开法工委的办公室，扑通跪地，大喊：

“冤枉啊——”

一声“冤枉”，撼动了整幢大楼。这座大楼是娄底市的政治

中心,四大班子都在这幢楼里办公。这幢楼里的每一间办公室几乎在整一年的时间里,都在议论着娄底发生的这件事。迎宾馆就在大楼对面。市长在迎宾馆有专门的房间,他经常在那里办公,主要精力都投入到专案组那边去了。市里的工作可以说陷入瘫痪。这幢楼里的每一个人都十分清楚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是非曲直。然而,他们自顾不暇,他们目前根本没有能力改变这种现状,他们也在一个巨大的阴影笼罩下生存,他们都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谁都不知道自己是否列在了被清洗的黑名单上,只好默不做声,听天由命。

童耀文赶紧上前将 D 经理搀起来。

“你冷静点。”童耀文劝道。

“我无法冷静。”

大楼里的人都围了上来。

他们静静地听着 D 的哭诉。

那是五月中旬的一次对话。地点:地区检察分院——

问:“你跟颜跃明是什么关系?”

答:“同志关系。”

“你要老实交待!不要袒护颜跃明!你不好好交待,不允许你回去。”

“我小孩读书,放学回不了屋。”

“我们把钥匙转交给派出所。”

“不行,我没有犯罪,怎么要找派出所。”

六月二十日的对话。地点:迎宾馆——

问:“你晚上两点半到颜跃明家汇报工作,有没有?”

答:“没有。你们真无耻!”

“你要放聪明点,你年纪不大,很狡猾。”

“我送你们两个字:卑鄙!”

“你态度不好,要定你的罪。”

“你们办案要调查研究,实事求是。”

七月十八日下午至十九日凌晨。迎宾馆——

问:“你不要顽抗到底,顽抗对你没有好处。要放明白点儿。其他女的开始很硬,后来交待了,没有什么,受害者是要保护的。”

“我不是受害者。为什么要把我当作受害者、强人所难呢?”

“你是受害者,要好好交待。”

“你是男的,你愿意戴绿帽子吗?”

“你不讲就要搞得你一辈子不安宁,搞得你老馆子与你离婚。一切后果由你负责。这个案子是通过省、地、市领导的。我们要纪委天天找你,让你不安宁,到那时就晚了。”

.....

这一段时间里,D 经理买了有关法律书学习。她发现每次专案组的便衣来,要么打一个招呼自己就跟着走,要么打一个电话就赶紧去,这似乎不符合法律程序。

八月八日,雷阵雨刚过,专案组的人又来敲门了。这回,她没让他们直接进屋。她严肃地要求说:

“请出示你们的证件。”

这帮人从来就没有这种习惯。他们很不情愿地拿出了证件。他们要她去迎宾馆。

“这是我妈。”她指着妈妈说,“有事这里讲。”

“你去不去?”

“不去! 你今天就是拿刀子放在脖子上,我也不去!”

“去拿逮捕证来!”唐命令道。

一会儿,拿来一张传唤证,D 仔细一看,上面用炭素墨水写着“三·一八匿名信案”字样,立即抗议:

“我听都没听说过‘三·一八匿名信案’,我不签。”

.....

颜跃明的生活作风问题找到了D的身上,而且把她当作了重要证人,纠缠了那么长时间,使她突然明白这完全是一桩冤假错案。人们处于沉睡状态的某些意识渐渐觉醒了。他们开始勇敢地站出来,反抗权势,反抗专案组。

据市人大法工委掌握的情况,为颜跃明的问题,专案组曾传讯了六十人,其中有三十多位妇女,对九位妇女进行了逼供。刑讯逼供和翻供,成了颜跃明最有代表性的两个现象。所以,专案组熬更守夜、费尽心机拿到的所谓证据,由于证人和被告的翻供,顷刻间都化作了一堆废纸。

像D经理那样,人们为了维护自己的清白,为了维护别人的清白,正义与良知开始集结,并彻底改写了娄底的历史。

第五章 尊严与抗争

在颜跃明获释前,娄底市的大街小巷、城市农村,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娄底市出了个建市以来最大的受贿案,受贿金额达二十多万!这对于一个内陆经济十分落后的县级市来说,不啻是个天文数字。受贿者是国家公职人员,是个早就家喻户晓的人物——颜跃明。而且向社会通报情况的人是本市最权威的党政一把手。市长和书记大会小会动员,号召全市的知情者勇于揭发检举,与颜跃明巨额受贿犯罪作坚决斗争。从当时市长、市委书记所渲染的气氛来看,人们认为,颜跃明罪不容诛。虽然,市长、市委书记和专案组都清楚地知道,颜跃明受贿罪立案并对颜采取强制措施的证据,仅是一直无法铁板钉钉的三千八百元。市长在市里开会公开讲,颜跃明受贿二十多万元,搞了二十多个女人。这等于给专案组定了个指标。一边是高指标,市

长亲自督阵,一边是好吃好喝高补助,一流的装备,还封官许愿。专案组便被高高挂着,下不来了。只有竭尽全力搞到颜的犯罪证据。可是,集中了如此巨大的人力和物力,搞了二百多天,案子仍然没有任何突破。年底就是五年一度的换届选举,之前必须有个交待。市长和专案组不可能不焦急,并积极安排后路。

专案组毕竟不是铁板一块,天长日久,有些人看出了端倪和问题。

颜跃明在冷水江公安局的审讯室被连续铐在窗子上八天后,凌晨三四点钟,他在极度困乏中看见了公安局的老魏和邹涛、左海(左友发之子)来换班。

老魏不声不响地从门外搬进来六块青砖,然后把他脚下的凳子撤掉,把砖垫在他脚下。老魏面无表情地说:

“颜跃明,你站在凳子上不好,容易打瞌睡摔下来。”

颜跃明眼睛里刹那间噙满了泪水,只能模模糊糊地看着老魏的一举一动。

可老魏领他从厕所回来时,发现砖被扔了。这个平时很持重的中年汉子突然大发脾气,斥责说:“你们把砖扔了干什么?!”然后,又把砖一块块拣回屋,重新给颜跃明垫在脚下。“老魏,给支烟抽好吗?”颜跃明说。

老魏掏出一支烟递过去,点燃。

“颜跃明,你也是快四十岁的人了。”老魏一面点烟一面数落着,“为什么偏要受这个苦?提什么罢免案呢……你胳膊扭不过大腿。”

这时节,颜跃明还能说什么呢?

八月份负责看守颜跃明的邓卫星,是个很不错的小伙子。他从部队转业后,来到了娄底市公安局。接触时间不长,颜跃明便感觉此人心地善良。颜跃明向他诉说了整个案情的来龙去脉,诉说了关押审讯期间,专案组刑讯逼供的种种情况。颜跃明

还把墙上用指甲刻的字迹和手腕的伤痕指给他看。

“怎么能这么搞呀！”邓卫星同情地说。

“我随时随地都可能被赵伯栋、唐铁军害死，你要救救我啊！”颜恳求他。

“怎么救？”

“你给我一点时间，我给中央和省、地、市人大写封信。”

见邓卫星有些犹豫，颜跃明给他跪下了，给他叩头，“你是个党员，又是转业军人。你是个好人的好人。我要向人大控诉冤情。”

“别这样，别这样。”邓赶紧扶起颜跃明，“好好，我答应你。”

八月十三日，邓卫星当班，颜跃明抓紧时间写成了《我呼唤庄严的法律》。他写道：

扪心自问，在这十年来的改革中，我矢志不渝地坚持改革，曾几次拒贿，连一九八三年我任厂长的承包奖几千元都分文未领。我有功于人民。纵然有些小错，但绝没有罪，更没有像专案组这一伙人炮制的“罪恶滔天”的所谓事实了。我一没有奸污过一个妇女，二没有贪污和受贿过一分钱。

我被关押近四个月，被迫承认和若干女性发生了关系，给这些女同志的名誉、人格、精神、家庭造成了多么大的痛苦。但是，这不是我的罪，是唐铁军等人故意造成的。我请求：

一、如果是我提了罢免案要报复我，我认了，我可以离开家乡，可以不要干籍、党籍，只是不要为了我一个人的事情，去牵连许多无辜的同志，给他人身心和家庭带来痛苦，搞得人人自危。

二、为了我的事，已经花去了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娄底市本来财力、人力有限，我宁愿受委屈，也不愿这样浪费人民的血汗钱。

三、我多次申请赵伯栋、邹洽岭、唐铁军等人回避我的案子，我的冤案是他们一手故意制造的，我现在又掌握在他们手中，我的生命安全受到威胁，我请求尽快恢复我的自由，使我为党为人

民工作。如果暂时不能,也不要唐、左等人监居我,请市人大派人监居。

四、我没有罪。我在任何情况下都相信党和人民,我决不会自杀,也不会逃跑。如果,我发生了意外的话,就是赵伯栋、唐铁军、左友发害死的,请党和人民为我伸冤。

人大代表颜跃明于冷水江武装部招待所 106 房(拘禁地)跪呈。

这份材料在邓卫星的悄悄协助下送到了市人大法工委,使外界第一次了解到了颜跃明受到刑讯逼供的惨状。读之者,莫不潸然。

颜跃明在被非法拘禁期间,还得到了专案组其他好心人的秘密帮助,如娄底恩口派出所干警李海红、待业青年兰杰贤等。

这里特别要说一下兰杰贤。他家住冷水江,二十二岁。他哥哥也是参加专案组的干警。在一段时间里,他负责看守颜跃明。渐渐地,他了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他哥哥也告诉他,颜跃明无辜,颜跃明没有罪。他对颜说:“我看过介绍你的报纸,你是改革者,你是因为‘市长罢免案’才被抓起来的。你是冤案。你不仅无罪而且有功,你为中国的民主与法制作出了贡献。他们对你非法拘禁。我也专门找法律书看过。我可以帮你,请你相信我。”

这个小伙子在十一月为颜跃明秘密送出了《我的再次控诉》。

在这些有良知的好心人帮助下,颜跃明关押期间的所有情况,外界都了如指掌,为市人大常委会向上级人大和司法机关反映情况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

其实,在此之前,市人大常委会和法制工作委员会也采取了行动。他们面临着双重压力,一个是社会舆论,一个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本身。

最清晰不过的事实是，专案组未经人大常委会批准就抓走了人大代表颜跃明，严重违反了一九九二年四月三日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

颜跃明被抓走半个月后，社会舆论反响强烈，一般群众、人民代表、机关干部纷纷找到市人大常委会，指出，人大常委会是人大代表之家，要主持公道。人大代表被抓到哪里去了，你人大常委会都不知道，你们人大常委会失职！

在市人大常委会的强烈要求下，地检分院被迫于抓走了颜跃明半个多月后的五月十七日补办了“关于请求许可对被告人颜跃明采取监视居住强制措施的报告”。

六月五日，地检分院的领导人就颜跃明一案向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作了口头说明，并检查了该案在办理过程中的违法现象。

在这次有六名人大主任和六名人大主要委、室负责人参加的会议上，地检分院的报告没有通过。后于六月十三日市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上，大多数委员都对专案组不尊重人大常委会法律地位的违法行为表示了强烈不满。审议过程中，在参加会议的市委副书记李亭玉做工作的情况下，人大常委会才勉强批准了地检分院的报告。

这等于说，对专案组非法拘禁进行了追认。对此，市人大常委会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七月二十一日，地检分院又向市人大常委会提出了“关于请求许可对娄底市第四届人大代表颜跃明依法逮捕的报告”，并提交市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

在这次会议上，市人大法工委主任童耀文作了两万多字的长篇发言。发言以确凿的法律依据和大量的事实说明，颜跃明从监视居住到申请逮捕，中间调查了三个月，“受贿”数额仍然是

三千八百元。而且据人大法工委掌握的材料证据看,这三千八百元并不能认定。第二,大量事实说明,专案组在办案过程中采取了刑讯逼供等违法手段,证人纷纷到检察院和人大翻供,控诉。所以逮捕理由不能成立。

逮捕报告未获批准。

然而,市人大常委会意识到,专案组虽然证据不足,却要对颜跃明的迫害升级。人大常委会再也不能对此保持沉默了。

人大主任肖国华根据广大干部群众的强烈要求,指示童耀文向省人大常委会写一份材料,反映娄底的事态。

八月三十日,更深夜静,市人大常委会第五会议室还亮着灯光。童耀文在伏案疾书。他深知此举非同小可,这将意味着市人大常委会为了维护人大代表权益、维护人大常委会的法律地位,向法律、权力一体化的专案组挑战,向实际操纵此案的本市最高行政长官挑战!后果难以设想。

“为了安全,我把我家属(妻子)安排在大楼下面右侧自行车棚里,注意观察周围动静。”童耀文告诉我。

妻子躲在自行车棚的暗处,不敢须臾放松警惕,提心吊胆地观察着。

丈夫写材料,妻子楼下放哨。这真是娄底政治生活的绝妙写照!

童耀文在第五会议室。已近午夜时分,他不时听见楼道里有动静,像是有人走过来,到门口,脚步停了,紧接着便有轻轻的敲门声。敲门声震得他心尖直颤!他屏住呼吸,不作声,脚步声又走了。

又轻轻地来了,轻轻地敲门,轻轻地走了。一晚上八次!神秘的脚步声,神秘的敲门声使他的神经都快绷断了!

这期间,市人大刘积葵副主任和市纪委书记来看他。刘积葵郑重叮嘱他:

“要注意安全。”

八月份,斗争已趋白热化,大家睡觉都睁着眼。市人大要给省人大和全国人大写报告的消息难免走漏。半夜三更地写东西,确实让人为童耀文捏把汗。

午夜十一点半,童耀文的妻子突然发现一辆桑塔纳小轿车开进了门。一看便知是赵伯栋市长的专车,司机是朱永卫!

桑塔纳围着办公大楼慢慢地转,一圈,两圈,三圈。转了三圈就离开了。

妻子赶紧跑上楼催促童耀文。

“我看见赵伯栋的小车在楼下转。你别写了,赶快回家吧!”

童耀文把材料收好,一看表,已是十一点四十五分。

夫妻俩走到自行车棚时,桑塔纳回来了,他们赶紧躲到暗处察看。车开到大门口,车上下来一个人,定睛一看,“赵伯栋!”赵伯栋市长上了楼。

好玄呀!童耀文差点儿和赵伯栋面对面撞上。

童耀文是硬汉子,他一九八零年从部队转业回来后,干了十几年政法工作,熟悉法律。对颜跃明案,他作为法工委主任,尽了他全部的力量。他的工作,他的努力,为伸张正义,解决颜跃明冤案铺平了道路。为此,他被视作眼中钉,肉中刺。

一九九二年十一月,市委副书记找他谈话,竟要变动他的工作,调他去市政府办公室下属的法制办当主任,等于说由现职务的正科级降为副科级。这明明白白是打击报复!

他非常气愤地对我说,真希望有人来主持公道,“否则就像个黑社会,无法无天”!

他要为娄底恢复公道而抗争。

王定华要的是尊严。

这个近五十岁的中年人,戴眼镜,胖胖的,身材魁梧,与人谈话,一字一板,故意控制着节奏,有一种湖南人极其罕见的幽默

感。

他慢腾腾地说：“在娄底，我是三朝元老，伺候皇帝左右。大家都骂赵伯栋有两只狗，内务是政府办主任，外面就是我。”

他任市经济技术协作办公室副主任，长期没主任，也没扶正，负责全面工作。“经协办”这个庙，实际上承担着礼宾司的职能，迎来送往，陪同市里首长出访负责首长饮食住行，首长吩咐的请客送礼，都由他去办。他手里掌握着市长的“小金库”，接待要高规格有规格，要低规格有低规格。

他在娄底可绝对是个人物。六十年代，高考曾考过地区第一名，因为父亲是资本家，被“政审”下来；他认定自己有音乐天才，就跑到武汉考中国音乐学院，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中国音乐学院，又被“政审”下来。

上不成大学，当不成音乐家，他就一脑门子钻科技、搞发明。

他曾领导过一个科研所，本人得了八个技术发明成果奖。一九八四年调到娄底市政府“经协办”工作，据说是湖南第一个由大集体工转干的人。

他说，三朝元老也不好当，像维持会长，“八路军”来了要拿粮，“皇协军”来了要开仓，“皇军”来了，全部家当都要赔上。“伯栋同志与前任书记有矛盾，我是前任书记的红人。书记调走后，伯栋同志也信任我。他的所有外出，都是我陪同。”由于常在市长的鞍前马后，自然对市长的禀性了如指掌。“伯栋同志爱下象棋，棋艺特臭。我臭，他更臭。我跟他下棋，一般都是下七盘。我赢五盘，故意输两盘。这两盘算是我拍马屁了。当然，这个马屁要拍得高明，要让他看不出来，让他感觉不到，高高兴兴舒舒服服地赢；不能让他发现破绽，弄得尴尬。所以他特别喜欢跟我下棋。”

“伯栋同志还有一个特点。”他说，“爱读错别字。到武汉，市文化馆的同志陪同参观自贡灯展，他要大声地发表对中国文化

的看法,却把‘弘扬’说成了‘弦扬’。开会时也经常念错别字,比如把‘支撑’念成‘支掌’,‘苑’念成‘晚’,‘伎俩’念成‘支俩’。遇到这种情况,你还不好纠正,伯栋同志特别要面子。”“你总不能让他永远念错别字吧。”

我禁不住有些同情市长了。

“那有什么办法呢?”他用平静的语气反问我,眼镜后面闪烁着智慧和狡黠。

既然他对市长言听计从,既然他是市长的“红人”,这回就要把他派上用场了。

一九九二年六月二十六日晚,王定华突然接到赵伯栋市长的一个电话,语气非常亲切:

“定华啊,”他一听便觉不妙,平时赵市长从未叫过他“定华”,都是叫“老王”。他仔细听着。“有个事情你回忆一下,几年前,你和颜跃明出差去长沙,到宁乡车坏了,他在一个店里摸一个农村妹子的屁股和奶脯,被人打了两个耳光。”

当时颜跃明已经被抓,市长书记大会小会讲,娄底的局面是一边倒,“可没这回事呀。”

他本能地说:“我没有与颜跃明出过差。”

市长说,“有那么回事呢,你好好回忆一下喽。”

市长这个电话,把王定华搅得坐卧不安。在他的记忆中,他一九八四年四月到娄底,从未与颜跃明一起出过差。放下电话后,“思想斗争很激烈。证做不做?做,坑人;不做,市长红人当不成。一晚上没睡踏实觉。”

第二天一上班前,赵伯栋又打电话到家里,还是那非常亲切的语气:“定华呵,昨晚的事情想起来没有?今天上班,请你到迎宾馆412房间找一下公安局的老左,左科长,去把这个情况证实一下。”

“好。”

上班后,他根本没去只有一步之遥的迎宾馆,而是像往常那样,进办公室后,先泡一杯茶,悠哉游哉地品着。他料定,他不去找那帮人,那帮人会来找他。

果然不出所料。九点多钟,左友发带着一个年轻干警来到他的办公室。

坐定后,左友发就问:“赵市长给你打电话了?”

“打了。”

“那就请你把颜跃明的那回事说一下吧。”

“好。”他答应着。他们拿出笔准备记录。

然而,王定华慢慢腾腾,一字一板说出的一番话,却令他们大感意外。

“我的记忆力之好,在机关是有名的。我一九八四年来到娄底,已经八年了,在我的记忆中,我从来没有与颜跃明一起去过长沙。”

空气一下子僵住了。

这种效果是赵市长和专案组没有预料到的。平常王定华小心谨慎服服帖帖自不用说。就在前不久,他从东莞出差回来,赵市长跟他谈话时,明确告诉他,年底换届后,下一届政府就要把外事办、外经委、经协办合而为一,由他执掌将印。已对他封官许愿。让他出来作证,当是在把握之中的事。

“你这句话是说,我们要给你写个否定材料才行啦?”旁边的年轻干警沉不住气了。

“是的。”他语气肯定地说。但是为了给个台阶下,他又说:“谁提出来的,可能记错了!”

为什么?科委魏主任跟我长得相似,是不是魏主任在场,他们张冠李戴了?”

左友发从卷宗里拿出一张纸,落款是“胡精艺”,“王定华”三个字赫然在目。

“胡精艺其人,我知道是市针织厂厂长。”他看完材料说:“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一直没与胡精艺见过面,根本不知道他高矮胖瘦。他怎么会认识我?”

左友发明白了,就不再问了。

可王定华是个细心人,他把询问笔录拿过来看完后:“我要添一句话才签名。”

“可以!”

王定华一字一板地写道:“在我的记忆中,我从来没有与颜跃明出差到长沙。”

事完后,他踱到办公室对面屋子市直工委办公室,对平时的好友成雄跃说:

“这下我的政治前途完了,官当不成了。赵伯栋要我作假证。在他手下往上爬,就得作假。但我要对得起良心。”他有点激动。

“好样的。”成雄跃竖起大拇指。

他对我说,在夹缝中生存的日子他已经过够了。他略有些伤感地描述说:“我是一双拖鞋,一双很软很舒服的拖鞋,谁来都愿意穿,穿破就扔了。这就是我的命运。”

他说:“我生性胆小。我既不是反对赵伯栋的英雄,又不是支持颜跃明的干将。我是有良心的人,不能卖身投靠。我没有作假证,仅仅是为了维护人的尊严!”

“维护人的尊严”,何等庄严神圣!

事态沿着这样的逻辑发展,是当初市长和专案组完全没想到的。

一九九二年四月二十九日晚十二点左右,娄底地委秘书长彭浒渤的电话,把常务副专员龙德发从被窝里叫起来,说地委要召开紧急会议,请他参加。

龙德发一听就急了:“和平时期,晚上十二点开什么会!我

不参加！要开明天开！”

“别急，内容是听取对颜跃明采取法制措施的汇报。”

“我不参加，你也别参加，最好这种会别开。请把我的意见转告地委书记和其他领导同志。”

“什么原因？”

“两点：一、应该实事求是，不能只听个别人的说法。颜跃明历史上有过贡献，是个有影响的人物。如果检察院认为犯罪，有足够的证据，检察院对法律负责，不需要地委讨论，去戴帽子。二、颜跃明只是个科级干部，为什么越级要我们讨论？”

龙德发感到事态严重，立即给书记、专员打电话，力陈己见。

后来，他了解到颜跃明在关押期间，遭到了刑讯逼供，立即向地委书记报告。指出：“此事情你们务必过问一下。一定不允许对颜跃明的生命构成威胁，只要颜跃明还活着，事情总是会搞清楚的。”

龙德发，中等个头，四十多岁，看上去精力充沛，精明强干。他一九六九年毕业于北京航空学院，由钳工、车间主任一步步干到副专员。在一九九零年来娄底任常务副专员之前，当了八年的株洲市副市长，卓有政绩。他直接领导的株洲电子研究所的科技体制改革，被写入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还有与青岛一起搞的劳动、人事、组织三项制度改革，在全国也有相当影响。在娄底当了三年常务副专员，感触很深，他认为事情搞成今天这种局面，地区也有责任。由于他在地委提出赵伯栋不宜继续担任市长职务，个人行动也受到监视，娄底市一位知情的常务副市长当时告诫他，“你要注意安全，晚上不要一个人在外面走”。

这真是荒唐透顶的事情！一个堂堂的地区副专员的安全都没有保障，况乎平民百姓？！

专案组数月的大规模调查，案子基本上是原地踏步走，没有搞到进一步的犯罪证据。想逮捕驳回。又想定流氓罪，由地检

分院把案子移交娄底市公安局,对颜跃明实行所谓劳教。这一行动也受到了坚决的抵制。

行署副专员阳花萼说:“如果让颜跃明劳教,除非把我这个地区劳教委员会主任撤了!”劳教案卷转到娄底市公安局,市公安局局长、专案组副组长李柏林说:“不能盖我的章!”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肖扬(现司法部长)和湖南省人民检察院都对颜案批示,要求立即放人。

一九九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市检察院检察长向市公安局发出了《纠正违法建议书》。检察长在列举了有关事实和法律依据后,严肃地指出:

“人大代表颜跃明不构成犯罪,上述情况不符合颜跃明一案的实际,我以娄底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名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等关于侦查、审判、法纪、监所四个监督职能,以及《人民检察院刑事检察工作试行细则》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和《劳动教养试行办法》中的有关规定,特向贵局各领导提出:立即恢复人大代表颜跃明的人身自由,停止继续违犯诉讼程序、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行为。”

第六章 娄底的故事

位于湖南中部的娄底是湖南省重要的农业和能源基地。一九六零年建市,一九六二年撤销,一九八零年又恢复。是国内少见的建市如此短命、后又恢复建制的县级市。

翻开娄底年轻的档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人口只有三十几万的县级市,在湖南省由一围绕着颜跃明没完没了的官司,有相当的知名度。

如果以为颜跃明一九九二年被非法拘禁二百一十四天是娄底政治生活中的偶然现象,那就大错特错了。

我刚进娄底市,就有知情人告诉我,娄底的特产之一,就是搞运动和窝里斗。有这样一些干部,不懂经济,不懂法制,习惯于“左”的那套东西,习惯于搞运动,习惯于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治理方法,与改革开放的要求相差十万八千里。

一九九二年,对于中国来说是何等重要的一年。这一年,中国人可能想得最多的就是四个字:改革开放。

而娄底不同。这里的最高首长的精力好像顾及不到改革开放。他们配上手枪,配上“大哥大”,让“文革”当中臭名昭著、“文革”以后销声匿迹的专案组又死灰复燃,大搞监听、监视,大搞骇人听闻的刑讯逼供,制造冤假错案,制造白色恐怖,书写了娄底历史上最耻辱最黑暗的一页。

我们因此可以说,娄底市的一九九二年与中国的一九九二年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并使颜跃明再度成为娄底、湖南、乃至全国的新闻人物。

颜跃明何许人?

一九八四年,他被市委、市政府、省二轻厅分别命名为“改革勇士”;一九八五年被共青团中央命名为“全国优秀青年厂长”、“全国新长征突击手”;一九八三年至一九八九年,连续六年被市政府记大功;一九七八年至一九八九年,连续十二年被评为先进生产(工作)者。一九八六年被提拔为娄底市二轻局局长兼党组书记,后任湖南青年企业家协会副会长,湖南省第五届政协委员,娄底二、三、四、五届人大代表。在他遭受了残酷的迫害后,一九九三年,在市五届人大会上,又被选为省第八届人大代表。

在湖南,颜跃明可谓声名显赫。

在娄底,可谓是声名过于显眼。

伴随着他声名渐涨的是,检举,揭发,密告,诬陷,和组织、纪

委、公检法没完没了的调查。

我粗粗了解了一下,颜跃明当厂长、局长十年,几乎年年没有断过“揭发检举”,年年都没有断过工作组织调查。规模最大的一次是一九八七年十月,市委在市直机关抽调了十几名主要负责人,分了四个调查组,调查了三个多月,结果是,颜跃明清白无辜。后来市公、检、法又组成了一个调查组,证明检举者诬告。

但是,所有调查组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姑息养奸,对诬告者没有进行应有的制裁。在娄底市养成了一个好人得不到保护、恶人得不到惩罚的恶劣风气,实际上纵容和鼓励了经久不息的窝里斗,终于酿成了一九九二年非法拘禁颜跃明这一恶性事件。

而且所有调查组都达到了一个共同的效果,就是把无辜者折腾得筋疲力尽,心灰意冷。

原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颜日衡敲开了我的门。

他是民谣里“杀掉六只鸭(颜)”的其中一只鸭。

因为他姓颜,因为他被列入了黑名单,所以在娄底市也受到了特别的“优待”。

一九八八年夏季,娄底地区正降大雨,杂交水稻种子严重欠收,娄底市委、市政府为此召开会议并作出决定发动广大干部群众利用各种关系,外出买种,并规定联系购回一斤新种子奖励一角钱,购回一斤陈种子奖励五分钱。

市农委主任梁经求得知颜日衡五叔是绥宁种子公司的书记,就动员颜去绥宁。

此行收获很大,以比较便宜的价格购回杂交水稻种五万六千八百四十斤,不仅满足了娄底稻种需求,还卖给了广西一部分,净赚了四万余元。根据绥宁种子公司的规定,颜日衡得到“信息费”四千五百元。其中给予娄底市农业局长六百元。

而娄底市不仅没有按照诺言兑现“信息费”,而且认为颜日

衡得到的“信息费”是贪污，市检察院立案，一九九零年四月三日以贪污罪逮捕，同年六月十二日又以“贪污罪免于起诉”。颜日衡不服上告，娄底地区检察分院经调查，于一九九一年五月八日认定：“颜日衡的行为不构成贪污罪。娄底市人民检察院以贪污罪对其免于起诉不当，应予撤销，作不起诉。”

然而有意思的是，市委、市政府置地检察分院的结论而不顾，于一年后的四月二十九日（就是颜跃明被监视居住的前一天），市委书记黄懿斌在迎宾馆礼堂宣布了开除颜日衡党籍，撤销副部长职务，行政职务降一级，工资降一级的决定。这一决定，使娄底市一片哗然。这明明是给颜跃明“陪绑”，杀鸡给猴看！这事要是说给经济比较发达地区的人去听，真会嗤之以鼻。

一九九二年，全国是大改革开放的一年，娄底却是大搞“阶级斗争”的一年，是大搞“城市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运动的一年。

搞经济不行，搞这套东西却得心应手。市电台新闻部主任金明正告诉我，社教运动期间，他们被要求学习毛泽东的“老三篇”和“新三篇”。

“老三篇”，文革的那一代人可能还记忆犹新，现在的年轻人就未必知道了。在此备述于后：《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

“新三篇”：《矛盾论》、《实践论》、《反对自由主义》。

我收集了一份娄底市委社教办一九九二年一月发的文件：《娄底市党政机关社教工作验收标准及实施办法》。验收实行百分制，不厌其烦地把一百分分解为五大类三十一种评分标准，里而从头到尾吸收了“文革”的精华，让你觉得似曾相识。

我从中摘取有意思的部分供大家欣赏：

宣传发动方面(15分)

召开了干部职工社教动员大会，动员面达100%(2分)。分别召开了骨干、党员、职工座谈会或其他形式的座谈会，广泛听

取了对搞好社教的建议和对领导班子的意见(3分)。广泛深入地开展了宣传发动工作,运用标语、广播、黑板报、墙报大力宣传社教的目的、意义,有适度的舆论声势(2分)。干部职工对社教形成了共识,普遍有了正确的认识(4分)。班子成员自学“七篇”文章,做好读书笔记,并写一篇心得体会,召开了心得体会交流会(4分)

专题教育方面(25分)

组织干部职工系统地开展了五课以上的专题教育,领导带头讲课(5分)。开展算账对比、现身说法、参观访问、调查研究、演讲比赛等活动,配合系统的理论灌输教育(3分)。专题教育覆盖面达单位总人数的100%(4分)。干部职工“两信”(注:指对社会主义的信心和信念),解决得比较好(5分)。一把手找班子成员谈心,并做好谈心记录(5分)。班子成员写好反思材料(3分)。

这些玩意儿,无论是走形式也罢,不走形式也罢,都在娄底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我们必须请一位生理专家来作一个定量的分析,如果把精力和热情都投入到学语录、写标语、听广播、办黑板报和墙报、造舆论声势、写心得体会、开心得体会交流会、算账对比、现身说法、参观访问、演讲、灌输教育等中去,哪里还有剩余的热量去干别的事情?

上级领导应该听到这样的汇报:娄底市没有一手软一手硬的问题。他们一手抓斗争,一手抓“社教”,可谓是家喻户晓,深入人心,非常过硬。今天,我们走到某机关,或许还能看到学习“老三篇”、“新三篇”的“心得体会宣传栏”的一页页稿纸,在寒风中被掀起来,满天飞舞着大话、空话、套话、假话等等构成的废话。

自一九九二年四月至一九九二年十二月,颜跃明还在被拘禁期间,娄底市发生了三件事。第一件是十月份赵伯栋市长调

任娄底地区公安处处长,主管全地区三百八十万人民的生命安全。第二件是在十月召开的娄底市第三次党代会上,市委书记黄懿斌仅以超半数三票的险境下当选,觉得面子上实在过不去,为此一直耿耿于怀。

在十月十五日市中心组学习讨论十四大精神时,黄书记作了长篇发言,直抒胸臆:“这次十四大精神的学习,要加强党的领导,只能有一个中央,一个声音。我们娄底完全违背了这个原则。今后市委、包括人大、政府各家,只能有一个声音,我黄懿斌在,必须听我的。这次党代会,我一个书记只得一百零三票,是本地人搞名堂。人大有搞名堂的,常委有搞名堂的,各部委、办、局,处级局级干部搞名堂。尽管搞名堂,我还是选上了,多了三票,我们感激这三位同志。本地人想当官,想把我黄懿斌选下去,但天不作美,我又当选了。我在这里,就不相信你本地人能翻天。涟源娄底人不信任我,不投我的票,省里批准,地区信任,地区领导要我干……我后悔过去太软。今后,我要以铁的手腕,搞名堂的,该撤的一定要撤,本地人想当组织部长、政法委书记,想得太美了,你们想当官,一个人也当不上。有些人讲,你有权,我有票,这次落选的干部,包括乡干部,我给地区说了,一定要比原来安排得更好一些。你有权不投我的票,我有权撤你们的职。一个也别想得到好处,我黄懿斌在娄底就得听我的……”

说到此,黄书记话锋一转,对着市建委党组书记邬秋恒说:“老邬你看是不是?这次有的单位选代表就不正常。这就是搞名堂。”

“黄书记,你问我这是什么意思?”

邬秋恒要求发言。他说:“娄底贯彻学习十四大精神,需要安定,需要团结,在娄底市这次党代会之后,思想上需要疏导。黄书记,今天你发言欠妥,欠冷静,胸怀不宽阔。俗话说,宰相肚里能撑船!至于选举的票数问题要从两个方面来看。至于投

票,我就没有投你的票,投了申庆华一票,但你值得反思。”

听到“反思”二字,黄书记拍案而起。

“黄书记,你怎么要打巴掌,要打人!”

黄书记又在桌子上响响地拍了一下,说:“我就是要这样,就是要报复。看你邬秋恒怎么样!”

接着又狠狠地拍了三巴掌。

会议在这种气氛下不欢而散。

黄书记的一番话,实际上从另外一方面反映了娄底政治生活不正常的状态。

……

第三件事,颜跃明没有想到他所在选区的选民推选他为市五届人大代表候选人,并在他获得自由后的第三天,以所在选区内的最多票数当选为人大代表。在市五届人大上,他又当选为湖南省第八届人大代表。当宣布这一结果时,会场代表为他长时间热烈鼓掌,很多人走过来跟他握手,拥抱。

颜跃明热泪盈眶。他深知,这种结果,是娄底人民给他的最高奖赏。他以人民代表的名义面受难,今天,人民又对他所遭受的苦难给以最大的安慰。这时,他朝主席台望去,从右往左数的第七个位置,空荡荡无人,黄书记已静悄悄地走了……

赵市长开溜,调任地区公安处长;黄书记为勉强当选发火;颜跃明撤销案件并被选为省、市人大代表,这三件事情就是这样奇妙地胶着在一起,为一九九二年的娄底政治生活划上了一个句号。一个令人慨叹不已的句号。

我要走了。

我提出要去颜跃明家看一看。

还是那个雨夜,先去娄底师专参观地牢,尔后到颜家。

分房子的时候,他是皮革厂厂长,他把好的楼层分给了职工,自己住上了冬冷夏热的最高层。

两室一厅，家徒四壁。原来省市给他的承包奖，他都捐给了厂里办幼儿园和青年之家。墙上几个大镜框十分显眼，里面是一九八五年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全国新长征突击手、全国优秀青年厂长经理和一九八八年全国青年企业家协会常务理事会的合影，还有湖南省委书记毛致用参观皮革厂的照片。

客厅里的吊扇油漆剥蚀，锈迹斑斑，长沙发裂了个大口子，海绵被吐出来。

那台被怀疑可能是受贿的电冰箱，还是等外品，边上喷漆脱落，颜妻用油漆补了一块，像贴了胶布一般难看。

颜跃明要送我去长沙。临出门，妻子在他的黑提兜里塞满了告状材料。他掂着兜，苦笑着解嘲说：“原来上省里提的是改革方案，现在提的是告状信。”

他认为，专案组的人今天还在耀武扬威，赵市长现在官居公安处长，目前的状况与娄底人民的情绪相距甚远。这样的结局不公道。这件事情如果发生在“文革”期间还情有可原，可它发生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发生在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后，这是不能原谅的！他身上揣着有娄底市一百一十四名科局长以上干部署名的《强烈要求对非法拘禁、报复陷害省市人大代表颜跃明及其他无辜公民的赵伯栋追究刑事责任的报告》，说，省里告不准，还要去北京。别说是人民代表，就是普通公民，这种状况也决不允许！

湖南民风强悍，举世闻名。清末，太平天国势如破竹，南京定都，称雄天下，然而，湖南凭空杀出一彪人马，便平定了疆土社稷，延续和支持了大清江山。一百多年来，湖南英雄辈出，攻杀不断，世代怨仇不解，从未间断过用最极端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和矛盾。

这块播种着仇恨的土地，能长出和睦相处、亲善友爱的庄稼吗？在旧的体制下，谁敢保证别的地方不发生类似事件？

娄底，相传是二十八星宿中的娄星和氐星交相辉映的地方。有人说娄星和氐星是煞星凶相，也有人说它们是福星高照。到底是祸是福？

娄底的故事还远没有讲完。二月二十四日凌晨，寒流来了，漫天都是雪片。我们匆匆赶路。我在风雪中与饱经磨难的娄底城告别。我有一种强烈的预感，较量并没有结束，我还会回来，无论是怎样的结局，我都会回来。我相信，我还会为我这篇报告文学写一个可能是悲剧可能是喜剧，也可能是悲喜交加的长长的续篇！

一九九三年四月北京木樨地

2

4

1

讨个说法 “以人民的名义” 续篇



惩恶扬善、伸张正义、因果报应、出口鸟气的好莱坞式结局，在生活中，往往是一种良好的愿望和美丽的期待。

世纪末感言

调查湖南娄底“颜跃明事件”属报社派遣，但是七千字的调查报告“二百一十四天的较量”写出来后却被“枪毙”，后在《经济日报》一九九三年“两会”讨论两院报告期间全文发表。可能是因为“兔死狐悲”、“物伤其类”的感受，与会代表反响强烈，纷纷质询湖南代表团。这是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以人民的名义》在《当代》当年第三期发表，发表后，即在海内外引起轰动。在《当代》主持召开的作品讨论会上，我说，我将以“连续报告”的形式写出《以人民的名义》续篇，因为事件远远没有结束。与会者颇惊讶，因为报告文学写作往往都是一锤子买卖，特别是揭露性的题材。

续篇在当年《当代》第五期发表时，事件仍没有了结。于是我在文章的结尾处告诉善良的读者：“惩恶扬善、伸张正义、因果报应、出口乌气的好莱坞式结局，在生活中，往往是一种良好的愿望和美丽的期待。”

——作者

娄底的故事还远没有讲完。二月二十四日凌晨，寒流来了，漫天都是雪片。我们匆匆赶路。我在风雪中与饱经磨难的娄底城告别。我有一种强烈的预感，较量并没有结束，我还会回来，无论是怎样的结局，我都会回来……

（摘自《以人民的名义》）

—

颜跃明要上路了。他要上省城讨个“说法”。

他抚摸着这辆四处漏风的北京 212 吉普车，万语千言都咽在喉咙里。这辆破车是他这个原娄底市二轻局局长兼党组书记的专车。本以为，今生今世见不着这位曾跟他同甘共苦多年的老伙计了。在囚禁地备受煎熬的日子里，多少回梦见它孤苦零丁，长嘘短叹，失却了往日的风采；风吹雨打，烈日曝晒，漆身都剥落了，一副锈蚀斑斑的面孔，看上去令人心碎！车头两个大灯，像两只瞪得大大的眼睛，那种软弱、哀怨和无能为力的神色，显得那么陌生。以往可不这样，车破是破点，但有股子犟劲，只要一加油，它便毫不犹豫，一往无前。去年罢免市长案后的一个晚上，颜跃明驾车一出院门，就被盯梢了。也是辆北京吉普，像只臭虫粘在后面，怎么也甩不掉。一怒之下，他把大灯全关了，仗着路熟，一片漆黑往前开，借着月光，看见路边有树林，一闪身，钻了进去。等那只“臭虫”左顾右盼开过去后，他打开车灯，开足马力，“轰”地一声拱出树林，抄了条近道，赶在“臭虫”的前

面,迎头冲上去。逼近了!更近了!快撞车了!双方都狠狠地刹车。“吱——”凄厉的摩擦声,撕裂了寂静的夜空。他摔门下车,叉着腰,不说话,与没关的大灯一块,怒视着对面车里猥猥琐琐的盯梢者。“臭虫”开始退却了,然后倒车,转身没趣地溜了。堂·吉珂德没了对手,那将是怎样难堪的局面呢?

颜跃明必须永远寻找对手。

二

颜跃明要上路了。

他知道在这块土地上讨个“说法”的不易。他知道此行的漫长。

全国人大、全国高检、公安部、各大新闻单位、省长省委书记、省人大主任副主任、省政法委、省高检检察长副检察长、省委省政府办公厅、地委书记、行署专员,几乎都控诉遍了。他已经东借西凑,送了上万元的材料给有关领导和部门。他与所有娄底人一样,曾为湖南省人大和湖南省委两个庞大调查组的先后到来面欢欣鼓舞。本以为,曝光已有八个多月,令全国舆论大哗的“非法拘禁人民代表颜跃明案”,早该永落石出,早该“有个说法”。然而,盼星星,盼月亮,这个“说法”始终盼不来。

一九九三年三月,全国八届人大会议期间,《经济日报》详细报道了“颜跃明案”。见报后第二天,湖南省长陈邦柱即向首都几家新闻媒体的记者发表了公开谈话,保证说:颜跃明案总“要有个说法”。陈邦柱的谈话见报后,“要有个说法”旋即在湖南成为一句名言,一句口头禅。无论是到省地市找哪一级领导找哪一个部门,无论是原“颜跃明专案组”的头儿,还是被害者当事

人,结束语都是“要有个说法”。

然而有趣的是,由于在“颜案”中所处的角色不同,由于处理“颜案”所站的立场不同,由于该案的错综复杂,牵涉面太广,更由于该案和处理该案暧昧不清和扑朔迷离的内幕、背景,使得这句在书面语上没有任何色彩或者只有陈邦柱一种语态的“口头禅”,变得千姿百态,色彩纷呈。有的推脱,有的搪塞,有的抵触,有的戏谑,有的调侃,有的无奈,有的侥幸,有的神秘,有的不解,有的迷惑,有的期待,有的焦急,有的愤怒,有的悲哀……“要有个说法”在湖南娄底成了彻头彻尾的语言游戏。谁都没有说法,又似乎谁都有个说法,总让你感觉其中有一种东西窥视和左右着事态的发展,而这种东西,你却看不见,摸不着。

然而,无可辩驳的事实是:颜跃明因“罢免市长案”被非法拘禁了二百一十四天!颜跃明及许多当事人,或遭到专案组的非礼和野蛮待遇,或遭到专案组的刑讯逼供。省人大和省委的两次调查,作者两赴娄底采访,专案组的主要领导人,虽然对某些事实的程度和定性看法尚不尽相同,有些细节尚待司法认定,但是对主要事实的认定却是基本一致的。

那么,为什么事实已大白于天下,事情却得不到妥善、有效和及时的处理呢?两个政治局委员、一个书记处书记兼中央政法委书记批示,省里两次高层次大规模调查,全国高检院和省高检院多次复核,对于处理一个县级市的科级干部的案子来说,其规格和规模,无论是湖南还是全国都是绝无仅有的。可以说是兴师动众,不亦乐乎!可是为什么,一边轰轰烈烈,一边冷冷清清,案件过程如此清楚明了,却久悬不决呢?

更奇怪的是,一边是受害者喊冤不已,一边却是冤狱的制造者在大会上作“典型经验报告”,在电视和报纸上大出风头,得到提拔重用,耀武扬威。

“说法”在哪儿呢?难道这种现实就是湖南和娄底的“说法”

吗?!

我第二次来到湖南时,多少有些茫然。

颜跃明作为本案的受害者,更是茫然。市委市政府已经给他安排了个头衔,但是一直没有到位。此案没有结果,他决不罢休。

陈邦柱省长在报纸上说“要有个说法”。颜跃明要上省城讨这个“说法”。

他开着吉普车上路了。

四月的春风,带着一丝儿清凉一丝儿温暖,逗弄着堂·吉诃德和他那又老又瘦的坐骑。机器又开始漏油,跑几公里就要停车加油。离合器又不好使了。颜跃明气得下车抽支烟,没抽几口,猛地扔掉,冲着车头就踹。踹两脚,能走个十里八里路,不踹不走。他就这样连打带踹走走停停一脸晦气地蹭到了一八十里外的长沙。可一打听,陈邦柱去了娄底的双峰县,刚好走岔了。他的起始点,正是他的目的地。他掉转头往回赶。

他隐约地感觉到,他已经陷入一个永无休止的逻辑怪圈。

本来,逻辑是这样演进的:

在今年三月全国人大八届一次会议上,“颜跃明案”内部通报见报后,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法委书记任建新批示:“请清泉同志批处。”

湖南省委书记熊清泉接到批示后,即在会上打电话给在家主持工作的书记,要求由省政法委副书记带队,组成一个由各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的高层次调查组,赶赴娄底,重新调查“颜案”。十一人的调查组,绝大多数都是厅局级以上的干部。从此,处理“颜案”在湖南出现了一边倒的情况。

省人大说:我们的态度非常清楚,我们的调查已有明确的结论,具体处理要问省委调查组。省高检检察长说:现在省检察院独立办案已不可能,最后怎么处理,要“交省委批准”。而省委书

记熊清泉、省长陈邦柱明确告诉我们说：“颜案”的处理要由娄底地委拿一个意见，提交省委批准。

地委的意见如何呢？

有人为地委的意见编了四条谜语：

一、“我刚来不了解情况。”

二、“我已经不管这个问题了，现在管经济工作。”

三、“我现在没权。”

四、“太复杂，不好办。”

四条谜语打地委四位领导人的名字。

六月二十二日上午，我们采访了娄底地委书记曹志斌、地委常务副书记丛树英、地区人大联络工作委员会主任蒋育民、地区政协联络工作委员会主任陈春林、地委秘书长彭济渤。得到的答复是：颜跃明案“立案”，地委没有集中讨论过，省里来了两个调查组，已经直接插手此案。硬要地委拿个说法，作出结论是困难的，我们要等省委的意见。

省里要地委先拿个意见，地委又理直气壮地说要等省里先拿个意见，到底谁先谁后，始终纠缠不清。这有点像“到底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省里想的是鸡生蛋，地区想的是蛋生鸡。

“拉大锯，扯大锯，姥姥家，唱大戏……”我们也陷入了湖南充满玄机的逻辑怪圈，搅得不胜烦恼。在这里，重要的已不是人民代表和公民的权利是否受到粗暴的践踏、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否受到极度蔑视，重要的也不是打击报复、刑讯逼供、非法拘禁是否成立，谁来积极地维护法制的尊严和人权的尊严……而是争论谁先迈出第一步！

从颜跃明一九九二年十二月一日出狱开始算起，一拖便是九个月！九个月中好像娄底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好像时间可以证明打击报复、非法拘禁、刑讯逼供乃是天经地义，好像权力

的魔杖可以化腐朽为神奇！

迹象是非常清楚的：各级领导摆出了一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冷处理”的架式，摆出了一副打持久战拖下去的架式。好像谁说了都不管用。

真是令人哭笑不得。

三

颜跃明怎么不上火呢？

省委调查组来娄底，似乎带了“说法”或“框框”，而且一来便拽上了娄底地委，调查组中有一位地委政法委副书记任副组长，要见的人都由地委办公室安排。

调查组一上阵就尴尬。

找颜跃明谈，颜的第一个要求就是“地委政法委副书记与赵伯栋的关系非同一般，必须回避。”

找市公安局局长李伯林谈，李的第一个要求也是要这位副书记回避，“否则一句话都不讲”。而且这个高级别的调查组与省人大调查组工作程序明显不同。

后者调查的时间长，范围广，接触人多。即使如此，组长、省人大任免和代表权益工作委员会主任孟繁志跟我说：“我们的工作程度还不够深，有许多情况还要作进一步的调查，才可能有定论。”

而前者，在调查过程中似乎有个原则，非地委办公室安排的人员不见。首长们怕陷人纠纷的泥潭，怕直接面对哭哭啼啼、悲痛陈述的受害者，于是，在地委设置了一道闸门。

地委倒是乐于如此。这道闸门不仅有截流的作用，更有过

滤的作用。

调查组工作了七天，只接见了颜跃明这一个受害者！“颜案”受到株连的几十个受害者都被关到了大门外！显然，他们不想听这部分人的冤情和控诉。

因此，在娄底地委招待所出现了受害者围追堵截调查组的荒唐而滑稽的局面。

不知道调查组住在哪间房子里，楼层服务员显然事先打了招呼，对此保密。受害者不管这一套，大概知道了楼层后，就挨着门敲。

“你是省委调查组的吗？”

“不是！”

说“不是”的中年人出门时，楼层服务员悄悄地指着那个人的背影告诉受害者：“那个就是省委调查组的××长。”

推开门进去。里面坐着几个人。

“你们是调查组的吗？”

“不是。我们是司机。”

“调查组的同志在吗？”

“不在。他们都去双峰县了。”

楼层服务员又悄悄告诉受害者：“他们没去双峰县。他们在一个屋子里开会呢。”

听说调查组已圆满完成调查工作，准备打道回府。许多受害人急了，一块去堵，一定要调查组接见，面陈冤情。

还是不见。他们就闯进屋去。他们也不问对方身份，逢人便谈。说到痛切之处，便跪下恳请“要听听受害者的情况，不要只信一面之辞”。悲泣之声，令夜空颤动。

调查组漠然。

“你们不要跪。起来起来！现在说我们不听，有材料给我们留下，没材料回去写材料。要谈话，去找地委办公室的杨科长，

由他们安排。”

看来,首长们习惯于看现成的材料办事,而且习惯于在他们的周围安排屏障保驾,或者,他们把受害者喊冤,看作是非组织非程序的阴谋也未可知。

有受害者愤怒地说:“就是在封建社会拦了宰相的八抬大轿,宰相也要升堂呀!”

也许调查组并没有意识到,“颜跃明案”可能是中国新时期十几年来针对人民代表非常严重的一次打击报复!可能是中国近些年来最大的冤狱!

看看给调查组跪下的是哪些人。

周吉贤,娄底市金属塑料制品厂厂长,私营企业主。一九九二年三月十八日地检分院立“周吉贤贪污案”,与“颜跃明案”平行审理,十二月下旬以贪污罪不成立而撤案。他被剥夺人身自由达八个月之久!原因很简单,金属塑料制品厂是市二轻局的下属企业,由周吉贤入手突破颜跃明的问题。周吉贤在八个月的监视居住期间,倍受凌辱,企业损失上百万。

廖利民,金属塑料制品厂办公室主任。

因为散发为厂长伸冤的“紧急呼吁书”而被拘留七十多天。其中有7天,他是在娄底师专的地牢中度过的。四面不通风,阴暗潮湿的环境,使他的腰腿关节受到严重损害,至今行走困难。

周海初,金属塑料制品厂采购员,也曾被长期拘留,妻子分娩而不能回家,受到了专案组粗暴对待。

还有很多受害者!

娄底市副市长杨沛林直言不讳地说:“调查组根本没来市里调查,在许多受害者堵上门的情况下,仍然将受害者拒之门外,这种工作态度显然不够公正客观,娄底市的干部群众对此当然不满。‘颜跃明案’,从性质上看,是权与法的斗争,起因是一九九二年三月底的‘罢免市长案’。”

杨沛林,五十岁,小个,精瘦,组织部管干部出身,为人为事谨慎,不多言语,眼睛里多观察。他在娄底干部群众伸张正义、主持公道营救颜跃明出狱的过程中,发挥了十分关键的作用。今年年初的换届选举,他在没有被党委提名的情况下,直接被代表选为副市长。我二月份初访娄底的时候,他对我的采访调查抱着相当审慎的态度,在整个采访过程中,跟他只有数句寒暄。这次,他向我打开了话匣子。

他说:“在事实没有彻底搞清楚前,我是不发言的。现在,我认为事实已经非常清楚。我认为原市长赵伯栋打击报复颜跃明的证据确凿。第一、市人大会议结束后,赵伯栋在市常委会上提出要查处罢免案;第二、市人大会议结束后,在没有立案的情况下,先入为主地抓人,甚至到外地抓人。赵伯栋还亲自打电话到娄底驻深圳办事处,指示若颜跃明到深圳,要先稳住,然后抓起来,并指示深圳办事处电话通知广州办事处;第三、在立案前的四月二十日,赵伯栋亲自批条给市经济技术协作办公室,要给专案组拨办案经费;第四、赵伯栋谎报军情,本来只有三千八百元的经济疑案,他向地区管司法的副专员阳花萼汇报说有二十几万元,又多次在大会上讲,此案是娄底建市以来最大的经济案件;第五、亲自指挥参与办案,在娄底到处抓人,前后审讯了六七十人,在娄底制造白色恐怖,搞得人人自危。当时紧张和恐怖的气氛,现在是难以想象的;第六、在审讯颜跃明的过程中,仍然追查罢免案的后台。”“调查组走了两个多月,到今天都没个说法,实在是说不过去。陈邦柱省长三月份说,总要有个说法,说法在哪儿呢?现在娄底的现状是,赵伯栋还是公安处长,五月底,地委召开全区中青年干部经验交流会,赵伯栋作为典型代表第一个发言,又上电视又见报。给外界的印象是:赵伯栋没有问题,不仅没问题,而且是个好干部。再者,搞刑讯逼供的人,至今逍遥法外,致使市公安局处于瘫痪状态。这些情况,调查组都了解

吗？”

四

市公安局局长、“颜跃明专案组”第一副组长李柏林支持杨沛林的观点。他说：“赵伯栋打击报复颜跃明案是事实。”

李柏林深知专案组内幕，但见他却不容易，他谁也不想见。他对省里能否公正处理娄底事件持悲观看法。他多次对我说：“你不要采访我了，我说的再多，你写的再多，人家不理睬你。没用！”我说：“什么事情总要有人去做，总要一步一步去努力。”他说：“我干公安工作已整四十年，今年十月份满六十岁了。凭我的经验，他们的势力比你们强，搬不倒他们。就是见报了，社会舆论再强烈，又能把他们怎么样！”

省委调查组来了，要约见他，他也拧着劲不去。

晚上快十一点的时候，他接到了颜跃明一个电话。颜说：“李柏林同志，我不想请你帮我说话，也不想为难你，只需要你凭着良心——一个老公安的良心，实事求是地讲出事实真相，对得起你自己，对得起你的子孙后代！”

“……”

李柏林不说话。颜跃明一番话令人动容。他深知其中分量。但是，他对这种官样文章式的敷衍调查心灰意冷。前段时间，女婿刘建宽告诉他，“外面对你有说法”，说他对“颜案”前后态度不一，见风使舵。他涨红了脸吼道：“有说法怕什么！他们知道个屁！”很多时候，他是有苦难言。他已年届花甲，湖南省公安系统像他这把年龄还在岗位上的老同志，可能只有他李柏林一个了！四十年的公安工作，他建功立业，多少荣耀，谁不知道

他李柏林？他身怀武术绝技，远近的地痞流氓闻风丧胆。他看上去不像六十岁的人，上楼下楼，行动敏捷，每根筋骨好像都在砧板和炉火中锻炼过，嘎崩嘎崩的。小小的瘦老头在前面疾行，仿佛稍不留神，他便会拔地而起，贴着屋脊瓦檐，化作一股清风。他不仅习武，而且尚文，有一手好诗文好书法，还是地区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娄底街上还能时常见到他题的匾额。胆大心细是他的特点。他对破案有一种职业的热情和快感。刚刚进入“颜跃明案”时也是如此。他记得很清楚，去年四月中旬的一天，他在岳阳参加省政法系统笔会，会议开完即接到省公安厅的通知，说市里通知立即赶回去，有重大案件要研究，已有专车来长沙接。晚上十点赶回娄底时，市委书记、市长等人已在“迎宾馆”等候了。说是“周吉贤案”有重大突破，周交待颜有贪污受贿的情况。市领导要求检察院或公安局立即采取措施，对颜跃明“立案收审”。虽说李柏林认为周的交待仅仅是线索，“不可轻举妄动”，但态度是积极的。第二天便去双峰县周吉贤监视居住地看材料，晚上十二点到市委书记家，与市委书记、市长和专案组的其他成员一起研究立案问题，一直到凌晨二点多。

这之后，只要是专案组的会，赵市长逢会就参加，参加就要作指示，介入的程度已远远超过了“市长”这个角色所应该介入的程度。李柏林觉得好生蹊跷。凭着他几十年的经验和敏感，判断此案必有猫腻。他能把住的只有一条：公安局不立案。因为在四月二十九日晚地检分院同意立案之前的所有会议上，检察院都不同意立案。市长和市政法委书记就说，检察院不立案，就交市公安局立，并压公安局：“这是市委交办的案子”。

“党委交办，公安局照办。但是贪污受贿经济案件，不属于公安局，属检察院。立即收审也不符合有关规定。”李柏林不敢硬抗，但仍在据理力争。

“证据不充分，此案检察院不能立，要立公安立。”地检分院

态度强硬。

最后强行指令：由公安局办立案手续，并收审颜跃明。

结果李柏林一直拖着不办，僵持几天后，把地检分院撵上了架，才把他解脱出来。“立案”和“配合办案”，性质上有天壤之别。他已经做到了一个公安局长所能做到的一切。

由此，他开始失宠。他告诉我，“专案组中有专案组，专案组外还有一个核心”。他虽说在名义上仍是第一副组长，但已远离了实际操作的权利核心。

然而，他们低估了这位公安局长。

这位貌似一介武夫、永远黑着脸说话的公安局长，有一种癖好：记日记，几十年不辍。重要的事情，无论多晚回家，都要记下来备查。“这个习惯是一九六三年学习雷锋时开始的。”他说，“目前已有日记36卷。”

不动声色地听，不动声色地说，不动声色地记，成了李柏林独特的工作方式。

对颜案自然也不例外，因此，他是重要的知情者。

颜跃明的几句话，深深打动了。他连夜把日记本准备好，第二天带到调查组，往会议桌上一摊：“全部东西都在这里了。我们谈！”他说。

不过他仍然固执地断定，调查组不能解决问题。他对所有在场的人说：

“我已经谈了好几次了，再谈也起不了什么作用。你们解决不了问题。你们是带着观点来的，不过是为了应付颜跃明。你们是官官相护。颜跃明的能量远远小于赵伯栋！”

五

颜跃明对“冷处理”的局面早有预料。

他不是那种没有任何政治经验随便就能哄住的人。十年的大风大浪,把他磨炼成了折不断、砸不扁、捶不烂的橡皮人。折腾和被折腾,早就成了他的生命状态。斗争残酷到如此程度,都没有把他搞垮、搞死,真是奇迹。换了别的人,早就在娄底这块土地上化作灰烬化作肥料了。他精力旺盛,天生好胜好斗,他斗别人,别人也斗他,谁都能与他结盟,又谁都能抛弃他。七斗八斗,两败俱伤。娄底的许多重大是非,往往与他有关。他已经陷入了是非泥潭而不可自拔。连赵伯栋都因此对他抱有同情。赵说颜“十年来,没过过一天好日子”。他的神经永远绷着,思想永远保持着高度警惕的状态。我们住长沙蓉园宾馆,一天,在餐厅吃晚饭,刚吃了一半,他在我的对面,悄悄给我使了个眼色,示意我跟他一块出去。出餐厅大门,他警惕地巡视了一下四周,然后神秘地附在我的耳根上说:“我看见了赵伯栋的司机×××了。他肯定是赵伯栋专门派来监视我们行动的。我看见了他,他也看见了我。他赶紧溜走了。”后来知道,赵的司机是在蓉园租了房子办公司。突然,颜跃明又用一种很压迫的语气低声警告我:“你看见那辆黑色警车没有?”“哦,‘公爵王’。”我侧身看了一眼,漫不经心地说。“我敢说,他在监视我们。”他斜盯着那辆车。“至于吗?”我对这种一惊一诧颇不以为然。这时,缓行的“公爵王”擦身面过。警车走远了,颜才松了口气。他告诉我:“我什么时候都不会忘记观察四周情况。我睡觉时眼睛都睁着!”

颜跃明浑身都是眼睛，浑身都是警惕。完全可以想见他以往生存环境的恐怖。时刻都要警惕跟踪，时刻都要警惕威胁，时刻都要准备应付突如其来的变故。长此下去，怎生得了！看见他这种反常的精神状态，我的心里涌出一股酸涩。人怎么会被搞成了这种样子！可是毫无办法。谁要他是颜跃明呢？他已经穿上了红舞鞋，永远不可能停下来。他曾哭着对我说：“我怎么能停下来呢？那么多的人为了营救我，花费钱财，四处奔波，我对得起他们吗？！我七十多岁的老母亲，我十一岁的女儿，我爱人，老少三代为了替我伸冤，到处给有权有势的人下跪磕头。我女儿哭着喊：‘叔叔伯伯，救救我爸爸呀——’我对得起她们吗？！特别是想到母亲和女儿……”

到了这种份上，颜跃明在很大程度上已不是他自己了。他知道自己处境，可他必须永不停息地去抗争。虽然这种抗争对于他本人来说，具有深刻的悲剧色彩。

六

我有关娄底的文章在《经济日报》见报、报告文学在《当代》一九九三年第三期发表后，几个月来，我的办公桌上从未断过娄底寄来的油印材料。拆开信封，便有一股新鲜的油墨味儿扑鼻！

三月底，寄来了娄底市一百多名共产党员、科局级干部的“再次强烈要求对非法拘禁、报复陷害省市人大代表颜跃明及其他无辜公民的赵伯栋追究刑事责任的报告”。

四月底，收到二十五名受害者具名的“强烈要求对非法拘禁、刑讯逼供无辜公民的犯罪分子唐铁军、左友发、彭济平、罗贵华予以撤职立案收审的报告”。

娄底市人民代表谢永根、曾巨龙、黄秉均、徐正初、贺朝生打来了电报。电文称：“人民代表颜跃明遭报复陷害，（被）非法拘禁二百一十四天。我们强烈要求上级排除阻力，保护人民代表的合法权益，迅速将主犯赵伯栋、××撤职隔离审查，以平民愤。”

又收到娄底市人民代表黄秉均等及干群一万人的电报。电文称：“原娄底市长、现地区公安处长赵伯栋报复陷害人民代表颜跃明，引起全市人民公愤。省里三次调查，不了了之，使赵（伯栋）逍遥法外。我们多次上告无效，定于五月初依法游行，并集体赴京上访，以求上级迅速严惩赵伯栋。”

五月初收到颜跃明“关于再次强烈要求上级严惩犯罪分子赵伯栋，××的报告”。

娄底市一百多名共产党员、科局级干部“强烈要求对报复陷害改革者、人民代表的赵伯栋绳之以法的再次报告”放在了我的桌上。

六月中旬，又收到娄底市一百八十二名科局长和厂长经理“强烈要求对报复陷害、非法拘禁、刑讯逼供人民代表，蓄意制造冤案的赵伯栋、唐铁军等人依法惩处的再次报告”。报告云：

“有关颜跃明被报复陷害、非法拘禁和刑讯逼供的事实材料，我们和颜跃明本人已多次呈报中央、省、地、市领导。《经济日报》，《法制日报》等数十家海内外报刊先后披露、转载了这一案件的一些事实。中央、省、地领导也多次指示严肃查处此案。从颜跃明被非法关押至今已有一年多时间，我们和颜跃明本人先后数次上京，数十次上省向有关领导和部门呈报冤情，省有关部门也先后三次派出调查组调查此案，并答复一定要严肃处理。”

“事实胜于雄辩，证据昭然于世，为维护国家法律尊严，维护党的威信，理应迅速从严从重处理此案。但时至今日，冤案制造

者赵伯栋依然位居公安处长职位,依然利用手中之权恫吓证人,威胁群众,此中原因,主要是省地个别领导在制造颜跃明冤案上负有领导责任,因而故意歪曲事实,设置障碍,搞阳奉阴违,表面上应付要给赵伯栋等从严查处,还事实以公道,而背地里却不惜以国家法律,党的原则、人民的利益作交易,徇私枉法、包庇罪犯。我们始终是十分理智的态度,相信党的领导,逐级向上级反映,避免发生有损党和国家形象的事情。但是,我们认为,在颜案上,个别领导对我们和受害者的正当要求置若罔闻,并使用多种愚弄和欺骗手段,对犯罪者采取了包庇纵容的态度,对中央和省委、省人大领导的指示和国家法律公然藐视。我们要求严肃处理赵伯栋等人,是为了维护国家法律尊严,是为了伸张正义,是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为此,我们再次强烈要求对制造这一特大冤案的首犯赵伯栋、主犯唐铁军、左友发等人立即依法予以严惩。否则,我们将再次集体上访省里和中央,并将采取多种方式呼吁社会各界予以广泛支持和声援。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七

绷得太紧了!

延宕! 拖沓! 沉默! 僵持!

久久没有说法,娄底人的忍耐已达到了极限! 理智的防线,像一座超负荷水坝,随时都可能崩溃!

绷得太紧了!

八

我们处理社会危机社会矛盾,往往束手无策,往往采用斗争和对抗的极端方法,有些人往往在“黑箱子”里密谋,缺乏应有的回旋和弹性,缺乏应有的规则、程序和透明度,结果只能是加深危机,激化矛盾。

九

娄底原是个个人杰地灵的地方。

“北有行知,南有陶龛。”当时与陶行知先生齐名的伟大教育家罗昶重先生,此刻正安睡在娄底城东四十里涟水河畔一块干净的土地上,静静地听那白鹭掠过时空旷而寂寞的鸣叫。

一九二零年,罗昶重先生自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西方教育,毕业归国,即拒绝高官厚禄和大学教书的诱惑,继承“陶龛学校”父业,来到娄底西阳白鹭湾这偏僻乡村,踏踏实实地进行乡村基础教育实验,笃信“教育救国”,凡三十年而不辍,在全国享有盛誉。

陶龛学校就在河的对面,三层楼顶高高地矗立着两个大字,彪炳陶龛校训:

“血性”。

一湾碧绿的河水,稻田中耕作的农夫,摆渡的船工,背着书包的儿童,阡陌桑田,茅屋修竹,偶尔传来几声鸡鸣狗吠……在

这桃花源般的境界里，我可以用心来聆听娄底先贤半个世纪前的教诲。

什么是“血性”？怎样才叫有“血性”？那就是“非常本色，非常老实，一是一，二是二，心地光明，行为正大，决不虚伪，决不扯谎，决不欺诈，决不取巧，决不做阴谋；做错了事，能自己承认，决不嫁祸于人；答应人家的事，决不失信，决不失约”。“血性的人，富于牺牲的精神，见义恐后，见利恐先，能刻苦，肯负责，对公家的事，能尽心竭力去做，他人有急难时，能尽力去救助；只要是信之所在，仁之所存，便一往无前，赴汤蹈火，百折不挠，决不畏难，决不退缩，也决不怕失败”。

再看看先贤乡村基础教育的方针：

“解放儿童”，

“尊重儿童”，

“信任儿童”，

“服力儿童”。

我们面对先贤，只有惭愧。敢问吾辈中，有资格与先贤对话者，能有几何？

我实在是不理解，为什么“陶龛精神”几十年来没有发扬光大？为什么罗舫重先生一九五零年自沉于陶龛学校内的水塘？或许他看见了未来人们不可超度的深重罪孽，而对不肖子孙们彻底绝望？

我实在是不理解，这块诞生了陶龛教育思想的圣地，民风怎么会如此强悍，人们怎会如此好斗，学校怎会构筑“地牢”，是古来禀赋如此呢，还是几十年“阶级斗争”训练的结果？娄底如此狭小的空间，怎么能包容这么丰富的内容：文治和武斗、智慧和愚昧、诚实和谎言、博大和狭隘、宽宏和残忍、仁义和野蛮、坦率和虚伪、光明正大和阴谋诡计……大拥挤了！太奇特了！

娄底人实在是辜负了这般美丽的大好河山！实在是辜负了

先辈的教诲！

我望着罗先生的塑像。我知道他在想什么。他把一切都看在了眼里。他不说话。他在苦思冥想。他眼神安然，可是安然的背后又有几分惶惑。风清月朗、万籁俱寂的午夜，他的心在涟水河畔哭泣……

十

想轻松一下么？想躲开是非烦扰么？青山绿水，桃源仙境也不可能轻松。“现实”像个眼睛发绿的魔鬼，永远窥探着你跟踪着你，逼迫你时时刻刻都必须面对它。

十一

有人敲门。

我在等待着这次敲门。说实话，我有点忐忑。这种敲门声，总感觉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威胁。这让我想起了去年八月三十日晚，市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童耀文深夜里赶写为颜跃明伸冤材料时，那八次不明身份者惊心动魄的敲门声！来人是娄底地区检察分院副检察长、“颜跃明专案组”组长刘松平。这是一个在我的梦中多次见过的人物。

梦中的场面让我惊悸。专案组长带着许多横眉竖眼的打手，想抓谁就抓谁，想关谁就关谁。夏天的审讯室，生着一个大火炉，炉膛内发出“咕噜咕噜”的奇怪响声，像是一个饿鬼肚子里

的鸣叫。火苗飘出来,从里面变幻出无数只灵巧无比的长长的蓝舌头,恣肆地舔那些早就缩成一团的无辜者的脸。审讯室里还有老虎凳,奇大的老虎钳,手动简易升降机,油腻的铁链子泛着贼光。贴墙有个大冰柜,光着大膀子的打手,不时地取出“可口可乐”易拉罐,“噗”地拉开,紫黑的气泡猛地冒出来,血一般地仰脖灌进肚里。流到嘴角和胸膛上的“可乐”,顷刻间由紫黑变作了猩红。屋里还有一个电钻模样的器械“嗡嗡”地响着。“你们不说也没用,看见这东西没有?这是世界上最先进的高科技产品,我们想得到什么就能得到什么……!”突然,我看到专案组长朝我走来,一副凶神恶煞的模样,向我逼近,向我逼近。我想喊,喉咙被堵住了;我想逃跑,一双脚像是生了根,一丝一毫都挪动不了;我要推开他,可两支胳膊根本不听使唤……

我的梦来源于潜意识中的深深恐惧——一种有可能被剥夺自由、命运在别人手里把玩的恐惧,一种听天由命、任人宰割、任人蹂躏的恐惧。

十二

有人敲门。

“请进。”

刘松平进来了。

看见他的第一眼,便让我大松一口气。这位专案组组长的形象与我的想象大相径庭。

这是个四十个多岁的中年汉子,个子矮而敦实,黝黑的脸上带着和善和诚恳,听别人说话时,很有耐心;自己说话时,尽可能地把握着分寸和节奏。他多少有点不自然。他努力地让脸上浮

出微笑,努力地保持着某种矜持和尊严。当然,微笑和矜持却掩盖不了他内心的紧张。大家毕竟是第一次见面。这种场面,他是绝对没料到的。他万万没有想到,市委市政府如此支持的“颜跃明案”能出现这般戏剧性的效果来,在娄底在湖南在全国引起轩然大波;万万没有想到,一个“要人有人,要钱有钱”、条件优裕、涉及一个小小的科级干部的案子,办得那么困难那么糟糕,真是没吃到羊羔肉,惹了一身羊臊臭。他一九八零年调动到娄底地区检察分院工作,此前在湘潭大学教物理,在讲究学历的一九八三年,三十岁刚出头,以其学历和干练,由一般干部提拔为地检分院的副检察长,可谓是“少年得志”,颇引人注目。由大学物理老师而转业搞检察工作,副检察长任上也干了整十年,虽不能说春风得意,也说得上是顺顺当当,办案从未有过大的失误,如果没有大的变故,完全可能再往上走。可这“颜跃明案”,毁了他的前程。在他必须面对现实的时候,在他必须面对所有的调查人员的时候,在他必须面对社会舆论的时候,这个大学物理老师向我发出了哀叹:办颜跃明一案,胜读十年之书!可能物理学本身帮不了他什么忙,可是物理学研究中所遵循的方法和原则,尊重事实、坚持真理的科学态度、严格推理的逻辑思维,按理说都可以把大学物理老师与检察官两种社会角色联接起来。我们甚至可以说,前者为后者提供了其他检察官都可能没有的得天独厚的条件。非常遗憾的是,我们看见了大学物理老师与检察官之间不可弥合的人生断裂,看见了两个刘松平,看见了由此而带来的严重后果。

在制造颜跃明冤案过程中,地检分院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一九九二年十月,给赵伯栋市长腾出了“地区公安处长”职位的现任地检分院检察长赵光华,因为与本案没有直接利害,所以说话直言不讳:“我一上任就不能回避颜跃明案,放与不放,必须要有明确的态度和意见。检察院办颜案有深刻的教训:一是

立案不慎重。事实证明案件拿得不准；二是据我了解，立案和对颜采取措施，与市人大联系过，虽然发过话，表过态，但是没有及时履行法律手续。对人大代表进行立案审查，必须经过人大常委会批准，这是有法律规定的；三是案件抓得不紧，时间拖得过长。事实证明，办案时间拖得越长，问题越大，给当事人的身心损害也越大；四是经济问题立案，但是抓不到后又涉及所谓流氓问题，而流氓问题属于公安局管，查不查是分安局的事情，我们检察院不该管。这方面，我们处理不妥当；五是办案人员比较多，比较杂，对保证办案质量、保证司法程序带来了困难，也难免出现办案失控情况；六是案件进入一两个月后，经济问题无法认定，这时应该有个意见，但是处理不果断，失去了机会。所以，我一来，就摆在我面前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到底是抓还是放？我的意见，早放早主动，迟放迟主动。”

问题不在于“抓”还是“放”，而在于，为什么在事实没有拿准的情况下匆忙立案？为什么知法违法，在人大常委会未履行法律手续的情况下，任意剥夺人大代表的司法庇护？从专案组动用的人力、物力、财力来看，从在较短的时间里便涉及了近百当事人来看，从赵市长在全市所造的舆论来看，案件不可谓抓得不紧，可为什么拖了近八个月没有结果而又不放人？地检分院越俎代庖，不仅替代市检察院办科级干部的经济案，而且替代市公安局或者说与市公安局联合办“流氓案”，这种积极性是怎么调动起来的呢？这些问题都必须找专案组长刘松平来回答！

刘松平也不得不苦笑着承认，颜跃明案中的“巧合”太多了，以至他今天都难以解释清楚。一九九二年三月十八日，地检分院与市公安局同天立了针对颜跃明的“周吉贤贪污案”和“匿名信案”；三月底“罢免市长案”后又在各种力量的活动和压力下立了“颜跃明案”，这些仅仅是“巧合”吗？

我曾非常认真而慎重地了解和分析了刘松平在立案前后的

态度。我问他：“我不明白，就在四月二十九日晚地检分院决定立案前两天和之前的所有会议，你都不同意立案，为什么两天后，立场就迅速转变了呢？”

他思考片刻，说：“我认为证据不足，数量偏少，要求公安局继续补充材料。四月二十七日会议后，公安局李柏林补充了新的材料，颜跃明贪污受贿数额有所增加，所以我同意立案。”

然而事实是，拿颜跃明说事儿的是三千八百元，立案还是三千八百元，最终撤案还是拿不准的三千八百元，何谈“增加”？在数额没有实质性突破的情况下，两天之内就改变了态度，值得我们深深思量。压力？交易？

再者，“罢免市长案”与“颜跃明案”有着明显的关系，赵市长非常深地介入颜案，这在娄底，妇孺皆知。“为什么不要赵市长回避？”我问。刘松平说：“立案前不知道有罢免案。”

这说得过去吗？

从“罢免市长案”到“颜跃明案”立案，中间整隔一个月，“罢免案”作为娄底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成为市民街谈巷议的主题。如果是远离城市的偏僻农村倒也罢了，对于深入其中办案的检察官，对于几乎每天与地、市机关打交道的人，说是“不知道有罢免案”，实在是情理不通！而且颜跃明在双峰县第一个拘禁地就单独跟他介绍了罢免案的渊源和对赵伯栋打击报复的看法。那么，为什么要回避这个问题呢？

结束采访的时候，刘叮嘱说：“对我的讲话，一定要尊重原意，不能断章取义。”

我非常郑重地说：“这是起码的职业道德！”

我的回答等于在问：你有起码的职业道德吗？你敢于面对事实面对自己吗？

十三

“颜跃明案”对于刘松平来说，真是一场心灵的炼狱！

他与动员各种力量欲置政敌于死地的赵伯栋不同，与专案组的副组长李柏林、邹洽岭不同，与那些目无法纪的打手更不同。他是大学物理老师，知书识礼；他是副检察长，懂政策，懂法律，是司法的执行和监督者。可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些在办颜案的过程中，都没有成为他的长处。地检分院的分工中，他负责反贪局和法纪两摊工作，加上他又具体负责了“周吉贤案”和颜的调查，上面就把“专案组长”的头衔自然而然地安在了他头上。他笃信“法律是统治阶级的意志”。在一种特定的氛围下被委任为专案组组长，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情。说起来，似乎也有一腔苦衷。但是，如何办案，是他完全能够把握的。

他希望有这么一次交谈。

我也希望有这么一次交谈。

他仔细研究了我对颜跃明冤案的公开报道，报纸上划满了红杠杠。他非常清楚，报道明确地指出了地检分院对颜案所应承担的责任，同时划清了他们与冤案的直接和真正的操纵者、刑讯逼供的直接参与者的界线，充分考虑了原娄底市主要领导人“借钟馗打鬼”、“撵鸭子上架”的事实，给他们留够了余地。

刘松平坐在我的对面，大沙发和小个子显得不怎么协调。他在听，警惕和小心翼翼地听。他在捕捉着任何一个有价值的信息，试探着来访者的虚实。刘松平的心情像窗外娄底时而阴雨时而晴朗的天气那样捉摸不定。

我们的谈话没有对抗。双方都清醒地意识到，这是一次與

论与司法的对话，一次事过境迁、两套国家统治的理性系统在对话，双方都在努力地控制着情绪。

“我们怎么谈呢？”几句调节气氛的寒暄后，他问。

“我先提出问题，然后请您回答问题。”我从十五个层面围绕打击报复、非法拘禁、刑讯逼供三个严重违法现象向这位专案组长提出了问题。

关于“专案组”——

他的说法是：“以‘专案组’这种形式来办案，事后想起来是不妥的。当时没有考虑到检察、公安之间的制约关系。”

关于“打击报复”——

他的说法是：“政府领导的介入，我想说明的是，是我们主动邀请来的。因为办如此复杂的案件，有许多问题需要政府解决，如办案经费、人员、交通工具等。我作为专案组的负责人，站在我的角度看，政府越重视，我越高兴。从另一个角度看，他们动员那么多人和利用专案组达到其他目的，那就不正常了。”

市政府主要领导和专案组互相利用、互相默契是毫无疑问的。你不是抓了个大案要案、抓了条大鱼吗，你不是要急于建功立业吗，“主动邀请”，我求之不得，那么我便投之以桃，我便给钱、给车、给人、给宾馆，更重要的是，我还要给思路，还要加强领导。刘松平说：“市政府领导不可能左右检察院办案。”这不错，可是市政府领导可以左右公安局！

“更重要的事实是，市政府主要领导几乎参加了专案组的所有重要会议，逢会必有指示，甚至半夜三更亲自去察看颜跃明关押地点。如果仅是给专案组几台车、拨点财政支持还说得过去，至于要市长对专案组事必躬亲、熬更守夜，至于要全市总动员，置30多万人的生计于不顾，全副精力投入‘阶级斗争’，这些能视为正常吗？”

“……”他不说话。

“是谁允许市长如此深地介入办案过程呢？”

“……”他仍不说话。

实质上，谁的心里都跟明镜似的，市长插手专案组，专案组又反过来纵容了市长的过度行为，使整个案件政治化和复杂化了。

关于非法拘禁——

他的说法是：“对颜跃明的监视居住，陈国忠（注：地检分院反贪局局长）请示过肖国华（注：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肖国华口头同意。当然，《代表法》规定了对人大代表采取法律手段，必须向人大报告，但是没有具体的实施细则。你肖国华并没有说不同意嘛！”

市人大方面的解释是，肖主任没说不同意，也没说同意，只是说：希望专案组依法办案。再说了，人大常委会是集体领导，也不能一个人说了算。既然说你抓人是合法的，那为什么半个月后还要来人大补书面报告呢？

其实，专案组知道抓颜跃明很难超越市人大这一关，而且知道在“罢免市长案”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就去抓人，必然会遇到阻力，因此想搞一个既成事实，逼市人大就范。

四月三十日晚讨论立案，四月三十日上午赵市长本人曾与专案组在一起开会。赵市长亲口对包括笔者在内的北京几家新闻单位的记者说：还是我让他们去找人大主任肖国华的。并告诉他们肖主任在大会议室开会，坐在靠窗子的最后一个位子上。赵对我们说：“肖主任年纪大了，喜欢在靠窗子的地方打瞌睡。”

关于转移十一处监视居住地点——

他的说法是：“严格地说是不能这样做的。但是在司法实践中，为了侦察方便，这种情况普遍存在。邵阳有个案子，在全省的范围内转移监视居住地，我们只是在地区的范围内转移。”

这么说，湖南还有比娄底情况更严重的地方，娄底不过是小巫见大巫罢了。

关于专案组刑讯逼供问题——

他的说法是：“去年七月一日至十日是对颜跃明审讯最重的时候。这段时间，我也在冷水江，就住在市武装部招待所二楼，和颜跃明住一楼。七月九日，公安处审讯科长来跟我说，‘刘检察长，颜跃明说，有刑讯逼供’。我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把负责审讯的罗贵华、刘小雄叫来，他们否认有此事，我相信了，所以没有亲自去看颜跃明。对此，我应该承担责任。”

“你为什么不去看一下呢？”我问。

“审讯一开始，我便保持了一定的距离，主要是害怕被颜跃明缠上，影响审讯的顺利进行。”

“毕竟楼上楼下，只有一步之遥，再说了，颜跃明住在你楼下，连续好几天没回来睡觉，你怎么会不知道呢？”

“我要是去看一下，今天就好说话了。这是一个教训……”他的话音越说越弱。

但是他对我的文章中的检察院实际上“纵容”公安人员搞刑讯逼供的说法，表示了异议。

他说：“‘纵容’这个词用得也太严重了。”

我说：“‘纵容’太重，那么‘默许’呢？”

“默许——”他考虑片刻，说，“我不好否定这个词。”

“那么，我现在是否能这样表述：检察院实际上‘默许’公安人员搞刑讯逼供？”我故意咬文嚼字。

这是在玩文字游戏。在这种游戏后面，我们分明看到“文革”在复苏，丑恶在泛滥，中世纪的野蛮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重演！

时至今日，我仍然坚持“纵容”的判断。理由是非常充分的。

我最新掌握的材料证明：去年六月底，专案组召开了一次所谓的“加温会议”。据李柏林回忆说，赵市长参加了这次会议。“加温会议”的主题，是准备突击审讯颜跃明，也就是说，要让审

讯加温。在场所有的人都明白，“加温”将意味着什么！

还是让我们来听听权威的解释吧。

有几十年公安工作经验的李柏林说：“按照公安系统的理解和惯例，突击审讯就是搞‘疲劳战术’。‘疲劳战术’、‘车轮战术’就是刑讯逼供，在公安部门都是明令禁止的。”

“你在场怎么不制止呢？”我问李柏林。

“所以我提出刘检察长必须去审讯现场，以便把握事态。”

然而事态是，“加温会议”定调子，审讯人员大打出手，颜跃明饱经摧残，刘松平蜗居二楼，闻而不问，问而不察。以至于专案组为所欲为。泛滥开去，以同样的手段，波及到娄底近百个证人和当事人，造成十分严重的后果。

这不是“纵容”，又是什么？！

十四

北京民族饭店咖啡厅，除了几个外国人在闲聊，里面空荡荡的。我们挑一个僻静的地方坐下。北京少见的闷热。我们各要了杯冰咖啡。

惬意。舒适。安逸。安全。

这是一位评论家朋友。在《以人民的名义》作品讨论会上，他没有发言。他说，他要单独跟我谈。

他要跟我讨论高度问题。他以为，当下流行“制度决定论”，这容易给人造成一种错觉，仿佛有一种灿烂辉煌、一了百了的新制度在等待着我们。像是我们梦中的情人，按照我们的理想，被任意梳妆打扮着，并在她的身上寄托着我们的向往、思恋、痛苦和哀伤，寄托着我们对生存现状的不满、忧虑和无能为力，寄托

着那点儿脆弱而美好的期待和不堪一击的理想主义。离开了人性、人的历史和人类社会的文化延续和生存现状,去奢谈什么“制度”,只会误入歧途,只会重蹈“乌托邦”的覆辙。怎么能想象“制度”能在娄底这块土地上得到那样一群人的强有力的维护呢?咱们现在难道没有制度没有法律吗?看见他们能那样随意地抓人、传讯人,看见市长握有如此无限膨胀的权力,看见专案组手段那么残忍,让人心灵惊悚!这种悲观的看法,实际上,不只是针对娄底而言的,它面对着整个人群,面对着整个人类,面对着人生由生而死而忧郁不解的悲剧性结果。然而这并不等于说,扬弃旧制度、期待新制度没有任何意义。工业革命以来,《人权宣言》、《独立宣言》、《共产党宣言》都在为一个新世界的降临而祈祷着:这里没有压迫,没有歧视,人生来平等、自由,每个人,无论他属于哪一个阶层、干哪一种职业,都充满了自信和尊严,为了维护人权,维护自由和民主,社会统治公平、公正必定告别中世纪的黑暗,告别原始积累的残酷,去建立一个崭新的制度。也就是说,一个好的制度是充分尊重人权的,是抑恶扬善的,能够襄助正义,有效地维护秩序和规则。所以,我们要有法律。要以法律的名义为“自由”下个定义,为人的社会行为确定一个共同恪守的空间。制度和法律的确立,实际上告诉人们,人的恶、人类社会等级鲜明而使有些人拥有某种特权,黑暗与腐败,俯拾皆是的不合理不公平现象,都公然地存在着,东方西方、黄种人黑种人白种人概莫能免。我们承认默许这种存在,但是不能太过分了!赵市长和专案组的所作所为,已经远远超过了法制与道德所能容忍的程度。

十五

第二次见杨沛林,他仍然是那句老话:“你现在根本无法想象去年娄底白色恐怖的状况。”大家都对“罢免市长案”可能导致打击报复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但是没有想到来得那么快、那么猛、那么赤裸裸毫无顾忌。斗争被迫由明处转移到了暗处,形式由公开的议会斗争转向在野的地下斗争。

这里我必须说明一下,我对“斗争”这个词有一种本能的厌恶。在我所接受的教育中,在我的经验和记忆中,“斗争”几乎就是敌视、好斗、仇杀的同义语。在所有人类矛盾的处理形式中,没有比“斗争”更煽情、更恐怖的了。在一九九二年娄底大搞阶级斗争的语言环境里,两股势力相对抗,在市长和专案组的打击威慑下,颜跃明、杨沛林辈明显处于劣势,被撵得鸡飞狗跳。我能用什么词来取代“斗争”,来概括和描述娄底这场惊心动魄的对抗性活动呢?我感到了新汉语的苍白和贫乏,我感到了我的苍白和贫乏,我感到已经渗透到汉语中的某些含义的巨大破坏力量,我感到了汉语的意识形态污染。斗争的目标,斗争的目的,斗争的方式,斗争的手段,斗争的策略及由此而建立的国家意识形态和社会控制,构成了一个与现代社会相去甚远的政治文化系统。这套系统以一个更高更虚幻的名义,排斥理性,排斥法律,排斥普通人的道德和情感,实际上鼓励了恶,鼓励了暴力,鼓励了破坏,最终使非理性的洪水泛滥成灾。对此,我们应该认真彻底地反省。离开了对以往政治文化系统的反省,我们的“讨个‘说法’”还会有什么意义呢?

让我们再回到杨沛林的话题上去吧。

“罢免市长案”后，娄底的矛盾便激化和公开化了，由此迅速形成了两个水火不相容的阵营。一边是以颜跃明、杨沛林为核心，代表着一大批地位摇摇欲坠的中层干部；一边以赵市长、黄书记为核心，代表着权力。后者手里捏着权，捏着钱，捏着专政工具，捏着芸芸众生的命脉。后者迅速聚集力量，成立了专案组，包租了宾馆，摆开了决战的架式。

这是一次力量悬殊的较量。

正义在权力面前，往往显得卑微而弱小，所有的努力，往往可能是“以卵击石”。

“但是，我们没退路，都是要置我们于死地。与其等死，还不如拼个鱼死网破！而且，我坚信，这个案一定能翻。”杨沛林说。

杨沛林去年不到五十岁，在沉重的压力和恶劣的环境下，他一夜之间花白了头发！

颜跃明被剥夺自由后，杨沛林以他几十年组织工作的经验和沉稳，以他待人诚恳、认真负责的人格，实际上充当了这一派的精神领袖。这是相当冒险的角色。继颜跃明之后，专案组大肆进行搜捕，颜妻，颜妹，与颜关系亲近者，甚至许多非亲非故者，都先后被抓，而他本人的所有活动，已被监视，稍有不慎，都会被强大的对手视为非法，随时随地都可能失去人身自由。

他为此付出了代价。

杨沛林家住地委大院，与赵伯栋是邻居。他的活动方式是，白天若无其事地到市委市政府一些熟人的办公室闲坐闲聊，在闲坐闲聊中收集汇总各方面的情况，晚上出来活动，联络有关人员来通报情况，商量对策。早晚不着家，完全打乱了几十年平静如水的家庭生活秩序。总是更深夜静时回家，总是揪心地等待和担忧，总是灾难早晚要降临的恐惧，神经再健康，意志再坚强，这时节都崩溃了。他的家庭开始龃龉。“这能怪谁呢？也不能怪我爱人。她第二天要上班，两个孩子第二天要上学，谁能受得

了我那昼夜折腾？我不能连累他们。”他唯一的方法就是暂时离开家。

这位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成了流浪者，或者说，成了娄底级别最高的流浪者。一九九二年，几乎有一年的时间不能回家。晚上便在退休的老姐姐家里或者同事家里歇息。后来杨沛林常住的几家渐渐养成了互通情况的默契。“杨部长今天住哪儿？”一两天不知道他的行踪，大家便会着急。在娄底“黑云压城城欲摧”（市人大副主任刘昌其引语）的情况下，不能没有杨沛林。他稳重，冷静，沉着，不动声色。只要他在，大家便有了主心骨。

他幽灵一样的精瘦身体。在夜幕的庇护下穿行于娄底的大街小巷。他爱穿一双布鞋——轻声疾行，俨然侠客。他晚上去访问别人，都不直截了当去敲门，而是逶迤蜿蜒，东躲西绕，确认没有盯梢后才上门。

“杨部长来了！”大家都熟悉他的敲门声。

一九九二年五月十八日至八月十二日，颜跃明被突然从娄底武装部的看守地点秘密转移后，近三个月的时间杳无音讯。问题的严重性不仅在于与颜断了联系，还在于谣言四起。有谣言说，颜跃明已经供认了贪污受贿巨额款项；有谣言说，颜跃明已经供认了流氓犯罪事实……在外面为颜案而奔走和斗争的人们将信将疑，军心颇受影响。颜跃明到底情况如何呢？杨沛林给大家作了分析，稳定了人心。

说来也巧，八月十二日中午，颜跃明在看守的监视下，在冷水江市武装部关押地的外面餐馆吃饭，突然看见杨沛林的一个亲戚也在那里吃饭。这是他五月十八日饱经摧残后，第一次见到熟人。他的眼泪“呼”地要往外涌。他真想扑过去，紧紧地抱住他，向他诉说专案组的暴行和他所受的委屈、苦难。他努力地控制住并向对方暗暗地使了个眼色。一会儿，趁看守不注意，他把一张早就准备好的纸条悄悄塞给他。

这张纸条当天晚上便交到杨沛林手里。上面写道：一、我没有问题；二、他们要周吉贤和陈华德作伪证；三、他们要搞罢免案，要搞李柏林；四、他们用了刑。

杨沛林立即到颜家，布置颜妹想办法去冷水江，给颜带信：“要赶快把里面的情况写出来，特别是用刑情况。”

第二天，颜便写了《我呼唤庄严的法律》，跪托有良心的看守人员带出去。

“这封信送出来后，许多同志看到了颜跃明还活着，看到他如此受苦，看到大家的努力没有白费，都激动地哭了。”杨沛林布置赶快打印，在市、地机关散发！

娄底的八月中旬，酷热难当。大家都躲回家吃饭午休去了。市委市政府办公大楼和地委行署办公大楼，整幢楼都像是个疲惫的巨人，睡死过去了。空荡荡的楼道，突然闪出两个背挎包的中年汉子，从容不迫地从挎包里取出什么东西塞进办公室门缝。一楼、二楼、三楼……都塞完后，两个中年汉子如释重负，一闪身，便消声匿迹了。

下午一上班，地、市机关便炸了锅！他们都看到了颜跃明《我呼唤庄严的法律》打印稿！

形势和舆论，从此开始发生变化，天秤开始向正义和公道倾斜。

杨沛林眯缝着眼睛，平视前方，吸一口烟，长长地吐出去，仿佛吐出的是满腹的郁闷和惆怅。他不说话。

他不是那种喜怒形于色、办事情绪化的人，在最艰苦和困难的时候，大家在他那里得到的永远是坚定的信念和不屈不挠的精神，在他脸上看到的永远是镇静和刚毅。然而，大家只看到了他性格的一个方面。

严峻的形势，恶劣的环境，颜跃明的受难，组织和家庭的压力，在慢慢地吞噬着他的自信和意志。

夜间,他总是独自行走。无论是刮风下雨雷鸣电闪,无论是月亮阴晴圆缺,他都是独自行走。冷漠的月亮和星星,草丛中鸣唱的蛐蛐和蟋蟀,在深秋里悲泣的苦蝉,昏黄的路灯,晶莹的露珠,这辆除了铃不响哪儿都响的自行车,还有这漫漫长夜,都成了他的伴侣。他感到了孤独和寂寞。晚上把人家的门敲开,温馨和睦,相亲相爱,天伦之乐,扑面而来,更加深了他的孤独和寂寞……“我也是有家的人哪……”到哪家饿了就吃,困了就睡,吃百家饭的生活,何时能了,何时能休!想到伤心处,如此坚强的汉子独自会在路上,换了个人似的,眼泪止不住流淌……

十六

人生来就要经受苦难。

杨沛林为颜跃明求签打卦,结果总是令人绝望。可是颜跃明的哥哥颜跃辉告诉我,他求的神却很灵。

颜跃辉在娄底是个很有办法的人。弟弟颜跃明被抓后,他找了三辆摩托车,二十四小时跟踪赵伯栋的专车,车牌号是“20434”。他说:“这是专案组指挥车。它去哪儿,颜跃明就可能在哪儿。”然而,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五月十八日,颜跃明被囚禁半个多月后,突然从囚禁地失踪,动员了所有力量找,都毫无音讯。逼得没办法了,他只身下衡阳,去南岳衡山烧香拜佛,为弟弟的安全祈祷。几个月来,颜跃明生死不明,他唯一的办法,就是烧香磕头。为了白发苍苍的老母亲,为了未成年的小侄女,为了所有兄弟姐妹,为了颜跃明的平安归来,祈祷“菩萨保佑”。在他四十多年的生命旅程中,从来没有烧过香拜过佛。他硬邦邦的膝盖,从未给谁下过跪。他从来没有背负着这么多人的愿

望来到这人与神对话的地方。他感到太沉重了,那种能把一个硬汉的脊梁压垮的沉重。原来以为,他有着不可摧毁的意志和力量,今天,跪在神的面前,用颤抖的口气祷告时,他才感到了自己力量的渺小和薄弱。他根本无法与庞大的国家机器、与至高无上无所不至的权力相对抗。可这混沌世界茫茫乾坤,总要有个说话的去处吧!总要有个安顿精神的去处吧!

他听人说,宁乡县花园乡有具菩萨叫“杨四将军”,很灵验。

按规定,他准备了一斤新鲜猪肉,一斤酒,一斤苹果,一斤香蕉,二斤大米,一斤纸钱,一把香。当晚找了汽车,叫上颜妻周吉莲,赶到宁乡时,已经是午夜一点多了。

这个地方就以菩萨命名,叫“杨四将军村。”

很大一座青砖瓦房,香烟缭绕。他们去时,堂屋已经挤满了人。

神龛上供着木雕的杨四将军。

杨四将军在人世间有两个代言人——阴师和阳师分别由叔侄二人担任,侄儿是阴师,叔叔是阳师。叔侄二人,一个是大队党支部书记,一个是大队秘书。

排队排到凌晨三点才轮上。

颜跃辉和周吉莲赶紧给“菩萨”跪下。

“要问什么?”

“问我兄弟颜跃明吉凶。”

“你弟弟是个干部党员。”阴师张口便是滔滔不绝,“有人给我托了个梦,你弟弟为人民做好事。有人搞他,搞他的人不超过四个。”

“我弟弟会不会被搞死?”颜跃辉忍不住插嘴。

“你不要着急,死不了,你弟弟官小,那边官大;你弟弟势力小,那边势力大,但是中间有贵人相助……”

四个月后,也就是十二月,颜跃明果真获释。

“菩萨”在完全不知道颜跃明背景的情况下，倒也神机妙算；与此同时，“菩萨”带着大队党支部书记某种是非好恶的良知，愿意保护好人。到了白天，他就会回到现实生活中，恢复他党支部书记的模样。不管怎么说，“菩萨”已经给你了一个说法。你要为这种说法付费。他赶紧献上礼物和十元人民币。

“杨四将军”为孤立无援的人们抑恶扬善，祛病消灾，指点迷津，这多少有点虚幻和自欺欺人，但凡有点办法，营救颜跃明还有点希望，他颜跃辉都不会来这儿。赶一二百公里求救于菩萨的最大合理性在于他们不会被拒之门外，他们的美好愿望可以得到充分尊重。

阴间与阳间，天堂与地狱，就这样拉近了距离，神与人便有了某种默契和贴切，便有了对话的可能。

十七

颜跃明并不知道，神祇对他的未来命运已有了预测和说法，“杨四将军”已应祈祷，暗中保佑着他的安全。他欣喜若狂。他与亲人和同志们取得了联系。他的《我呼唤庄严的法律》，已社会上广泛散发。之前，他对前途悲观失望。四月三十日正式关押他那天，他在地检分院带信给大家，言辞颇为悲壮：“我没有罪！我是受赵伯栋打击报复！同志们，永别了！”读之者，莫不潸然泪下。如今，形势发生好转。外面不断传来消息说，全国高检和省高检已有批示，要求放人。前不久，他小妹妹对着关押地大声喊：“哥哥，你不要怕！刘桂明来了！”刘桂明是司法部《法律与生活》杂志社青年记者。自一九八七年以来，他从未中断过对颜跃明命运的关注。那么，为什么湖南新闻舆论缄口不言，出奇地

沉默？在颜跃明被关押的二百一十四天里，各级领导、司法机关和新闻界都收到了控诉材料，但是为何没有作为？在这种情况下，记者也没有办法，因省委副书记专门为此案向湖南新闻界和各大报驻湘记者站打过招呼，要求不介入，不报道颜案。中国的记者也是“套中人”，他们很难摆脱思想禁锢，对新闻事件进行客观公正地报道。他们也是体制的一个部分。《人民日报》一位记者甚至当面指斥称“不了解情况”的地委书记，但是他写的报道却被“封杀”！再优秀的记者，报道不能见报，形象都不可能完整。对于社会来说，对于历史来说，他的作用和影响都等于零！这无异于谋“才”害命。这是记者的悲哀。颜跃明了解这种现状，但他依然兴奋。刘桂明是老朋友，在他最危难的时候，能冒着风险来娄底采访，了解真相，为他伸张正义，真是莫大的安慰。不久，他又说服看守向外界传递出了《我的再次控告》。这篇“控诉”与《我呼唤庄严的法律》相比，更加愤懑，更加自信。上次是“跪呈”，而这次是站着说的！

我是娄底市二轻局党组书记，娄底市人大代表颜跃明。

……

今月3月30日，娄底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期间，根据部分人大代表对市长赵伯栋在娄底市任职期间政绩平平，以权谋私，心术不正，拉帮结派，打击改革者等情况，我领衔和其他24名代表联名依法向大会主席团提出了《请求罢免赵伯栋市长》的“罢免案”。由于多种原因，该罢免案未交大会审议。但是，我却大祸临头，迎来了一场大灾难。我今天所遭受的一切完全是因我在娄底市第四届三次人大会上领衔与24名人大代表联名依法提出“罢免案”所招来的大祸，是赵伯栋利用职权对我残酷的打击、迫害，完全是赵伯栋一手炮制的大冤案。我被非法拘禁审查六个月了，几十个人的专案组，动用10几辆专车，花了10几万元的巨额经费，没有查出我有什么经济问题，毫无所

获,但赵伯栋之流仍然不恢复我的人身自由,继续对我非法关押。我控告赵伯栋之流置党纪国法而不顾,以权代法,肆意践踏法律,滥施淫威,制造冤案,大搞刑讯逼供的罪行。我强烈恳求上级各有关部门及领导主持正义,还我公道,维护法律的尊严,保证我的安全和恢复我的人身自由,严肃查处赵伯栋利用市长职权,泄私报复的犯罪行为。

颜跃明呈上(于冷水江铁水江铁厂囚禁室招待所 204 房)

1992 年 11 月 15 日

颜跃明在站着说话!与三个月前“跪呈”《我呼唤庄严的法律》相比较,这次没有“请求”,没有回旋,没有退让,而是彻头彻尾的反攻。他正在恢复一个公民人格的尊严和自信。他正在恢复一个人民代表的尊严和自信。杨沛林们,颜跃明自己,良知尚未泯灭的看守们,能在短暂而又漫长的三个月时间里,让颜跃明几乎被摧毁的精神状态恢复到今天这般模样,付出了何等艰巨的努力!真是令人感慨万端,唏嘘不已。与所有至今还在漂泊、没有归宿的冤魂相比,颜跃明是何等的幸运!

十八

赵伯栋在安排后路。

赵和赵政治上的强有力的支持者看见大势已去,颜跃明不仅没有被搞垮,反而更加咄咄逼人。更重要的是,随着颜案真相的曝光,社会舆论开始打破沉默了。紧接着便是即将来临的人大换届选举。市长要继续当下去,必须在市人大的油锅里炸一道。他不敢保证当选。一九九二年前的政绩暂且不说,仅就一九九二年而论,他“要用铁的手腕”打击一大片的干部政策,得罪

了娄底市广大中层干部；他参与指挥下的专案组蔑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蔑视《代表法》，非法拘禁人民代表，得罪了市人人及人大代表，这几乎就是得罪了娄底市三十余万公民！一个市长，一个由人民代表选举出的政府官员，一个理论上为人民服务的公仆，把事情做到这步田地，他还会有什么选择呢？

开溜吧。

当然，由赵市长而地区公安处赵处长，结果仍然辉煌！

赵伯栋和他的同盟者，不会忘记向娄底人显示自己的政治实力。这不是一般性的平级调动，使政治对抗走向了极至，也使政治解决娄底这场罕见的冤案陷入了死结。同时，也给市长本人一种错觉，强权可以天马行空，无往不胜。他看了我发表在《经济日报》的一篇报道和报告文学《以人民的名义》后，打电话给一位曾给我提供过重要情况的当事人说：“他们动不了我半根毫毛！”但是，他忘了中国一句俗话：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他忘了他已是全国的新闻人物，不仅娄底市三十几万人将永远“惦记”着他，而且湖南乃至全国也会有成百上千万的人将永远“惦记”着他。他的一举一动，都将是众目睽睽。这是何等难堪的局面。一个人，如果总是在这种局面中生活，怎么可能安宁？心态怎么可能健康？从这层意义去分析，上面的支持者，把赵安置在公安处长的位子上，置事态和舆论的发展于不顾，等于是把赵放在火炉上烧烤，这是最最不明智的做法。遗憾的是，他们至今都没有想到，一个月前，赵市长已当了赵处长。他能否想象出，赵伯栋坐在处长的金交椅上读《控告》是怎样的情景和心情？

十九

我希望见到原赵市长现赵处长,希望听听他的说法,尽可能听取完全不同的意见,并能公正客观地将它们记录下来。

这是一次心理上的较量。

我们拨通了地区公安处的电话。

地区公安处办公室答复说:“赵处长晚上八点整到宾馆去。”

我们如约提前十五分钟在宾馆三楼会议室等。

已经过了八点。左等不来,右等不来。我们感到其中蹊跷。

晚八点二十分,外面已是漆黑一片,上来两个穿公安制服的人,直接来到会议室。

“你们是北京来的记者吗?”

“是啊。”

“这是公安处办公室主任。”一个较年轻的介绍说。

“很抱歉,赵处长今天晚上值班,来不了,想请你们几位到公安处谈。”主任说。

我们相视一笑:有名堂。

“请稍等。”我给大家使了个眼色,意思是先回屋商量一下。

颜跃明和市里的另外几个局长听说要去公安处见赵伯栋,坚决反对。

“你们千万不能去!赵伯栋什么都能干出来!要谈到宾馆来。”颜跃明拉着我说。

他们眼神中的焦急和担忧,把气氛渲染得十分紧张而悲壮。

“还是去。”我考虑了一下说。

见我拿定主意,他们只好补退一步说:“那可一定要小心。”

十点钟必须给我们打个电话,报告一下情况。如果我们十点钟接不到电话,那就派车去公安处楼下接应你们。”

这架式,像是送我们赴那个杀机四伏的“鸿门宴”。这架式,给大家脑子里上了根弦。

我们八点三十分到赵处长的办公室,零点三十分离开,整谈了四个小时!

四个记者谁都没碰清香扑鼻的茶杯。娄底大雨欲来的夜晚,沉闷,燥热,渴得喉咙发紧。我几次想去端茶杯,都本能地缩了回来。

赵伯栋是个精力充沛的人。中等个,壮实,四十六岁。

说到赵的年龄,市经协办副主任王定华能脱口说出:“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三日生。”王的口气中带有戏谑和幽默。“你怎么那么清楚?”“你忘了,我曾经是伯栋市长的走狗呀!他出去,从来都是我陪。”

这里还要说说王定华。王定华在娄底是个人物。他比赵伯栋大两岁,干了近十年的“副科级主持工作”,永远扶不正。他是那种把自己的灵魂经常放到油锅里煎熬的人。本来他聪明绝顶,搞技术,搞发明,曾经为国家制定耐火材料标准而名噪一时。一个县里没有学位的技术员,能搞出“国标”来,让全国遵循,实在是件了不起的事情。

十年的副科长,耽误了他多少建功立业的大好时光!真是一念之差。

他对首长,永远服务周到,体贴入微;永远是满足现状、唯唯诺诺的样子,首长交办的事情,从不含糊。“因此,大家除了‘维持会长’外,还送了我个外号,叫‘拍马洛夫斯基’。”他与那些小职员有所不同的是,他完全明白自己是什么人,正在做着什么事。心里装有一杆秤,一把尺子,时刻都要拿出来度量一下。他活得很清醒,所以也活得很痛苦;他活得很认真,所以也活得纠

缠不清,让满腹经纶、一腔热情都付予了时光流水。

“老王,你多大岁数?”有人问。

“五十。”他顺口答道。

“不对。你一九四五年生,今年四十八岁。”我纠正道。

“嘿嘿,你就不明白了。”他狡猾地说:

“和首长在一起,年龄要说得越大越好。这样才不会对首长产生威胁。由科长向处长升,总有个年龄限制吧。”

他身上有一种退后半步生的韬略,有一种察颜观色、随遇而安的世故,有一种随时忍受胯下之辱的气度。在娄底,谁都不真正地了解他内心的伤痛和无人对话的悲哀。

今天他多喝了几杯。北京五十六度的“二锅头”撩起了这个湖南汉子喋喋不休的话题。他对我说:“我生性胆小怕事,这回好了,你把我曝光了。我想躲也躲不掉了,不过我不怕。我对我所说的一切负责。”

北京禄米仓一家地下室招待所,屋子低矮气闷,光线暗淡,弥漫着发潮发馊发臊的气息。王定华借着酒劲,借着六十年代考中国音乐学院的话,跟我大侃电影音乐。

“我二十岁出头的时候,写过一篇论文,叫做《浅论电影音乐的革命化、民族化和大众化》。我当时真傻,写那么大的题目,一个知青,一个湘中农村的小人物,人家怎么可能登呢?我喜欢电影,喜欢音乐。我心里想的是,天生我材必有用。什么是‘革命化’?什么是‘大众化……’”这个时候,王定华侃侃而谈,全然不是处处小心、唯命是从的副科级干部了,也不是“拍马洛夫斯基”了。他是他自己的上帝。可能只有这个时候的王定华,才是王定华;可能只有这个时候,王定华才是真实和完整的王定华。也可能,正是这种真实和完整构成了他的人格、尊严,使他在去年形势十分严峻的情况下,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市长要他作“伪证”的要求。

不知道为什么,面对真实和完整的王定华时,我的心感到隐隐作痛。

二十

生活挺折磨人。

中国的现实生活,把赵伯栋推到了王定华面前,也推到了我们跟前。

这是一次气氛严肃的对话。

这边除我之外,还有《经济日报》记者陶国峰、《法制日报》记者陈建国、《法律与生活》记者刘桂明。那边是两个人,赵伯栋和一名书记员。

“可以录音吗?”我问。

“可以。”赵伯栋说。

看上去,赵伯栋也不是想象中的洪水猛兽。前面说到,他是个精力充沛的人,待人接物有一种目的性很强的热情。杨沛林的评价是:赵伯栋工作大胆,泼辣,但是喜欢搞形式主义,讲大话、空话、套话、假话。娄底有些中层干部评价说:严格地说赵伯栋也不想把娄底搞乱搞精,他也为娄底做了些好事,如市政建设。常务副专员龙德发的评价毫不留情面,在《以人民的名义》中已有详述。赵看了文章后,曾打电话给已任湖南商业厅长的龙德发,问是否跟记者讲过那些话。龙明确说“讲过”,并指出,好些话当着他的面也能讲。“伯栋同志,你要是听了我当时意见,不会有今天这种局面。”

刚坐定,赵伯栋递过来一封信,是贵阳的一个读者写给他本人的。这是一张《经济日报》剪报,上面用黑笔写道:“对赵伯栋

这个没有人性的恶棍，还要让他坐在人民公安的执法位子上。我倒想问问：法律还谈何庄严……正义何在？良心何在？赵伯栋这个恶棍应该得肝癌，早死早好。”信封背面写着一句话：“恭喜你们摊上一个‘好处长’”。

我们不知道这个读者为什么要用“得肝癌”来诅咒赵伯栋，但是可以肯定，“得肝癌”是他所知道的最恶毒的诅咒。

这里，我想尽可能原始地将我们与赵伯栋的对话内容端给读者。赵伯栋接见我们并对自己的行为进行辩护，这是正常的。这是他的权利。虽然他曾经践踏过他人的权利，我们还是要尊重他的这种权利。我们公布他的辩护，正是因为我们尊重他的权利。

“颜跃明事件公开报道后，在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我首先发言。“我们报道的基本原则是客观，公正，对事不对人。我作为作者，愿意对我所报道的所有事实负法律责任。因为这个事件涉及到了如何维护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如何维护人大代表权利、中国的民主与法制等重大问题。赵处长作为报道所涉及的重要当事人，今天，我们很高兴有机会听取你本人的意见。”

“说实在话，我很想见到你们。”赵伯栋说，“颜跃明案报道后引起反响，我的亲戚朋友拿着报纸来问，究竟是怎么回事。我现在就想就报道谈点我的看法。第一、报纸上说颜跃明放出来那天出了太阳，在此之前都是阴天，把娄底说成暗无天日，太严重了。”

“这是当时娄底的自然天气。如果其中看出了别的什么意思，那是你的看法。”我说。

他说：“二、‘联合专案组’的‘联合’二字不合适。再说专案组不是以公安局的名义组织的。”

我说：“‘联合’不合适，那么用什么词合适呢？”

他说：“三、给专案组用专车不是四辆，而是一辆，车号是：41

- 20434。为什么要车？专案组要接送人。四、颜案涉及娄底市大批中层干部，这不可能。五、杨沛林不是常务副市长，据我所知，没有这样明确过。（作者注：准确地说法是：管常务的副市长。）六、娄底市人口三十多万，不是十几万。（作者注：前者是全市人口，后者是城区人口。）七、文中说对颜跃明采取司法措施，未经市人大常委会批准。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四月三十日上午八点左右，我跟专案组说，人大主任肖国华正在开会。我还给去的人指明了肖国华开会习惯坐的地方：会场靠左的窗子下面，你去找，肯定在。肖的态度是同意的。”

说到“罢免市长案”时，他说：“关于这个问题，我一言难尽。颜跃明是一九九二年三月二十九日向市四届人大三次会议提交的罢免案。罢免案为什么没有成功？规定百分之十以上的代表签名才有效。他到处找人，签不到名。他拿了一张白纸，晚上一点多钟到女宿舍去签。人大主席团核实，有八个人是被迫签名。（作者注：这里面有个常识问题：是市长官大权大呢，还是二轻局局长官大权大。能怕谁呢？关于罢免案的细节，我有详细的调查。有的细节，现在还没有公开。）再说罢免是非组织活动的产物。对此我没有讲话，因为我认为代表提出罢免案，是他们的正当权利。我对颜也没有讲半句话。我在会议结束后的区乡干部会议上说，不追究参加的人。颜跃明为什么要提出罢免案我讲不清。颜跃明应该说是我树起来的。我一九七三至一九八三年任团地委副书记和书记。一九八三年他承包改革，我专门去厂里看了，表示坚决支持他。我还陪他去找了《湖南日报》记者李贵。他转干，也是我培养推荐的。一九八八年元月，我到娄底当常务副市长，他很高兴，要我支持他，他也支持我。我在实际接触中，发现他压力很大，年年都受审查。他提出要读书，我同意。我借给他两本复习资料。复习期间，他犯了一个错误，我非常严肃地批评了他，由我宣布对他进行停职反省的处分。他不服。

从此,我们的感情疏远了。我认为没有这件事,不会有罢免案。罢免案不是我打击报复他,而是他打击报复我。究竟我在娄底政绩怎样,最近地委让我做优秀中青年干部就很能说明问题。”

关于亲自参与专案组办案的问题,他说:“我参加专案组的一些重要会议,这是事实。亲自去看颜跃明的关押地点,也是事实。当时的情况是,李柏林很晚了来找我,说找了很多地方都不合适,其中说到市武装部有个地方不错,但是他管不着,一定要拉着我一块去看。去看时已是半夜十二点多了。我是不情愿去的。”

他说:“我认为报纸的报道,记者有自己的自由。你们报道可能有三条理由:支持改革,颜跃明是人大代表,这类事情是热点。看了报道后,觉得文章写得好。许多朋友和同志看后很愤怒,让我跟记者打官司。我看了一下,这篇文章不好打官司,最终会是娄底人打娄底人。现在是十几家报纸转载,提高了我的知名度。关于报道,我有三条意见:一、与实事求是距离,二、点名应经过党委同意,三、报道时一定要注意社会影响。报道出来后,我有压力,我只是发了一个电报给报社。打官司没有时间和精力。我仍然坚持上班。我老婆哭了好几次。我对她说,我不干自己打倒自己的事情。”

关于颜跃明,他说:“颜跃明放出来后,一天都没有放松把我搞掉。但我至今没有做对他不起的事情。我对他保持冷静和谅解的态度。他是个得势的人,容易失去理智。尽管他对我恨之人骨,但我同情他。他被人利用,搞地方派性。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我在这儿工作了十七年。这个小地方很复杂,排外情绪很强。我如果是娄底人,绝不会有今天的下场。这几年,市委书记和市长中的外地人都被选举掉了。我就是吃亏不是本地人。他们认为我整了他们。小颜是打冲锋的。小颜这几年都被利用,一天都不得安宁。一九八六年立案审查,一九八七年立案审

查，一九八八年立案审查，一九八九年又立案审查，他没有过一天好日子，我同情他。但他也搞得娄底不得安宁，天翻地覆。不要以为自己都是马克思主义，别人都反对改革。我也有责任，自己培养的典型嘛。”

关于他在颜案中扮演的角色，他归纳说：“一、我没有参加决策颜的立案。二、没有直接参加办案，就是参加会议，也都是他们通知我参加的。专案组要车、要钱，我又是分管公安。参加会议是被动的，不是主动的。三、我没有向任何人交待查罢免案。我向李柏林提出：要派正派人和本地人参加。四、专案组要我解决问题，是我的职责。我也主持了一些会议。我没有打击他的动机，硬说我打击报复，这个事实不存在。时间上的巧合与事实是两回事。但是我支持办案。我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所以，真正受害的人是我。”

他最后说：“我要提几点要求：一、公正实事求是地报道。二、要注意娄底的复杂情况，要维护这里的安定团结。如果颜跃明受了委屈，要实事求是地对待。三、出自内心地爱护关心颜跃明，目前最重要的是帮助他理智，提高他的素质。四、罢免市长案究竟是合法的还是非组织的，我遭到了打击报复，我要求组织尽快作出结论。”

关于他的经历，他给我们介绍说：“我家庭出身贫寒。父亲是土改出来的老党员。我一九六五年当兵，一九六九年复员后到邵东县邮电局。由于事业心强、拼命学技术，被评为广州军区和湖南省的学毛著积极分子。我有许多红帽子。一九七零年被结合为县委委员。一九七二年调任团县委副书记，一九七三年调任邵阳团地委副书记，一九七七年调任娄底团地委副书记，一九八零年当团地委书记。一九八三年当市针织厂党委书记。我的特点：一、有事业心，拿了共产党的钱，做共产党的事。二、我比较正直，不搞阴谋。搞大动作，不搞小动作。三、当处级干部

二十多年,没有干过违法的事情。四、比较好学,喜欢写东西,喜欢搞小发明。比如我根据经济生活中利用发票作弊作案的情况,发明了一种防作弊的发票。只要使用这种发票,可以避免现行发票的弊端。还发明了一种自行车撑伞器。我要是不当市长和公安处长,可以当百万富翁。我性格暴躁,工作方法简单。为什么人家可以争取颜跃明,他是我手下的却没有争取过来?主要是政治思想工作没做好。我是个有争议的人物。我听候发落。地委今年安排我在全区中青年干部经验交流会上第一个发言,听说反映还可以。这说明地委领导还是相信我的。”

《经济日报》记者陶国峰正色说:“我来讲五点。一、我们报纸为什么发稿?在一定意义上,我们不仅仅是把颜跃明看做一个人民代表,更把他看做一个普通公民。一个普通公民的权利受到这样侵犯,我们当然要予以抨击!人身权利得不到保证,国家也不会安宁。人的第一权利,是安全生存的权利。就这么被抓起来,还进行了野蛮的刑讯逼供,这是党纪国法所不能允许的!二、湖南娄底派性很重,我也同意根深蒂固的说法。派性不仅在这个地方有,其他地方也广泛地存在着。只不过程度不同罢了。我认为,一个地区有不同的意见存在是正常的,不同意见的各方自然会结成不同的利益团体并产生矛盾。但是,我要说明的是,政治斗争有政治斗争的规则,必须在不违背党纪和法律的情况下进行政治斗争。三、就娄底这个事情讲,非法拘禁和刑讯逼供人民代表颜跃明二百一十四天是事实,打击报复是否成立,要等最后的结论。四、从种种迹象看,这个案子不是个正常的案子,不是按正当的方式来办的案子。无论是重视的程度还是投入力量的规模、还是办案的方式,都是不正常的。实际上是联合办案,对于检察院来说,完全丧失了法律赋予的监督办案职能。为什么这么不正常?五、处理这个案子,我们希望任何人都受到公正的待遇。根据事实,弄清真相后来处理。我们希望娄

底能在这个过程中稳定、安宁。”

这里面的要害是，赵伯栋是否利用权力对颜跃明构成了打击报复。“黑匣子”总有一天会被打开。对此，我们都有足够的耐心。

四个小时的对话，赵处长占了三个小时以上。他自始至终情绪激动，侃侃而谈。寂静的夜里，整幢楼都能听见他的声音。我们尽可能地不插话，我们愿意认真地听他把准备好的话讲完。我们没有根据我们所掌握的事实进行驳难和辩论。

他讲完了。一看表，不知不觉，已是午夜时分。大家紧张严肃的脸并没有放松。

归纳赵处长的谈话，全部意思是，他受到了打击报复，他有冤枉和委屈，他才是真正的受害者。

那么，娄底有了两个“受害者”，一个是被非法拘禁了二百一十四天并遭到非人待遇的颜跃明，一个是由市长而公安处长的赵伯栋，两个人都声称受到了打击报复。我们应该怎样判断呢？

二十一

我们坐车出了公安处大院。我把手伸出车窗外，湘中丘陵地带湿热的风，给我传递着真实和自由的信息。我有一种复杂的解脱感，同时又感到永远的不可解脱。我真实而逼近地感受到，颜跃明的对手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有利害关系的人，一群还在台上的有权有势的人。在一个庞大的体系面前，一个生命个体有多重的分量呢？捏死你，跟捏死只苍蝇或者臭虫一样。抓了你打了你又如何？没把你整死，把你放了，对你是莫大的恩赐。你知足吧！

颜跃明能在专案组手心里活着出来,真是奇迹!但凡有点茬儿,早就不是今天这般模样了。赵伯栋在颜案上下了个大赌注。他对我们说:“如果颜跃明被法办了,很多人不好收场。”他的目标是一批人,颜跃明是娄底多米诺骨牌的头一个。他的胃口太大。赵伯栋运用专政机器打击政敌的时候,犯了个致命的错误:过于自信,低估了对手扭转乾坤的能量,低估了时代的变化。他输了,输得很不光彩。生看着煮熟的鸭子飞了!生看着受伤的猛虎挣脱铁栅栏的禁锢,呼啸而去,在那密林深处,发出撼人心魄的怒吼!他为他的政治前途付出并将继续付出代价。

也许,他原来的自信和现在的自信自有他的道理。原来,上面支持了专案组,希望由此为突破口,一了百了地解决娄底的问题。颜案搁浅,出现了始料未及的坏兆头,上面又帮助他顺利地完成了由市长到处长的平稳过渡,在举国声讨、万众注目的情况下,让他成为培养中青年干部的典型,让他在报纸和电视上频频曝光,显示一种势力政治实力。

湖南省委书记熊清泉今年六月底七月初在京参加全国人大常委会。七月一日晚在他下榻的首都宾馆接受了我们的采访。当他听说了娄底的情况后。直皱眉头,说:“他们怎么能这么搞呢!”他说,“省委处理这个事有两条规则:一、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把事实搞准……二、通过处理这个事情,要有利于娄底的安定团结。这次一定要慎重处理,使大家在处理过程中受到一次法制教育,提高觉悟……”

娄底人做事倒有种爽快劲儿。直来直去,态度明朗,叫阵都摆在台面上。

我们在娄底时,看到了娄底地委机关报《娄底日报》。六月三日的头版头条消息云:全区中青年干部锻炼成长经验交流会召开……七十一名中青年干部代表济济一堂,切磋交流,再展宏图。会上,八个人做了典型发言,赵伯栋第一个发言。可有意思

的是，见报时，他的名字却躲到第二位。里面似乎颇费了一点心思。

赵伯栋的理解没有错，这就是地委对他以往业绩的公开评价。

作为了解娄底事件的旁观者，当然可以把地委这种姿态认定为处理颜跃明案的基调和说话。

娄底地委解释说，让赵伯栋发言没有特殊的含意。

这不可能！此举精心操作的痕迹太重了！

地委说：省委要地委拿一个对颜案的处理意见，省里已来了两个调查组，要地委拿出个说法和结论是困难的。我们等着上面的意见。

地委把球踢给了省委。

乍一看，地委处理颜案慎重面消极。可是，分析地委在如此敏感和紧张的时期，把赵伯栋推到光天化日下表彰，则表现出了相当积极的态度。即使激化矛盾也在所不惜。这是滥用权力和有恃无恐的后果。

到处找“说法”找不到，可这不是明明白白的“说法”么？！

这种做法把忍耐达到了极限的颜案众多受害者惹急了！惹炸了！

在娄底，到处可以闻到对抗加温加剧的可怕气息！

二十二

颜跃明开着吉普追省长陈邦柱，从长沙追到了双峰县。

双峰县，是去年颜跃明囚禁地的第一站。到昔日的囚禁地来，向省长讨“说法”，真是个让人感慨良多的巧合。颜跃明的

人生,就是这样大起大落,充满了戏剧性。一腔酸甜苦辣,更与何人说?

到双峰已是晌午。他开车直奔县委招待所。车还没进门,就被公安人员拦住了。

“你找谁?”

“找陈省长。”

“约好的吗?”

“没有。”

“没有,不准进。”

“为什么不准进?!”

“就是不准进?”

门外的争吵声,惊动了双峰县长杨云辉。

“是谁在闹?”

“杨县长,是我。”颜认识杨。

“哦,是颜局长呀。你来干嘛?”

“见陈省长。”

“陈省长正在午睡。你吃饭了吗?”

“没有。”

“那先吃饭先吃饭!吃完饭,我陪你去见。”

杨县长和政府办公室主任陪着颜跃明到外面吃饭。要了满满一桌子菜。可谓盛情款待。安排好,杨县长便对他说:“颜局长,你慢慢吃。我在招待所等你。”说完便和办公室主任走了。

心急火燎,吃饭也没有胃口,再说杨县长还在招待所大门口等着呢,不能让人家久等。颜跃明匆匆地扒了两口饭,便回到了招待所。

他发觉气氛不对,第一、杨县长不在大门口;第二、公安人员的人数明显增多,好几十人,显然是在防范戒备着什么。

他发觉他中了杨县长的“调虎离山之计”。

他硬往里闯。

公安人员把他挡回来。

他掏出了省人大代表证。代表证上用黑体字印着醒目的一行字：

“代表可持此证视察。”

他高举着给公安人员展示。

“我是人大代表，去见我们选出来的省长，为什么不可以？！”

“人大代表也不行！”

“我有权依法视察。我是人民代表，不是阶级敌人！你们不让我进是错误的。”

“这个证有什么用？不让进就是不让进！这是我们的地盘！”

正在吵的时候，杨县长不知从什么地方出来了。本来想布置人员把颜跃明挡在外面，否则弄恼了省长，说他这个县长无能。没想到，颜跃明这人是个软硬不吃的家伙，事情闹大了，不好收场。

“唉呀唉呀，怎么回事？”杨县长故作惊讶。

“杨云辉，你我说起来还是朋友。说好了你在大门口等我，一块儿去见陈省长，怎么不见了影子？”颜跃明很生气，不客气地说。

杨县长弄了个大红脸。急忙道歉：“对不起，对不起。公安不认识你。”

“杨县长，你把公安撤走。我要见曹志斌书记。”

“走走，我领你去见曹书记。”

一大群公安如临大敌，簇拥着杨县长和颜跃明往里走。上二楼见曹书记，公安也跟上了楼，还跟进了屋。

曹书记迎出来。“颜跃明来了。”

“曹书记，你看，那么多警察跟着，像话吗？”

曹书记这才注意到周围都是严阵以待的公安。“你们都走！”他挥手把他们叱退。

“有什么事情吗？”曹书记问。

“我想请您对陈省长说一下，人民代表颜跃明要见他，就是一分钟也行。我来找他讨个说法。”

“你作为人民代表有权利见省长。”曹书记说，“但是省长这次来很忙，现在正开会。我负责把你的意见转告他。”

颜跃明坚持说：“哪怕一面也好。省委调查组已经走了半个月，没个说法。娄底人民很愤怒。”

“颜跃明同志，你相信我，一定会有个说法，邦柱同志这次来双峰确实很忙，希望你能理解。”

他见如此情状，只好悻悻作罢。

“我来送你下楼。”曹顺水推舟，热情地拉着颜跃明的手，穿过公安构成的两道人墙，送颜下楼。

颜跃明惆怅万端。回去的路上，后面还跟着一辆警车，“礼送”出境。他真不知道这种生活什么时候能结束。一根橡皮筋被拉长了，手一松又恢复了原样。可怕的恢复，可怕的重复，无休无止的恢复和重复。找省长要说法，竟被杨县长调虎离山，曹书记礼貌劝阻，公安夹道“欢迎”夹道“欢送”。带着希望来了，却带着失望走了！

二十三

颜跃明从去年十二月被释放至今，八个多月没有安排工作。不是不想安排是无法安排。他加入了中国的上访大军。“上访”，是中国的“西绪福斯神话”。上访者，带着各自的似海冤情，

由乡镇拥向县衙,由县衙拥向省城,由省城拥向北京。他们中的许多人,在北京永定门外安营扎寨,建立自己的社区,准备打持久战。因为他们知道“上访”不会有结果,往往是把大石头从社会最底层推到中央。对有些事,日理万机的信访部门用一张二指宽的条、一个牛皮纸信封,轻轻松松地扔给邮差,邮差便把大石头运回了最底层。——如此这般,往返无穷。即使如此,上访者仍努力不已,仍然不放弃正义必将战胜邪恶的信念,仍然相信世上还是好人多,仍然期待着下情能够上达。他们有人的尊严。与许多上访者相比,颜跃明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他头上有许多眩目的光环:改革家、企业家、省市人大代表。他还不是普通老百姓。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各级新闻单位都在关注他在娄底的动态。更重要的是,他有本届市委市政府的支持,有娄底上百名中层干部支持,有娄底三十几万人民支持。各级领导和机构都非常清楚,他们面对的不仅仅是颜跃明本人。这些都给颜的分量加了码。

我与颜跃明常常面对面坐着,通宵达旦。离开娄底前一夜,我们都不睡觉,彻夜长谈。

颜跃明说:“我是改革者,省市授予我改革勇士称号。我要改革,他们不准。所以这场斗争,实质上是改革与反改革的斗争。”

也有人跟我说:“娄底十年的历史,是围绕着颜跃明的改革与反改革斗争的历史。”

七八年前,听到这些话,还可能让我热血沸腾。可是今天听着,如坐针毡。这里孕育着一种可怕的逻辑,一种把中国改革简单化的逻辑,一种以“是否改革”为分水岭、以“是否支持改革者”为是非标准的逻辑。意识形态宣传、新闻媒介报道、地方党组织工作都在很长的时间里有一种简单化倾向,这种倾向给许多著名的改革者造成了一种错觉,因为他们为冲破旧体制沉闷僵化

的气氛作出了牺牲和努力,所以他们便获得了一种社会评价的特权。“改革者”成了一种价值尺度。一些社会公认的道德观念,一些普通人的情感判断,遇到“改革者”就拐弯了。在十几年中国改革进程中,这种错觉毁了多少英雄好汉。一九八八年以后,中国的改革者们本应喘一口气,静下心来自觉反省成为不可能,同时又把反省推到了一个更高更新更迫切的层次。

看来,颜跃明也没有完成这种反省。他还沉浸在过去十年营造的辉煌氛围中生活着。他不知不觉地在重复着自己。他一直被人捧着,被人仰视,从来不甘寂寞。杨沛林评价他:“颜跃明不是个贪利的人,而是个要名誉的人。”颜跃明说:“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是个新闻人物,一直生活在光天化日下,我的一举一动都受到周围人的注意。我能干什么?我敢干什么?说我搞了几十个女人,可能吗?这不是说我不想女人,而是不敢。”

他的不甘寂寞,主要体现在他的社会行为上。

他跟我说,他喜欢搞政治。然而,政治活动中,无论是多么廉洁正直的人,常常要而对肮脏的交易和违心的妥协。他却做不到。而且,在权力体系的笼罩下,一个科级干部能玩什么政治呢?人家想带你玩的时候,你还可以玩;人家不想带你玩的时候,就把你撇了。

我在这里需要说明一下,颜跃明过去和现在是否完成了某种蜕变和反省,与本案所构成的一系列法律后果没有直接的关系。因为颜跃明为了捍卫人民代表的权利,捍卫公民《宪法》所保障的权利,向社会呼唤公道和正义,向湖南省、娄底地区要个“说法”,完全是正当合理的。但我对他的未来却有着莫名的忧虑。他身上有一种理想主义与狂热的不稳定性相杂糅的东西,有一种时代深深植入他骨髓中的悲剧因素,将来可能发生什么事情,实在是难以预料。

每次告别的时候,我都要对他说:“你好自为之。”

我们不止一次地在谈话结束时,谈及他的未来。往往在这个时候,天已近黎明。我已是筋疲力尽。我们互相凝视着。他浮肿的眼睛里闪耀着热情、真诚和不甘心。这个好斗的家伙!我把窗帘拉开,窗子打开,让自然的光明、让寒冷和雪花扑进这乌烟瘴气的屋子,让绽开的玉兰和梔子给我们带来春天的芬芳。顿时,我们所生存的空间发生了变化,我们的血脉注入了新鲜的活力。我们感到了冥冥上苍的鼓舞和启示。

我不赞成他搞政治,说:“你去搞经济吧。离政治远一点儿。”

他问:“为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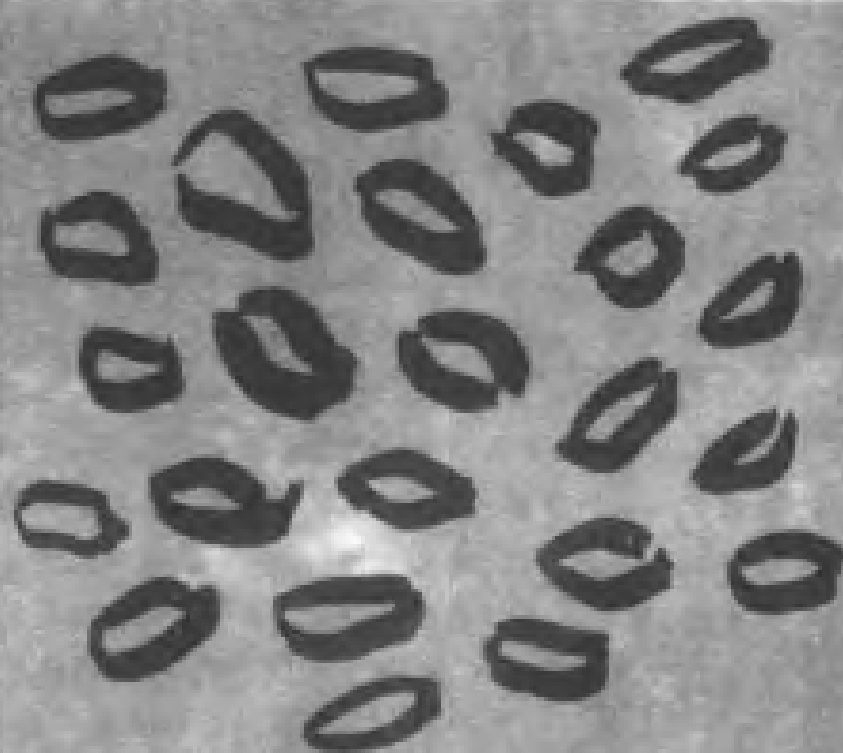
我说:“那将是中国最大的政治!”

讨个“说法”,可人们所希望的“说法”在哪儿呢?我这篇文章的结尾,只能告诉人们,惩恶扬善、伸张正义、因果报应、出口鸟气的好莱坞式结局,在生活中,往往是一种良好的愿望和美丽的期待。

一九九三年七月二十五日于北京木樨地

九月九日夜改毕

创世纪荒诞： “傻子瓜子”兴衰记



不到四万字的文章，关于“傻子”年广九、“傻子瓜子”的经典故事，经典细节多的我都有点不好意思。

世纪末感言

不到四万字的文章,关于“傻子”年广九、“傻子瓜子”的经典故事,经典细节多的我都有点不好意思。我采访到这些经典故事、经典细节,不是因为我聪明,而是因为我傻。我只不过是把上百的记者、作家看到了一笑了之并文过饰非的事儿当了真,只不过按照常识作了判断。通过这些故事细节,我们基本能把握那一时期的“改革家”的情状。

据我调查,“傻子瓜子”在八十年代末衰微,不是像人们所说的,是因为他没有文化,素质不高,不懂现代管理。西方原始积累时期的企业家,大多是海盗和亡命之徒,大多没文化,可是并不妨碍他们有经营头脑,构筑自己的商业帝国。“傻子瓜子”衰微的原因不外有二:一、在独特的制度和意识形态挤压下,年广九经营心态变形;二、违背起码的商业道德,坑害消费者,自毁品牌,“禁止有奖销售”仅仅是导火索罢了。

——作者

一个城市个体小商贩。一个改革家。

改革,令人振奋的字眼。它在二十世纪末形成了一股超越种族、超越社会制度的“世纪狂潮”,席卷着地球的每一个角落。在沉睡中苏醒的芸芸众生,无论迷惘、仓皇、亢奋,却都争先挤向改革的潮头。“改革家”的头衔,成了最时髦的荣誉。

邓小平、戈尔巴乔夫先后登上美国《时代》周刊封面,以“年度风云人物”为世界所瞩目,他们的民族和国家也大扬其名。改革家数不胜数,层出不穷。一个城市、一个地区,改革家的出现往往标志着那里改革的状况,那里在改革的狂潮中所占据的空间坐标。

安徽芜湖,这个五十一万人口的城市因改革而名闻天下,恐怕在很大程度上仰仗一个被称作“傻子”的改革家,他的大名叫年广九。

谁都没有料到,这个在芜湖中山路、新芜路、大戏院等繁华街道拎篮摆摊叫卖水果几十年的小商贩,这个老少爷们尽可以在“大观园”澡堂外和戏院电影院门口邂逅相遇的“傻子”年广九,这个逢人开口笑猥猥琐琐从顾客钱包里赚些蝇头小利以维持全家四五口人生计的“北方侉子”,在中国商品经济的“一池春水”中搅起了大波大澜。

在这里,我要记述的便是刚刚发生似乎又相隔遥远的关于“改革家”、“傻子”、“傻子瓜子”、“傻子”世界的故事。

皖东芜湖。长江。码头。轮渡。人们行色匆匆。

沿码头路边,十几辆三轮车一字排开,车夫们懒散闲聊着,漫不经心中又不时向轮渡出口处投去一瞥,企望从外地佬的钱包里狠狠宰一刀。

满街都是卖瓜子的商店摊位，“傻子”、“胡大”、“迎春”，商标真真假假花花绿绿。走拢去，商贩就会涎着脸迎上来兜售。买瓜子！芜湖瓜子名气大呵。来包“傻子”？“傻子瓜子”名扬四海走向世界！来包“胡大”也不错，“胡大”芜湖最好销，逢年过节就连“胡大公司”的宣律师都要亲自到胡大家开“后门”啦。你遇到一个巧嘴的年轻商贩，他会狡黠地眨着眼睛告诉你，“傻子”、“胡大”采众家所长妙制精湛，配方神奇独特，滋阴补肾，清凉祛火，它是营养食品有病治病无病防病。要是听“迎春”瓜子公司的副总经理陈恒庸“侃”，他那种把“傻子”、“胡大”踩在脚下的瓜子大亨风度就足以使你为之倾倒。怎么，你来芜湖这么久，还不知道！我们“迎春集团”是商业部支持的。

买瓜子卖瓜子访瓜子写瓜子。瓜子，瓜子，瓜子。一登上长江东岸，你就会发现你已为瓜子的海洋淹没了。奶油五香玫瑰酱油可口的味道掺合在江风里迎面拂来，嗅之而不能自己。而今即将离去，思维却像一堆乱麻，感觉却像一张白纸。

一辆米黄色“伏尔加”——《光明日报》驻安徽记者站专车——很不耐烦鸣着喇叭用车头拨开人流车流驶向码头。

车停。下车。

“笃笃——”轮渡沉闷的汽笛声在催促乘客。

我正要上船，突然一只粗壮有力的胳膊把我拽了回来。同车的芜湖市委宣传部新闻科科长扯着我的袖管不容商量地说：“你的稿件我们要审。”

突如其来的要求，搞得我莫名其妙。“稿件一个字都没写呀，审什么？”

“根据中央一九八一年文件精神，你写芜湖的稿件必须送我们审查！”他用身体拦住我的去路，神色威严。“稿件不经我们审，有问题你要负、负……”

留在岸上的这位尊敬的科长，终于随着船行被抛在了后面，

他的声音却一直在我耳畔烦扰。

前一天。芜湖铁山宾馆(市委市政府接待处)。一间装修豪华的小宴会厅。一场晚宴正在举行。席间觥筹交错,祝酒频频。

红色地毯,典雅的上漆金饰高级硬木餐桌椅在柔和吊灯壁灯辉映下神采奕奕。每个食客身不由己地进入一个暖融融的世界。每一个食客的呼吸道来往进出的都是上流社会和谐友好的空气。配以上等美酒、山珍河鲜,怎不令人忘情销魂,“不知有汉,何论魏晋”?

这是一次非同寻常的聚会,市委副书记以市委市政府的名义招待闻风来到芜湖采访“傻子”、“傻子瓜子”的中央和地方报纸电台新闻记者。

大家笑脸相迎,夹菜碰杯,多有客套。然而,彬彬有礼中似各怀戒心。宴会前,书记便以“听取意见”为由,来“摸底”了。记者们闪烁其辞,欲言又止,反杀一个“回马枪”,问书记这事那事;书记儒将风度,翩翩倜傥,正好接过话茬,疏导舆论走向。这场面,好似《三岔口》,摸黑各打各的路数。

超乎寻常的敏感,超乎寻常的重视,才有了新闻科长第二天的唐突和莽撞?

第一章 八十年代皮影戏

我的芜湖采访,可说是“素材”充足。包内装着在北京和芜湖搜集的大堆资料,有通讯、消息、评论、散记,有话剧、报告文学,有正式出版的纪实小说。本来是件很轻松的事情,为“傻子瓜子”公司为“傻子”为私营经济正名,推倒那些不公正的结论。“傻子”本人、“傻子瓜子”公司全力配合绝对没有问题,新观点加

新例子,辅之以大量的资料,“炮制”文章得心应手。住有电话有卫生间的客房,三元钱一天的伙食,虽说不太好,却有着去了就吃、吃完走人的方便。我窃喜中国的记者好当。

请看我搜集的权威报刊资料:

《安徽日报》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二十日头版:

“过去对‘傻子’的看法,往往从感情上看,从道德上看,而没有从发展生产力上看。”

《人民日报》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二版:

“……年广九,搞个体经营精明能干,但一管理三方组成的傻子瓜子公司,没有文化,没有管理经验,马上显得吃力,搞个体经营那一套不灵了,日子过得很艰难,最后落得负债累累。”

中央党校《理论月刊》一九八七年第九期:

“三中全会的春风激励了他(注:指年广九。)的开拓精神,他遍访名家,博采众长,创制了风味独特的‘傻子瓜子’。”

《解放日报》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二版:

年广九“这—个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冒出来的复杂人物,带着强烈的旧意识,却在努力开创新的工作;……”

《新观察》一九八四年第十五期《为年广九祝贺》:

“……年广九作了公司经理,我向他祝贺。”

“我为年广九祝贺,也希望有更多的年广九,更多的新式商人,站在改革浪潮的前端来。”

一九八六年五月出版的《傻子别传》(因温元凯为其作序而大放异彩——作者注):

“我们想说的是,这个大字不识的文盲,成了举国闻名的个体户、企业家。……雄辩地证明了一个真理。这个真理,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曾经指出过:‘在圆周上,起点亦是终点’。”

当然还可以引出许多比以上材料更来劲更精彩的东西。

年广九作为全国历年最有影响最有争议的“改革家”“企业

家”“风云人物”，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名气大得已经到了无人不晓的地步。安徽省的党政首脑走马灯似地换，以至于“雁过不留声，人过不留名”，知名度远不如“傻子”年广九。

上海青年话剧团演出十场话剧《傻子进行曲》，据说剧本和演出均在上海获一等奖。此例可算一证。

有人前后在芜湖采访了三个月，写成报告文学《一个“傻子”和一个瓜子市场的兴盛》，在当时的安徽获得了很大的成功。

电视、广播、画报……所有现代社会大众传播媒介都在传播着年广九的故事。

读多了，看多了，听多了，却也寻出诸多蹊跷来。

年广九以其绰号“傻子”在国家商标局注册。可是为何叫“傻子”起码有两种以上说法，在此不究。

一九八四年三月，“傻子”给当时的安徽省委书记黄璜写信，黄璜具有政治姿态的回信公开见报，一时间年广九名扬海内外。恕赘一言：年广九是文盲。

“傻子”离婚，原因有三种。

“傻子”爱情，罗曼蒂克有之，动情伤感有之，辗转反侧有之，诙谐调侃有之，五花八门。……

等等，等等。

公开见报刊的材料和民间传说，相关事例稍作归类组合，不难发现关于年广九的传说，没有一种是“绝对值”！看来，一个新兴学科——“傻子考据学”要诞生了。

我不能欺骗自己的眼睛！我开始怀疑这些材料所提供的事实和结论的可靠性。我隐约感觉到我正在被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力量牵引着观看具有八十年代风格的“皮影戏”。

做这么一种假设，“傻子”先生如果编在俄国伟大的化学家门捷列夫的“化学元素周期表”中，当列在极为活泼的Ⅰ族碱金属元素系列，诸多不确定性不规范性、政治、经济、文化、艺术、法

律都在他身上找到了结合点。鬼才知道为他繁衍出了多少美丽的传说。

神秘,朦胧,不可知,网一样笼罩着“傻子”、“傻子瓜子”。

也许是“傻子”一开始就不想对他所说的每一句话负责任,也许他在本能地或有意识地保护自己,也许他在根据当时当事心情的好坏发挥着他非理性的思维,也许他根据形势的需要记者的需要编一些让你满意得屁颠屁颠的玩意儿打发你,也许纯属恶作剧,跟历史和社会开个大玩笑……

第二章 不规则印象 ——“傻子”文化之一

无须核实

芜湖铁山宾馆。“嘭! 嘭!”有人砸门。

“您是年广九同志,哦,老年?”

门外立着一中年汉子。

“嗯。”他颌部微扬,鼻子里哼了一声。

“请坐请坐。”

年广九身着中山服黑呢套服,整整齐齐笔挺系着风纪扣,头发蓬松带卷朝后梳,不归顺,看得出是老年叉开五指草草捋刮所致。进屋。落座。仰着脸无甚表情,两眼下垂。脸部,紧绷着,棱形颧骨益显其突出。细长的眼睛似在琢磨,却又故意环视着屋子不相干的地方。

“前不久我见新华社记者,也在这间屋子里。”

对我强有力的暗示。潜台词之丰富令我暗吃一惊。

“请喝茶。”

他一副不拘小节的风度。掏出一包简装“前门”，弹出一支叼上，擦火柴点燃。拿火柴盒的右手中指，一只呈正方造型的戒指金光闪闪。

“嗯？你找我？”他说。

他漫不经心地吸烟，烟雾后面可以发现那双细长的眼睛掠过一丝本能的警惕。坦率地说，这与我从报刊上读到的那位笑容可掬称瓜子、谨慎小心待人待客、见人一鞠躬递上名片的商贩——“傻子”年广九判若两人！

我像每个怀着诚挚热情来采访他的记者一样，斟酌每一句提问，对他表现出充分的依赖和尊重。

“老年，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四十六岁。”

“您的额头怎么了？烫了那么多血泡。”

“哦哦，炒瓜子时揭锅盖，被水气冲的。”他坦然地回答。

天下没有比这再简单再可靠的事实了。全国著名“私人企业家”“改革家”亲口所述，记者据此写成文章，事实根本无须核实。似乎一切都在情理之中。

我比别人稍多了个心眼儿。后经核实，一九八七年底“傻子”应是四十八周岁，不是“四十六岁”。

他额头那片血泡的来历更是与他所解释的原因风马牛不相及。

在芜湖，“傻子”与未婚女子公开同居，近六七年来早已不是新闻。私生活方面，“傻子”的言行举止当属现代派。他是一九八一年三月正式办理离婚手续的。离婚后，他先后与两个女人公开同居，一时社会舆论大哗。“傻子瓜子”公司刚成立时，没房住，公司专为“傻子”在宾馆租了间房，他堂而皇之地带着第一个

同居的女人小顺子,也无人过问和干涉。在我们这种靠伦理和道德所维系的国度,“傻子”如此举动,可谓先锋派是也。真是个值得研究的奇怪现象。

一个不明不白的原由,“傻子”踹了小顺子,与目前这个女人同居。他们住在冰冻街三号“傻子瓜子”公司对面的一幢扎眼的二层小楼里。

我见过这个女子。

她叫彭小红,二十二岁。大脸盘大眼睛,肤色白嫩,透出一股子早熟的魅力,艳冶中又有几分天真。《安徽日报》周末版主编老岳告诉我,小彭是一个老红军的遗腹女,老红军死后,母亲改嫁。她曾失足被劳教两年,期满后为社会所不容,四处碰壁,生活没有着落,便上了“傻子”的船。她对“傻子”开宗明义地说,“我就喜欢你的钱。”她和小顺子一样,为了取得合法的社会地位多年来与“傻子”可谓是进行了殊死搏斗。她们都奋力争取合法婚姻,不是为了爱情,而是为了生存,为了在这个社会里找到一个栖身之地。一方仅仅是为满足肉欲,一方是为生活所迫,后者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而“傻子”正是利用了这一点,左推右搪,闪烁其辞,就是不肯办理结婚手续。弱女子曾投书政府数千言,痛陈自己不幸的遭遇,呼吁“救救我吧!”社会的支援都是那样的无力。以至于她把青春诉诸子和“傻子”没完没了的拼命撕打中。年广九头上的血泡就是她用开水所烫。

数字图腾

“数”,很能体现人类的智慧。数学游戏是人类最艰深的游戏。一个“ $1+1$ ”的问题,搞得多少大数学家焦头烂额、遗憾终生。人类对“数”,既有忌讳,又有崇拜。欧美忌“13”;中国人崇拜:“9”、“99”,象征着博大无限。

“傻子”总经理那里,最受宠、使用频率最高的数是“4”。

他跟你讲话,一张口就是“讲四个问题”。他有一套自己的思维方式和表述方式,在此不敢篡改,翻出原始记录,依次分述如下:

过去的四个问题。第一,解放后徒弟搞师傅一大错没有师傅哪来徒弟。你懂吗?为什么中国发展技术倒退了过去的“花纹”那么好现在人不会搞了呢徒弟反师傅你知道吗?第二,儿子不孝敬父母儿子打老子,到派出所顶多关一会儿就算了。老子还敢管吗?你懂吗?第三,不管哪一朝,反面正面都有才能发展,“粮食过关”,真报坐牢虚报升官。你懂吗你知道吗?第四,一个人想执掌大权你冻得半死给你两块钱你治好后来整我。你知道吗?

三中全会来四个好处。第一,中央首长来,郊区农民一样上街,赵紫阳到芜湖没见站岗。你知道吗?第二,农民个体商贩部队国营干部都平等。第三,社会主义安全,资本主义有钱不安全。你懂吗?第四,只有半个好处。你有本事你挣钱,有人看得短你懂吗?不服气。这帮人不是前线打仗的,是后方搞后勤的。你知道吗?所以说三中全会三个半好处要成为四个还得五年。

.....

现在我有四个对得起:对得起党对得起人民对得起军队对得起下一代。你懂吗?

.....

我采访结束后,准备回北京。他阻留说:“你再住四天。”

.....

他一俟讲“四个问题”,就陷入一种一发不可收的迷狂状态。从椅子上猛地站起来,在房子里焦躁不安来回踱着,手不断地在你眼前挥舞,夸张地表现他的感染力。点一支烟,没抽几口就摁灭。嘴巴一刻也不停也不可能停。他在说“你懂吗你知道吗”的

· ·

同时,那对小眼睛在你的脸上搜索他的演讲效果。你听得如坠云雾中,他就愈发精神亢奋。

你听不懂,跟不上他那些逻辑混乱的一二三四。你想插话,想请他澄清事实解释含意,这简直不可能!

满耳朵的一二三四“你懂吗你知道吗”,把我彻底搞糊涂了。我只有机械地频频地点头,手一刻不停地记。鬼才知道我懂还是不懂!

“老年……”我朝他扬手示意。

“你让我说完!”他很粗鲁地阻止我的提问。

需要耐心,需要涵养,需要心灵的理解和沟通,需要为他的逻辑建立一套参照系。

“4”的遣用,完全成了他下意识的活动。

“傻子”平生嗜酒嗜赌,即使当了总经理也未改旧习。他当总经理后因聚赌曾两次被派出所拘留罚款。猜枚划拳“春夏秋冬”,“4”是个大吉大利的数,是个能给他带来好运的数。

“四季财呀!”

生意场上的人对“数”有着苛刻的讲究。

对于“傻子”来说,“内容”似乎无关紧要。他在公司训话,张口就是“现在讲四个问题”。别人告诉我,他说话,今天昨天张三李四不一样,就像价格,随行就市,要紧的是以“4”为单位的组合形式。

“4”仿佛成了“傻子”的“禁忌”,成了他顶礼膜拜的“图腾”,赋予他以生存、竞争、自信的原始动力。

看见他在那滔滔不绝地作毫无理性的演说,令我想起了原始部落的人们在“图腾”面前充满激情的舞蹈,几天几夜地跳呵跳呵,灰尘腾起,蓬头垢面,疯狂而忘我。

浴

芜湖人嗜吃。按照芜湖的说法：“五神六神都不是神，只有一个‘吃’（芜湖方言，‘吃’音同‘七’）神。”把“吃”奉为“神”，上升到了形而上的境界。令人垂涎。

芜湖，古与长沙、无锡、九江并称“四大米市”。清光绪二年，芜湖辟为通商口岸，豪富商贾云集，有钱人多，加上物产丰富，所以诸神供否已属无谓，单供了“吃神”。与芜湖人交往，多遇美食家，如何吃，如何烹制，五迷三道，乐此不疲。

与嗜吃相呼应，芜湖人嗜浴。个把星期，便要洗上两三次澡。许多人一天一把澡，毫不稀罕。似有“洁癖”。详察其因有二：干力气活，一天下来，汗泥淤积，几把洗净，是为所求。这部分人属于“祥子型”。还有一部分闲散高雅之士，天天泡澡堂子纯属有瘾。这些人来澡堂子，其意绝非擦身搓背，要么“慎独”逃避风俗搅扰！要么例行打发时光，修身养性。要么排遣喜忧哀乐，要么干脆是来显示一下自己与社会其他层次人的区别。总之，泡澡堂子是一种境界，亦可说是一种文化。

话题扯得远了，可还与我们的主人翁“傻子”很有关系。

我在采访中听到一个顺口溜，单表总经理“傻子”年广九：

“八点上班十点到，九点还在床上睡大觉，一到办公室就胡闹。下午一点上班四点到，三点还在澡堂靠一觉。大事管不了，小事也不‘照’（芜湖方言，同‘行’义），别人迟到不得了。”

前文曾提到的话剧和报告文学都说傻子有每天“洗一把”的癖好。话剧的结尾就用“暗喻”的笔法写“傻子瓜子”公司学电脑专业的女秘书“跳槽”，傻子手里拿着家里和公司的钥匙，颓丧失落，“走到门边，拿起毛巾往肩上一搭，泡澡堂子去了。”“幕落。剧终。”“傻子瓜子”公司的章程，可谓是体现了“改革家”的风纪。

迟到一分钟,罚款1块钱!职工被“傻子”开除的算起来有八十多个!总经理本人却散漫得可以,偏要上班时间去洗澡,别人不敢有二话。当然,这是为保持他自己做人的特色。

一场牵涉傻子瓜子公司的经济官司,法院办案人员来找总经理了解情况。年总经理坐了不到五分钟就一声不响地走了,别人以为他出去一会儿就回来,岂知他老先生去洗澡了。

是蔑视?是不满?是抗议?可丝毫的情绪上没有反映。

一九八七年八月,日本东京广播电视公司为这位异军突起的改革家兼私人企业家所吸引,派记者专访“傻子瓜子”公司。一个下午的访问结束后,这位记者在宾馆设晚宴招待包括“傻子”年广九在内的有关人士。“傻子”一天都没洗澡,心里比身上还痒得抓挠难忍,此时此刻实在坐立不安,迫于礼节,又不便动作。酒席吃到中途,他按捺不住了,站起来正准备离席而去。在一旁的公司副总经理李作峰知根知底,早有所防,他连忙也跟着站起来,对日本记者说:“××先生,我们公司有个会议,年总经理要马上赶回去开会。请您原谅。”说完用眼神向年广九示意。年才赶紧顺话茬:“对对,开会,开会。”

……

澡堂。下午时分。白瓷砖澡塘,雾气蒸腾,人头攒动。“傻子”如醉如痴地在水里浸泡着。半睁半闭的眼睛睥睨着周围,片刻,旋又闭上。他似乎在水中充分地享受品察体验着历史的变迁,脸上不时泛起惬意和快感。别了,鸡鸣狗盗之徒商贩苦力之辈!……原有这等事,泡澡堂子竟也如饮酒品茶那般优闲高雅。……这或许是他当小人物时企望的上流社会生活?理当如此,命当如此,何惧别人评说!

下午的池水污秽不堪,条状粒状的油泥从池塘下翻泛而起,呈稠糊状,令人作呕。为何偏要下午来泡?天知地知他知,或许他自己也不知。

猪的宿命

与“傻子”打过交道的人,不管时间长短,交情如何,都不能用一两句话明白无误地把他概括清楚。有时他坦率得惊人,对自己的许多荒唐行为毫不遮饰,然而他的坦率中又明显让人感觉到狡黠和不踏实;有时他鲁莽、蛮横,可又同时伴随精明和敏捷;有时他机关算尽,故作世事百晓,老谋深算,可是表现出来的又往往是愚蠢和幼稚可笑;他的情绪变幻莫测,明朗中又有几分说不清道不明的神秘;谨慎小心中,更多的却是有恃无恐;沮丧颓唐,百无聊赖,突然间像在哪儿吃错了药,顿时来了劲儿;他那股子故意作出来的总经理架式中,隐含着犹豫和心神不宁。年广九身上集中体现了“本性的丰富性、微妙性、多样性”。

然而,这些仅仅是傻子年广九外部形象的表层。那么,他的深层形象如何呢?浸透他骨髓的东西是什么?宿命,是苦难人生带给他的无所不在的宿命!

傻子曾对我讲,在这世界上他谁也不相信。所以他说的话,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加上他表述意思的语言颇费解,与他有关系的人,包括与他关系密切的同事或朋友,根本不把他的言谈举止当回事。有当无,无当有。许多记者访问他,他也顺杆爬,供你所需,答你所问,难与你推心置腹。可他的漫不经心的散言闲语和行为中却包含着深刻的内涵。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上午,年广九带我参观芜湖香店村“傻子瓜子”公司瓜子加工厂。看完后,我们到二楼厂部办公室小憩。

仓库保管老张头迎上来,给年和我各泡了一杯茶。他一边喝茶,一边讲他当初就住在隔壁屋子里,如何叱咤风云,事业如何红火,他当时无家无室,在厂里直接指挥瓜子的加工生产。一

九八四年到一九八五年初,是年广九的鼎盛时期。何等荣耀的时光啊!可如今,公司负债累累,欠银行贷款六十五万元,没有资金购买生货加工,工厂门可罗雀,冷冷清清。“傻子瓜子”的名声一落千丈。

“总经理,咱们厂里两只猪长得不错。”老张头陪着笑脸低声下气地说。

“好啊!杀,杀,杀给工人吃。”年广九像打了针兴奋剂,精神大振,眼睛放出异彩。

老张头忙说:“不行不行,还没长合适。”

“傻子”换了个人似的。“走走,我们去参观参观猪圈,看看猪长得如何。”

他不由分说,拉着我就走。出门下楼梯,喋喋不休地说:“猪旺则人旺,猪死则人死。”

“猪的兴亡与人的兴亡有什么关系?”

“你不懂,你不懂。我在昆山县(属江苏)猪养得好,长到二百多斤,我就赚了二十多万。

后来猪死了,我就亏了。看来我年广九的事业还要发展。”他兴致勃勃。

我们转到楼后面。猪圈是借着楼后墙面和围墙搭的简易猪圈。

到那猪圈一看,我“哈哈”大笑起来。原来,是两头瘦巴巴的小毛猪!

老张头在拍“傻子”的马屁!

真是大煞风景。搞得“傻子”讪讪地,神情很不自然。

姑且不论猪之肥瘦,年广九这番猪与生意兴衰之关系的“论述”,可谓奇谈。这恰恰是年的破落户现状的一个绝妙象征。

我不知道猪是否作过我们祖先的图腾,祖先们是否用猪来占卜未来。“参观猪圈”这个小小的插曲,与第二章提到的对“4”

的崇拜，相得益彰，组成了傻子文化现象的一个亚文化层面。

把自己的命运系在自然界某种偶然的现象上，“生死有命，富贵在天”，总有显相，年广九选择了猪。

猪的宿命。这就是曾经在客观上推动了社会进步的有“开拓”“进取”“竞争”精神的“改革家”的精神世界！这就是中国社会小人物卑微的精神世界！他们在命运面前无能为力，社会在无情地捉弄他们，他们也在尽可能地向社会报复，因而许许多多变了形的东西，便在他们的身上得到大荟萃。

撒尿小记

年广九家。

卧室里，双人沙发、双人床，床头柜上有一本女性健美书，一本《浪女妮科拉》。几件女人的衣物，一些女人用的杂什。

这天下午天气极好，阳光斜射着墙上悬挂的一柄宝剑，剑鞘外镶嵌的金属光芒四射。

年广九气色不错，他见我驻足观赏宝剑，兴致很高，上前取下来，“哗啦”从剑鞘上拔出一条“弧线”。这哪里是什么宝剑！钢刃灰暗，鳊头躬腰驼背，仿佛得了阳萎。

“老年，这剑……”

“哦，你看，平常我这么练。”他给我示范：左手捏尖，右手持柄，两头使劲，扳成弓形，弹了两弹。“你懂吗？”

没法懂！天下竟有如此练剑之法。

侧面墙上一幅无名画家蹩脚的书法，装裱粗陋，倒是与那“宝剑”相得益彰。

日本“三菱”原装二十吋彩电。“大三七”收录机。

三米见方花纹斑驳纷杂的“波斯”地毯。

古色古香的红木家具。

门后边塞着个红色搪瓷痰盂。

夹生的“书卷”气和缺乏刚勇的“武侠”气，加上靡靡刺鼻的脂粉气，不伦不类，组成了这间卧室主人的文化背景。

“老年，我们开始谈？”我拿出采访本。

“今天跟你谈四个问题。”

我硬着头皮记。“第一……”，“第二……”，他习惯地站起来，如同平时那样作报告的姿态，挺着胸，挥着手。“第三……”，说到这里，突然停住不说了径自走向门后，推上门，左手拎起痰盂，右手解开裤裆扣，掏出那物件儿“喝喝喝”撒起尿来！

他神态自如，边撒尿边扭头跟我继续说他的“第四”。“喝——”。“我亏损是政策干扰，政府应该赔偿……”，“喝——”

撒完尿，一哆嗦，打个“尿颤”，抖两抖，放下痰盂，对着我，若无其事地系上档口。

翻开那天的采访记录，我是这样记的：

（“傻子”年广九拎痰盂撒尿）

我的眼前闪现着“蒙太奇”组接：“傻子”、年广九、年总经理、开拓者、企业家、中国改革家、撒尿。

奇怪的不是年广九在住室内当着我撒尿，而是我根本没有被污辱被愚弄被藐视的感觉，只觉得这场面太奇特了！

事后，我曾作了一系列推测：

他的膀胱或括约肌功能出现了麻烦造成小便失禁？要么厕所太远上下楼不方便怕耽误功夫怠慢客人？或是企业家风度改革家气魄时间观念伦理道德观点大更新？再就是习之所致惯之所致生性如此？这可是采访学所尊重的范畴。如果什么都不是，就只能是粗鄙了。粗鄙作为当今的一种文化形态没什么不好。古人都能择“东床坦腹之婿”，何况今人乎？不过，“粗鄙”在这里被年广九发展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甚至远远超出了“粗鄙”。

应该记下这历史的一页：公元一九八八年元月五日。

第三章 “蛮荒”之地 ——傻子文化之二

创世纪惩罚

进了“傻子瓜子”公司的工人，除了总经理和工人的关系外，还有一层当然的师傅和徒弟的关系。公司一九八四年成立后，直属芜湖公司的瓜子加工厂的工人中相当部分是“傻子”年广九安徽怀远县老家的农民，除了总经理和工人、师傅和徒弟的关系外，还一层宗法关系。因为年家“广”字辈份很高。这些工人除了叫他总经理外，还依辈份叫他“老头子”。公司的劳资关系，以宗法关系为主，其他关系相掺和，错综复杂。

他有一套“师傅打徒弟”的著名理论。前面提到，他认为过去就是徒弟整师傅，搞得纲名败坏，师傅不教徒弟，致使技术失传。

他打工人。人家问他：“你怎么打人？宪法公民权力你懂不懂？”

他还有一套理论：“你不懂。打是爱。你看他们表面上不高兴，心里高兴。”似乎在为工人办一件大好事。

傻子告诉我，管考勤的人员，如果不负责任，遇迟到者放任不报，若被告发，罚款十元。所罚款项，不充公，其分配方法是：

告发者得五元，百分之五十；

公司得三元，百分之三十；

迟到者得二元,百分之二十。

对于偷盗公物行为,发现不报者,罚款二十至三十元,其分配比例是:

小偷得五成;

告发者三成;

公司得二成。

奇哉,怪哉,“妙”不可言!

不知道这些规定是否写进了公司的规章条文,因为我没得到正式文本。不能否认这些枯燥的百分比给我的感觉和想象插上了多么有力的翅膀。

我们要感谢年广九同志的贡献,他为人类思想库,为改革大潮提供了这么一套思维逻辑和价值尺度。

迟到者、偷盗者不仅可以免罚,而且还要受奖!偷盗者可以登上领奖台,受奖数额高出有功的告发者两成!冷不丁看,是非扭曲,奖罚混乱。

见我望着他发懵,“傻子”洋洋得意地笑了:“你不懂,你不懂。”

突然,我恍然大悟。他是在折磨和彻底摧毁迟到者偷盗者的自尊!中国人“士可杀而不可辱”。他深谙中国人生哲学之三昧!规章制度定出来,明跟你说,就是要敲锣打鼓地侮辱你!让你羞愧得无地自容!让你在骨子里望而却步。

年氏管理,屡发绝招。

一九八四年底,香店村瓜子加工厂工人斗殴。十二名怀远的工人抱团欺负一外乡工人。当时住厂直接指挥生产的年广九,把挨打的工人和打人的十二个工人都叫到办公宿舍楼的二楼电视室,让那个挨打的工人坐在他旁边,打人的十二个工人站在对而三、四米远处。只听年大吼一声:

“跪下!”

十几个小伙子一下没明白是怎么回事。他们大多是高初中生，受过现代教育，“跪”的概念早就烟消云散了。“跪下”是什么意思？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的小伙子们被吼懵了。

见大家迟疑不跪，年腾地跳起来，指着十几个人又吼：“都给我跪下！跪下！——”

在“老头子”不可动摇的神威面前，不知是谁先“扑通”一声跪到了水泥地板上。像是一个信号，大家膝盖一软，齐齐跪成了一排。

“打！”年广九命令道。

打？谁打谁？大家跪着面面相觑。

“互相打！”

互相打？这不是开玩笑么？大家谁也不动手。

“你们不会打？唉？互相打嘴巴子？”

又不知是谁先动手，“啪”，谁挨了一嘴巴。“啪”，“啪”，“啪”，零零落落地开始互相开打，节奏慢，下手也轻。

“打！打！使劲！——”年在吼叫。

人的尊严崩溃了，人的文明泯灭了，人的道德丧失了，人异化了！“啪啪”的巴掌声，吼叫声，怒骂声，极大地刺激人的情绪，唤醒了沉睡在深层阴暗处人的“恶”和野性！节奏在加快，掌声在加重，打了十几分钟直到互相把对方的脸打红打肿，嘴角打出血！

三年后，“傻子”年广九专门把我带到这间电视室。室内。电视机早就搬走了，一大间房子空着，有一种凄凉感。他亲自表演，怎么跪的，怎么打的，仿佛事情刚刚发生。

这房子，就是宗族祠堂！我的心，一阵阵发紧，发冷。眼前恍如看见那十二个青年农工，敢怒而不敢言，蒙受着巨大的耻辱跪着互相抽打，脸嘴肿了，血滴嗒滴嗒流淌……

贫穷，你豢养了奴性！五千年的“文明”呵，你带给了我们什

么？

真是创世纪的杰作！真是创世纪的惩罚！

漂 移 的 庄 园

“傻子瓜子”公司瓜子加工厂，设在芜湖市东北六公里处的香店村。高墙铁门，森严壁垒。平时大铁门紧锁，没有特殊情况，工人不得随便出入。工厂保卫兼看守大门，级别竟与厂长相同。年广九专门挑选信得过的精壮汉子担此重任。谁要是违反规矩，将受到严厉的处分。我刚到芜湖就听说，工人们诅咒加工厂是“监狱”。

进大门，一片空阔的场地。右边是二层楼宿舍、厨房和一排十二个排开的炉灶大炒锅，左边是熟瓜子加工堆放车间。

这里，工人的自由度很小，不得单独上街，必须集体活动。厂里洗澡，按早中晚三班，工人由班长率领，依次鱼贯入池。“傻子”说：“我搞的是军事化生活。”

洗澡堂里的大池塘，砌得很糟糕，粗糙能刮肉。一级阶梯坐人，九米见方。一池水，最多时，有一百好几十人洗。

“轮到最后一班洗，水不是太脏了吗？”我问。

“傻子”说：“人脏还是水脏？人脏嘛！水脏也是人洗的。还是人脏么！”

这儿没有理性。

炒制瓜子是一项劳动强度很大的工作，又烤又累。八小时，除了大小便，都在锅台上干。无论是数九寒冬还是三伏酷暑，工人们都得光着脊梁，穿着裤衩。一九八五年初，“傻子瓜子”在全国搞有奖销售的时候，公司规定八小时还要义务搬运麻包。

工人在工厂吃住不花钱，都由公司包。但如果依据当地生活标准和实际伙食算帐，相当数量的工人工资偏低。并不像有

的文章所说的那样,到了“傻子瓜子”公司就能发财。

劳动强度大,工资低,伙食差,还要挨打骂。一九八五年三月初的一天,工人们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决定罢工。

深有意义的是,罢工参加者绝大部分都是年广九怀远老家的人。罢工当天下午,工人们推举代表进城找年广九谈判。他们提出了四点要求:

一、增加工资。

二、改善伙食。

三、减少额外超负荷体力劳动。

四、不要(作者注:注意!不是“不准”)打骂工人。

分析这四点要求,可以看出工人们自觉程度非常之低,罢工是在一个很低的层次上进行的。他们所争取的只是起码的生存权利。

总经理年广九根本不予理睬。临开晚饭的时候,他坐着波兰“菲亚特”微型车赶到厂里。下车后,二话不说,直奔厨房,手攥添煤铲,跳上锅台,揭开菜锅盖,使劲一捅,口里不住咒骂着:“叫你们吃!叫你们吃!”

锅底捅了个大窟窿,一锅菜全部漏进炉膛中,浇灭了火。

他朝围拢来的工人大叫:“你们敢罢工?是不是吃得太饱了,吃得太多了?今后你们别吃饭,看饿着肚子还有没有力气去罢工!”

没参加罢工的工人在一边急了:“总经理,我们没闹事。我们总得吃饭吧?”

工人队伍很快就分化了,瓦解了。

年广九说:“没罢工的,每人发两块钱,上街吃饭。”

罢工工人在沉默中看着形势急转直下。他们什么也没得到。

我曾想找到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采访,但是知情人告诉

我，他们陆陆续续被开除了。

这就是在八十年代中期，“企业家”年广九管理企业的铁腕！在我们这个社会主义的温温馨馨的大家庭里，人们还从来没尝过资本“原始积累”是个什么滋味。“原始积累”那些血腥的东西、非人道的东西，我们只在教科书里读到过，那似乎应该是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工业革命的产物。然而它却唱着跳着活生生地来到了我们这古老的土地上，不管你是否痛苦是否欢迎它。

那个大院子，充满了郁闷恐怖的气氛。它像一座中世纪庄园，一块年氏“领地”，远远地漂离当代社会的大陆。在那里，只有奴隶，只有封建领主。你要在那里生存，除非你自觉地埋葬自由、埋葬人格。

“傻子”用不准工人吃饭的办法处理劳资纠纷，是因为他从社会的最底层来，最懂饥饿意味着什么。“饥饿”的恐惧，像恶梦一样不可摆脱。“饥饿”给他的人生带来的一切痛苦一切麻烦都向他袭来……于是，他冲进厨房，跳上锅台，揭开锅盖，一股菜香扑鼻，一举砸穿锅底。他获得了一种“焦虑”释放后的快感。

离开了心理因素的分析，恐怕不好解释“傻子”复杂的非理性行为。

大镜子的妙用

“傻子”坐在大镜子里。

年广九的老宅。大戏院五十二号。立体空间都浓缩到了镜面上：

坐在大镜子里的“傻子”跷着二郎腿，坐在靠椅上醉眼朦胧，一副世事皆不问飘然欲仙的样子。每天中午他都要喝两盅，偏爱安徽酒“濉溪大曲”，今天中午多贪了几杯，身体软软地昏昏欲睡，偶尔打一两声“鼾”。

瓜子买进卖出都要记帐。

一个南京来的女工头也不抬地数钱。

他大儿子年金保记帐。

数钱的女工把钱数好，分成一扎一扎的给年金保端去入账存放。在她站起来的一瞬间，朝镜中的年广九迅速地膘了一眼。暗喜老狐狸睡着啦。

她两个大拇指在钱面上动作极小地一搓，搓起两张十元票子揣进兜里。

殊不知她的小动作全被装睡的年广九看在眼里。他不露声色，仍眯着眼装睡，在镜子里监视着她的一举一动。

正当她第二次如法炮制时，年广九有如苍隼扑兔，一个箭步上前，捉住她拿钱的手腕。

“你老头子喝多了，抓大姑娘的手干什么？”她大吵大嚷起来。

“嘿嘿，”他冷笑着说：“我是喝多了！”

他扳开她的手掌，拿过二十元钱。

“这是啥？”

她被捉住了赃，再也不敢言语。

“还有没有？”他追问。

“没有啦。”

“不对！还有！”他喷着酒气。

“没有啦！”她嘴很硬。

“有！兜里！”

“兜里没有。不信你搜。”

她翻出衣裤兜，果然没有。

咦，怎么回事？明明看见揣进了兜里。

突然，他发现裤兜有个洞，马上明白了。

他找来一个姓李的女人，说：“把她弄到屋里去。”

“到哪儿搜？”李搞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扒开阴门！”他说。

“什么阴门？”李更糊涂了。

“你下面长了啥？”年指着李说。

姓李的女人这才明白。把女工弄进里屋。

听见里面解皮带的金属碰击声。年广九在靠近门处点燃一支烟，一脸的得意，伸长耳朵听里面的动静。

“经理！——掏出来了。20块！”

年广九给我讲这个故事时，为了证明其真实性，还给我表演了当时的每一个细节。

“你把她开除了吗？”我问。

“我没开除她。我要拿她当活靶子。给她三块钱，对她说，到医院检查一下，别弄出病来。”

“她现在在哪儿？”

“人家回南京发财了。现在是十万元户了。她还感谢我呢。”

真是到了《天方夜谭》的世界。

活生生的人，活生生的事，活生生的举动，不由你不信。

“元旦”前后，宾馆人走楼空。一幢楼里只住着两三个人，窗外一片漆黑，我进了芜湖就失眠，天天在沙发床上“翻烧饼”，床的心脏里，劣质弹簧嘎吱嘎吱乱响。

看见的，听见的，太离奇了，都让我自己怀疑自己的识判功能是否正常。

傻子的事，据我所知，很多都是路人皆知的事。但是很遗憾，它们作为一个个孤立的事实，都被忽视了。他的形象，要么是正面的，要么是反面的。往往造成错觉，往往对年广九的许多行为作出令人满意的解释和判断。

恨他的人，恨得不明不白；捧他的人，捧得不明不白。在芜

湖,有人为他单独建立了一套价值系统,抛弃了一些最基本的前提,不用人、公民、道德、法律的尺度去衡量他的行为。他成了天马行空的超人,他性格中的变态因素恶性膨胀,给社会带来了很大的危害。

第四章 瞒天过海 ——“傻子经济学”

拨弄魔方

“傻子”的魔方,是桌上那包大头朝下小头朝上像“金字塔”一般的瓜子。

刚才,年广九当着“傻子瓜子”公司多位同志的面,亲自表演了他包瓜子的“绝技”。目的是让各位确立一种经商思想。

他拿了一张画纸,然后又找一张稍硬的纸作衬里,左叠右拢,包实封盖,那十个指头像弹钢琴似的利索,技艺精湛,顷刻间包成了一包外形挺拔美观饱满而内容做了手脚的瓜子包。

他的“包技”与“抓技”是相辅相成的。原先芜湖瓜子业有一个不成文的法律,一包一百粒瓜子,可“傻子”练就了一把抓九十四粒的绝活,真是气死张秉贵。今天实在是无法揣测他“一把抓”九十四粒瓜子不多不少的技术是如何练成的,也可能传得太邪,但他为生活所迫机关算尽聪明绝顶的狡黠劲儿倒是不难想象的。

“你们不信试试,我包半斤八两,抵你们包一斤好看。”他对目瞪口呆的人们说。

哪个顾客又在乎一包瓜子里少几粒瓜子呢？外界都知年广九生意做得活，先尝后买。送你一袋吃，吃后好再买。岂不知，他送给你的是本该属于你的。

一包瓜子，像神奇莫测变化万端的魔方，在“傻子”股掌间玩出了乐趣！玩出了利润！玩出了生命！

“傻子”出任总经理后，什么“一把抓”、“垫衬”之类都属难以启齿的雕虫小技了，那些小杂耍都留给了徒子徒孙们。总经理年广九早就胸怀全球放眼世界了。与过去单枪匹马小打小闹所不同的是，现在他有省市区各级政府的支持，有区政府充当他的贸易伙伴，他可以甩开膀子大干一场了。

年广九告诉我：“我九岁学经济学，十岁学成出师（实际上是学徒）。”

后来几次接触中，这位文盲经理多次强调所谓“经济学问题”，要旨是，“不是我吃掉你，就是你吃掉我”。他对“吃”的办法打了个比方，用理性的方式来叙述，大意如此：竞争的双方 A 与 B，他们经营同一种商品 X，市场平均价格两元，在条件具备的某一时刻，A 突然将 X 商品降价到一元，并在宣布降价的同时，封存全部商品不予出售；然后串通 C 去套购 B 的 X 商品，便可以一元五角或者更好的价格全部收买。这样 A 就形成对 X 商品的市场垄断，并可以大幅度涨价，以垄断价格向市场出售。既可吃掉对手，又可大发横财。

这真是彻头彻尾的“经济学”！

考察“傻子”年广九的经济行为，一九八五年初“傻子瓜子”公司在全国范围内搞的“傻子瓜子”有奖销售最能诠释“傻子经济学”。

在“傻子瓜子”公司采访，从总经理到一般工作人员，提起一九八五年二月五日开始的“傻子瓜子”有奖销售，莫不眉飞色舞，精神亢奋。当时可谓盛况空前。傻子瓜子公司一举向银行贷款

二百三十三万元,第一天就售出一万三千一百公斤熟瓜子。二月十二日,日销量高达二十二万五千五百公斤,创瓜子销售历史的最高纪录。截至三月四日国务院发出所有工商企业停止有奖销售的通知,共发出销售奖券一百一十五万四千六百七十张,每买两斤赠奖券一张,共销出瓜子一百一十五万四千六百七十公斤,每公斤批发价比原来涨两角,卖三元四角。这些瓜子主要销往北京、上海、天津、哈尔滨、石家庄、南京、济南、青岛、郑州、西安、杭州、武汉、福州、广州、长沙、南昌、桂林和安徽各城市。一时间,“傻子瓜子”公司人满为患,全国各地纷纷来电来函来人来车,发了疯似地订货抢货。天还黑着,汽车板车就排队排到街口拐弯了。人民币像雪片一样飞进冰冻街三号。

你买我卖,周瑜打黄盖,乍一看,再正常不过了。我拿到一份年广九上告并要求政府赔偿损失的材料,“傻子瓜子”有奖销售期间,共进生熟瓜子一百四十四万九千三百一十公斤,其中熟瓜子七十六万四千一百五十三点五公斤,占总进货数的百分之五十二点六。这批熟瓜子中属于傻子瓜子公司自己加工生产的(包括各分公司)熟瓜子只占百分之三十八点六。也就是说,有奖销售期间,“傻子瓜子”公司购进了大量的不是自己加工生产的熟瓜子装进了印有“傻子”商标的塑料食品袋,以假充真,以次充好,欺骗消费者!

就此事,我向年广九总经理请教。他满不在乎地说:“熟瓜子的加工方法都差不多。”

这种回答令人惊愕!“傻子瓜子”之所以能获得国家正式注册商标,正是因为“傻子瓜子”的炒制有一套独特的工艺技术,正是因为它是全国瓜子业的名牌。年广九的说辞,无论如何不能向天下人交待。这使我联想到公私联营前的一九八三年,年广九套购国营“迎春瓜子”,打上“傻子”商标加价倒卖上海的“前科”,前后作法,两相比较,如出一辙。

为了最大限度地追求利润,他把自己的名牌商标弃之如敝履。这种经营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商品经济不够发达、市场机制不够发育的落后社会经济状况。

一九八五年三月中旬,有奖销售被勒令停止,奖品不能兑现,各地纷纷退货,生熟货大量积压,银行贷款不能偿还,加上几场相关的官司,“傻子瓜子”公司一举亏损一百五十多万元,“傻子瓜子”的商业信誉降到最低点。

记得在哪本书里记载了这么一句话,人是“用蚕吐丝或蜜蜂筑巢的同样方法生产哲学和诗歌的一种较高种属的动物”。

年广九虽然只会写自己的名字,而且写得歪歪倒倒,可他分明有自己的哲学和诗歌,并把它们发展到极致。谎言、赌博、投机、唯利是图,将最终导致“傻子瓜子”毁灭的命运,而禁止有奖销售,只不过加快了“傻子瓜子”走向坟墓的速度。

在此,我不想对一九八五年三月中纪委、国务院在全国范围内禁止工商企业进行有奖销售作一个肯定或否定的判断。国家和党的部门行政干预经济生活,几十年来,曾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出于道德的和理想主义的目的,经济不能在一套相对独立的系统中运转,只能从属服务于特定的时期和政治气候、与之相贴近相应衬相制约的政治文化背景,把中央集权、计划、官僚体制、儒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等等大杂烩一锅煮了,掺进商品经济大循环中,令经济发展疲惫不堪。然而,一统就死,一放就乱,亦是中国的现实。国家干预经济,不仅应该,而且可能,实行自由经济制度的西方发达国家亦在健全和强化国家宏观控制机能,如当今世界流行的“贸易保护主义”,国家疏引投资导向,干预通货膨胀等。其实,在中国,问题不在于是否“干预”,而在于什么前提下进行干预。

政府行为必须受到法律的制约和监督。这是现代民主社会的最基本的特征。

转嫁危机

“傻子”年广九曾为我的采访指引方向，“你想想，我们几年来都有经济效益，为什么有奖销售负债一百九十多万现在只剩下七八十万了？”

这的确是个谜。

但为什么“傻子瓜子”公司在负债累累生熟货大量积压银行拒绝贷款资不抵债的情况下维持了近三年，简直不可思议。

“傻子瓜子”公司的大招牌在冰冻街三号赫然矗立。

进公司的第一感觉，霉味呛人。

我初来乍到，瓜子公司嘛，公司的人自然捧出瓜子招待。

传说中的“傻子瓜子”七十二种配方，选料精良，一嗑三开，壳一分为二，可以轻松愉快吃瓜子仁。

专程到芜湖采访瓜子，在“傻子瓜子”公司吃天下闻名的“傻子瓜子”，岂不美哉？

饮一口安徽绿茶，盯准一颗饱满硕大的瓜子，拈起来扔进嘴里，一嗑三开不假，轻轻一嚼，正欲细细品其妙味，却顿时满嘴恶苦：“啊，苦苦，霉了，呸呸。”

“不对吧？可能你吃到一颗妙糊的。”有人说。“你看，这颗就挺好的。”

“霉”与“糊”我自认还能分清。我意识到其中可能有诈，又不露声色地挑了几颗尝，确认了我的感觉。我不敢再吃了。我那点可怜的医学卫生常识提醒我，霉变瓜子含有毒素，能使人肚泻致癌。

我看见那些茶几上的“傻子瓜子”好像在冲我恶笑。

我观察注意到，来公司批发瓜子的人，讨价还价，开票提货，行踪诡秘。

有人责问：“‘傻子’把十几万斤囤了两年多已报废的熟瓜子运回来销给消费者，这是什么问题？”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年广九带我参观香店村瓜子加工厂兼仓库。

场地上，露天堆放着一大堆刚拆了包的瓜子，撕破的“傻子”商标塑料袋遍地都是。

几个工人正将拆散的瓜子撮到工厂大门右侧的两个大水池里淘洗。

“这些瓜子为什么还要洗？”我问。

“这是从蚌埠刚拉回来的十四万斤熟瓜子，豆粉生霉了。”年广九冷静地说。

“还能吃？”

“先洗一遍，然后煮，煮完烘干，拌上香料，一样能吃。”

我看见成千上万斤的陈瓜子堆放在敞开式库房里，拣几颗噎开霉味刺鼻。

年广九却满不在乎。他大拇指朝后一扬说：“到我们这儿，什么都能卖钱！”

各种迹象都证实，“傻子瓜子”公司大量地向市场倾销霉变瓜子！我震惊之余，开始对“傻子瓜子”公司违法经营情况进行私下调查。

私下的调查艰苦困难，阻力重重。我的行动开始受到监视。年广九打电话到市工商局核查我的“记者证”。

霉变瓜子都被谁买走了？通过什么渠道、销到哪儿去了？

一九八八年“元旦”。中山桥农贸市场。芜湖市最大的瓜子集散地。这是一条约有一百米的狭长街道。两旁楼阁破旧颓败。

市场上熙熙攘攘，旁边挤满了二道贩子们的瓜子摊位。说是摊位，实际上是麻袋换麻袋，挽开口，大小高矮矮矮。

知情人告诉我,到这里买瓜子的,大多是芜湖市附近农村和外地的二道贩子。二道贩子在“傻子瓜子”公司以每公斤一元八角至二元的批发价,到手大量的处理瓜子。中山桥农贸市场毫无疑问是倾销霉变瓜子的主要渠道,主要销往农村市场。二道贩子将霉变瓜子按百分之十至二十的比例掺在好瓜子里,有的干脆不掺就上市。

一九八七年芜湖除了“傻子瓜子”公司,“胡大”、“迎春”等公司都是现炒现卖的鲜货。也就是说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傻子瓜子”公司之所以能不死不活地拖到今天,出卖技术和“傻子”商标,连续不断地大规模地向消费者转嫁危机,这些便是其苟延残喘的手段。

经查实,一九八五年底到一九八八年初,“傻子瓜子”公司先后重加工或不加工,推销不能食用的霉变瓜子达数十万斤!

一九八八年元月六日下午,我将调查情况向芜湖市卫生检疫站通报。检疫站第二天上午采取行动,当场查封了“傻子瓜子”公司近十万斤已加工和未加工的全部霉变瓜子。

当市卫生检疫站的人到“傻子瓜子”公司核对销售数时。副总经理李芳伦说:“这没事。吃不死人。”他还辩解说:“我们加工霉变瓜子,也是为了让国家少一些损失。”

真是奇谈怪论!更奇怪的是,这种奇谈怪论在芜湖很有市场。据一位市工商局的同志说,一九八六年省市两级政府组织了“傻子瓜子”有奖销售损失联合调查组,十二月底调查报告写出来后,他们专门向市长作了汇报,查实公司库存有五万五千公斤熟瓜子,经市卫生检疫站抽样鉴定:“已失去食用价值,不得食用。”但是这批瓜子如何处理,没有任何下文。

我百思不得其解,认真地翻看一下“傻子瓜子”公司向中央省市各级领导各级组织提供的正式材料,发现里面破绽百出。然而,这样的材料竟一级一级批转下来: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省长——市长——省工商局——区长，大家都对年广九的非正常经济行为熟视无睹！人们为什么不去正视或不敢正视这些光天化日下的事实呢？

如果说“傻子经济学”有其成功之处的话，那就是它极准确地把握和咬住了消费者、当权者的弱点短处，能在社会的“盲点”区域大展雄风、游刃有余。

投机、损害公众利益、损害国家利益，似乎成了特定历史时期的典型经济现象，像一种不可避免的“瘟疫”，与社会、与改革共同前进。

第五章 以改革的名义

利益所系

改革了！

改革了，

改革了……

改革了？

我为“改革”忧虑。社会各种势力，不管它是拥护还是反对改革，不管它是诋毁还是讴歌改革，不管它是天堂的获得者还是地狱的失去者；黑暗光明、善恶美丑、腐败健康，都聚拢到了改革的旗帜下，企望自己的行为得到“改革”强有力的庇护。

有人以改革的名义营私舞弊、升官发财。在许多地方，“改革”这词，就像“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这类政治词汇，在专门的场合下，成为定性表态的专用名词。原来喝大碗茶，而今换“可口

可乐”，有人欢呼，“改革了——”。昨天辫子还在背上拖着，今天盘到了头顶，有人欢呼，“改革了——”……就是在这种氛围中，“傻子”年广九被推上了中国的历史舞台。

人们不会去注意一九八一年八月的一天，芜湖大戏院巷口五十二号的主人、绰号“傻子”的年广九刚从外地归来，神不知鬼不觉地在酝酿着什么。此时，中国刚从灾难中复苏不到五年，百业待兴，千头万绪，治丝益棼，大变革前夜的那种失落和茫然的情绪正统治着整个民族。在旧的僵死的政治经济体系下，理论和实践一片困惑。

就在年广九摸进市府请示降阶是否符合当前党的政策后的第二天，他的“傻子瓜子”大幅度降价，由每公斤四元八角的市价降到每公斤三元五角二分，降价幅度为百分之二十九。这一举动，彻底动摇了国营垄断几十年的瓜子价格体系，逼使国营“迎春瓜子”数次降价，一直降到每公斤三元四角八分，低于“傻子瓜子”。就在各竞争对手从睡梦中醒来仓促应战时，“傻子瓜子”已经像秋天荒草的一把火，以价廉物美风靡全国，正敲响通往世界的大门。

自从一九八一年九月五日《芜湖日报》公开报道“傻子瓜子”经营情况开始，中央各新闻机构和许多地方报刊都先后作了报道，傻子年广九进了电视，上了舞台，他的每项活动的报道，几乎成了私人经济在中国发展的晴雨表。他作为全国最有影响最有争议的个体户之一，引起了党的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安徽省几届书记省长、芜湖市决策层的关注。这真是私人经营者史无前例的殊荣。所有这些都在芜湖形成了一个超敏感压力场。

一九八四年初，年广九在外地流浪谋生很长一段时间后回到芜湖。三月二十七日请人代笔给当时的省委书记黄璜写了一封信，在资金、场地、原料供应都不落实的情况下，公开抛出了那项“激动人心”的一九八四年生产计划：当年生产五百万公斤瓜

子,产值一千六百万元,上交国家各种税二百零二万元。经我查证,这个诱人的计划产量,占一九八四年芜湖市全年实际产量约百分之五十,而当年各方面都占有明显优势的“迎春瓜子”的加工量是五百六十万公斤。还有其他四五十家瓜子生产厂和炒货店呢?光是我国当时有限的瓜子原料都是问题。干劲可鼓而不可泄。且不管该计划的可行性如何,黄璜亲笔写了回信,公开发表在《光明日报》和《安徽日报》头版,支持年广九发展“傻子瓜子”。省委书记致个体户公开信,这是中国经济生活中的一件大事。省委有关部门贯彻“公开信”精神,电话指示芜湖市委市政府具体扶持“傻子瓜子”。“傻子”年广九的政治声誉和社会知名度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原来纯属经济领域内的问题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扶持年广九发展,与当时的政治空气联系到了一起。年广九也在一种极其复杂至今还众说纷纭的心理支配下,前后十次以上跑到市委市政府,请求联营。市委在上下压力、比较被动的状况下召开常委会专题多次研究“傻子瓜子”问题。据说,最后那次决定了“傻子瓜子”后来命运的常委会开到午夜零点才结束。

曾经给芜湖带来很大荣耀的“傻子瓜子”,如今却像是沉重的包袱,拖不垮,砸不烂,甩不掉。市、区两级领导对于公私联营的“傻子瓜子公司”成立的前前后后,大有不堪回首之状。一位市委副书记说,“当初我们就不同意联营。”

新芜区区长说,“我们也没办法,是市里的意思。”

省里压市里,市里压区里,催熟了“傻子”这个怪胎。都是为了执行上级的指令。

当然,在主观上迫于形势压力,勉强面为之,但在客观上却是一举两得:一是在政治上赢得了一票,支持个体户嘛;二是弥补了“看不准”的漏洞,使有影响的私人经济自觉不自觉地纳入了社会主义轨道。

于是，一个由新芜湖区、芜湖县清水镇和“傻子”年广九拼接起来的公私联营终于出笼了。年广九以技术和“傻子”商标不计价入股，任公司总经理，副市长袁绍卿任名誉董事长（后退出），新芜区和芜湖县清水镇共出资三十万元入股。利润“三三”分成。

联营给年广九带来的好处和权力是不言而喻的。作为总经理的“傻子”年广九，可以随便支取公司的现金，自己用的粮食、煤、食油都派人到加工厂食堂拿，许多私人用高档消费品都在公司报销。

年广九私人拖欠公司款项达到二十二万五千多元，有的大宗款项拖欠了两年多。就此事，“傻子”解释说：“我还有外地寄来的私款存在公家账号上。”可是会计科查账后认定，傻子的私款目前只剩下一千七百多元，即存款远远不抵欠款。由于“傻子瓜子”公司是公私联营公司，只能视傻子年广九长期拖欠大宗公款。

一九八五年初，市卫生检疫站到公司宣传《食品卫生法》，年广九却说：“你们别跟我说法不法，在我这里没有法。”

一九八六年初，审计部门依照《审计法》要公司申报有关数据，他却命令手下的人不准报，并声称，“谁报开除谁”。

至于他截拆工人私人信件、赌博、非法拘留人……都是有案可查的。

这些行为，加上弄虚作假的“有奖销售”、倾销霉变瓜子等等，如果落在别的任何一个人身上，后果都不堪设想。

值得深思的是，“傻子”的这些所作所为，毫无讳忌，当地政府和有关机构全都清楚，可是却表现出了少有的“耐心”和最大限度的“宽容”，以至于芜湖的老百姓称年广九是“特殊公民”，知情人愤怒地说，如果改革改到最后，改到了这种份上，这种改革还有什么意义？“傻子”、“傻子瓜子”曾给芜湖市带来活力和荣

誉,对于偏于一隅的一个地区来讲,这种“典型”百年不遇。“傻子”曾有一段时间跑到外地炒瓜子。一位副总理批评“芜湖留不住人”。拍电视、上广播、登报纸,热热闹闹地,也不显得芜湖市寂寞和冷清。开会研究,市委书记市长过问,组织省市两级调查组,一致意见是继续扶持,“傻子”这块金字招牌不能倒!倒了,芜湖光彩何在?具体如何扶持,仅仅是“意见”而已,不落实。皮球从区里踢到市,市里踢到省里,省里又踢回来,来来往往两三年悬而不决。

说到底,是利益所系!要不然不会有那么多高级的人来花那么多宝贵精力费那么多口舌使那么多手脚来维护早已是摇摇欲坠的“傻子”改革家形象,来维护芜湖改革的大好形势!

贴金术

贴金术例一

前面提到,日本东京广播电视公司专程到芜湖采访“傻子”年广九。

日本记者来的前一天,市外办根据市里领导的指示,作了一番导演布置。决定由新芜区政府一位副区长负责接待,年广九和公司副总经理李作峰参加。

市里两级政府皆知“傻子”的为人,害怕他到时候胡说八道,有损泱泱大国的体面,有损芜湖改革的声誉,市里批示,要做好他的思想工作,主要由善于言辞的李作峰介绍公司情况。还特别叮嘱,“傻子”“要摆好‘企业家’的风度”。

市外办宣布纪律:不要“汇报”公司亏损负债情况,只“汇报”生产量和销售额。没有瓜子可炒,布置“迎春瓜子”公司炒。

市区上下,兴师动众,准备好了一套周密的接待方案,等到

明天来哄“东洋鬼子”。

可到了第二天下午按约定时间去宾馆会见日本记者时，年广九突然生变，他在家与彭小红打架，打得狼狈不堪。脖子被女方挠了好几条血印，血往外渗流，大夏天的，又遮掩不住。李作峰见状，说：“老年，下午会见外宾，你这个样子，就不要去了。我们就说你出差不在家。”

年无奈，只好答应。

大家都一片顺气舒心，年广九不在场，像甩掉了个大包袱。

日本记者如约到达。李作峰按既定方针办有礼有节：“年总经理出差未归，很遗憾。”

话音未落，年广九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摇摇晃晃到众人中间！“七月流火”的天气，他衬衣领口紧扣，很体面地遮住了脖子上的血痕，按照上级领导的要求，摆好“企业家”的风度，在外国记者面前一展“中国改革家”的雄资！

“傻子”的突然出现，大家没有丝毫防备，日本记者更是诧异不解。满屋子的尴尬！

所有中方接待人员密切注视“傻子”的一举一动，心都提到脖子上，五脏六腑被只耗子上下左右奔窜抓挠得不得安宁。

不过请诸位放心，年广九绝不是那种见洋鬼子就扑通下跪的孬种。他曾两次对我说过：“我们中国的好东西不能卖给外国人吃，要尽中国人吃，中国人不想吃了、吃不完了，再卖给外国人。”其“爱国鄙夷”的拳拳之心，可以想见。

地道的国粹！真乃国之瑰宝省之瑰宝市之瑰宝区之瑰宝，为芜湖的改革长脸增色！

贴金术例二

这是一个反证的例子

我查看“傻子瓜子”公司财务科为年广九专门建立的挪欠公

款明细表,发现一笔数额巨大的第一承包年度“承包兑现款”,十八万元!

“傻子瓜子”公司一九八四年十月开始实行董事会监督领导下的经理定额承包责任制,实行五年任期。一九八四至一九八五年为第一承包年度。规定承包人年度期满应交联营的另外两方定额纯利十八万元。新芜区十二万元,芜湖县清水镇六万元,董事会奖金按所交纯利的百分之二提取。公证处公证。

然而,公司由于受到禁止有奖销售的打击,到一九八五年底,实际亏损和潜在亏损加起来近二百万元。

区政府在当时是非常矛盾的。公司在银行贷款一百多万元,“担保人”是区政府;公司三十万元的投资中,区政府占二十万元。一方面,他们对年广九表现出极大的不信任,想尽可能多尽快地收回投资,减少亏损;一方而又迫于当时政治形势的压力,只能对“傻子”采取扶持措施。故此他们以“兑现承包定额纯利”的名义,清理了部分“债权债务”,没有钱,用货抵。新芜区得到了价值十二万元的积压陈瓜子,清水镇得到了六万元的煤。

年本人却没损失一根毫毛。瓜子和煤都是国家贷款所买,他私人没花一分钱。结果只能是加深了“傻子瓜子”公司的债务危机。

政府名为扶持,实质上是落井下石!逼使年广九在社会上坑蒙拐骗,从消费者身上榨取不义之财。

“傻子瓜子”公司在完全失控的状态下经营,其肆无忌惮的程度令人瞠目。这给外界制造了一个僵而不死和虚假繁荣的景象。

然而,在它的背后,区政府三位“董事”实际上“不懂事”,第一承包年度还得到二千一百元奖金(存放至今没敢发)。原区长有一次住院,堂堂皇皇地收下了“傻子瓜子”公司的“慰问品”——一床纯毛高级毛毯。

利用与被利用,互相利用的关系,在芜湖根本不是新闻,路人皆知。

黑色传播

一九八七年九月的一天,“傻子瓜子”公司外围满了看热闹的人。一伙北京来的人在拍电视。

开机。摇——。芜湖“傻子瓜子”公司的大门。人们进进出出,生意兴隆。

摄影机夸张地表现着公司内部曲里拐弯的走向。

定格。貌合神离的年广九总经理和副总经理李作峰在研究工作:品尝瓜子。

分切。中山路“傻子瓜子”公司批发部兼门市部。

(话外音:这个批发部与年广九“傻子瓜子”公司没有法律上的关系,但是挂着“傻子瓜子”公司批发部的大招牌。它系“傻子瓜子”的大儿子年金保“金保炒货店”的门市部。这是芜湖市面上能看到的奇观之一。)

长镜头。“傻子”笑容可掬称瓜子,群众购货踊跃。

(话外音:“傻子”自当总经理后,第一是没地方,第二也不可能去称卖瓜子。然而称瓜子似乎是外界印象中“傻子”的标准形象。非此不能代表他的风貌。)

镜头对准香店村“傻子瓜子”公司加工厂。工人们手推肩扛运瓜子,一派生产繁忙景象。“傻子”站在炒锅旁向青年工人传艺。

(话外音:公司当年无钱进生货,库里堆放囤积的都是霉变瓜子。)

.....

以上是中国电影刊授学院影视部为中央电视台拍的专题新闻

片《芜湖——思考的江城》(中央电视台播放时改为《芜湖改革散记》)中的一些镜头。

我有幸看到了该部与公司签订的《拍摄电视专题片合同书》。

“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

合同规定,乙方影视部在专题片中为甲方(“傻子瓜子”公司)安排一分钟播放内容,收取甲方摄制播放费三千元。制约的条款定道,“若该片不能在中央电视台播放,乙方应负责赔偿甲方全部损失费”;播放前,“如甲方不按期汇款,乙方有权不将甲方镜头编入片中”。新闻传播成了赤裸裸的金钱交易!“新闻价值”等于三千元钱!神圣的新闻真实性在这里像条狗,被三千元锁进了笼子!

拍电视专题片的“记者”在拍摄过程中可能也闻出气味儿有些不对,在芜湖宾馆问公司的汽车司机小侯:“你们公司的经营到底怎样?”

小侯实话相告:“内外交困。”

“记者”却默然没有吭声。

真理与金钱如同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必择其一。最后的结果,证明了“记者们”的选择。严格地说,也不能强求他们,合同写得明白,他们与什么乱七八糟的改革根本没什么关系,出来就是为了挣钱。

《芜湖改革散记》的拍摄,芜湖市委宣传部从向企业筹款到审查解说词予以充分的合作。这部片子,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还由芜湖电视台播出了。

我向宣传部新闻科长请教。他说:“专题片不是新闻,是广告!”

我钦佩他卓越的解释和宣传组织工作!同时也为本文引言部分描述的该科长拦阻我上船的行为作了一个绝好的注释。

再看温元凯作序的《傻子别传》，翻开版权页：

作者：朱华 解正中 呼安泰

出版者：济南明天出版社

字数：90000 印数：1-5000 1986年5月第一版

定价：0.93元

这些枯燥的数字后面，有着肮脏的交易！

这本按印数五千册报税的书，实际上印了X万册。单是“傻子瓜子”公司就签合同购买了一万一千零四十册，至今还有一万多册积压在库房里，牛皮封纸都没拆，上面积满了灰尘。更有意思的是：作者在出版社领取了稿费后，又向“傻子”领取了五百元的犒赏。

难怪在《傻子别传》中，“傻子”被描绘成有理性富有人情味懂“爱情”机智幽默正直侠义有开拓精神的强者和备受社会误解的“改革家”！

在这里，良心和灵魂太便宜了，只需花个三五百元就能买到！

社会舆论环境就是这样形成的。

我的面前堆满了历年有关“傻子”、“傻子瓜子”的报纸剪贴、杂志、书籍，足有几十万字！读完一遍要有极大的耐心和毅力。这一点我深有体会。特别是当我摸清了事实真相后，再去看那些肉麻的文字，再去与那些电视、报刊的同行们交流。

这是一个富于中国特色的传播现象。归纳起来，不外有以下几种：

“唱中心，写中心”。这是我们的大众传播媒介和新闻记者有着光荣传统的职能。根据上面的中心任务，塑造（或制造）“典型”，随潮涨潮落面朝三暮四，比如上面说“要大力支持个体户或私人经济”，在一个统一的论调下分门别类、排队梳理、对号入座，褒贬都视政治气候而定。

有一类文章,可以看出作者都怀着满腔的热情来为社会的新事物呐喊、捧场。他们对旧体制旧习俗不乏鞭挞之力,他们对改革的大潮更不乏推波助澜之功。然而他们犯了一个大错误:他们太过于多情,他们敞开胸怀拥抱每一个“女人”,而不睁眼看看“她”是否属于自己。还有一种就如上面所述,纯属出于低级和卑劣的目的,钻了改革的空子。

在芜湖,他们殊途同归,谱就了关于“改革家”年广九的宣传主旋律。

大跃进大炼钢铁人民公社共产风三忠于四无限大斗争大批判大学习树典型以点带面……阳光下的黑色传播……大众传播机构和我党的新闻工作者曾几何时在历史上扮演了这许多不光彩的角色!

悲哀,一种莫名的悲哀……

第六章 荒诞与悲哀

痞子运动

“傻子瓜子”公司经理室。

“咔!”玻璃碎片四射。“咔”碎木横飞。一把改锥恶狠狠地撬开办公桌的抽屉,公章被取走;一把巨大的毛笔蘸满浓墨在墙上胡乱飞舞。

读者也许以为这是位“梁上君子”的杰作,非也!此幕上映之时,尚有一位公司副总经理、几位公司职员目瞪口呆地旁观。

这场闹剧的主角,便是令人尊敬的“傻子瓜子”公司总经理、

当今中国名传四方的改革家年广九。

年广九后来对我说：“我砸桌子有什么错？我是总经理，总经理砸个桌子有什么不可以？”他有着变了形的自尊，表现出来的却是滑稽；他出身贫苦，却没有穷人的那种朴实和真诚；他极度的愚昧无知，却没有起码的气度和谦逊；他想一夜之间金钱像河水那样哗哗地流，却又缺乏那种含辛茹苦励精图治扎扎实实的企业家品格。

他非常认真地保持着一副“俨然”的姿态，而这种姿态是被他在底层社会生活时理想化了的東西。他津津有味地体验着，这使他不管在什么场合的言谈举止都表现了极浓的戏剧性，让人啼笑皆非。

有一天，我与他在他的卧室聊天。进来一个年轻人，声音低而谦卑：“年总经理，给你的信。”

信是一张纸，没装信封，折叠着，字没写满。他煞有介事地打开展读。

上眼皮吊着，眼睛朝下眯觑着，品察个中滋味。一会儿，他也觉得老端着这架势挺没意思，给来人悄悄地使了个眼色。

来人心领神会地退出门外，年亦跟出，还在我的视野之内，他就身子朝后仰着将信递给来人：“念！”

芜湖炒货行业可以追溯到本世纪四十年代文林炒货店。解放前有个潘顺强炒货店有些名气。一九四六年冯玉祥从大后方北上，过芜湖，潘氏炒货店的老板潘龙彩前去拜谒，席间想找冯玉祥筹措些资金，以图发展。冯说，我是个当兵的，哪来钱借你？这样吧，我给你的炒货店题个字。凭着冯玉祥的题字，潘氏炒货店在江东算是有了些名气。这块冯玉祥题的牌匾，“文革”当中被当作“四旧”砸了。炒货行业在芜湖，从一九五六年完成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后，已是萧条不振。特别是“文革”之后，几乎绝迹，成了城市居民“春节”才能供应的食品。几

十年的光阴,只能供人们思想的现实是,对于吃饱肚子维持最基本的生存条件来说,嗑瓜子又能算得了什么呢?人不要说有享受的权利,连生存的权利都受到了威胁。荒唐的年代里,社会排斥瓜子作为一种商品存在,已经到了可笑的地步。当三中全会对外开放、对内搞活后,全国瓜子业以芜湖为中心突然像注进了魔水,迅速地膨胀起来。而“领导”时代新潮流的竟是社会地位十分卑微的“傻子”年广九。可以说一夜之间就使炒货业发生了一场根本性的变革,同时也极大地启发了一个长期僵化封闭的社会遵照价值规律发展经济的思路。这种冲击非同小可,任何当时的现在的正人君子们理论家们社会活动家们都不敢低估了他的历史作用。傻子本人也深知这一点,每遇官司,每遇犯法之事被人揪住,每每耍泼耍痞。他都会大嚷:“谁敢搞我?我对芜湖瓜子有贡献。总理说了!黄璜说了!”经济纠纷调解有摩擦,他立即会不顾谁在场甩袖而去。“咱们北京见!咱们天安门见!”这股子痞劲,使大家茫然失措。

他最值得炫耀的东西是什么?

他对我说:“我一生有三件宝,第一件宝是我这只九钻金戒指。”

他右手伸到我眼前,挺直中指,戴在下指节上的钻石戒指熠熠生辉。

“数一数,看够不够九钻。”他不管我愿不愿意,把手又伸近了些。

“一,二,三……九。”我无奈,一颗一颗数。“对,九颗。”

“三千多美金买的。”

“哪儿买的?”

“金陵饭店。”

“美金哪儿弄的?”

“个体户就没有美金了?!”他头向上一扭说。

“第二件宝，是我屋里这套红木家具。标价四千八百多元，加上请客送礼，买下来，花了五千多元。现在可值钱了，有个日本人愿出两万元买，我都不卖。”

“第三件嘛，就是我的‘傻子瓜子’商标。”

与年广九接触断断续续半个月，加上查阅他的背景材料，采访他周围的人，都让我有这样的感觉，他就像雅各布·布克哈特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一书中所写到的“内心自省和外界观察……处于睡眠或者半醒状态”浑沌未开的中世纪人。

年广九出身十分贫寒，父辈从淮北逃到芜湖，被人蔑称为“北方伢子”。他成家立业后，赡养着老母亲、妻子、三个儿子。六张嘴，一个人挣钱，贩了二十多年的水果。“文革”前曾以投机倒把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生活是这样的无情和艰难，没有精钻的经营之道，是很难维持一家六口生计的。其实他的阅历不是很复杂，一九八一年出名前，活动区域主要就是在芜湖大街小巷间。社会长期打击和限制个体经济的发展，决定了他的生意只能是小打小闹。那么怎么会突然冒出来成为一时间中国商品经济中家喻户晓的风云人物？

民间对年广九的概括有六个字：“文盲，法盲，流氓。”

市委书记和工商局对年广九的概括是九个字：“文盲，法盲，流氓无产者。”

他来自社会的最底层，备遭社会歧视，为社会所抛弃而走上贫困的绝路。不能否认这种人身上有一股子翻天覆地的潜能。他一无所有。要么窝窝囊囊像猪狗一样活着，要么痛痛快快折腾像个人样。他没有任何负担，没有任何羁绊。

由“傻子”年广九，我想起了鲁迅笔下的阿Q。

住在土谷祠的阿Q起事自称革命党，也令未庄为之动摇，也令赵太爷之流心惊胆战。然而，迎接他的不是“性感”的吴妈和财主的深宅大院荣华富贵，而是“嚓嚓嚓”，砍头完蛋！

“傻子”、阿 Q、阿 Q、“傻子”，他们身上的那股子“痞”劲，对中国社会变革的力量颇有概括力。把他们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来考察，他们的力量所形成的“痞子运动”冲击瓦解旧的体系和结构，然而，这毕竟是一种“社会无组织力量”，不能代表新社会的形态，最终为社会所淘汰。

我们心中的魔鬼

从芜湖采访回到北京，去前门吃了一次刚开张的美国“肯德基家乡鸡”。

三层楼，挺巍峨。门口站着“肯德基家乡鸡”的创始人“肯德基上校”的塑像，白头发白胡子老头，胖乎乎，可蔼可亲。这位“上校”，原不过是美国肯塔基州某偏僻加油站的小老板，为了方便来往司机，制作和出售一种涂有特殊佐料烤熟的鸡腿鸡胸脯，因物美价廉而风靡欧美。目前，已在世界五十八个国家开设了七千四百家快餐厅。而今，美国佬把店开到了正阳门的大门口！

吃完“肯德基家乡鸡”，心里很不是滋味。为什么“傻子瓜子”不能像“肯德基家乡鸡”、像“汉堡包”那样发展起来？“傻子瓜子”刚崛起时，无论如何是很优秀的，而且势不可挡。为什么就这样一步步走向衰微？

一九八四年，是安徽省和芜湖市颇感自豪的一年，大联合代替了一盘散沙，大有些一九五六年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气派。“傻子”、“胡大”两家公私联营公司相继成立。有些并非自愿，大势所趋的味道。

年广九呢，得到了一系列社会荣誉，芜湖市瓜子经营研究会执行会长、芜湖市新芜区政协常委（一九八七年按法律程序落选）。

公私联营的思想理论基础在骨子里是些什么东西，前面已

经提到。人们认为这样一来,私营经济这只不安分的“鸟”就关在笼子里了,就上了马嚼子了。

年广九为何要给省委书记写信来压芜湖市与他联营,既有他经济上的原因,也有他政治上的考虑。

于是公私两个经济动机、手段、目的截然不同的怪物坐到了一条板凳上,各怀鬼胎,互相制约,结果只能是两败俱伤。

一九八五年以后,公司亏损一百多万元,年广九多次在公开场合说:“亏钱?我怕什么?亏的是共产党的!亏婊子儿的!”

他知道有人把“傻子”、“傻子瓜子”当金字招牌打,他屡屡抱怨,“他们把我当猴耍。”他要开除政府派来的秘书。秘书说,这是社会主义企业,不是你年广九的天下。

年广九既是总经理,又是私方老板。劳资关系在人们的观念中仍然摆脱不了雇主和雇工的关系。谈及此点,人们往往谈虎色变。

马克思曾经讲过这样一个故事,英国有个资本家雇用了一批工人渡大西洋印度洋到蛮荒之地澳大利亚,企图发财,可是工人一登上澳州大陆,都作鸟兽散,这个资本家枉费心机,落得个破产的下场。马克思嘲笑那个资本家破产是因为他不懂得澳大利亚没有英国那样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这个故事所阐述的道理是非常深刻的。

我们心中有个魔鬼,我们怕它,然而它来了。

传说“傻子”年广九乐行善事,破财免灾。他告诉我,有次不顺心,跑到九华山,扔了大把香火钱,定要剃度为僧。老和尚相其面后说:

“去吧,你与佛无缘,气数仍盛,事业还会发达的。阿弥陀佛!”

他欢天喜地下山来,以为定是上天有眼,让他捐了个好运。

是恨?是怒?是悲?说不清楚我现在是一种什么心境。在

这个被社会揉碎了、分解了、异化了的变态的弱小灵魂面前，我实在是恨不起来，怒不起来，虽然我曾是那样地恨过怒过。现在我只是深深地感到悲哀。

离开芜湖那天，轮渡把我带到长江西岸，我被一种情绪震慑着：芜湖城在莽莽大江的东岸，蒙胧苍茫，隐约可见赭山逶迤南行；这座城市，在浑黄而宽阔的江水中，像一条年久失修的大船，几分从容自信，几分落魄悲凉，向东方缓缓驶去。这里的长江，全然失却了“汹涌澎湃”、“卷起千堆雪”一往无前的气概，收敛、含蓄、平和，以那包容宇宙万物的东方哲学，不露声色地把脚下这块土地深深地切开，迂回蜿蜒，顽强地冲刷和改造着地层的柔软部分。迫使东西两块陆地往相反的方向漂移，不由分说，不容逆转。江心一艘甲壳虫般大小的驳轮，“扑扑”地喘着粗气，后面牵引着七八条货船，在长江宽厚的胸膛上游弋。

.....

我想起了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说过的一句话：

无论在物质方面还是精神方面，所谓进步，都是建筑在我们无法忍受的损失之上的。

正是在这个时候，历史又翻开了艰难的一页……

一九八八年三月十七日凌晨二稿 于北京木樨地

“关广梅现象” 回 顾



关广梅的“租赁改革”曾被认为是中国改革的标志。她的出名，很大程度因为《经济日报》“姓资姓社”大讨论。

世纪末感言

关广梅在一九八七年可是个家喻户晓的人物，她在辽宁本溪从事的“租赁改革”被认为是中国改革的标志，她的出名，很大程度因为《经济日报》“姓资姓社”大讨论。一九八八年初，我到本溪调查关广梅租赁改革。结论是：一、本溪关广梅租赁承包责任制改革，基本上是一出闹剧；二、一九八七年《经济日报》大讨论也基本上是一出由报社导演的闹剧。

我到本溪发现了两个让我惊诧不已的事实：

一、关广梅任总经理的本溪东明商业集团，没有获得法律资格，关广梅既不是集团的法人代表，也不是下属八个有独立法人资格商店的法人代表。关广梅正是在这种长期不合法的状态下，参加包括党的十三大在内的各种政治、经济活动。

二、关广梅那封导致“姓资姓社”大讨论的给《经济日报》的信，是《经济日报》记者、本溪政策研究室“提升”、“拔高”关广梅本意而炮制的。而且，《经济日报》记者对待关广梅的态度前后不一。

我发现，建立法治（当时我用的是“法制”），建立市场经济秩序这样一些改革的目标，却被所谓的“改革”和“改革者”蔑视。我对那种用“运动”的方法搞改革提出了质疑。这种质疑，今天也有其重大的现实意义。

——作者

序 篇

这件事,如果不记录下来,永远是我的一块心病。

两年前,命运促使了我的本溪之行,采访当时著名的改革家关广梅。

辽宁仿佛是一块圣地,哪一个时代都诞生过轰动全国的明星或典型人物。然而,从国际国内的政治影响来看,“关广梅”的名字是最响亮的。

人们不会忘记,一九八七年中国的一家大报——《经济日报》展开的那场轰动全国的“关广梅现象”大讨论;人们不会忘记,在党的十三次代表大会上,关广梅女士成为改革明星,受到中外新闻媒介的追踪;当然更不会忘记,在与会中国企业家的新闻招待会上,面对数百中外记者,她镇定自若,对答如流的情态。

“关广梅现象”大讨论和连续报道,先后历时四十多天,收到一千多封读者来信。《经济日报》后来总结说,“‘关广梅现象’这一概念经广泛传播后,已经成为评价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改革性质的一个代表性词汇”。

一家全国性的大报拿出这样大的篇幅、历时四十多天对一种社会热点现象展开大讨论,其规模之大、时间之长、影响之广,在中国新闻报刊史上和政治生活中都是非常罕见的。正因为如此,一九八八年度在本溪评定的全国好新闻作品,“关广梅现象”大讨论和连续报道荣获特等奖。这是中国年度好新闻作品的最高奖,相当于美国一年一度的普立策新闻奖的桂冠——公众服务奖。

如果说全国好新闻定评复评阶段由本溪钢铁公司赞助在本

溪市进行不是偶然的话,那么,我的本溪之行却是极其偶然的。

并不像关广梅女士多次在公开场合所说的那样,我是“去专门挑茬的”。当时,我负责编辑《中国青年报》的专栏:“承包租赁在改革中”。编辑部从陆续传来的消息中断定,本溪值得出一篇探讨租赁改革的有分量的文章。宣传改革、张扬改革,支持改革者,为改革者呐喊,是本报一九八七年复刊以来最大的特色。可是,本报从本溪回来的记者手里所掌握的材料,难以在相当深度下成篇,编辑部决定派我前往本溪。

我是抱着支持改革者、探索中国改革出路的良好愿望赴本溪采访的。然而,本溪发生的事情却与我的初衷相悖。一系列怪事把我搞得无所适从,促使我必须从新的角度、必须持更严肃认真的态度来认识本溪的改革,认识“关广梅现象”。尚有的一点儿理性告诫我,必须在错综复杂的事件面前把原来的设想调整一下,保持应有的冷静。

没有任何协助的独立采访,既艰苦又富于挑战意味。

本溪十多天的采访,我掌握了大量的确凿无疑的事实,这些事实使我对“关广梅现象”作出了完全不同于时尚的结论和解释。一种发现了非同小可的独家新闻的职业快感,在那些天里,在以后相当长的时间里,深深地浸染着我。我很亢奋。因为它将告诉公众本溪改革真相,告诉公众大讨论背后潜藏着的某种非理性,以及这种非理性已经给和可能给中国的改革带来的影响。

我匆匆赶回北京。

在孤灯冷照下,我送走了“五一国际劳动节”。

《“关广梅现象”之怪“现象”》。我虔诚而忐忑地把这篇四千多字的文章交上去,并虔诚而忐忑地静候着它的命运。

报社的反应异常平静。可是在这异常平静里,不断地从外报传来我的稿子被枪毙的消息。这令我奇怪,后来我才知道,我

在本溪采访活动被先期到达本溪参加全国好新闻作品评选的《经济日报》记者通报了北京。我前脚走,好新闻的评委们后脚跟进本溪。这是个事关重大的事情。按时间推算,如果没有什么问题,我的文章完全有可能在全国好新闻公布之前发表(一九八八年度全国好新闻作品于一九八八年五月十四日公布),如果是这样的话,也就完全有可能影响“关广梅现象”讨论的评选。任何一个读过《“关广梅现象”之怪“现象”》的人都会得出这个结论。全国好新闻定评复评阶段评委、本报已退休的一位总编辑事后读了这篇文章,说如果这篇东西发表,可能就是一九八八年的特等奖新闻。

稿件遭到了强有力的干预。

报社总编辑会议,严肃、认真、慎重,考虑到多方面的因素,以压倒多数的结果决定:稿件送审。

这类稿件,送审就意味着“枪毙”。

“送审”,是枪毙这篇稿件的最完美的形式。

今天,翻开我的采访笔记,再读我的文章和为此而写的其他文字,不由得慨叹,当时的判断和忧虑,不是没有道理的,但是没有得到应有的理会和重视。

我的判断应验了。关广梅领导的“本溪市东明商业集团”在我去的第二年便解体了。这不是她的过错,而是时代的过错。

我应当承认,我对当时风起云涌的改革抱着非常复杂的心情。我曾是那样热情地拥抱各种各样各个领域的改革,同时也为某些“改革”和鼓吹“改革”可能会带来的后果而深深地忧虑。一种可怕的预感一直笼罩着我。

八十年代末是中国社会何等激荡的岁月!登临怀风,沧桑饱览的心境,实在是难以尽述。我感到遗憾的是,“新闻”成了“历史”。一位著名的西方历史学家说:历史始终是今天与明天的对话。这种对话,对我们今天和今后的生活还有意义吗?这

种对话,对中国的未来还有意义吗?可能现在已经不这样考虑问题了。人们可能会说,对话本身便具有意义。对话便意味着活力和希望。

如果说历史如同西部高地奔涌而下的大江大河,那么,我所要回顾的便是大江大河流经我身边的汹涌澎湃的一瞬间……

上篇 潮汐兮

本溪是一个盆地。在沈阳的东南面,她仿佛是松辽平原上与世无干的一块地域。

太子河穿流而过,传说一代英豪努尔哈赤便是诞生在太子河畔。

从天上看本溪,准确地说从人造地球卫星上看本溪,令联合国环境保护组织惶惑不解的是,这个有着三十多万人口的中等城市在地球上好像不存在。她的面目被钢厂等排出的工业粉尘完全遮盖了。以至于专家们说,本溪是地球上污染最严重的城市。

然而,本溪并不是以污染著称于世的。这个在辽宁排列第五的小兄弟,这个默默无闻地埋在沈阳南角山地中的城市,一九八七年一下跃上了改革潮头。她孕育了“我国商业改革中一个成功的试点”,孕育了“中国第五号新闻人物”(中国权威的政治时事刊物《半月谈》评定推出)。

到了本溪我才了解到,本溪不仅有“关广梅现象”,而且还有“李明现象”、“破烂王现象”、“工具厂现象”……辽宁出版的《本溪改革现象》中有详尽记载。

本溪是改革的摇篮。

本溪是改革“现象”的摇篮。

这自然引起了新闻传播媒介的热情关注。

一九八七的六月三日,《经济日报》一个实力很强的记者小组来到本溪。他们节奏很快目的性很强地工作了近一个星期。这是《经济日报》第三次光顾本溪采访关广梅租赁改革。就是这次采访使关广梅走向了全国走向了世界,正是这次采访使《经济日报》拿到了本钢赞助的特等奖奖金。

《经济日报》在本溪的采访活动,遭到了《辽宁日报》一位高级记者的非议。他在采访了关广梅后,在《当代》一九八八年第三期发表的报告文学《一九八七年中国第五号新闻人物》中说,有“两位对关广梅的改革持怀疑态度的”“驻辽宁专事经济报道的北京某报社记者来本溪采访,他们顺着‘群众呼声’而追踪”,结果,“关广梅‘是没有资本的资本家’的概念在两位记者的头脑里形成了,他们写出文章要在报纸上公开批评在本溪出现的以关广梅为代表的资本主义现象”。有意思的是,他指的“某报”,就是《经济日报》。他责难的“两位记者”,就是后来写“关广梅现象”记者组的两位主力记者。这真是个谜,关广梅租赁改革的怀疑者,怎么又是关广梅租赁改革的赞扬者!而且这篇报告文学的作者有意识地将《经济日报》总编辑与他的下属断裂开,在文字上看“怀疑”与“赞成”似乎是两家报纸,以此来说明总编辑“决策”大讨论的高明和记者“道听途说”的愚蠢。我不知道那两位记者读到这些文字后会有什么感想。然而,《经济日报》由审慎怀疑到迅速转变态度,记者由拂袖而去到大肆鼓吹却是事实。

“高明”也好,“愚蠢”也好,结果是“高明”和“愚蠢”的珠联璧合,这样才有了一九八七年六月十二日开始,历时四十多天“租赁企业究竟姓‘社’还是姓‘资’”的大讨论。让我们先来看看关广梅那封导致了大讨论的信的诞生经过。

一九八八年四月二十四日。星期天。本溪矿务局招待所。

“我是关广梅。”

关广梅进屋后自我介绍说。

为了这次会面我颇费了些脑筋。刚踏进本溪便有人告诉我，关广梅不好见，要见她的人太多，令她应接不暇。弄清了眉目，请一位与她相当熟识的市委官员安排了这次会面。

我们互换名片。她的薰香名片上用繁体楷书赫然印着：

本溪市東明商業集團總經理

“听说您来本溪一个多星期了，也没到我们那儿去坐坐？”她的声音有些沙哑。

“您生病了？”

“嗓子眼儿长息肉，没关系。”她说。

她坐进沙发里，“嗷啦——”，拉开人造革皮夹，取出一个小红笔记本和一支圆珠笔，很郑重地放在茶几上。

她全然不像外界传闻的“孙二娘”形象，也不像一九八七年十三大中外记者招待会上侃侃对答的女改革家。

隔着茶几，她坐在我对面，西服里套着件黑毛衣，就是十三大答中外记者问时穿的那件黑毛衣。脸有些浮肿，似乎有些疲惫，但是，那对黑色的眼睛，和善友好中又带有几分探寻和警惕。总之，一言、一行、眼神、微微前倾的坐态，都让你能感觉到，她是个可靠的热热乎乎的老大姐。

我无论如何不相信，我面前这位“老大姐”般的女经理，就是“经济日报”头版头条那封思维宏观、逻辑严谨、理论色彩很浓的公开信的作者。

我相信我的判断。

谁是“信”的原作者？

因为这个问题涉及记者和媒体的职业前提——“真”与“假”，我认为是解剖“关广梅现象”，解剖八十年代中国改革思路和方法首先要搞清楚的问题。我的调查便是从这里开始的。乍

看起来,程序是无可指责的:一个勇于创新的女经理在改革举步维艰的情况下非常苦恼,致书编辑部,编辑部根据信的建议展开讨论,然后是记者采访,发表文章……

我在本溪市委采访,知情人告诉我,“他们是带着打印好的提纲下来的。”

也可能是我孤陋寡闻,当我在本溪市委政研室高大明亮的办公室里采访时听说关广梅那封著名的信,在很大程度上与关广梅无关时,我感到万分震惊!

市委政研室的几位官员在接受我采访时,平静地告诉我,关广梅致《经济日报》的一封信一共写了三稿,分别由三个人完成:

第一稿,市委政研室流通处副处长李欣欣;

第二稿,《经济日报》记者;

第三稿,关广梅的副手、东明商业集团副总经理李明。

本溪市委政策研究室在本溪的政治经济生活中,是个举足轻重的机构。他们上可以与决定本溪命运的书记们直接对话,下面情况亦是了如指掌;既是市委经济理论的研究写作班子,又是本溪几个“改革现象”的直接推动者。被本溪人称为“军机处”。

一切都是在北京设计的:大讨论由关广梅的信发轫。《经济日报》打印好的提纲得到本溪方面的认可。经过多次讨论后,决定由政研室来写“信”的第一稿。政研室根据关广梅所谈的租赁改革所遭到的各种非议和阻力,研究了一个思路,决定由李欣欣执笔。第一稿,二千多字,标题是《关广梅的苦恼》。

李欣欣,三十四、五岁,高挑的个子,热情、利索、机敏。在成百上千万插队知青里面,她很幸运,读了个工农兵大学,后来因那个学历“不好使”,又拿到了一个函授本科学历。后来她调到北京中央党校马列主义教研室,给我打来电话,称我是“敢于在本溪进行独立调查采访的唯一的记者”。我们现在成了朋友。

她是个有独立见解、令人尊敬的女士。她与政研室的其他同事一起自始至终参与了《经济日报》在本溪的采访活动。她的第一稿,据她回忆说,主要写了五层意思:一、出名后身不由己,惹来众多非议,开玩笑也被抓把柄,而且无法管理家庭,爱人不理解,孩子在学校也受牵连;二、社会上对租赁改革不理解,老百姓认为租赁就是为了捞钱,租赁经营就是坐收渔利;三、有关部门和领导不理解和不支持改革,不承认关广梅任命的干部;四、改革触及一些人的利益,得罪了那些好吃懒做和上惯了“太平班”的人;五、旧体制下的管理办法感到难以冲破,比如菜价,关广梅感到竞争不过其他国营商店,因为她没有国家的菜价补贴。我问李欣欣:“为什么第一稿没能过?”

“《经济日报》记者组看后对我说,你写的这些苦恼,所有企业家都有。你这种写法冲击力不大。他们说中央要开展租赁企业姓‘社’还是姓‘资’的大讨论。”李说。

“政研室的基本态度呢?”

“我们当时很犹豫,说,提那么高不好吧?但还是同意由他们修改。可是第二天他们拿来的修改稿,从观点到内容,可以说是重写!”

记者组本以为“修改稿”能得到默认,当天带回沈阳。殊不料,却遭到了抵制。本溪方面认为,不能因为“你们的大讨论,搞得我们不得安宁”。提出要再一次修改。

正在双方为关广梅这封“信”拉锯扯锯、讨价还价的当口,一个人物登场了。“信”的第三稿任务就自然而然地落到了他的身上。

他叫李明。

李明,三十八岁,中等身材,白净脸皮,走到哪儿都是衣冠楚楚,言谈举止,颇有些绅士风度。他在本溪在辽宁,都是个非同小可的人物。他的经历很不平凡,但可以说是青云直上:一九六

六中学毕业，一九六八年下乡，后来当煤矿工人、宣传科干事、本溪市委办公厅副处级巡视员，一九八五年一月当上了市委政研室流通处处长。他靠自学获得了辽宁大学经济系函授部政治经济专业和本溪电视大学中文专业两个学历。他的经济理论文章有四篇获省以上奖励，其中《政企分开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获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学术成果一九八二至一九八五年度论文类二等奖，《新华文摘》转发；《生产关系二重性与“左”倾错误的经济基础》是全国中青年哲学工作者最新成果交流会入选论文。无论是仕途还是学术成果在本溪这个小山城都非常显赫。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六日，他辞去处长职务，向全社会公开打着“名利双收”的旗帜，来到关广梅租赁企业给关当副手。此举被称为“李明现象”。

我在本溪与他有一段不浅的交往，关于他，我后面还要专门谈，因为他在本溪关广梅从承包到租赁、后来推出“关广梅现象”的过程中，都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

李明刚从沈阳回来，在一种复杂的心态下接了修改“第二稿”的活，因为当时他已与关广梅发生了严重的齟齬。

他在第二稿的基础上，采纳了一些本溪方面的意见，作了一些润色和修改，在《经济日报》记者组走后的第二天就交出了第三稿。经审查同意后，当天就送到了沈阳《经济日报》记者站。

记者组的头拿过第三稿看后，情不自禁地说：

“妙妙妙，太妙了！”

愉愉快快，圆圆满满，皆大欢喜。

关广梅说话，口齿流利，不怯场，善表达，在十三大的记者招待会上令中外记者叹服。这对一个只有小学六年级文化水平的人来说，已是难能可贵了。然而，让她把租赁改革升华到政治和理论的高度，确实有些难为她。

与她初次接触，就能感觉到她身上有一股朴实劲儿。

她把我那本“关广梅现象”报道讨论剪报资料册拿过去看，翻到她“写”的那封信，是她的观点，她就用笔打横杠，不是她的观点，她就不划杠或打括号。当她划到第三自然段时，就括去了租赁“被一些人认为是资本主义”几个很重要的字眼。

“这些不是你的观点？”我问。

“不是。”她说。

这位“关广梅”现象大讨论形式上的发起者，这位承担了很大历史责任的改革家企业家的举动是十分值得玩味的。

她还告诉我，“那时我们天天晚上讨论，有天讨论到晚上十一点，当时咱也觉得提那么大一个题目有点问题，如果‘租赁’真是资本主义，上面怎么交待？在本溪的讨论不是什么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问题。他们提示我，在全国租赁经营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你是怎么看？我才谈了一些看法。原来我没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后来我也同意接受了。我对报道不怎么在乎，也没去细研究，从来没有认真想，任其发展。”

关广梅这种无所谓的态度与大讨论所涉及的非常严肃的主题似乎不怎么相称。她看了“致编辑部信”的第三稿后说：“你们政研室说行就行。”也没有履行起码的文书生效手续——她没在“信”上签字便把“信”交还给了政研室的官员。

这时候来纠缠是否“签名”的问题，也许显得小题大作吹毛求疵，在改革的大趋势面前，在主宰改革命运的人们面前，这种小杂耍一般的文书手续又算得了什么呢？在强大的政治潮流下，在威名赫然的改革典型面前，这种普通人的自尊和法制观点又有何意义呢？

第三稿的“信”，就是见报的“信”。

为了阅读和比较方便，现将《经济日报》一九八七年六月十二日头版头条发表的关广梅致编辑部的分开信全文引录如下。可能枯燥、乏味，但却有助于分析了解“关广梅现象”产生的全过

程。

编辑同志：

我感到改革越来越难啦！

我从一九八五年到今年一月，先后个人租赁经营本溪市8家副食品零售商店，并在此基础上，组建成本溪市东明商业集团。这八家商店，租赁前盈利的，租赁后利润大幅度增长；过去亏损到连职工工资都发不出去的，租赁后扭亏为盈。国家多收，企业多留，职工多得。可是，在租赁后企业兴旺发达的今天，有人却说我是在搞资产阶级自由化，走的不是社会主义道路。

我想不通，什么叫社会主义？过去有人讲，社会主义就是人人有饭吃。可依我看，社会主义首先是人人要干活，按劳分配，不劳动者不得食。干多干少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那是社会主义吗？

所以，在我租赁的八家商店，对各店的经理、副经理都实行“委托经营责任制”，并试行了“百元利润工资率”分配办法，搬掉了干部的“铁交椅”，经理收入多少，首先决定于他管理的商店经营的好坏；职工都实行“百元销售工资率”分配办法，打破了分配上的“大锅饭”，每个人收入多少，也首先决定于他的劳动量，卖多少钱的货，拿一定比例的工资，一分钱卖不出，就一分钱也拿不到。但这些办法，被一些人认为是资本主义的管理办法，是不平等的雇佣和剥削，是“坐收渔利”。我无论如何不能理解：过去微利、亏损，甚至连工资都发不出的企业反而是社会主义，现在有了利润、有了奖金的企业倒是资本主义，真是怪事！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是实行生产资料的公有制。租赁经营，并不改变企业公有制的性质，所有权仍然是国家和集体的，并不是我个人的。我所从事的租赁经营，实际上是借助于租赁体制

的一种严厉的承包经营责任制,它是搞活企业的一种好办法,绝不是搞私有制,正因为如此,在我们企业中,党、团、工会组织是健全的,各项活动是经常的、健康的;思想政治工作加强了而不是削弱了;职工和我是平等的。也正因为明白这一点,我和职工们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看得同样重要。租赁后的商店,商品的品种远远多于租赁前,这是为了让顾客更有权利去选择;店容店貌也大大好于过去没有租赁的时候,这是为了使顾客有个舒适的购物环境;每发现一起乱涨价、缺斤少两、搭配销售、和顾客吵架的问题,从经理到营业员,都会受到比过去更加严厉的处罚,这是为了保护顾客的正当利益不受侵害——然而尽管如此,还是经常有人对租赁企业提出这样那样的指责。有的把我们实行经理兼书记的体制看成是“取消党的领导”;有的把我们的重奖重罚看成不要思想政治工作。特别是来自管理部门的挑剔和非难,使我们在改革的路上每迈出一大步都很艰难。而这些指责、挑剔和非难,越来越多起来。

在这里,我想请贵报特别转达我对本溪市委、市政府领导同志和那些赞同租赁经营的部门与同志的深深感谢。是他们的理解和支持,给了我改革的信心和勇气。可以说,我们本溪市商业租赁改革的每一步,都是在他们的鼓励与关怀下前进的。没有他们,本溪市的租赁经营既搞不起来,也深入不下去。

我不是完人。我们租赁企业也不是完善得没有问题的企业。所以,我们格外欢迎那些善意的帮助和出自改革愿望的批评。但社会上形形色色的流言蜚语,有的管理部门中个别人员的刁难和干扰,实在让我们租赁企业难以生存,难以发展。我就是为这事写信给报社,建议报纸上讨论一下,我们这种经营方式到底姓“社”还是姓“资”?

编辑同志,您能理解我们吗?

关广梅

“分工合作,流水作业,综合平衡,逐步拔高”。这是“信”从一稿到三稿,热热闹闹的效果。

为了改革大目标,各个时期要有各个时期的典型,经过长期政治训练的中国人对这些事儿最明白。你拎筐,我往里装货,按需供应,包你满意。辽宁新闻界传来的信息说,为了迎接十三大,辽宁某家报纸预备了十几个不同类型的典型,形势需要哪个就抛哪个。

这种时候,谁都明白,拎筐人绝不是凭空而来!

一九八七年的春天来得很迟。

从一九七八年党的三中全会制定“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政策以来,中国的改革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有人对改革开放开始怀疑发难。有人说,企业承包租赁是“搞私有制”,认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最深刻的根源来自经济领域。这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陷入了意识形态巨大的困惑之中。

在这个背景下,中央各大新闻媒介都在一九八七年的春天加强了对经济体制改革的宣传报道,为改革的社会主义性质正本清源辩证是非。

我在前面已经提到,作为中国经济方面的权威报纸《经济日报》曾三下本溪,采访报道关广梅的租赁改革。公正地评价,《经济日报》是一份报道我国经济情况、弘扬改革的优秀报纸。然而,在报道本溪租赁改革上,他们犯了“先入为主、制造典型”的新闻界的老毛病。《经济日报》二进本溪,时间是一九八七年五月初。他们派来了精明强干的记者。这位记者后来告诉我,他来的目的很明确,“报社指派写一篇宣传改革家关广梅的稿件”。派他来是顺理成章的:一、他是财贸记者;二、能力强;三、他家在

辽宁,父亲是辽宁省的上层人物,对辽宁省的情况比较熟悉。

他们来本溪工作了两天多的时间,接触了社会各届人士,包括商业局、蔬菜公司和租赁商店职工代表、市政协委员等。他们根据采访到的情况,改变了初衷。

这位记者与关广梅有一次不很愉快的谈话。谈话的主要内容是,首先肯定租赁改革的大方向,对关广梅租赁经营过程中取得的成果予以充分肯定,同时也就调查到的关广梅租赁中三个方面的问题,向关广梅提出了批评:

一、记者私访顾客,顾客反映东明商场物价比别处都贵。而东明商场是稠密居区的东明地区乃至本溪屈指可数的大商场。记者发现东明商店售货员上班时间嗑瓜籽,对顾客爱理不理;还看见顾客和售货员吵架。

二、关广梅租赁八家副食商店,后租的五家合同迟迟不签。本该一九八七年元月份签的合同拖至记者谈话的今天还只有一份“承诺书”,而且,在后五家的招标投标会上关大骂局和公司领导。这种作法不文明。

三、在刚召开的市政协会上,委员们反映了关租赁的副食商店服务态度、经营思想和计量上的问题。

回北京后,我到《经济日报》见到了那位记者。他说他当时的指导思想是,商业企业改革的唯一标志就在于是否有利于消费者。

当时,在本溪在辽宁,上上下下都知道《经济日报》要写关广梅的批评稿,省市委有关领导和部门也进行了干预。本溪专门派人赶赴沈阳阻止这篇并没有写的稿件见报,直至惊动了辽宁省委书记。

其实,传说中的批评报道并没有写,记者回北京后,只是交了份情况汇报。

应该说,这位记者的态度是非常严肃的。他完全可以站在

支持改革的立场上,对关广梅租赁承包中的一些问题视而不见,写一篇洋洋洒洒的改革家风云录。他没有那么做。这种选择,后来使他陷入了非常尴尬的境地。

《经济日报》三赴本溪时,他必须昧着良知,充当采访的主力记者。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一切全变了。《经济日报》三赴本溪,这次他们将在新的背景下审视关广梅这个改革典型和她的租赁经营。

还是这家报纸,还是这位记者,前后态度反差如此大,令本溪人迷惑不解。

当然,本溪人还是对《经济日报》给予了充分的合作。大家都需要,殊途同归。大家的本意,都是想“推动改革”,可是后果如何呢?

海上明月共潮生。

月亮和太阳的引力作用,引起地球海水周期性地运动,这种现象被称作“潮汐现象”。在半个月内,朔、望后,潮差最大,称为“大潮”;上、下弦,潮差最小,称为“小潮”。

潮汐兮——“关广梅现象”如同被朔、望之潮托起的一轮明月,在中国的天空上熠熠生辉。然而,作为一种改革现象,它一出现,便先天不足。它的存在所面临的挑战,恰恰来自改革本身。

中篇 共和国基石

本溪人在介绍本溪改革背景时,都不会忘了介绍本溪是个重工业城市,国家指令性计划长期占统治地位,自然地理封闭,

思想观念陈旧,被称作“一块板结的土地”。

在“一块板结的土地”上开出改革的花朵,何其之难。

正因为如此,本溪人非常珍惜他们的改革成果。

首先,我们不能否认关广梅在本溪乃至辽宁承包租赁改革实践中所起到的作用,不能否认她承包租赁的几家国营和集体的副食商店经济效益都在不同程度上得到了提高,她的举动冲击了商业系统旧的管理体制。她的胆略和勇气,无论从哪个角度说都是值得钦佩的。也正是由于这一点,我采访到的绝大多数人包括反对她的人都很敬佩她。

我们所知道的关广梅,是改革家、企业家;我们所知道的关广梅任总经理的“本溪市东明商业集团”,是租赁改革的成功范式。关广梅本人也因此获得了一系列的荣誉,并受到国内外的关注。

一九八七年七月七日的《纽约时报》称她为“本溪伟大的女性”、“一个成功者”。

发行八十多个国家的美国《新闻周刊》也于一九八七年七月以《大白菜与资本家——她脱离了社会主义道路吗?》为题发表专访文章。

一九八七年十月二十八日美联社的电讯稿,标题更是赤裸裸:“党代会上的明星是个有胆量的资本家”。

以本溪东明商业集团总经理兼党总支部书记的职务出席党的十三大的关广梅,在一九八七年十月三十日那天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被安排在主席台上,摄影机照相机的镜头都对着她。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她对答如流,语惊四座,令坐在她后边捏一把汗的本溪市委书记大大宽心。

外电外报纷纷发表文章盛赞关这次与记者的会见。

她已经成了中国改革的标志。

遗憾的是,作为政治观念上的改革家、企业家,作为政治观

念上的租赁者、经济人，关广梅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然而，作为法律上的租赁者和经济人，“她”是不存在的！

我们先来看看“东明商业集团”。

这是我国商业行业第一家企业集团。

在本溪采访，最令我震惊的是，关广梅“东明商业集团”不合法！

更为严重的是，关广梅租赁的原八家现三家副食商店（场）拥有独立的法人资格，租赁者按照国家工商法规和省市有关法规，在取得租赁权后，应该立即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唯一有权核准企业法人和法人代表资格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营业执照的变更手续，更换执照，只有完成这些手续后，方能视为合法经营。而关租赁副食商店（场）后，一直没有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变更手续，并取得八家租赁企业的法人代表资格。也就是说关广梅租赁企业，先后有一年多和两年、直到我采访她时的一九八八年四月底，长期无照经营！

从法理上讲，关广梅的行为不能代表法人的意志。再换一种说法，在法律上看，关广梅的任何行为是与她租赁的企业（法人）相剥离的，她不能在法律上代表她的企业！

这是我们不容回避的严酷的事实！

本世纪初的第二年，法国东方学学者让·樊尚·施伊尔在伊朗古城苏萨发现一根闪长岩石柱。石柱上端是巴比伦第一个王朝汉穆拉比王站在太阳神夏马西商前接受权标的浮雕，下端刻满了楔形文字。这根石柱就是现今珍藏在法国罗浮宫的著名的“汉穆拉比法典”。

那些楔形文字，是法典二百八十二条条文。

有意思的是，这部公元前十八世纪产生的集中了苏美尔人文明和智慧的法典，其中有相当的部分是经济条款，涉及到了物价、关税、交易和商务。也就是说，作为人类文明的一个重要标

志,人类社会在三千八百多年前就明确规定人的所有的经济活动必须在社会共同遵守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规则下进行。

一八二零年,南大西洋的圣赫勒拿岛埋葬了一位横跨两个世纪的科西嘉人。这个驾驭法国革命、改造了法国生活的人,这个给意大利、瑞士和德意志的新生活尊定了广泛而又深厚的基础的人,这个发起了十字军东征以来最伟大的行动、使西方势力滚滚冲入东方的人,这个最终把千年的思念引向南大西洋那块孤独岩石的人,用武力和《拿破仑法典》中的资本主义精神摧毁了欧洲封建主义宫殿。

拿破仑晚年曾自信地说:拿破仑可以毁灭,《拿破仑法典》将永垂不朽。

今天,在欧洲、美洲、大洋洲占世界二分之一的土地上还飘荡着《法典》油墨的芬芳。

法律,神圣的法律!

历史,仿佛要经历几次大的轮回。

一九八七年一月十日上午,本溪市最大的群众集会场所——文化宫正在开千人大会。横幅标语加彩旗,热热闹闹像过节一样。

市委,市政府,工会,妇联,商业局等有关局的首脑们几乎全部到场。今天是本溪深化改革的盛典:东明商业集团宣告成立。

市长讲话,市委书记讲话,局长讲话,……挨着讲,讲改革词,表改革态,立改革志。

在参加大会的局长里面,工商局局长心里很不是个滋味。

他是被捏着鼻子来的。他心里明镜一般,作为国家市一级工商行政管理机构的头来参加这种形式的会,而实际上关广梅东明商业集团这一实体性的集团未经批准,也没有在工商局注册经核准获法人资格,实在具有讽刺意味。

在法律面前,本溪工商界有识之士开始质疑!

本溪工商管理部门开始质疑！

本溪司法界开始质疑！

当然，本溪党的理论和政策研究部门的年轻理论工作者们也对其“合理性”作了官方的强有力的论证。甚至某位有实权的市委官员跟关广梅说：“只要你不以东明商业集团的名义签合同就没事。”

我国企业间以集团的形式进行的横向联合，一般分三种形式：紧密型、半紧密型、松散型。后者可以不获得法律资格，好合好散。而东明商业集团却不是这种形式。

东明商业集团的主要谋划者、原东明商业集团副总经理李明告诉我：“我们一开始就想把东明集团办成紧密型的，为此我们还成立了统一的集团内部管理机构。如外采部、工会等。”把关广梅租赁的八家有法人资格的副食商店以“集团”的名义聚拢来。

我们尽可以说那些对东明商业集团提出质疑的人士是反改革派和保守派，退一万步说，他们就是反改革派和保守派，他们反对了改革派的某些薄弱环节，反到了失误或者欠缺的节骨眼儿上，这些是值得改革派警觉并引以为戒的。正如本溪力主改革并推动改革的人士所说，改革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事业，它是一个探索的过程，没有一个完美无缺的范式可供我们借鉴，没有一个欢庆胜利的丰盛筵席等待我们入席。我们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就是没有这样一面挑剔的镜子，指出我们的黑暗、腐败、丑陋，指出我们的偏颇、失误、缺陷。我们的政治生活中，更多充斥着的，是政客、是吹鼓手、是阿谀奉承者，这帮人可以轻轻松松地在“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民不聊生的时候告诉你，“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这帮人可以昧着良心在“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饥荒灾年告诉你，“形势大好，而且一天比一天好”！

这是很不正常的。更何况，向关广梅提出质疑的各界人士，

绝大多数都有着支持改革、完善改革、维护改革和改革形象的良好愿望。

《经济日报》是了解这些情况的。

本溪的问题,被掩盖和回避了。

再深入调查,我发现了更多难以令人置信的事实。

关广梅在一九八四年承包了本溪消防商场,一九八五年发展为单个企业的个人租赁、承包、股份三位一体经营,一九八六年租了光明副食商店和全市最大的副食商场——东明商场,一九八七年与李明合租了平山、紫金等五家副食商店,组成“东明商业集团”。八家以经营副食为主的零售商店,有一千多名职工,是全市蔬菜公司所经营副食商店职工总数的四分之一,销售额和实现利润分别是全公司的三分之一和二分之一,被称为是本溪商业系统改革“三年迈出三大步”的典范。

关广梅与蔬菜公司明确租赁关系是一九八五年,然而,应集八家独立经营副食商店(场)(法人)法人代表资格于一身的关广梅,根本没去工商局核准法人代表资格并更换营业执照(按工商法律界的说法,就是没“翻牌”)!

当我在本溪市工商局查阅到关广梅八家租赁企业的原始档案后,实在是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关广梅租赁有一条流传很广的经验,八家副食商店(场)实行委托经理责任制。这是一种在表面上相似于西方发达国家的企业管理制度。然而,作为总经理的关广梅与委托经理之间没有任何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契约关系,委托经理对总经理实际只负“道义上的责任”。这意味着关广梅租赁群体管理经验材料上介绍的那种承租者“与委托经理及其保人共担风险的管理构架”,在法律上是不存在的。委托经理与总经理只能是负盈不负亏的关系。

我问关广梅:“你能驾驭得住吗?”

她很自信地说：“别说八个，十个、十八个都行！”

她的自信也许是有道理的。因为从法律的角度上看，关广梅租赁，也只能是负盈不负亏的关系。到目前为止，她并没有获得法人代表民事诉讼的权利，她所有的经营活动不能受到法律的保护和制约，完全可以不对自己的经营活动负法律责任！

本溪的租赁，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租赁，实质上是风险承包。租赁，作为一种经营形式应该说比承包更进了一步。它的精髓是，把法律关系引入到经济关系中来，将原来的纵向的行政关系确认为横向的民事法律关系。这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梦寐以求的东西。

本溪和关广梅法律关系的现象被工商界和法律界称为“大笑话”。

“荒唐”“大笑话”和“荒唐”的事情为什么能在本溪繁衍滋生，得到最大限度的宽容？

一九八七年是关广梅租赁的鼎盛之年，它的标志之一就是一月初通过蔬菜公司向全社会招标，她与李明合作新夺得了紫金、平山、高光、水塔、英勇五家副食商店。

一月六日。本溪北地。市蔬菜公司五楼小礼堂。招投标公开答辩会场。市委市政府市商业局等方面官员出席。包括关广梅在内的十五名好汉将在这里为八家出租的副食商店而角逐。

会场隆重、热烈、严肃，里面坐着三四百人，还有报社和电视台的记者。

投标十分制，标底五分，演讲三分，租赁者素质二分。实行评委无记名打分。

招标答辩会进行到下午出现了出乎意料的场面，评委对投标者进行打分时，有的评委对关广梅的素质打出了零分！

会场气氛随着关广梅脸色的变化而顿时紧张起来。

关广梅按捺不住，站起来对评委的打分表示抗议。并要求

改变程序,评委公开亮分。遭到评委的拒绝后,她便在众目睽睽下大骂出口。

“你们这些‘二层眼’(注:两位负责招标蔬菜公司经理都戴眼镜),你们搞的是什么玩意儿!……”

会场三四百听众为之大哗!

“租赁承诺书”签字时,又出了令人尴尬的局面。

作为甲方,蔬菜公司经理先上主席台,坐在朝听众的左边尽头,他见关广梅上台后,很恭敬地起身退出座位,想将关让进右边。(至今我弄不懂,经理完全可以往里挪出一个座位的地方,为什么偏要站起来把关广梅让进右边?是经理对“改革家”的尊重敬畏?还是男左女右的既定规矩?)

作为乙方的关广梅上台时没给经理先生留一点面子。主席台桌后一长条凳,七八米长,她楞是从左头绕到右头,围着长条凳绕了一周,像唱戏走台步,坐到经理右边签字。

她当众签了字,当众砸了笔。

承租人中标后,按程序要讲话的,答谢评委。关不上台。骂骂咧咧地说:“评委给我打零分,我还答谢他们!”

最后只得李明上台打圆场。

在场各界人士莫不为之侧目。

散会后,商业局一位副局长劝关:“小关呀,你别这样。”

她说:“这会儿你可解恨了。你算什么东西!”

市里的一位领导也来劝。

她说:“站一边去吧,你装什么好人!”

其实,蔬菜公司挺窝囊的。一位深知内幕的人告诉我。为了支持关广梅租赁改革,让关能顺利租到商店,蔬菜公司还为关广梅作了些手脚。

《本溪日报》一位摄影记者绘声绘色地告诉我,那天他整整跟了一天没挪地方。他说,那天气氛特别热烈,而且很有戏剧

性。开始时,关广梅投了六家副食店的标,认为是必胜无疑,在会场上与李明谈笑风生,表现出稳操胜券的风度。当评委打素质分时,她的脸一下就拉长了。当她投标六家之一的高峪副食商店被别人夺走时,她更沉不住气了。

他说,有意思的是,当宣布关广梅夺得紫金副食店,他的同学紫金门市部主任带着紫金商店二十多个参加会议的班组长,“唰”的一起站起来喊:“我们不同意关广梅租赁紫金商店!”

这位记者描述说,喊完口号后,奇怪,全场一片肃静,有人咳嗽,都是轻轻地压底了嗓门。“你当时为什么没有拍照片?”我问。“谈笑风生,脸色突变,骂骂咧咧,群众反对,绕凳签字,这是一组有趣的照片。”

“一张照片都没拍到。当时听说关广梅投了十家的标,心想如果关广梅十家都中标,拍张照片轰动一下。没去细琢磨,先入为主,报喜不报忧的思想,错过了一次抓重大新闻的机会。真后悔。当时那种场面,我们事先是不敢想象的。都惊呆了。”他说。

我真同情这位记者。

不过,即使没有照片,也能想象得到本溪这场值得纪念的改革活动的热闹劲儿、混乱劲儿、难堪劲儿、尴尬劲儿。

那天参加会的人,从政府和市委官员到普通职工,看着这一幕一幕的表演,心情都是很复杂的。我碰到的几个人,都是各说各的滋味。但有一种情绪是相同的:一言难尽。

如今谁不想改革?谁不想从改革中看到或捞到实惠?谁不想改变处处碰壁、互相掣肘、呆滞停顿、毫无生机的窘迫境遇?谁又想故意与“改革”过意不去,换来一片唾骂?人们实在是弄不明白。眼前发生的一切就是改革吗?

辽宁有一位报告文学作家为关广梅打抱不平,说,“这下认为关广梅胃口大贪婪的人,更可瞟她的白眼了;认为关广梅缺少涵养的人,可以找到注脚了。”

我们可以指责对改革者求全责备吹毛求疵的人,我们可以指责那些自己不干事又妨碍别人干事的人,我们可以指责那些对改革居心叵测以至损害改革前途的人,我们可以指责不能保障改革健康发展的旧体制,但是,这是否就意味我们可以原谅改革者没有理智的“勇敢”、没有规矩的“举动”,在要求别人正确评价自己的同时却不尊重甚至损害别人?

这种逻辑显然是推不通的。

在本溪,有许多似是而非的逻辑。

关广梅租赁,从内到外,法律关系混乱,正是由这些逻辑造成的。

让我们再来看看关广梅的租赁合同。

一九八七年一月六日,关广梅与李明合作,通过投标竞争,击败众多对手,在原租有三家副食店(场)的基础上,增租了五家副食商店。一月十日关广梅即宣布成立“本溪市东明商业集团”,并且当天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几天后便接管了租到的所有副食商店。然而,这一切的先决条件——租赁合同却在一九八七年十月二十一日才签定(注:这份合同没经公证处公证,而且由于种种原因实际上并没有生效)。签合同的时间是在十三大召开前的两天,而且这份合同是在市委的督促下才草签的。

从中标到签订且作为合同的“合同”,中间隔了十个月!

作为甲方即出租方的本溪市蔬菜公司自是有苦难言。

本来租赁是个有序的过程:出租方向社会公开招标,各方投标,揭标,根据招标启事所规定的要求和条件、参照中标报价利润,甲乙双方签定合同,公证生效,更换法人代表、营业执照,租赁经营……不料,签合同这个环节就卡了壳。乙方关广梅拒绝分签五家商店租期三年的合同,却向甲方提出了修改合同的“十二条意见”,几乎全部推翻甲方所拟合同的条款。其中最要害的是关广梅提出年度利润指标“三年捆算”(即盈亏损三年总算)、

“五家捆算”(即五家商店盈亏互补)。这些意见遭到甲方的反对。

甲方蔬菜公司的理由是:一月七日招标的商店不是五家,而是八家,而这八家的经济指标(基数)却是根据其不同情况而分别测算,乙方亦是依据“招标启事”所提供的“公开标底”分别投标而中标,所以提出“两个捆算”尤其是“五家捆算”没有道理,这只能使承租者风险度大大降低。

双方僵持了半年后,一九八七年六月二十九日,本溪市长亲自会同有关部门研究解决蔬菜公司(甲方)与关广梅(乙方)的租赁合同争执,就关广梅提出的“十二条意见”,提出了市政府解决的“十二条意见”。七月二日,关广梅听了市长“十二条解决意见”的传达后,说:“其中一、四、五、九、十、十一、十二条,我都同意;二、三、六、七、八条,没按我的《十二条》意见办,我不同意。差一条我也不签合同。”

这种口气已经远远超出了平等协商的味道!仿佛是说,我的条件,你们同意是它,不同意也是它。

主客关系完全扭曲了。

这真是一场马拉松式的较量。在这十个月的时间里,出租方蔬菜公司的主导地位开始倾斜、失重,只能抱着复杂而又无可奈何的心情眼巴巴看着承租方不签合同进行租赁经营,未经许可却成立“东明商业集团”。他们作出的最强有力的姿态仅仅是“不予承认”而已。

可能蔬菜公司在租赁的程序上有某些疏漏和不完善,合同某些条款与现行政策相悖并显得有些苛刻,对“东明商业集团”未获得法律地位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关广梅作为承租方,先租后谈,反客为主,造成租赁合同十个月签不下来的闻所未闻的荒唐局面,是不是也应该负些责任?

关广梅签合同与一般的承租人签合同似乎有质的不同。在

此期间,《经济日报》展开了姓“资”姓“社”的大讨论,涉及关广梅的甲乙双方的合同争执,竟被视为支持还是反对改革这一原则问题,关广梅成了本溪支持还是反对改革的分水岭。可能还有别的什么原因,于是关广梅的租赁顺理成章地得到了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人和党政机关权力部门的关怀。

一九八七年四月三日,关广梅提出“十二条意见”后,蔬菜公司即于四月八日向市商业局请示报告,就关的“十二条意见”陈述了甲方的“十二条意见”。四月二十七日,市委政研室、市体改办认真研究了甲乙双方的“十二条意见”,提出了“供有关部门讨论时参考的《关于对“蔬菜公司与关广梅新租五家副食商店合同条款”的意见》(也是“十二条”)”。其后,市长六月二十九日主持确定的“十二条意见基本上就是市委政研室、市体改办的“十二条意见”精神,然而如前所述,遭到关广梅的拒绝。

为这份特殊的租赁合同,来来往往,“十二条”运动,市委市政府非正式的会议多次,市政府正式会议两次。除了上述市长主持会议,还有一次正式会议由政府一位副秘书长受市长委托主持,工商、税务、商业、政研室、体改办、蔬菜公司等部门参加。会议一变市长原定的“十二条意见”,迫使蔬菜公司作出重大让步:三年捆算和五家捆算。

副秘书长说:“就这么定了!”

商业局一位副局长说:“不管怎么的,我要最后进一言,这个局面和作法不正常。”

说完离席而去。

蔬菜公司急了:“你们是不是以市政府的名义压我们?谁是甲方代表?我们的招标启事不是作废了吗?”

市委政研室有人反驳蔬菜公司:“我们在座的都是甲方。”

我在采访期间找到这位政研室的同志,他完整地陈述了如下意见:蔬菜公司认为我们偏袒关广梅,我们认为不存在偏袒的

问题,我们都是为了完善和推动改革。在资产所有者来讲,我们都是甲方。

这是公有制下财产关系模糊不清的一个最典型的例证。公有财产,谁都可以管,谁都可以不管;谁都可以负责,谁都可以不负责。

结果是,五家商店的分签合同作废,五家合而为一,一九八七年年终结算,五家捆算,在三家没有完成合同指标的情况下,以盈补亏,承租人仍获得了一万一千五百三十三元的收入。

本溪一位领导人说,为什么要那么为难改革者?为什么一定要看到改革者亏损才高兴,好像只有这种结局才能说明改革在本溪的胜利,才能证明关广梅改革的成功!

分析关广梅投标租赁的经济行为和动机是很有意思的。

一九八七年一月初关广梅和李明投标竞争,是本溪企图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步骤。实验的主要内容,就是于原行政系统之外,搞一套能敏感地反馈市场情况的独立系统,租赁群体(集团)由于财产关系、利益分配、风险担保和抵押、法律程序等许多要害问题在根本上没有解决,有所谓“明确”的,也是徒具形式。在这种状况下,无论如何不能保证经营者的经济行为不夸张变形。

他们以高出“基数”平均百分之百的计税利润指标而夺取了五家副食商店。其中平山副食商店,三年的租赁计税利润高出基数百分之一百五十四,最低的英勇副食商店也高出百分之七十二。

据有关人士讲,计税利润基数的核定是比较严格的,希望标投的越高越好,但也要有个限度。关广梅的高光、紫金、水塔三家副食店,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完成合同指标几乎是不可能的。

一九八八年初,关广梅与李明散伙分家,关被迫将上述三家的利润调低后划给李明经营,将划出部分分担在平山、英勇两个

盈利的副食店。

“你们为什么要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明明三家副食商店无利可图，为什么偏要去租呢？”我向这场戏的导演李明请教。

“当时，我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想扩大，搞集团实验。按关广梅的说法，就是斧底抽薪”。李明说。

说白了，是想通过高指标租赁架空并挤垮旧体制。

关广梅在多种场合说，他们出租一个我就租一个，而国营集体商业企业实行租赁正是大势所趋。

不是关、李的堂吉诃德精神可爱，就是呆滞的旧管理机器的可憎。二者必居其一。

租赁是改革，租赁是为了改革，即经济人经济行为的直接动力是带有很强政治色彩的“改革”，是某种社会责任感，而不是来自市场刺激，来自企业为生存而赢利的强烈欲望，来自改变个人政治和经济地位的需要。

这恰恰是几十年来传统经济体制下的旧的伦理道德关系的回光返照！

这种经济领域中的伦理道德关系是靠一种时尚的精神支撑的。一九五六年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一九五八是“大跃进”，“超英赶美”，文化大革命是“斗私批修”，“反修防修”，“抓革命，促生产”，“狠斗私字一闪念”。如今最时尚的东西，就是“改革”。这些旧的伦理道德系统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藐视理性、藐视经济秩序、藐视法律、藐视商品经济领域中由价值规律所决定的起码的规则、藐视人的情感和人的价值、藐视人功利和实用的追求，而这一切，却是改革所要构筑的共和国大厦的每一块基石！

进入本溪，考察本溪以关广梅为主体的租赁改革，很难让人有进入一个理性世界的感觉。

本溪市有小型租赁业二百三十三家，有关部门一九八八年

年初对其中一百三十八家进行了调查,结果是:有四十五家没有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变更登记手续,五十八家合同没有公证鉴证,七十二家承租人和保人没有协议和合同……这些最基础的工作被不屑一顾,却到全国和世界奢谈什么改革经验!

我曾与关广梅讨论她的法律地位问题。这是一次极有意义的讨论。

我被告知,她很忙,只能谈一个小时。

为了节省时间,我列了一个详细的采访提纲。我不想给她留下一个自命不凡的形象,更不愿意给她留下一个“蠢货”形象。

一坐下来,便是四个小时!

“东明商业集团为什么没有办法律手续?”我问。

“这事说起来就话长了。但是东明商业集团成立党总支,是市委组织部下了文的。”

“问题是市委承认并不能代表法律承认。”

“事后,我们专门去工商局补办,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办成。责任主要在甲方不在乙方。”

“这似乎不符合法律程序,应该是先核准,后成立。”

“我想这没什么问题。一月十日东明集团成立那天,市委市政府的领导全部出席了大会。”我同时还注意到一个细节,在“关广梅现象”大讨论中,“编者按”,三位记者联合署名的几篇重头文章,以及讨论过程中的所有文章,都没有出现过“本溪市东明商业集团总经理”这一重要的称谓,只是说关广梅是本溪拥有八家企业“千名职工的租赁企业群体”的“总经理兼党总支书记”。这需要将一句话分成两句话来处理。挺拗口的。后经核实,这不是疏忽,而是有意回避!

“东明商业集团”除了党和领导承认,还有就是新闻界承认。

一月十日,到场的新闻记者纷纷发稿,欢呼本溪改革迈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我问一家中央级大报驻本溪的记者：“东明集团没有获得法律地位您知道吗？”

“知道。当天我也发了稿。我想事后获得是不成问题的。”

我的问题又回到了关广梅原八家现五家租赁企业“法人代表”上。

“我在工商局查阅了您租赁企业的全部档案。档案及工商局提供的情况表明，您几年来一直没有在工商局办理执照变更手续，没有取得八家企业的法人代表资格。”

“是有这么回事。去年我大多数时间都在外面，忙不过来。再说后租的五家合同拖了十个月才签，甲乙双方都有责任。十三大后，又忙着和李明分家，没张罗这事。”

“后五家如此，前三家呢？东明、消防商场、光明商店，都是在一九八七年以前租赁的。”

“.....”

更换一个执照，办理企业“翻牌”法律手续，只需花七元钱！程序也非常简单！有人从工商局拿来了《企业法人代表证明书》。关广梅却“没功夫”填报。新租的英勇副食商店因随意更改经营范围被工商局查出，关却让委托人孙桂兰以不是法人代表的关广梅名义注册！

可能在权力强有力支持下的关广梅不需要明白，要求她像普通公民普通经济人那样在经济活动中必须取得法律地位，不仅仅是为了维护她和她所代表的经济实体的利益，更重要的是为了维护与她和她所代表的经济实体发生关系的公众和社会的利益。作为经营者，在法律上，她首先应当承担义务，然后才是权利。

我也曾与本溪市委负责改革的领导、推动租赁改革的中青年理论工作者讨论关广梅的法律问题。

那位领导说：这八家商店投标，关广梅中标，这是众所周知

的事情,有经济责任关广梅承担,经营好了关广梅得利。法律手续,虽然没有履行,实际上法人代表是关广梅。“集团”的问题,从法律的角度应该那么看(指先取得法律地位),但从实际上看,关广梅实质上已承担了“法人”责任。

与市委的中青年理论家们辩论,他们说:检验真理只有一个标准,就是生产力的标准。法律如果阻碍了改革,法律一样需要修改。我们不能等着法律完善后才来搞改革。

当讨论到行政干预经济的“度”时,他们说,“度”就是要看是否推动了改革。

“改革”被当作了目的。

改革改革改革,谁敢说不“改革”?

中国人几十年来的悲剧就在于把某些良好的期望和幻想当作行为准则。

无序,混沌,非理性,这不是改革所期望的状态。

一九八五年租赁初起,一九八六年九月前,本溪就颁布了具有地方法规性质的“小型国营商业企业租赁经营试行办法”。一九八六年十二月,辽宁省也颁布了同样的法令,对租赁的方法和程序、承租人的权利与义务等作出了详细的规定。

国家工商管理也有一整套法规法令。

然而,法律在权力、在改革家面前显得多么苍白无力!都是一堆废纸。

本溪,是全国依法治市的先进市。真是绝妙的讽刺!

法大权大? 权大于法? 这都是老掉牙的永恒主题。

我们曾经那么有效地依靠党的系统控制了几亿人的思想,却没能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立法司法系统。我们有从中央到党小组几千万党员,有积攒了半个多世纪的政治经验和上百万智商一流的思想工作者队伍,却没有健康的法制来维护社会。

党的系统、政府系统、法制系统,作为我们国家的三条控制

系统,法制系统是最疲软的。

改革所要建立的目标,却被人们以“改革”的名义轻而易举地摧毁了;共和国赖以生存的基石似乎也变得不那么重要了。

巴比伦人在镌刻汉穆拉比法典时,选择了一块闪长岩。这种岩石质硬如花岗岩。我恍如看见上百万年前阿拉伯某地,地火奔突,熔岩涌流,一块顽石在其中翻腾、翘首期待着人类的智慧和文明,翘首期待着公元二十世纪末东方另一个伟大的民族建立起新的秩序、新的道德、新的法律,按照一条有序的轨道创造出新的生活。

下篇 世纪末困扰

初踏上本溪的土地,这里似乎与别处没有什么两样。人们上班下班买菜购物散步聊天谈情说爱,电影院和文化宫的录像广告说明,法国著名喜剧大师路易·德菲内斯主演的喜剧片颇为卖座,给本溪这座总是板着脸的大工业城市增添了几分欢乐与和平的气氛。

这里经历了一次洗礼。可是,我深入其中就发现,这次洗礼的结果并没有那么轻松愉快。

我刚进入采访,便感觉到了一股与欢乐和平的气氛很不协调的被压抑的潜流,感觉到有一块巨大的阴影时刻笼罩着这座山城。

这些可以记入中国新闻史,可以记入中国政治思想史。

从一九七八年三中全会至今,改革十年,除了“真理标准”的讨论外,还有两次震动全国的对某种社会经济现象姓“社会主义”还是姓“资本主义”的大讨论,都发生在一九八七年六月。

一次在浙江的温州。

一次在辽宁的本溪。

我们现在暂时撇开本溪,先来看看温州这场讨论。

温州从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八七年,背着沉重的“资本主义”包袱,由穷到富,整整跋涉了三十年。刻骨铭心的三十年。以成千上万人的苦难和生命为代价的三十年。

一九八七年六月,北京一家大报组织了北京、浙江的政府官员和学术界权威浩浩荡荡开进温州,进行“温州大对话”。他们到了温州这个叫人眼花缭乱的世界,参观、研究、讨论,加上高规格的接待,宴席茶肆间,剔着牙,品着茶,引经据典,对“温州模式”究竟姓“社”还是姓“资”,作出自己的判决。

其实这些人与创造和把握了自己命运的温州人毫不相干。

参加这次对话的人当中,有一位是原永嘉县委副书记,叫李云河。他就是一九五六年永嘉刮起的那场全国著名的“单干风”的“祸首”。我和我的朋友经济部记者刘扬在温州采访时,在市档案馆查看到一九五七年永嘉县委把他打成右派的决定。他当时才二十七岁!罪名是在永嘉复辟资本主义。他绝对没有料到,他当年在永嘉推行的“分田单干”即是二十多年后中国农村经济改革实行“联产承包制”的先声,是中国农村经济改革革命性的思路。他当时不过是一位良知尚未泯灭的县委书记。他只不过想让农民能吃饱肚子!为此,他献出了自己的政治生命。

当时的界线划得很简单,也很清楚,“分”是资本主义,“合”是社会主义。

人的生存本能使人必须选择最适应人生存的形式,必须选择最佳的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生产方式。否则,猿猴永远不会变成人,人永远不会变成现代人,人类社会只能永远停留在茹毛饮血的原始状态。

永嘉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展开了拉锯战。我分了,

你合了,你走了,我再分。有的田地竟在几十年分合了几十次!这是两种生产关系的较量,是幻想与现实的较量。

据永嘉县一九七五年十二月统计,全县六千七百九十五个生产队,土地分掉部分的三千一百一十六个队,基本或全部分光的二千一百一十九个队,占全部生产队的百分之七十。到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日止,全县纠正四千八百四十九个队,正在纠正三百九十六个队。

一九七七至一九七八年“双打”期间,温州七县一市的几个“点”上,共纠正分小小队一万零八百八十四个,纠正分田单干二万四千三百一十三个队。

真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资本主义”颇有生命力!

材料上编了顺口溜说:“街上做生意,农村分田地,赌徒挂花会,敌人搞复辟。”

陈永贵在全国第二次农业学大寨会议报告上说,受“四人帮”危害“最深的温州地区,闹得很多地方分田单干,两极分化,黑市买卖猖獗,集体经济瓦解,阶级敌人嚣张,贫下中农受罪。”

温州市农委的老李给我们讲了个辛酸的故事:在农村闹分田单干的时候,市委有个干部的弟弟被抓了典型,市委干部大会,常挨批。他跑回乡下劝弟弟别搞单干了,他弟弟说,“不搞我们一大家子吃什么?”屡劝不听。为了保住自己的差使和前程,也是为了保护弟弟免遭灾难,他只得勒紧自己一大家人的裤带,在自己微薄的工资中拨出一部分来资助其弟搞“社会主义”。

真是“红色幽默”。

摆在温州人面前的一个严酷的现实,他们每人只拥有四分五厘的耕地!生存空间极其狭窄。东面是大海,另外三面被雁荡山截断,可谓是上天无路,人地无门。即使恩赐,也是鞭长莫及。

在大对话期间,苍南县金乡镇原镇长金钦治匆匆赶到温州。

这位自称对理论有着极大兴趣的老人,年近六十,已是花白头发,原是中学教师,后弃教从政,官做到一镇之长。他到会上二话没说,开场白是,在座的都是国家级和省级的理论家,我提几个问题向诸位请教。一二三四五……,一口气提了十三个问题,令理论家和官员们瞠目。

金乡镇,以前是“后无山,前无滩,全靠耕地四分三”,百分之三十至四十的人每年要往外讨饭三四个月。有一位在金乡镇一带打过游击的老干部,后来当了温州的官。六七十年代,他率工作组到了金乡搞“社会主义教育”(简称“社教”),他知道金乡穷,他知道人吃不饱穿不暖又被捆住了手脚的时候最需要什么,所以他总是带着救济款。金乡人至今还记着他的大恩大德。

我在金乡镇委见到了金钦治。他谈起“温州模式”姓“社”还是姓“资”的那场讨论,带着嗤之以鼻的口吻:“几十年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来回折腾,还不够吗?我们穷的时候,他们都跑到哪儿去了?我真是弄不明白,北京那些人为什么对‘社会主义’这顶红帽子那么感兴趣,为什么对‘资本主义’那么惶恐不安。”

在金乡镇几十年社会主义教育和改造的结果如何呢?

据一份权威的统计资料,目前金乡有百分之九十的家庭信奉基督教,百分之十的家庭信佛教等。

我在金乡街上遇到一个作徽章生意的中年人。

“你信教吗?”

“信。”

“信什么?”

“基督。”

“为什么信基督教?”

“基督有什么不好!基督劝人向善、和睦。还能保佑我发财。”他冲我诡诈地眨了眨眼。

金乡的信仰,乍看很不正常,但这是无可奈何的事实。因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保障每一个公民的信仰自由。因为过去那种“社会主义”既不能解决人的生计,也不能解决人心中的迷惘和困惑,给人以心灵的倚靠和寄托。

在姓“社”姓“资”的讨论期间,温州市农委副主任李仁续和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漫步在苍南县钱库镇街头。钱库是综合商品市场,是温州著名的“十大产销基地和专业市场”之一,商品销售额在亿元以上。

下面是他们之间的一段对话。

李仁续:“改革深化一步,‘资本主义’因素就增加一分。对温州的现实不能只是策略上的承认。只有承认干的就是社会主义,大家心里才踏实。”

经济学家:“老李呀,要我在理论上改变自己的观念,是非常痛苦的,是非常复杂的,是非常困难的。”

面对活生生的温州,经济学家坦率地用了“三个非常”来表达他这一代人的困扰和感慨。不能强人所难。谁也解不开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给我们留下的这个政治思想史的谜语:姓“社”的不是“社”,姓“资”的不是“资”。

人区别于动物的标志之一,就是人能进行高级的思维活动。人有理念。人的脑子里,充满了对自然、人生、社会的幻想和思考,充满了宗教的震慑、死亡的恐怖、生命的追求、爱情的迷恋。自由的思想空间,给人类社会的更新和进步提供了可能。

我们应该看到,当我们在形而上学的领域里争论不休的时候,真理正悄悄从我们身边溜走,世界正大踏步向前迈进。

让我们来看看“讨论”的后果。

一九八八年四月二十五日上午。本溪市律师事务所。

他坐在我对面。我们把律师事务所的嘈杂、喧哗都关到了门外边。这间屋子最靠里,门一关,便是满屋子的清静。

他是个清瘦而精干的中年人。他不时地用审视的目光注视

我。

我找了他好几天,托人转告我的住处和电话号码,都没有反应。我的直感告诉我,他在躲我。他是我今天第二次堵到门上来撞大运给撞上的。

此行本溪,他是非见不可的人物。他是本溪市法学会副秘书长、市律师事务所律师、关广梅“东明商业集团”的法律顾问。

他姓雷。

他的谈话缓缓地,很谨慎——

我是一九八七年二月介入“东明商业集团”的。那时,我听说李明弃官搞改革,很佩服,总想尽自己的一点力量帮他一把。我主动迈进东明的大门,自荐承当“东明商业集团”的法律顾问。我们签了一个三年的服务合同。

我当了“东明商业集团”的法律顾问后,首先就发现集团没有取得法人资格。我问关广梅,你是不是实体?她说是。我说,如果是的话,就应该按《民法通则》规定的“法人”条件补办法律手续。我曾四次向关广梅和李明严肃地谈了集团应该取得“法人资格”问题。由于种种原因,一直到现在,他们都没有办。一九八七年七月,东明集团请社会各界人士来征求意见,工商局的一位科长说,你们东明集团没有取得法律地位,你们的活动可以视为非法。关广梅说,得得得,我希望你们罚,一罚我就出头了。关广梅与蔬菜公司租赁合同的签订过程,是典型的权大于法。他们因条款争执顶牛,从法律的角度看,主要怨蔬菜公司。作为占主动地位的甲方,完全有理由取消投标,收回商店,重新招标,因为关广梅在签订合同的过程中推翻了招标启事,即推翻了所有竞争者在投标前必须承诺的条件。然而,他们不敢这么做。上面干预。租赁是改革,这么做不是反对改革吗?关于底下的八家副食商店,我提出应尽快地办理法人代表变更手续,尽快地“翻牌”,取得法人代表资格。我和关广梅说,租赁后,下面商店

的经理都是你的委托经理,只能是委托代理,这些经理与你都有民事法律关系。如果你不是法人和法人代表,无法由分证鉴证部门确认你与委托经理订的契约,将来因为经济利益打官司,对你非常不利。而她却说,谁不知道我是经理!报纸电台不是都宣传过了吗?关广梅信权不信法,信宣传不信法。我作为东明集团的法律顾问,该做的工作都做到了但是效果甚微。我承认我失职。所以我向律师事务所申述终止与东明集团的三年合同。所里没同意,说关广梅是十三大代表,在电视上答中外记者问,很有政治影响。

.....

当代契约社会,律师地位非同小可。在西方发达国家,不管是多么有权有势的百万富翁、政客,他们所有的经济或民事法律活动,律师都是绝对不可缺少的重要角色,须臾不可分离。而在我们的国度,法与律师的地位是这样的低贱,这样的可怜!

最令我震惊的是,采访结束后,雷律师,这位老法律工作者郑重地嘱咐我:“记者同志,请你不要披露我的姓名,请你保护我!”

记者保护律师?

“作为法律的代言人和维护者,难道法律都无力保护您?您是‘东明商业集团’法律问题最有权威的发言人,您要是隐姓埋名,我的材料的权威性和可靠性就会打一个大大的折扣。我和您一样,都面对的是一个名声显赫的改革家,都面对的是一层能左右局势呼风唤雨的庞大势力。”

这些话在我喉管里滚动,终于没说出口。我呆站着凝视雷律师,心中一阵惨然。

我永远不会忘记一位记者和一位律师在本溪的一间平房里那僵峙的一瞬间。

律师事务所的几间平房不易察觉地紧紧挤靠在市法院的西

墙，市政府大楼在它的东边，只有一百米之遥。

当天晚上，我做了个傻梦。梦见我给雷律师和他的律师事务所建了一幢大厦，用大理石，不，是用花岗岩砌的；紧靠着市府大楼，比市府大楼高出一大截！辉煌煌煌。

律师事务所再往西走几步路，就是本溪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门口挂了一大堆牌子。工商局的牌子埋在中间。

我在楼上局长办公室的隔壁会议室里见到了企业登记科的原副科长李明武。这位李科长胖乎乎的，说话总是乐呵呵的，时不时还有点小幽默。他说——

我是一九八六年至一九八七年在企业科干。关广梅的法律问题，我在多种场合讲过。更换执照和东明的法人地位，关本人有问题，主管部门也有问题。我找商业局张副局长，我说，我可是找你第三次了，东明的事儿你们得赶快办，否则我们就要查处了！张局长说，我们也没办法，我们说话她不听呀。其实，我是吓唬吓唬他们。谁敢查处东明呀！新闻界也跟着起哄。去年五月《本溪日报》一位副总编来工商局办事，我冲他说，给你们报社提下意见。你们是党的喉舌，东明集团谁承认了？你们都报道了，将来你们负法律责任吗？他听后，连连称是。

我看你挺认真的。你是记者，听过这种“嗑”没？广东福建靠南洋，江苏浙江靠老乡，北京靠中央，辽宁靠毛泽东思想。

哈哈。

工商局楼下一层。企业登记科。

与现任科长聊，可没有原科长那么轻松。他是个耿直的汉子。

他说——

改革给我们带来的好处是有目共睹的。所谓“关广梅现象”，是关广梅租赁出现一些问题后，群众有看法有疑问。这些看法和疑问，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关广梅提出要求和问题，你有

不同看法,就说你反对改革。改革应该遵守现行法律,何况有的法律手续是非常简单的。这是基本常识。说本溪有一股反改革的势力,这不实事求是。姓“社”姓“资”的讨论是先设立命题,自设自驳。我们非常反感。记者同志,我说这些仅供你参考,你可以查东明集团八家商店的档案。请你不要在报上登我们的姓名。作为记者,你有义务保护我们。

.....

这是我在本溪第二次恳求保护。

在本溪,给人感觉,什么都是颠倒的。

工商局,作为国家的执法机构,有着法律赋予的相当大的权力,走到哪儿都份儿大,走到哪儿都当神仙供。他们依法办事,根据法律提出自己的见解,倒要寻求记者的保护,岂不怪哉!

从工商局出来,再往西走,不到一里地,就是商业局。

商业局“体改办”有几张桌子,别别扭扭地塞在财务科办公室里。

如今改革如火如荼,时兴“体改办”,就像过去时兴“清查办”、“双打办”、“严打办”什么的。

“体改办”马主任点燃一支烟,歪脖从黑皮包中摸出个小本子。他接待的南来北往参观学习团无数,也接待了不少记者。关广梅租赁的情况从开头到现在,详详细细,都记在小本里。他说——

一九八五年,在市里召开的一次劳模座谈会上,市长问关广梅敢不敢搞租赁,关广梅说敢。市长说,敢,就这么定了。当时我们都发懵。商业局、蔬菜公司从来没有认真商量过,市长和关广梅面对面就这么定了。咱虽然也在搞改革,但“租赁”可是个新名词,光听说过,可没见过。沈阳市汽车工业公司是辽宁省最先搞租赁的企业。为了贯彻市里的意见,给关广梅承包的企业穿上“租赁”的新衣服,局长带着有关部门专程到沈阳学习,把工

业部门的租赁经验移植到商业部门来。实际上,本溪关广梅的租赁,是承包的内容,通过租赁的形式实现的。关广梅、李明搞起“东明商业集团”,带来了一系列法律和经营管理上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东明的法人地位、集团决策者和经营者的关系、集团内部的分配关系、资产的优化组合等等。比如他们成立集团有一个重要理论依据。可以打破所有制的鸿沟促进八家承租企业人、财、物的优化组合。这八家企业,是独立的核算单位(法人),三家国营,五家集体。主管部门持不同看法,他们认为各独立核算单位间的关系,不能是平调的关系,人、财、物的使用,只能是有偿使用。市财政局到东明集团搞调查,认为东明人、财、物的使用纯属平调。劳动、财务、银行等国家部门都不同意呀!很多矛盾是与现行政策体制的矛盾。本质上不是主管部门刁难。关广梅八家企业的财务报表都是按月按季报公司,等于是公司代她进行财务管理。八家企业的物价、计划生育、计量卫生、环保、安全、报表汇总、植树造林、职工教育、来信来访都由主管部门包了。租赁当中的问题都是明明白白在这儿摆着。本溪改革当中的主要矛盾也是很清楚的。《经济日报》的“关广梅现象”姓“社”姓“资”大讨论,把商业局和蔬菜公司划到了改革的对立面,这不符合本溪的实际,伤害了相当一部分曾为改革出谋划策,积极支持和努力工作的同志。我们的新闻报道为了适应形势需要而找典型的做法,实在是不可取。《经济日报》的讨论,等于给本溪改革当中存在的矛盾这个“圆”划了很多“切线”!唉,你说,关广梅东明集团面临那么多的问题,我们能不焦急吗?我每年要接待好几百人,可是,集团没有法人地位,合同长期不签,关广梅不换执照。这些都让我怎么交待!关广梅的事,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也简单。硬是让搞得谁也说得碰不得,说了碰了,就说你反对改革。谁能担当得起反改革的罪名!你看我这满头的白发,都是这几年给急的。我说这些,你都记下了,但不准发表。你要

是发表了,那时候我可不认账。惹不起,总躲得起。被划到了改革的对立面,我们张着嘴光吃饭不说话行不行!记者同志,你可要为我们负责任呵。

.....

说完,他把小本扔进黑提包,歪脖点燃一支烟,若有所思地狠狠吸了一口,又重重地从嘴巴和鼻孔中喷出来。

已经有三个人在介绍完情况后寻求记者保护!一个律师,一个被赋予了法律监督管理权力的政府工商行政管理官员,一个局“改革办”主任。这里仿佛没有正义、没有真理、没有是非标准,人人自危!真是令人难以想象,在“改革现象”的摇篮——本溪竟会有这种事情发生!

这难道是“关广梅现象”大讨论所预期的效果?

在本溪,我接触最多的是李明。他曾以一九八七年辽宁十大新闻人物闻名全省。他在年富力强仕途光耀的时候,从市委政研室流通处长这一最有希望高升的职位上屈尊俯就,来到东明商场的三楼总经理办公室,充当关广梅的副手。市委对李明的举动给予了充分的理解和支持,目的都是一致的:给关广梅的租赁改革插上理论的翅膀,使本溪改革大展宏图。

不能否认他在本溪改革运动中曾经起过的重要作用。他从一九八五年七月到关广梅租赁消防商场调查起,就深深地介入了进去,从理论研究到宣传报道,他都作了大量的工作。这个对经济理论研究和改革实践有着很高热情的原市委的年轻处长,这个充满了自信,对将来怀有很大抱负的人,为关广梅这个只受过六年教育的改革家和企业提供了大量的新名词、新术语,为关广梅的改革出力。“东明商业集团”的命名,都是出自他优秀的大脑。他到东明,在本溪曾被称作是“理论”(李)与“实践”(关)的珠联璧合。

他在他致市委的辞职申请报告中写到,关广梅租赁经营“这

是一个综合性的改革,是我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中具有开拓性的突破,其意义并不亚于农村中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出现。”为此,他写了调查报告和理论文章,其中有两篇发表和获奖。我认真拜读过他的主要经济理论文章,应该说这位靠自学起家的经济理论工作者已具有相当的水平。他研究了租赁经营者任期目标责任制,研究了租赁经营负责制的四要素,可是他恰恰没有能一针见血地指出,关广梅租赁仅仅是关广梅承包的另外一种说法而已,它是以完成利润基数为奖罚依据的风险承包责任制,根本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租赁”,而是现行政治体制下和意识形态宽容度下的一厢情愿而已。“租赁”概念无法转换,所以关广梅租赁比“承包”没有质的飞跃。虽然它一出现就称为是“改革的深化”。其表面特征之一,就是它与“政”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关广梅本人在一九八七年六月《经济日报》组织的大对话会上,还把蔬菜公司对她另眼看待,“不承认她任命的干部”,作为一条甲方刁难和不支持租赁改革的“罪状”。还别说依仗政治气候和行政进行租赁经济活动这类事了。

“租赁”作为一种时髦,作为一种政治筹码,而不是作为一种有特定内涵的经济运行机制,在本溪度过了三个春秋。这难道就是有别于资本主义‘租赁’的社会主义‘租赁’?”

关广梅租赁就给李明提供了这么一个坯子,因此李明关于租赁的理论框架就必然出现明显的缺陷。企业集团,企业间人、财、物的优化组合的设想和实践出现一系列的麻烦,症结即在于此。非理性的产物,无论如何是穿不上理性外衣的。终于,“理论”与“实践”的关、李结合,发生了悲剧性的结果。

事实上,他进入东明一个多月后即在经营思想、为人处事、权力大小等等方面与关广梅发生了矛盾冲突,并发展到互相攻讦不可调和的地步。

李明到东明后,被任命为副总经理和东明商场经理。不到

四个月的时间,李明即被关免去东明商场经理的职务,处于欲干不行欲罢不舍的尴尬状态。

一九八八年二月,他们在吵吵闹闹中合作了一年后,正式宣布分手。在市委书记的亲自主持下,在市委书记的办公室里,关、李在非常不友好的气氛中瓜分了他们合作租赁的五家副食商店。李明分得了三家小的,关分了两家大的。

二月十二日,深化改革又迈新步——关广梅与李明分开“租赁”。原先合作是改革“如虎添翼”,如今分开又是“深化改革”!

李明拿到这天的报纸,只是满脸的苦笑。

李明倒是聪明,分到紫金、高光、水塔三家副食商店后,立即去工商局补办了法人代表变更手续,为自己取得了经营三家商店的法律地位。

一九八八年四月十七日傍晚,本溪大雪纷飞。我和李明在矿务局招待所斜对面一家回民馆喝酒。我们要了羊杂汤、蒜泥羊肚、蒜泥牛头肉、羊肉蒸饺,还要了四瓶啤酒。

小店里,空荡荡只有我和李明两人,支了桌子,排开碟盘。隔窗子,看见外面天气渐黑,饭馆门前的红幌子被风雪吹打得左右摇摆。

烫烫的羊杂汤加上冰凉的啤酒,掺一块儿灌进肚子里,说不清是什么滋味儿。

“雪真大!”他说。

“好春雪!”我说。

“我现在算是彻底自由了。”他冷不丁冒一句。

这个在改革的政治舞台上雄心勃勃的原市委官员,把宝压在了关广梅身上。由于他的加入,关广梅迅速地扩大了租赁企业,并实行企业集团。按关广梅的说法:“如果没有李明参加,我绝不会再租后五家商店”。然而,李明还没去东明,就被套上了紧箍咒。市委书记找他谈话,明确指出他到东明辅佐关广梅,主

要是三项任务：助手，参谋，秘书。并让他要有思想准备，“你干得越好，名和利都是关广梅的，不是你的”。

这与李明投身改革就是要名利双收的初衷相悖。李明因此而失宠。市委书记说，分裂的责任“三七开”，李明占七关广梅占三。

李明可能在辞官前，对自己左右局势的能力估计过高，没有想到关广梅在姓“社”姓“资”大讨论后，在辽宁在全国的社会知名度和政治地位空前提高，他那“处长”和“经济理论研究”的砝码顿时失去了重量。他不过是太阳系里的曾经稍稍闪烁的一颗卫星。他被度量了以后，便被抛弃了。

在本溪，虽然公众对关广梅的议论颇多，但是，从做人这方面来看，李明比关广梅活得更艰难更痛苦。在接触的过程中，我发现他对外界的反应极其敏感，谦卑恭敬中带有许多不自然。关广梅对我抱怨说：“李明一直都叫我小关，处长的架子就是放不下来。”

我还注意到，关、李矛盾尖锐，可是关广梅外出报告等重要脸面文书都是出自李明之手，包括那封关广梅至《经济日报》的信。关广梅的报告，某杂志认为好，刊登后寄给关稿费，李明在“劳动所得，理应如此”的理由下从关手中拿走，气得关目瞪口呆。

我实在是不明白，李明当时那么多的“赞歌”是在什么样的心境下从他的笔尖流向全国的。这些文书需要归纳、需要总结、需要升华、需要对关的租赁改革一片热忱、需要深刻领会多方面的意思，需要摹仿关的口气和语言风格而又无伤大雅。这可是一项高难度的工作啊！

我们来看看他创作关广梅《经济日报》见报稿的心境。他说

一九八七年六月五日我从沈阳回来，他们把李欣欣写的第

一稿和记者写的第二稿都拿给我征求意见,我说“各有千秋”。为什么商量的结果,把写第三稿的事交给我?有三条原因:一是,写这种东西,我在本溪还算一把手;二是,在本溪,知关广梅者,非我莫属;第三,我搞经济理论研究,有一定功底。(注:还有一条理由,就是考虑到各种因素,他也想藉此缓和与关的关系。)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关广梅现象”姓“社”还是姓“资”,我的思想与《经济日报》的讨论完全是两回事。他们那种提法与我的原意有很大不同,完全是不同的参照系。我有篇论文:《生产关系的二重性与“左”倾错误的经济基础》,说得很清楚,两种生产关系可以并存,是交叉的关系。不是“非此即彼”的思路。这篇论文是我近十年的研究结晶。当然,在一千多字的信中是无法展开阐述的。

李明身上有着中国知识分子那种典型的双重人格色彩。一方面是对现状的抗议、不满(辞官),一方面又是超人格负荷的委屈求全,以见容于现状。得多还是失多,无论是从全局和局部、长远和眼前看,都不能断然有个定论。与关分家,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解脱。然而,更大的社会压力,以及各方面压力给他带来的心理负荷正在等待着他。

他很沉重地对我说:“本溪这场戏可以说是我一手参与导演的,最后我也将自食其恶果。”这位本溪改革的积极推动者,壮志难酬,面对所谓改革已经是心灰意懒。

四月十八日晚饭后,李明打电话来,一定要我这个根本不会跳舞的人到豪华程度仅次于本溪小天鹅舞厅的老干部活动中心舞厅去跳舞。可是到了舞厅后,他便撇下我和我的副手,一个人,鱼一样地游进了人流。

华尔兹奏起来了,一对对男女在旋转,整个舞厅在旋转,整个世界在旋转。

李明,我连影子都看不见了。

由他去吧,他刚分到手的三家副食商店,婆婆妈妈油盐酱醋柴的事儿,把他折腾得够苦的。

他现在需要麻醉,需要放松,需要忘却。

乐队又奏起了一支华尔兹舞曲……

尾 篇

新闻被枪毙了。

为此,我写了封没有张贴的《致总编辑公开信》:

各位老总:

《“关广梅现象”之怪“现象”》送审已是10天!黄灯高悬!毫无疑问,这篇稿件被枪毙了。作为作者,为它的生存耗尽了心智!但我还想为这篇稿件愿陈一言:

《“关广梅现象”之怪“现象”》原稿的最后一段是这样写的:“在本溪,改革似乎是某个人某级组织的事情,这难道是本溪改革必然的逻辑归宿?”

这就涉及到了对改革的初步判断和支持或推动改革以什么为标志来衡量的问题。通过采访温州、傻子瓜子和本溪,我痛切地感觉到,我们在推动改革的进程中,很多时候沿续了六七十年代那套思维方式和方法。在某种既定“原则”引导下,“抓典型”、“以点带面”,上面和新闻界制造和吹捧典型,下面盲目崇拜和摹仿典型,热热闹闹搞了几十年。为了适应某种政治需要,典型人物们往往“天马行空,独往独来”,超越法律,超越正常的生活轨迹,超越正常人的心理和生理状态,一句话,超越理性,在非理性的空间飞翔。纵观几十年竖起的典型,有多少是真正站得住脚的?历史告诉我们,这种经济生活中为政治和特定时期伦理道

德服务的典型,自欺欺人,危害了我们几十年。经济生活中虚矫之气浸淫,何谈改革之深化!此风日盛,则改革日衰!我们必须正视现实。

如果说关广梅租赁的真相的披露,会影响中国改革的整体形象,那么我们要说,这种担心是缺乏依据的。其一,关广梅租赁无论如何不能视为认识中国改革的分水岭,也不应把关广梅租赁视为中国改革之标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恰好是姓“社”姓“资”大讨论的思路。再者,如果说“关广梅现象”是改革大潮中涌现出来的经济现象,那么勿宁说它是个政治现象,是一套旧思维通过新闻媒介在改革大潮中的演绎。仅从当前形势出发,抛弃了许多应该重视的前提,有意或无意忽略了许多重大的新闻事实。为此,新闻界将承担历史的责任。如果缄口不言、熟视无睹,那么后人将会怎样评价我们这一代记者呢?仅靠良好的愿望不能推动改革!

这篇已经打扮得“光光溜溜”的稿件,早已避重就轻,多方照顾,只不过提出问题、研究问题,还谈不上批评云云,都不能容忍,那么,我们还能容忍什么呢?

稿件被枪毙了,但它应“壮壮烈烈牺牲”。心里堵得慌,只是满腔的悲愤。

卢跃刚

1988年5月31日

《经济日报》1988年6月12日一版消息:

探讨“关广梅现象”报道对深化新闻改革的意義

首都新闻界人士在本报聚会

本报讯 首都新闻界部分人士6月11日聚会经济日报社,

探讨获得 1987 年全国好新闻特等奖的深度报道“关广梅现象”，对深化新闻改革的价值和意义。

“关广梅现象”，是本报 1987 年 6 月 12 日至 7 月 23 日进行的一次深度报道，共发表各类稿件 78 篇，吸引了全国读者的关注，在海外也引起较大的反响。

需要增强宏观意识、理论意识和建设意识，否则，就难以完成改革和开放对新闻传播所提出的要求。

这次会议由首都新闻学会召集，新闻界知名人士戴邦、高恺、钱辛波、吕梁、宋静存、何光先等 60 多人出席。

本溪某公园。绿草。花丛。常青松柏。

清晨，几多想益寿延年的老人，伸胳膊动腿。几多刚劲勇猛的汉子腾挪跳跃。

这几天，这些人当中又添了个三十多岁的眼镜。他就是那个本溪蔬菜公司的负责租赁招标的副经理佟立勋。

自打一九八七年年年初搞完招标投标后，好长时间不对劲儿，发现心脏出了毛病，时不时就停止跳动。医生说没事，累的。住了一个多月医院。

后来有人告诉他，练练气功。他就练“少林气功”。

少林气功，以静养静，静中求动，调全身之宗气、卫气、元气。静者可以稳神养性、防治疾病、益寿延年；动者可以崩发虎劲，助推山之力。练法上，先静而震动，善固气在丹田，疾聚疾发；特别注重以意领气，气与力合，以气壮力，以力导气。……

云云，云云。

一九八八年八月二十六日零点四十分 于北京团结湖

一九九零年八月二十八日凌晨二点二十分 改于北京团结湖

春天里的神话



郑州商战，“亚细亚风波”，是一九八九年后两三年的沉闷气氛中人们能拿来说的故事。

世纪末感言

郑州商战，“亚细亚风波”，是一九八九年后两三年的沉闷气氛中人们能拿出来说的故事。故事本身很精彩。但是，我想通过这个故事说明的东西却不是人们想象的样子。我的落脚点是如何评价中国传统文明。

我的目光延伸到了北宋汴梁。《东京梦华录》吓了我一跳：当时的汴梁竟是如此繁华。“清明上河图”仅仅是汴梁之一角。交易规模之大，交易方式之先进；人口至少 250 万，比现在的郑州市区人口多得多……活脱脱呈现出的是商业文明的景象。往上缕，可以缕到发源于河南的商朝；往下缕，可以缕到晚清，浓郁的商业气息绵延不绝。而这一块儿，在评价中华传统文明时被忽视被丢失了。人云亦云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在事实面前又受到了挑战。

——作者

亚细亚少女

真是一场好雪！

午夜时分，独自从河南南阳的南方大酒店踱出来。朝西走。二十多年前，我曾沿着这条路去读书去革命。还是这条路，还是这些夹道生长的梧桐树。少男少女，早出晚归，手牵着手，在雪地里绕着梧桐树嬉戏。转眼间，梧桐已经遮天蔽日，松软脚印不仅大了几号，而且还证明着夜行者的某种成熟。往日的少女已是我妻，偎依在我的身旁，银铃般的笑声，已化作了林中的充实和宁静。我感到了一种神奇变化，一种世事沧桑的不可逆转，一种追溯往事、绵绵怀旧的衷肠。昨天还在开封饮酒，今天却到了南阳，在这灯火阑珊的雪夜中踟蹰。顷刻间在河南境内，由北向南，纵贯数百里，何等地豪迈、畅快、以致忘记了几天前我刚在北京复兴医院动了阑尾手术。

下雪了，便有一种喜悦，便有一种期待，便有一种晕眩和冲动，与此同时，便有了一种莫名的怅惘和哀伤。黑暗中独自行走，沿着二十多年前曾走过的青春烂漫的路，我突然发现周围一片虚无，突然感到了可能失去家园的恐惧，感到了一种遥远而清晰的召唤。我的心追寻着她。

这种春天的萌动，对于王遂舟来说，来得更真实。这位郑州亚细亚商场部总经理断断不会想到，他在电视上制造的“亚细亚少女”，诱发了中原商战，在一九九二年春天即将来临的时候，为大疲软大萧条的中国经济注入了新鲜的活力；断断不会想到她能沉闷的中原腹地搅得躁动不安，烽火连天；断断不会想到，只有一百一十多万人口的小小郑州城，为此而爆发了一场绵延

不断的“特洛伊战争”，并在几年后把我吸引到这里来。

无论如何，这是一个谜。在我的印象中，这场“特洛伊战争”，似乎不应该发生在河南这个商品经济如此落后的内陆农业大省人口大省。作为一个四十多年来以生产粮食和生产人口为主的省份，用时尚的文化角度看，河南几乎就是封闭的传统社会、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同义语。对这里似乎不敢有过高的希望。一个始终在中国改革进程中扮演着“大拖斗”的角色，怎么蕴藏着如此巨大的能量？一个承载着沉重历史包袱的空间，怎么可有朝霞满天？河南省委书记李长春语惊天下：要把郑州建成中国的商贸中心！如今的郑州成了一个大工地，所有的大商场都在扩建，上百亿资金正被或将被毫不犹豫地投进去。这种活力从何而来？

一九八九，一九九零，一九九一，何等沉闷的三年！中国改革仿佛走进了死胡同。八十年代初期以来的激情、兴奋、希望和期待，都变作了小鸟，飞向虚无飘渺的天空。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漫长的心理休眠期。老百姓在银行里至少存着八九千亿人民币，就是不肯取出来购物消费。经济学家说，这笔银行存款猛如虎，随时随地都可能冲出牢笼，把中国脆弱的经济撕碎、吞噬。然而，这八九千亿人民币虎视眈眈，根本不在乎经济学家的危言耸听，根本不在乎“学习雷锋让利削价忍痛出血大甩卖”的漫天喧嚣，根本不在乎市场如何疲软如何萧条，只是以一种奇迹般的耐心静静地等待着，等待着……

这种耐心的等待也许是有道理的。在这既短暂又漫长的等待中，一个美丽的少女微笑着朝十亿中国人走来：“中原之行哪里去？郑州亚细亚——”

中央电视台一个出乎意料的广告，美丽少女“倾城倾国”的一笑，在那令人失望和沮丧的时节里，让我们进入了一个神话的境地：“亚细亚少女”大大的眼睛闪耀着天使般的微笑。——那

种能融化几分凄惶无端迷茫般惆怅的微笑。亚细亚——古老语系中东方初升的太阳,从那山峦的背后,从那大海的一角,从那枯藤老树的细枝末梢,从那画眉惊飞的翅膀上,慢慢地拱出来,脸庞上还沾着几滴晨曦的露水,晶莹而俏皮。她踏着黄河的波光,踏着松软的沙滩,跳跃着,歌唱着,……她似乎全然不理睬人间这许多哀愁苦痛,永远不停地奔跑,向前奔跑,仿佛时间的齿轮就是这样被推动,仿佛只有这样才能代表生命的健康状态。她浑身充满着青春的活力,充满着无数的欲望,唤醒你沉睡的本能,让你怦然心动魂不守舍。她迎面而来,擦身而过,永远不停地奔跑,向前奔跑,……

一个神秘人物往南行

有人在千里之外预见到了郑州这场不可避免的“特洛伊战争”。他甚至预见到了他在这场战争中应该扮演什么角色。一个秋风瑟瑟的午夜,他现买了张站台票,踏上了南行的列车。

对于许多人来说,王力是个神秘的人物。这位北京恩波(私立)公关事务所的老板在郑州一闪即逝,像颗匆匆来去的流星。有记载说,这位“中国第一公关先生”作为郑州亚细亚商场一九八九年至一九九一年的高级公关顾问,与亚细亚闹翻后,改换门庭,到了对手郑州商业大厦。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由于事先与亚细亚商场的约定和起码的职业道德,王力一直对他在郑州商战中的作用保持沉默,直到一九九三年,新闻界才渐有披露。这些都为他在郑州的活动涂上了神秘的色彩。

王力在京城可是一大“侃爷”。他当过清洁工,当过经理,当过记者,又辞去了公职,兴办了中国第一个私立公关事务所。他

是那种永远不能安宁永远都要折腾事儿的主儿。走南闯北,全靠已经谢了顶的脑袋和一张嘴。他人生最大的乐趣是“讲学”,经常有滔滔不绝四五个小时、数百上千人不思茶饭无人退场的纪录。“您知道我去北京大学给那帮爱瞎起哄的大学生讲的第一句话是什么?”“什么?”“我说,我敢打赌,我演讲的时候,如果有一个人退场,这个‘王’字倒着写!”

我笑了。

“您笑什么?”他问。

“你这个赌永远赢。”我说。

“为什么?”

“‘王’字倒过来,还是三横一竖‘王’。”

他那总是浮肿着的小眼睛狡猾地笑了。

“来,”他举起了大玻璃杯。“咱们为这赌喝一大口。”

在高档粤菜馆,喝“青岛扎啤”,这是何等惬意的事情。1989年的王力可没有这般精神抖擞,潇洒自如。

恐怕对那个时候有任何悲观的看法都不过分。“六四”以后,大家都没心思做生意,纷纷离开了北京城。在建国门外的卢堡大厦(现名凯莱大厦)里办公的恩波(私立)公关事务所,门可罗雀。原来“私立”二字,像个金字招牌,独立品格、灵活经营、讲求效率、优质服务熔于一炉。一夜之间,情况变了。新闻媒介拉出架式,要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要把个体户搞得倾家荡产”!王力是老北京,打小是从胡同里窜大的,而且事务所也搬不走,也不想搬走,“干等着一九五六年后第二拨接受公私合营社会主义改造呢”!平时,私营企业都是不显山不露水地赚钱,而“公关”却生怕不能四海远播,青史留名。于是乎,让你王力一枝独秀。潮水涨的时候,大家齐头并进;潮水落的时候,便孑然一身,想缩也缩不回去。在江湖闯荡多年、深谙体制三昧的王力,当务之急,当然是调整自己的形象。

以往“爱国”都搁在心里,现在必须露出来给大家看。办公室的门上,他贴上五星红旗。

“请把小旗子撕下来。”服务员面无表情地说。

“这是国旗!”王力强调说。

再大声抗议也没用。没商量,只好撕。

恩波(私立)公关事务所曾被请到鞍山,针对共产党员信仰危机、思想混乱、威信下降的情况,王力出奇招,在全体共产党员中开展“佩带标志”活动,以重塑共产党员形象。其意有二:一是时刻勿忘“我是共产党员”,二是自觉接受群众监督。辽宁人接受这些东西特别快,特别有天赋。结果鞍山党威大振。

然而,此招在北京某局却不灵。一上午的局长会,大家拿不定主意。在犹豫不决的袅袅烟雾中,王力急了。“戴个标志能吃亏到哪儿去?!这一点都做不到,还能做什么呢?!你们都是既得利益者,下班还有小车坐,我还要骑十几里路回家吃饭呢!”

王力一脸晦气从大楼里钻出来,一抖膀,骑上那辆破自行车往家赶。北京天气太热,可是北京人的脸上却挂着若无其事的安祥,雷打不动的矜持。琢磨不透这北京人。来到这革命的圣地,谁都不敢小瞧,弄不好便会走了眼。随手揪一个胡同串子,没准就是皇亲国戚。再就是干部多,多得让你眼花缭乱,随便扔块石头,都可能砸着七品以上的官。第三是有文化的多,满北京都是看书看报的人,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当然,这种关心,热得快,冷得也快,更多的时候,是一种自娱和消闲,一种容易兴奋更容易忘却的纪念。热的时候,精神充实,为所欲为,呼啸而来,呼啸而去,写标语,喊口号,熙熙攘攘,汗流浹背,枪林弹雨,所谓“革命是人民盛大的节日”。北京从“五四运动”以来就接受“革命”的洗礼和训练,也经常充当革命运动的发源地,它既要陶醉和得益于“革命”的荣耀,更要承受“革命”的各种代价和后果。“革命”是革命和革命者的坟墓。老百姓看到,一场革命

下来,无论是胜利还是失败,严格地讲,都与他们切实的生活没有什么关系,或者说没有直接的关系。他们的需要与政治家的密谋、交易,与一些知识分子革命的狂热、动荡不安生活方式的审美期待和追求,有着天壤之别,虽然,各种敌对的政治派别、各种互相攻讦的政治家都把对他们的许诺和他们的反应作为重要的筹码,都把他们奉为“神圣”,并在许多庄严的场合颂扬。到头来,老百姓往往是“革命”游戏被供奉的牺牲。这好像是一个原始部落盛大的祭祀(如果说“革命是人民盛大的节日”),狡猾的祭祀者怀着敬畏、恐惧、利用、伐幸的复杂心理,口中念念有辞,而祭盘中图腾物必须去死,必须充作牺牲。在这精心策划的仪式中,在金光闪闪和无限崇敬的祭祀辞辉映下,带走人间的疾病和苦难,带走阉割和宰杀的快感,带走永远可望而不可及和模糊而虚幻的许诺。天长日久,岁月沧桑,便有了失落和幻灭。“冷”便是必然的了。北京城硝烟未散的时候,玉渊潭、工人体育场外的花园,三三两两的票友重新聚拢来,一把京胡,清远,凄冽,听起来多少有点惶惑和陌生。“苏三离了洪洞县……”,那种梦幻般的感觉,好像永远找不回来了。

王力也陷入了这种找不回感觉的困窘中。在一种巨大的情结笼罩下,争言革命者众,争言经济者无,“不合作”成了另一种时髦,要想做点事情,便会唾你有病。后来革命也不能随便谈了,最大的自由是吃吃喝喝,准风月谈。谈风月,当然要有环境,要讲条件;要吃喝当然要生产。消费成了社会齿轮的润滑剂。然而,工业报喜,商业报忧,中国经济陷入了沼泽地。从哪里切人才能找到新的感觉呢?

骑车回家的路上,他的脑子里闪出了商业部部长“胡平”的名字,还有胡平在一九八九年初发表在《中国商报》上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商业文化的长文。可能谁都没有注意到,胡平第一次系统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商业文化的概念。

王力未曾与胡平谋面,然而十分敬重这位新商业部长,认为他有少见的文化素质和战略眼光,期待着能与之对话。

在今天的恩波(私立)公关事务所办公室显眼的地方,端放着一个精致的黑色铝合金镜框,里面镶着王力致胡平的一封信。由于这封信有益于人们了解商战全貌,征得王力先生的允许,在这里首次全文发表: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部胡平部长台鉴:1989年初,中国杰出现代咨询机构——恩波(私立)公共关系事务所注意到阁下有关商业文化学的论述,除立即将这一全新观念列入恩波公关“A级商业情报”,同时还结合国情急需,把充分物化这一观念的工作定为自身1990年执行课题。

1989年8月,恩波公关选中郑州为战略地域,同时也选中亚细亚商场为具体执行目标。经过科学严细的初步调研论证,恩波公关于同年9月27日正式函告亚细亚商场——恩波公关将于未来两年之内向社会严肃隆重地推出亚细亚企业形象。

其后,恩波公关相继向亚细亚提交了“总体策划的框架意见”及“协议执行文本”(即实施方案),为亚细亚迅速跻身商业诸强的战略发展计划明确定势——“依托和发展社会主义商业文化,开发和创立社会主义商业文化。”至此,代号为“升华1990”的半军事化行动开始全面实施。

与此同时,恩波公关还确定了“从亚细亚入手,激化中原商战,促发一代有现代觉悟、现代意识、现代谋略的生意人”的深层概念,并为实现这一目标六赴郑州义务讲学。

1989年10月—1991年2月,恩波公关先后20次深入亚细亚,为落实“升华1990”、推动商业革命,付出了艰辛努力。

其间,恩波公关还成功地引发了国内新闻媒介对“亚细亚现象”和“中原商战”的关注,阁下看阅的诸多报道,几乎全部导源于恩波公关总体谋略的策划。

为实现商战的最佳效果,恩波公关在结束了亚细亚业务后,目光已转向国营主渠道。

在过去的几年中,出于对客户商业机密负责,恩波公关对深度介入亚细亚及中原商战的事实始终缄口不言。如今,上述机密时效已过,而社会各界对“亚细亚现象”的内幕渴知却与日增加,考虑到此种现代谋略将有助于国家经济的发展,将有助于企业思维方式的更新,恩波公关决定将于近期举行新闻发布会,向社会公开“亚细亚现象”及“中原商战”的原委始末。归根结底,是阁下高明的理论引发了恩波公关的策划灵感,无论是感谢,还是单纯回报物化与执行的过程,我们都希望获得一次向您,向商业部其他高级官员详尽介绍的机会。可否,盼示。

顺颂

夏祺

恩波(私立)公共关系事务所

所长:王力

1991年6月17日卢堡大厦

然而,事情并不像信中所写的那么简单。

恩波公关渗透郑州,最终达成与亚细亚的合作,可谓是殚精竭虑,费尽心机。

王力曾沿京广线南下寻找机会。邯郸和安阳,都因为条件不够理想而被放弃。他继续南下,来到中原腹地的重镇——郑州。中原向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所谓“得中原者得天下”。然而,改革开放以来,中原的沉闷几乎与边远的西部贫困地区一样,以至于学术界习惯上把中原与西部捆在一块儿称作“中西部地区”,以与东南沿海发达地区区别。因此,很难寄予希望。可他一到郑州,就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一九八七年以来,郑州火车旧站和旧城改造,“二七广场”这个革命的圣地,如今成了大工地!那热火朝天干商业的劲头与北京轰轰烈烈闹革命及其后的

冷清肃杀,形成了强烈反差。围绕着郑州的标志——“二七纪念塔”,巴掌大一块地方,已有亚细亚、华联、商城、人民等四家大型商场,东南西北,各霸一方,朝夕对峙。除人民商场是一家破旧的老字号外,其余三家都在快马加鞭地装修,工程已是尾声,巍峨势雄,光彩照人!不是冤家不聚头。不远处,还有郑州百货大楼和紫荆山百货大楼正虎视眈眈,觊觎着二七广场的动静。一场大战,在所难免!

王力神不知鬼不觉地夹杂在茫然拥动的人群中,悉心查访多家情况,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他细细地品味着郑州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势态,强烈地意识到:“机会来了!”这种机会体现为虽有政治和意识形态的麻烦,经济领域的宽容度仍在扩展,无论是政府还是民间都有一种发展经济和以发展经济来缓解社会矛盾的努力,都有一种寻找在制度转型期平稳过渡、不至于彼此敌对彼此伤害的可能;无论一九八九年的夏天多么沮丧和沉闷,一种正视现实、承受苦难和动荡、不满足于现状、要求改革的潮流并未终止,只不过更为深沉、更为理智、更为稳健罢了。当然,这种机会从全国来看,还是隐形的,潜在的。而郑州则把这种机会直观显现出来了。王力多少有些兴奋。那么,郑州七家大商场(包括郑州西郊将近完工的商业大厦),谁是最佳的合作伙伴?谁可能充当这场大战的主角?

他盯上了亚细亚商场。

四年后,北京南海渔村。王力不胜酒力,已是微醺。

“北京有王府井百货大楼、西单商场、东安市场等等全国数得着的大商场,为什么不在北京闹,偏偏要去郑州?”我问。

“谁敢伺候那帮爷!都是老字号,牛大了!而且都形成了积重难返的套路。就说百货大楼的张秉贵,那种一把抓的本领,那种温暖人心的微笑服务,确实够感人的。可微笑服务是商业最最起码的要求呵。中国有句老话:没有笑脸莫开店。这种要求

与商业文化差得太远。更何况,北京这地方,卖屎都挣钱!”王力又话锋一转,调侃说:“再说了,北京人闹革命、搞运动兴头刚过,惊魂未定,干什么事儿都是懒心懒肠的,哪还有心思琢磨重利轻义的商业?所以逼着我往穷地方走。毛主席语录,穷则思变。”

“那你为什么选择了亚细亚?”

他眯缝着小眼睛说:“原因很简单。”

他说,这家商场是一家股份合作制集体企业,有职工一千三百多人。股东是河南省中原不动产总公司和河南省建设银行。股份合作机制,人员构成年轻,没有包袱,远离商业旧体制,是其最大的特点。其实认真追究起来,它既不是标准的股份制企业,也不是标准的集体企业(虽然注册为集体企业),更不是全民所有制,而且不入商业系统的流,是典型的四不像。正是这种四不像,才可能成事。商场总经理王遂舟,当时三十岁出头,复员军人,思想活跃,敢想敢干,很有魄力,无疑是郑州潜力不可限量的青年企业家。

在他看来,亚细亚是条大鱼,想要钓住它,非得采取姜太公的矜持和韬略不可。

他了解到,王遂舟是郑州市公共关系协会副会长,他便以北京市公关学会副会长和恩波公关的名义与郑州公关协会联系赴郑州讲学,同时特别关照多请商业系统的人士和各大商场的领导人。在郑州青年宫的第一次演讲,某种意义上说,与其说是给台下数百河南省和郑州市的局长、处长和企业领导人上课,还不如说是单单给亚细亚公关部的两个年轻人上课。他知道,台下数百双眼睛中,有两双如饥似渴的眼睛在注视着他。他来郑州首先要征服的恰恰是这两双眼睛。对此,他有充分的自信。他侃侃而谈。从公共关系在现代社会的含义到具体实施的成功案例,从公共关系学在国外的发展到国内的现状,许多知识,对在座的听众来说,都是全新的。从结束后热烈的掌声来判断,演讲

非常成功。

他从讲台上下来时，一位长相清秀而精干的姑娘挤上前来，向王力伸出了手。

“王先生，您好。”

“您好。”

“我是亚细亚商场的。”姑娘大方地介绍说。

“噢。”

王力并没有显露出十分的热情，可心里说：我等的就是你！

他不失礼貌地接过名片，轻声念道：“郑州亚细亚商场公共关系部经理刘博”。

“欢迎王先生有机会到亚细亚商场看看。”

“谢谢。”

这“谢谢”说得既不肯定，也不否定，热情中保持着某种节制和距离感。此时，他已断定，强敌如林的亚细亚商场必来找他王力无疑。

阿里巴巴洞门打开了。

商人

王遂舟的期待，正如神话中所说的那样，羿受尧命，射十日，只射了九日，剩一日，于是让地球拥有了太阳，拥有了朝起夕落的光明；于是便有了阳光灿烂，万物生长；于是给了人类无限的生机和灵感。这种灵感来得是那么直截了当。本来亚细亚商场的前身是“德化商场”，坐落于二七广场的东南角。德化街，原是郑州一条老商业街，在德化街盖一家商场，自然叫德化商场。在德化商场翻盖扩建商场，新酒装旧瓶，自然继承了旧商场的名

称。可是商场的新主人总觉得这名字陈旧老化,听着不响亮不舒服。“德化”,道德风化。好像一切都是规定好的,形象道貌岸然,四平八稳,与现代化大商场眼花缭乱、煽人物欲的气氛极不谐调。名字必须改!有人提议用“亚细亚”。又有人提议,查一查,“亚细亚”是啥意思。亚洲的全称是“亚细亚洲”,亚细亚人是黄种人,“亚细亚”在古老的语系中是“东方初升的太阳”,而且是野太阳!无规无矩、遨游八极的野太阳!这正符合年轻人想干一番大事业的性格和脱胎换骨的愿望。就是它!

如果说王力接近亚细亚是经过了精心策划、长期铺垫的结果,那么王遂舟当亚细亚的总经理却是在一系列的瞬间偶然中决定的。

当初,在河南中原不动产总公司总经理晋野的餐盘中,亚细亚商场这块蛋糕原打算是切给别人吃的。作为河南省最早最大的不动产开发商,早期根本无意在商业零售业中插一腿,与国营商业主渠道竞争,扩建亚细亚,只不过是预见到了郑州这块未开垦的处女地未来商业繁荣的潜力,抓住机会开发房地产罢了。他们手里没有商业零售业的经营管理人才。他们擅长把一个猎物非常有耐心地养肥,然后毫不手软地切开撕碎,分光吃尽。如何把猎物不失时机地扔进饥肠辘辘的鲨鱼池,是房地产商圆桌会议的永恒主题。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河南中原不动产正野心勃勃向前发展时,已有人看出了它的某些破绽,准备把它“切开撕碎,分光吃尽”,在郑州,与中原商战同舞台演出了惊心动魄的一幕。那是后话。

一天,晋野在办公室接待了正在筹建的商城大厦的副总经理王遂舟。这位个头不高、阔脸宽胸的年轻人,目不斜视,腰板脖颈都挺着,两道浓浓的剑眉紧锁着,三年的军旅生活,使他无论在什么场合都带着一种军人不可更改的坚定和规矩。他朝你

走来时,能让你感觉到一股风,一股冲击力。这些都给晋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说起来,他们都互相知名,算是郑州呼风唤雨的人物,只是没有机缘会面。

“请坐。”晋野客气地向王遂舟让座。

王遂舟坐下后,得以仔细观察这位亚细亚商场的老板——一个只顾匆匆埋头走路,精力充沛的小个子,一个尚没有获得做城里人资格的河南济源县山区的农民。晋野有着传奇般的经历。他的血管里没有尊贵的血液。严酷的现实和父辈悲剧性的生活状态时时刻刻都在告诫他:谁都靠不住,只有靠自己,才能扼住命运的咽喉。他只接受过初等教育,然而他从山区闯了出来,由济源而新乡,由新乡而郑州。短短的几年中,由一个普通的山区农民生意人,做到了河南中原不动产总公司的总经理。省人事部门甚至动员他任省某厅局的负责人,遭到婉拒。他说:“我不是当官的料。”他是那种典型的靠天份和自我奋斗而取得成功的农村孩子。到了郑州,到处都可以听见他的传说,可是见到他的人和能够捕捉到他的形影踪迹的人却很少,包括他的老板、他的副手和他的老婆。他好像在云里雾里生活,飘忽不定,不可捉摸。他还兼着海南和国外一系列公司的重要头衔。今天晚上还在郑州某大饭店吃饭,明天没准就在北京或广州、海南了,后天就可能接到他从香港、新加坡或者西欧的某个国家打来的电话。大家似乎已经对他这种生活方式习惯了。越是神秘,就越是想见,可总是阴差阳错。终于抓到了他。他说:“晚上十一点半以后好吗?”他总要忙得迟到,像幽灵一样在更深夜静的时候,在你等得已经绝望的时候,轻轻地敲响你的房门。只要坐下来谈,便是奇思诡想,海阔天空。他的知识结构非常奇怪,不时冒出一些新思想新概念,不时冒出一些“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闻所未闻的方略。一年后,王遂舟向他请示亚细亚商场的广告费用,他说:“给你一百万够不够?到年底,花不完一百万,你

不要来见我！”这在当时乃至现在，商业零售业企业不到一年，花一百万广告费，不啻是天文数字。

王遂舟此行目的，是购买亚细亚商场的部分零售摊位。话到投机处，他随口说道：

“晋总，你们盖了这么个现代化的大商场，地势又好，为什么不自己经营呢？”

“经营？”晋野问道，“谁来经营？没人。”

“晋总，我咋样？”

“你……”

晋野凝视着王遂舟，王遂舟也极其敏感而迅速地在晋野脸上搜寻着哪怕是丁点细微的反应。双方都很清楚，这种选择的机会是极为短暂、瞬息即逝的，谁要是抓不住，谁就是笨蛋。因为这可能是人生中最具灵感最辉煌的一瞬。

晋野的眼睛亮了。他点燃一根烟，轻轻地吸了一口，然后，从容问道：“你想好了？”

“当然。”

“如果让你当亚细亚商场的总经理，你有什么打算？”

“授予我经营决策全权！特别是人权、财权！”

“这当然。”

“第二，目前亚细亚商场的一层二层都卖出去了，整体感已经破坏，对将来的经营十分不利。这种分割的状况必须改变！”

这是一个当初未能预料的难题。整幢楼的出售工作虽说不很顺利，但一层二层在前期以吸收资金（一千一百万）的形式已先后卖给了十六家单位。请神容易送神难。然而，经营战略发生了重大调整，这些神非送走不可。后来真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算清理干净，几乎所有的回收价格都高于售出价，有的甚至高出了一倍以上。就是赔血本也要买回来！我问晋野：“这样做值吗？”晋野说：“结果你不是都看到了吗？要害是，我们买回了

气势,买回了遂舟这样的经营人才!”

晋、王这两位郑州商界的枭雄会面,王遂舟与中原不动产结盟,可以说是历史性的。这次会面,实际上点燃了由亚细亚商场挑起的“特洛伊战争”——中原商战的火种。

如果亚细亚商场是中原不动产的一个大拼盘,那么所谓“商战”就无从谈起了。面独家经营,集体所有股份合作(一个十分奇怪的)体制,无论是多么拗口多么奇怪,有一点是非常明晰的,那就是产权关系简洁单纯,有意无意地一下子把与国营主渠道的界限划分得泾渭分明。两军对峙,竞争的局面,在所难免。

王遂舟拿下了亚细亚商场的总经理,能否拿下郑州商业零售业的半壁江山,或者极而言之,能否在杀机四伏的环境中存活下来,这都是未知数。

摆在王遂舟面前的局势十分严峻。商场造价四千二百五十五万,绝大部分是河南省建设银行贷款。还贷付息的压力很大。其次,1989年国民经济治理整顿,经济滑坡,市场萧条,加上社会动荡不安,消费空前跌落,零售业遭到沉重打击。北京学运波及郑州,学生们认定亚细亚商场是郑州最大的“官倒”,因为谣传王遂舟是全国政协副主席、北京光大实业公司董事长王光英的(当然也就是王光英的外甥河南副省长刘源的)亲戚,于是喊出口号,“砸烂亚细亚”!正是学运起来的时候,亚细亚商场内外装修完毕,开业前的所有工作已准备就绪,蔚蓝色马赛克外观,茶色玻璃,郑州第一家扶手电梯,旋转扶梯,其新颖和豪华,在郑州在河南都是首屈一指。亚细亚鹤立鸡群,便成了社会议论的中心和宣泄不满情绪的最佳对象。外界可能不知道,王遂舟上任后,刚开始打的恰恰不是商战,而是“亚细亚保卫战”。当时,可能除了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等党政机关外,亚细亚成了首当其冲的建筑物。河南是个穷省,花几千万元盖了这么个威风漂亮的宝贝,被风起云涌的学生和群众砸喽毁喽,岂不可惜!武

警、公安、职工布置了警戒线，王遂舟本人也是二十四小时关注事态发展，吃睡都不踏实。

再有，国营商业主渠道大军压境。

推开郑州市区地图，便可一目了然。围绕着二七广场，亚细亚商场的北面是商城大厦（营业面积一万余平方米），西北面是华联商厦（营业面积一万五千八百平方米），东面是人民商场（重新装修后，更名“天然商场”），北面一里路有全国闻名的郑州百货大楼，东北两里路有紫荆山百货大楼，不远的西郊还有个商业大厦（营业面积是亚细亚的两倍），个个都是与亚细亚匹敌抗衡的超级大国。“老字号”和“新字号”国营商业主渠道两路大军“分进合击”，把亚细亚商场挤压在二七广场的东南角。

分析各大商场的背景和实力，亚细亚也处于不利形势。

先看紧接其后于九月一日开业的商城大厦。该厦是王遂舟的老家，直属于省供销合作社，有职工一千二百多人，总经理李自强是供销合作系统的“老商业”，以其敦厚温良、稳扎稳打而久负盛名。商城大厦手中的王牌是，有一条供销合作系统经营了数十年的城乡购销渠道，老客户一呼百应。也就是说，有一套向农村辐射的强有力的批发销售系统。

九月二十日开业的郑州商业大厦更是虎视眈眈，号称“河南最大，全国一流”，由于其地处二七广场外的碧沙岗工业区，既游离于二七广场这一竞争大漩涡，又保持着随时进击、向诸侯挑战的张力。它有职工二千三百人，后台老板是郑州市第一商业局，总经理王振华至今还兼有一商局副局长的职务。王振华此人，历史教员出身，有着很强的务实精神，商业大厦从筹备奠基到落成经营，自始至终都在他的把握之中，成为国营商业主渠道精锐中之精锐。

如果说商业大厦是一商局宠爱的“大儿子”，那么，一九九零年九月一日开业的华联商厦可以说是一商局的掌上明珠。这家

有一千六百名职工的商厦,几乎就是一商局局长王华然的“自留地”,其中许多重要的部分,都能看到王华然的影子。华联商厦的底子是郑州纺织品批发站,经营纺织品是其特色。创始初期,为了增加商誉和加强竞争能力,他们加入了纺织工业部著名的“华联集团”,形成了全国性的购销联网。总经理张淑云,四十多岁,是郑州家喻户晓的女强人,干练,泼辣,有冲劲。她告诉我,她的百米短跑最好成绩是十三秒,二百米是二十九秒一。这是女子短跑绝对要拿名次的成绩。

新锐、老军交相呼应。郑州百货大楼、紫荆山百货大楼都是全国知名的企业,虽然设备陈旧、人员老化,但经验丰富,价廉物美,在郑州市民中有着几十年的良好声誉。郑百老总丁福森是全国商业系统有名的老劳模。

与这些强大的对手相比,亚细亚几乎是一张白纸,根基浅薄。而且这些对手有着天生的血缘关系,都是几十年营造起来的主渠道大家族的正宗和嫡传,无论是观念还是现实中,都把亚细亚像“私生子”一样地析离了出来,虽然“亚细亚”的名字似乎想证明着什么,似乎想顽强地在消费市场的夹缝里划出一片生存空间来。王遂舟多次跟外界说,“亚细亚在郑州是上不沾天下不着地的孤儿”。王遂舟还多次对我说,“他们从来都瞧不起我”。一九八九年后为了挽救国民经济滑坡的颓势,在工业上强调发挥大中型企业“国家队”的作用,在商业上强调发挥“主渠道”的作用,我们可以想象亚细亚这样的体制不在册的企业受到鄙视的状态。然而,在社会生物圈中,人们往往同情弱者。“同情弱者就是一张牌。”王遂舟说。

体制对于体制内的人来说,有无穷多的好处,也有无穷多的烦恼。这种烦恼似乎是不可解的,使他们在享受体制荫蔽的同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丧失身心的自由。体制内可能人人都是巨人,然而手脚被捆绑催肥的巨人,是幼儿园里长大的巨

人,是戴着枷锁跳舞的巨人,动辄得咎、没有自由的巨人。这是他们的软肋。改革初期,撕心裂肺的“松绑”呼声,绝不是凭空喊出来的。

用兵之道,避其所长,击其所短。

王遂舟清楚地知道,他手里有两张牌:一张是社会心理,一张是体制僵化的软肋。前者面对掏腰包的消费者,后者面对竞争者。纵观数年的中原商战,王遂舟都在打着这两张牌,由劣到优,由弱到强。

那么,亚细亚的优势何在呢?王遂舟说,亚细亚的劣势就是亚细亚的优势。“一张白纸”?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根基浅薄”?商场一千三百多名职工,平均年龄不超过二十四岁,这在全国大型现代化商场中是极为少见的。但正是这种年龄结构的人,没有那种旧体制下的陈规陋习,思想活跃,敢于创新,赋予了亚细亚无限的可能和活力。亚细亚当时年龄最小的部门经理只有十九岁!这在别的地方,恐怕祖坟的风水再好也不可能。

开业前,王遂舟打出了第一张牌。

王遂舟是那种表情严肃、不苟言笑的人。久不见他,遇到后,偶尔一笑,便倏地敛住,全神贯注,逼着你快快切入正题。他的身上除了军人气质外,行为举止中还有一种日本人的认真劲头。衣服永远穿得规规矩矩,每根领带都经过了精心的选择,以与西服的颜色和谐。开车,办公,谈话,永远是正襟危坐,头发修得整整齐齐,胡子刮得干干净净,脸颊、上唇和下巴一股杀青之色。与他谈话,能时刻感觉到他的观察和把握,能时刻感觉到他的大脑在飞速旋转。说到诡秘和得意处,他会坏坏地一乐。

可能直到今天,郑州人还不知道,他们的消费曲线起伏升降,都是亚细亚精心调度的结果。开业前半年,亚细亚商场便在《郑州晚报》上以前所未有的大字号,整版篇幅刊登广告,《经济

日报》也登出了大幅广告。“广告”声称,亚细亚所在之地,是“寸土寸金的经商宝地”,声称“亚细亚商场将以一流的信誉、一流的服务、一流的管理、一流的效益争艳于全国大型商业企业之中”。接着举办全国晚报“亚细亚杯”杂文比赛,向全社会征集商场徽记和亚细亚之歌。除此之外,还在报刊上出现了煽消费者情绪吊消费者胃口的新闻报道。

消费者的胃口被高高地吊起来了。可是,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七日的《郑州晚报》突然在头版刊登了一篇专访,《王遂舟的忧》。给期望值很高的消费者狠狠地泼了盆冷水!王遂舟对来访者说了一大堆忧虑:什么筹备时间太短,什么资金、货源紧缺,什么水平有限,什么职工队伍素质不高,等等。

这个气球放出去后,王遂舟立即布置人去搜集社会反应。当他听到“亚细亚看来还是底儿潮,蔫了”、“老实了,不吹了”的反应时,内心窃喜,并嘱咐停止一切新闻报道,让亚细亚暂时声销迹匿。

社会的期望值被压下去了,然而,他对部下说,压得还不够,还要压,压到最低点!

本来在广告中早就预告了商场于五月一日开业,全部准备工作已于四月二十六日就绪,可是到了五月一日就是憋着不开业。而且保安部门接到了死命令:“外界任何人不得参观!”商场一千多职工早已按部就班,处于倒计时状态,商场内的每一根弦都绷得紧紧的。谁都不明白王遂舟这个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一天。

两天。

三天。

……

“遂舟,咋还不开业?”“遂舟,这样拖下去可能不行吧?”熟人,见面便问。

“……”王遂舟微笑不语。

亚细亚商场到期未开业,社会舆论纷纷。

“亚细亚看来真不中!”

“亚细亚成不了气候!”

弄得社会对亚细亚商场没有任何期待了。好像没有这回事似的。

五月五日,王遂舟突然向职工宣布:明天商场正式开业!

第二天早上八点整,因为是夏令时,行人稀少,副省长秦科才、副市长张玉祥赶来参加开业典礼,王遂舟走到麦克风前,说:“亚细亚商场隆重开业!”

整个开业典礼只用了一分钟!大家还没回过神来,便结束了。

场面冷清,没有鞭炮,没有骚动,与王遂舟所说的“隆重”实在是差了十万八千里!

一切都是在无声无息、不事渲染的反常规状态下完成的。

王遂舟谦恭地为郑州市民奉上亚细亚商场,一个郑州开天辟地以来从未有过的现代化的豪华的大商场!进大厅,灯火辉煌,手扶电梯可以把你从一楼送到三楼,数万种商品,应有尽有,琳琅满目,鲜花绿树散布其间,如同到了花园一般。更有特色的是,因为是第一次招工,亚细亚招进了一批训练有素的美女,花容月貌,婷婷玉立,令顾客驻足忘返。

一传十,十传百,不用登报,光是市民间互相传递消息,不到中午,就让亚细亚商场沸腾了!人山人海!二七广场的三个路口全部堵塞!人走不动,汽车停开!人们被崭新的亚细亚搞得目瞪口呆,神魂颠倒!人们的情绪被狠狠地煽动起来了。五月七日,商场客流量达到了三十万!最后不得不动用部队和武警来维持秩序。

狡猾的王遂舟把这个充满了戏剧性的过程描述为“三部

曲”：第一部：煽情；第二部：泼冷水；第三部：再煽情。导演的中心思想是：“避免期望值过高而带来的失望和疲劳，掌握主动权。”

亚细亚商场成功地操纵和把握消费者情绪，给我们一个启示：社会的评价、选择，民心的流向，往往是某种氛围的产物。上帝俯瞰着芸芸众生。芸芸众生非常盲目地互相裹挟。不由自主，唯有上帝清醒，随时随地体现着个人的意志。民心利用好了，便会有奇迹般的效果。政治与商业在这一点上，是完全相通的。所谓顺乎民心逆乎民心，其判断的依据，恰恰不是表面情绪，而是社会本能的心理状态。以往的错误，往往是许诺太多，期待太高，又力所不能及，结果适得其反。这方面，亚细亚创造了一个范例。

当然，事儿一煽起来的，便一发不可收。从一九八九年五月六日到现在，“节目”一个接一个，亚细亚的门口，几乎天天都在唱大戏！

《郑州晚报》登出广告：“为了丰富少年儿童的文化生活，开发少儿智力，培养、提高少儿的社会参与能力，亚细亚商场向少年儿童献上‘亚细亚儿歌’三首，开展背诵儿歌有奖活动，欢迎广大小朋友踊跃参加。参加对象：学龄前儿童或小学低年级学生。”“亲爱的小朋友，假如您能用普通话流畅背诵其中两首儿歌，请于每个星期日到亚细亚商场背诵领奖。”

三首儿歌《长大也到亚细亚》、《亚细亚太阳真鲜艳》、《拍手歌》在报纸上公布后，商场门口搭起了诵歌台，每逢星期天，家长便领着孩子，络绎不绝地来到亚细亚背诵儿歌，其中的“你拍一，我拍一，我来亚细亚坐电梯”，成为郑州儿童向往的境地。

《郑州晚报》又登了广告，亚细亚举办“《我爱童装街》征文比赛”，广告词曰：“父爱母爱爱意常在，童心爱心心心相印”。

写作文，不到商场逛一遭两遭是绝对写不出来的。

亚细亚生生制造出了一个童话世界!“其实,这些活动是为家长们准备的。”王遂舟说:“奖不奖都无所谓,关键是哪位家长不望子成龙呢?哪位家长会放弃让孩子参与社会活动、锻炼孩子才干和能力的机会呢?到了亚细亚,怎么可能不买东西呢?”

千万不可低估这些活动!我不知道将来文化学者和儿童文学作家会怎样评价那3首无名氏创作的儿歌,然而,可以断定,这种以赢利为目的的商业文化对社会的影响和渗透,将是绵长而深远的。

当然,亚细亚所做的远不止这些。在“六四”以来特定的政治气氛和困难的经济背景下,竞争中求生存,求发展,他们可谓是费尽了心机。经营策略年年月月花样翻新,时时刻刻都在制造热点,制造新闻,从没有消停过。进商场大门,便可见到河南省独一无二的、也可能全国独一无二的商场“儿童乐园”,顾客可以放心地把孩子寄托在那里。“这个儿童乐园花了将近三十万元。”王遂舟说:“为什么花那么多钱修它呢?”我问。“原来大人带小孩来逛商场,由于拥挤,曾经发生过事故。再说顾客购物,带着孩子逛也不方便。”王遂舟实际是给顾客奉上了一种温馨和安全感。这是个非常巧妙的促销方法。二楼有“琴台”,古筝“高山流水”,荡出一曲舒适和高雅来;四季常青的热带植物与那彬彬有礼的迎宾小姐一起,证明着商场文明礼貌和生机勃勃。架便民桥,办夜市,赡养“二七”老工人,“TT小姐”,飞机撒彩票,还有每天的升旗仪式,女子仪仗队表演……总之,亚细亚商场像个大魔箱,王遂舟这个魔术师不断地从里面变出些稀奇古怪的东西来,让观众目不暇接,让竞争对手目瞪口呆,防不胜防。其中许多花样,成了外地游客到郑州观光的景致。

对于王遂舟来讲,竞争获胜的动机,仅仅是因为四千多万银行贷款压力?仅仅是因为郑百、紫荆、商城、华联、商业大厦五个

国营和合作商业的庞然大物在销售市场上咄咄逼人？还不完全是。王遂舟是那种内心极其敏感、自尊心非常强的人。严格地讲，初来乍到时，他对商品零售业还是相当陌生的。他拐弯抹角、想方设法从省供销社系统的商城大厦调出来时，带出来6个年纪差不多的哥们儿。七个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人凑一块儿，来接管主体结构刚刚完成的亚细亚商场。按这七人之一的段卫国的说法：“一群热血青年，终于碰到了一次机会。”他们仰视着钢筋混凝土框架，都不敢轻言妄语，都对未来感到忐忑和茫然。他们的脸和这混凝土一样的铁青、凝重。他们谁都没有经营一家现代化大商场的经验，或者哪怕是经营一家小百货商店、小杂货铺、小糖果店的经验。他们的商业知识，大多数是从书本里读来的，是从电大商业专业学来的，都是纸上谈兵。也正因为如此，那些身经百战的“老商业”起初并不把这帮小年轻看在眼里。你王遂舟不过是一窝小蚂蚱里的头儿罢了，一个只懂得齐步走的复员军人罢了，终难修得正果。再说了，你亚细亚是个什么东西？不过是个走不上正道打人另册的“四不像”罢了。“主渠道”里做事，比如下个红头文件、搞个什么政策、落实个什么待遇，从来不带亚细亚玩。王遂舟驾驶的亚细亚，像是伫立在二七广场上的一幢虚无飘渺或者是中看不中用何足挂齿的空中楼阁，一幢摆设。根本是熟视无睹，不把你当玩意儿！

王遂舟曾以一种严肃加调侃的口吻对我说：“他们就是在今天也瞧不起我。”

他的自尊心受到了很大的伤害。

他开始出击了。他开始向所有对手挑战。一种恶作剧式的挑战。

王遂舟的第一“剑”，刺向了斜对面商城大厦总经理李自强。

商城大厦是王遂舟“娘家”，也是王遂舟千方百计要逃脱出来的地方。这是一幢雄伟的咖啡色建筑，把在二七广场的东北

角。除了郑州百货大楼、紫荆山百货大楼这两个老字号外,商城大厦第一个跨入二七广场这个大竞技场,接受亚细亚挑战,并揭开了“特洛伊战争”——“中原商战”的序幕。

进商城大厦很不容易,不知道为什么,大门前沿着街道都被交通铁栅栏团团围住,两侧要走很长一段路才能进去,而且通道狭窄,这与一个年销售额二点四亿、利税一千二百万、销售额在全国商业零售业排序第五十一位的庞然大物来说,是极不协调的。

看照片,李自强是一位朴实敦厚的长者,往后梳的头发已经花白,脸上能看出某种饱经世故的善意。他一九八九年由省供销社调来当总经理时,已届花甲,比当时王遂舟的年龄整大了一倍。他在一九四九年前便当过“小伙计”,之后一直搞商业工作,他主持的商城大厦营销特点是:价格“稳”、“低”,薄利多销。也可能因为年龄的关系或者为人处世的经验,办公室副主任丁振宇说:“我们老总的性格温和,这种温和的性格也构成了我们企业的风格。”

那么,这种温和是怎样迎接王遂舟这匹商业界“黑马”锐不可当的狂飚突进呢?

至今我们还能闻到一九八九年初秋那场争斗和搏杀的硝烟味道。

从诸多迹象看,老将李自强对亚细亚在二七广场初试锋芒并不特别在意。商场开业前的一切准备,稳扎稳打,有条不紊。他在《郑州晚报》非常从容地登出了九月一日试营业的广告。这一个“试”字,真个了得。显然摆出了一副与亚细亚开业“火爆”闹腾的效果完全不同的架式:谦逊而又矜持,温和而不失居高临下的风度。这种矜持也许是有道理的。在消费疲软的情况下,商城是省供销社系统支撑的企业,有着几十年体制培育下的购销渠道,实力雄厚,货源充足。更重要的是,在当时的经济形势下,

如何摆脱困境,以图生存发展,李自强丰富的经商阅历和老谋深算与王遂舟的初出茅庐相比,似乎有更多的优势。从这个角度看,亚细亚多少有点生不逢时。所以李自强从容不迫,不急不躁,庆“国庆”,十月一日正式开业,九月一日试营业,试营业一个月!完全没有把亚细亚的成功当回事儿,完全没有把王遂舟当作他强有力的竞争对手。王遂舟的父亲也是老商业,五十年代就任郑州市蔬菜公司经理。他和王遂舟的父亲一辈,与小侄儿竞争,当然要有点长者风范。商城轻敌。然而,正是这一个“试”字,埋下了病根,被王遂舟揪住大做了文章。

在王遂舟看来,本来商城威风八面,优势明显,可这开业的标准定在“试营业”上,就露出了大破绽。当他看到晚报的广告时,长舒了一口气道:“真是天助我也!”

“为什么‘试营业’是商城的大破绽?”我在三年后不解地问王遂舟。

“‘试营业’真是个天大的错误。”王遂舟非常感慨地说。“它麻痹了多少人,毁了多少人。我认为这是种旧观念的产物,许多商业企业就是砸在这上面。你想,这里面有个简单的道理,他们没有考虑到:你说试营业,消费者可不这么看。再说了,大姑娘出嫁,一个月后又重新揭面纱,哪儿还有新鲜感?”

商城还有个根儿上带来的弱点。

王遂舟有些刻薄地分析说:“商城生出来便是先天不足。第一是楼小,梯形结构,盖得很不规则。第二,开业前,我进去看过,布置摆设很有毛病。商场里,一般都是大通道、宽视野,低展柜,可商城完全相反,通道挤,柜台高,条块分割厉害,妨碍视野。有点像乡村供销社。”

说起来,王遂舟的心境是十分矛盾的。他一九八七年底任商城的副总经理,负责基建筹备工作,中层领导班子也是他参加选定的,整幢大厦曾倾注了他的心血。

八月三十一日晚,亚细亚灯火通明,包括王遂舟在内的所有领导和当班职工都没回家,都在加班加点重新打扮商场,积极备战。而商城大厦早已是漆黑一片,仿佛能听见那种稳操胜券的踏实的酣睡声。王遂舟仰天长叹。他熟悉那里的每一寸土地,熟悉那里的每一个人,感情笃深。可他今天作为竞争的另一方主帅来参加这场你死我活的中原商战时,还没有交手,对方便露出了致命的破绽,欣喜高兴之余又有着难以言表的沮丧和隐痛。据实相告,鸣金收兵,来日再战,后果将会是怎样呢?商业竞争便是这般残酷,便是这般铁石心肠。最后,王遂舟操剑朝李自强最薄弱的环节刺过去。他作出了“以气势压倒商城”的决定。

说起一九八九年九月一日试营业第一天的情景,商城人还有些惊魂未定,还有些愤愤不平。郑州市民一觉醒来,突然发现刚开业不到半年的亚细亚又变了个模样,像个刚出花轿的新娘,里外粉饰一新。商场外安彩灯、插彩旗、放气球;西门口还搭了个大戏台,亚细亚艺术团和时装表演队在上面眼花缭乱地摆动,演唱着。商场大厅正在举办鲜花展。过路人能看到亚细亚两米高的大横幅,上书“所有商品九五折”;鞭炮声比商城更长更响……而且王遂舟下了死命令,策划的每一个细节都不准出问题,谁出了问题开除谁!大家都被搞懵了,今天到底是商城开业还是亚细亚开业?用一句俗话说:今天的亚细亚张灯结彩,喜气洋洋,像是刚开业一般。结果,拥进亚细亚的人远比拥进商城的人多。

这种场面让商城人始料未及,尴尬不堪。更让商城人不能容忍的是,亚细亚人不仅轰轰烈烈地唱对台戏,而且还打到了家门口。

他们发现亚细亚人跟着顾客混进商城,用小本抄商品价格,然后用对讲机向本部老板报告商品价格。华联商厦总经理张淑云说,她刚开业时,每天也有上百人到华联来抄报价格。商城更

是指着鼻子说,亚细亚不顾商业道德,“无货标价”,而且标低价,要把商城卖得很好的“新飞”冰箱挤垮。商业大厦则指责亚细亚在商业开张时,派了上百人,手持百元面额的大票来购物,给售货员制造混乱和难堪。

对此,王遂舟坚决否认。他说:“没有比打价格仗和干偷鸡摸狗的事情更愚蠢的了。在现代商业经营中,要害是服务质量。而且,在郑州,谁都知道,亚细亚的商品贵。亚细亚靠的是高水平的服务和信誉来吸引顾客的。那么,价格仗从何打起呢?”

说来也巧,九月一日是郑州市某体育运动会的闭幕式,有关方面要求亚细亚出一个一百人的方队。方队去体育馆,又恰好要经过商城门口。方队喊出了“亚细亚好”的口号,商城人指责亚细亚人,这是一次有预谋的示威和挑衅行动。亚细亚人予以否认,并解释说,方队针对商城的口号,纯属青年职工的“即兴”行为。

预谋也罢,即兴也罢,总之,方队的呼喊,激怒了商城人,使商城人憋在肚子里的恼火和郁闷爆发了。

“这不是往我们头上拉屎撒尿吗?!”

有血气方刚的青年职工要扑出去,被李自强紧紧拦住。李自强非常明白,如果拦不住,商城人与亚细亚人将会有一场血肉横飞的恶仗。“六四”刚过不到三个月,如果真打起来,引起社会骚乱,后果不堪设想。

“谁都不能动!谁动我开除谁!”平时待人宽厚的李自强大吼道。

大家看老总真怒了,便收住了脚步,但仍不服气:“他们太不像话了!”

“不行!”李自强没有任何余地地强调说。

李自强本人也没有料到,亚细亚针对商城的试营业有如此精心而凶猛地商业竞争策划,一招一式,处处都超出了经验所能

及的常规,而且势不可挡,令他猝不及防。但是,他也非常清楚,亚细亚这家完全游离于体制外的股份合作制现代化大型商场,已经向旧的体制和旧体制内正在崛起和将要崛起的所有足能与之匹敌的大商场正式宣战了!第一战役下来,商城明显处于劣势。商城人充满优越感的自尊心被王遂舟深深地刺伤了。商城人至今难忘这一剑之仇,因为这一剑给全郑州市民一个不可磨灭的印象:商城不如亚细亚。后来,王遂舟跟我说起这场恶斗,不无歉意地说:“现在想起来,真有点对不起他们。我曾经在职工大会上讲,我们和商城,是一条血脉流出来的血。”

在郑州等了好几天,终于没能见到李自强。他出国考察去了。我见到了商城的两位副总经理和两位办公室主任。他们给我描述了李自强的一个大轮廓。

一九九三年,李自强已有六十四岁了。他是那种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规规矩矩成长起来的“老商业”。他一九八九年当了商城的总经理后,每天工作十五六个小时,工作十分勤勉。他的第二个特点是处事严谨,事无巨细,皆在把握之中。他给办公室定出标准,招待烟,最高级的就是郑州产的“彩蝶”,即使是商业部的人来了也是如此。每次招待完客人,剩下烟、瓜子和水果,他一定要嘱咐,“水果可以拿走吃,烟和瓜子都要收起来保管好,下次再用。”弄得大家面面相觑。第三个特点是克己奉公。他与办公室副主任谢钢林在北京出差,说:“小谢,咱们挤公共汽车吧?”还没等谢反应过来,他六十多岁的身板已挤上北京那拥挤不堪的公共汽车了。而王遂舟在这些方面相当灵活,因为他更看重现代企业的公共关系和外部形象,更看重效率。他上下班,都是自己开着一辆黑色闪光的“奥迪”车。

谢钢林说:“冬天是李总最难受的季节,他几乎天天感冒。他的办公室在西北角,窗户不严,风鬼哭狼嚎地往里灌。他每个月值一个星期的班,中午晚上都睡在沙发上,怎么可能不感冒?

我们劝他,李总,楼上607室是高级房间,平时也不接待客人,闲着也是闲着,你可以在里面休息嘛。”“不用不用,那留给客人住。”李自强拒绝说。这一拒绝倒好,下属们一冬天都能听见他说话时,鼻子不通气的嚷嚷声了。

第四个特点是宽以待人。他很少训斥部属,也不轻易处分和开除职工。为有一个忠厚长者的好名声,他说:“我啥也不要求,只求将来我回商城时有人理我。”这种处世哲学,给他带来了无穷的烦恼。因为他毕竟是一家拥有一千二百名职工的现代化大型商场的总经理,毕竟是在旧体制异常疲惫、亚细亚挑战的外部环境下进入二七广场这一风云激荡、形势变幻莫测的大漩涡的,如果还是遵循老规矩,在通常情况下按部就班地操作,就难免略逊一筹。这方面,王遂舟可能名声不太好。他的中层干部被免职是家常便饭,只要不得力就免;职工先后被炒鱿鱼的上百,以至于招来了劳动部门和市工会的抗议,招来了某些职工的不满,并被斥责为“搞资本主义”。王遂舟对此不以为然,仍然我行我素。他以为,强化企业领导人权威,维护企业铁的纪律,保证企业健康有效地发展,天经地义,损失一点“道德”形象,损失一点情感,也在所不惜。

当然,李自强的处世哲学,给他带来好口碑。省供销社想请王遂舟做报告,又碍于下属的商城与亚细亚是冤家对头,被亚细亚折腾伤了心,先向李自强征求意见,“合适不合适”?他大度而爽快地说:“当然合适。”而且在会场上,主动把手伸向了王遂舟。王遂舟也在讲坛上对着供销社上千的听众说:“李自强是我们的老师。”这次演讲的效果,按在场的谢钢林描述:掌声雷动!

当然,台上握手言和,台下仍要竞争。

亚细亚与商城一役,着实让郑州商界大吃一惊。“主渠道”商业各大主力纷纷秣马厉兵,积极备战。

压迫最大的,当属亚细亚的邻居、与亚细亚隔路相望的华联

商厦。

华联的前身是郑州纺织品公司,总投资四千万元,改建成现有规模。改建时,曾名为“二七塔纺织品商店”,实在是不气魄。有人提议,挤进商业部“华联集团”。然而,华联集团是商业部一个由沿海城市组成的外向型的松散型企业集团,专事出口和营销纺织品,所谓“穿在华联”便是它风行全国的广告,在消费者中间有着很高的信誉。可是,在通常情况下,这家集团不吸收内地商业企业。华联商厦办公室副主任张东虹说,为了获得“华联”这块牌子,光是北京商业部就跑了十几趟,可谓是“煞费苦心”!因为置身在二七广场这块充满血腥味的大角斗场,一块有着强有力后盾的招牌太重要了。

张淑云已经看到了先于华联开业的商城、商业大厦被亚细亚这个孙猴子搅得不得安宁的窘状,她必须要有充分的准备。

平地起一个一流的、硬件多方面都要超过亚细亚的现代化商业大厦,谈何容易!

首先是资金短缺。前期,除了少量投资和拆迁费用外,她采取了“中层干部二千元,一般职工一千元”的办法,强行集资二百万。可是到了一九八九年下半年,资金全部用完,工程面临停工危险,如果停工,军心便可能浮动,局面将难以收拾。

她向第一商业局告急,第一商业局向市政府告急,郑州所有银行和“大款”都求到了,大家爱莫能助,治理整顿,银根紧缩,谁的日子都不好过。

正当亚细亚和商城杀得难解难分之时,由郑州市副市长刘振中带队,有一商局局长王华然、市财政局副局长、张淑云等一行人组成的人马,神不知,鬼不觉地上了西藏。目标是,至少筹措五百万资金。

西藏之行,对于张淑云来说,是在玩命!她虽说是很棒的篮球和短跑运动员,可就是不适应高原气候。飞机一落地,她便有

严重的高山反应，“走路没劲，吃饭没味，上楼喘气”。在去日喀则的路上，她一天只能吃一顿饭，也就是喝几口稀饭面条。一路上，她休克三次，面色蜡黄，不省人事。同车的人见状都吓坏了，把车停下来，该吃的药全吃了，还是不行。王华然说：“淑云，不行，咱就回去吧。”张淑云没有力气说话，只是拿眼神不容商量地表示：继续往前开！

高原的秋天，天离得那么近，远处的雪山那么的清晰，碉楼、毡篷、剽悍的藏民和剽悍的牦牛，在舒展和雄阔中充满了神奇的情调。然而，这些一肚子烦恼的郑州人根本没心思观赏。王华然后来心有余悸地跟我说：那次上西藏真危险，张淑云差点把命搁在山上。

张淑云上西藏拼命，是为形势所迫。与同时上世界屋脊的政府官员不同，她是市纺织品公司和华联商厦两家总经理一肩挑，一边是亚细亚虎视眈眈、窥测着她的一举一动，一边是上千号人仰着脖要饭吃，她的四十岁人生面临着最严峻的考验。她的今天来之不易。她出身贫寒，一九七四年怀孕时，调到市纺织品公司服装组。有人调侃说：“服装组来个大个子，一来就挺着个大肚子。”言下之意，服装组来了个不中用的人。她不服气，说：“等着瞧，我生完了孩子……”她先当服装业务员，上班时站柜台，业余时间蹬着三轮车进货。大冬天，蹬着小山似的三轮，衬衣都被汗水浸湿了，寒风吹来，透心地凉！经常是天刚蒙蒙亮，就要到农村赶庙会，推销商品，纸箱上一坐，货往地下一摆，两毛钱一包的爆玉米花就当了午饭。她深深地知道，一个女人要受人尊敬，要取得成功，必须要有超常的努力，必须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她就是这样，从一个普通业务员蹬三轮开始做起，完全靠个人奋斗，一步一步干到了总经理，在郑州算得上是一个呼风唤雨的女中豪杰，巾帼英雄。

可如今，英雄气短，不是因为高原的空气稀薄，而是囊中羞

涩,数千公里赶到世界最偏僻最荒凉的地方,来淘金,来请求援助。

一来就情况不妙。第一轮谈下来,西藏人能给的与郑州人所期待的相差太远了!而且,似乎没有多少余地,异常绝望的张淑云回到宾馆,蒙头大哭。在她四十岁人生经验中,从来没有这么伤心地痛哭过。她本来就是个大嗓门,现在也不管不顾了,扯开了嗓门痛痛快快地哭。谁来劝都没用。闻之者,莫不动容。

张淑云泪洒喜马拉雅,这一壮烈之举感动了上帝。上帝在她彻底绝望的时候,赐给了她希望,在最后的一刻,她得到了远远超过期待的支持和援助。

华联转危为安。

一年后,华联商厦像只展开了巨大翅膀的蓝蝴蝶,出落得如此洒脱和华丽。王遂舟经常在亚细亚楼上用高倍望远镜观察着华联的一举一动,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不放过些微的变化。他经常称羨华联商厦的建筑。他说:“从现代商业的角度看,她是十分完美的;她的外观形态也非常漂亮,像只在波涛中行驶的巡洋舰。如果要我拿亚细亚换华联,我肯定换。”

华联一表人材,挠得王遂舟心里直痒痒,真想在开业前能进去看个究竟。他感到了威胁。可是张淑云早有防备。她严令,开业前谢绝任何人参观,并加强了保安措施,将华联铁桶一般地密封起来。

然而,防不胜防。

一天,一楼大厅正上货,张淑云从二楼下一楼,迎面一个年轻人上楼。这个年轻人胸前戴着华联的值日牌,见她下来,赶紧埋头疾行。

“这人好面熟。”十分敏感的张淑云判定他不是自己人。他是谁?她在一瞬间急速搜索着记忆。“噢,他是亚细亚的一个部门经理!”

她宽阔的身体拦住了他的去路。

“你是亚细亚的吧？”她问。

“……”他不说话，脸忽地红了。

“……”

“你们这样做不合适吧？！”

“……”

年轻人自知理亏，也不申辩，十分惭愧地摘下胸前的值日牌，匆匆离去。

“值日牌是谁的呢？”张淑云查出了“家贼”，并炒了鱿鱼。

王遂舟也曾下过死令，华联在正式开业前，亚细亚人谁也不能进去，违者绝不轻饶。所以他得知部下侦察华联内部情况“栽”了，也毫不犹豫地这位经理调离了原工作岗位。第一严肃纪律，第二挽回面子。

这实际上也是初试锋芒。这一试，让王遂舟小有惊诧。对方的眼睛时时刻刻圆睁着呢！

看来，对付华联，绝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他在亚细亚中层干部会议上讲：“要把华联当作最大的老虎、最强硬的对手来看待！”

他分析了华联的优势：一、华联是一商局的掌上明珠，一商局长王华然亲自带领工作组从开始便进驻，并且聚拢了政府部门和理论界一批有识之士，帮助谋划运筹，士气很高，准备与亚细亚一决雄雌，一定要把政府的面子争回来。二、华联的营业面积比亚细亚大了三千平方米，整体设计比较合理，规矩。周转仓库大。三、筹备时间长，有郑州纺织品公司依托，业务力量强，购销渠道畅通。四、具有所有新商场开业的经验教训。五、社会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心理，你亚细亚把二七广场折腾得乌烟瘴气，华联应该把亚细亚的气焰压一压。这五条优势加起来，华联可谓天时、地利、人和。

即使如此,华联也有很明显的弊病。首先,她是原纺织品公司派生出来的商厦,纺织品是其特色,但是百货的购销能力,相比而言,可能弱一些。再者,老企业,老机构,内部矛盾延续下来,一时半会儿难以解决。第三,内部措施仍然能看出“旧”的惯性,仍然没有“脱俗”。

曾下死令不准所有亚细亚人去“参观”华联的王遂舟,在一种巨大的压力和好奇心的诱惑下,在华联开业前曾多次斗胆潜入内部,察看其中的奥秘。他是军人,他知道“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他知道在开战前必须想方设法不择手段地掌握对方情况,才能制定有效的作战方案。而且要亲自去。这里可能要提出一个问题,王遂舟如此知名的人物,走在二七广场上谁都认识的主儿,也无遁土、隐身之术,潜入“敌方”内部,怎么能不为高度警惕的眼睛发现呢?王遂舟对此笑而不答。他那神情仿佛在说“你别多问。反正我进去了,对里面情况了如指掌。”其实,外界并不知情,二七广场爆发的这场“特洛伊战争”,敌对双方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绝无秘密可言。各种亲戚朋友关系互相渗透,有的关系埋得很深,根本无法察觉。王遂舟暗访敌阵,是在“内线”的精心安排下完成的,这一点应该没有问题。

二七广场稍有风吹草动,便可能酿成满城风雨,这是郑州商战的一大特点。

王遂舟暗访华联,眼光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他看出了破绽,至少有三个破绽。他心中窃喜。他回家兴冲冲地跟他妻子讲,这三个破绽如果告诉华联,每天至少可以增加销售五万元!他告诉我:“这三个破绽至今还存在着。你想想,他们的营业面积比我们大了三千多平方米,但是一九九二年的零售额却比我们少了六千五百至八千万!”

“是什么破绽呢?”我问。

“天机不可泄露”。他又神秘地笑了。

亚细亚对付华联的策略,显然成熟和狡猾多了。

华联一九九零年九月一日开业时,对门的亚细亚风平浪静,作出了一副不为所动不为所扰的样子,只是在当天挂出了一条大标语:“祝贺华联商厦隆重开业。”这给外界造了一种印象:亚细亚学乖了,显露出一种宽容、忍让、同生共长的大将风度。

可是在华联的眼里,亚细亚的一举一动,都是“黄鼠狼给鸡拜年”,背后暗藏杀机。因为在此之前,已经有过一次“送匾风波”了。

关于“送匾风波”,有王遂舟和张淑云各自不同的两种版本。

王遂舟版本说:在华联开业的前两天,他带着漂亮而着装整齐的亚细亚礼仪小姐,抬着祝贺华联开业的贺匾,突然来到华联,被门卫拦住。“我们给华联开业送匾来了。”王说。门卫经请示,把亚细亚一行人放进门内。可是在商厦大厅等了好半天,都不见人出来接待,然而,王不急不恼,从容地跟门卫说:“匾放这儿,我们走了。”没等说行或者不行,王遂舟一行人把匾往大厅里一放,潇洒而去。当天下午,郑州新闻界就知道了华联对待亚细亚善意之举非常无礼的消息。不长时间,这则对华联社会形象很有伤害的消息,已经在郑州城里被炒得沸沸扬扬了!让华联尚未出师,便蒙上了晦气。

张淑云版本显然是在被动地解释这场不大不小的风波:那天,她在七楼会议室主持会议。门卫打来电话:“张经理,亚细亚来送匾呢。”“谁来了?”张淑云问。“王遂舟”。她随即派了副总经理和总经理助理前去迎接。可是从七楼到大厅,赶到后,亚细亚已经留下匾走人了!弄得大家都很茫然。又给七楼打电话:“张经理,亚细亚的人走了!”她这才发现问题的严重,赶快派人去亚细亚道歉。可是,已经晚矣。

这像是一场戏!一场精心策划、充分把握了效果的戏!我可否作出如下揣测:王遂舟送匾,压根儿就知道张淑云不会出来

接匾,虽然按理她应该出来接匾;压根儿就知道,他将受到慢待和冷遇。他可能就是为了制造“冷遇”而去的,而且,华联商厦的结构也奇怪,经理人员的办公区与经营区是完全隔开的。到经理办公室,要出商厦大门,从侧门进去,再爬一个七楼,走一趟需要二十分钟左右,有足够“冷场”的时间,有足够离去的理由。要的就是这种效果!设计得真是完美无缺!无论如何,华联总躲不过这场“失礼”的戏!而王遂舟则是一种虚怀若谷的大将风度:飘然而来,飘然而去。

当然,这仅仅是一种揣测。这种揣测构成了“送匾风波”的第三种版本。

从送匾到挂祝贺标语,明眼人观察到,亚细亚的路数正在发生变化,在一年多血雨腥风的竞争中,亚细亚正由闹腾走向成熟,正由自卑走向自信,正由斗勇走向斗智。整个精神状态似乎都在升华。人们在猜测。是什么因素在背后发挥作用?都在纷纷传说亚细亚背后有高人。外界都不知道,聪明的亚细亚人早已从北京请来了“中国第一公关先生”王力。在那次报告会上,亚细亚公关部主任刘博与王力眼神相碰的一刹那,便迸发了灵感的火光,王力是蓄谋已久,亚细亚是求贤若渴,一拍即合,在与商城之役后,王力被聘为亚细亚高级公关顾问。

AA 级绝密:升华 1990

在王力与亚细亚关系破裂、至今已有过节的情况下,回顾那场商战的情景,多少有点云遮雾罩、不得要领的感觉。在几乎所有电视和文章中,王力的名字,像一个稍纵即逝的幽灵。谈论起来,这位名满京城的公关先生,满腹都是被忽略和遗忘的失落。

他说,我必须遵循起码的职业道德,不能过早地公布恩波公关事务所与亚细亚合作的内幕。亚细亚方面也出于商业动机希望他对舆论界缄口不言,保持沉默。但是,亚细亚忽略了一个问题,公关先生王力绝不是等闲之辈,他曾经强有力地帮助过亚细亚,曾为提升亚细亚企业文化水平立过汗马功劳,怎么可能不利用亚细亚经营所取得的巨大成功势头来发展他的商业机会呢?于是便有了那封致商业部长胡平的信。

恩波公关渗透郑州,除了比任何人都敏感地闻到了大战前的火药味外,还充分地注意到了本地商业竞争的文化环境。

“你知道何谓‘商人’?”王力问我。

我说不知道。

他说“商人就是郑州人。”

他见我大吃一惊,便解释道,灭夏之商部落的人,不是“商人”。相传商人农耕养殖富裕,擅贾市,但凡有聚人聚市买卖,人们便会高呼:“商人来了!”天长日久,商人买卖便成了习俗。有记载说,商汤到商纣,君临天下六百余年,其间,商都曾六次迁移,其中第二次,“帝仲丁迁于敖”(《史记·殷本记》),“敖”便是古郑州。据史书记载,商代六次迁都,除一次去了山东曲阜,其余五次都在河南境内,沿黄河两岸摆动。也就是说,黄河水哺育了六百年商人。做为商人后裔的郑州人,血管里流着“商人”的血,是确凿无疑的。

写到这里的时候,不能不使我想到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和理解。“五四”以来,传统文化的批判主义是占了上风的,一九四九年之后,那种批判得到了国家制度和官方意识形态的认可 and 保证,并与恶劣的国际环境和激进的工业化进程相匹配,形成了西方激进的社会变革思想与苏联体制的一统天下。中国的传统在社会鼓励的道德范畴内、在教育体系中实际上被剔除出去,从此与世隔绝。八十年代中期,随着第二轮西方科学与民

主思想的引进,中国知识分子由于历史的宿怨,由于对现实的不满,在对中国传统文化所知甚少的情況下,在文化的巨大断裂带上,展开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猛烈批判,并渐在文化艺术界形成了一种时髦,也因此而英雄辈出,也因此开创了文化批判的英雄主义时代,一个以骂老祖宗为荣的时代。现实批判与传统批判与西方的思想方法奇怪地纠缠扭结在一起,组合或编织着浪漫的逻辑。一言以蔽之,亚细亚生产方式,农耕文明,小农经济,小农思想,……你一个农坯子,注定摊上个“东方专制主义”!然而,非常残酷的是,这种思维方法和批判态度,恰恰是过去几十年中占主导地位的思潮的可怕沿袭!甚至就是重复!只不过批判的对象略有更换罢了,批判的出发点略有不同罢了。我们在拣回一些东西,同时在丢失一些东西。我在朦胧中感觉到,丢失的东西比拣回的东西多得多,珍贵得多。在我们检索历史的时候,在我们面对老祖宗的巨大智慧所创造的鼎盛辉煌时,这种感觉尤其强烈。当我们看到华人在东南亚国家、在西方各个领域里、特别是工商业领域里取得巨大成功时,我们愈益发现阻碍国家现代化进程、束缚中国人聪明智慧的,不是愁思缕缕、魂牵梦绕的历史,不是一锹土一锹土培育起来的五千年中华文明!

王力对文化追根溯源,并依此制定恩波公关的发展战略,也许是不自觉的,也许没有理性的清晰线索,但是他有一点是很清楚的,中原爆发的这场商战,有其深刻的文化原因。“如果说还有原因,那就是政治文化原因。几十年来,河南人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好斗,好窝里斗。这方面,他们有长期的训练。”王力说。

“升华——1990”亚细亚发展战略,便是王力充分考虑了中原腹地经商传统、好斗特点和当时的社会氛围等诸方面情况的产物。

四年后,我拿到了一直秘而不宣的“升华——1990”执行文本。上面标注有“AA级绝密”字样,更让这个文本带上了神秘和

玄虚的色彩。

公正地说,这是一份花费了很多心血、下了一番大功夫的公关策划。或者说,是一个精致的范本。王力在文中开宗明义地指出,他的全部设计思想是,“开发创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商业文化”。

他写到:“‘升华——1990’致力成为令国人瞩目的某种商业革命。无论是中央有关机构或机构领导,还是购物顾客或新闻媒介的读者、听众、观众,都将会受其影响和感染。或表态,或参与,成为公众在特定时期议论评说的内容。力争做到商业部主要领导对此表态,中央新闻单位对此评论,公众由此对亚细亚刮目相看——亚细亚并非仅仅是商业机构!”

他写到:“‘升华——1990’是亚细亚全年高层次公关活动的一条战略主线,贯穿始终并连接还有影响的系列公关战术动作。因此,战略主线的确立必须明确,战术动作的确定必须合理,做到瞻前顾后,上下衔接,左右逢源。”

他写到:“‘升华——1990’是亚细亚在群雄鼎立之中扬长避短的最佳竞争战略,如甲乙双方配合默契,势头形成他人望尘莫及的高形势、高格局,实现这一大前提的保证是乙方主动积极配合,为甲方完成高难度动作创造、提供最佳基础环境和配合环境。”

他写到:“‘升华——1990’在酝酿和设计过程中,曾在首都反复征询了各方面权威人士的意见,他们认为这的确是一项重大突破,但必须讲究功力。”它“必须成功,因为这是亚细亚在短短一两年之内跻身中国商业诸强的唯一途径。”

语气充满自信,咄咄逼人!

为保障设计思想的实现,文本还进行了多种企业制度和企业文化设计。其中有一条颇让人费解、在当时又颇有实效的设计,就是全体职工早操后,举行“向二七纪念塔致敬”仪式。而且

还要求动作“整齐规范”态度“严肃认真”。这一招早已为女子仪仗队每天早上商场开门前的升旗仪式所取代,但是在当时特定的政治气氛下,这一招真可谓是绝招!

二七纪念塔,是五十年代为了纪念一九二三年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死难烈士而修建的。长期以来,二七塔就是郑州城象征,彪炳着郑州的光荣革命传统。这个矗立于市中心二七广场上的建筑物,久而久之,便成党政机关教育青年、父母教育后代毋忘革命传统、毋忘光荣历史的图腾。八十年代中后期,城市规划部门作出决定:二七塔周围的建筑物,都不能超过二七塔的高度!所以,你今天去二七广场,能看到一个奇特的景观:所有在二七塔旁建的大商场、大酒店都没有二七塔高,而且建筑上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前低后高,呈梯形结构,好似对二七塔的谦恭、忍让和尊敬。

在熙熙攘攘皆为利来的人群中,在道德沦丧、充满了诱惑的商业闹市里,夕阳晚照,天边一抹猩红,二七塔孑然一身,傲慢而孤独。

王力早就发现了这座六棱塔在郑州的某些独特性质和意义。他在二七广场悉心考察时,仰望着二七塔,微微一笑。此时,他已断定,二七塔注定要为亚细亚的崛起扮演特殊角色,注定要为亚细亚在政治上赢得关键的一分。因为亚细亚从诞生那天起,就被视为歪门邪道的异己力量。她的体制,她超出常规的竞争活力,都为“主渠道”所不齿。特别是王遂舟严格的管理、严厉的纪律,被视作“搞资本主义”,“用资本家的方法整职工”。向二七塔致敬,无异于向政府说明,亚细亚十分重视思想教育,十分注意用讲传统的方法开展生动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后来在向二七塔致敬的基础上,又主动终生赡养二七老工人,以树立良好的社会道德形象。

各路竞争的诸侯是怎样看亚细亚的这番举动呢?典型的说

法是：“他们把二七塔都占了，我们还能和他们竞争个球！”他们认为，亚细亚向二七塔每天的致敬仪式，无异于把持了天子级祭祀礼，抢占正统，别人自然等而下之，自叹弗如了！

当然，在充分挖掘和利用了二七塔的政治影响和由此而带来的商业潜力后，随着外部政治环境的改善，“向二七塔致敬”便被每早开门前的仪仗队升旗和表演的仪式所取代了。因为那种过于功利主义的“传统教育”，为形势所迫，偶尔为之倒也罢了，长此以往，假戏真做，那可真有点滑稽了。聪明的亚细亚人见好就收，他们受启发于北京天安门每天的升旗仪式，及时打进北京，与国旗班搞“军民共建”，让亚细亚娘子军到北京接受中国军队一流的队列正规训练。

从此，二七广场又多了一个景观，郑州城又多了一个景观。无论是朝霞满天还是刮风下雨下雪，我们可以看到，各大商场开店前人迹寥寥，唯有亚细亚门前人流如潮，水泄不通。其中有许多人专门从外地赶来郑州看这场只有十几分钟的升旗仪式。

五星红旗和印有亚细亚红太阳徽记的旗帜在音乐声中升起来了！“敬礼——”十二名仪仗队青春灿烂的少女“唰——”，非常整齐和干净利落地行礼，——娇小秀美中透出一股蓬勃向上的魅力。那敬礼动作，即使在职业军人眼里也无可挑剔。

在一位娇小女子清脆而斩钉截铁的口令下，这支平均年龄只有十九岁的仪仗队开始操练。

这时，扩音器响了：

“看，她们来了。她们迈着展现军人风采的三种步伐，整齐划一，威武雄壮。下面，您将看到的是花样变化的队形，亚细亚英文字母组合的‘ASIA’尽在其中。第一个字母是‘A’，大家看到的是第二个字母‘S’，第三个字母‘I’，最后一个字母是‘A’。现在，展现在您眼前的是太阳队形，太阳队形的寓意是以‘ASIA’为中心的野太阳，立足中原，辐射中国。现在大家看到的是三人

作业表演,英姿飒爽,朝气蓬勃,向我们绚丽的事业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这种每天坚持的仪式,实际上已经把那种政治需要的传统教育转变和升华为扎扎实实的团队精神培育上去了。

这其中能看到亚细亚一条清晰的企业文化的理性发展脉络。

公正地说,王力“升华——1990”亚细亚社会公关形象的设计,从思想到操作都是一流的,而且在当时十分压抑的环境下,具有很强的实用性。王力作为方案的设计者,当然明白他参与中原商战的意义,当然明白这个筹码有多大。他在与亚细亚的合作终结时,致函王遂舟,说:“深谢阁下提供容此间表现的机会。”他不会放过任何一个重大的商业机会,不会放过任何一个表现和宣传恩波公关的机会。这就产生了一个矛盾,有人认为,作为一家企业策划于密室的高级公关顾问,应该是隐姓埋名的,而且服务和被服务的关系非常清楚。可是王力喜“讲学”,好侃山。搞公关策划,提高知名度和商业信用,隐姓埋名,甘于寂寞,当无名英雄,显然又不可能。公关这种现代社会的职业,本来就是为别人策划的同时也为自己策划的职业。这个矛盾,最终使恩波公关与亚细亚的合作只维持了一年半不到,便分道扬镳了。而且一年半时间里,已有齟齬,根儿在一九九一年三月王力在市政府组织的演讲会上。在这次演讲会上,王力强调说,恩波是在亚细亚已经做得相当出色、已有相当社会知名度的情况下介入的。即使如此,这场有市领导和许多大企业领导人参加的演讲会,王力仍有“喧宾夺主”之嫌,弄出不大不小的不愉快。王力颇有些委屈地说:“这堂课实际上让亚细亚非常风光。”为了更有力地证明这一点,他专门把现场录音带托人带到郑州,转交王遂舟。当然,借着亚细亚名声鼎沸的势头,这堂课也让他王力满面生光。以往都说王遂舟背后有“高人”。猜测在郑州城里满天

飞,如今摇鹅毛扇的到前台亮相来了。原来向亚细亚一头沉的天平,自然向恩波公关倾斜了些。这无论如何有点不习惯。而且恩波向社会公布它在亚细亚商场和中原商战中的角色,似乎也太急了。这么一弄,神秘感就完全打破了。可能王遂舟有这样的考虑,亚细亚在羽毛尚未丰满的时候,由神秘光环到理性光环,必须有一段路程要走,至于到什么时候走完,什么时候才能使亚细亚真正健全起来,还不好说。但是可以肯定地说,现在还不健全,路程现在还没有走完。所以王遂舟恼火。再说了,有多少弟兄和商场职工跟着他王遂舟打天下,为在二七广场立起亚细亚这座坚不可摧的大厦,付出了多少血汗,你王力凭着三寸不烂之舌,在市领导面前谈笑间便将全部荣耀归你了?!关键是有可能会在社会上引起错觉,看轻了亚细亚这拨人。

看来,恩波和亚细亚“清盘”是不可避免的了。

一九九二年春节刚过,王力如约来到郑州,就与亚细亚结束合作问题,与王遂舟进行最后一次会谈。

这天午饭后,在七楼王遂舟办公室里,王遂舟、王力这两个经常给沉闷的生活增添点新花样新刺激、经常搅得周围世界不得安宁的枭雄,重又聚首。

这是两个性格差异很大的人。

王遂舟是“老商业”的后代,血管中流着商人的血,插队、当兵、复员回商业部门,粗犷和敢想敢干中不失沉稳和精明。

王力长王遂舟六岁,乃国民党将门之子,有着职业军人的严格家教。“文革”中,侥幸留京城安排工作,干清洁工,一干就是七八年,专门负责军博、木樨地一带的垃圾清扫。特殊的家庭背景和长期的社会底层生活,让他深知世态炎凉。所以,他的严肃中,总感觉有几分算计和调侃,即使三杯酒下肚,嘴上没了遮拦,仍然能感觉到他内心清醒的控制和把握。

这是两个文化背景和人生经验完全不同的人的合作。他们

曾为亚细亚的事业而互相仰慕和尊敬,曾为亚细亚的成功而欢欣鼓舞。他们曾在一起讨论亚细亚如何在竞争中求生存求发展,曾在一起构想着亚细亚光辉灿烂的未来。一边是求贤若渴,一边是姜太公钓鱼,互相都紧紧地抓住了机会。他们的谈话曾是那么的投机,就在这间办公室里,就坐在这些沙发上;可如今,两个人坐在一起,突然觉得无话可谈了,觉得平常非常了解的人猛然间变得如此陌生,如此隔阂并充满着误解。认真想起来,二王似乎不应该对此负责。陌生、隔阂和误解,何尝不是所有人与人关系中悲剧的所在呢?

原先融洽和愉快的空间,现在却让人尴尬,让人坐立不安。一九九一年三月三日中午,大家既害怕又期待着这次“为了告别的聚会”。

在简单的客套后,王力说:“当初恩波公关制定的以商业文化为目标,在较短的时间里,让亚细亚成为全国知名的新星,经过一年半的努力,承诺已基本兑现。对此,大家有目共睹。我本人能有个机会与您及亚细亚有这次合作,深感荣幸。”

彬彬有礼的话语里显然包含着某种压力和暗示:我的活干得非常漂亮,下一步就要看你的表现了。

王遂舟从容地说:“没问题。”

这时候,王力从包中拿出一张复印件,递给王遂舟,说:“我明人不做暗事,商业大厦准备聘请我去当顾问,这是我们的协议委托书。我想征求您的意见。”

商业大厦是郑州国营主渠道的老大,实力雄厚,时刻都在西郊觊觎着二七广场。而且神不知鬼不觉地挖走了亚细亚的高级公关顾问!

这着实让王遂舟大吃一惊。亚细亚这点底儿,王力可以说了如指掌。如果他一到“敌方”阵营,亚细亚便没有商业秘密可言了!王遂舟眼睛看着委托书,脑子里却在飞速地旋转着。

“当然,我如果去商业大厦,您放心,我绝不会做伤害亚细亚利益的任何事情!”

“……”王遂舟根本没想到王力在临离开的时候来了这么一手。他是什么意思?是从纯商业利益考虑的偶尔为之呢,还是蓄谋已久!是表示与亚细亚合作的不满意呢,还是某种心态的恶作剧?可他是中国最好的公关顾问,一个成熟的中年人。他在解除了与亚细亚的合作关系后,完全是自由的,完全可以不打任何招呼就去对方阵营里服务。征求意见?征求什么意见?我说行?我说不行?他真去了商业大厦,将会给亚细亚的商业竞争带来什么后果?社会舆论将会对此事有怎样的印象?他知道,王力虽然致力于企业文化的建设,能言善辩,但却是个相当务实的人。在结束这次谈话后下楼的路上,王遂舟半真半假地拍着王力的肩膀调说:“老兄,合作不合作,咱们以后还是朋友。朋友嘛,不要总是说钱嘛。”敏感的王力也调侃地说:“遂舟,我可以像您一样讲精神文明。北京还有您老嫂子和大侄子呢,他们要张嘴吃饭,他们还要物质文明呢!”此行的目的之一王力可忘不了,就是来亚细亚催约定的顾问费用。

王遂舟不能再往下送了,商业大厦接王力的车在大门外等着呢!王力这张牌打得太逼近了。“挖墙角”到了兵临城下的份上!大家都把事情做得赤裸裸没有余地。“我与另外的大商场关系都不错,遂舟,您是否想把关系缓和一下?”王力问。“嗨,这么打来打去,到底都为了个啥!拜托了。”王遂舟表现出了豁达的态度。可是今天这种戏剧性地结束合作关系的场面,又不免令人黯然神伤。

王力离开亚细亚,即将服务于商业大厦,真是有万般的感慨和惆怅。中原商战,亚细亚完全是孤军作战,东拼西杀,终于在二七广场争得一席之地,王遂舟也从来没有轻松过,几乎每周都去各大商场悄悄地遛一圈,亲自看看对手们都在干什么,都有什

么变化。所谓“知己知彼”。说起来,也是够累的。王遂舟更是清楚,他若稍有懈怠,便可能被国营主渠道撕碎吃喽!“升华——1990”策划实施不到半年,实际上针对亚细亚挑战的郑州国营五大商场的总经理联谊会开张了。郑州商界的五巨头丁福森(郑州百货大楼总经理)、刘家万(紫荆山百货大楼总经理)、张淑云(华联商厦总经理)、王振华(商业大厦总经理)、李自强(商城大厦总经理)在政府有关主管部门的支持下,联名签署了《郑州市大型国营商业零售业总经理联谊会致各友好单位的函》,函中,他们不点名地指责亚细亚“违反商业道德,扰乱市场秩序,损害商业信誉,在经营中搞不正之风,造成不良影响。五家企业总经理决定,各成员单位不与这样的单位发生业务往来,不联合举办业务活动,不联合刊登广告。”他们还在函中警告说,“希望各供货单位在与这五家企业开展业务活动往来时,不要同社会中上述所指的单位发生业务联系。否则五家企业可能采取统一行动。这将会影响我们之间的正常业务往来……”

国营五大商场总经理联谊会还商定,定期举行价格协调会,每五天用电话互相通报销售额。这是彻头彻尾的行业垄断,标标准准的不正当竞争!要把亚细亚扼杀在稚嫩中。行文中充斥着要挟和恐吓的语气,开创了中国市场经济探索中一个非常恶劣的先例。可能至今这五位老总和他们当时的上级主管部门都没有意识到后果的严重。

山雨欲来风满楼。王遂舟正承受着前所未有的压力。

国营五巨头结盟

“国营五大商场总经理联谊会”可是个讳莫如深的话题。谁

都承认存在,谁都不愿提及。王振华说:“联谊会谁也不针对。别说这些,说这些没意思,应该往前看。我最反对别人对这些事情刨根问底。”商业大厦一九九零年五月四日也“根据郑州市五家大型国营商业零售业总经理联谊会第二次会议的精神”,命令所属各商场和批发公司,五天之内清理所有广告,若有与亚细亚商场同版或同时播出的广告,一律撤回。如果五月二十日,所属各商场、广告科及关系厂家“仍有同亚细亚商场同时登播者,要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商业大厦对联谊会精神贯彻得最迅速、最有力、最彻底,并开了公开点名的先例。张淑云对此则说:“这事儿没有外面传得那么邪乎。我们和亚细亚关系挺好的。”虽然华联商厦与张淑云同层办公楼里,至今还养着五大商场总经理联谊会办公室的一名专职人员。

这事儿,追根溯源,与郑州市一商局长王华然有关。王华然是个精力充沛而且直率坦荡的人。他毫不遮掩地对我说:“五大商场总经理联谊会实际上是我牵头搞的。成立初期,实事求是地说,是针对亚细亚的。”在商业大厦召开第一次会议时,他本人也出席并主持了会议。他在会上说:“我们国营主渠道面对亚细亚的竞争,目前是一盘散沙。所以有同志建议成立五大商场总经理联谊会,互相交流信息,我同意这种意见。”这也符合情理,五大国营商场,除商城属于省供销社外,其余四家都属于市一商局,在他王华然麾下,由于有人告状,省里专门派人追查联谊会的幕后操纵者而一无所获。这在郑州一直是个谜。

王华然在郑州可是个大忙人,好不容易在紫荆山百货大楼的会议室堵住他。关于郑州的商业竞争和商业繁荣,他有一肚子故事,是最知道内情的人,也应该是个有功之臣。

今年是他的本命年,整四十八岁。一九八五年六月他由市委秘书科长就任市一商局长时,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你知道郑州原来的老底子吗?”王华然说:“刚解放时,郑州

叫郑县,只有五点六平方公里的面积,在我的印象里,只有一条路上有灯,也只有六盏灯。”郑州虽然地处中原交通枢纽,但是几十年了,几乎就是个一成不变的城市。除二七纪念塔和花园口路的法国梧桐,还能给我们留下什么记忆呢?七十年代中期,我曾来到二七广场新华书店,一楼的书架上几乎全部都是浩然的《艳阳天》和《金光大道》。可王华然来当一商局长时,既没有艳阳天,更没有金光大道。一九八四年底,郑州火车站三公里范围内的老城改造,一商局系统就拆掉十八个商业网点,拆迁面积二万多平方米,二千多人因此而失业。他来走马上任,送给他两个礼物,一是失业职工向他要饭吃,一是这些职工向市里请愿告状。这些事情非常棘手和敏感,处理不好后患无穷。通常情况是拆东墙补西墙,硬往那些本来就人浮于事、疲惫不堪的企业里塞,让谁都看不到希望。是恢复原状,小敲小打呢,还是抓住旧城改造的机会,勇于开拓进取,让郑州商业发展到一个崭新的境界。王华然作为国营商业主渠道的头儿,在商业局党委会上分析说:“如果说国营商店光拆不建,至少有四个问题:一是这次旧城改造的政策是,拆走的人员都由本单位安置,失业的职工得不到安置。二是每年省市下达的任务无法完成。他们才不会考虑网点拆了减任务,而且任务还有可能每年递增。三是原网点都临街,不建居民购物不方便。四是最重要的。现在都说要发挥国营主渠道的作用,没有阵地,这种作用无从谈起。”并确定了新网点的重建格局:规模大、档次高、设计新、装修豪华。这将意味着,郑州国营商业将用五年的时间改造扩建网点十八个,总建筑面积十九万平方米,新增营业面积五万八千平方米。而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九零年,四十一年时间里,郑州一商局系统一共才有营业面积十一万平方米!而且所需二点二亿投资,国家不会拿一分钱,完全要靠企业自筹。建与不建肯定没有争论,要害是建如此大的规模,如此高档和豪华,消费是否过于超前,郑州这

样的中等城市是否有与之相适应的消费能力。根据以往的经验,郑州作为一个经济不太发达的内陆城市,居民购买力是相当有限的,消费水平也偏低,不可能一夜之间出现奇迹。再者,改扩建好几亿元资金从哪里来?

好心人劝王华然,“华然呵,别冒这风险!”

也有人挖苦他:“前几任市长都干不成,就你一商局长比别人尿得高?”

王华然对我说:“我这一辈子,认准的事,没有干不成的!”

十八个改扩建网点,有两个重点工程,一是西郊“全国一流,河南最大”的商业大厦,一是在商战台风中心二七广场的华联商厦。一商局副局长王振华被派到了商业大厦筹建,并兼任总经理;王华然则带着一个工作组进驻华联,亲自督阵,从开工到建成,一刻也不放松。据说,从屋顶、室内装修到外墙,处处都体现着王华然的设计思想。

“你为什么在华联投入那么大的精力?”我问。

“华联代表着国营商业的水平,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他说。

大厦外玻璃幕墙设计,有人提意见:“这玻璃墙太贵了!要二百五十万哪!”

三百五十万也建!王华然坚持原设计,不准有任何更改。

正是华联商厦正面这天蓝色玻璃幕墙,让她的邻居王遂舟称羡不已,心惊肉跳。真是太漂亮了。这幕墙,像是一幅巨制的宽银幕,灿烂的阳光,轻盈的白云,四时变化,悲欢离合,都展现得淋漓尽致。

如果说商业大厦是“全国一流,河南最大”,那么华联商厦一定是栖落在梧桐树上的金凤凰,东西呼应,珠联璧合,堪称国营商业的骄傲。

在王华然眼里,华联和商业是两个定要与亚细亚决一雌雄的宏篇巨制,当然不敢掉以轻心,在设计和施工中,事无巨细,都

在他的把握之中。有人戏谑地说：“华联是王华然的大儿子。”华联开业前，他探听到亚细亚制定了相应的对策，这使他联想到商城和商业开业时，被亚细亚搅得鸡飞狗跳的情景。他拿出了“护犊子”的劲头大吼：“张淑云，你华联去找公安局，去找高压水龙头，见亚细亚的人来捣乱，用水龙头滋出去！”气得嘴唇直发抖，仿佛事情已经发生了似的。

华联是最后一个加入郑州这场“特洛伊战争”的。为了体现国营主渠道的骄傲和尊严，他们在华联大厦的最顶端竖起了两个巨大的红字：“国营”。到了傍晚，华灯初放，“国营”像两个红色巨人，傲然挺立在二七广场的最高处，方圆数里都能看见它们在寒风酷暑中熠熠生辉，威武雄壮。

华联每进展一步、每一个细微的变化，都印在了邻居王遂舟的高倍望远镜里。华联楼顶上竖起了巨大的“国营”，确实令人惊骇。在一九九零年夏天，在那种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的政治氛围中，华联强调“国营”，无疑是对亚细亚这种“四不像”体制强有力的示威，无疑在向全社会暗示亚细亚的歪门邪道和唯利是图、损人利己。与之相比较，“国营”将意味着公有制的正宗、公正公平、为人民服务、遵守商业道德、很高的商业信用。也就是说，华联的设计，挖空心思地想证明竞争双方的制度不同，一优一劣，以唤起公众社会对亚细亚的不屑和鄙视，或者表明“国营”对亚细亚体制的不屑和鄙视。

王遂舟真正感到了压力和威胁。

华联开业前的一天傍晚，亚细亚商场的老板——河南省中原不动产总公司董事长曹殿宣来到王遂舟办公室。

“遂舟，在干啥哩？”曹殿宣见王遂舟拿着望远镜，便问道。

“老板，你看——”王指着华联头上顶着的那两个光芒万丈的红字，不无忧虑地说。

“你是说那两个红字？”曹殿宣微笑着问。

“嗯。”

“你不觉得这两个红字有一个很大的缺陷吗？”

“什么缺陷？”

“国营体制中的所有缺陷，它都有。”

曹殿宣在郑州也是个非同小可的人物。算起来，他应该大王遂舟一辈。他是个粗犷豪爽的汉子，枣红的脸，扎茬的络腮胡总是泛着青光，说话，嗓音洪亮，眼神里透出多少世事沧桑来。他是脚踏两只船。一只船是体制内的省乡镇企业局，一只船是体制外的中原不动产总公司。他既是省乡镇企业局工业供销公司的总经理，又是河南中原不动产总公司的董事长。他吃了几十年体制饭，深知国营企业许多弊端。

著名经济学家肖灼基曾说过：中原商战的实质是两种体制之战。

实际上二七广场这个大角斗场不只有两种体制，除了亚细亚和华联外，还有集体所有制的商城和以个体经营为主的人民商场（改扩建后称“天然商场”）。商城与华联等四家国营商场结盟，人民商场根本没有能力参加这场大厮杀，所以最终仍然是股份制的亚细亚与国营主渠道之争。

那么，国营体制的缺陷何在呢？

要想见商业大厦总经理兼市商业局副局长王振华，是件十分困难的事情。他之于商业大厦，相似于王华然之于华商联厦，被称作“商业大厦的总设计师”。他与王华然不同的是，他一到位就兼任了这家投资六千三百五十万的大厦的总经理，年长王华然五岁。

商业大厦堪称河南商界的航空母舰。一九九二年销售额三点二亿，居全省第一（注：亚细亚不服气，认为这三点二亿是算帐算出来的，目的在于压亚细亚一头，让亚细亚屈居第二），利税二千万。

大厦办公室主任兼公关部经理邹茂忠介绍大厦基本情况时,是主要围绕着王振华介绍的。而且这种介绍像是被编进了计算机程序,有一种对谁都如此的千篇一律的感觉。

他说:“总经理王振华是郑州市商业局副局长,大厦党委书记兼总经理。副地(师)级待遇。工资是进档的(注:不太明白‘进档’是什么意思,享受何种政治待遇)。原商业部规定,销售额达到二亿元以上的商业企业,可定为地(师)级,而不论场地多大,人员多少。(注:按这种标准,亚细亚也早就过了二亿,王遂舟那么也应该是地(师)级干部喽?)所以有时我们能开的会,商业局都不参加。我们的干部属市委组织部管,级别比商业局高。王振华一九六二年毕业于河南大学经济系,当了十多年教师,后任市劳动技校校长,一九八五年任市一商局副局长。他有三个特点:第一,有工作能力,事业心强。从建大楼到现在,没有过过一个清静的星期天。上班最早,下班最晚。第二,深入实际,每周都有一天总经理接待顾客日。第三,正统,正直。他一直在局里领工资,到现在没拿一分钱商业大厦奖金,只拿局里每月三十元的平均奖。我给市委组织部打了个报告,提出工资可以在局里领,奖金和津贴在大厦领,他也没同意。而且他还比较廉洁,当总经理,只租了一间半房子住。”

王振华太忙,按约定时间让我多等了三个小时。他进来见我时,满口道歉:“对不起,让你久等了。”他戴着顶瓜棱短舌呢帽,一件样式陈旧的黑呢短外套,走路躬着腰,如果再让他夹上书本和教杆,便是个标准的老教师模样了。他的脸上没有血色,略浮肿,透出某种不可排遣的疲惫和晦气。

这里顺便说一下,王力的恩波公关事务所与商业大厦的合作消息,在郑州被炒得沸沸扬扬,然而,他们并没有合作成功。王力解释的理由有三条:一是“业务委托书”的条件苛刻,他作为王振华的“公关事务顾问”,收费偏低而义务和责任又偏多。特

别是公关的具体目标第四条,“使商业大厦的经济效益在去年的基础上有大幅度地提高。销售额超过二点五亿元,利润超过一千万”。王力非常刻薄地对商业大厦说:“我把这些事儿都干完了,你们大厦二千多号人都去干什么呢?”二是商业大厦毕竟是他先前服务的亚细亚商场的竞争对手,这种作法,有意无意会对亚细亚构成伤害,扩大双方裂痕。三是商业大厦人事关系复杂,远不如亚细亚那么单纯。

解剖体制,人事制度是要害。

我拿着商业大厦印刷精美的折叠简介读起来。王振华之下,还有五位副总经理,两位党委副书记。与之相媲美,只有一千二百人的商城大厦李自强的麾下,有副总经理十名、总经理助理二名。非常有意思的是,这两位在郑州叱咤风云且闻名全国的总经理,对他们的所有副手都没有任免权,权力都在上级主管部门和市委组织部。说到这酸软处,王振华只是苦笑。从安排的时间看,他想礼节性地说点套话打发了我。可一说到这种状况,他有一肚苦水要往外倒。他说:“我这里的干部,正副职的任命都在市委组织部,我没有任命权。我意见很多,但是没有办法。现在说起来,要向企业放权,实际上是组织部门在收权。要放权首先是你组织部门先放权。我们班子八个人,原一商局系统的五人,其中两个是原紫荆山百货大楼的总经理和书记,紫荆山出事后,双双调入商业大厦。可他们原来就有矛盾,一个矛,一个盾,一块调进来,结果是调来一对矛盾。八人中,外系统的三人,都与市委书记市长关系不错,硬塞了进来。开会可热闹了,互相争执得很厉害,你说一句,我顶一句。两个人在一个办公室办公,互相见面黑着脸,不说话。这都是什么事儿!这哪叫办企业!这是在办收容所!”王振华最怵的就是开会。

李自强怎么对付他同样没有任免权的十个副手呢?平时温和的李自强,这时节却老谋深算。他的办法是扩大部门经理的

权力,并直接向总经理负责。采取的是虚设和架空的办法。

安顿好这些副总们,李自强心里颇坦然。有人郑重地向李自强提出:“李兄,你的弟兄(指各位副总)可以组成一个加强班了。”

“人多好办事。”李强一副天地宽阔的样子。

“那也太多了。”

“不多不多。”李自强非常诚恳地说。

李自强这种化腐朽为神奇的仙风道骨,搞得还想继续进言的人哭笑不得。

“我也想采取李自强的办法,可又搞不成。”王振华对我说,“商城的人通天,本事比我大,我本来是教书的,不愿意经常找领导。逢年过节,我只去职工家,不去领导家拜年。我的副手们可都是通天人物啊。”

他怕进市委大院,怕迈组织部的门坎,,可这天他又被召到了组织部。他忐忑不安,商业大厦七人领导班子不管怎么别扭,但在已经考察配备完毕,组织部莫非又有新的方案和人选塞给他?他像耶稣,明知道这是“最后的晚餐”,也要硬着头皮受折磨,当然是心灵的折磨。“王局长,再给你商业大厦派个人。今天请你来征求一下意见。”组织部说。

“原来的班子不是已经配齐了吗?”

“这事儿,我们跟你们局长说了。局长同意了。”组织部一副没商量的口气。

“局长都同意了,咱副局长还咋说?!”这不是睁眼被人家捏着鼻子往套里塞吗?王振华有些恼了。

“现在咱们来商量商量咋安排。”组织部又很和蔼地说。

这位要塞进商业大厦的干部,是某厂副厅级党委书记,改选掉后,由组织部安排工作。咋安排?

“工会主席还空着。当工会主席算了。”

王振华以为,他的大度,足以表示对组织上难处的体谅了。

可人家并不体谅他的诚恳和企业的难处。

“那不中!当工会主席不中!”组织部立即否决,“市领导已经定了,让他到商业大厦当副书记。”

这可把王振华真惹恼了。“你们今天叫我来到底干啥?不是拿我开玩笑吗?是征求我的意见吗?第一,安排人征求我的意见,说是局长已经同意了!第二,咋安排征求我的意见,你们又说市领导已经定了。你们都定好了,后面都嘀咕完了,那还来找我干嘛!这不是脱裤子放屁嘛!你们完全可以直接宣布,由我执行,省得我这么空跑一趟!”

“我们尊重你。”组织部门说。

“尊重……”王振华一时语噎,内心涌出无限的悲哀。组织部安排干部不安排干部,有什么根据,凭什么标准?在市场竞争条件下,谁最了解企业干部的要求状况?谁最了解什么样的人才能胜任企业领导?社会上流行了好几年的一副对联,是专给组织部门的:

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

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

企业要有级别吗?企业家要输人官本位评价体系吗?这便是代价!你这个企业级别,特别是高级别,人家削尖脑袋想钻进来,拉关系,托门子,找路子,目的当然只有一个,继续当官。当官,当然就是要排座次,商城的办公室主任说,每次文件,十一位老总的先后秩序是千万不能搞错的,否则后果严重,不仅要向办公室兴师问罪,还要上访告状,平反昭雪。商业大厦重组班子,要重用一位副总经理,上报组织部的名单,他排在第一位,可是组织部批下来时,来了个本末倒置,第一名被放到了最后一名。组织有组织的考虑嘛。光是协调班子这拨人,非拿出百分之五十的精力来!

考察体制,除了人事外,还有奖惩和分配权值得关注。

关于奖惩,讲一个特别突出的例子,这是商城大厦人人都知道的故事。李自强在自己管的商城买牙膏,“小姐,请拿管牙膏。”

“……”没人答应。

“小姐,我要买牙膏。”李自强提高了声调。一个姑娘慢腾腾地走过来,取出一管牙膏扔出去。

平时绝不摆总经理架子的李自强,这时也忍不住冒出一句话来:“你知道我是谁?”

姑娘眼也没抬地说:“你不就是李自强吗?”

一时弄得李自强十分尴尬。这也是国营主渠道体制的尴尬。他当总经理,根本没有相应的权利!职工敢于毫无道理地顶撞他,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体制在理论上保护这种无理的做法。

商城办公室副主任谢钢林十分坦率地说:“我们很欣赏王遂舟,也很羡慕王遂舟,可以放开手脚,进行一些大胆的试验,就是杀头坐牢也痛快!”

这实际上是郑州商界国营主渠道的普遍心态。

应该说,王华然评价郑州国营商业主渠道的成就并不为过:“在别的地方国营商业几乎被冲垮的情况下,郑州的国营商业仍占据着主导地位,而且蒸蒸日上。”一九九一年国营主渠道五大商场销售额七亿多元,一九九二年达到八点四九亿元,比十年前增加了三十六点五倍!郑州商业的辐射范围由过去的六县八市,增加到了全国三百五十个县市。这种情况在内陆省市是绝无仅有的!同时也证明了内陆经济不发达地区惊人的购买力和市场发展潜力。唯有竞争才能繁荣。

然而,谁都清楚,国营主渠道的五个大商场,是五个戴着脚镣跳舞的巨人。他们只是在有限的空间里歌着舞着,达到目前

的水平,已经是超常发挥了。如果我们形象地描述这场中原商战,有点像孙悟空大闹天宫。孙悟空生性自然,无拘无束,天老大,他老二,随心所欲,七十二变,让那些一招一式对阵的天兵天将懵头转向,无所适从。亚细亚就像孙悟空,人员构成年轻,没有旧体制的包袱和约束,王遂舟本人在企业拥有至高无上的人权和财权,旧体制内所有复杂的问题,在他这里都很简单。一支身心舒展自由的军团与一支背着包袱、戴着脚镣的军团打仗,无论后者如何强大,声势如何显赫,还没有交手,后者败局已定。所以,王华然跟一位省里的负责人说:“你给我亚细亚这样的机制,我会搞得更好!”对于这一点,任何人都不会有怀疑。但是,在王华然的撮合下、多位主渠道老总积极响应而掀起来的联谊会,是否能遏制亚细亚,形成垄断的局面,却令人怀疑。虽然,他们联合给各关系单位和下属部门下通知,在《郑州晚报》联合刊登广告,联合举行经销活动,向社会公开与亚细亚竞争的联合阵线,虽然他们都是全国一流的大商场,都属出类拔萃之辈,但是他们却无法克服制度的深刻矛盾;更重要的是,五大商场总经理,除了张淑云四十四岁外,其他四人都已是五六十岁的人了,而王遂舟只有三十六岁。年龄不饶人,什么都可以较量,年龄却不可能较量,精力、魄力都日渐衰微。一场老年人与青年人的战争,结果可想而知。即使现在不用去采访商战内幕,只需到各大商场走一遭,无论是服务质量,还是经营管理,亚细亚明显技高一筹。亚细亚打破垄断、在所必然。渐渐地,国营五大商场总经理联谊会已形同虚设,名存实亡。

“这个时候炫耀‘国营’能说明什么问题呢?”曹殿宣说。

王遂舟会意地笑了。

在人们的心目中,“国营”几乎就是高成本、低效率、服务质量差和冷面杀手的同义语。国营商业曾经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一统天下,可是服务质量和商业信用却日薄西山。有经验的购物

者,光凭服务员的脸色就能判断出商店或商场的所有制性质。把“国营”当作一个特点、一种优势来宣传、张扬,甚至贵族化正统化道德化地炫耀,来为她竞争中的分量增加筹码,实在不是聪明之举。特别是服务质量,实在不是“一团火精神”和“雷锋精神”所能解决的,不是“主人翁精神”所能自觉的。服务质量是制度的产物,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新道德的产物。对手真正地犯了一个错误,这个错误比他们的许多技术性错误大得多。这个错误是观念上的,把市场竞争的本质和目标完全搞颠倒了!现在的消费者,绝不会在乎你是否国营。既然不在乎,强调又有何意义呢?如果说有意义,也只局限于政治和意识形态。可是作为企业家应该明白,政治和意识形态,就像天上飘忽不定的云,此一时,彼一时,压根儿就没有永恒的价值。企业在这方面作文章,可能会得不偿失,误入歧途。

一九九零年的秋夜,秋风瑟瑟,多有凄惶。“国营”两个大红字,像是挂在漆黑的夜空中没有着落的星辰,在那高处,不胜寒怆。

“这才叫做知己知彼呵!”曹殿宣与王遂舟握手而别。严格地说,说这句话,董事长本人都未必有把握,因为正在进行的河南省中原不动产总公司股份制改造,好像被一只无形的手操纵着,陷入了泥潭,形势的严峻,不亚于被国营主渠道紧逼着的亚细亚。

“总公司改造的情况怎样了?”王遂舟问。

“咱们都好自为之吧。”曹殿宣话中有话,多有感慨。

夺 权

曹殿宣这一感慨,在一九九二年四月的一天晚上,把我投进了郑州亚细亚宾馆 414 房间。里面已经坐满了人,但是刚进去不适应,看不清谁是谁。厚重的窗帘紧拉着,屋里烟雾在大套间里东奔西突,烦躁不安。他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每天都到这儿来,午夜或者凌晨才离去。心情沉重地来了,心情沉重地离去。他们每天都希望着能从这儿得到一点好消息,可是形势越来越恶化,每天都让他们失望,天天熬夜,所有的人脸都浮肿着,没有血色。他们已经厌烦了这种毫无生机的重复,可又无可奈何。但是他们必须来,必须来这儿通报情况,把握事态发展。屋里的气氛紧张,沉闷,压抑。

“省政府文件不可能撤,中原不动产必须解体!”

“省体改委在一份纪要上说,就是要进行必要的行政干预!”

“省体改委工作组要强行接管中原不动产!”

“省体改委已到省工商局注销了中原不动产总公司!”省政府大院里传出来的消息越来越让人撮火。从法理上讲,从注销之日起,任何以中原不动产的名义所进行的商务活动,都可视为非法。

“他们怎么能这么干!”曹殿宣大怒,“注销一家四五千万元资产的大公司,不通知法人代表!就跟打水漂一样容易!天底下哪有这样的道理!”

“夺权”这两个字,写出来已是非常陌生了。可在一九八九年后两年多的“回潮”时间里,这类似曾相识又有些陌生的东西颇有市场。几乎与中原商战同时进行的,还有一场亚细亚商场

的老板与庞大的行政体系夺权与反夺权的大战,风起云涌,惊心动魄。

这场夺权与反夺权的大战,也在河南乃至全国引起了很大的震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这场大战与中原商战在政治文化上的某种背景联系,被大多数人忽略了,或者说这个商战故事中的故事被忽略了。

我了解中原商战内幕,了解亚细亚商场的真实面貌,追踪中国商业文明的脉络,恰恰是从这场夺权大战开始的。

“这位是北京来的卢跃刚。”我被介绍给这帮神情沮丧的人,这帮企图挽狂澜于既倒的人。他们似乎已经习惯于某个陌生人突然地加入他们的行列。我看到里面圆桌右侧有个空座位,想必是留给陌生人的。我坐下,听他们对局势和前途的判断分析,“他们如果不给任何余地怎么办?”有人忧虑地问。

“我们就让亚细亚商场罢市,以示抗议!”有人建议。

我为之一震。亚细亚若以罢市的形式参与这场厮杀,这将意味着矛盾的最终激化和公开化,意味着“中原商战”的真正结束,意味着郑州商业竞争以及所带来的商业繁荣的崩溃!那样的局面真是不敢设想。这时我突然注意到,既是亚细亚商场总经理,又是河南中原不动产总公司副总经理的王遂舟没有到场。亚细亚在这个问题上持何种立场呢?王遂舟在郑州在河南是举足轻重的人物,他的意见太重要了!而且,想吞掉中原不动产的省体改委,对待亚细亚商场却是非常慎重的。他们曾明确地告诉王遂舟,关于中原不动产归属之争与亚细亚无关,希望他不要介入。不管主渠道商业对亚细亚至今抱有什么看法和成见,亚细亚是郑州的骄傲,这是公认的。亚细亚给郑州给河南乃至给中国带来了什么,任何人只要不带偏见,都应该有清醒的评价。在荷兰流传着一个寓言般的故事:渔夫们在鱼汛的时候,经常打回满舱的银鱼。可银鱼过于娇贵,上岸后都活不了而价钱大减。

奇怪的是,同一拨扬帆出海,同样的时候回家,一个老渔夫打的银鱼,上岸后仍然鲜活着,永远卖出好价钱。老渔夫的富裕让别人眼馋,老渔夫能打回活银鱼的奥秘引起了好多人的好奇。一天,老渔夫上岸后突然死去了,好奇的人们打开了他的舱盖,发现里面养着鲇鱼!鲇鱼只要遇到外来的鱼种,就要在水里面翻搅,一团死水便成了一团活水,活水当然增加了氧气,使得银鱼出水面后仍能保持鲜活的生命。省体改委绝对清楚亚细亚就是一条“鲇鱼”,没有它,郑州商界便可能是一潭死水泡着一群死鱼或者要死不活的鱼!所以,他们对亚细亚采取了“大棒政策对付老子,红萝卜政策对付儿子”的策略。他们不可能毁了这突如其来的能给河南人带来无限荣耀无限风光的大好形势。中原不动产掌握着对手这种心态,于是使出杀铜了!但在场的人都知道,这样干的政治风险太大了,所以非常慎重。

“王遂舟为什么不来?”我问。

“他可能有事。”有人说。

“有事也请他务必来!”曹殿宣黑着脸说。

“在这样的大是大非面前,王遂舟作为中原不动产的领导人之一,必须有个明确的态度!”午夜时分,王遂舟推开门,大踏步地走进屋。

“各位,对不起,来晚了。”一口河南话,洪亮而磊落。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王遂舟。这个郑州的大明星,一个前途无量的年轻人。在他的事业渐入佳境、亚细亚生存环境逐步廓清的时候,他却被拉进了与政府部门分庭抗礼的阵营中。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情,中原不动产与亚细亚有着父与子的血缘关系,对待任何事情都能闪烁,唯有这件事情绝难闪烁。他必须服从和维护亚细亚集团的整体利益。

王遂舟对我们说:“我对我说的所有的话,负完全责任!”

中原不动产和亚细亚在极为被动的境遇下要采取极端的方

法,来发泄不满,寻求社会舆论的支持,可以说是“逼上梁山”。

按照他们的说法,省体改委欺人太甚!对中原不动产命运的干预已经远远超出一个政策研究综合部门应有的职权范围、与“改革”的形象也很不相称。

中原不动产总公司是河南省相当著名的房地产开发商,隶属于河南省乡镇企业局,下属有亚细亚商场、亚细亚宾馆、亚细亚大酒店、亚细亚企业发展有限公司等。这家公司成立于一九八六年元月,起家的时候,四亩地,三十万资金、加上四部一共折价三十万的汽车,到一九九一年底,发展到拥有两亿可调用资金、三千万以上的固定资产、累计实现利润三千万的大集团公司。

一九八六年可不像一九九二年、一九九三年,“不动产”、“房地产”的概念非常生疏。谁也不会认识到其中有无穷多的奥妙。当时一位很高档次的官员在审批了“河南省中原不动产总公司”后,专程跑去问总经理晋野,“你跟我说说,什么叫‘不动产’”?

中原不动产这个神奇的动物,在众目睽睽之下,三四年的功夫,滚雪球一般地壮大起来,成片开发居民住宅小区,购买亚细亚商场并成功地经营着亚细亚商场,亚细亚宾馆和亚细亚大酒店又接踵而至,多家有实力的银行都纷纷拎着钱来找中原不动产合作,可谓是异军突起。然而,一九八九年原不动产的发展势头发生了重大转折。由于银根紧缩以及许多内部外部等方面的原因,中原不动产被迫脱离原隶属单位,接受省体改委指导下的股份制改造。

“股份制改造”,无论是以当时的眼光看,还是以现在的眼光看,都是件无比美好的事情。因为这将意味着企业制度由行政管理转向市场机制的根本性改革。严格地说,这是企业摆脱官僚体制束缚所朝思暮想的事情。中原不动产也是如此,否则,他们不会积极主动地选择这条道路。

然而,蹊跷的是,这项被普遍看好的股份制改革探索,不仅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反而成了一场匪夷所思的灾难。从一九八九年秋季到一九九二年五月,经历了三年漫长而痛苦的旅程,终于流产,所有的合作者不欢而散。

一九九二年四月的一天晚上,我在家里接待了一位郑州来的不速之客。这位不速之客交给了我一个大难题。他代表着已经在河南省工商局被注销了营业执照的河南省中原不动产总公司以及它的控股公司:河南省乡镇企业供销总公司。他来北京游说新闻界干预这场经省政府红头文件批准的政府部门对企业的不合法吞并。凭经验,完全可以断定,企业在现行体制下,如果没有被逼到无路可走的份上,绝不会求助于公众舆论来主持公道。向社会公开事件真相,是个破釜沉舟的选择,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你们意识到你们在与谁顶着干吗?”我问不速之客。

“当然意识到了。”不速之客毫不含糊地说。

“你们考虑到后果了吗?”

“兔子急了还咬人呢!”河南人那股倔强劲儿上来了,摆出了死磕的架式!

正如不速之客所说,省工商局按照所谓“主管部门”意见,注销一个有名的中原不动产这样一家大集团公司,实在是个荒唐的过程。

某天,省体改委一位女干部骑着一辆自行车来到工商局,给省工商局长拿出省政府豫政文(1991)114号文件和豫政文(1991)154号文件,加上省体改委意见,省工商局二话不说,照令办理,河南省中原不动产总公司顷刻间便从地球上消失了!这是一九九一年十一月十八日发生的事情。与此同时,在省工商局诞生了隶属于省体改委的“河南省亚细亚股份有限总公司”。

114号文件说:“从发文之日起,停止河南省中原不动产总

公司开发经营房地产的有关业务,各金融部门也要相应停止该公司开发经营房地产业务的贷款。”文件把亚细亚商场巧妙地择了出来:“郑州亚细亚商场系独立核算单位,继续营业,不受整顿中原不动产总公司的影响,各部门仍应给予支持。”

亚细亚仿佛是一根坏藤上结的一个好瓜,一个坏老子养了好儿子。

154号文件的标题可是置中原不动产于死地:“关于撤销河南省中原不动产总公司成立亚细亚股份有限总公司的通知”。

由省体改委牵头的省政府联合调查组一九九一年八月七日作出了给省政府的“整顿中原不动产总公司初步情况和下步工作意见”,列出了中原不动产的五大问题。打头第一重要的问题是“党组织涣散、思想政治工作薄弱、思想混乱”,称“总公司及所属企业现有党员56名,占职工总数的百分之二点四,远低于全国党员占总人口的比例。”又称:“由于党组织涣散,力量薄弱,不能不带来一系列问题。公司领导核心三人(一总二师指总经理、总工程师,总会计师),没有一名党员,其中一人为农民,一人为退休返聘人员,一人为等待移居美国人员。”

所谓“农民”,是指总经理晋野;所谓“退休返聘人员”,是指总会计师张婉;所谓“等待移居美国人员”,是指总工程师张自然。大有些藏污纳垢的意味,能让人在行文中感觉到一种深深的鄙视。

考核一家大企业,居然在第一条考出如此重大问题,不能不勾起人们对“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时代联想。

有人开玩笑说,退休人员可谓“老”,总经理可谓“农”,移居美国者,可谓“移民”,中原不动产真是“老农民”!王遂舟曾愤怒地说:“有人说晋野是个农民,不可能管理好一家大企业。这简直是胡说!晋野是农民不假,但他作为总经理,无论从哪个方面看,都是当之无愧的!他是我们河南难得的人才!”

这篇“意见”交给省政府十三天后，便下达了 154 号文件。效率高得惊人！整个过程都是在省体改委的强有力操作下完成的。

省体改委和省工商局注销中原不动产的做法，遭到了强烈抗议。中原不动产董事长、法人代表致书抗议说：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此作法有着明显的漏洞：

一、没有法定代表人鉴署的申请注销登记报告；

二、没有主管部门或者审批机关的批准文件；

三、没有清理债务完结的证明，或者清算组织负责清理债权债务的文件。

我们就此问题请教省工商局长，他回答说，省工商局完全是依照国家有关法规和省政府的意见办理的。“根据省政府的文件，省体改委是代管单位，省政府又有通知，我们当然听政府的。”

一方说没依据，一方说有依据；一方依据的是“红头文件”，一方依据的是产权的法律归属。认真一追究，发现了一个颠覆性的细节，省政府虽然明确中原不动产股份制改造由体改委负责，改造后的亚细亚股份有限总公司由体改委代管，但是，在股份制改造过程中，省体改委接管并发生激烈的冲突，忘记了一个基本的事实，中原不动产在法律上仍然归属于省乡镇企业局。乡镇企业局一改将中原不动产抛弃的初衷，站出来维护自己的法律地位了。

那么，是凭借“红头文件”有效呢，还是凭借产权关系有效？问到这里，省工商局长有些忐忑和茫然。

纵观中原不动产股份制“改革”过程，都是在强制的状态下进行的。在强行注销之前，已经发生过一场强行接管的闹剧了。

一九九一年三月二十二日，体改委工作组一位处长率领其

他四家股东单位的代表,到中原不动产强行召开全体职工大会,在中原不动产董事长和总经理缺席的情况下,宣布:不承认原不动产的法人代表和总经理,并将总经理领导下的三总师制度改为“生产经营指挥小组”这样一个“抓革命,促生产”的格局,并任命总经理为生产经营指挥小组组长。这种架式,让在场的所有职工啼笑皆非。

工作组以为,中原不动产的“夺权”已经大功告成,以为体改委顺理成章地成了中原不动产的主宰。中原不动产这块肥肉以及亚细亚商场这块金字招牌,当然成了囊中之物。

事情没有那么简单。所有在场的职工都预感到,这场戏并没有演完。中原不动产的高层领导人在河南可都是些非同凡响的人物。中原不动产的今天这个大家当,绝不是轻而易举得来的,当然也不会轻而易举地被别人拿走。

“夺权”的时候,中原不动产所有中层以上干部都接到了告诫:对工作组的接管行动不得有任何抵触行为,否则后果自负。

真是逼人太甚!

本来中原不动产对省体改委帮助进行股份化改造、摆脱大环境和小环境的困难,是积极配合和衷心感激的。但是他们渐渐地发现,他们作为被改造的主体,在经济实力还相当雄厚的情况下,地位在降低,作用在减轻,本来是筹备组组长和新股份制企业董事长的曹殿宣,后来不知为什么变成了副组长、副董事长,在新组成的亚细亚股份有限总公司,最大的股东中原不动产却在董事会和总公司的经理层居次要的位置。其转折点是一九九一年二月初体改委党组的四条意见。其中有一条是“根据中央企业集团要以国营大中型企业为龙头和依托的精神,考虑到社会影响力、经济实力等多方面因素,为扩大公司影响,董事长倾向由郑州铝厂担任。”言下之意,中原不动产虽然已是一家集团公司,虽然拥有亚细亚商场等多家在社会上有着广泛信誉和

影响的企业,虽然是新股份公司最大的股东,但其企业性质是“集体企业”,身上没有“国营大中型企业”这种贵族血液,当然应该改“正”为“副”,改“主”为“次”。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大力宣扬发挥国营大中型和国营商业主渠道作用之日,正是全国国营工业、商业企业亏损严重、难以为继之时。因为在很多人看来,唯有此,才能在经济领域坚持社会主义。说得好听一些,这叫做好心办坏事;说得难听一点,背后有无交易?

这种做法当然遭到中原不动产的抵制。

就在接管的第二天,曹殿宣即召开全体职工大会,他在讲台上高举红色的“法人代表”证书,大声说:“我还是中原不动产的法人代表,还是董事长,我宣布,原来的经营班子,保持原样,一个也不许动!”

“我再讲一条,不准歧视其他股东单位的同志,他们不了解真相。谁要是歧视找谁算帐!散会!”

在中原不动产被强行注销后,曹殿宣又举起了他的“法人代表”证书。不过后来再举起的时候,多少有点悲壮之感了。许多人在台下热泪盈眶。谁都不愿意这份拼死拼活挣来的家业,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拱手奉献。

这里要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工作组要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以至违反应有的程序,达到“改革”之目的?本来是好事,为什么偏偏搞得如此不可收拾?

我看到历次筹备会议的纪要、有关文件和新董事会章程,发现其中有一个重要的破绽,就是工作组中具体负责操作的体改委有关负责人得到了许诺,新企业成立后,将被派去任党委书记,而且董事会章程写到,党委书记可以进入董事会。也就是说后期操作有着明显的个人和部门利益作祟。兵不血刃,便可控制一家大集团公司,这是何等的好事!

回北京后,我曾打电话给以大力宣传股份制而著名的厉以

宁教授,问,股份制设计中,党委书记如果没有行政职务或者没有代表某股东利益,能否进入董事会?厉教授说:“从没听说过这种情况。”

曹殿宣和晋野分别跟我长谈此事,认为,股份制改造,到后来完全违背了初衷。初衷是要改造和摆脱旧体制,结果却是由一个旧体制到了另外一个旧体制,换汤不换药。这怎么能叫“改革”?!改了半天,由“集体所有制”硬改到了正宗“国营股份制”。这场“改革”,旷日持久,损失惨重。

中原不动产顽强抗争,加上社会舆论的压力和某种微妙的上层较量,省工商局于一九九二年五月被迫恢复了中原不动产的合法经营权利。

从此,进行了三年之久的中原不动产股份制改造宣告流产。

“父”与“子”在“经济血统论”的观念下受到歧视,倍遭磨难,王遂舟当然明白曹殿宣“夜话国营”话中有话。亚细亚商场与中原不动产母体公司有着同样的处境,有着同样的经济背景和政治文化背景。唇亡齿寒。他们相互注视着,一切尽在不言之中。

一种文化的凭吊与感伤

严格地说,我在春天即将来临的时候到河南,并不是想简单地描述河南的中原商战及复杂的内幕和背景,去纠缠其中的诸多是非,事过境迁,人们都找到了自己的归宿,不再会去做不属于自己的梦。关于中原商战,肖灼基教授概括为两种体制的战争。在一次聚会上,王力碰见了肖灼基。王力说,“肖先生,我认为您的概括只对了一半。”“那您的见解是什么呢?”肖灼基了解到王力曾是亚细亚商场高级公关顾问,便问道。“中原商战是河

南人的今天与河南人的昨天打,是河南人的明天与河南人的今天打。”王力从容地说。此语一出,惊骇四座。中国的改革何尝不是如此呢!

我感到诧异。在过去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中原地区经济发展极其缓慢,而且“左”的思潮影响严重。这里曾是人民公社的诞生地,有至今已颓圮、沟通黄河卫河的共产主义渠,有信阳大片饿死人事件,有数十年连绵不断、殃及百姓的上层斗争。李长春从辽宁调到河南主持党政,在中央电视台公开发表谈话,一针见血地指出,阻碍河南发展主要有两个因素,一曰“左”,一曰“旧”。一个经济发展如此落后、观点如此陈腐的中原地带,居然会产生惊动全国的商业竞争,居然有如此巨大的购买潜力。我到河南,会晤了省政府有关的官员、省商委主任、郑州市主管商业的副市长和理论研究人员,看到了许多宏伟的规划,其中心的议题都是把郑州建设成为中国内陆地区的商业贸易中心。郑州商业的总头儿王华然说,郑州在“八五”期间,商业方面的项目有二十二个,总投资可达十九亿人民币!于是又为出现了新一轮购买力担忧,与一九八五年的担忧一模一样。按人口、人均收入、经济发展水平、恩格尔系数计算,郑州这样的中等城市的消费能力是十分有限的;再说交通,郑州虽说是京广线和陇海线的交汇点,有着全国最现代化的铁路管理系统,但是运输能力极其有限,如往广东方向的货运,只能满足百分之五十。然而,王华然如同八年前一样,仍然对前景充满自信。

这种自信从何而来呢?

这是开封河南大学历史系周宝珠教授的家。

周教授专修宋史,著有《宋代东京研究》,有那种过来人的与世无争、安于清贫的平心静气。

“你们老远地跑到这里找我干啥?”周教授问。

“考察宋代东京的情形。”

提到“宋代东京”时,他的眼神十分精彩。

“你们知道当时的东京有多少人口吗?有好几种说法,一百五十万至数百万人,我估计北宋东京最盛时有人口一百五十万左右。人口远远超过了世界上任何一个城市!你们看过《清明上河图》吗?”

著名的华裔美籍历史学家黄仁宇在他的《资本主义与21世纪》中写道:“张择端画《清明上河图》时已入十二世纪,开封在不久之后沦陷于金。可是画中所示的都市繁荣景象,在当时的世界里无出其右,即较之二十世纪中国内地的口岸,也无逊色。”

“那简直像是生活在神话中啊!”周教授赞叹道。

许多资料都确凿地证明着,中国人曾在中原地带创造过独一无二、傲视天下的都市商业文明。周教授说:“根据我的考证,当时围绕着商品交易,已有相当高水平的信用关系、契约关系和道德规范,社会也很有秩序和规矩。”用现在的眼光看,中国在北宋时期如果再往前跨一步,就有可能进入“现代”社会了。至于说中国为什么没有跨出这一步,反而走向了衰败,这是一个非常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简单地说,此时,我们虽然有了商业繁荣,却没有维持和延续繁荣的商业制度、商业组织,所有商业繁荣便在封建官僚制度和外族的人侵下瓦解了。这里我不想展开讨论。比这个问题更重要的问题是:“商人”和“商人”的后裔告诉我们,以往我们对中国文明的理解可能完全错了,或者说是中华文明是用“农耕文明”难以简单概括的,同时还提醒我们,要注意文化的传播途径。一位青年经济学家认为,中国文化的传播和整合,民间的商业活动很可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和因素。王华然对此也很有研究。他说,为什么叫“买东西”而不是叫“买南北”?传说商纣亡后,商人失去土地,只能靠贩卖为生,而那时南北蛮荒,贩卖活动由中原到沿海,呈东西向分布,所以叫“买东西”。虽然“士农工商”的排列中,“商”居其末,重农轻商,这实际

上只反映了统治者一种治国态度(这种态度没有对错,只是生存的要求,只是由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的。毛泽东提出的“以粮为纲”亦如是),并不妨碍民间大规模的商业活动,并不妨碍商人的奢华消费和受到社会的羡慕、尊敬,以及底层结构发生的某种变化而带来的新的文明状态。

看看那时的东京!“花光满路,何限春游,箫鼓喧空,几家夜宴。伎巧则惊人耳目,侈奢则长人精神。”与一千多年后的郑州,何其相似!在这风雪黄昏中,开封城满腹惆怅,长长叹息:“还能看到《清明上河图》所描绘的景观吗?”我有些发痴。

“什么也没有了。”周教授的眼神开始黯淡。“北宋的遗迹已被埋到八九米深的土层下了。”仿佛那是他的精神家园。

这时,我的灵魂已离我而去,冲出这间简陋的平房,来到汴河两岸,凭吊那昔日的灿烂辉煌。其实汴河早被填平了。清澈的河水,百舸争流,早变成了一场春梦。北风呼啸着,满眼都是苍白。枯枝上栖息着几只乌鸦,突然聒噪着腾空而去,几声苍凉和凄厉,让我的灵魂颤栗!这时候,我听见古老的开封在轻轻地呼唤,像是正举行抬魂的祭祀,呼唤土层八九米之下那沉睡的繁华复兴。

说起来,上帝还算公平。当中国人民享尽荣华富贵的时候,西方人还在中世纪漫漫长夜中爬行!因此,在近现代一定要拿出一百五十年或者更长的时间折磨中国人,让中国充分品尝战争,动乱,落后,疾病,饥馑,兵贫;让中国人充分品尝鲜血,眼泪,痛苦,怅惘,哀伤……这是命。

“走吧。”

一个声音把我的灵魂拽回历史学教授身旁。

第二天回郑州,然后去南阳。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十二日于北京木樨地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卢梭刚出生时，观察中国

乡村八记



我必须安顿我负疚的灵魂，于是写了《乡村八记》。

世纪末感言

我必须安顿我负疚的灵魂，于是写了《乡村八记》。

我一九七五年插队回到四川雅安老家，一九七六年主持修建“科学饲养场”，在公社的支持下，以“科学”与“革命”的名义。挖了数十座古坟，取石砌墙。几年后的一天晚上，灯光错暗，我嫂子告诉我，每逢天阴下雨、气候寒冷的时候，便有鬼魂哭泣。当年，由于施工质量不好，拱券垮塌，一个如花似玉的女知青成了冤鬼。当地人说，她替了我的命。冤鬼冤魂知冷知热，没有了栖身之所，怎么不哭泣？但愿他们在天之灵能原谅我。

农村经历，颠覆性地改造了我的世界观，培育了我的“底层视角”。

二十年后，我来到了鄱阳湖畔的湖下村，我在一位农民青年家里住了八天，调查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

中国农民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吃的是草，挤的是奶”，被剥夺，然后被遗忘。我想说明的是，占我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庞大群体是怎样被社会“边缘化”的；一九四九年“土地改革”以来半个世纪，中国传统社会的伦理秩序怎样被“革命”颠覆，并留下怎样的恶果。

——作者

一九九四年元月,我来到江西省樟树市黄土岗镇湖下村,住进了青年农民邹斌仔家。在那间土坯房里,我住了八天。我离开时,黎明的波光乍起,全村静悄悄的。雨后的鄱阳湖平原,徘徊着村民们翌日诗一般的梦境。邹许昌、邹斌仔父子把我送上路,猛听得长空雁阵忧郁而清远的“呵——呵——”嘶鸣,一个巨大的“人”字朝着鄱阳湖缓缓飞去……正是那几声雁叫,让我久久不能安宁,勾起我可能是现在、可能是过去、可能是未来的许许多多故事。匆匆写来,是为八记。

第一记 流浪者

—

他在那里等我,手里拿着一本《读者》杂志。这是我们在北京与广东的长途电话中事先约定的辨认标志。他沉浸在南昌火车站候车室喧腾嘈杂的人海中,静静地等候着。我真担心见不着他。飞机整整晚点三个小时!他能如约从广东回江西吗?在广东找到一份工作可真不容易,会不会临时变卦呢?即使他来,飞机晚点,根本无法通知他,他会不会失望而归?此行要是见不着他,完全可能前功尽弃。根据一个线索找到他,在偌大的版图近两亿到城镇打工求生的农民工大海中,把这根绣花针捞出来,花了我们一个多月的时间!当他从广东开平市一个镇办马赛克厂给我家里打来电话时,奇迹便出现了。我在心里祷告着,不断

地回忆着电话中约定碰面的每一个细节。

“我的家乡生活很苦，条件很差，你能适应吗？”他问。

“没问题。”我问：“咱们在哪儿碰面呢？”

“南昌火车站候车室。”他说。

“你有什么标志？”

“我手里拿一本《读者》。”他问：“你有什么特征？”

“个子约有一米七八，大块头，一脸胡子，穿一件蓝色的风衣。”

“好认。”他在电话那边笑了。

在很远的位置，我发现了拿着《读者》的年轻人。我看不清他的面孔。候车室晚上桔红色的灯光，只给我提供了一个清瘦的轮廓。我很兴奋。我大踏步地朝他走去。他从长条椅上站了起来。我看清了他的脸庞。大大的眼睛，侧分着头发，腰板挺得很直，一身洗白的牛仔服似乎证明着他已经闯遍了天下。他也很兴奋。我能清楚地看见他的喉结上下走动，那种克制，那种欲言又止。后来我知道，他为了能回江西家乡来迎接我，向老板请假不准，执意要走，老板以扣工资威胁，结果是丢掉了广东的饭碗，“那点工资算什么！大爷我走了！”

“让你久等了。”我说。

可他那神情仿佛是在说，他在这里不是多等了三四个小时，而是等了十年，或者更长的时间。那神情仿佛是在说，他自天而降，而不是刚刚下飞机的我。

他那双黑黑大大的眼睛在我身上审视着，像是在证明某种判断，看他从广东专程归来是否值得。

不知道为什么，我们都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时间和空间便这样被倒转了，被切碎了。他让我想起了八年前我小说中写到的一个少年。这个少年叫“飞来”。一个精灵般的少年。精灵解释说：“亲爸爸生不出我来，我不‘飞来’又从哪里来？！”我描

写道：“水面，一长条不规则的五彩斑斓的玻璃，被飞来钻石般锋利的脊背划破了，天地间都凝固了，唯有飞来这只生灵在水面上肆虐，激起波澜；以飞来为界，两张被揉皱的绸布在阳光的照耀下，一片金晃晃鱼鳞花仙然飘落。”这篇小说的素材，来源于十八年前四川西北部一个叫“下里”的乡村生活经验。人物是虚构的，那条河，我没有虚构。我写到“作为雅砻江的一条支流，青衣河本是一条古老的河。她在这夜的欺骗和诱惑中流淌，如梳篦浣绕着一拢乌亮的秀发。”……算起来，“飞来”长到今天，也有面前这位年轻人这般大了。

我此刻十分清醒地意识到，我在冒风险。我在寻找真实中的虚构和虚构中的真实，以期获得更逼近的真实。因为，我常常有这样的一种经验，虚构的世界离我们很近，而真实的世界却离我们很远。哲学的具象与抽象，生活的虚构与真实，使我苦恼不已。很多时候，我茫然地看着太阳从东方升起，然后从西方陨落，自在的人身，化作了缕缕轻烟和那天边灿烂而短命的霞光。我儿子印，七岁时写了一首诗，描述了他对“晚霞”的印象：“晚霞亮亮的，乌云在前进。我站在楼道里，看着晚霞慢慢地动。”

南昌火车站。我十八年前的乡村生活，像是一节旧车厢，也泊靠在这里。车厢里装着“飞来”，装着那条缠绵的青衣河，装着我青春时期的梦想。我看见他驾驶着火车头朝我的旧车厢开来，“咣啷”一声，车厢与车头挂上了。

就这样，我与邹斌仔来到了湖下村。

二

本来，我与在广东打工的邹斌仔应该是永远的陌生客。本来，我完全可以在北京怀柔县宽沟的记者年会上发表一番关于农村问题的宏论后，由选定的东西南北中五个省的驻站记者去

完成“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考察报告”。他们都是中国新闻界的精英。他们有足够丰富的人生经验、知识背景和职业激情去完成这次大规模的行动。他们完全同意我们对中国问题的判断,完全同意我们对农村剩余劳动力性质和趋势的判断。大家已经对许多媒介浮浅潦草的“民工潮”报道厌倦了,已经对那种城里人的眼光厌倦了,特别对我们北京人感到厌倦了。一位经济学家愤怒地说:“他们把北京的城墙当作了他们家的院墙了!”已是深夜。总编辑、部门主任和驻站记者,十几个人挤在一间小屋子里。小屋子里烟雾弥漫,大家精神亢奋,从怀柔水库吹来的西北风,摇撼着砖木结构的仿古建筑。他们在这几乎与世隔绝的地方,向社会发问,也向自己发问。

“两亿农民工,可以说是两个超级大国!两个超级大国组成的农民工军团,朝城市涌来,朝发达地区或者其他能生存的地区涌来,这是人类社会工业化进程中从未有过的壮观场面!”有人赞叹。

“有人说,农民工给中国社会带来了许许多多问题,应该把他们堵回去。能堵得回去吗?他们像荒原的野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冲破重重的路障,顽强地在向城市蔓延。他们是‘盲流’吗?”

“有人说,他们应该离土不离乡,就地吸纳,就地发展,完全可以两全其美。那么,我们要问,所谓‘因循守旧’、‘安土重迁’的农民为什么偏要顽强地从土地里摆脱出来?为什么偏要告别妻儿老小,告别热乎乎的炕头,离乡背井,到那遥远的陌生地寻找出路?”

“中国农村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九亿农民的生存状态如何?分析一年一度的‘民工潮’,怎么能离开土地,离开乡村社会呢?!怎么能不去问问农民的想法呢?!怎么能不到它的发源地去探究原因呢?!简而言之,怎么能不去关心农民的命运?!”

“在这个过程中,农民失去了什么,得到了什么?中国社会失去了什么,得到了什么?他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这间乌烟瘴气的小屋子,此时,已经陷入了一种迷狂的状态。大家没有丝毫的睡意。他们似乎看到这样一幅寓言式的图景:一驾马车正向前迅跑。车上本来坐着两个人,一个是城里人,一个是乡下人。他们同是马车的主人。后来,车跑不动了。老实巴交的乡下人下了车,去帮助加油,去帮助推车。马车又开始向前迅跑。可是城里人只顾自己风光,忘了把乡下人拉上车。车越快,精疲力尽的乡下人被远远地抛在后头。乡下人努力地追上去,可他发现,车上已没有了他的座位。城里人永远驾车在前面跑,乡下人永远在屁股后追,久而久之,便成了一种规矩:乡下人想搭车,要看城里人的脸色。乡下人这才猛醒,他成了苦力,成了一个“只会种庄稼的怪物”,“马车”已经不属于他了。

著名社会学家陆学艺先生在上海的亲戚家听到对农民进城的埋怨,他风趣地说:“你们是不是希望农民就像《搜神记》中的田螺姑娘,让她把家里所有活全干完,把饭煮好,然后在回到‘如三升壶’的大螺壳里去?”

正是在这种哭笑不得的现象面前,小屋里的人都不能不承认这样一个严酷的事实:城市与乡村既有天然的联系,更存有深深的隔阂。

一年前的“春节”,邹斌仔流浪北京,无家可归,当他为了御寒,在午夜张灯结彩的长安街上狂奔时,也刻骨铭心地看到了这个事实。

把邹斌仔从数千万迁徙流动的农民工汪洋大海中淘出来,并在今天让他成为这篇报告文学中的人物,纯属偶然。

宽沟会议后,我把一夜讨论的兴奋带回了报社。我与报社“青春热线”的主持人、首届“邹韬奋新闻奖”获得者陆小娅女士

聊起即将进行大规模的农村社区调查和追踪农民工“候鸟路线”的设想时，她问到，“你们社区选定的标准是什么？”

陆小娅作为心理咨询专家，提出了一个相当要害的问题。她那高度近视的眼睛挑剔地盯着我。对此，我不敢有丝毫的闪烁其辞。

以往，我们了解农村社会，大都是两个极端，要么是穷得叮当响的宁夏西海固、川东酉(阳)秀(山)钱(江)彭(水)、山东沂蒙山区、陕北黄土高原、河南大别山区等地区，要么是富得流油的华西村、大邱庄、刘庄、窦店；一方面为尚在温饱线下挣扎的八千万农村贫困人口大面化之地沮丧，一方面又为那些暴富的农民欢欣鼓舞。更要命的是，那些充斥于新闻媒体“形势大好”的一边倒宣传。这给了我们一系列错觉。居中的广大农村社会反而被忽视了。传统农耕，超稳定的社区结构，资源单一，文化繁衍较好，变化缓慢，恰是这一区域的显著特征。分析一个传统社会如何进入现代社会，这一区域可能最具代表性。

“当然是居中原则。”我说。

“那么，怎么把握和描述呢？”她又问。

“我们考虑了十二个字：‘静态分析，动态观察，宏观把握，微观分析。’也就是说进行实证性的研究和把握。农村问题的许多方面是相当敏感的，特别是相关政策失误的研究和批评。”

“你们可能会左右为难。这种社会学意义上的新闻调查和写作，搞不好会非常难堪。”

陆小娅曾在陕北插队四年，当过赤脚医生和大队妇女主任，深知农村疾苦。她曾写文章祭奠过一个叫“老善娃”的独身穷老汉。当初，这个穷老汉想让她这个北京知青给他继子做婆姨。他的请求目的很清楚，“不过是为了满足自己最简单、最平常、甚至有点可怜的愿望——不致绝后。他解不下(不懂)北京知青和陕北女子有什么区别(如果有的话，就是知青结婚不要彩礼)”。

后来,老善娃果然为继子找到了婆姨。然而,彩礼把苦了一辈子的老善娃压垮了。大年初一,老善娃跳了悬崖……她是那种极易动感情的人。“我给你讲个故事。”她说。

三

“青春热线”开通三个月后,第一次碰到想自杀的人。

陆小娅刚进报社大门,便被传达室的师傅叫住了。“有人给你留了张条子。他一边写一边抹眼泪呢。”

她接过条子一看,大惊失色。上面写到:

中国青年报社“青春热线”电话主持人:

由于父母的包办婚姻及望子成龙的心情太强烈,使我深受其害。我有我自己的追求和理想,可现实生活竟是如此残酷和无情。我真没有想到一个九十年代的青年要冲破包办婚姻的阴影竟是如此的艰难,生活对于我来说,已失去了所有的意义。

一个月前,我在一位朋友的资助下离家出走,四处奔波。我渴望用自己的双手来创造一个美好的生活。可惜中国之大却无我的容身之处,我连付出劳动和汗水去换取生存的权力都没有。找朋友、劳务介绍所,一个个希望在我的苦苦乞求中接踵而来,又在我苦苦的等待中成为泡影。现在我身无分文,我不想去偷去抢也不想去作乞丐。生活为什么就这样不公平呢?既然我不能堂堂正正地活着,那不如让生命就此结束。

在我生命即将结束的这个时候,我有一个请求,希望通过贵报向社会呼吁,希望全国的家长们,都能理解和尊重下辈人的感情、理想和追求,使他们真正成为对社会有用之人。我不希望别人再来重演我这个悲剧,让我成为中国包办婚姻、望子成龙的最后一个牺牲品吧!也呼吁全社会都来关心爱护所有的青年。

一个通伍兵

一看便知这个“退伍兵”是到北京打工的农村青年。虽然“青春热线”开通后,知道早晚会遇到这种事,知道要帮助这些处于心理危机状态下的青年朋友,可事到临头,陆小娅还是有些紧张和束手无策。

她赶忙问:“人呢?”

“走了。也没说去哪儿。”

她判断,他既然留了条,肯定还会通过某种方法联系。从信中可以看出他还有话要说。

她急忙上办公室,在电话的自动应答中留下一句话:“南方来的退伍朋友,请马上到报社来,我们等你。”

晚上九点多,他终于来了电话。他来了。为了逃婚,他离家出走,先下广东,后上四川、湖南、湖北、河南,四处碰壁。他把他人生的最后一站定在了北京。他带着一脸的疲惫、一脸的失败感和绝望。

在交谈中,她们知道他十多天栖息在建国门立交桥下,没有好好睡过一夜觉,吃过一顿饭。寒冬腊月,蜷缩在立交桥下,怎么可能睡着呢?只好跑步取暖,每晚都要跑几十公里。先是由南二环跑到丰台再折回,后来就在长安街上奔跑。这个与大都市和节日气氛毫不相干的孤独者,在长安街上奔跑。他感觉到,所有的人都在用一种异样的眼光看着他,一路上的高楼大厦都在笑话他。他好像是空气中一粒飘浮不定的微尘,一粒还稍稍有点儿热量的微尘。他想定位,但是定不住;他想停下来,也停不下来。黑夜中传来北京火车站和电报大楼播放的《东方红》乐曲和报时声。“当!——当!——当!——”这报时钟声揪得他心痛!他既期待着夜的消逝和白天的来临,又对某种时间的步步迫近而深怀恐惧,进而从内心深处慢慢地涌出来一股不可扼制的绝望。他是唱着《东方红》“呼儿嗨哟”长大的。“可谁真正为我们农民谋过幸福?”他说。他想停下来稍稍休息一会儿,然

而不能。他衣着单薄,北京午夜攫人心魄的寒气顷刻间掠走他刚焕发出来的少得可怜的热量——每天只吃三个面包所积蓄的热量。他奔跑时,经过了国际饭店、北京饭店、贵宾楼、民族饭店、燕京饭店,他知道里面的富人们正在一掷千金,淑女们正在谈情说爱;他奔跑时,经过了天安门、新华门,他知道,过去和现在的国家统治者正夜以继日,为天下事所烦恼,而不能成眠。当然,他也知道,城墙里面的北京人不会也无暇来关心他这个靠奔跑来取暖的流浪者。社会真是如此不公平么?这不公平像是电影中的画面和杜甫的诗篇,分不清虚构与真实。他奔跑时,可能不知道,在其他的空间里,还有近两亿农村青壮年被迫从土地上走出来,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和酸甜苦辣在奔跑。他只是他们中的一分子。为了生存而流浪,为了精神而流浪,他已走投无路。

他真是幸运!或者是天无绝人之路!他找到了“青春热线”,遇到了陆小娅。

她安顿他住下,让他在报社招待所美美地睡了一觉。第二天中午她去叫醒他。他说,“有半个月没有在床上睡觉了。”“走,洗洗手,吃饭去,你一定很久没吃饭了。”她说。

陆小娅洗完手回来时,他一把拉住她的手,“扑通”跪下了,哭着说:“大姐,要不是你,我现在就不会活着了!”

她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事,又没有思想准备。她说:“我当时竟吓了一跳!惊慌失措和难堪尴尬,使我的心‘通通’直跳,手忙脚乱地将他拉起来。”

她动员他回家。她转身从钱包中拿出一些钱,对他说:“我知道你现在没钱了,想回家也回不去,这点钱借给你当路费吧。”说“借”,“一是怕伤了他自尊心,二是让他在人世间多点牵挂,好好地活下去。”她说。但是她的心情和他的心情一样地复杂。她明明知道他是为了逃避包办婚姻而跑出来的,如果回去,意味着与命运的抗争失败了,意味着又要面临那不情愿的婚姻和农村

贫穷、单调、沉闷的生活，还有人们嘲笑、鄙视的目光。她说：“我突然感到自己很残忍，仿佛在把他往火坑里推。毕竟这一切痛苦和压力都不是由我来承受，而是由他来承受的呀！可是，似乎又没有别的路可供选择。身边没有钱，居无定所，又找不到工作，还会再一次陷入绝望。‘两害相权取其轻’，面对残酷的命运，活下来是第一位的。”

老百姓说，好死不如赖活着。活着，一切都还有可能，否则，连一点可能都没有。对于普通人，死亡对死者没有任何意义，对生者也没有意义。后者要求一切活着的人，必须敢于拿全部生命过程作赌，去承受苦难。“那么，活又活不好，死也死不了，又会怎样呢？”我说。他正处在这种困窘和矛盾中。

陆小娅和“青春热线”其他同事劝说他打消轻生念头时了解到，他喜欢文学，曾在了一本杂志上结识了一个“笔友”，是个残疾女孩。他说女孩很善良，天下只有她能理解他。这次出逃，这个女孩借给他一百块钱。

她观察到，他在说到这个女孩时，眼睛里流露出一丝儿温情。

“喜欢她？”她轻声地问到。

“喜欢。”他似乎在一种沉思和迷茫之中。

“为什么不去告诉她？”

“不可能。”他的眼睛暗淡了。

“怎么不可能？”

“我是农村的，她是城里的。”

他凄然而无奈地一笑。“爱情”也是要身份的。他因为“农民”的身份，连提出爱的勇气都没有！对方还是个残疾女青年。即使回去，这种处境也不会有丝毫改变！那么，抗争又有何意义呢？所以，他的出逃、他的流浪、他绝望，就不单单是为了逃避包办婚姻了。

四

这便是“邹斌仔”的意义。

农村人口膨胀,人多地少,迫使邹斌仔们从土地里从乡村社会出来。他们不可能为了一个什么固定的观念而在那里坐以待毙。他们不会满足祖祖辈辈留给他们的旧的生活方式,他们要去追求新的生活方式,他们不能抗拒现代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巨大诱惑。没有什么人会来怜悯他们,要改变日益恶化的生存处境,只能靠自己。于是,一个人类工业化进程中农村数亿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极其悲壮的历史景观便呈现在我们面前。

我们多少有点惶惑。

我们多少有点忐忑不安。

这股不可阻逆的社会潮流可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什么影响?这股潮流的发源地——中国乡村社会到底在发生什么事情?

都是未知数。

于是,邹斌仔朝我们走来了。

第二记 “红字”

—

“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来会打洞。真不知道是哪家的理。”邹斌仔说。湖下村电杆、电线、电灯、电视等等什么都有,就

是没有电。到了傍晚,除了成群寻找归巢的飞鸟和乍然而起的野鸭,整个乡村都失去了活力,在夜的笼罩下,如同死去一般。乡下晚饭的炊烟顺着树杈与那朦胧的雾霭交融,然后落在黛色的水面上,被带向远方。煮饭吃饭都没电,看电视没电,等大家睡死过去的时候,电来了,瞬息即逝的光明,像是在一个巨大的汤锅里,吝啬地撒一小撮胡椒面,给这村庄寂寞的夜空一点儿安慰。邹斌仔与我面对面坐着。我们中间有一盏咖啡色药瓶做的煤油灯。里面能装不到二两的煤油。邹斌仔的母亲知道我晚上要约人聊天,要笔记,要读书,每天晚饭后都要添满煤油。主人家的热情都体现在这盏煤油灯上了。小药瓶往往倒得很满,溢出来的煤油,在小屋子里飘散着一种令人晕眩的腥味。点燃棉绳的灯蕊,火苗很冲,顶尖一股没有燃烧完全的黑烟,与光亮之外的黑暗保持着某种联系。“三弟弟,省点油,吹灯睡觉喽!”十八年前,堂哥在外面喊。一看表,不到十点!我高中毕业后,回老家插队,成了这个大家庭的一员。堂哥是公社小学校长,伯父,嫂子,六个侄儿女。六个侄儿女还小,伯父年轻的时候背着砖茶到藏区卖,翻芦山岗,翻大雪山——夹金山,早早地驼了背,丧失了劳动力。这是个缺乏劳动力的大家庭,全家的花销,全靠堂哥一个月三四十元的工资。见我从早到晚都在屋里点灯看书写字,煤油消耗如此之大,天长日久,当然心痛。即使校长再开明,家庭总管嫂子这一关也过不了。所以,堂哥这令人不愉快的一喊就势所必然了。后来,我在母亲面前告了一状,堂哥当然遭到了母亲的一番训斥,当然表示认错,“痛改前非”。今天,我为我当时的胜利而内疚。堂哥由于过重的家庭负担和教学负担,积劳成疾,英年早逝。对于一个在社会的另一极端长大的青年来说,初来乍到,是很难在细微处体会到农村的生存窘况。说起来,我和堂哥的命运,完全被历史搞颠倒了。他似乎应该是在特权庇护下随心所欲的我,我似乎应该是“英年早逝”的他。一九

三五年底,红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分道扬镳,二过草地,准备经雅安、名山,攻打成都,总部便在我的老家住了一百天。爷爷是苏维埃主席,主动送大儿子(我伯父)参加了红军。可是伯父参军没几天,伯母生产,便请假回家照顾。看着伯父一两天回不了部队,爷爷便决定用二儿子(我父亲)去替换大儿子。大儿子从此继承父业,成了地地道道的农民;二儿子当时只有十五岁,爬雪山,过草地,到陕北,身经百战,侥幸余生,成了高级干部。正是一个小小的偶然,历史便演变成了目前的样子。贫穷的农民哥哥,显贵的干部弟弟,一并成了革命的后果。堂哥跟我开玩笑:“三弟弟,你应该是农民,我应该是公子哥儿。”命运真是琢磨不透。此一时,彼一时。奈何,奈何。

“想什么呢?”邹斌仔见我看着煤油灯发愣,问道。

“哦,”我回过神来,“没什么,你接着说。”

二

邹斌仔深刻地体会到城乡之间的差别,不是在长安街上奔跑取暖的时候。那时候他所看到的,仅仅是一种现象,一种外在的符号。他的绝望来自于一场哀伤的爱情故事。

农村青年的出路大概仅有那么几条:考学、当兵、获得吃商品粮的城镇户口。其中当兵不能一步到位地解决问题,如果不是入党提干,不转志愿兵,仍然可能在服役期满后,复员回家当农民。邹斌仔一九八七年当了兵。他的麻烦是不善于随机应变,不善于言谈,不会看眼色,自然也不太合群。他与部队大多数农村战士一样,怀揣着对未来生活的憧憬和理想,努力奋斗,想要混出个人样来,摆脱那个生他的旧故土地。家里为他的前途,也操尽了心血。农闲的时候,父亲早早地出门,走村串户,收购鹅毛鸭毛,赚几个钱,一者贴补家政支出,二者以备急用。为

了到时候能转志愿兵,家里寄来五百元钱,让他能见机行事,打点各方神仙。并且在信中说,只要他能当志愿兵,倾家荡产也在所不惜。同时还在家里给他安排了婚事。这门婚事,父母主要有两个考虑,一是女方的一个亲戚是市里专管退伍兵安置工作的某局长,二是女方在镇里有很硬的关系,斌仔万一复员回家,能有一个城里的固定工作。他们为斌仔好,给斌仔来个双保险。收到钱后,他真是哭笑不得,心里沉甸甸的,不敢退回去。他知道这钱来之不易。左思右想,拿出三百六十块,报名参加了一家文学杂志的函授班。可是,当家里写信告诉他,已给他在邻村说了门亲事,女方如何如何好,家里已经做主了!这个消息不啻晴天霹雳!“天哪,他们从来没有跟我商量过啊!这不是逼着接受一个我根本没有见过的女孩吗?信上还说,家里已经付给女方三千二百元的定亲礼!”邹斌仔说:“我不干!”亲戚朋友都来劝导。有的甚至说,为了那可能拿不回来的三千二百元,也该同意这门亲事。三千二百元,在农村绝对是个天文数字!一般的农家,猴年马月才能挣回来呵!

邹斌仔的父亲邹许昌对我说:“当时,斌仔不在家,女方向我们能不能作主,我们说能作主。这下好了,全砸了。”他们给斌仔通报这个消息时,万万没有想到,此时的斌仔已是心有所托了。

“她真是个好姑娘。”邹斌仔说。他在述说这段爱情故事时,脸上充满着怀念和温情。这是个多愁善感、自尊心很强的年轻人。这种性格既支撑了他,又害了他。煤油灯在他黑黑的脸上闪烁着。“那个脸黑的孩子,站起来。你来回答这个问题。”初中地理教师指着他。从此同学们都叫他“非洲饥民”。这简直是对他莫大的污辱。一气之下,再不上学了。谁劝也不听。他觉得这个世界上谁也不理解他。心里孤独寂寞,有话也不知能与谁说,在部队时,他在一本杂志的“征友”专栏上,看见了一个江西女青年写的一段话,大意是,当一个人遇到困难遇到挫折时,不

要灰心丧气,要有勇气正视人生,要做生活的强者,要去奋斗,要为改变环境而努力。这番话打动了他的心。他给她去了封信。四页纸的信,倾诉着他内心的痛苦和烦恼。虽然他不知道这个女青年长得什么样,干什么工作,芳龄几许。这些对于他来说,似乎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有一个对象来诉说心中的没有地方说的郁闷,去寻找一种理解,一种心灵的慰藉。从精神分析的角度看,如果压抑得不到宣泄,身心损害的后果将是严重的,甚至可能是毁灭性的。他找到了一个宣泄渠道。他们未曾见面,互不相识,可能正因为如此,他有一种极大的安全感。何况对方是位青年女性,她那段话里强烈地传递着一种女性独有的信息,一种让他敞开心扉的暗示和鼓励,一种朦朦胧胧的期待和共振。他对着一双完全被他抽象化的女人眼睛,壅堵在胸中的话奔涌而出。

信寄出去后,他突然感到了不踏实,甚至有点后悔。她接到一个陌生人这封不期而至的信后会怎么想?她会回信吗?她不会以为这是闲极无聊的逗闷子玩?他坐立不安,不敢抱任何希望。一颗心悬在了半空中。

“我得到了出乎意料的回报。”他对我说。没几天,她回信了。整整八页纸的回信!是他去信的两倍!他的心兴奋得蹦蹦直跳。女孩的回信热情洋溢,让他激动万分。没多久,他又收到了一张女孩的明信片,上面写着:

“当你孤独的时候,当你失去勇气的时候,当你造一条船去彼岸,你遇到风浪很累的时候,别忘了,还有我这个朋友。”

“朋友”,这两个字,此时在他心中有何等的珍贵呵!“我邹斌仔从小长那么大,从来就没有一个能吐肺腑之言的朋友呵。我真是太幸运了!”他捧着明信片,躲在一个没人的去处,轻轻地啜泣,进而又号啕大哭。

从此,他们从未中断过通信。你来我往,每封信都不少于十

页,厚厚的一摞,拿在手里,沉甸甸的;每封信都充满了激情,仿佛有说不完的话。渐渐地,互相产生了爱意。有一天,他告诉她,他要复员回家了。想去看她。她说,你来吧。这对通信两年之久的青年男女终于见面了。

这种背景下的恋人第一次见面,能给文学家提供多少罗曼蒂克的想象呵!仿佛到处都是快乐的蓝颜色,到处都是世间的温情,唱诗般在为幸福而歌唱。生活中缺乏快乐、温情和幸福,所以当它们一起来临的时候,我们都愿为它们祝福。文学在本质上,就是这种祝福的产物。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文学与那真实的人生有着多么大的距离。

他在她家等她。奇怪的是,他的心情异常平静。他来到了一位朋友的家,一位剖肝沥胆的恋人的家,没有任何陌生的感觉,一进屋,便看到她的影子,闻到她的气息。一切都自在而熟悉,“好像回到了自己的家。”

她进来了。她走路颠簸,是个残疾人。

“你好。”她向他伸出手。

“你好。”他握住她。

她以那种残疾人特有的敏感在搜索着对方的某种反应。她看着他那双热情澎湃的眼睛,握着他的手,心里有一种温热和踏实。邹斌仔对我说:“说出来,你可能都不会相信。我在认识这位姑娘之前,曾经做过一个梦,这个梦说,我将来必定要跟一个有残疾的女人生活在一起,必定要由我来照顾她,陪伴她度过我的一生。”

他说这番话时,一次在穿湖下村而过的蒙水河畔,一次在北京昌平区的一排白杨树下。这番话令我动容。

我不知道人世间是否有心灵感应,是否有超生命现象在左右着人们的命运。事实是,他在她家度过了平生最愉快的三天。当天晚上,她父母弄了十几个菜、两瓶酒来热情款待他。他们聊

天,他们散步,他们谈着未来的打算和抱负。她鼓励他与包办婚姻抗争,甚至与家庭断绝关系。

三

“后来,我意识到,我们见面是一个错误。当我们由梦幻的期待走到真实来的时候,走到必须对许多具体事情作出判断和选择的时候,我们发生了矛盾和冲突。比如说,她对我父母搞包办婚姻十分反感,进而对我父母反感,说一辈子也不想见到这样不理解儿女的父母。这怎么行呢?无论如何,父母就是父母,二十多年的养育之恩,总要报答吧?在我走投无路的时候,她建议我去学一门手艺,比如说美发,她可以跟我开一个发廊维持生计。可是我根本没有学一门手艺的兴趣。我在萍乡一家很大的塑料厂找了份相对稳定的工作,在很短的时间里干得比较出色,可是我看不惯厂里的很多事情,写信给她。可她非常实际地跟我说,‘你能保住工作,自己不饿死就不错了’。怎么能说这种话呢?更严重的是,我感到了我们之间对话的不平等。她是工厂的绘图员,个子比我矮,可她总是让我仰视着她。怎么能这样呢?我现在还是个没有摆脱农民身份的农村青年,还是一个一文不名的穷光蛋。可我还是男人,男人有男人的自尊呵!”邹斌仔说。

两个人的观念冲突中,包含着非常丰富的信息。

一个是残疾的城市女青年,一个是一文不名屡屡失败的农村男青年,他们的共同特点是,都喜欢文学,怀里都揣着一个“嘭嘭”弹跳的梦想,都看重和珍惜生命的历程,都不甘心命运的摆布,同时又都有着先天的敏感和自卑。这种先天的敏感和自卑又在社会选择和社会竞争下,被强化被夸大了。在没有生存保障的情况下,两个极其脆弱的灵魂结合在一起,会是怎样的情景

呢？

我还在痴想。为什么“见面是个错误”？有情人终成眷属。同是天涯沦落人，怎能不同病相怜，相依为命？怎能不抛开世俗的牵累，在“爱情”的制高点上展翅高飞？我们完全可以按照小说中描写的那样，为这对充满反抗精神的恋人设计出无数条光辉灿烂的道路来。为什么走到如此地步，彼此再往前走一步便是另外一番天地，却根本挪不动脚步了呢？本来都像是插了翅膀，轻盈地从天南海北飞到一起来了，却突然变得如此沉重了呢？

对于思想空间无限活跃，生活中又缺乏自理能力的少女来说，她是在父母的保护下长大的，她要创造自己的生活，当然需要强有力的东西来承载她的全部梦想。

然而，邹斌仔暂时做不到。

“你去学一门手艺吧。”她提出了建议。

当他们在—个超现实的空间飞奔的时候，当他们不能不面对具体问题的时候，邹斌仔便尴尬不堪了。

“学手艺撇开兴趣不说，我算了一下，至少需要一千块钱，我到哪里去找一千元线？再说了，学成后，我和她搞一个店，没有万把块钱，是拿下不来的。”邹斌仔说。

如果说，第一次见面是轻松的、愉快的，可是—个月后的第二次见面却是另外—番心境了。邹斌仔回到了家，又不得不逃出来。他面临着必须结婚的压力，没有任何余地。天天灌进耳朵里的都是没完没了的劝说和议论。

他—脸颓丧来到少女的家。她和她家里人都支持他到外面去闯—闯，或许还有出路。她给了他—百块钱。

等她再知道他的消息时，便是北京陆小娅打来的电话。“他想轻生？你们要救救他呵！”她在电话中哭了。哭得那么伤心，哭得那么没有着落，哭得那么绝望。她曾经在明信片上写过：

“别忘了，还有我这个朋友。”无论如何，还有我呀！她的绝望，是“我”在他的脑子里消失了，永远地消失了。“爱情”，在这个时候失去了分量。

她至今可能都没有意识到，他们第二次见面后，他的内心已失去了平衡。当他花掉了她给他的一百元钱后，并且分明看到没有回报的希望的时候，只是说：“她会原谅我不把钱还给她吧？她知道我走投无路了。”

他们都需要挽救。然而，他没有能力挽救她，她也没有能力挽救他。悲剧便在所难免了。他也没意识到，她也是走投无路了。

在我去湖下村后，她给他去了封短短的信，尽量不流露情绪地告诉他，她在工厂的优化组合中，失去了那份绘图工作，失去了本来就很微薄的工资。

四

他哭了。

他知道，她也哭了。

他知道，在她的心目中，他是个弱者，懦夫。

他珍藏着她所有的信件。他每次回家，无论是怎样的心境，都不厌其烦、数不清遍数地读她的信。信读旧了，读烂了。所有的信，他都能背下来！读她的信成为他生活的一个部分！“这世道为什么这么不公平！是我对不起她。是我毁了她。”他老是这么念叨着，像祥林嫂一样地念叨着。“我们不该见面。我们见面是个错误，一个无法挽回的错误。我怎么就没弄明白，我这样的人，根本就没有资格跟城里人恋爱，根本就没有资格跟城里人结婚！这是一个错误。当我们第三次第四次见面的时候，我们已经无话可说了。我们的生活没有任何变化，所有的具体问题都

要从原起点开始讨论。我们都想互相有所依靠,都想去建立一个崭新的幸福的生活,可是我们之间,已经被失望的巨大鸿沟隔开了。我们的信开始少了,开始短了,我们已经失去了写长信倾吐孤独和寂寞的冲动。我们要是不见面会是怎样呢?我们可能会永远生活在一种思念和期待之中,永远生活在一种纯洁和想象之中,永远生活在相互的嘘寒问暖之中。这下好了,我有话去对谁说?我真是后悔,我们不该见面。我犯了一个错误”他说。

“你们都没错。你不能总是在内疚中生活。”我企图安慰他。

可此时他似乎不太在乎我的安慰。“我最大的错误是投错了胎。对于这一点,你们城里人体会不到!”

五

我还能说什么呢?邹斌仔们的身上,背着“农民”这两个“红字”,永远抹不去的“红字”!我的父辈也是农民出身。我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是农民,我的堂哥、表兄弟姊妹是农民,我的侄儿侄女是农民,我的父母尽可能地利用职权、即使离休后仍然利用各种关系,给他们提供方便,努力让他们摆脱农民的身份。在我家的餐桌上,这是一个永恒的主题,一个让人烦透了的主题。甚至为了实现某个计划,要进行全家动员,打乱正常的生活程序。“农民”,甚至是城里人许多家庭中一个难以摆脱的阴影。

即使是许多已经非常富裕、已经取得成功的农民,无论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场合,只要鄙夷地扔过去“农民”两个字,就足以摧毁他们的自尊,足以让他们的富裕和成功变得毫无意义。所以,“吃商品粮”成了农民心目中至高无上的特权,成了舍生忘死都要实现的目标。堂哥死后,组织上为了奖赏他几十年教龄奉献,恩赐给了两个“农转非”指标。一家七口人,两个指标,其余五口

人再继续“农民”。这就意味着，一夜之间，情况发生了变化，一人锅里吃饭的七口人分成了两种性质。据我所知，转谁不转谁，可是有着天壤之别的选择。其中的辛酸难以尽述。先别说如何处理这两个“农转非”指标，光是落实这两个指标，就用了好几年的时间。找这个找那个，找得着这个，找不着那个，找着这个推那个，找着那个又推这个，把堂哥弄了个死不瞑目，死时，眼角还挂着期待指标的酸泪。堂哥死后，老家来信说，组织上良心发现，终于落实了指标，以表示对这个献身农村教育几十年的小学校长的悼念，当然更是体现组织上对乡村老教师阳光雨露般的关怀，更是鼓励那些活着的乡村教师努力工作。前一段时间新闻媒介宣传说，某某地方某某城市为多少农民企业家多少出色的青年农民工转了城市户口，这些消息传达的是一种社会悲剧呢，还是社会喜剧？或者是一种黑色幽默？

第三记 游戏

一

到湖下村的第一夜，平静中有些兴奋。主人家把我安排在上坯房的里屋。据说土坯房建于一百多年前，墙皮都已脱落，露出土砖坯码垒起来的原始状态。很规则的纵横线条与房顶漏雨形成的痕迹，似乎在诉说着鄱阳湖平原一个普通村落农家的古老历史。

里屋显然是用来招待客人的。屋里放了一张床，一个五六米见方的水泥粮仓，一个木制的人力水车，一个长条凳，一张桌子，一个小杂物柜，还有一个供方便用的大尿桶。这个尿桶至少

能盛五十斤尿。床很精致,上面和三面全封闭,红木做的,贴粘和雕镂着花草图案,邹斌仔说是土改时分地主的家产,他家花了五十元买的。主人家最值钱的家什,显然都挤在了这屋里。

在北京临出发前,妻子给我买了个镀铬铁皮手电筒,奇怪,这只手电筒几乎和我一九七五年回老家插队时用的那只一模一样。怎么也聚不拢光,像是被散了瞳,照射出去,墙上印着一个十分滑稽的大人的光圈。拧,拧,拧,想把光聚起来,结果是把头直接拧下来算了事。这电筒让我想起我的小说里那个猥琐龌龊的小男人的新婚之夜干过的勾当。

“搞啥?”

“媒婆说你还是个姑娘。”

“你不信?”

“不信。”

“咦,冰凉,咋了还打电筒?”

“嘿嘿,你忘了我是赤脚医生?”

……

小男人在新婚之夜检查新娘是否处女,结果被剽悍的新娘从被窝里拎出来,追打得抱头鼠窜。剽悍聪慧健康和不满现状的新娘,是我小说中一个理念化的人物。她参加扫盲班,极喜欢听知青孔秀才讲革命形势,“中国很大,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中国是世界革命的中心,世界一片红等于是共产主义……”如此这些了不得的学问。不懂革命,他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不懂温良恭俭让,不懂雅致,不懂文质彬彬,他引经据典旁征博引说得面红筋胀,逗得大家笑歪了脸还是不懂。他就说总而言之,就是不要软软蔫蔫羞羞答答乱七八糟没文化。这个渴望文化的农村妇女诱使有文化的白净知青跟她生个孩子,结果生了个手脚不全的早产儿。一切都不和谐,一切是希望中的失

望，一千七百万知青，所谓文明火种的传播者，何等的苍白和贫弱，无论是想在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英雄，还是一来便心怀鬼胎的懦夫，都与这乡村社会毫不相干。后来看见那些连滚带爬、一边窥测着一边诅咒着从农村逃回城市的人，惊魂稍稍安顿下来，在城市福利的保障下，写着“青春无悔”、“改天换地”又酸又涩的文字，真是让人肝疼。他们用一种脱离险境后的浪漫情怀，用一种怜悯意味的人道主义，用一种涂沫了淡淡胭脂的怀旧，去祭奠青春的躁动，祭奠狂热的革命激情，祭奠被政治家充分利用了的纯洁无瑕的信仰，去书写可能是最人道也可能是最不人道的文字。

这次湖下村的访问，没有惊动地方，神不知鬼不觉地潜游到大海的最底层。我也不想惊扰邹斌仔一家原有的生活秩序。当晚，我请邹斌仔过来，开了一张生活必需品的清单，请他第二天务必购买到。他一接过单子便笑了：

a:三斤煤油；

b:两本稿纸；

c:马灯一个；

d:暖水瓶一个；

e:脸盆一个。

我把全部生活费强塞给他。

严格说起来，这种做法，有点伤主人的自尊心。可也顾不得许多了。冷不丁来一个壮汉，住那么长时间，伙食不能像平常那么凑合，对一个农村家庭压力之大，可想而知。

一位朋友的“尼桑”客货两用车把我送进村时，夜幕已经降临。十八年前的这个时间，我们的解放牌卡车堵在了进山的路上。川西北的雅安，人称“雨城”，当地人说，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三百六十六天都在下雨。天，永远哭丧着脸。进山的路，多处塌方，只好暂时把汽车和行李寄存在路边的茶场，我和父亲赤脚淌

过陡峭的险段,赤脚步行了好几公里才到家。对我来说,这不过是一次充满了刺激的乡村旅行。

与湖下村的平原浅丘陵景观不同,雅安下里简直可以说是个世外桃源。进山,半山腰一条土石路“极狭”,悬崖峭立,飞瀑直下,怪石嶙峋,激流轰鸣;越往前走,山越高,水越急,惊猿之声,凄厉贯耳。下着大雨,迎面而来的是那黑暗中越来越没有出路的压力和恐惧,恍如处处都是不怀好意的怪笑。如果是白天行走,至十六公桩处,忽然“豁然开朗”,一块与世隔绝的河谷地带一望无际,来往行人,着青衣,颇安祥,此呼彼应,与世无争;阡陌桑田,野鹤衔绿,美女如云。湖下村有蒙水,下里有蒙山,蒙山蒙水,人生机缘。古书记载,“扬子江中水,蒙顶山上茶”。蒙山云雾下,有后扬溪碧绿蜿蜒。下里的美女,又多生于后扬溪畔。一位一九六六年插队、因成份问题不能出山的老知青,偕我到后扬溪寻美,果然是明眸流盼,身姿婀娜,肤色红白娇嫩,如同画中梦境,令人心旌摇荡。堂哥拿我逗乐:“三弟弟,给你在下里找个新娘子如何?”

堂哥是个有幽默感的人。他早年跟随父亲在外面读书,六十年代初,读完高中回乡是乡村里的秀才。一天早上我刚洗完脸把毛巾晾在竹竿上。他冷不丁发问:“三弟,我们一家九口人洗一张毛巾,用一年,你一个人洗一张毛巾,是不是该用九年?”这种怪问题,让我一时语塞。

第一天,晚上睡得不太好,一早起来,便把湖下村看了个明白。“湖下村”,有枳湖而居湖之下,故名。枳湖,说起来是湖,实际上是一方弯曲狭长的水面。农闲,早上正好睡觉的时间,路上不怎么看得见人,我正好能每天起早放心大胆地到湖水畔解手。天上看大雁飞,水下看鱼儿游,十分清新惬意。城里人到农村,上厕所是第一不习惯的事情,放不下架子来,真有憋出毛病的可能。下里的厕所与猪圈在一起,一个长方形的粪池上面养猪,留

出一条空档,搭一块板子,刚来的人不懂,角度不对,会溅一屁股恶臭的粪汤。那情景,让人尴尬不堪。“三弟弟,揪一把草甩下去,尿尿就溅不上来了。”嫂子教我。嫂子是生产队妇女队长,可以说,就是生产队的妇女领袖。她教了我很多东西,第一条就是不要出人力流大汗地傻干。我干农活从不偷懒,虽然很不得法,但是态度十分认真,几天就能挖断好几把锄把,手掌满是血泡,钻心地疼。回家热水洗手,“哎呀,疼死我也!”她看人不注意,附在我耳朵上说:“三弟弟,你傻的,锄头高高举,轻轻落,挖几锄,歇一下。”那这些地什么时候才能挖完?我对她这种劝告非常反感。“你傻的,看大家哪个好好干。”她在旁边嘀嘀咕咕。“这种干法,伤了力,毁一辈子。”当时我实在是搞不懂,贫下中农的觉悟尤其低。从理论上说,人民当家作主人,国家也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可是眼前这些人民公社的社员、土地的主人,干活都是懒洋洋的,而且,毛主席教导我们说:“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可在这种懒洋洋的气氛中怎么接受再教育?每天上午九点都能听到工作队长扯破了嗓子喊“上工喽——”,能在一小时之后陆陆续续到工作地点就不错了。队长本人也是喊完上工后,再回去睡一觉。有一段时间让我吹哨喊工,大家慢腾腾的样子,直让我的心头之火冲脑门子。大家好像对什么事情都不在乎,什么事情都见怪不怪,在那种麻木不仁、逆来顺受的后而,好像有一种洞察一切、倔犟和世故支撑着。那种耐心,好像是用故意拉长的生命过程来与整个社会作赌。在这场赌局中,所有的人都笼罩在一种心照不宣和自欺欺人的默契气氛中。天晚了睡觉,天亮了起床,生孩子有计划生育,种庄稼有公社的喇叭手把手地教。还有毛主席教几亿农民如何节约用粮,大意是,忙时吃干,闲时吃稀,忙时吃三顿,闲时吃两顿,粮食不够,夹以瓜果豆菜之类。我插队时正是秋收季节,抢割水稻。烂泥田中割稻,要有高超的行走技

术,或者说要有高超的行走艺术。光脚丫,只能穿短裤,必须侧着踩倒五六寸高的谷茬,才不至于陷进烂泥中影响进度,才不至于让谷茬划伤了脚。走得好,如草上飞。我一天下来,便是伤痕累累,血迹斑斑。伤痕为老鼠尿中的钩端螺旋体进入血液提供了方便。那时候,钩端螺旋体可是要人命的疾病,而且症状与感冒极其相似,发高烧,畏寒,浑身乏力。不少知青死于这种恐怖的疾病。我从水田直接去了公社,刚好县巡回医疗队在乡场上住着。我浑身都是泥点,戴着顶破草帽,洗白的蓝卡叽布衣裤,脸黑瘦,加上长得就像农民,那位在县里颇有名气的医生,手把脉,眼不抬,话不问,开了些清热解毒之类的药,两三分种就把我打发了。他可能心里想着,“你个农民崽子,早死了好”。他的态度和差点置我于死地的结果,真是让我受教育匪浅。病愈后,生产队长交给我一份差使,就是用毛笔和红纸给几十户人家抄写一份毛主席教大家节约用粮的语录。当时想,毛主席他老人家真伟大,不仅日理万机,管国家大事,而且还事无巨细管到了家家户户吃喝拉撒睡,像是一个大保姆;而全中国的农民像是一群永远长不大的孩子,虽然在这块土地上繁衍了数千年,从种粮食生孩子,到农闲农忙时家政安排,都要教。我怎么来到了一群孩子中间了呢?把这些语录贴到农民家里,农民会是一种怎样的心情贯彻执行最高指示?但愿都虔诚不二。当然,不贴也要贴,这是上面的决定。别人家贴在哪里我不知道,我家贴在屋子最显著的地方。这毕竟是我的“墨宝”,多少有点炫耀的意思。其实,我家完全可以不贴,因为我家祖传的几代都会精打细算,通常情况下,农村中地主、富农、上中农、中农成份的家庭,绝大多数是精打细算、省吃俭用的,在有限的资源状况下,很难通过所谓“剥削”暴富。他们与原始积累时期的资本家不同。他们甚至是资本原始积累的对象和牺牲品。当然,这是个一两句说不清楚的话题。

二

秋天收获的季节,差点给卢氏家族带来灾难。把收获与灾难并在一起,实在是不合谐。无论如何,对于农家来说,收获是一种生命的高峰体验。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从播种、浇灌、施肥、打虫、除草到收割,“土、肥、水、种、密、保、管、工”,整个过程充满了期待和焦虑的心理张力,人们不敢肯定,他们的辛苦劳动一定会有一个良好的结果。大家都很清楚,在经济实力和保障体系非常脆弱的情况下,所有的劳动和围绕着生存的其他社会行为,都带有某种宿命的成分。“老三(我在家排行老三,家族内便这样称呼我,以示亲近),你说人定胜天吗?”一位家族的老辈在田坎上休息时,一边裹着什邡旱烟,一边问我。没头没脑的一问,搞得我发愣。在我们的教育背景中,这几乎就是一个常识性的问题。在灵魂深处闹革命,人的所谓“主观能动性”得到充分扩张的年代,这哪是问题。“你说呢?”其实我从他的发问,已经知道了答案。“胜个球!”他不动声色地说。后来我才渐渐明白,自然界和社会中的任何一种因素,都可能把农民一年或数年的希望摧毁。从这个意义上说,数亿农民真可以说得上是一群价值观相当稳定的理想主义者,他们的目标指向非常清楚。他们为收获或者没有收获的收获而活着,他们为希望或者没有希望的希望而活着,绝不会因为一时一事而放弃未来新一轮的播种与收获,哪怕是悲剧性的努力。为此,他们很看重耕作的每一个过程,甚至过程中的每一个细节,在生产方式没有根本变化的情形下,忽略和放弃某一个关键细节,将意味着技术的退化和传统的丧失,将意味着会被这块土地淘汰出去。他们必须走到终极点,去拿到与自己的努力相匹配的尽可能多的粮食。为了粮食,为了土地,他们可以同仇敌忾,献上自己最优秀的子弟,献

上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去征战,去拼杀,决犹豫。这个时候的粮食,已经不是仅仅能果腹的物质了,已经变成了一种至高至尊的图腾物,一种全部物质和观念形态的承载体了。在这秋收季节,就像是广阔的原野上倒翻了一坛百年历史的美酒,“哗啦——”,醇香的气味弥散开去,把人变成了满地爬的醉蟹。满坝子厚厚实实的杂交水稻在微风中左右摇摆而不能安稳。把一尺多长的玉米掰下来,把皮一瓣瓣剥开,能看见一群可爱的胖小子一个挨一个地推搡着挤在一块儿。当我换成了农民身份在这片神秘的土地上浮想联翩的时候,周围农民的眼神是一片茫然,似乎没有陶醉在所谓“丰收的喜悦”中。几十年的经验告诉他们,粮食没有真正吃到嘴里之前,好像都不属于他们。他们知道,县里几天前开完了一年一度的“三秋工作会”,马上就会有一大批干部组成的三秋工作队下乡,他们必须带着笑脸迎接他们的到来。我们站在青衣河这边,看着河那边公路上三秋工作队的解放牌大卡车红旗招展,锣鼓喧天。乡亲们的眼睛冷峻得吓人。一个太祖辈的生产队副队长在我旁边冷冷地说:“老三,你看他们像不像催粮队?”

“催粮队?”我大吃一惊。三秋工作队与催粮队有天壤之别,怎么能视如一物呢?前者是帮助农民,后者可是勒索农民呀?这是我的经验中绝对没有的概念。我似乎闻到了政府与农民之间的火药味。

我想问个究竟时,太祖铁青的脸色,把我涌上喉咙的话给堵了回去。

更令人吃惊的是,太祖与我之间几十秒钟的低声对话,不知道怎么就传到工作队的耳朵里。我也没有想到,工作队已经密谋以这个事件和我为突破口,揭开生产队阶级斗争的盖子,调查清楚风传的瞒产私分的严重问题,然后整顿和改组生产队领导班子。直到今天,谁也不知道密谋的时间和细节,总该是当天晚

上吧,因为当天晚上工作队就进了村。听说这个密谋会开得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和十拿九稳。他们分析我初来乍到,纯洁幼稚,而且根红苗正,定会与工作队合作。

我家门前有一股无名小溪,发源于后山岗。穿行于翠竹俊杉之间,清纯碧透,乡里世代取汲于此。傍晚时分,牧童归来,家家炊烟袅袅。我在溪边洗脚,从对面走过来一位干部模样的陌生人。

“你是卢跃刚同志吗?”

“……”

“我是工作队老吴。”陌生人见我不知所以,自己介绍说。

“哦。吴同志。”

“我们聊聊。”

他有点神秘。我不知道他想跟我聊什么,但看得出绝不是家长里短。关心知青生活困难?我没什么困难。我们这届知青,多谢党中央考虑在先,在插队的头一年,每月有十元钱生活费,每月可到公社粮站买三十三斤平价商品粮。

“是不是有个队干部跟你说过些什么?”

“说过什么?”

他神情严肃,弄得我直发懵。

“好好想想,昨天在沙坝田?”

“……”一听到“沙坝田”,当时的情境便翻到了眼前。我吓出了一身冷汗。虽然我并不能同意太祖的结论。我的家庭,我所受到的教育不允许我同意。但是,我明白,一旦工作队查实,其政治后果是相当严重的。

“我们知道你的情况。希望你跟组织讲真话。”他说。

“我什么也没听见。”

有一种本能在支配着我。这话好像不是从自己嘴里说出来的。

“他问你什么？”老吴走后，堂哥问我。

“问昨天沙坝田太祖的事。”

“你怎么说的？”

“我说没听见。”

我为我的撒谎沮丧。对于一个政治狂热的青年来说，这个谎撒得可够大的。

没想到，堂哥盛赞我的举动。

没想到，我的举动受到整个家族的尊敬。走在路上，人家都用奇怪的热情和信任的眼光看着我。我受宠若惊。后来我才知道，我的举动使家族避免了一场灾难。

从此，家族把我当自己人真正接纳了。

三

局势的严峻完全出乎预料。五十年代，为了加速一个新兴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强制实行了粮食和其他农副产品的统购统销政策，以牺牲农民的利益为代价，进行了残酷的原始积累。十年浩劫，国民经济已近崩溃，几乎全靠农业来支撑。然而，农村在人民公社的体制下，生产的潜力和总量是非常有限度的。于是便有了新的名目，除了法定的公粮外，加征“超产超购爱国粮”，从农民的口中再拿走一部分。所谓“超产超购”，实际不“超产”也要“超购”，勒紧裤腰带“爱国”。农民不够吃，饿死人也在所不惜！我去找公社书记理论。公社书记吓得关上门，压低嗓子警告我，“这话只对我说，只我们两人晓得。千万不要对外人说”。原来，前不久的县三秋工作会上，一个公社书记反抗“超产超购”指标，已被撤职并隔离审查。“我们生产队今年减产嘛！”我说。“你年轻，不晓得其中利害！”他是关心我，害怕我因此酿成大错。他也不同意这种掠夺式的作法，但是在会上不敢发言。

农民生活的真实情况与宣传差距如此之大,让我大为震惊。我所在的生产队,一个壮劳力一天才值三角一分,而且还是理论上的。因为三角一分钱,是指干满十分工的价值。在工分结构中,每天全劳力的满分是八分,如果加上早工二分,才可能挣十分工。而生产队没有特别的情况,绝不安排早工。也就是说,一天实际上挣不到三角一分钱。别的生产队更惨。有的一天挣一角三分八,刚好够买一斤平价大米。最少的一天才值五分钱!湖下村原来也是穷得叮当响,每天十分工不到一角钱!如果老老实实按照上面的要求去做,非饿死不可。而且,我刚到农村时,已经听到饿死人的消息了!这种严酷的现实,对于一个立志到农村改天换地的共青团员来说,对于一个满怀着革命热情和理想的青年来说,可谓是惊心动魄。无论如何我想不通,怎么会弄到这般田地!

为了生存,农民开始跟上级玩着猫捉老鼠的游戏。

我不知不觉地进入了这场游戏。

为了防止农民在秋收时瞒产私分,政府除了派三秋工作队监督外,还规定各生产队必须有个知青参加分配小组。一个月一次的公社知青大会上,公社书记讲,知青参加分配小组后,要坚持原则,坚决维护国家利益,敢于与那些不良现象作斗争。

公社的指示,当然要认真对待,否则分配方案无效。问题在于,进入分配小组的知青都要经过公社批准,有的是公社直接点名。本生产队的人选,就是公社确认的。这个人选当然遭到了大家的激烈反对。最后妥协的结果是,让我替换了那个知青人选。

我记得非常清楚,那是个漆黑的雨夜。大家打着火把把第一茬稻谷抢收回来。仓库里点着马灯过秤。我在旁边记账。

人都走完了,喧闹的仓库此时静悄悄的。只剩下队委会的人和分配小组的人。大家你看我,我看着你,都不说话。我预感

到马上要发生什么事情。已接近午夜,外面的雨越下越大。雷声“呼噜呼噜”的,总是炸不出脆响来,像是个喉管里卡了痰的肺气肿病人。一道闪电由大门闯进来,把每个人从黑暗中扯了出来,大家仍是无动于衷,任大雨磅礴雷鸣电闪,凝固成了一组雕塑。

大家好像都心照不宣地等待着什么。

仓库保管卢登贵,曾是多年的生产队长。他的一只眼睛不太好。只要一说话,就像是在笑,有一肚子主意,有一肚子让你捧腹的故事。本队有个知青,家里父母是城里某农学院的老师。卢登贵当队长去的时候他给一碗挂面卧四个荷包蛋,晚上留宿,享受新被褥的待遇;当仓库保管员去时一碗挂面后,一杯清茶,请你走人;第三次去时,他暂卸了队委职务,赐喝一杯白开水,请你走人。所谓的“三进农学院”。这个故事有无演绎不可考,但是流传很广。眼下,他虽然不是队长,但他在队委会是绝对的核心。拿大主意的都是他。他不紧不慢地卷着一支旱烟,然后安进铜烟嘴。用火柴点烟。他突然把我手里的记账单抓过去用点燃烟后的余火点着。大家都呆呆地盯着火光。他拎着账单的一角,一直把指头烧出了糊味才松手。

他把还剩下一大截的旱烟头拔下来,使劲扔出门外,起身拍拍手,喝了一声:“回家”。

随这一声喝,在场的人,个个身轻如燕,窜出门去,融化在黑暗中。

只有我傻乎乎地坐在那里,不知道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看着纷纷落地的纸还发呆。卢登贵叮嘱我:“今晚的事,不要对外人多嘴。”

我把这些故事讲给湖下村支部书记听时,他笑了。他在湖下村当了十八年支书。从他的笑,可以判断出,他也是这方面的行家里手。

“你不认为这游戏玩得干净?”我问他。

他一脸的世故,笑而不答。

四

十八年后,又把我与粮仓放在了一起。

我注定要夜夜失眠了。

“这屋里的老鼠,有一个加强排。”我跟邹斌仔说。

“至少有一个加强连。”他说。

“为什么不养猫?”

“猫?”

我问黄土岗镇镇委书记杜水源:“对老鼠一点办法都没有?”

“没有。严格地说,不是对老鼠没有办法,而是对人没有办法。我们镇里可以出钱买鼠药,可以统一规定灭鼠时间,让全镇动员起来,可是有人借机去毒杀邻居的鸡鸭。”杜说。

“这是理由吗?”

“那还有什么别的理由呢?”

杜水源领我去见付下村村支书付建年,说,该支书年轻有为。

付刚上任做了两件事,一是在有限的耕地上改良种植结构,一是灭鼠。

付建年说:“我花了一百二十元钱请专家,二百亩地毒死了两万只。”

“两万只?!”我大惊失色。“唉,灭也白灭。我们村有五百八十亩田地,再说,老鼠都集中在村里,面积广大,拿它们奈何?”

据香港《明报》报道:

地球上并非只有“人口爆炸”。世界卫生组织(WHO)说,老鼠也正在经历一场“鼠口爆炸”,不少专家正为此忧心忡忡。

WHO 说,老鼠的数量现很可能已超过全球五十二亿人口。据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医学中心专家估计,美国的“鼠口”在过去二十五年里增加了 1.5 倍,现已达到 2.5 亿。研究表明,一只城市母老鼠每六至七周就能产十只小鼠。

联合国卫生专家托马斯·格雷则指出:老鼠的数量在工业化国家大规模增长已是无可争议的事实,在发展中国家也是有增无减。这位称老鼠为“人类头号四足天敌”的生物学家说:“更令人担忧的是,如今老鼠的食之丰美很可能是前所未有的。”

老鼠的兴趣并不局限于食物。据格雷说,老鼠似有一种不可遏止的乱咬一气的冲动。它们钻墙打洞,啃金属管道,对电缆尤其钟爱。格雷解释说,这也许是出于老鼠磨牙的需要。鼠齿每年约长十三毫米,不把牙磨锋利,老鼠就难以生存。

中世纪西欧的鼠疫曾使数百万人死于非命,一八九六年印度大鼠疫又使一千万人丧生,这两场瘟疫的罪魁祸首的子孙们今天仍在上窜下跳,传播着出血热、斑疹伤寒等几十种疾病。WHO 一九九零年对十二个国家的调查发现,当年因老鼠作祟爆发了大小一千二百五十起流行病。

在长达上千年的人鼠之战中,人类至今仍未能取得决定性胜利。

据中新社报道,广西一个村一次毒杀一百二十万只老鼠!

在这种无可奈何的事实面前,“时迁”就有充分的理由卧在我面前三尺远的地方不走了。“时迁”,是我为一只老鼠起的名字。这只老鼠非同小可,首尾加起来,足有两尺长!与瘦小的鼓上蚤不同,它身材胖大,能在很细的竹竿上健跑如飞,凌空跨跃,所有的老鼠似乎都对它恭而敬之,诚惶诚恐。它的个头,它的敏捷,它的傲慢,都足以证明,它是这儿的王!前面说过,我住在邹斌仔家粮仓兼卧室的里屋。这间屋子天经地义地成为老鼠窝。人鼠杂居,久而久之,老鼠对人便没了恐惧,生人进驻,那群老鼠

的眼神,顶多可以描述为“诧异”,然后就是“欣喜”,极而言之,“你顶多是只汤姆猫”。这里好像不分彼此,你的就是我的,我的还是我的。它们毫不客气地抢食书桌上的瓜籽花生,老鼠们各有所好,有的喜欢枕头边,有的喜欢被窝,有的则喜欢钻我的棉大衣袖筒和大挎包。白天如此,晚上更热闹。黑暗,是老鼠的天堂。首先可以肆无忌惮地磨牙。湖下村老鼠磨牙有两个去处,一是硬杂木做的床梆,一是水泥砌的粮仓。本来湖下村的粮仓是竹蔑做成,因为不堪“磨”,换成了木制,木制也不在话下,各家各户便不约而同地买了水泥、细沙和砖,砌得千秋万代百无一失。岂不知,鼠牙也随着粮仓材料的更替而进化了。“咯吱咯吱咯吱”,老鼠们顽强地啃着水泥墙,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啃得我牙根发麻,汗毛竖立。我和外屋的邹斌仔父子此起彼伏地敲打着床梆,企图制止这种无谓的令人心肝发颤的努力。可是它们根本不理,依然我行我素。“你们天天都如此吗?”我问。“那怎么办?”邹答:“没有办法”。光是啃床梆啃水泥墙倒也罢了,再加上发情交配期永无休止的撕咬和哀嚎,这下你才意识到,你真正来到了一个毛骨悚然的国度。

鼠王“时迁”总是在一旁静观其变,无动于衷,像是一个深谋远虑的思想家。

它爬在费孝通先生的名著《江村经济——中国农民》上不走,它不明白我为什么要带着这本书跑到湖下村来。

看不出开弦弓村与湖下村有什么关系。一九三五年,一九九四年,六十一年时间,可以完成一个由生到死的人生年轮了。它说。

变化和不变化。我说。

第四记 储备粉笔

一

洋洋数万言,还没有说到湖下村。

村支书邹春根翻出了他那小本本。他像对付所有上面来人一样,慢条斯理,胸有成竹。他当了二十二年支书,村里那点儿情况自然是烂熟于心,可是他不能让来人留下不郑重的印象。他把小黄皮本正着翻一次,然后再倒着翻一次,必然要在中间的某个位置找到所要的全部数据。“湖下村,由濯水埠、湖下村家、湖家脑、何家脑、付子星、新基村六个自然村组成,二百五十三户人家。因为年年都有分家,所以年年的户口都有不同。水田一千五百八十二亩,旱地三百亩。有人口一千零六十五人。人均上地一亩七分。全村有全劳力五百四十一人,其中男劳力二百九十一人,女劳力二百四十九人,半劳力九十三人,其中男半劳力五十人,女半劳力四十三人。十八至五十五岁的男劳力和十八至五十岁的女劳力统统为全劳,十六至十八的男女劳力、五十五至六十岁的男劳力统称为半劳力。分田地,半劳力比全劳力少五分之一。这么多田地,这么多劳力,可以说是半年辛苦半年闲。劳动力至少多余百分之三十。田里,地里,栏里,加上外出打工的收入,算起来,全村人均收入七百元,一九九二年上级要求上报人均收入是九百五十元,一九九三年上级要求要在一九九二年上报的基础上增加百分之十,也就是说要报到一千元以上。(注:就此事,我专门咨询镇委书记杜水源。杜说,这个码不是镇里加的,是贯彻地区和市里的批示精神。)”

“这不是浮夸吗？”我问。

“现在的事情，哪有多少扎实的哟！”邹春根不紧不慢地说：“上面要数字，我就给他们，要多少，我就给多少。人均收入反映生活水平提高啦。我问，到底填多少？上面也不明确说，只给一个比例，说你们自己算。我说，算好办，只害怕算不够计划和变化。干脆，我跟会计说，在人均收入表后面盖一个村委的章，所有栏目都空着，由你上面随便填。填多少都行。”

“收入都来自哪些方面呢？”

“主要是农业。村里没有村办工业，副业就是有些鱼塘，家家户户养些鸡鸭和猪。种粮食不赚钱哟。我来给你算一笔账，打一千斤干谷，按照一九九三年价格计算，需要投入尿素五十斤，三十元；钾肥三十斤，十三元；磷肥五十斤，七元五角；各种农药五元；水电费十元；村委管理费、农业特产税、优待金、五保户金、纯女户养老保险基金、印花税等等，共计二十六元，还不包括数不清的临时摊派集资；耕牛饲养成本，约四十元；人工费就不算了。所有的东西都贵，只有人贱，可以忽略不计。一九九二年以前，国家计划征购干谷，一百斤，二十一元，超购部分，一百斤，五十元。一九九三年，一百斤谷，四十元。所以，打一千斤干谷，理论上能收入是四百元。为什么说‘理论收入’？你还不知道哟，到粮站交粮，压‘水分’，压‘等级’，压得凶哟！”

“为什么不理论？”

“嘿嘿”邹干笑。“理论？农民哪个敢理论！”

“这不明目张胆地欺负人嘛！”

“习惯喽——”邹漫不经心地拉长了语调说。

村民何放生是全镇有名的种粮大户，说到收购干谷时不公平。“不公平，你们可是说呀。”我说。

“我们老表（在江西人的“老表”特指农民）哪个敢哟。”何说。

“谷子不干可以拿仪器测嘛。”

“你不满，要挨揍哟。他们会拿竹竿敲脑袋哟。”

“所以，仔细算下来，一百斤干谷，能纯收入百把块钱就不错了。这还都是好年景的账。一般的年景，天灾人祸，不亏，吃饱肚子，就算是烧高香了。”

· 据我所知，压“水分”、压“等级”还是小欺负，还不算是大欺负。生产资料价格的农产品收购的“剪刀差”才是大欺负。经济学家杨德明先生提供的资料说：一九四九年至一九八二年，国家通过“剪刀差”这种不公平交易的方式从农民手里拿到的钱，等于一九八二年国有固定资产的总值。粮食少了，强行征购，甚至不惜牺牲上千万农民的生命；粮食多了，不收购或者压价收购，甚至有数亿元的“白条子”和“绿条子”，严重伤害了数亿农民的情感和生活！不公平交易，强行交易，强行欠帐。一切都是在肆无忌惮和赤裸裸的情况下进行的。资源非常有限的乡村社会，一方面人口膨胀，一方面是外部压迫，走入了生存绝境。竭泽而渔的后果是，“要资金没资金，要技术没技术，要人才，没人才，我们这块土地怎么发展？”邹说。

说到人才，光绪十年《邹氏重修族谱·跋》说：“有一代之人才，斯有一代之事业；一代之事业，必赖一代之人才。”

面对祖先的期待，邹春根数落着：“湖下村的成年人，文盲一百三十九人，小学文化程度四百八十三人，初中文化程度一百九十一人，高中文化程度四十一人。所谓小学文化程度的人，十之八九是文盲。”

绝对的贫困和恶性循环，构成了湖下村生存与发展的特征。更严重的是，种种迹象表明，这种贫困和恶性循环的状况仍在加剧。我请邹春根统计了一九八零至一九九三年湖下村非正常死亡人数，共有十八人，七个小孩被淹死，一个触电死亡，其余全部是上吊服农药自杀。自杀的人当中，有百分之五十是因为贫穷自杀。贫穷是一种疾病，在农村蔓延。而外部压迫，更是雪上加

霜。

二

农村发生的许多事情,在我们看来,难以理喻。

应该说,湖下村尊师重教,堪称典范。全村最好的建筑,是村办小学校舍。在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家家户户都吐了血,筹集了八万元,盖了漂亮而结实的两层楼。这在农村是极罕见的。学校在蒙河大堤下面。还没进村,老远就能听到学生唱歌一般的读书声,春夏秋冬都听到读书声,给郁闷的湖下村带来了一线生机。一九八五年以前,湖下村的孩子失学率是百分之二十,现在是百分之五。与其他地方比较,湖下村适龄儿童的入学率,是相当高的。严格地说,乡村社会对文化对知识是相当尊重的,甚至形成了某种程度的禁忌和崇拜。诉讼、契约、调解纠纷,往往仰仗于有经验有文化的德高望重的人。许多地方的农民,无论多么贫穷多么愚昧多么没文化,拉屎擦屁股,宁愿用竹片树枝鹅卵石,也不用印刷和书写有汉字的或者其他语言符号的纸张。以免因褻渎而殃及子孙。无论这些入学的孩子将来是否跳出农门,是否出入头地,毕竟有了可能和希望。

然而,仅有的这么点可能和希望,正蒙受着莫名其妙的褻渎。

在阳光明媚的校舍里,校长邹彪给我列了一个上级主管部门要求一年级到六年级小学生必买必读的书籍和刊物的清单。他说:“书太多,学生要用化肥纺织袋装上往家拿。”

我有幸地在此公布这份清单:

《爱我江西》

《小学生天地》(周刊)

《小星星》(月刊)

《中国出了个毛主席》

江西某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出了个毛主席》，十几万字，印数十万，二元六角一册，东摘西抄，编辑思想低劣，装帧印刷质量很差。这是一本小学生没有兴趣、也不可能读懂的书。上面强卖的理由冠冕堂皇，谁也不敢违抗：“纪念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还有一枚一元钱一个的劣质塑料毛主席像章。

“学生没钱怎么办？”

“人家早就考虑到这点喽。全部书款已经在教师的工资里扣除了。”

“这不是逼着教师去找学生要吗？”

“还能怎么解释呢？工资捏在他们手里。想怎么办就怎么办。”

“这招可真够损的。”

“他们可是借毛泽东的魂发了笔国难财！”

还有更新鲜的。

上级要求每一个小学生必须购买所谓的“防近视保健笔”。有两种型号。一至三年级购买两只铅笔，一只圆珠笔一盒装的，四至五年级购买一支钢笔、两支圆珠笔一盒装的，前者五元线一套，后者更贵些。

请看“防近视保健笔”的广告宣传词：

灵笔在手，童眸生辉。防近视保健笔与传统笔的最大区别在于笔杆设有三个与拇指、食、中指握点相吻合的固定的偏椭圆形球凹面，通过三个指穴的科学布局，将写字时握笔形成人为固定，确保了‘三个一’（握笔点与笔点相距一寸，眼睛与纸相距一尺，胸口与桌沿相距一个拳头）的正确写字姿势和良好的视觉环境，从而达到预防近视、斜视、颈椎变形等疾病的保健目的。该产品获国家专利（专利号 88205709·X），国家教委号 91(36)号、92(48)号文件决定在全国中小学推广使用。

如此科学如此有益如此美好如此过硬的产品,如果说它与传统笔还有什么最大区别的话,那就是,一、在它的包装盒上根本找不到生产厂家及其地址,二、需要通过行政力量强买强卖。

教师、学生和家長,惱怒而无奈。“我们到商店买东西,不好的东西可以不要。可是这些东西不要也得要。”

乡村民办学校成了假冒伪劣产品的倾销地和垃圾筒,成了由权力当伴娘的婚礼教堂。教师、学生和家長苦不堪言。

教导处主任傅义如说:“这些东西把一些家庭生活困难的学生从学校撵走了!这样怎么搞九年义务教育?这是相当矛盾的。”

乡村民办教育有一番苦水。

校长说:“九年义务教育虚张声势,义务教育,好像是农民的义务,而不是国家义务。国家把负担转嫁给了农民。我的工资是公办教师的十分之一,可是我的工作量,至少抵两个公办教师。我已经五十三岁,当民办教师二十五年。上面的老爷只要在牙缝中剔出一点来,我就可以转为公办教师了。”

在他们看来,“民办”和“公办”一字之差,却有天壤之别。转“公办”,是满头白发的校长梦寐以求的事情,因为这将意味着他身份的改变,意味着子孙身份的改变,和由身份而带来的一系列福利。

教导主任说:“民办教师的职业是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又是最可怜的职业。”

校长说:“为什么可怜?双重压力,又要教书,又要种田。乌黑的头发进来,现在已是满头白发了。年年盼,月月盼,天天盼,盼来了什么?”

一个学期,按规定,一个教师只有十八元钱的办公费。全校七名教师,一个学期只有五十六元办公费,自然是十分紧张,连维持起码的办公要求都困难。

他们终于盼来了上级关怀。

一天,他们接到通知,“给你们安排了些粉笔,你们来拉一下。语调很轻松很温柔。

这一安排不得了,安排了整整三箱!不是白给,要付钱的,一百多块钱!是全学期办公费的两倍!

三箱粉笔是个怎样的量的概念呢?

他们把柜子打开,把三箱粉笔搬出来给我看。一箱一百盒,一盒六十支,一箱六千支,三箱一万八千支。像是一支在雪地里整装待发的斯巴达军团。

有经验的教师告诉我,即使是粉笔虫子一样的教师,一年顶多用三百六十支粉笔。

这样折算起来,一万八千支粉笔够一个勤奋善书的教师用五十年!够用半世纪!校长说,湖下村村办小学七位教师至少够用十年!

又是一次奸商与权力的完美合作,一次完美的海盗式的掠夺!这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以往我们理解“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时,往往停留在政治文化的一个狭隘的范畴内,往往在无能为力的状态下,把它描述为“推进现代化的一种润滑剂”,以获得某种社会心态自欺欺人的平衡。我的朋友、著名摄影家谢海龙先生有一个梦:中华大地近四千万农村失学青少年都背上了新书包,踏着晨曦、踏着晚霞上学和归来;他背照像机,去拍健康可爱的脸庞,去拍阳光灿烂的课堂,去拍朗朗的读书声,去拍中国的未来和希望。为了这个梦,他从一九九一年开始,在一片靡靡、颓废和茫然中,走上了一条人生新旅程,用他的照相机,用他的热情和良知的眼睛,用他十分微薄的力量,去救助普天下的(当然包括湖下村百分之五)的失学儿童。然而,社会救助与社会掠夺,在乡村社会如此这般地纠缠在一起,让谢海龙和为希望工程奔走呼号的海内外仁人志士的举动,显得那么滑稽可笑。

三

在湖下村储备半个世纪用的粉笔,也许是有道理的。许多乡村干部推行某种政策遇到麻烦时,都会感叹,“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这些小生产者太应该接受教育了。早先的说法是,“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产生着资本主义”,甚至能导致“资产阶级法权”。这些东西讲给农民听,让他们百思不得其解。粮食被你们拿走了,价格你们说了算,跟你们不能讨价还价,你们随便定个什么名目,想怎么拿就怎么拿;而且种什么不种什么也由你们定,让种麦子就不能种玉米,偷偷的种了,你们也可以铲掉。开始把土地分给我们,后来说要搞社会主义,要组织起来。把一盘散沙聚成高楼大厦,办互助组,办初级社,办高级社,乃至要办人民公社,说是要奔向共产主义。我们认了。这都是为了我们好,让我们过上好日子,抛弃小生产的狭隘,走上共产主义康庄大道。谁也不会傻到放着康庄大道不走,去走死路一条的狭窄小道。我们翻身求解放,全托了你们福。谁要你们是解放者我们是被解放者呢?后来又说,“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荒谬透顶,还是要分田单干,包产到户,推行钱广(电影《青松岭》中的阶级敌人)的哲学,卖掉“大生产”(注:有一种香烟叫“大生产”,上面印着笑得花儿开的农民大嫂),恢复“小生产”。我们也认了。既然农村能被当作为一个大实验场,当然也能被当作一个大垃圾场。邹斌仔的哥哥邹小斌告诉我,县种子分公司通过镇政府强行卖给农民种子,跟《中国出了个毛主席》和粉笔一样,不买也得买。稻种自家已经买了,也必须再买种子公司的,种子多了只好自家吃,吃得我们心痛。种子的价格高出几倍!更荒唐的是,我们此地不种玉米,偏要家家户户买玉米种子,而且是发潮发霉的种子,不能种,人也不能吃,好几块钱一斤

的种子,只好喂鸡,鸡吃了拉稀。一九九四年,国家技术监督局抽查重要农资产品质量,农药平均合格率百分之六十四,农机零配件平均合格率百分之六十二,种子平均合格率只有百分之十九!

邹家的堂屋,右墙根一排都是鸡窝,养了一二十只鸡。第一天吃晚饭时,我背对着它们,相距不到一米,几十双眼睛在那暗处,盯得我脊背发凉。

第五记 捧鬼神·刨祖坟

一

邹柳芽是湖下村最穷的一户。

一间屋子,约有十二平方米,里面可热闹啦。一口猪,一只鹅,两个孩子,夫妻俩,一共六口活物,都亲密无间地生活在一起。在邹柳芽脸上看不见窘迫和苦恼的样子,整天都是乐哈哈的,天大的事情,心里都搁得住。他曾出去当上门女婿,1980年生了男孩,“男孩三岁时,在门前的水塘淹死了。孩子被淹的时候,塘边有人不去救,眼睁睁看着淹死。因为我是外姓人。那里穷,活不下去只好上山开荒,可是荒地的收成保不住,只好又回到湖下村老家。”在外面他不能安身立命,回来后,自然要尽其所能,穷尽属于他的空间,给他家里的所有活物以安身立命之地。进门左边有一块凹地,铺有稻草,这是猪窝,猪不在家,出去觅食去了。碗柜下面是鹅圈,鹅是丈母娘送的,把鹅安排得宽敞一些,第一有利于鹅的健康生长,第二,表示对娘家礼物的珍视和尊敬。鹅,心安理得地在里面卧着。谷仓上,是十六岁的女儿和

五岁男孩的床；里面挨着墙是他们夫妻的床。开始不习惯，渐渐地互相摸透了习性，大家各得其所，相安无事，全由着自然的状态。猪哼哼，人打酣，“鹅鹅鹅，曲颈向天歌”。柳芽家四口人，种五亩水田、一亩五分旱地，没有钱买肥料，六亩五田地，一季庄稼只施一袋尿素，再掺点牛粪和草木灰。“庄稼长得让别人看着发愁，足足能比旁边的庄家矮一头。”邻居插话说。湖下村的田地一年种两季，平均亩产一千五百斤，可是柳芽家的庄稼却少收一半，一九九三年交公粮，按指标少一百斤，猪一百多斤就卖了，卖了钱交罚款。连猪都觉得窝囊，临走时，拱翻了锅灶碗柜，拱翻了床上所有的铺盖，直搅得天翻地覆，一塌糊涂，然后才气喘嘘嘘扬长而去。当时谁也管不住，索性由它去，直待这头气得发疯的猪彻底破坏这兼鹅的卧室兼猪的卧室兼人的卧室兼厨房的原有的格局。“嘿嘿，挺有意思吧。”柳芽乐出一口黄牙。

村支书邹春根想让我真正了解民间的疾苦，所以给我推荐了邹柳芽。

“邹柳芽家在哪里？”我问。

“哪里有猪肉香，你就往哪里走。”邹斌仔说。

这是什么话。湖下村的赤贫户与猪肉香，根据种种迹象分析，本该是绝缘的两样东西，怎么能生拉在一起呢？

邹斌仔见我一脸的疑问，神秘地说：“你跟我走就知道了。”沿着一条窄巷，果然越往前走，越是肉香扑鼻。别说是邹柳芽“三月不知肉味”之辈，即是我等，也会馋涎欲滴。

揭开大锅盖，一锅的肉香喷涌而出，顿时满屋子热情洋溢。一锅肉足有二三十斤。柳芽拿着大铁勺，深深地舀了一勺，端到我面前，意思是我可以开怀品尝。

我很感动。可我纳闷的是，周围看热闹的人刹那间静悄悄没了声音，都瞪大了眼睛等着瞧即将发生的一幕。

邹斌仔附在我耳朵上说：“死猪肉。”

这一说不要紧,把我见到一锅肉的兴奋全给搅脏了。一肚子恶心,翻江倒海地往上涌,把嗓子眼堵满了。一时窘住,不知道说什么好。

邹柳芽戏弄我的这场小小的恶作剧,惹得哄堂大笑。

“死猪肉能吃吗?”我惊恐地问。

“怎么不能吃。”

“会不会生病?”

“生病?穷人有穷人的命,穷人有穷人的口福。”

“这病猪从哪里搞来的?”

“猪病死,人家埋了,我们去挖出来,剥洗干净,就煮了这么一锅。”

后来才知道,邹柳芽和他的穷哥们邹永明虽然是全村的最贫困户,却是全村吃猪肉最多的两家。几乎全村的死猪肉都被他们两家包了。人们知道他们吃死猪肉,有了信息便告诉他们。为此,他们远近闻名。

我真迂。人都穷到这份上了,还有什么可怕的呢。穷人命硬,穷人胆大。如果是大革命时期,邹柳芽等是极容易发动的,成为“革命”的主要依靠力量,更是理所当然。

还有实例。

邹柳芽家道破败,房子终年失修,雨季漏雨,外面雨有多大,屋里就有多潮。又没钱买瓦翻新。一个雨天,他急了,一气跑到村外,把菩萨神龛上的瓦全揭了。被淋花了脸的菩萨看着他,连起码的“对不起”、“谢谢”之类的话都没有,转身就走,直望着他瘦小精干雨中疾行的背影发愣,转而又无可奈何地叹息。柳芽此时也绝不可能转身再看一眼菩萨惨不忍睹的脸。

邹柳芽此举,震动了全村。当然,全村人也拿他没有辙。他神灵都不怵,难道会怵人么?邹柳芽不敢惹,菩萨更不敢惹。唯一的补救是,几户人家攒一些瓦,重新把神龛盖起来,然后,轻轻

忏悔几句安抚几句了事。

多少年来,屡屡亵渎神灵,已是罪孽深重,这座小小的菩萨龕,是近年生活略有改善、尽其所有来赎罪的结果。其虔诚,是有限度的。据邹氏家谱记载,刚进村,有一座很大的菩萨庵,香火很盛。五十年代末,在“破四旧”的革命口号下,菩萨庵被拆除,所有的大木头,被拿去炼钢铁;小木头,被拿去修猪圈,当柴烧。现在只能看到一片杂草丛生的废墟了。前些年,曾任村小组长(相当于原来的生产队长)的邹球根,组织了一个舞龙舞狮队,终了,要找个地方烧掉这些纸龙,结果是哪儿都不合适。按风俗,这些东西不是什么地方都能烧的。商量来商量去还是要去菩萨庵废墟烧。原因很简单,祖宗的社祭都是在那里进行的。承袭祖命,乃是天道。纸龙点着了,它随着熊熊火焰腾空而去。它在上帝面前,会讲述怎样的人间消息呢?人们有些忐忑不安,心里空空荡荡没有着落。

二

下里的那个村落也有同样的心情。

原来在青衣河畔的村口,有座高大壮丽的山神宫。原来只留下了一个地名。我回去时,说到山神宫如何如何,人们眼前只是一片平地,记忆中的一个轮廓,想象中的一种精神概念。和尚道士最先被撵走,紧接着的是宫中的泥胎神像,然后,古为今用,神为人用,山神宫充作了乡办小学,算是培养接班人,敬奉未来吧。“文革”期间横竖觉得这种“封资修”的东西矗在那里扎眼,与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气氛极不合谐,也不管它是否精良,也不管它是否庇护着最神圣的事业,一概铲除之。

生活中的神被请走了,然而,心灵中的神却无处不在。你看

不见它,却时时能感觉得到它。它居无定所,不能承受人间的供奉,甚至遭到了它诞生以来最彻底的唾弃和践踏。可这丝毫不能折损它存在的意义。旧的破坏了,新的在哪儿呢?破旧容易,一把火就可把几千年的遗物变为灰烬,可“立新”何其难哉!我曾经立誓要给这落后的乡村带去某种东西,向“旧的习惯势力”挑战。结果大失所望。一天晚饭后,我决定洗一次全家的碗。灶房里并排有两口大锅,一口煮饭,一口煮猪食装泔水。洗碗水应该舀进泔水锅,剩点儿锅底,用竹刷子刷过去。家里人都这么干。然而,我平常旁观时忽略了一个小小的然而是十分重要的细节。我把锅底的水刷过去的时候,想当然的在锅边灶台上“啪啪”拍两下,把水拍尽。没想到这举动招来嫂子的一声大喝:

“三弟弟!”

她一把抢过我手中的竹刷。一瞬间我什么都没反应过来,人家的动作都完成了。

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呆呆地僵在那里,不知所措。农村的晚饭,可真是“晚”饭,晚上九点才吃完。所以下里吃晚饭,叫“宵夜”。昏暗的煤油灯,映照着一家人对我的惊愕和恼怒。不多言语、十分宽厚的伯父,脸也紧绷着。平时全家人对我的宽大与和蔼可亲,此时都烟消云散。气氛空前紧张。我知道我闯了大祸,可我实在不明白,祸到底闯在哪儿。

“刷子不能在灶台上打!”嫂子说。

“为什么?”原来如此!我以为犯了多大的事呢。

“为什么!为什么!不为什么!就是不准打!”嗓门还是那么大,震得顶棚的灰尘往下掉。她对我的漫不经心更加不满,口气不仅强硬,而且在我看来,根本不讲道理。

“总有个原因吧。”

“……”见我逼得紧,她倒有些犹豫了。

我见她犹豫,便得寸进尺,一定要她说出不准打的理由。

“打走灶王爷怎么办?!”她脱口而出。

“灶王爷?”我觉得挺滑稽。这与我们的唯物主义无神论教育相距十万八千里。我也知道她的犹豫,是因为她当着生产队妇女领袖,照猫画虎地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宣传上级精神,这种理由实在与她平时的形象不符。这也让我吃惊。我人生第一次意识到,在一种特定的社会氛围中,一个人可以驾驭着两只价值标准完全相悖的帆船同行,一只“真”,一只“假”;一只“实在”,一只“包装”;一只天上飘忽不定的薄云,一只亘古不变的土地。以现在的眼光看,绝对不敢冒然对这种社会行为作出是非与否的判断,因为这是人们真实的生存处境。问题在于,当时的社会似乎只给我们一处异常的明确敞亮、毋庸置疑的价值观,我们的脑子里根本没有储存“灶王爷”的概念,以及这种概念可能给我们周围的生活带来什么影响。我故意用一种夸张的动作环视灶房黑暗的四周。“灶王爷在哪儿呢?”与其说寻找灶王爷的存在,不如说在证明灶王爷的不存在。我想笑,但是不敢。那种气氛下,笑出来,全家人非跟我炸了不可。

我的眼神在问“灶王爷在哪儿?”我的直接发问却是:“灶王爷有什么用?”

“有什么用?人不生病,房子不起火,鸡鸭猪狗长好,家里平安无事,这都是靠他保佑!打走了灶王爷,谁来保佑!”

这种解释更让我摸不着头脑。这种解释,显得那么陌生,那么遥远。我想告诫她,她已经不知不觉地把别的保护神给漏掉了。幸福生活的保护神怎么可能是看不见摸不着的灶王爷呢?真是荒谬。

然而更荒谬的是,这颇有文化的堂哥,也对我这种漫不经心的态度表现出了不满。他说:“你应该尊重大家的感情。”我说:“这怎么能说到尊重感情的问题呢?”他后来跟我说:“有些事情说不清楚。”“怎么说不清楚?”我不服气。他诡秘地笑了。这笑

里好像是说,没有必要告诉你这个涉世不深的家伙。

我只是隐约感觉到,乡村社会由一种根深蒂固的东西支撑着,但是可以肯定,这种东西不是大家天天都能拿到台面上来讲的东西。

我陷进去了。从此,我的心灵时刻都在忐忑。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又会触犯某种禁忌。

三

湖下村一带有一种非常奇怪的风俗。

我在村民邹木根家,刚好遇到他家的“猪婆”下了十二个猪仔。在农村,看家境如何,首先要看猪圈里的猪长得如何。到圈里一看,好家伙,齐崭崭一群两尺多长的小猪仔,活蹦乱跳地围着健康的母亲转。十二头,一色雪白!母猪不管不顾地“嘤嘤”吃食,小猪在下面叽哇乱叫抢奶。

“这小猪长得真漂亮。”我不禁赞叹。主人听见夸奖,不仅没有任何的高兴或者客套的表示,反面绷着脸惶惶逃窜了。

我仍在放肆地夸奖着,陶醉在这种生命旺盛的农家乐中。

“邹斌仔快来看,那头小猪被挤跑了。”

给我当向导和翻译的邹斌仔轻轻地拉我的衣襟,说,“别说了!别说了!”

“怎么了?”我看见神色紧张的邹斌仔十分不解。

他一面拉着我,一面跟主人打着招呼,“我们走了。”

出猪圈,到了没人的去处。他告诉我,这里的风俗,不能当着主人家的面夸奖他家的孩子或者牲畜长得好。当地人认为,这种夸奖无异于诅咒主人家的孩子或者牲畜早早完蛋!

吓出了我一身冷汗。主人刚才饶了我个“不知者不罪”,否则,非跟我拚命不可!

后来,我在《清江县(注:后改为樟树市)志》中看到了这种禁忌的记载。如果要夸孩子长得好,就说:“长得像猪、狗仔样。”这本一九八九年编制的县志,在叙述完当地“禁忌”后,说:“解放后,破除陈规陋习,代之以社会主义新风。”“新风”都是些什么呢?县志列了六个方面:敬老养老、救死扶伤、文明五好(注:何为“文明”,何为“五好”,都没有解释)、科技致富、观念更新、自学成才。有意思的是,列举的“新风”像是县新闻干事写的六篇表扬稿,与前面说到的“陈规陋习”根本没有一一的对应关系。严格地说,传统社会对这六个方面的精神内核都不排斥。那么“新风”从何吹起呢?

“新风”曾经吹过下里。“下里巴人”也曾参与其中,无论是愿意不愿意。拆庙铲巫,婚丧嫁娶,打击宗法势力,疾风暴雨式的移风易俗,我都没看到。可能与传统冲突最大的是四个字:科学、民主。前者是“精神”后者是“制度”,二者互为因果。“民主”之风暂且谈不上,“科学”之风处处都能感受到。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农民把我们这批知青当作了文化知识和科学技术的化身。凡有这方面的事,都由知青充任。

一九七六年,县里要搞科学养猪实验,给中里区拨了九千元钱,上里、中里、下里各选一个试验点,各分三千元。下里的点,选中了我们生产队。我们生产队靠河边靠公路,还有一块叫“小坝子”的平地。

“科学养猪场,跃刚去。”爷爷辈的卢贵泽队长说。

“跃刚有文化,又是队委员会的,可以加强领导。”曾祖辈的保管员卢登贵附合说:“再给他配几个好石匠。”

前面说过,卢登贵说话,像是寓意深远地笑。是他教会了我怎样瞒产私分。然而,这次说话,他可是真的笑了。笑上加笑,“笑”得更加复杂,更加寓意深远。在座的所有队委会成员都清楚,三千元白天而降,对于一个天工值三角一分钱的穷队来说,

是笔不小的数字,而且是现金,专款专用。可是大家都清楚,双排二十四孔科学猪场(注:标准的说法是:圈洞式养猪。),三千元钱,顶多够买水泥沙石料。掰着手指头算,自己有石匠,人工费可以省,自己有杂木材,模具费可以省;可砌墙基用的石料,需要好几十立方,第一,自己的地界内没有石料可供开采;第二,买,钱不够;第三,生产队的公积金是赤字,根本无法贴补。汇报上去公社早就为我们考虑好了,“可以就地取材嘛”。

一听就明白,“就地取材”是什么意思。生产队占着下里很大一块风水宝地,原来方圆几十里的大户人家,精彩的大坟都在地界内。公社在把项目安排给我们的时候,想必已经充分考虑到了这个因素,所以配套给了“刨祖坟”的政策。上、中、下三里(“里”,是很古老的行政区划,可以追溯到两三千年前。)都给了同样的政策。否则,这台戏根本唱不成。

“万一坟主找来怎么办?”问公社。

“让他们来找公社。移风易俗,支援科学试验。你们大胆干。”公社说。

即使如此,队委会里面,除了我以外,谁都知道,刨人家祖坟,是伤天害理的事情。别说刨,正常的年代,碰人家祖坟上的一坯土一根草,都可能导致世代的冲突怨仇。大家都不愿出这个头,便各怀鬼胎,十分默契地把这重任交给了我,——一个只有十八岁的热血青年。

开队委会研究,是个晚上。天气好冷。我打着电筒来到队长家。其他人都来得早,我稍晚。我兴冲冲坐下时,发现周围的人都蜷着闪闪地抽旱烟。静悄悄的,有些异样。风吹斑竹,萧萧作响。其他人来得早,似乎已有默契。他们已经挖好了坑,就等我往下跳了。

这种把戏瞒不过家里人。家里人坚决反对。“三弟弟,那些坟挖不得。”但是又不好明说挖不得的道理。所以,家里有反对

意见,被我视为封建保守思想,一笑置之。农村生活本来就沉闷困苦,盖科学饲养场,可谓是一个造福乡里的崇高壮举。当时,无论是理论上还是道德上,我都没有心理障碍,更何况,还有公社做坚强后盾。

我领了军令状。而且发誓说,一定要与中里、上里的试验点比个高底,盖一个一流的科学饲养场。

为了小坝子科学饲养场,我倾注了全部心血。我翻山越岭,到四十里外的名山县购买石匠用的工具,几十斤重,一步步背回来。我与公社派来支持工作的一位半脱产技术人一块,到别的公社和外县学习人家经验技术,绘制草图,回家后,征求石匠们的意见,最后修定。

全部准备工作就绪后,接下来就是取石料了。

“从哪座坟开始呢?”我问大家。

大家面面相觑,谁也不愿先说话。

我无法忍受这种沉默,又问:“从哪座坟开始?”

才有人说,先就近处的挖吧。

大户人家的坟都讲究。根据社会地位和富裕程度,通常分为三个级别。

一种叫“生基”:由两块五寸厚、丈余长的整砂石板作墙(叫“整壁”),两块石板堵头,三块或者五块石板嵌盖,所以又区别为“三盖生基”和“五盖生基”。这种坟比较简单,完全裸露于地面。如果是夫妻合葬,扩宽堵头,中间再加一块“整壁”。

再好一点的,“生基”外,加“圈墩”,团团围住,用土覆盖夯实。正面竖大牌,正门两侧石板镌刻人物花草,或者镌刻诗词。

更好的,“圈墩”外有数根“围杆”。所谓“围杆”,是一些约十五公分直径的石柱子。十分气派雄伟。

这些坟,看起来都裸露在明处,但绝不是轻易能打开拆散的。刚开始的方法是硬来,十八磅大锤猛砸堵头的大门,结果是

纹丝不动，门上留下一片令人绝望的白麻点，像是在嘲笑这些胆大却愚蠢的掘墓人。大锤砸门的“空空”声，在桃花园般静谧的阡陌桑田上流动，引起山峦间撕心裂肺的回响。路过的行人，都要停下来看一看，眼神十分复杂。有惊诧的、有恐惧的、有鼓励的、有幸灾乐祸的、有漠然而视的。漠然而视最可怕，这种冷冷目光，既与你保持着某种距离，又咄咄逼人。这种目光最具有挑衅意味，随时都可以从这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许多人家从此睡不安宁了。很长一段时间，几十公里长的河谷地带，笼罩着一种不安的气氛。人们仿佛在等待着我们打开地狱之门，等待着报应，等待着灾难降临。

那时的我，无所畏惧，自有一种更高的道德感在支配着我，鼓舞着我，召唤着我。

这种干法不行。

我先请石匠给我讲“石经”。他们告诉我，一般做生基的整壁和盖板岩石，叫“豆沙石”（地质学称为“沙岩”），极有灵性，都是从几十里路远的山上取来的。取石讲究纹理品性，顺之者，完美无缺，材尽其用；逆之者，纵然使出多少蛮力亦是玉石俱焚，徒劳而无功。因为是取先人百年之石，石匠自然要平心静气，不敢稍有懈怠。择那万物更新，草木茂盛的季节，百鸟清唱，地气滋润，方能取得上品。打造时，一般粗鄙浅陋、品性不端的石匠根本沾不上边，只能打个下手，旁边听喝，恐怕玷污了虔诚。整壁里外两面平滑整洁，工艺要求严格，手摸上去，不起伏，无妨碍，经得起任何方向“吊线”检验。石料选好后，更要挑那胆大心细身材高大的精壮抬工，大碗地准备酒，大块地准备肉。一块整壁，一两千斤重，中间一根主杠，两边三根偏杠，八人大扛，一路抬来，号子声，直吼得地动山摇。

地基、整壁、盖板，三者镶嵌，严丝合缝，再加上掺了上等桐油的精白石灰勾缝，更有甚者，还要覆盖卵石、桐油、精白石灰混

凝土。可谓固若金汤。

下里出楠木。楠木木质细腻坚韧，率直挺拔，颇为珍稀。所挖的坟墓，都是一二百年的古墓，棺木大多用生长了上百年的楠木。与取石比较，当时取木不太难。老人们说，一九五八年以前，下里处处可见古树参天。之后，遍山荒秃，古树被砍去炼钢铁，地的命脉，从此断绝，杂树都不肯长。金木水火土，相生相克。现在看来，这个相生相克的系列中，“人”是躲不掉的。“金木水火土人”，这样才完整，这样才能完成自然循环的定数，否则，难以解释目前尴尬的局面。

数十座墓挖下来，经过精心的琢磨，已掌握了个中门道和习性，再往下，便如“庖丁解牛”般出神入化了。

第一步，挑下碑顶，清净基座，用绳套住，“轰隆”一声放倒；

第二步，拆圈墩；

第三步，清除覆土；

第四步，开门。开门是件精细的活。大墓有两扇门，用小钢钎尖插入两门之间，轻轻点拨，顺着一股巧劲，两扇门便自然开启，悠悠地走了出来。

第五步，凿净勾缝的油灰凝；

第六步，先去生基最上一块顶盖，然后由上而下，依次取出；

第七步，开棺，清除人体。钢纤杆进骷髅的眼眶，先挑飞出去，顷刻间，坟外就剩下一片死人骨头了。

我们正在打开一座清朝道光年间的古墓。这座墓，真可谓精美绝伦。顶盖全部打开后，里面一口棺材光彩照人！下里极潮湿，雨伯的故乡，很难找到一处干燥的地方，即使是钢筋铁骨也会腐蚀成酥！可是，这口棺材，虽经一百多年历史仍未有任何一点朽败迹象。棺面涂的是本地上等土漆，枣红色，平滑如镜！行家说，定是个巧夺天工的神手，薄薄地涂了十遍以上，方能有这样的效果。我探头张望，面目着实地印在了漆镜上！这群汗

渍斑斑、蓬头垢面、丑陋不堪的掘墓人在那上面，个个竟是那么地健康、英俊、漂亮！

筑墓人的想象和设计令人惊叹。

棺材下面有一层木炭，木炭下面是细沙，细沙下有两层封闭严实的隔水隔潮石板，整座生基十分干燥。

“可惜！可惜！”

不知是谁在一旁叹息道。

我像以往那样跳进去用钢钎挑开棺盖。里面躺着一个老者，五柳美髯，约有六七十岁，头枕瓷枕，额上一抹方巾，脚踩卷头无忧履，身上的绣花绸缎，依然灿烂。这个老者，皮肤已经脱水，胡子焦红，仍然能分辨出他昔日的堂堂风采和尊严来。他的眼睛乍闭还睁，仿佛今天这番遭逢，早在他预料之中；仿佛为了今天这番遭逢，他足足等了一百多年。他想看看一百多年后的子孙是怎样的面目！

“他在朝我们笑！”

不知谁喊了声，直吓得大家魂飞魄散！

四

我们终于盖起了两个可供参观的模范圈洞。

然而，拆除模板半个月后，圈洞内发生了一起神秘的死亡事件。死者，是一位芳龄不到二十、如花似玉的女知青。

记忆是那么清晰。她穿着件灰白色卡其布小翻领女装，小碎花衬衫，蓝裤腿卷着，解放鞋。她的头发，亮铮铮的。草帽背后有两根充满了青春气息的大辫子，前面有一双美丽的眼睛。天，下着小雨。我去公社汇报科学饲养场的进展情况。我故意不带雨具，任由小雨扑到脸上。小雨滤清了早晨的空气，能见度极高，远山、河水、人物，都凸现了出来。老远就能看见小坝子科

学饲养场的两个圈洞，老远就能闻到圈洞混凝土的芬芳。这让我兴奋。这两个被乡里视为外层空间飞来的怪物，在我看来，是实现我改造山河伟大抱负的里程碑。有一种轻轻的醉迷和晕眩，由脚根向上升腾。

她扛着一把锄头，迎面朝我走来。

“跃刚，去哪儿？”她那一笑，莞尔，灿烂。

“公社。”

她被簇拥在上工的人群中。小坝子下面的河坡，是她所在生产队的油菜地。

晌午时分，一个中年汉子慌慌张张闯进公社。“跃刚，快快快……”他脸色煞白，语无伦次。

“快啥子？”

“打、打、打电话。”

“给哪个打电话？打啥子电话？”

“你们小坝子的圈洞垮了！压着×××了。”

（我已经记不住她的名字了。我只记得她的名是由三个字组成的。）

我立即抓起摇把式电话猛摇。

“总机总机，请接县医院急诊室。”

那边是个女人的声音。

“我是下里公社，砸伤了一个知青，请你们马上派救护车来！”

“我们一个小时后到。”

中年汉子坐在楼梯上，一边裹旱烟，一边自言自语地说：“没救喽。”

他跟我说，怪，那么个娇小女子，背到半路时，在他背上撒了泡尿，之后，身体突然变得异常沉重，而且越背越重，压得气都喘不过来。

“现在人在哪儿？”

“卫生院。”

他领我去了公社卫生院。

我又见到了她。

她躺在一张简陋的平台上。她面无血色。她的脸上留着惊恐和不解，我早上看到的莞尔和灿烂，梦一般地消失了。医生正在抢救。她的衬衣卷到了腋窝。她的皮肤，那么白净和娇嫩。她有一对成熟而美丽的乳房，然而，此时已经没有了鲜活的气息。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看见少女的乳房。

医生已是大汗淋漓。医生绝望了。医生给她擦去鼻腔中渗出来的血污。

钢筋混凝土拱篷，大石板墙基，怎么会轻而易举地垮了呢？

圈洞坍塌压死人了的细节，是晚上回家后嫂子跟我讲的。

她说，我们在田坝里做活路，河那边有人跑过来喊，“小坝子压死人喽！”“压死谁啦？”“压死个知青。”三弟弟早上走时说，要去小坝子。听到这个消息，我的眼睛发黑，吓得心都要跳出来了。我甩掉锄头就朝河那边跑。一路跑，一路喊，“三弟弟！三弟弟！”跑拢一问，压死的是其他队的女知青，腿一软，一屁股坐在地下，半天起不来。那女子命不好，跑到圈洞躲雨，只在模板上轻轻靠了一下，墙基就垮了，顶篷垮下来，刚好压在她的脑上，怪，里面好几个人，就死她一个，其他人伤都没有。外面有个女孩去抢蓑衣，砸断了手脖子。圈洞拆掉模板已有半个月了，什么事都没有，怎么可能“轻轻地一靠”就垮了呢？真是没有道理，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全家人在吃夜饭。桌子中间的煤油灯，在大家的脸上闪烁不定。嫂子说，死人是有预兆的。昨天晚上她做梦，她在盆里和玉米面，“三弟弟拿了一根水竹竿，插在里面，顺着往上爬。三弟弟爬到了最顶上。我在下面喊，三弟弟，你快下来。他说，我不

下来。这个时候竹竿突然断了,我赶紧用双手去接三弟弟,可是他飘在半空中,就是落不下来。我醒来时心惊肉跳,心想肯定要出事。”

一家人听得毛骨悚然。

嫂子又说:“那女子可怜,抵了三弟弟的命。”

吃完饭,看家狗见我独自在门廊坐着,便蹭过来,依偎在我的身旁。雨,还是不停地下,没完没了地下。后来,我在《潮地》中写道:“三百六十五天,三百六十六天雨霏霏,潮呵,潮呵,难见天日,整个世界都生霉,霉粉霉蕈在空气中跳舞。”“青衣河,好清凉的名字好清凉的河!河中偶尔能见镇上人家户灯火跳,眼前拉了一块迷迷蒙蒙的幕帘,天地山河都溶为了铁板一面,河的深处极遥远的地方传来那个矮丑家伙的声音。那只独眼在笑……”

恍恍惚惚中,我听见一个女子在夜空中轻轻啜泣。

五

事故发生后,大家再也不提修科学饲养场的事。废墟,谁也不去处理。一直到我离开农村,一直到我十多年后重返故里,还是原来那个样子:残垣断壁,一片狼藉。更奇怪的是,还那么完整地堆放在那里,谁也不动。谁也不敢动。三千块钱,打了水漂。

十多年后,我站在自己第一部作品面前,说不清满腹的惆怅滋味。它在嘲笑我。回到家,刚落座,嫂子就凑到我耳根上说:“你走后,到了晚上,来往的行人,听见木炭沟(我们挖了几十座坟的地方)有鬼在哭。”说得我汗毛孔发炸!起了一身鸡皮疙瘩。人死了,在给灵魂找个安稳的栖身场所,可我们把这个栖身的场所给挖了。多少孤魂野鬼栉风沐雨,酷暑严寒下,无处躲藏。凄

凄惶惶,不可终日,焉能不哭?“唉!”我心想,这哪是在哭,是在诅咒!灵魂存在吗?有位朋友告诉我,现代科技已经测出,人有灵魂,而且说灵魂有重量,约是0.028毫克。很多人听了直摇头。我宁愿信其有。这样,可能会让人有一点起码的谨慎、操守和虔诚。不敬祖宗,不敬神灵,亵渎祖宗,亵渎神灵,成为中国社会相当长一段时间大无畏的壮举。我也参与其中,无论是怎样的历史背景下,无论是怎样的主客观原因,为此,必须忏悔,以求得祖宗和神灵的宽恕。有的东西是可以不敬的,有的东西是不能不敬的;有的东西是可以亵渎的,有的东西是不能亵渎的。该敬的不敬,不能亵渎的去亵渎,后果会如何呢?革故鼎新,企图用某种意识形态割断我们与传统社会的联系,完全取代传统社会某些根深蒂固的东西。可是,故旧革掉了,新鲜又在哪里呢?

第六记 红色幽默

—

因为是社会调查,我请湖下村支书推荐十户人家,分富裕、贫困、中等水平三个层面。有趣的是,贫困户没有任何精神压力,没有任何顾忌,你想听什么,就给你讲什么,你想看哪里,就领你去哪里。邹柳芽家庭人均收入不到二百元,一直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因为穷,反而心放得宽,觉睡得踏实。他一把拎过一个满胸襟都是鼻涕口水的四五岁小男孩,告诉我,这是他儿子,儿子和女儿的所有衣服都是邻居、亲戚接济的。每年粮食都不够吃,东家借一点,西家借一点,秋天新粮食打下来还,青黄不接

的时候,不够吃,再借,借了再还,还了再借,借了再还,年年如此,往返无穷。穷是一种病,穷还容易生病,在村赤脚医生邹洪芽那儿,压着邹柳芽陈年累月一大摞账单,邹洪芽无可奈何地说:“邹柳芽每年要欠三百多元医药账。打防疫针,两角钱都要欠账。借到穷人手,待到穷人有。猴年马月才有?决不敢抱希望。”去要债,乡里乡亲,磨不开面子。现在的赤脚医生,自负盈亏,账单压多了,也承担不起。可是,有病了,还要给治。他不能像政府那样,采取强硬手段。政府的摊派税收,邹柳芽想方设法也要交上,不敢耽误。

邹柳芽债多不愁,因而心态极佳。这与近几年富裕起来的人,形成了不可思议的对照。

湖下村富裕人家,对我的访问,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抵触情绪。

村长领我去一个较富裕的人家。进屋后,主人也不让座,全不顾生人在场,用当地土话跟村长叽呱乱嚷。我听不懂。邹斌仔在一旁窃笑。

“他们都说了些什么?”回来的路上,我问邹斌仔。

原来,这是一场有趣的争论。

“村长,这个人到我们家来干啥?”家庭主妇问。

“这位同志是北京来的。”村长解释说:“村委研究,选几家富裕典型走一走。”

“比我家富裕的多得是,为什么不去别人家,偏要来我家?”

“这也不是什么坏事。”

“我不管这些。你们村委太不像话。”

见我不走,碍着面子,只好接受访问。可谈的主要内容都是她家奋斗到今天如何不容易,还欠别人多少债。总之,都是哭穷。

怪了,几户富裕人家,家家都如此,如出一辙。而且,这种心

理,不太像一般的怕露富心理。湖下村这个地方,按理是个天时地利的好地方。两三公里处,就是湘赣铁路复线,四通八达。如此便利,就是富裕不起来。这些富裕人家,绝大多数没发什么横财,不过是早出晚归,精耕细作,勤俭持家,略有盈余罢了。如是,为何对“富裕”两个字这么恐惧呢?

“我们这里爱开这么个玩笑,”邹斌仔说:“当心吃你大户,打你土豪。”

这种玩笑开得人心惊肉跳。

这可不是一般的玩笑。这种玩笑背后,是家破人亡、沦为贱民的记忆。谁敢保证,政策一夜之间不发生变化?

二

乡村社会,一直是阶级斗争的战场。在我的印象中,地主、富农都是刘文彩一样的恶霸,喝人奶,吃鸭蹼,大斗进,小斗出,私设公堂,横行乡里。我回老家插队时,向伯父打听的第一件事就是,“旧社会,如果没粮食吃,能找地主借吗?”

“当然可以借。”伯父漫不经心地说。

“借了以后,怎么还呢?”

“借多少,还多少。”

“是不是大斗进,小斗出?”

“都是卢家人,哪有这么干的。”

我又问收租的事。我参观过刘文彩的“收租院”,在四川美术学院艺术家的刀笔下,如狼似虎的家丁,奸狡计猾的账房先生,被迫交租的贫苦农民,栩栩如生。

“租人家田种,当然要交租子,哪有白种白吃的。”伯父说。

伯父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他继承祖业,支撑家庭,辛苦操劳了一辈子。除了种田外,还要种茶叶、蓝靛。农闲时,把自家

种的茶叶制成砖茶,然后与乡里结成帮队,翻越大雪山,步行上百里,把砖茶背到藏区卖。祖上都是一米八几的大个子,大个背东西吃亏,伯父年纪轻轻,就驼了背。那个时候,家里劳动力富裕,自家的田不够种,也要租别人家的田种,自然晓得租田种的规矩。农忙时,也要雇一两个短工。土改划成分时,根据生产资料多寡,我家被划为上中农,或叫富裕中农,离剥削阶级的富农只有一步之遥。后来土改工作组发现,严格按照上面的政策办,我们村的贫下中农比例太小,不能形成领导阶级力量,考虑从中农中降低一部分成分,以壮大贫下中农队伍。我家是“红属”,当然在照顾考虑之列。我家由革命争取的力量,到革命可靠的力量,戴上一顶安全帽,成为理论上的统治阶级的一员,真是万幸。这关乎子孙后代的生存与发展,关乎外面吃公家饭的亲属生存与发展。我们那个时代的家庭教育中,不能与成分不好的家庭婚配,是一个重要的内容。

由阶级成分而带来的社会歧视,曾经那么长久地影响了许多人和家庭的命运。家庭出身不好的,无论怎样聪明绝顶,顶破了天,给你个“可教育好的子女”,就算烧高香了。这种政策所带来的压抑和恐惧,是后来人难以想象的;这种政策给传统社会带来的破坏,后果难以估量。

渐渐醒事后,便有诸多不解之处。那些革命的领袖和上层人物,按照时兴的说法,绝大多数“出身不好”。否则,他们不可能有钱读书,不可能有钱出洋“寻找真理”,“寻求救国的出路”。他们一方面享受着剥削阶级家庭的恩泽,一方面宣布叛变剥削阶级家庭,然后,制定政策,对失去财产、失去政治地位的剥削阶级进行严酷的无产阶级专政,进行无所不在的社会管制,并殃及子孙后代。这个过程中,“五伦”被彻底抛弃了,“忘恩负义”公行。为什么会这样呢?血统,成了功名事业最重要的因素。

我曾经问堂哥,在卢氏家族中,为什么那些地主、富农大多

数都勤劳温良,有些贫下中农却好吃懒作,刁钻狡猾?他笑而不答。当时他也无法回答。而且,卢氏家族的地主富农主要集中在一个叫“新房子”的地带,基本属于一个宗系。我不明白。一天,一个与我同样大小的富家子弟,把我带到“新房子”他家的阁楼上。“轻点!”他压低声音说:“我们不轻易上来。”上面乱堆着杂物。人上去楼板的灰尘顿时活跃起来,在玻璃亮瓦透进来的光束中舞蹈着,直往鼻孔里钻。一股子干霉的味道。“书在哪儿?”我问。他把我带到一个竹篾编的大背篓旁,把上面的杂物一件件扔出来。我看着着急,说:“干脆全部倒出来。”哗啦——一声,里面的东西全部倒出来了。有几本线装书。我随便拣起了一本。《论语》。我读道。一九七四年“批林批孔”,断章取意,从没有读过完整的本子。翻开第一页,《学而第一》,第一行,“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孔老二像个和颜悦色的好老头,说话,这般亲切。原来可不是这个形象。“堕三都”、“杀少正卯”,“克己复礼”,“周游列国”,“惶惶如丧家之犬”,一副险恶加倒霉的模样。一个梦想复辟旧制度的人。儿歌里唱到:“叛徒林彪孔老二,都是坏东西。”“哪来这么多书?”我问。他说:“我们老辈子是前清举人。”原来他是举人老爷的后代。“这是他老人家写的东西。”他递给我几页发黄的稿笺,上头都是蝇头小楷。这是一篇论述列强为何强大,中华为何羸弱的“策论”。视野开阔,立论雄健,文气畅达。这让我大吃一惊。如此与世隔绝的穷乡僻壤,居然也有“胸怀全中国,放眼全世界”的人物。这里都是知书知礼的人,然而,正是这些人,被认定为阶级敌人,一举一动都要受到监视和管制。这些人活得谨慎,干活绝对认真。认真不是因为恐惧,而是传统。这让我大惑不解。

蒙河堤下,有一幢城堡式的大房子。

这幢房子,青砖青瓦,净空很高,虽然已经陈旧,但仍然能看出它昔日的显赫和威严来。房子里面,住着三兄弟。

这幢房子有一段邹氏家族世代相传的故事。

《邹氏家谱》记载：这幢房子的主人，是一个常年到福建贩木材的商人。其兄早亡，遗下三个侄儿。孤儿寡母，十分凄凉。三个侄儿，一个勇武，一个聪敏，一个憨厚。为哺养三个侄儿成人，他终身未娶。他将部分资产盖了这座大房子，再也不外出流浪，悉心辅导三个侄儿读书。此举，深受乡里尊敬。他本人被视为道德楷模，专文写人家谱。

在家务农的小弟，又得三子。

我见到了已经七十岁的老三。老三叫邹国英。这是个地道的农民。我在支书家聊天时，他都在一旁坐着，静静地听，不言语。

我去他家，只有他一人在家。

他告诉我，他们孙子辈的三兄弟分了家业。老大嗜赌，揣着祖辈传下来的大把银钱，终日在外面豪赌。老二也不务正业，专为大哥帮衬，大哥赌赢了，他管收钱，大哥赌输了，他负责回家取钱。哥俩形影不离，长辈管束不住，成为方圆几十里闻名的赌王。后来，老大赌败了家业，一贫如洗，老二也受了牵连，伤了元气。唯有老三，一年四季辛勤劳作，省吃俭用，勉强维持住了家业，过着比较殷实的日子。

老大、老二的败家子作风，当然受到了人们的鄙视，老三当然受到了人们的称赞。

可是土改来了后，这共同生活在一个屋顶下的三兄弟，命运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赌徒老大成了贫农，老二成了中农，忠厚本分的老三，成了富农。

邹国英做梦都没有想到，历史跟他开了个大大的玩笑。他白天黑夜地被拉出去戴高帽子批斗的时候，那两个游手好闲的兄长都悠悠哉哉地在家喝茶。

有件事情,让他几十年都没有想通。土改前,大涝,青黄不接的时候闹饥荒,他动了侧隐之心,拿了二百石谷,借给村里的饥民,只有约定里象征性地收取一定的利谷。土改后,借谷的农民,不仅不还谷,反而说他乘机剥削灾民,让他认罪。他不服,借谷的村民便闯进他家,砸烂家什,抢走存粮。

“我这是行善事呵。”他说:“怎么会遭到这种报应呢?粮食抢走了,饿得我爬不起来,只好吃糠充饥,吃了,又拉不出屎来。”

老人说着说着,眼泪就往下掉。

我心里说:比起那些冤死的人,你老算是幸运的了。

三

北京国际饭店玫瑰咖啡厅。整个下午,里面空荡荡无人,一片紫红色的气氛。

有四个人坐在一个最靠边的地方。

这是一位朋友专为我安排的聚会。我正在进行一个事件的前期调查核实工作。

前不久,一位党内德高望重的老同志请我到他家,非常郑重地将一位历史教员写给他的信转交给我。他说:“文革期间,湖南道县发生了一起大屠杀事件,道县境内的地富反坏四类分子及其子女,几乎被斩尽杀绝。这个历史教员是目击者。”

这位历史教员在信中说,他所在的大队,“曾秉承上级的批示,成立过‘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以地富反坏右将要复辟变天,颠覆无产阶级专政为由,把男女老少幼婴中的六十七个半人(注:其中有一个孕妇。),用绳子穿成一串,像赶牲口一样地赶到三口地窖中,进行烟薰、填土、夯紧、活埋!这一惨绝人寰、骇人听闻、亘古未有过的重大事件,遍及全道县。”

关于“道县屠杀事件”,新近出版的《中国“左祸”》已有概要

记载：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三日到十月十七日，历时六十六天，涉及十个区，三十六个公社，四百六十八个大队、一千五百九十个生产队，二千七百七十八户，共死亡四千五百一十九人，其中被杀四千一百九十三人，被迫自杀三百二十六人！

受道县杀人事件影响，全地区其余十个县市，也出现滥杀现象：

在“文革”期间，道县所在零陵地区（包括道县）非正常死亡九千零九十三人，其中被杀七千六百九十六人，被迫自杀一千三百九十七人，另外，致残致伤二千一百四十六人。

依当时流行的阶级标准划分，在死亡人员中，四类分子三千五百七十六人，占 39.33%；四类分子子女四千零五十七人，占 44.63%；贫下中农（大多数有不同程度的历史问题）一千零九十九人，占 11.54%；其他成分者四百一十一人。其中未成年人八百二十六人；被杀者中，最大年龄为七十八岁，最小的仅十天！

杀人方法有十种：

1. 枪杀，含步枪、猎枪、鸟杆、三眼炮等；
2. 刀杀，含马刀、大刀、柴刀、镰刀、菜刀等；
3. 沉水，含沉塘、沉河（又称“放排”）；
4. 炸死，又称“坐土飞机”；
5. 投岩洞，一般辅以刀杀；
6. 活埋，基本上埋在废窖里，又称“下窖”；
7. 棍棒打，含锄头、月耙、扁担等；
8. 绝勒，含勒死、吊死；
9. 火烧，含薰死；
10. 摔死，主要应用于未成年孩子。

（注：原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的堂弟，也

被“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处死刑。)

我收到了历史教员的回信。

他在信中详细地回忆了当时滥杀的情景。

他所在的生产队,第一次杀了两个人。一个解放前当过土匪,一个是地主的未婚独生子。乡中学召开公审大会,“目不识丁”的贫下中农协会主席、“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宣布完“罪状”后,大声问在场的群众:

“该不该杀?”

众曰:“杀!”

二人被押到河滩上跪下,刽子手持鸟铳行刑。

刽子手中,有一人是被杀者的侄儿。被杀者回头央求道:“打准些,往后心打,不要打脑壳!”

开枪,未死,侄儿上前补了一枪,乃毙!

事后,侄儿“每回忆此景,心中后怕至极,日夜不宁,生病二月,卧床不起”。

“第二次,大批杀,对象:地、富、反、坏、右。方式:地窖活埋。人数:六十五个半人。(一孕妇,腹中一儿,未出生,故曰,‘半个’。)”

一晚,大队支书召集大队、生产队干部、贫协主席、民兵骨干会议,按花名册,逐村宣判。“念一人名,问曰:‘××该不该杀?’众附和曰:‘杀!’于是,有干部将某人笔勾一下,某人就被判了死刑。”

“成年人每人一索,小孩子一索捆三五个”,“像柳条穿鱼一样穿成串”,由民兵押着,缓缓行进。

在一个偏僻水库边的宣判大会上,“贫下中农高级人民法院院长”讲完一番话后,照例问在场的群众:

“该不该杀?”

众呼:“杀!”

“犯人”中，有公社中学教导处主任，“只穿背心，短裤，无惧色，不时回顾其妻。”其妻乃“中农，不在杀之列，立于后，与观众站在一起，怀抱未满周岁独生儿”。他“以为可保一脉，故无惧。谁知会后，一民兵将儿夺走，抱走，其妻不敢哭哼一声”。

行刑地点：某“山坡上油茶林边的三口废地窖（原装红薯）”。

“众‘犯’陆续来到地窖边。民兵用刀、枪逼着，来一个，往下跳一个；缓一点的，便挨捅。最可惨的是小孩，因为串成一串，好几个人，头一个跳下去，便牵动第二和其余数人，因为惯性太大，第二个及其后者的头部、腿、腰往往猛烈地撞击在梆硬的地窖口或是地窖壁上，重重地身不由己地摔入地窖中，撞压在谁的身上就不知道了。”公社中学教导处主任“下地窖后，由民兵将其儿往下抛去：如此杀小孩约三例。”

行刑过程中，还有两三插曲。

某青年“腿肚子挨了民兵一梭标，一路流血过多，走到溪边要求喝水，喝了半肚子”。

某，“中年，头天受寒，腹胀，该日早被捆，叫嚷拉肚子，民兵不准。临刑时，实在忍不住，说什么也要让拉一次。拉完，遂下窖。”

某小学教员，事先躲避，被学生家长出卖。“从山坡后被押小跑”到刑场。有人喊，“剥了他的皮！”某，“怕极色变”，“至此窖边，主动往下便跳”，腾身下去时，遭民兵一枪，击中，坠入。”

三窖皆满，“被害者哀求声、咒骂声、嚎哭声，嗡嗡不绝于耳。”

“民兵先用稻草把火点燃，抛入地窖中，又往下抛成捆稻草，烧，薰。地窖中发出犯人临死前像蜜蜂一样的嗡嗡声，夹杂着谩骂声。声绝。众民兵持铁锄挖土，往下填；填一会土后，往下倒石灰。如此，顷刻将三口地窖填平。不放心，担心（有人挖地窖）逃走或被劫走，把准备好的木质大榔头拿来，五六个劳动力轮流

夯土,到夯紧为止。还不放心,民兵轮班守护,至次日。人群散,杀结束。”

有幸免者二人。其中一青年,机智果敢。民兵捆他时,他捶胸嚎哭,分散民兵的注意力后,就地一滚,下山坡飞跑。数民兵紧追不舍,“开枪,不中”。入山谷溪边,藏入荆棘中,未被发现,幸免。“白天藏入山中,深夜归家”。“如此数月,犹惊弓之鸟,神经高度紧张,后来平定后归家,犯了神经病,就诊数年不愈。”

四

玫瑰咖啡厅的四人中,有一位曾是湖南某文学杂志的编辑。八十年代中期,曾专程赴道县调查屠杀事件。

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曾下令调查此案。湖南省成立了“处遗工作组”。这位编辑在本案处理完后潜入道县。

他的调查完全证实了历史教员信中谈到的全部事实和细节。他调查的该大队杀人数为六十四人,少了半个人。因为他不知道其中有孕妇。他说,历史教员所在的大队,是“全县杀人最多的大队”,在当时放了一颗杀人卫星。

这是一次精心策划、经公社批准的谋杀。

他在一篇文字中描述说,该大队支部书记曾打电话给公社的某领导说:

“×××啊,我是×××,向你汇报一个事情。昨天晚上,我们大队开了党、团员和干部会议,研究决定用扫把扫,杀六十多个。”

“好家伙,这么多呀!你们采取什么措施?”某领导问。

“我们准备了三口窖,准备全部下到窖里去。”

“可要注意安全呀!”

于是,该大队大开杀戒,演出了前面描述的悲惨的一幕。

历史教员信中谈到,他原来的语文教师,道县师范的教导处主任何聘之也死于那年的血雨腥风中。

那位编辑也跟踪采访了此事。

他说,何聘之被杀害于寡婆桥。

道县师范的老校长尹少蓁告诉他:“说何聘之会反党,我无论如何也不敢相信,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他冒着杀头的危险,参加地下工作;大跃进期间,他又写剧本,写文章歌颂三面红旗; (“文革”初期被戴上三反分子帽子)开除回家后,他老老实实参加农业生产,定期向大队党支部写思想汇报,报告思想改造情况。就是文革杀人时,他至死仍然相信党的政策,相信民兵不会乱杀人,相信总有一天,会有搞清自己问题的机会。就在他被牵上寡婆桥杀头的时候,他还不相信会乱杀人。他反复向牵他的民兵说:‘你们不要杀我,我是冤枉的,我热爱党,热爱毛主席……’可是,那些民兵哪听他这一套,举刀就砍。他喊‘毛主席万岁’‘岁’字还没出口,就被一刀砍断了脑壳。踢进水之中。和他一起被杀的,还有他的大儿子何上明。”

他喝了一口咖啡。脸色煞白。

往事不堪回首。

“那时候,河水整天都是红的。寡婆桥,我们去了两次。桥上砍人多,刀砍钝了,便在石栏上磨,现在还能看到磨刀的痕迹,仿佛还能听到磨刀嚙嚙的声音;河风吹来,好像还能闻到血腥的气味。”

他对我们说。

他原是学理工科的,一不小心,走上了文学这条危险的道路。道县调查后,便被盯上了,方方面面,搞得他不得安宁。他决心放弃文学。他认为,文人在如此严酷的现实面前太渺小太软弱了。他把有关材料分几处妥善存放好后,走上了另外一条谋生之路。

他的语调,超脱、沉着、冷静、缓慢。用这种语调来讲述道县的故事,不知道为什么,反而强化了恐怖的气氛。这间四星级大饭店咖啡厅的紫红色调,恍如是道县四千五百一十九个冤鬼的鲜血所渲染,亦把人惊悸的灵魂逼上了绝境。

第七记 招 魂

—

根据物质财富拥有的多寡来区分人群的性质和阶层,而且,不分社会的发展阶段,广泛持久地推崇之,于是便出现了压迫和被压迫、剥削和被剥削、革命和被革命、统治和被统治的人文景观,使人与人之间始终处于矛盾和对抗的紧张状态,同室操戈,攻杀不断,冤怨不解。这到底是为了什么呢?为了五谷丰登?为了社会进步?为了至善至美?动不动就“革命”,到底“革”谁的“命”呢?谁在“革命”中得到了好处呢?那位历史教员在信中告诉我,大屠杀后,那些被杀人的家都被抄了,抄的东西堆放在一块,进行了理所当然的重新分配。他说,这像是在经历“第二次土地改革”。他家分到了一台旧纺织机,一些旧衣物。第一次土地改革,他们得到了得而复失的土地;“第二次土地改革”,他们得到了死人的遗物。即使如此,他们也没有丝毫改变贫困和苦难的命运。反而加剧了贫困和苦难,反而导致了生存环境的进一步恶化,这种恶化,也由资源限制和工业化压迫的物质层面,上升到了文化传统的破坏和丢失,灵魂找不到归宿的精神层面。

可以说是“礼崩乐坏”。

湖下村主要由邹、付、何三大姓构成，其中邹姓占了百分之七十，处于绝对的统治地位。村委会的支部书记、村长、会计、民兵营长、妇女主任，都由邹姓担任。据邹氏家谱记载，邹氏祖先是山东邹平人，也就是梁漱溟先生三十年代致力于“乡村建设运动”的地方。这场旨在“复兴中华民族”的“乡村建设运动”曾经在中国乃至世界引起了广泛的影响。一批中国知识分子，痛感西方文化和经济的冲击，以及兵荒马乱对乡村社会的破坏，由教育入手，对乡村社会进行重建和改造，探索中华民族的前途。山东有梁漱溟，江苏有高阳，河北有晏阳初（后迁到重庆北碚）。梁漱溟先生半个世纪前说：“我们旧日的社会已崩溃到最深处，故它从头作起。”现在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邹氏唐时南迁至江西，北宋初，定居于清江，湖下一带，草木葱茏，泉水清澈，幽静且秀丽，邹氏一脉三兄弟，“因而居焉”。邹氏因此“精神百倍，勤劳万状。登山则万木葱茏；涉溪则双虹映带”。邹氏兄弟多有雅兴，分别在三个地方立下基业，名曰：“日房”，“月房”“星房”。湖下村一支乃光芒万丈的“日房”。从此，“勤俭逊让，风俗良美”，一千多年，世代相传。

邹氏家族后来统一建了土坯房，由北向南，平面是宝塔式结构，并排而建，依辈分而居，秩序井然。这种家族村落的居住方式，如军营宿舍，实属罕见。也可见家族秩序设计者用心之良苦。

今天，我们在湖下村，已经看不到这种秩序的力量了。

一九八二年，邹氏家族内一对平辈男女青年自由恋爱了，这在湖下村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同族婚姻，在一个宗法社会中，可以说，犯了大禁忌。

这对青年非常勇敢。黄昏的时候，他们依偎着在蒙河大堤上散步。这是湖下村邹氏亘古以来未有的浪漫举动。

村里的年轻人用一种兴奋和羡慕的眼光注视着他们。心里都为他们的幸福美满而暗暗祝福。而中老年人却认为这违背了祖宗成法,属大逆不道。两个年轻人遭到了家庭的强烈反对,甚至把他们逐出家门。然而,这并没有阻挡住宗族内婚姻的蔓延。自那以后到今天,湖下村有近二十对同宗族婚姻,占到了已婚青年的百分之十以上。

一位作家在秦始皇兵马俑所在的村落里采访了两对同宗族婚姻的青年,认为这是“自由”、“自主”的现代意识对乡村社会青年影响的产物,是对“媒妁之言、父母之命”“包办婚姻”的反抗,是对封建传统的挑战。

然而,立志于重修邹氏家谱的村支书邹春根却犯了难。

先辈在修续家谱的原则中指出,作奸犯科者,乱伦者,不得入谱。

“这属于乱伦吗?”他问我。

他的脸上带着迷惑和恐惧。他是本村长辈,又是村政权几十年的首领,不仅要贯彻乡政府的各项指示、征粮纳税、摊钱派工、计划生育、社会治安,同时还担负着主持公道、维护伦理道德、家族继往开来的重任。在近二十对同宗族婚姻中,有平辈的,有姑奶奶辈与侄孙辈的、有叔伯辈与侄女辈的,有姑姑辈与侄儿辈的,他们的婚姻都是合法的,但是,这种合法性能写进族谱吗?这样下去,会不会引起种族退化?

一位社会学者在甘肃省临洮县太石乡水原村调查时,就有一例姑奶奶与侄孙子的婚姻事件,给该村以强烈刺激。为了正本清源,决定重修家谱。重修家谱的序言中写到:

谱之为谱,所以记载祖先发祥之起源,子孙承继之锦瓜失,辈者之麟趾,家世之文野者也,是则家之有谱,犹国之有史也,岂可忍乎哉!张李四房,重修家谱,为追念先祖,排辈不乱,同宗不婚,世代健康。学先祖勤学成才,艰苦创业,勇敢无畏,不屈不挠

的精神,严以律己,宽以待人,淳朴敦厚,清正廉洁的道德,行人之状,助人为乐,热心于进步事业之德为。愿我世代子孙,继承和发扬祖宗的优良传统,为国显民作出贡献。

族规明显与现行法律相悖。《婚姻法》规定,直系亲属和旁系亲属三代不许通婚,并没说同宗不能通婚。这种法律,显然背靠着现代科学。那么,族规是否只体现了宗法关系,而藐视科学和法律?可又明明说是为了“世代健康”呀!

在传统社会中,婚姻与祭祀,是两顶最要紧的事。那么,这种传统,是否有其内在的人文理智!否则,怎能绵延数千年而不衰,并为后人奉为圭臬?否则,文明缘何而起?

我就教于一位近年颇有成就的文化学者。

二

他飘然而至。

此乃一介白净面皮的书生,为人木讷,却底气很足,声若洪钟。所谓“讷于言,而敏于行”者。

“你怎么想到了我?”因为是老朋友,他进门就嚷。

“你,‘八年苦读书,文章满天下’呀!”我亦大声说。

“嘿嘿,你拿我笑话。”

“喝什么?”

“‘庐山云雾’。”

“还惦记着呢?”

“当然,当然。”

一巡茶后,自然是一番高谈阔论。

当我把江西看到的情况和我所关心的问题告诉他时,他沉思了一会儿,说:“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人类学问题。这个问题非常值得讨论。据我所知,在一个比较狭小的血亲宗族内的通

婚,是传统观念中大逆不道的乱伦行为。这种观念,很普遍,很古老,而且是世界性的。一直到现在,我国广大汉族地区的宗法家庭,绝大多数仍沿袭着比较严格的族外通婚方式。”“江西等一些地方开始蔓延的宗族内通婚,已经打破了传统的族外通婚的界限,但又没有超越现在婚姻法的禁止范围。这种情况是否能在一代或是若干代之后引起遗传素质的大幅度下降?至少在日前有关学科的发展水平上,我们还无法给出一个比较明确的判断。”我说。“从遗传学和生物进化的角度说,人类最根本的财富,是我们已获得的进化高度,是我们已获得的人类素质的水平。因此,我们有必要设法搞清血缘与通婚之间的利害关系。当然,我们最终可以在实验室中寻找部分答案,但是否能全面解决这问题,目前确实还没有把握。我没见过这方面的报道。因此,有必要从人类既往的经验中寻找某些参照依据。在世界范围的原始氏族中,乱伦禁忌,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在原始宗教观念中,导致神降灾于人类,对人类施行惩罚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人类对乱伦禁制的破坏。而且,这种惩罚范围,并不局限于违逆禁忌者,还包括其所在的种群,所以,一旦出现乱伦,全体族人往往会以极残酷的方式来处罚乱伦双方,以平息神的愤怒。《金枝》的作者弗雷泽,是西方早期最有成就的人类学学者之一。他已经初步看到了一个更加纵深的现象——原始时代的‘宗教迷信’,也就是人们观念中对神的惩罚的畏惧,曾经产生过很重要和很有效的文化保障功能。他写了一本《魔鬼的律师——为迷信辩护》。这在当时,写这方面书是需要很大勇气的。他搜集了近代大量的原始氏族的有关事实,认为:‘通过灌输对违反性道德和传统规范的恐惧,迷信成为婚姻制度的支柱。’他说。

“在人类的科学时代,去谈论‘迷信’的某种合理性,是否太离谱了呢?”

“所以说,这需要很大勇气。要害是,这种所谓的‘迷信’所导致的人类进化的后果。近代处于最低发展水平的原始民族是澳大利亚人。在欧洲移民到来之前,这里基本上没有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因此,这一地区的社会文化现象,为我们了解和认识人类的童年提供了比较可靠的直接例证。澳大利亚普遍存在着一种被称之为类别制的原始婚姻制度和与之平行的族系结构。摩尔根称其为‘以性为基础的社会组织’;弗洛伊德甚至认为,澳大利亚人的整个社会结构的设立,目的主要是为了防止乱伦的性行为。在澳洲大陆,分布着六百个左右的原始部落的社会结构,一个部落一般分为两个‘半球(胞族)’,每个半族各由三五个氏族组成。通婚关系被严格限定在两个半族之间。这就是所谓的‘外婚制’。一个儿童,十岁左右便被告知进入了性回避期。在进入性回避期有一些容易识别的永久性标记,如凿齿、纹身、割礼等。男女青年未获得婚配权之前的分性别集体居住,也是一种比较常见的乱伦防范措施。”

“创立这种严酷的婚姻制度的原因何在呢?”

“以往,大多数学者认为,这种制度的创立,是因为人类看到了近亲性交的明显恶果。这种判断是否正确,我们暂时不去深究它。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就是那些原始婚姻的创立者对这种制度的极易受到破坏的脆弱性,是非常清楚的。在澳大利亚起源的神话中,原始婚姻制度的创立者,往往也是这一制度的守护神。人类学者将这种人称为‘文化英雄’。他们以神罚方式来捍卫着这一制度。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这种宗教观念,实际上是一种目的性很强的欺骗性的文化保障手段。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这种脆弱的制度,能在一个原始群体中稳定地实行上百个世代。一般认为,这种婚姻制度出现于五万年前左右或更早些,是‘图腾文化’的伴生现象。一些考古学事实有力地支持了这个判断。这个阶段,正是人类从古人到新人的最后一个具有重要意

义的体质进化历程。而这种制度对这个进化历程无疑起到了决定性的推动作用。这是人类在原始时代所创造的一个自我约束的奇迹。”

“古老的中华民族是怎样的状况呢？”

“中华民族也是这种奇迹的后果。《礼记(婚义)》说,‘婚礼者,将合二姓之好’。在我国,同姓不婚的原则一直被严格地执行着,‘同姓为婚,其生不蕃’,一直是与乱伦禁忌相呼应的一个信念。原始时代结束后,普遍存在的乱伦禁忌,保证了包括我国在内的整个旧大陆多数地区的人口素质处于比较稳定的守成状态。”

“那么,对于宗族内通婚的现象,你的结论是什么?”

“在以往人类经验的参照系中,今天发生的宗族内通婚,是文化丧失的结果。我们应该看到,人类的体质进化,是一个尚未完成的历程。人类如果在这个历程中陷入一种恶性循环中去,将会出现怎样的情景呢!”

这种结论,确实有点耸人听闻;这种思路,在我们的知识结构中,多少有些陌生。姑且称之为一家之言并记录在案吧。

宗族内婚姻最终会发展到怎样的后果,还需要有充分的耐心来观察,还需要科学的检验和学者进一步的研究。然而,作为一种近十多年来大规模出现并与几千年甚至上万年人类社会的传统背离甚远的文化现象,是应该观察和记录在案的。

三

真是纷繁杂乱。现代文明的侵入,农村人口压力,“左”的意识形态影响,传统的丧失和复苏,都在农村这个大舞台上淋漓酣畅地上演着。

我们在乡村社会看到的是一锅夹生饭。

就文化的角度看,一方面,宗族内婚姻,传统宗法观念的崩溃;一方面又是生育上宗法观念的强化。本来是一脉相承的东西,现在却相距甚远。前者,打破了禁忌;后者却要传宗接代,把如何保证家族中某一支脉的延续,巩固其家庭地位,看作了顶重要的事情。这导致了大量低素质人口产生和“人口质量的逆淘汰”趋势,以致政权系统不得不采取强悍的手段来制止。

在经济和文化的双重压力下,给推行计划生育“国策”的乡村基层干部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烦恼。

湖南省一位乡长一九九一年的日记,对此类情况记录得颇为生动。

8月21日

根据县委、县政府召开的秋季计划生育工作突击活动会议精神,上午召开了乡党委、人大、政府等三家领导会议,分析了我乡计划生育工作落后(全县32个乡镇、我乡排列21名)的原因,明确了这次计生工作的任务,即四大手术要完成122例,其中女扎39例、引产41例、人流20例、上环22例。按上级指示:两女户要全部结扎,并实施两女户养老金保险。拟定了我乡秋季计生工作突击活动方案:1.全体乡干部参加。30个干部(含招聘干部)分为两大组,我自己带一组,负责完成6个村任务。党委副书记带两组,负责完成5个村的任务。2.统一时间、统一标准,时间是突击到9月5日结束,标准按湖南省《计划生育条例》和县委、县政府的规定,一胎上环,二胎结扎,两女户结扎一个不漏,计划外怀孕人流引产一个不留,全部结扎女性,不允许结扎男性(除特殊情况外)。3.决定了对动手术对象的营养补助和两女户养老金保险金额。人流手术者补营养费20元,引产手术者补营养费35元,男性结扎者补10元,两女户养老金保险500元,财政拿不出钱款也得保。4.决定对计划生育对象逃跑者要动其家产。5.参照《条例》,统一了全乡对超生子女户征收超生

费的数额。即超计划生育二胎者罚款 400 元,生三胎者罚款 1500 元。

下午,召开了全体乡干部会,布署安排计划生育突击活动的有关事宜,并分组进行了讨论。而后休息。

8 月 22 日

秋季计划生育突击活动全面铺开。上午八时,工作队员 30 余人开往狮子岩村三组,着手拆除超计划生育钉子户熊开补同志的房屋。熊开补夫妇已外逃生育了 3 个女孩。(生三胎时已男性结扎)今年 6 月份乡计生办发现其妻怀第四胎。将她带往县人民医院引产,进医院后未引产就逃跑了。事后,乡政府下了行政通知书,勒令他在 10 天内自选引产手术,否则一切后果自负,可能熊开补把乡政府下的通知书不当一回事。按湖南省《计划生育条例》规定,对他应征收超生子女费 5000~8000 元,并下达了征收通知书,由于熊开补无法交款,所以只好拆他房子。房子是三间,约百十平方米。当工作队的同志刚开始拆房子时,熊的母亲呼天唤地地哭,要求看在地老年人的面子上,留一间给她住,村党支部、村委会也同时请求留一间。根据此情况,经乡政府集体研究同意留了一间。拆除了房屋两间,将所有材料运回乡政府,作价出售 1200 元,今天共工作了 9 小时。

8 月 23 日

早晨五点钟起床,六点钟乘车前往交坪溪村搞计划生育。该村总人口 1100 人,这次应做四大手术对象 25 例。其中钉子户金启银已生四胎,原男性结扎,属多年逃跑游击生育,为了突破难点,打开局面(该村属我乡计划生育历年来是最难搞的一个村,工作队员入场后在村党支部和村委会的配合下,花了 7 个小时将金启银的两间木房子全部拆除,价值 1500 元。由于天热,同志们汗流浹背,衣服都湿透了,脸部被黑灰尘抹得活像个“大花脸”,按湖南省《计划生育条例》之规定,应罚款 6000~8000

元。但该户属赤贫户,除了两间房子外,什么可动财产都没有。俗话说:“不怕讨债人熊,就怕欠债人穷”。所以只好罢了。

下午三点钟才吃饭,吃饭休息一个小时。四点工作组 17 人和村干部 4 位同志分为 6 个小组,分别到计划生育对象家下达手术通知书和罚款通知书。当一个小组到一户上环对象金启兴家里时,金的妻子躲避了,工作组限一个小时要他叫回其妻,他的妻子在规定的时间内回到家,这时工作组的同志分别做他们夫妇的工作,要其上环,可金启兴不理睬并对做工作的同志责骂是土匪,“我只有一个孩子就要我妻子上环。上个屁。”按上级计划生育工作有关规定,对阻碍计划生育工作的事件,视其情节予以罚款或追究责任。所以对金启兴给予罚款 200 元的处理。他不服,致使与工作组的同志发生了争吵,并要行凶,在这种情况下,我下令将其捆绑,而后押着游了全村,捆绑游村途中金认识到自己做错了,要求政府从宽处理,同意妻子做上环手术。

根据他的态度,最后决定罚了 100 元款,他接受了处罚,妻子也上了环,八点钟全体工作队员返回乡政府,今天共工作了 15 个小时。

8 月 24 日

早晨六点钟起床。六点半分乘车前往交坪溪村继续搞计划生育工作突击。由于昨天狠抓了钉子户,打开了局面,今天早晨就做好了三户上环对象的思想工作,九点钟吃早饭,早饭后做好 37 户应做结扎手术对象的思想工作,下午两点钟用车把已做好工作的对象送往乡卫生院手术。两点三十分吃中午饭,休息一个小时,三点三十分至七点钟,工作队分为三个小组,做好 5 户生一怀二的引产对象的思想工作,七点半钟乘车返回乡政府。今天工作了 14 个小时。

8 月 25 日

早晨四点钟起床,四点半分乘车前往交寺溪村。今天的

主要任务是动员两女户全部结扎,为了不使两女户对象逃跑,我们天没有亮之前全部包围了这些对象户。七点钟,各小组汇报,8户两女户除一户早在三个月前外逃的以外,其余7户都在家。而后各小组对每一个对象户下了一道禁令“如果谁逃跑,工作队就把谁家的一切财产连同房子予以没收处理。”九点钟吃了早饭。早饭后,我们先着手把5组的两女户对象江泽红之妻动员上车,因为她是村干部,她若能被顺利做好工作,就会对其他几户起到促进作用,但事与愿违,当我们做她的工作时其母亲(50岁)嚎啕大哭,并说我们太过分了,做事做绝了,她只得两孙女就要结扎,还说:“谁把我儿媳妇弄去结扎,我就要和他拼老命。”这样僵局持续了4个小时,最后,不得不下令将她的媳妇抬上汽车,强行送往医院进行结扎。在抬她媳妇的时候,周围50多个群众围观,其中两位中年人出面劝说了他们婆媳俩:“现在政策如此,莫怪乡政府的同志。”下午二点吃了中饭,三点钟继续做另几户的工作,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于八点钟将其他6户两女手术对象全部带到乡卫生院实施了女扎手术。今天工作了16个小时。今天白天县委书记、副书记到我乡检查计划生育工作。(在家的人大主任接待了两位领导),指出我乡这几天存在的问题是结扎了几个男性不应该,并指示:①要全部搞女性结扎,如女性不能结扎要经县人民医院检查方可结扎男性。②39岁以下的育龄妇女一律妻取环结扎。③计划外怀孕的坚决实行人流、引产,非法同居怀一胎的也必须人流、引产。④计划生育工作不能心慈手软,对于重点户要搞得他倾家荡产。⑤坚决把人口压下来。根据县领导提出的几点意见,晚上十点至十一点三十分召开了乡党委、人大、政府三家领导会议,并逐条研究落实。晚十二点三十分才睡觉休息。

8月26日

凌晨二点二十分。卫生院院长急促地敲我的房门,叫我快

起床,起床开门后,院长汇报了昨天一女性结扎,晚上已出现三次休克,其腹部剧痛。根据这一紧急情况,我首先喊醒了两个同志去附近村联系车辆。另喊醒了四位同志去医院搬运患者,又打电话与分管计划生育工作的副县长联系,副县长接到电话后马上通知了县人民医院作好抢救准备。三点三十分用车辆将患者送往县城,四点三十分准时到达县人民医院,人民医院组织了三十五名技术骨干进行会诊抢救。诊断结果属结扎后腹腔积血(一根血管破裂),经及时抢救,重新做了大手术,才使患者脱离危险。我在装患者的车辆开出乡政府后,心情是沉重的,也无法再入睡。六点钟把我组的全体工作队员喊起了床,七点乘车出发前往米家龙村搞突击(该村距乡政府20公里,属深山老林之地),八点钟到村,首先分头向计划生育对象户下了通知书,十二点十分全体队员才吃早饭,早饭后,全体队员集中在自然村督促对象集中,由于自然村极为分散,到下午七点钟才把8个对象集中好乘车回乡政府,第二天这批对象才逐个手术,今天工作了20个小时,由于过度劳累,使我患了感冒。

安徽省的一位乡长在他1991年的日记中写道:

9月18日 星期三 晴

计划生育突击月活动开展一个星期了,可进展缓慢,这次上环任务40个,结扎任务11个,到今天止,上环仅完成十几个、结扎3个,和上半年6月份的突击活动比,差多了。这次进展慢的主要原因是:

一是基本上都是难缠户,狠人户或是村里的有盘根错节关系的小干部;二是客观上生产大忙,正值中秋收割农民都要抢收,抵触情绪很大。

说实话计划生育在农村确实是第一难事,得罪人不说,也不知要耗费多少精力,仅计生这一项工作,乡镇干部就经常被农民

骂,讽刺挖苦污辱赌咒。在乡镇当个干部真是倒霉透了,但是这项工作又历史性落在各级干部,尤其是农村干部身上。总得有人去干,哎,中国人口为何这么多。

我总的来说,还算文明。很多地方扒房子拖财产、拉家具更伤感情。今年6月份突击活动我们镇结扎了21个,自己比自己超历史,终于打破了不习惯结扎的局面。可是只有几个镇领导才知道这其中我们多花了多少钱呐!说穿了:为了息事宁人,减轻干群抵触情绪,我们暗暗采用了“买一刀”或买“肚子”的方法。重金之下,自然有人为之,可是永远花钱买,这钱从哪来?

我自己包的村里的团支书董表现,确实害人,上半年定了秋后结扎的合同,前几天同意结扎,从17号推到18号,18号推到19号,今天干脆其妻和父亲明确表示不愿去。如这一户挡道,该村后面的人又难发动了。明天我带人再上门做一次工作,如若还不肯去,那只有翻脸动硬的了。

其他村都有几个“死硬”分子或“皮条”,只有采取同样方法了。中国人还有一个弱点:“服狠”。哎,现代科学如此发达,为何总不能解决人类自己的避孕问题呢?如果科学上已能采用简单有效的方法,那我们的工作难度和工作量就大大减轻了。

这是两个恪尽职守、工作认真、忙忙乱乱、劳累不堪的乡长。围追堵截、拆房子、缴罚款、慰问结扎后遗症者,每天工作十多二十个小时,早出晚归,披星星,戴月亮。这还算人道的。河南省农委主任告诉我,他们那儿的乡镇干部检查超计划生育者是否怀孕,有一种极其简便的方法:直接撩衣服挤奶,挤出奶者,就撵到产床“人流”。乡镇干部是吃公家饭的,虽然大多数家居农村,还要抽空回家帮老婆种责任田,但毕竟与乡下还隔了一层。

邹春根就不同了。

他是“鸡头凤尾”,既是中国最小行政单元的领头人,也是大姓家族的代表,凭着他几十年支部书记的经验,乡村社会的许多

地方,是政权控制力所不及的。我去的前不久,他去追邻村偷鱼的贼,结果反被贼打得鼻青脸肿,卧床数天,找镇派出所,“说了好几个月,他们根本不愿来”。我去镇里,他委托我,“能不能顺便去一下派出所,找一下所长,请他来解决问题?”他不放心他承包的那一池鱼,每天晚上,一床薄被,和衣守在池塘边的那间草棚里。腊月天,天天如此。跟我告别:“慢慢走啊!有时间再来。”

他站在蒙河大堤上,指着田地撒野地吃着蔬菜、庄稼的猪牛鸭鹅说:“你看看,这些损人利己的事,谁能受得了!弄得好多地都荒在那里,大家宁愿跑好几公里到镇上买菜也不种。”他作为邹氏“日房”的首领,看到贼盗起,纲纪败坏,世风日下,家族式微的现状,痛心疾首。

四

“晚上有空吗?”他问我。

“有,”

“到我家坐坐。”

支书家的房,是新房。高高大大的堂屋,宽宽敞敞的灶房,盖这房,看得出个中的分寸感来。既不是村里最好的房,也是以象征支书的权威和看到“支书”这份差使辛酸之后的油水。当了二十多年支书,如果真是盖不起间好房,村里人也会瞧不起他,说他无能。

支书有双善良的眼睛,小小的个头,黑红的脸,眼角两边有许多白色的尾纹。那双善良的眼睛,总是在无声地笑着,笑里包藏着一种对上面来人的职业性观察。也可能他正是凭着这“笑”和“观察”使他能在几十年大风浪中,左右逢源,处乱不惊,牢牢巩固自己地位。

“抽支烟。”我递过去一支“红塔山”。

他接过烟，端详着，慢悠悠地说：“这支烟，值六七角钱哪。”

“平常抽什么烟？”我问他。

这时，支书老婆不知从哪里闪了出来，大声封住话头：“他把家里的嘴都顾不住，哪有钱抽烟。”

“原来还有便宜烟‘海鸥’，一角三分一包；‘经济’，八分钱一包；‘香叶’，一角七分钱一包；‘爱民’，一角七分钱一包；‘欢腾’，二角二分钱一包。现在烟贵，干脆戒了。”

他明白老婆的暗示：我支书家也不富裕。

对这种小狡黠，我倒不在意。只报以善意的理解。

闲话休扯。他转身进屋，很庄重地捧出了三大厚本大十六开线装书。

“给你看件东西”。

“《邹氏族谱》。”竖排四个大仿宋。

没电，蜡烛光下，《邹氏族谱》封皮呈酱红色，显得十分凝重。

这本修于清光绪十年，被一种丝状的物质粘在了一起。

“拿把小刀来。”他吩咐道。

我用这把小学生用的铅笔刀，一页一页精心地将粘在一块的页码挑剥开，展开。

这是我第一次完完整整地看到一部家族的历史。十八年前，我曾经去追寻过卢氏家族的根。我在大队支书家的后山坡的竹林中，看到过一块青石碑，上面记载，先祖卢正泰于明末清初由湖北麻城来到四川的经过，正应了“湖广填四川”的历史。传说明末清初，“张献忠剿四川”，大开杀戒，把四川土著杀得鸡犬不留，于是便有了湖广人大规模迁徙四川，垦殖荒凉。

我带着十分的虔诚来阅读《邹氏族谱》。偶尔有只小飞蛾扑到蜡烛的火焰中，烧出一股异味。族谱乃上好的宣纸印制，已是旧黄色。周围静悄悄的，能听见剥去丝状物质时轻微的撕裂声、

呻吟声。

这里非常清晰地记录了一个家族数千年生长繁衍的过程，严谨，精细，庞大，令人惊讶。这里有法则，有秩序，有伦理，有道德，张扬提倡什么，压抑贬斥什么，一目了然。这几乎是一部伦理社会的教科书，大家庭中所有的成员，无论是历史长河中的某一个断面，无论是漂流四海浪迹天涯，无论出现什么天翻地覆的变故，都能寻找到的位置，都能寻找到的家园，都能生生不息，一脉相承。

我不明白，为什么经过了数十年急风暴雨式的革命的荡涤和洗礼，这本族谱能劫后余生如此完美如此顽强地保存下来。

“这本族谱是怎么保存下来的？”对此，我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一九六六年从火堆里偷偷抢出来的。”

“谁抢出来的？抢出来后由谁保存？”

“嘿嘿。”他不愿说。

这期间，又经历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无论保存在谁的手里，都会寻致灭顶之灾。

“嘿嘿。”他还是含糊地笑着。

“什么时候拿出来的呢？”我又问。

“一九八五年人口普查的时候。”

“为什么到那个时候才拿出来呢？”

他不回答。

他不回答，好像是说，自有其道理。

后来有人告诉我，这本族谱一直藏在他家。这在家族中，是一个公开的秘密。他从疯狂的火焰中把族谱抢救出来。他认为他最有条件，在当支部书记前，他当了多年的生产队长，是党的培养对象。他完全可以表忠心，将这“四旧”付之一炬。他没有这么去做。他采取了两套价值并行的策略。在台上，他可以比

谁都革命,革命的口号比谁叫得都响;在家里,却时常翻阅,不断地忏悔和祈祷,以告慰先祖。他敢于在恶劣的环境下冒风险保存族谱,与时尚分庭抗礼,是因为,这是他内心或整个家族的命根子,只有保留住它,才有可能正本清源,才有可能知道他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我有一位朋友姓王,祖上在明清之交“闯关东”,由山东莱阳来到吉林。王姓氏族的一支在吉林数百年,除了他们胶东老家外,还有修订的家谱,证明着他们的来龙去脉。他家是王姓长房,按规矩,家谱保存在他家里,每年腊月三十的早上,他家都要在北墙朝祖坟的方向,摆上供品,摆上家谱,族内每家都要派出代表,来跪拜祭祀祖先,请先祖的灵魂来与大家一起过年。他的童年沉浸在这种祭祖的熏陶中。他不明白父辈们为什么要去做,这样做有什么实际意义,能给现世生活带来什么好处。他不知道先祖生活过的地方离他有多么遥远。他猜想那里一定是一个神秘的地方,是个自由自在的乐土,可以让所有善良人的灵魂安安静静地生活;那里没有疾病、没有饥饿、没有争斗、没有仇恨、没有杀戮,是个期待和希望的所在。他在这种敬奉先祖的虔诚、庄严、肃穆的气氛长大了。然而,在他十三岁的时候,这种仪式戛然而止。虔诚、庄严、肃穆的气氛烟消云散了。从此换上了另外一种仪式,另一种多少有点虚伪和虔诚、庄严和肃穆。好像原来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好像过去的人活着都没有价值,过去信奉的东西,都是一群人无意义的臆造,与这火红的年代不相干。一九七六年的一天,王氏家族接到上级指示,祖坟必须平掉深埋,祖坟周围所有一人抱不拢的松柏必须砍伐,祭祖仪式必须终止,家谱必须焚毁。他父亲把他叫进屋,把即将焚毁的家谱推到他眼前,然后给他数张大红纸,庄严地说“把家谱全抄下来”。没有任何解释。他不懂,想问,但是看到父亲脸上那种少见的冷峻,想问的话,全给堵回去了。他用钢笔抄下了全部家谱。八十

年代中期,这部钢笔誊抄的家谱,成了王氏家族重修家谱的唯一底本。后来,他父亲解释说:我们不能忘记了祖宗!

邹氏族谱重见天日到现在,又过去了十年。这十年,中国社会又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邹春根准备重修族谱了。俗话说:“逢盛世,修家谱。”他负有使命,重振邹氏“日房”族纲。

他找我来,就是想听听我的意见。

“第一步,我想先把这本族谱装裱起来。”他说。

“这是个好主意。”

“大概需要多少钱?”

“如果光是装裱,可能花不了多少钱。如果要重修,可能费用浩大。”

“时机成熟,费用再大也干。”他态度坚决。“过些天,我去月房和星房,听听他们的想法。”

他的想法,似乎是想让日、月、星辰都光辉灿烂,在那心灵的深处呼唤:魂兮,归来!

我支持这种想法。这种有百利而无一害的想法。这样才有可能重温旧梦,与那不堪回首的过去告别。

第八记 告别:一九七六、一九九四

邹斌仔放弃广东的工作,回湖下村老家,有两个意图,一是配合我采访,一是为他的一个宏大设想作最后一番努力。

他准备改造靠山边的五十多亩贫瘠的水田为鱼塘,办生态

养殖场。

在土地如此金贵的平原地区，这可是个非同小可的事情。

需要技术，需要投资，而且，村里还要为此调整各家的责任田。他到处游说，结果是到处碰壁。

逼急了，他直接给江西省长吴官正写了封信，针对减轻农民负担，提出了六条对策：

一、精兵简政，提高办事效率，削减行政费用，增加财政收入；

二、大力发展乡(村)及农民私营企业，提高农民人均收入；

三、在乡(村)两级机构加快人事改革步伐，实行公开招聘，择优上岗，让那些有志经济建设并具有一定组织管理的小字辈进入领导岗位；

四、加强乡(村)两级领导经济、市场、人才观念，以适应市场经济需要；

五、合理利用开发本地资源，优化资源配置，发展种植、养殖，实现农村综合立体化的产业结构，培育和发展乡村市场经济；

六、加强各类技术、管理人才的开发与培训，杜绝各种形式的走过场和半截子工程，这是有文化的新一代农民的要求。

这是一种社会的进步。这种进步，是一九七八年三中全会大规模调整农村政策、实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农民基本上解决了温饱以后的结果，并受到世界的赞誉和高度评价。

解决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村人口的温饱问题，应该说，是个奇迹。然而，这种奇迹并不意味着农民的问题得到了根本的解决。首先，中国还有八千万农民在贫困线以下生活着；其二，在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旧体制的幽灵仍然在农村广大的土地上徘徊，农民还不能按照现代社会和市场经济的规律，得到公正、公平的对待；第三，社会观念中，农民仍然受到歧视。

这些,都非常严重地阻碍着农村社会的发展。

有位经济学家说,未来中国可能有三问题会给中国社会带来麻烦:一是社会转型期相对过剩的人力资源问题,二是土地制度变革问题,三是区域经济发展距离急剧扩大问题。

其中有两项涉及农村。

中国农村可以说基本上解决了生存问题,然而,在如何解决发展问题上,却出现了长期的彷徨。

费孝通先生在六十年前就针对中国农村问题说过:“大家都应该承认这一点,一个站在饥饿边缘上的村庄对谁都没有好处。从这个意义上说,对基本措施,在中国人中间应该没有政治上的分歧。分歧之处是由于事实的误述和歪曲。对人民实际情况的系统反映将有助于使这个国家相信,为了恢复广大群众的正常生活,现在迫切需要一些政策。这不是一个哲学思想的问题,更不应该是各学派思想争论的问题。真正需要的是一种以可靠的情况为依据的常识性的判断。”

现在,“饥饿的村庄”已有了全新的含意。那么,“常识性的判断”是什么呢?承包制曾经使农村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解放,然而,当农村生产力需要进一步解放时,却受到了制度和观念的遏制,农民已经不能满足于“吃饱”的生存状态了,数千万农民工涌进城市,涌进发达地区,便是明证。这数千万农民工中,十五岁至三十岁的青年农民占到了90%以上,便是明证。

邹斌仔更倾向于先在外面学知识,学技术,学经验,学胆量,然后回家乡大干一场。但是,他的想法没人愿意听,家里人也认为他是异想天开。所以,他要把我带到这里来,要我听他诉说宏大的设想。他埋怨乡里没有能与之对话者。

“你看这片田地,瘦得很,每亩顶多打三四百斤水稻。开发成鱼塘就大不一样了。塘里养鱼,岸上养鸡养猪,鸡粪猪粪可以喂鱼,可以立体养殖。技术,我可以出去学,也可以请人来教”。

“水呢?”

“从山那边水渠引。这边地势略低,水也好引。”

“投资多少?”

“三五万元吧。”

“谁来投资呢?”

说到投资,他便不说话了。他神情沮丧。他曾经给那些有钱人发过信,但都杳无音讯。谁会给一个素不相识的农村青年投几万元呢?

这是一个病急乱投医的理想主义者。

理想主义者的身上,多少都带着点悲剧的色彩,与现实多少都有点格格不入。

我找到镇委书记,向他热情地推荐这个想法新颖的小伙子。然则,书记告诉我,他爱莫能助。原来,他对小伙子有看法,动不动就给首长写信,而且口气不小,算什么!给首长的信,由省里转到市里,市里转到镇里,该书记批示说:“请王副书记、邹部长找其本人,按内容做好思想政治工作。”

几天后,王副书记在“文件处理卡”上写:“在本月24日,已找邹斌仔同志谈话,做思想政治工作。”

一封给首长的信,换来了被做思想政治工作。“真是荒唐。我现在需要投资,需要各级政府的支持,不需要思想政治工作的搪塞和敷衍。我的思想没毛病,有毛病的是他们!”

回来的时候,已是傍晚。远村,被层层雾霭缭绕着,已是朦朦胧胧,看不清面目了。恍如蒙河水从伟岸的堤坝上漫溢出来,一群嘻笑打闹的村姑在浣洗纱巾。

我们在田垄上走着。

我们沉默无语,各有心事。

已是冬天的末梢,土地已开始苏醒。地的深处,已能听见惊蛰的骚动。

远处,传来哀怨的唢呐声。悠长而凄婉,牵人魂魄,没有遮拦地传播到鄱阳湖平原的每个角落。

“村里有人家办丧事。”斌仔告诉我。

吹唢呐的乐手,吹累了歇一阵,然后,又是一支一支接着吹。

开始是当地民间流行的哀乐,紧接着便流出了我非常熟悉的曲调。——《在希望的田野上》。“我们的家乡,在希望的田野上,白云在……”。——《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我们有多少贴心的话儿要对您讲,我们有多少热情的歌儿要对您唱……。”

一段我们都熟悉的语录浮现出来:“一首歌就是一段历史。”

哀乐,“忠字舞”歌曲,新时期赞美诗,在葬礼上,就这样被组配起来,产生了一种奇异的效果。让人感到时光的流逝和人生的短暂。在恍如隔世的感觉中,有几分悲凉,几分惆怅,几分陌生,几分亲切,几分滑稽。历史就这样被吹鼓手连缀起来,为死者送葬。

这时,为顾主起劲鼓吹的吹鼓手,断断不会想到,他们的乐曲让一个北京来的陌生人忽然意识到,他是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时来到湖下村的。他正在参加一次告别的仪式。

二

这让我想起了——一九七六年与周恩来、朱德、毛泽东三位开国元勋告别的情景。任何重大事件的发生,似乎都有某种预兆。

年初的腊月间,下里突降大雪,乃四十年所罕见。四十年前那场同样的大雪,把后山和坝子里的竹子全冻死了。接着发生了红四方面军的进驻,红白两军相互的血腥厮杀,上、中、下三里的子弟被送上战场。父亲送儿子,妻子送丈夫,满目都是生离死

别的悲剧场面。父亲回忆说,要走的时候,担任了慈母角色的爷爷,一夜没睡觉,在菜油灯下赶制了两双草鞋,让父亲带着上路。那一夜,父亲也睡不踏实。他在想奶奶。如果奶奶还在的话,他不至于还穿着嫂子的布鞋。父亲告诉我,奶奶是上里山上一个叫箭杆林的女子,性格出奇地好,一直到她暴病去世前,从没有打过或骂过三个孩子。她这么好的脾气,在农村是极其罕见的。无论是怎样艰难困苦的生活,她都不会有任何的怨言,仿佛眼前所有的艰苦,都会在她善良的眼睛里化解,都会成为过去。我插队的时候,曾经和父亲去过一次奶奶的娘家。这是几十年后的一次拜访。娘家人很意外,很高兴,但是很穷,到邻居那借了块豆腐来招待远方来的客人。他们的贫穷和热情,让我心酸。表舅说,这里本来不是这样,原来可以造纸,酿酒,现在不准。……父亲那时十五岁,为了不牵累家人,自作主张,改了姓名,跟着红四方面军撤退北上的队伍,过芦山,进宝兴,翻越因红军而著名的大雪山—夹金山。在夹金山顶,能看见芦山岗,芦山岗下就是我们家。此去生死难卜。我父亲在山顶上望着家乡,流出了眼泪……对于一个与世隔绝的村落来说,一九三五年突然而来的变故,让许多家庭妻离子散,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九七六年初的大雪,又把竹子全部冻死了,情景完全与一九三五年冬天一样。一种不祥的预感在河谷地带蔓延。老人们都说,国家要出事。到底出什么事呢?又谁也说不清楚。雪没命地下,把人堵在家里,长嘘短叹,听天由命。

我们在挖坟的土地上,突然听见公社打开了有线广播。广播正在播送周恩来逝世的消息。

不久,朱德去世。

再往后九月九日,毛泽东去世。

那天,天阴得吓人,举国恸哭,哭得天昏地暗肝肠欲碎,好像天要塌下来似的。全国变成了个大灵堂。根据上级的要求,每

个生产队都搭起了灵堂。我们生产队的灵堂,就搭在仓库,这个私分瞒产和斗争地主富农的场所。灵堂该怎么搭,农村人都很熟悉。“跃刚毛笔字写得好,花圈他写。”“怎么写?”我问。“你自己晓得。”我便参照电影上看来的知识,在挽联的右边写道,“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泽东主席永垂不朽”;左边写道,“下里分社柏树大队三队全体社员敬挽”。然后找张绿纸,大书一个“奠”字。当时不甚懂“奠”的确切含意。因为农村已铲除祭祀的风俗,牌位取消了,祖坟挖掉了,如果说,家家尚有祖先的遗像,顶多不过有点“纪念”的意思。大家如同迷途的羔羊,没头的苍蝇,惶惶不可终日。我则想,神一般崇高的毛主席怎能这样撇下我们轻率离去?我们天天都祝福老人家“万寿无疆”,而上帝只让他活了八十三岁。对于他的死,大家都没有思想准备。我多少有点失落和茫然。我们的脑袋,是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脑袋,我们的思想就是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就是我们的思想。毛主席语录、毛主席诗词,我们都能倒背如流。毛主席已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为了保卫毛主席,可以上刀山下火海,这是千千万万中国人包括我自己的由衷誓言。毛主席就这么走了,将来谁领导我们的生产生活,谁来领导我们革命,指引我们向前进?我把这些担忧,都写进了稿子里。我是公社报道组的头,写作新闻十分勤奋。那些天,县广播站几乎天天都播我写的纪念毛主席的稿子。

除了地富反坏以外,村里所有的人都来到了仓库。大家都规规矩矩排着队,面色虔诚,轮流向毛主席像和我写的花圈鞠躬。鞠躬前是小声抽泣,鞠躬后是嚎啕大哭。有捶胸的、有跺脚的、有拍墙的。哭得最凶的,是一个中年妇女。她是捶胸又跺脚又拍墙,然后哭得往下打滚。她一面哭一面说,但不怎么听得清说什么。“……毛主席呵,我们将来生活怎么办呵,……我的命好苦呵……”她这么一哭,大家反而不哭了,都看着她一个哭,把

土地捶得“嘭嘭”响。

“她不是哭毛主席。”旁边有人小声说。

“那她哭谁？”我也小声问。

“哭她自己。”

“哭她自己？”

这种为自己的嚎哭，把这庄重的场面，一下子搅得滑稽了。大家纷纷离去，留她一个人在仓库的晒坝上哭。一直哭到天黑，哭得声音渐渐变了调，让人们心里发毛。

在我的倡议下，第二天，召开队委会，会议的内容是：毛主席去世了，我们怎么办？

“怎么办？你说该怎么办？”队长白了我一眼说。

“……”我一时语塞，平时的能言善辩，现在却派不上用场。严格地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我自己都茫然。本来想好的一套言辞，在这种气氛下，忽然发现不合时宜。

我观察了一下开会的人，脸上绝对没有我那种“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情绪，他们没有任何表情，仿佛是说，死人他们见得多了，谁掌权，对于农民来说，都要种田纳粮。天经地义的事，怎么也不会变的。

“这事情，讨论个球。太阳——依旧早上升起晚上落。吃完夜饭，依旧上床日婆娘！”有人拖腔拖调地说。

这番粗俗话，惹得哄堂大笑。

好像在座的人心里都有一杆秤，将来怎么办，轻重早就称出来了。——

可我知道，我没有这杆秤，心里不是滋味。我坐在这里，真是多余。我起身走了。我在满腹怅惘中依稀感觉到：一个时代结束了。

预兆应验了。

就在毛泽东走后一个多月，中国社会发生了眼花缭乱的变

化。

宠臣“四人帮”失势。“冤假错案”平反昭雪。邓小平等一批老干部复出，执掌最高权力。“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清算“两个凡是”，华国锋等“凡是派”下台。在政治上站稳脚跟后，紧接着抛出了关于农村问题的三个“一号文件”，在农村大力推行震撼世界的承包制改革。

土地分到了农民的手里。

当农民意识到，自己在为自己干活的时候，当他们获得了有限度的自由的时候，乡村社会便产生了几乎是谁也难预料到的奇迹。

从那以后，下里每年都捎信来说，口粮问题解决了。即使遇到灾荒年都有盈余。这种成果来之不易。

我曾访问过原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杜润生，副主任吴象、王郁昭以及一些参与起草“三个一号文件”的知情人。他们回忆往事，感慨良多。为了让农民获得吃饱的权利，他们付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进行了惊心动魄的抗争。“要吃粮，找紫阳；要穿衣，找万里。”历史理应记住他们。

三

我该走了。

我去与邹春根告别。

我想请这位当了二十多年的支部书记谈谈未来。这个党的最基层组织的头，看着他这条线最顶尖领导人走马灯似地换，而他却稳如泰山，在经济大海的一个角落，冷眼观察着沧桑变化，世态炎凉。

“你看我的任上经历过多少人，毛主席，华主席，胡总书记，赵总书记，江总书记。”他掰着满是老茧的手指头给我数。“我这

个角色好比磨豆腐，中央是上面转的磨盘，我是下面不转的磨盘。不管你上面怎么变，我以不变应万变。”

“你在下面看得清，能不能评点一下主席、总书记？”

“这可是政治问题，不好评。说是不戴帽子不打棍子，有那么轻巧的事情？害怕呀。”

“有什么害怕的呢？大不了还是个种地嘛。”

“这也倒是，几十年了，什么风浪没见过？混了二十多年，也就是混了个半脱产，只有半碗饭，半碗饭还不满。”他显然对这个话题有兴趣。“我说了，你可不要见笑。这些人，各有各的特点，老百姓的话说，一朝天子一朝臣，朝朝天子出好人。天子都是人才嘛。哪个皇帝不想为老百姓办好事，让老百姓过好日子？”

这是个狡猾的开场白。

他接着评述道：“毛主席对社会做过大贡献。他没有‘私’字，一家人，老婆、孩子、兄弟都为了革命牺牲了，一般的天子，难以做到这点。第二个方面，一世生活朴素，死时没什么遗产留给子孙。晚年有错误。中央内部有没有篡党夺权，我也搞不清楚。我个人认识浅薄。党内斗争复杂，也没有原来那么统一。所以工作上过‘左’。毛主席时，生活比现在穷，但比原来还是进步了。虽穷，但是社会治安好。”

“华国锋当了三年主席，在群众中还是有影响。我们这里的人都念他的好。一九七七年，他号召大搞农田基本建设，使我们干成了蒙河大堤，根除了洪水灾害，但是他没有中央工作的经验，所以吃了亏。”

“胡耀邦也好，赵紫阳也好，江泽民也好，他们都是围绕着邓小平的改革思想转，没有自己的东西。这三个人办的事，都是邓小平的意见。”

他用他的语言，为他所经历的党的最高领导人作了一幅政治画像。这里面包含着对未来的喻示。

谁来管他，他听谁的。

他说，对于未来，可以归纳为八个字：静观其变，听天由命。

与邹春根比较，邻近的管付村支书付建年似乎更乐观一些。付建年一九九三年当支书，号称“激奋楼主人”。

这是个走南闯北的中年人。他曾长年在外面办厂、做生意，赚了笔钱后，毅然回村当了支部书记。本来安排他先当村长过渡一下，被他拒绝。他说：“要当就是支部书记，第一把手，要不然，干不成事情。”

他请了本镇一个土秀才到家喝酒，酒酣耳热之时，命家人捧出早已备好的墨斗，请上二楼新房的白墙上写上三个斗大的字：“激奋楼”。以述心志。

他在给我的信中说，管付村七百八十六人，还有百分之五的人有温饱问题，一百七十六户人家还有百分之八十以上背着债务。为此，他制定了两个五年计划（一九九三至一九九七年、一九九八至二零零二年），最终目标是：人均年收入上万元，全费资助本村儿童上完中学，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农民进入工厂化，百分之二十的农民进入商业化。全部计划的第一条，就是“解放思想”：“从根本上改变村民仅会产粮的生产意识，引导他们农业精作，渔业精养，畜牧业上规模，走上以畜业和工业化为中心的轨道。”

他的信念是，“壮大集体经济，全心全意地为村民谋利益”。

不过，这仅是他要准备付出努力时的一厢情愿，拥戴他上来的村民未必不给他难堪。前不久，一农妇的一头母猪被雷电击死，她把死母猪背到他家门口，要他负责赔偿。

“猪是老天爷打死的，怎么能让我赔呢？”他又好气又好笑。“我管得再宽，也就是七八百个人，哪能管得着天王老子。”

他看出农妇是想讹他这个在外面“发了财”的支部书记。她把他当作了财神。“真是荒唐！”他以为，农妇只是贪图小利，想

捞点本回来。“好啦好啦，给你一百元补助。”没想到，农妇看他松了口，便得寸进尺，更加闹得厉害。

他真生气了“一百元不补了！你明天拿个大棒来我家猪圈，拣那长得最大最肥的打死一头抵命！”

“我可不干。”农妇一愣，噤嘴地说。

“不干，那你就牵走一头！”

“扑哧”，农妇给逗笑了。围观者又是捧腹又是数落农妇太过分。

“笑什么！”他大吼。“你们都给我走！”

大家散去，农妇也知趣地走了。

他跟我说，谁来判定这些事情。简直没有了起码的规矩和廉耻。

他对道德的振兴持悲观态度。

河南临颍县南街村的总支书记王洪彬对此却信心百倍。借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之际，他在村里打起了醒目的横幅：

“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

直接抬出了浩劫时期的口号。

对于富裕的南街村民来说，只要社会治安好，能过上好日子，谁统帅都行。

南街村民，家家都挂两张像，一张是毛泽东，一张是王洪彬，王洪彬让全村人致了富，全村人便崇拜他。他说怎么着，就怎么着。

在王洪彬眼里，毛泽东时代并没有终结。他在村中心，为毛泽东竖了雕像，并镌刻了碑文。碑文全文如下：

饮水思源 垂教后人

禾苗生长靠雨露阳光，南街兴旺靠毛泽东思想，这是南街人在长期实践中取得的共识。正是毛泽东思想照耀南街人从黑暗步入光明，由贫穷走向富裕。

南街党组织坚持以毛泽东思想育人,领导群众大学毛著,立足南街,放眼世界,认真反思,大胆探索,终知无工不富,决心走毛泽东思想指引的集体富裕之路。一九九一年率先取得省亿元村桂冠,产值连年翻倍,总支被省委命名为先进党组织。村里实行工资和供应相结合的分配制度,入托上学养老一律免费,图书馆、体育场等公益设施陆续建成,新学校村民楼正在兴建,村里工厂林立、机声阵阵,道路宽阔,花木成荫,村民文明礼貌,和睦团结,乐于奉献,敬业乐业,革命歌声到处回荡,欢声笑语随处可闻,民风朴实,井然有序,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南街是省级文明村。

村总支怀着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逐步扩大公共积累,跨越小康,向共产主义迈进。一个具有高度精神文明和高度物质文明的共产主义的新南街正在中原大地崛起。

饮水思源,南街人铭记党和毛主席的似海恩情,值此毛主席诞辰一百周年之际,敬建毛泽东雕像,并撰文刻石,以志伟绩,昭示后人,千秋永记。

我相信,所有经历过“文革”十年浩劫和现代迷信、个人崇拜由大树特树到崩溃全过程的人们,看到这座新塑像和碑文的心情是复杂的,多少会有些忧虑。因为目前尚没有认真细致的调查,还不好妄加评语,进行政治文化意义上的分析。碑文所提倡的东西,是否能在一个思想多元化的乡村社区中统领和主导人们、特别是年轻人的行为,这里也暂且不予讨论。

我想说的是,南北传统农业区三个支部书记的三种态度让未来呈现出了莫衷一是的复杂的景象,在景象尚未明朗之前,过早的结论,似乎没有意义。

四

我和邹斌仔坐火车回到了南昌。

我们住进了江西宾馆。这是个三星级宾馆。一天二十四小时热水,每天都有服务小姐来打扫卫生,叠被铺床。

我发现邹斌仔有点心神不宁。“这是我第一次住这么高级的宾馆。”一天前,我们还住在他那间土坯房里。他辅助我圆满完成了湖下村的采访调查,我却对他所设计的事业没有任何实际帮助。为他的事,我曾和村支书和镇书记谈过,但是都没有结果。那里的人把他的想法视为邪门歪道,把他视为不安分守己的叛逆。

现在我还能给什么帮助呢?他丢掉广东的工作,回到江西来圆他的梦,等待他的却是又一次失望。

我的手下意识地伸进兜里。可我一看到那双绝望和忧郁的眼睛时,无论如何没有勇气把钱拿出来。怎么说呢?“斌仔,这点钱,你拿着,我的一点心意。”这话说得出口吗?像是买了东西付帐一样。

看得出,我带给他的反差太大了!住在三星级宾馆里,已把他的自尊心逼到了最脆弱的临界点。我不能在他受伤的心上再撒把盐。

可是,除此外,我还能怎么帮助他呢?我的手在兜里捏出了汗。没想到,我们告别的场面会是这般悲凉,没想到,我们的告别,竟是这般困难。

前天晚上,我们从镇里回村,已是漆黑一片。天,下着雨。我们被淋透了。田间小路,崎岖泥泞。走到半路,我产生了一个怪念头,突然停下来,把电筒关了。

顷刻间,我们完全被这黑夜吞没了,如同跌进了一个没有尽

头的深渊。浓密的细雨,落到身上,落到地面上,没有声音,只有天地间的沉默——无穷无尽的沉默,令人惊恐万状的沉默。东西南北已混为一体。我们被融化为此黑暗的一个部分,肢体仿佛都被这黑暗疯狂地撕吃干净,只剩下两颗心在跳动。

我害怕了。莫非在光明熄灭的一刹那间,“我”便真的不存在了?我想大喊一声,可是喊不出来。

我们彼此相隔不到一米,可谁也看不见谁。

“咱们现在谁最重要?”我突然问。

“你最重要。”他说。

“为什么?”

“你有电筒。”

“不对。你最重要。”

“为什么?”

“你认路呀。”

“不对。没电筒,这么黑的天,怎么回得去?”

好像是两个悬浮在天空中的灵魂在交谈。

问题充满了玄机。这个问题突然提出时,我们同时发现,命运的一半,操纵在对方手里。我们彼此都失去了独自到达终点的能力,形成了不可或缺的强烈的依赖感。

我们同时发现,我们走到了一个让人喘不过气来的心理的真空地带。

他要走了。

我甚至不知道告别时该说什么。

说什么都好像没有意义,说什么都显得矫情和虚伪。

劝戒?安慰?许诺?

两种处境下的劝戒、安慰、许诺,已经太多太滥。

他转身融进匆匆的人流中。

他此去仍然没有落脚点。他会去哪儿呢?回家?在家里肯

定呆不住。那块土地对他已经失去了魅力。南下回广东？……此去依然飘泊，依然茫然。

我在《潮地》中写到：“飞来”朝着太阳的方向奔去。

湖下村的太阳留给我的最后印象是什么呢？——张贴在天上的苍白的剪纸，一个被雾霭简化了的抽象符号。

一九九四年五月十七日 北京木樨地

更多好書:

[*http://myboooks.googlepages.com*](http://myboooks.googlepages.com)